



杨天石 著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

上



杨天石 著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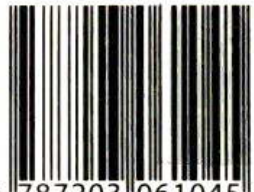
蒋介石日记解读

下

作者是我国著名的民国史专家，尤长于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者即长期阅读并深入研究保存在大陆和台湾的蒋介石日记的“类抄本”和“仿抄本”，多次赴台湾阅读蒋介石的“大溪档案”，多次赴美、英、日等国阅读与蒋介石相关的历史档案。2006年、2007年，作者又两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阅读陆续开放中的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本书即为作者研究蒋介石日记的成果精选。所收各文，或为新作，或据日记手稿修订、增补。

责任编辑 / 石凌虚
选题策划 / 汉唐阳光
特约编辑 / 程震
封面设计 / 思想五社
010-88383510

ISBN 978-7-203-06104-5



9 787203 061045 >

定价：60.00元（上、下册）

吕芳上 台湾原中研院近史所所长

蒋介石日记的丰富内容，一如杨教授所言，是治民国史不能不看的重要史料，是史学家可以长时期、多方面挖掘引伸的宝藏。我们乐于看到杨教授第一部努力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著作的出现，民国史学界一定会热切期待他续集、三集……的出版，因为只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一个重要又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蒋介石，才能真正走下神龛、走出政治的牢笼，真实的面貌才会呈现。

牛大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读他（杨天石）的著作，我们总能发现以前不知道的知识。杨天石比较注重叙述，他不是要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或构建一个宏观体系。他擅长用叙述把历史的细节复原，在这种重建中追求新知。即便是专家看他的书，翻几页就会发现新东西。

蒋永敬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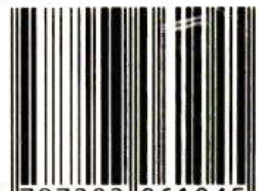
天石参与民国史的工作，涉猎的范围，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国民党派系斗争等，特别对蒋介石的研究，都下过很深的工夫，有很多的发现和创见。

李又宁 美国圣若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先生）不但博闻强记，而且目光敏锐，有淘沙拣金的本领。别人没注意的，他注意了；别人看不出所以然的，他看出了。他能宏观，也能微观。经他的整理和解释，许多史事和人物，都跳出纸面了。

责任编辑 / 石凌虚
选题策划 / 汉唐阳光
特约编辑 / 程·震
封面设计 / 思想互社
010-8888510

ISBN 978-7-203-06104-5



9 787203 061045 >

定价：60.00元（上、下册）

《 》

杨天石 著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

中华书局出版

①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杨天石 著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

下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杨天石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5

ISBN 978-7-203-06104-5

I.找… II.杨… III.蒋介石(1887~1975)—日记—1918~1945 IV.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6345 号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著 者：杨天石

责任编辑：石凌虚

选题策划：汉唐阳光

装帧设计：思想工社

出 版 者：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10-62164516

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4922208 (综合办)

E - mail：fxzx@sxskcb.com

web@sxskcb.com

Renmshb@sxskcb.com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55mm×965mm 1/16

印 张：35.75

字 数：400 千字

印 数：1-10000 册

版 次：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6104-5

定 价：60.00 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

[台湾] 吕芳上*

—

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处在剧烈变动的时代。许多动乱的发生和曲折发展的过程，里里外外，直接间接，似乎都不能不注意领导人物、群众活动、文化变迁、国际因素等的相激相荡，才构成中国现今的局面。至少在半个世纪之前，以近代史作为史学学术研究的一支，还颇见争议。近代历史虽有数据宏富之利，但更有问题复杂、事多隐晦、人多在世的困扰，尤难摆脱现实政治的纠缠。所幸 50 年后的今天，尤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全球冷战架构解体，政治与学术空气益见宽松，近代史研究已渐成气候。以蒋介石研究为例，海峡两岸对蒋一向的“神”、“鬼”之辨，到如今视为有成有败、有功有过的“凡人”，蒋介石走入历史，社会因此更见成熟。

二

1930 年 6 月，陈寅恪为陈垣《燉煌劫余录》作序，说了这样一段话：

* 本文作者原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现为台中东海大学教授。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泉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

发掘新资料、引进新理论、提出新问题、得出新结果，这是近代史学研究的基本精神。20世纪80年代以来，即以近代中国政治史的研究而言，在抛弃旧有思维框架、运用科际整合方法，具备国际视野、重视团队合作的条件下，运用新资料，提出新问题，已逐步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和前所未有的视野。举例言之，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解严之前，近代政治史本存有若干“禁区”，例如国民党内部派系问题、台湾史、中国共产党史、“汉奸”等的历史，都少有史家涉足；也有若干在国民革命史观下难予突破的研究困境，例如伟人事迹、群众运动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局发生重大变动，近代史研究也跟着发生意义深远的变革。以国民党史为例，在数据方面，国民党数据的空前开放，蒋介石档案的全盘解密，蒋介石日记的陆续公开，对民国史研究议题的开发、历史问题的解决均具正面意义；在历史解释方面，旧有思维框架的摘除、以多元取代一元的论述，历史不再为政治服务已完全可能。摆脱僵化史观、远离伟人教条，去除条条框框，“党史”、“国史”可以区分，“党同伐异”的话语系统逐渐淡去，把握宏观、研究微观，还原“史学是找资料证明的学问”，带给近代史学者更多发挥的空间。这也正是海峡两岸历史学者欢迎的气氛，想来也应是杨天石教授新著出版的重要时代背景。

^① 陈寅恪：《陈垣焘煌劫余录序》，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2分册（1930年6月），现引自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第266页。

三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之一，如何依据原始资料还原其本来面目，一直是史家的兴趣也是任务。早在2002年杨天石教授即有感于民国史事不免加油添醋，民国人物难免涂脂抹粉，致事件云遮雾绕，人物面目走形，因此勤快走访四海，广搜史料，然后以专题发掘蒋介石自民初以迄20世纪40年代史事，“目的是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以便进一步准确地阐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本此精神，2006年3月，当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首次开放蒋介石日记时，杨教授是学者中进入档案馆内阅读日记拔得头筹者，上穷碧落下黄泉，他的勤快、执着与用功，直叫人敬佩。

大体历史人物的研究，在握有最重要资料之后，得寻求基本史实的确凿、深切认识时代环境、掌握各阶段思想的发展，集中关键又发人深省的议题上进行发挥，不回避、不窜改、不苛求、不溢美，又能恰得其分，是为上乘之作。杨教授的诸篇论文根据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复又以各种文献、史料比证、勘核，可谓充分占有并正确运用史料的优势；从蒋介石自认对孙中山、陈其美忠心耿耿的刺陶（成章）案，经营上海号子（证券交易所）的失败，1923年蒋自认“吾前程发轫有望”的苏联之行说起，到蒋胡汤山事件，对日秘密谈判，史迪威事件中的蒋、史、宋（子文）角色与冲突，重庆谈判中蒋对毛泽东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的内心世界，乃至蒋的私生活，每一议题都从疑点出发，回到论证严密的答案中。这本书的文章十分重要，是谈人人一直想知道又得不到正确答案的历史议题，这种问题意识的掌握，不只是史才、史识的兼备而已。

四

2007年夏，个人有幸，与杨教授同时在胡佛研究所检阅蒋介石的日记。杨教授的文字斐然一如其便给口才，思路清晰，见识广博，予人印象深刻。杨教授早期治文学，然后有哲学训练的机缘，终乃投入历史的研究，其根柢之深厚，卓然成家，自有渊源。

蒋介石日记的丰富内容，一如杨教授所言，是治民国史不能不看的重要史料，是史学家可以长时期、多方面挖掘引伸的宝藏。我们乐于看到杨教授第一部努力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著作的出现，民国史学界一定会热切期待他续集、三集……的出版，因为只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一个重要又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蒋介石，才能真正走下神龛，走出政治的牢笼，真实的面貌才会呈现。

2007年12月25日 敬序于南港

自序

人的本相常常迷失，历史的本相也常常迷失。

人的本相迷失的情况很复杂。一种是因“捧”。将某一个人捧为天纵之圣，绝对正确，永远英明，仿佛斯人不出，世界就永远处于黑暗中一样。一种是因“骂”。将某一个人骂成十恶不赦，坏事做绝，祸国殃民，是千夫所指，人人皆曰可杀的天字第一号大坏蛋，仿佛一切罪恶，一切黑暗，均源于斯人。

蒋介石生于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逝世于1975年4月5日，活了88岁。他一生经历了近、现代中国的许多大事。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护法；孙中山逝世后，领导北伐、清党、剿共、抗日、内战，很长时期内担任中国党、政、军三方的最高领导人，位居“元首”。既和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又两次分裂。1949年后退到台湾，既坚持反共复国，又坚持一个中国，在活过88年以后去世。在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被神化、美化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高勋盛德”，“光华流泽”；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则被鬼化、丑化为人民公敌、元凶首恶、民族败类、千古罪人。

两种情况，简单的捧和骂，都背离蒋介石的实际，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寻找。

廓清迷雾，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正确评价其功过是非，揭示其本相，对于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国共关系，正确认识和书写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有其必要；对于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也有其必要。时至今日，距离蒋氏去世已经30多年，距离当年国共大战、生死搏斗的年代也已快到60年，尘埃早已落定，各种恩怨都已化为历史陈迹。人们全面掌握资料，综合蒋氏一生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对其做出比较科学、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已有可能。

我从20世纪70年代起，投身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开始研究孙中山，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研究蒋介石。第一步，在海内外广泛收集资料，第二步，选择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研究。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将他的部分日记和手稿交给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存，我曾以这批资料为主撰写了一批论文。2002年，结集为《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后，我又多次到台湾，研读蒋介石带到台湾的大量档案，特别是根据其日记所编写的《困勉记》、《省克记》、《学记》、《事略稿本》等资料，写成又一批论文。2006年3月，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开放，我有幸受邀成为最早的读者之一。2007年，胡佛研究院继续开放日记的1932至1945年部分，我再次受邀访问该院。

日记，记个人经历和内心世界，在各种历史文献中有其特殊价值。蒋的日记，长达五十余年，大有助于人们了解其内心世界和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当然，只看日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大量阅读相关的档案资料和文献，反复比较、勘核，同时，将蒋的所思、所行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思考、研究，才有可能揭示真相，找出真实的蒋介石来。

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得到过许多鼓励。1988年，我的《中山舰之谜》一文发表后，胡乔木多次在谈话中称赞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当面对我说：“你的路子是对的，

要坚持这样走下去。”2001年，我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完稿，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审读，得到“华夏英才基金”资助，于2002年出版。但是，我的研究也碰到过若干困难。2003年，有少数几个人化名给中央领导和有关机构写信。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我的书，就张冠李戴、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吹捧蒋为“民族英雄”，要求对我加以惩处。幸赖中国已经处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我的书和我的研究采取肯定和支持态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坚持和继续。

本书是我多年来所写关于蒋介石研究专题文章的一个精选本。部分文章利用收藏在大陆和台北的蒋介石日记仿抄本或类抄本写成，部分利用胡佛研究院开放的日记手稿复印本写成（本书注释简称为“手稿本”）。由于类抄本经过不同程度的删削、改动，已非原汁原味，故此次再到胡佛研究院访问，又利用日记手稿的复印本对各文所引日记进行核对，并作了部分增补或修订。

2006年我在胡佛研究院阅读蒋介石日记时，新华社有一位记者要求我简明扼要地对蒋介石“定性”。我曾说过三句话。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三、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同年在香港凤凰卫视演讲时，我曾对此作过比较详细的阐述：大陆时期，蒋介石反清、反袁（世凯）、反陈（炯明）、创立黄埔军校，是功；领导北伐，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直至胜利，是大功；1927年至1936年的“清党剿共”和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内战，是大过。台湾时期，实行土改，反对台独，是功；白色恐怖，是过。我至今仍坚持这样的看法。也许有读者不同意，或者不完全同意。这是正常的。见仁见智，说三说四，都可以，但是，要用学术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斯所祷也。

看来，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恢复其本来面目，正确评述其功过是非，给以准确的历史定位，其事有相当难度，其时将不会很

短，只有群策群力，通过长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道路解决。通过“争鸣”，人们对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党史，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将会进步，将会深入，距历史本相将越来越近，科学性也会越来越强。应该说明的是，本书根据蒋介石的日记论述蒋介石生平的若干问题，故副题《蒋介石日记解读》，但是，本书远不足以概括蒋丰富、复杂的一生，也不足以表现蒋介石日记的丰富内容，故以后会有续集、三集的出版。

感谢蒋方智怡女士开放蒋介石日记的无私而勇敢的决定。感谢胡佛研究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机构多年来给予的阅读便利。感谢马若孟（Myers Romon）教授、郭岱君教授、宋曹琍璇女士、潘邦正博士、林孝庭博士等许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

斯为序，并期待海内外广大专家、读者的批评。

著者，2007年7月15日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之 Blackwelder Court，时为第四次访问胡佛研究院也。

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

一 日记现状

根据现有资料，蒋介石的日记约始于1915年，28岁，止于1972年8月，85岁，距离去世只有3年。这一年，蒋介石手肌萎缩，不能执笔，因此停止了长达57年的日记。蒋的这57年日记，遗失4年。其中1915、1916、1917三年，遗失于1918年底的福建永泰战役。当时，蒋介石遭北军袭击，孤身逃出，日记、书籍大部分失落。现在能见到的1915年日记仅存13天，为蒋当年在山东任讨袁军参谋长时所记。胡佛研究院对外所称1917年日记实际是蒋自撰的回忆，题为《中华民国六年前事略》，回忆1917年以前的个人历史，并非日记。1924年的日记则可能遗失于黄埔军校时期，毛思诚在20世纪30年代编辑《蒋介石日记类抄》时就未能见到。因此，蒋介石日记现存53年，共63册。在中国以至世界政治家中，有这么长时段的日记存世，内容如此丰富，大概绝无仅有。

蒋介石日记原由蒋本人保管。蒋去世后，由蒋经国保管；经国于1988年去世后，嘱其幼子蒋孝勇保管。孝勇于1996年去世

后由其夫人蒋方智怡女士保管。2004年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女士动员，决定将日记寄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时间为50年。胡佛研究院的马若孟教授及郭岱君教授亲自去加拿大及美国加州的蒋宅，将这批日记携到胡佛。

蒋介石日记的状况并不很好。若干部分已经霉烂、损毁。胡佛研究院接受这批日记后，立即投入力量修复、保存，并用现代科技进行微缩摄影，制作复本。宋氏家族的曹琮璇女士和秦孝仪先生的高足潘邦正先生受蒋家委托对日记进行初读，对涉及个人隐私的少量内容进行技术处理。2006年3月首度向公众开放1918至1931年部分。2007年4月又开放至1945年，其余部分将陆续开放。其少量技术处理部分将在30年后全部恢复原状。

蒋介石日记有手稿本、仿抄本和类抄本、引录本等几种类型。胡佛研究院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绝大部分由蒋介石亲笔书写，可以称为手稿本或原稿本。蒋从早年起，即陆续命人照日记原样抄录副本。抗战时期，蒋介石离开重庆出巡，为了防止遗失，有部分日记由秘书俞国华抄存。由于这两种本子从内容到格式和手稿本都一模一样，因此可以称为仿抄本。这种仿抄本，大陆保存少数，胡佛研究院保存多数，自1920年至1970年，中缺1924年、1948年、1949年各年。

蒋介石一生崇拜曾国藩，在很多地方都模仿曾。曾国藩有日记，还有别人替他编辑的《曾文正公日记类抄》。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蒋介石陆续将自己的日记、来往函电、文稿等许多资料交给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管。毛即利用这批资料编辑长篇著作《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同时，毛思诚模仿《曾文正公日记类抄》的体例，将蒋的日记分类摘抄，计有党政、军务、学行、文事、杂俎、旅游、家庭、身体、气象等约十种，统名为《蒋介石日记类抄》。一般称之为“类抄本”。毛的做法是首先摘抄蒋的日记原文，然后加以文字润色，并不改变蒋的原意，所以还是可信的。但是，仍有个别地方，毛思诚为了将蒋的

形象显示得更完美些，有些改动和原文相差较远。例如，蒋早年比较激进，主张将资本家“扫除殆尽”，毛思诚就改为“如不节制资本”。又如：九一八事变后，蒋日记曾有“以忍耐不屈之精神维护领土”的说法，但毛思诚却修改为：“以坚强不挠之气概吞压强虏”。这一改，蒋的形象“完美”了，但也就不真实了。毛在编完《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后，《蒋介石日记类抄》和少数蒋日记的仿抄本以及其他函电、文稿等就一直保存在宁波家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氏后人将这批资料藏在夹墙里。“文革”中，红卫兵砸破墙壁，发现这批资料，逐级上报，一直送到公安部。公安部拨交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文革”后，毛氏后人将这批资料捐献给国家。

抗战时期，蒋介石命奉化同乡王宇高、王宇正继续按分类原则摘抄自己的日记，分《困勉记》、《省克记》、《学记》、《爱记》、《游记》五种。《困勉记》记录蒋在艰难中勉力奋斗的事迹。《省克记》记录蒋的自我反省和克己修身。《学记》记录蒋的读书心得。《爱记》记蒋的人际关系和对同事的看法。《游记》记蒋的游历。主要资料来自蒋的日记，但编者也偶采日记之外的资料，而且有些资料我们今天已经难以一一见到。其特点是用第三人称的口吻记述，和毛思诚的《蒋介石日记类抄》并不完全相同。不过，编者基本上忠实于日记。编者所述和日记摘抄常用“公曰”分隔，“公曰”以下的内容一般抄自日记手稿本，因此可以大体归入“类抄本”。不过这五种本子的文字都较日记手稿本简括，也有编者润饰、修改之处。除文字出入外，有些内容，日记手稿本没有。例如，1940年11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向重庆国民政府求和，蒋当月7日的日记手稿为：“周作民受敌方请托条件转达者，商人不察，以为较倭汪之条件减轻，其实文字变换，而内容无异也。商人只知私利，可痛！”而《困勉记》的记载则为：“此条件，不过文字变换，而内容实无少异。钱新之不察，以为较汪奸之条件减轻矣，希望政府采纳，是只知私利而

不顾国家者也，可痛。”两种本子，内容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后者点出了在松冈和蒋介石之间牵线的银行家钱永铭。这一变动，一种可能为蒋介石审阅时所加，一种可能是编者根据其他资料所加。两相比较，《困勉记》这一条的史料价值显然更高。当然，手稿本也有很多有价值的史料，被《困勉记》的编者删掉了。

蒋介石在命人编辑《困勉记》等五书之外，又命同乡孙诒等编辑《事略稿本》。这是年谱长编性的著作。全稿按年、月、日收录、排比与蒋的生平有关的各种资料，如文告、函电等，其中也大量摘录蒋的日记。该书承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自1927年始，止于1949年。同样，它对蒋的日记有删选，有压缩，有加工。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编者为了维护蒋的形象，对日记手稿本中的部分内容有所讳饰。有些地方，编者还曾根据后来的历史环境对手稿本的文字作过删改。例如，抗战后期，蒋介石与美国冲突时，曾经多次在日记中痛骂“美帝国主义”。这些激烈语言，在《事略稿本》中就找不到了。

《困勉记》等五种稿本现藏于台北“国史馆”。《事略稿本》也藏于该馆，近年来陆续刊行。不过，由于该稿卷帙庞大，刊行速度较慢，全部出版恐尚须时日。

秦孝仪主编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可以视为《事略稿本》的简本。其中所引蒋的日记未作说明，也有修饰，个别改动甚至距手稿本较远。该书印数很少，属于内部资料性质。由于该书仅编至1949年，近年来，台湾学者刘维开教授等正在续编，已出1950年、1951年、1952年三册。

此外，20世纪50年代，日本产经新闻社以日文出版了《蒋总统秘录》。为帮助该社编辑此书，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派专人摘抄、提供了包括蒋介石日记在内大量文献，因此该书在叙述蒋介石生平时曾部分引录蒋的日记。后来美国学者黄仁宇写作《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即根据《蒋总统秘录》

和《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此后海内外学者研究蒋介石的著作，所引日记不少出于此书。其实，黄仁宇本人并未读过任何蒋日记的手稿本、仿抄本或类抄本。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事略稿本》、《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蒋总统秘录》等书不以公布蒋的日记为目的，其主体部分也不是蒋的日记。勉强分类，只能称之为蒋的日记的“引录本”。至于2007年初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张秀章编著的《蒋介石日记揭秘》则是一本伪书，笔者已有两文揭露，此处不赘。^①

二 真实性问题

日记记录本人当日或当时亲历亲见之事或个人所为所思，不仅比较准确，而且私密度很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蒋介石，是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决策者，长时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从他的日记中，人们能够了解蒋介石的思想、性格、活动以至他的极为隐秘的内心世界，了解蒋介石和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特别是了解那些不见于新闻媒体、政府公报，为局外人所不可能得悉的、深藏的政治内幕。但是，蒋的日记可靠吗？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主要为写给别人看的，这种日记往往装腔作势，把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例如阎锡山的《感想日记》，满篇都是《论语》式的格言，一望而知是教人如何成圣成贤的，没有多大价值。一种是主要为写给自己看的。此类日记，目的在于自用，而不在于示人传世，其记事抒情，或为备忘，或为安排工作与生活，或为道德修养，或为总结人世经验，或为宣泄感

^① 参见《杨天石近代史文存》第5册《哲人与文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附录。

情，往往具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蒋的日记大体属于此类。

蒋虽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后生活一直比较荒唐，我曾称之为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亡命日本东京，受孙中山之命，加入中华革命党，同时尽力读书，在这一年读完《曾国藩全集》，深受影响。1916年，他的引路人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这件事给了蒋介石以极大刺激。“自矢立品立学，以继续英士革命事业自任。”^①他决心从此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每日静坐、反思，按儒学要求克己复礼。此后的一段日记应该比较真实。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他继续用儒学、特别是宋明道学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存天理，去人欲，日记成为他个人修身的工具。他修身的愿望是真诚的，日记自然也有相当的真实性。此后，他的日记逐渐增添新的内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记录，治兵、治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总结等。蒋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常有反思，他的日记也就相应成为反思的载体。这一段时期，蒋介石还不会想到他将来会成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要人，他的日记会长期流传，成为历史学的研究资料，因此，没有必要在日记中矫饰作假。等到他地位日隆、权势日重之后，他自然明白其日记的重要，但是，由于他继续通过日记记录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计划，提醒应注意事项，并继续用以治心修身，是为自用，而非用以示人，因此，一般会如实记录，而不会有意作假，自己骗自己。例如，他抗战期间的日记一般分几个部分：1. 提要。记当日主要事件或主要心得、主要修养要求。2. 预定。记一二日内应做之事。3. 注意。记对国内外形势的思考和应加注意之事。4. 记事，记一日所做主要之事。5. 上星期反省录。6. 本星期预定工作纲目。7. 本月反省录。8. 本月大事表。等等。假如蒋

^①《蒋介石自述革命思想之起源》，《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9年8月31日。本书所引蒋氏未刊日记、回忆、杂录，除特别注明者外，均为美国胡佛研究院藏。

在这些项目中造假，等于是给自己造成混乱。

说蒋记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有些事，他是“讳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系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又如，1931年的软禁胡汉民事件，蒋只记对自己有利的情况，而不利的情况就不记。再如，抗战期间，蒋介石派宋美龄去香港指导对日谈判，他就绝对不记。蒋自己就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可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同时，他的日记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自然，他所反对的人，反对的事，反对的政党和政派，常常被他扭曲。有些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样子。因此，只能说，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不是句句真实，事事真实，而且，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看蒋日记会是很大的不足，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

蒋的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主要为示人，为公布。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

一、蒋身前从未公布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向公众宣传，进行自我美化。当然，他会想到身后立传，使自己的事迹流传的需要，这一功能主要由《困勉记》和《事略稿本》一类著作完成。蒋一般会选择自己的同乡或亲信进行编辑，这些人自然会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删削或修改部分内容，而蒋本人也会逐本校阅，严格把关。二、蒋喜欢骂人。在日记中，蒋骂过许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黄郛，亲属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汉民、孙科、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下属如周至柔等，几乎没有人不被他骂，而且骂得非常狠。蒋如果考虑到要示人、要公布，他就不会在日记中那样无所顾忌地骂人。三、在日记中，蒋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欲”之间的艰难挣扎，甚至为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自慰”等。此类事，蒋在日记中都如实记录，显然，记这些，决不是为了示

人，更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高大与神圣的形象。

因此，我的结论是，蒋介石日记是研究蒋介石，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亚洲史、世界史也有相当的价值。有经验的、精心的阅读者从中将会发现很多可以推进或加深其研究的内容，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某些既定的观点，写出更准确、更科学、也更丰富的历史著作。

本 PDF 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目 录

序言 / [台湾] 吕芳上

自序

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

一、早年经历与思想

3 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

附记：蒋介石的自我评估

13 蒋介石的早年思想

——从向左到向右

35 做“圣贤”还是做“禽兽”

——蒋介石早年修身中的“天理”、“人欲”之战

55 蒋介石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蒋介石下海从商的缘由、经过与感受

附记：孙中山也是股民

二、北伐前后

85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苏联之行

——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纪实

- 127 中山舰事件之谜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拐点
- 151 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
- 173 “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
——追求法治始，破坏法治终
附记：蒋介石的追悔

三、抗日期间

- 199 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
——调整国内外政策的开端
- 219 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
附记：蒋介石为何开辟新战场
- 247 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
——日方诱和与蒋介石的应对及刹车
- 289 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
- 323 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
——兼述蒋介石如何对待被日本侵占的东三省
- 355 蒋介石与史迪威事件
——战时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

四、国共矛盾

- 407 第三国际的解散与蒋介石“闪击”延安计划的撤销
——论“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未成“潮”
- 425 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

五、对内政策

- 449 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
——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
- 467 论国民党的社会改良主义
——对“百年老店”的新审视

六、家庭生活

- 499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与蒋介石、宋美龄的感情危机
- 509 关于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
——驳考尔斯，兼辨李敖之误
- 523 宋美龄的巴西之行与蒋介石的“婚外情”传说
——兼析其事与美国人要蒋交出军权之间的关系

一、早年经历与思想

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

1912年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刺。关于此案，当时人已经普遍怀疑是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所为；后来，毛思诚在编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时，也承认不讳。近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一册，发现它的记载较毛思诚所著详尽，且系蒋介石“自白”，因此，史料价值更高，有助于回答蒋介石刺陶这一疑案。《事略》以毛笔恭楷写成，文字略有蚀损。现将有关段落照录如下，凡蚀损处均以□□表示，可以意补的地方则以括号标明。

《事略》述1908年的经历时说：

是时之知交，以竺绍康为第一人……余无形中亦渐染其风尚。彼□（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不然，以□□（徐之）学行，其成就必不止此。又谈，陶之为入，不易共事。余闻此乃知陶、龚日常诋毁徐伯□□（生有）帝王思想者，实有其他意图。余当时闻陶、龚毁徐，仅以为伯生已死，即有过误，我同志不应再加猜测，诋毁先烈而已，而孰知伯生之死，为陶所逼□（乎）！自此，即甚鄙陶之为入，以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

竺绍康，浙江会党首领，曾与秋瑾、徐锡麟共同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策划起义。1908年与蒋介石相识。1910年去世。锡麟，即徐锡麟，字伯荪，蒋介石写作伯生，章太炎写作伯孙。龚，指龚宝铨，光复会的重要成员。（按：徐锡麟和陶成章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后来，因在革命途径及大通学堂应否续办等问题上意见分歧，二人发生冲突。）1907年，徐锡麟依靠表伯、山西巡抚俞廉三的关系，以道员分发安徽，被任命为巡警学堂会办，深得信任。7月，刺杀巡抚恩铭，被捕牺牲。关于此事，章太炎曾说：“其后伯孙入官颇得意，焕卿等不见其动静，疑其变志，与争甚烈，及伯孙杀恩铭，始信之。”^①竺绍康所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指此。这一事实表现出陶成章性格的一个突出弱点——多疑，但据此即将徐锡麟之死的责任归在陶成章身上，并由此认为其“无革命人格”，显然不妥。

《事略》又说：

及陶由南洋归日，又对孙先生诋毁□□（不遗）余情。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是诚可憾，嘱余置之不理，不为其所动，免致纠纷。余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向之每月接济其经费者即停止，不与其往来也。

1907年春，同盟会内部发生反对孙中山的风潮，陶成章是参与者之一。1909年9月，陶成章因在南洋募捐未获满意结果，联络李燮和、柳聘农、陈方度、胡国梁等七八人以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的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

^① 章太炎：《答陶冶公代刘霖生问光复会及焕卿事书》，《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第253页。

“败坏全体名誉”等罪状十二条，要求开除其总理一职，通告海内外。《罪状》并诬称孙中山贪污公款，在香港、上海存款二十万云云。陶成章并带着《罪状》，赶赴东京，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事略》所称“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指此。这一事实同样表现出陶成章思想性格中的弱点，陈其美批评其“不顾大体”是有道理的，但由此判定其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也显然不妥。

《事略》还说：

当革命之初，陶成章亦□（踵）回国，即与英士相争，不但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且欲将同盟会之组织根本破坏，而以浙江之光复（会）代之为革命之正统，欲将同盟会领袖□□（孙、黄）之历史抹煞无遗，并谋推戴章炳麟以代孙先□（生），□（鸣）呼革命未成，自起纷争。而陶之忌刻成性，竺绍康未死前，尝谓余曰：“陶之私心自用，逼陷徐伯生者，实此人也。尔当留意之！”惜竺于此时已逝世，而其言则余初未□（忘）。及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当时之大局也。盖陶已派定刺客，以谋英士，如其计得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扰乱不知所之；而当时军官又皆为满清所遗，反复无常，其象甚危，长江下游，人心未定，甚易为满清与袁贼所收复，如此则辛亥革命功败垂成，故再三思索，公私相权，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

本段中，蒋介石坦率地承认，他是刺陶案的主凶，并列举了许多理由，证明他的行动是有功于革命的正义之举。其实，陶有可责之过，并无可杀之理。在蒋所述理由中，有些还有可疑之处。例如所谓陶成章准备刺杀陈其美的问题。蒋介石是陈其美的亲信，这一点陶成章不可能不知道，他怎么会糊涂到向蒋介石透

露刺陈方案，甚至动员蒋下手呢？倒是蒋介石所说的其他理由，对于说明陶成章的死因，有一定意义。如蒋介石称，陶成章“回国即与英士相争，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以及“反对同盟会”等，应该说，这才是陶成章的真正死因。

1909年秋，陶成章再次掀起反对孙中山的风潮后，因受到黄兴等人的抵制，于次年2月在东京重建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正式与同盟会分家。1911年筹备广州起义期间，两会关系有所缓和。不久，赵声在香港患盲肠炎逝世，陶成章怀疑为胡汉民所毒，再次对同盟会产生疑忌。同年7月，陶成章应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之邀，回到上海，组织锐进学社，作为秘密联络机关。当时，陈其美、谭人凤、宋教仁等正在上海筹备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以便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同月26日，陈其美、陶成章在沈缦云宅开会，讨论合作问题，二人发生争执，陈其美一怒之下，竟掏出了手枪。几天后，陶成章匆匆离沪，再赴南洋，上海一地存在着两个革命组织的状况也就因之未能改变。所幸的是，面对共同的敌人，双方大体仍能配合。11月3日，上海起义发动，陈其美率队夺取制造局，他只身入内劝降，被扣押。起义群众奋勇进攻，光复会的李燮和也调来军警助战，救出了陈其美。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都督，李燮和任参谋。对此，李燮和与光复会的人都很不高兴。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之罪。^①李燮和不同意，于11月9日率部去吴淞成立军政分府及光复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宣布只承认苏州军政府为全省的军政府，“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归苏州军政府办理”。^②这样，同盟、光复两会矛盾再度公开化。

上海光复之际，陶成章自南洋归国。他未能因应形势，和同

^① 杨镇毅：《光复军攻克上海江南制造局及陈其美篡取沪军都督之真相》，《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33页。

^② 《中华民国驻吴淞军政分府李宣言》，《民立报》，1911年11月17日。

盟会弃嫌修好，相反，却继续鼓吹和同盟会分家，进一步恶化和孙中山的关系。南京攻克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推举大元帅，一部分人主张推黄兴担任，以朱瑞为首的浙军将领则主张推黎元洪，强烈反对黄兴。时任浙军参谋的葛敬恩后来回忆说：“袒黄（亦即袒孙）、袒黎一时闹得不可开交。光复会分子反对同盟会日益露骨，陶焕卿、李燮和一派鼓吹与同盟会分家，我们就成了此等人的对象。”^①会议本已于12月4日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但于12月17日又改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代行大元帅职权。这一变化，原因复杂，但同盟会方面认为和陶成章“煽动军队”有关。^②12月20日，马君武鉴于孙中山即将回国，在上海《民立报》著文，盛赞孙中山的革命品格和经验，断言财政及外交等问题，“通计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该文称：

孙君之真价值如此，日人官崎至谓其为亚洲第一人杰，而尚有挟小嫌宿怨以肆诬谤者，其人必脑筋有异状，可入疯人院也。吾平生从不阿谀人，又以为吾国素知孙君，故默默然不赘论。今见反对孙君之人大肆旗鼓，扇惑军队，此事与革命前途关系至大，又孙君子数日内将归国，故不能已于言。^③

马君武此文所称“挟小嫌宿怨以肆诬谤”，“大肆旗鼓，扇惑军队”的人，显指陶成章。辛亥革命前，马君武长期生活在德国，和同盟、光复两会之间的矛盾素无关系。他感到“不能已于言”而出面著文，可见陶成章的活动已经引起了严重的关切。当

^① 葛敬恩：《辛亥革命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123-124页。

^② 章太炎口授，寂照笔述：《光复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第439页。

^③ 马君武：《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民立报》，1911年12月20日。

时，《民立报》和南洋同盟会员曾经为孙中山做过部分舆论鼓吹工作，陶成章等人认为意在为孙中山“骗取总统”。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陶成章曾致书孙中山，重提“南洋筹款”旧事。这就意味着，要将孙再次放到“大骗子”和“大贪污犯”的被告席上。孙中山因此愤而复书，责问陶在南洋发布《孙文罪状》的理由，并称：“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①这样，两人间沉淀已久的猜嫌再度搅起，革命队伍有再次争吵、分裂的危险。

这一时期，陶成章与陈其美的矛盾也进一步尖锐化，突出地表现在几个问题上：

1. 陶成章拒绝陈其美的“协饷”要求。据章天觉回忆，陈其美为在上海筹办中华银行，曾向浙江都督汤寿潜要求“协饷”25万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当时，陶成章在浙江军政府任总参议，汤寿潜向陶征求意见，陶表示容“缓商”，汤寿潜即复电拒绝。后来，陈其美当面质问汤寿潜，汤答以陶成章“不允”^②。其他记载也说，陈其美曾因军需，向陶成章要求分用南洋华侨捐款，陶回答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③

2. 陶成章对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为不满。樊光回忆说：“时陈其美在沪督任上，声名恶劣，（陶成章）当然是大不满意，间有讥评”^④。

3. 陶成章在上海练兵，并号召旧部。据《民立报》记载，1911年11月下旬，为了进攻为清军盘踞的南京，陶成章曾电飭浙江温、台、处三府，添练义勇三营，又电告南洋各机关，速汇

①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陶成章集》附录，《陶成章集》，第436页；参见前引章太炎口述，寂照笔述：《光复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

② 《回忆辛亥》《辛亥革命史丛刊》（二），中华书局，1980，第163页。

③ 《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86页。

④ 《陶成章集》，第444页。

巨款；同时又在上海成立“驻沪浙江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办公处”，准备在闵行镇一带练兵^①。这一举动，自然更易引起陈其美的警惕，认为其锋芒是指向自己的。1912年初，章太炎曾劝告陶成章：“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②所谓“与人争权”，自然是指陈其美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寿潜出任交通总长，所遗浙江都督一职建议在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三人中择一以代。从当时舆论看，几乎是一片拥陶声。有的说：“成章早一日莅任，即全浙早一日之福。”^③有的说：“非陶公代理，全局将解体矣！”^④有的甚至说：“继其任者，惟有陶焕卿，斯人不出，如苍生何！”^⑤章太炎也积极为陶成章活动，认为“浙中会党潜势，尤非焕卿不能拊助”。^⑥陈其美不会乐意丢掉上海去当浙江都督，但由陶成章出任，陈其美也不会安枕。

当时，上海已经谣传陈其美准备刺杀陶成章，王文庆在南京也得到“确实消息”，陶成章在沪“大不利”。^⑦于是，陶成章先后避居于客利旅馆、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汇中旅馆、广慈医院等处。1月7日，他在《民立报》发表通告，内称：

当南京未破前，旧同事招仆者，多以练兵、筹饷就商于仆，仆未尝敢有所推诿。逮南京破后，仆以东南大局粗定，函知各同事，请将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政分府及杭州军政府，以便事权统一，请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是所至禱！恐函告未周，用再登报声明。

①《光复义勇军纪闻》，《民立报》，1911年11月28日；参阅许仲和：《章炳麟撰龚未生传略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98页。

②《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2年。

③《杭州电报》，《民立报》，1912年1月10日。

④《杭州电报》，《民立报》，1912年1月11日。

⑤《杭州电报》，《民立报》，1912年1月11日。

⑥《越锋日报》，1912年1月12日。

⑦《陶成章集》，第436页。

这一通告表明，陶成章已经十分清晰地感到了自身处境的危险，正在力图使对手相信，他不会组织军事力量，“号召四方”，构成什么威胁。1月11日，他又通电声明，不能胜任浙江都督一职，电文云：

公电以浙督见推，仆自维轻才，恐负重任。如汤公难留，则继之者非蒋军统莫属，请合力劝驾，以维大局。^①

蒋军统，指蒋尊簋，同盟会会员。陶成章此举仍然是为远祸保身，但是，他的“旧同事”们却不能理解他的苦衷，沈荣卿等以“全体党员”名义致电各报馆及陶成章，电称：

顷阅先生通告各界电，骇甚。先生十余年苦心，才得今日之收果。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况和议决裂，战事方殷，荣等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先生为大局计，万祈早日回浙，筹备一切，若不谅荣等之苦衷，一再退让，将来糜烂之局不可逆料。敢布区区，敬达聪听。^②

这份电报不啻是陶成章的催命符。

1911年12月，还在浙军反对黄兴出任大元帅的时候，陈其美就曾请浙军参谋吕公望转告陶成章“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③。陶骏保原为镇军军官，1911年12月13日为陈其美枪毙，可见，当时陈其美已萌发了除陶的念头。这时，沈荣卿等又坚持要陶成章出任浙督，并且“号召旧部”，听陶指挥，这样，自然使陈其美感到事不宜迟。

① 《民立报》，1912年1月12日。

② 《民立报》，1912年1月14日。

③ 《光复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陶成章集》，第438—439页。

《事略》又说：

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

这里，实际上是在承认，“除陶”是陈其美指使的了。

在《事略》中，蒋介石自诩他的“除陶”是“辛亥革命成败最大之一关键”，实际上，他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削弱了革命力量。此后，光复会即烟消云散，原成员和同盟会更加离心离德了。

陶案发生后，舆论哗然，蒋介石不得不避走日本；刺陶的另一凶手王祝卿逃到浙江嘉兴，被当地光复会员雇人杀死。1912年9月，黄兴、陈其美入京，共和党设宴欢迎，邀请章太炎“同食”，但章太炎拒绝参加，他发表公开函件说：

陶成章之狱，罪人已得，供辞已明，诸君子亦当闻其崖略。自陶之死，黄兴即电致陈其美，囑保护章太炎，仆见斯电，知二竖之朋比为奸，已发上冲冠矣！^①

黄兴要求保护章太炎，但章太炎却将黄兴视为“朋比为奸”者，表现出对同盟会的深刻的猜忌和隔阂。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

^①《却与黄、陈同宴书》，《大共和日报》，1912年9月19日。

附记：蒋介石的自我评估

本文发表后多年，发现 1943 年 7 月 26 日蒋介石日记云：“看总理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这则日记很有意思，说明蒋始终认为他在 1912 年刺陶是“革命行动”，出于“大义”，其授意者虽并非孙中山，二人之间也始终未谈及此事，但蒋介石自我估计，孙中山之所以长期信任他、重视他，却和此事密切相关。

蒋介石的早年思想

——从向左到向右

这里所说的蒋介石的早年，指 1918 到 1926 年，时当 32 岁到 40 岁之间，这一时期，蒋介石追随孙中山革命，和共产党合作，是他一生中比较重要的时期。但是，历史不能割断，一个人的思想也不能割断，因此本文的考察范围将适当下延。

一个人的日记往往最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本文所用资料，以蒋介石留在大陆的日记为主，结合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 2006 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少数地方则以其他资料参证。

为什么考察从 1918 年开始呢？因为蒋介石此前的日记仅存片断，其他已在福建永泰作战时失落。

读书生活：吸纳新潮，崇拜旧学

五四以后，新思潮大量涌入，知识分子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新式书报，企图从中找寻救国真理，蒋介石也不例外。这一时期，他把“研究新思潮”列为自己的学课^①，自觉地、有计划地

^① 蒋介石 1920 年 1 月 1 日日记云：“预定今年学课如下：一、俄语。二、英语。三、哲学。……十五、新思潮的研究。”按，本日日记手稿本已破损，此据《蒋介石日记类抄》（手稿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均同。

阅读《新青年》等刊物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书籍，俨然是个思想开通、追求进步的新派人物。

蒋介石阅读《新青年》始于1919年，至1926年，在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有关记载。如：

1919年12月4日日记云：“看《新青年》杂志。”^①

1919年12月5日日记云：“上午，看《新青年》。往访林士及执信。下午，看《新青年》。”

1919年12月7日日记云：“看《新青年》，定课程表。”

1919年12月10日日记云：“看（《新青年》）易卜生号。”

1920年4月9日日记云：“在船中看《新青年》杂志。”

1926年4月21日日记云：“上午看《新青年》杂志。”

1926年4月22日日记云：“上午看《新青年》。”

1926年5月5日日记云：“下午看《新青年》杂志。”

五四以后，各种新式刊物如雨后春笋，但蒋介石对《新青年》似乎情有独钟，除该刊及北京大学罗家伦等编辑的《新潮》外，别的刊物蒋介石很少涉猎。

经济问题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中心问题。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发现，他曾经用相当多的精力钻研经济学的有关问题。如：

1919年12月8日日记云：“下午，看孟舍路著《经济学原论》。”

1919年12月12日日记云：“看津村秀松著《国民经济学原论》第一章。”

1920年2月6日日记云：“看《经济学》，至《社会主义》止。”

1925年3月30日日记云：“船中看《经济学》，如获至宝也。”

^① 原据《蒋介石日记类抄·文事》，今据《蒋介石日记》（手稿本）校核，以下均同，不一一注明。

1925年5月4日日记云：“上午看《经济思想史》。以后拟日看《经济思想史》及《将帅之拿破仑》数十页。”^①

在阅读经济学有关著作的过程中，蒋介石也偶尔写下他的感想。1920年1月16日日记云：“看经济学，心思纷乱，以中国商人恶习不除，无企业之可能。”^②同年2月7日日记云：“看《经济学原论》完。津村主张，皆调和派的论调，其中不能自圆其说者亦只顾滔滔不绝，诚实堪笑，亦甚堪怜也。”

研究经济学不可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蒋介石同样投入过相当的精力。如：

1923年9月6日日记云：“下午看马克思经济学说。”

1923年9月21日日记云：“下午看马克思学说。”

1923年9月22日日记云：“下午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1923年10月4日日记云：“上午复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习俄语，下午看《概要》。”

1923年10月7日日记云：“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1923年10月9日日记云：“下午看《学说概要》。”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给蒋介石的第一印象是深奥难读。据他自述，《马克思学说概要》的“经济主义”部分，他读了三遍，还感到“不能十分了解，甚叹马克思学说之深奥也”。^③有时，他不得不掩卷而去，但是，读来读去，他终于读出了滋味，甚至读出了“趣味”：

1923年9月24日日记云：“今日看《马克思学说概要》，颇

① 《蒋介石日记类抄·文事》，1925年5月4日。

② 手稿本残损，此据《蒋介石日记类抄·文事》，1920年1月16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0月10日。

觉有趣。上半部看不懂，厌弃欲绝者再。看至下半部，则倦不掩卷，拟重看一遍也。”

1923年10月18日日记云：“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悬卷。”

看书看到了“不能悬卷”的程度，说明蒋介石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相当了解并且相当有感情了。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代表作，对该书，蒋介石也有涉猎。

1923年10月13日日记云：“晚，看《共产党宣言》。”

1923年10月16日日记云：“看《共产党宣言》。”

从蒋介石日记中，还可以看出，他还多次阅读《列宁丛书》，印象良好。1925年11月10日日记云：“晚，看《列宁丛书》第五种。其言劳农会与赤卫军之组织与所牺牲之价值，帝国主义之破产原因，甚细密也。”同年11月21日日记云：“看《列宁丛书》。其言权力与联合民众为革命之必要，又言联合民众，以主义的感化与训练为必要的手段，皆经历之谈也。”

在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蒋介石接受了某些影响。1925年11月，他准备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作序，打算既谈人生观，也谈宇宙观，苦无心得，最后决定重点阐述“精神出自物质，宇宙只有一原”二语，显然，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不过，这一时期，蒋介石又读到了《太〔泰〕戈尔传》一书，使他又从马克思主义身边走开了。同年11月12日日记云：“太〔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之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列宁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以唯心，一以唯物。以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这段日记表明：在唯心与唯物的二元对立中，蒋介石选择了“唯心”；在“爱与

快乐”和“权力与斗争”的二元对立中，蒋介石选择了泰戈尔学说。这成为他后来走向基督教，拒绝马克思的起点。^①

这一时期，蒋介石也曾深入地研究过德、法、俄诸国的革命史。1923年，他认真地读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926年，他在阅读《法国革命史》的过程中发现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6月9日日记云：“看《法国革命史》，乃知俄国革命之方法、制度，非其新发明，十有八九，皆取法于法国及改正其经验也，可宝贵也。”可见，他对俄国革命中的许多做法是持肯定态度的。其后，他认真地阅读《俄国革命史》一书。6月23日、26日、27日、28日，其日记都有阅读该书的记载。7月21日，他开始阅读《俄国共产党史》。8月11日，他在向衡州进发船中继续阅读《俄国革命史》，并且在日记中写道：“甚觉有益。”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1931年12月，他还在阅读该书。^②蒋介石后来虽然反苏反共，但是，在他的统治术中，仍然有不少来自苏俄的东西。

蒋介石日记中，也常有他阅读孙中山思想有关著作的记载。如：

1923年5月9日日记云：“看《平均地权论》。”

1925年1月9日日云：“摘录《精神教育》‘军人之勇’，

① 蒋介石1931年4月15日日记云：“共产主义实为一宗教，亦可谓之马克思教，以其含有世界性无国界者也。耶稣教亦不讲国界，完全以世界为主。盖凡称为宗教者必带有世界性，而且皆排挤他教与其他主义，而以唯我独尊者也。其目的则皆在教人，然而其性质则大有区别。马克思以物质为主，是形而下之哲学，并以恨人为其思想出发点。其所谓教人者，单以工人一阶级为主。其于后世之今日，则一般共党徒越趋越下，而以卑劣仇杀为其本分，是其单欲扶工人阶级利己主义，以物质诱人深入罪恶也。基督教以博爱救世为主义，今日共产党之唯一大敌，且其以精神感化世人自新，故今日反对共产党者当以联合基督教共同进行。”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2月30日。

中师之精神文辞，使人阅之而不能掩卷，可谓观止矣！”

1925年1月16日日记云：“船上看《民生主义》第三讲完。到省校办事。晚，回长洲，船中看《民生主义》第四讲完。打倒帝国主义，解除人民痛苦，为余一生事业。《三民主义》一书，博大精深，包罗万有，而其主脑则在此二语也。”^①

1926年8月7日日记云：“看《建国方略》……全以经济为基础，而以科学方法建设一切，实为建国者必需之学。总理规划于前，中正继述于后，中华庶有豸乎？”^②

1926年8月8日日记云：“甚矣行易知难之理大矣哉，非总理孰能阐发无遗也。”

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蒋介石对于孙中山的崇拜心情。这种情况，使他很难听得进任何对孙中山学说的批评。

五四时期许多新潮人物大多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强烈批判态度。蒋介石与他们不同，他虽然吸纳新思想，却并不废弃旧学。1914年至1915年之间，蒋介石研读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三人著作，自称“研究至再，颇有心得。甚至梦寐之间亦不忘此三集。”^③五四前后，他喜读诸葛亮《前出师表》和文天祥《正气歌》等，也喜读《心经》等佛学著作。^④不过，他最喜读、常读的还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的著作。1921年4月29日，他重读《曾文正公全集》，有“旧友重逢”之感。1922年3月，他读胡林翼的《抚鄂书牍》，决定“日尽一卷”。比较起来，蒋介石读新学诸书，常常食而不化，而读旧学诸书，则如鱼得水，常常用以作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或用以作为治兵、从政

① 《蒋介石日记类抄·文事》，1925年5月4日。

② 手稿本残损，此据《蒋介石日记类抄·文事》，1926年8月7日。

③ 《蒋介石回忆民国四年以后之事略》（手稿本），1931年2月21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2月3日：“晚，看《心经》，甚觉虚空之理不误也，以后拟多看佛经。”

的规范。如：

1922年3月25日日记云：“看胡（林翼）集，其言多兵家经验之谈，千古不易之论，非知兵者不能言，亦非知兵者不能知其言之深微精确也。”

1922年4月11日日记云：“胡公之言、德、功三者，皆有可传，而曾公独言其进德之猛，是可知其虚心实力，皆由刻自砥砺之德育而来，其办事全在于‘赏罚严明、知人善任’二语中用工夫……崇拜胡公之心，过于曾公矣！”

1922年11月14日日记云：“晚，看曾公尺牍，至《复陆立夫书》，有‘事机之转，其始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信乎，吾可不以潜移默运之人自任乎！”

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对蒋介石的深刻影响。

1926年以后，蒋介石的读书生活逐渐发生方向性的转变，即废弃新学，专读旧籍。例如，他1934年的读书计划为：王船山、顾亭林、程朱、《资治通鉴》、张居正、王安石、管子、韩子，没有一本新潮方面的书。这种情况，反映出蒋介石思想的重要变化。

民族主义：反对列强侵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民族主义思想空前发达起来。

蒋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当时主要内容是反清，宋遗民郑思肖（所南）的《心史》曾经是他最爱读的著作。^①五四运动后，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向反帝方向发展。

^① 蒋介石1934年6月22日日记云：“友人赠我郑所南先生之《心史》，如逢故友。此史为余少年在倭时最爱读之书，促进我革命情绪不少也。”

五四运动给了蒋介石以强烈震动。他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在运动中表现出的斗争热情和爱国精神，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当年9月24日日记云：“至今尚有各界代表群集总统府门前，要求力争山东各权利及各处排日风潮，皆未稍息。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吾于是卜吾国民气未馁，民心不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①1920年6月，蒋介石出资5000元，与陈果夫等创立友爱公司，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但不久，银价大落。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金融机关，在外人之手，国人时受压榨，可叹也。”同年11月8日，蒋介石游览香港，看到英人在当地大规模建设的状况，慨叹道：“英人之规划宏远，诚足浩叹。此皆吾锦绣河山，自不能治，而使人治之，尤为可惜！”

蒋介石不仅反对外人侵占中国土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反对为洋人服务的洋奴买办。1920年9月3日，他往访张静江，为车夫所侮辱。下午打电话时，又为“电话手”所梗，蒋介石极为生气，在日记中写道：“洋奴之可恶，不止于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杀也。”蒋介石将车夫、“电话手”等类人视为“洋奴”是错误的，但从这段日记中不难看出他对洋场买办一类人物的憎恶。

1923年9月，蒋介石受孙中山派遣，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12月12日乘轮自大连回上海。日本船主任意更改船期，不守信用，船中腐败不堪。蒋介石居然由此预言：“吾料东邦帝国资本主义之命运，不久将尽矣！”

蒋介石反帝思想的高潮出现于五卅运动后。1925年6月23日，广州群众为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举行游行示威，队伍经过租界对面的沙基时，英国军队悍然开枪射击。群众死50余人，伤170余人，形成沙基惨案。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

^①手稿本残损，此据《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

道：“国势至此，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任其英贼帝国主义所惨杀，闻之心肠为断，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生以来，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他自黄埔赴广州途中，觉得一路景色凄凉，天空“顿呈不可思议之红灰色”。第二天，他在发病高烧中仍集合士兵讲话。第三天，他在日记提要栏目中写下：“如何可以灭此横暴之阴〔英〕番？”自此，他逐日在日记中书写“仇英”标语，总计约近百条，如：

英虏皆可杀！

英仇可忍耶！

毋忘英番之仇！

英虏我必歼汝！

英夷可不灭乎！

汝忘英虏之仇乎？

英夷不灭非男儿！

英番不灭革命不成！

英番不灭能安枕乎？

汉有三户，灭英必汉。

英虏，我的同志为你杀害！

英番不灭，国家焉能独立！

英夷不灭，焉能解放世界人类！

一年将匝，英番如故，窃自愧懦弱。

新年又逾二日，试问对付英夷工作成效如何？

旧历新年已越一日，英番盘踞如故，思之痛彻骨髓。

英夷气焰方张，当亟图最后对付，不可徒幸其国内工党革命也。

等等。凡此种种，和中国人民当时同仇敌忾的感情是合拍的。

蒋介石把“英虏”、“英夷”看做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

“英虏”、“英夷”也必欲除蒋介石而后快。1925年10月19日蒋介石日记云：“阴〔英〕番勾通北段（祺瑞），竟以十万金悬赏执余。”21日日记云：“阴〔英〕番畏我益甚，而谋我更急乎！”

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给了港英当局以沉重打击。1926年3月下旬，港英当局得到英国政府授权，决定提供1000万元借款，用于改良广州市政，企图以此为饵，诱使国民党人结束罢工。当时，广州市长伍朝枢和孙科都有意接受英国条件，游说蒋介石，争取支持，但蒋介石却坚决抵制。4月14日日记云：“梯云急于解决罢工问题，以贪英国借款，推其意为英人所利诱，余反对之，并斥其妄。不料哲生为彼所愚，后以余据理反对，彼亦无异词。”同年7月21日，广州工人纠察队因英侨拒绝检验货物，扣留其船舶及商人二名，港英当局派兵占领深圳车站。当日日记云：“蛮番不问理由，即将我深圳车站派兵占领，事之可耻孰甚于此！”次日日记再云：“得阴〔英〕番占领深圳之报，不胜愤激，乃与鲍顾问磋商应付诸事。”可见，蒋介石的反英并非只是一时热情。

除英国外，蒋介石对美、法等国也持警惕态度。其日记云：“英番可灭，美、法亦不可玩忽！”对美国外交，更曾严厉批判。1926年1月7日，蒋介石接见美国新闻记者，“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其基督教之虚伪”。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尽管蒋介石早年思想中具有激烈的反帝成分，但是，他在北伐期间的行动却是十分审慎、温和的。1926年末至1927年初，他多次向日本方面伸出橄榄枝。1月2日，通过黄郛向日本驻武汉总领事高尾亨表示：“国民党军断不会对租界发难”，“目前只希望对租界组织实行改良（例如给中国人参政权等）便可满足，并打算采取缓进的、合理的、和平的手段实现这一目的”。^①同月25日，蒋介石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

^①《高尾致币原电》，1927年1月2日；又，《币原大臣在枢密院关于中国时局报告纲要》，1927年2月2日。均见日本外务省文书，S16154，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大和久义郎，说明自己奉行的外交方针是：尊重历来的条约，不采取非常手段和直接行动加以废除，一定负责偿还外债，充分保护外国企业。^①同月底，他在庐山会见留日时的老师小室静时也表示：“对于上海租界不欲以武力收回。既占领杭州、南京等地后，拟即提出收回上海租界之合理的提议。若各国对于此合理的要求不予采纳，则更讲求他种手段。”^②这些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对外妥协政策。

社会观：厌恶旧社会，立志改造中国

蒋介石出身盐商之家，社会地位不高，又早年丧父，自幼即受土豪劣绅的歧视和压迫，因此，极不喜欢乡村士绅阶层。^③1919年2月，他在闽南长泰军中，忆及往事，勾起宿愤。26日日记云：“吾国绅耆阶级之不破，小民终无乐利之一日。”1921年10月，蒋介石在家乡兴办武岭学堂，受到乡绅的阻挠，28日日记云：“乡愿阻碍不少。周星垣之守旧迂阔，不可言状，乡间事办理之难如此。”29日又称：“乡居极感痛苦，事事为乡愿所阻碍，不能改良稍些，愧恨无涯。”他甚至发誓：“乡愿不死，殊无回乡之乐，甚想不愿来乡也。”^④

蒋介石也不喜欢商人和资本家。1919年10月12日日记云：“政客、武人、官僚之外，商人之狡猾势利，尤为可恶。资本家不扫除殆尽，则劳动家无乐利自由之道。”他甚至说：“为平民之障碍者，不在官僚与武人，实在资本家与绅耆扞格其间。以致一切权力不能伸张，一切意思不能自由。而政客、议员，名为民

① 《最近中国关系诸问题摘要》第2卷，日本外务省文书，SP166。

② 《蒋介石最近之重要表示》，《台湾民报》，1927年3月27日。

③ 蒋介石：《报国与思亲》：“其时清政不纲，胥吏势豪，寅缘为虐。吾家门祚既单，遂为觊觎之的，欺凌胁迫，靡日而宁。”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1年11月29日。

意代表，实则媒介于绅耆、官僚之间。凡有罪恶，皆此种蠹贼所造成者也。吾以为革新社会，资本家与绅耆二者之中等阶级，须先扫除廓清。”

蒋介石在上海经营交易所，从事证券与棉纱等物品买卖期间，目睹董事们倾轧、垄断的黑幕，更增加了他对资本家的厌恶感。1920年1月24日日记云：“赴开元会议交易所选举董事。商人积弊，仍不能脱把持与专制，大股份压制小股份，大多数压迫小多数，舞私牟利，垄断其间。小商人中虽有达材正士，不能施展一筹，以致中国实业，日趋衰落，安得将此种奸商市侩一扫而空之，以发荣社会经济也。”^①

在受到交易所中“大股份”压迫的同时，蒋介石也感受到房东的压迫与欺诈，进一步增加了他对资本家的憎恶。蒋介石同年12月9日日记云：“晚，为房东朱子谦作恶不仁，心甚愤激，资本家之害人焉大矣哉！”不仅如此，房东还企图吞没蒋妾姚冶诚寄存的交易所单据。同月22日，蒋介石日记云：“为富不仁，复欲害人，居心毒极！沪上商人行为卑陋至此者，见不一见，亦无足怪，惟恨冶诚之生事也，气极矣！”

以交易所的活动为纽带，蒋介石结识了上海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人物。对他们，蒋介石日记常有严厉的批评。1921年5月11日云：“知交股价落，不胜烦闷。遇盛四及一班无赖，社会之形态丑劣，嫌恶实甚，无可如何也。”1922年11月28日云：“中国商人，见之头痛。商家利禄之心，狡猾之谋，过于官僚也。”1923年2月3日云：“又因奸商妒忌，发怒愤激，殊非其道。”凡此种种，都表露出蒋介石对资本家和商人们的憎恶。

对军阀，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多所指斥。如：

1919年8月20日日记云：“看《申报》，知浙江伪督杨善德

^① 手稿本残损，此据《蒋介石日记类抄·杂组》。

已于12日病毙，继其任者为卢永祥。羊死驴继，吾浙其无噍类乎！”

1921年3月27日日记云：“北方无不倒之理，惟在吾党能起而应之耳！”

1922年6月14日日记云：“黎元洪违法入京，就总统之位，从此天下又起纷纠，政客、议员之肉，其足食乎？恨手无寸铁，不能一扫荆棘，忧闷无已！”

1925年12月1日日记云：“郭（松龄）宣言讨张作霖而戴张学良，可称滑稽。然如此矛盾，则北方大小军阀不能不自行瓦解耳。旧时代崩溃之迹象，于此益明矣！”^①

1926年7月12日日记云：“余以关税会议为卖国条件，决心与吴佩孚宣战，通告中外。”

这些日记表明了蒋介石反对北洋军阀的鲜明态度与立场。

与憎恶商人、资本家相反，蒋介石对工人有一定同情。

蒋介石对工人接触不多，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与生活状况也了解不多。1921年8月，蒋介石在乡监督改建厅屋工程，目睹工人辛劳状况，有所感动。28日日记云：“工人之辛苦危险，可谓极矣，资本家见之，如无慈悲之心，非人也。”10月21日日记继云：“自叹为我一人，而苦彼二十工人，自朝至暮，除食事外，毫未休息，每日足作十小时余苦工。呜呼！小工何罪，其苦如此，资本家与势力家之不勤俭自持，厚利报工，其必为神人所不容。不必言近世之潮流如何，徒问你自己良心过得去否耶！可不警惕乎？”11月6日日记再云：“工人困苦，小工更苦。工场法如不速实行，小工无法保护，中国人民只见死亡病伤，决无完全生存之理。有责者其可不惻然设法，实行提倡乎？”这些地方，显示出蒋介石愿意通过社会改良的途径改进工人的生活待遇。

1925年7月7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革

^① 手稿本残损，此据《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

命六大计划”，其中说：“工人为革命中有力之成分，且对于吾革命前途之难易成败，实有莫大之影响。”但是，他的具体建议只有“吾革命政府，宜努力安置为我国牺牲之失业工人”，“利用罢工工人建筑道路”等寥寥数语。值得注意的是，他曾提出：对罢工工人，可“酌加编制，施以军事及政治之训练，以植工人军之基础”^①。不过，这一思想，对蒋介石说来，恰如火星一闪，后来的正式文本就被修改得很模糊了^②。

在北伐进军途中，蒋介石还同意工人在特殊情形下可以管理工厂。1926年9月，蒋介石参观安源煤矿，发现厂主无能，受到日本资本压制，停工近1年，便主张：“工人乘此厂主放弃权利时，起而自己管理也。”^③不过，蒋介石只同意对工人生活做一定程度的改良，而坚决反对阶级斗争。还在北伐出师前夕，他就宣布：“阶级斗争及工农运动的罢工斗争，在战时是破坏敌人的力量和方法，对付敌人是可以的。若是在本党和政府之下，罢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动。”^④北伐出师之后，国民革命军占领地区的工人运动日渐发展，蒋介石曾发表文告，要求商人不要拒绝工人的“急迫要求”，“早早解决了工潮”，同时则要求工人集中在“本党之下”，“受本党指挥”，“非但不应该仇视商人，并且须在可能范围内急谋谅解”。^⑤此后，罢工日渐频繁，蒋介石仇视工人运动的态度日渐明显。1927年1月底，他与小室静谈话，一方面声称“劳动者地位之向上与幸福之增进，乃吾等之主义，故不能中

① 《军事委员会提议案》，《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第386页。

② 《蒋介石年谱初稿》修改为：“吾革命政府宜努力安置为国牺牲之失业工人，以解决其困难，并设立两广工路局，以为解决之方，兼冀大元帅提倡工兵之至意。”见该书第386页。按，此书即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的原稿。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9月20日。

④ 《战时工作会议之第三日》，《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26日。

⑤ 《蒋总司令告武汉工商同胞书》，《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5日。

途而辍”，表示不能动用军队来“制止劳动者之罢工”，但同时又说：“唯劳动者苟有跋扈行为，甚且危及国际关系，亦不能过于放任，彼时或采非常手段，亦未可知。”^①这些地方，已经预示了他日后的行动方向。

蒋介石一度认为，中国“不存在大土地占有制”，“中国很少发生大土地所有者与农民之间的冲突”^②。但是，蒋介石的早年日记显示，他对土地问题还是关心的。1926年2月3日，蒋介石与鲍罗廷谈话，鲍主张以“解决土地问题为革命之基础”，蒋介石表示赞成，日记云：“余亦以为然，惟忧无法引起全国大革命耳。”但是，这以后，蒋介石逐渐倾向于北伐期间，暂不提出土地问题。^③出师前夕，鲍罗廷建议发布土地政纲，蒋介石不赞成；鲍提议攻克武汉时发布，蒋还认为太早。^④不过，他仍然在思考和研究这一问题。同年7月30日，他收到邓文仪的俄国来信，述及土地问题，日记云：“土地制不外土地国家化（即归国有）与土地社会化（即归社会分配），如太平天国制是也。”次日再云：“近日甚思研究土地问题，有一解决之方。”8月1日，他在湖南九峰村致电张静江、谭延闿，要他们和鲍罗廷商量，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土地制度委员会，规定详细办法，或根据“平均地权”所言，再加细定，“逐条登报，公诸国人参考，且可临时应用也”。^⑤

① 《蒋介石最近之重要表示》，《台湾民报》，1927年3月27日；参见FO, 405, Vol.252, pp.431-433.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② 文件8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298页。

③ 蒋介石1926年7月23日日记云：“与鲍顾问谈革命方略及政治主张，彼以余言为然，而独以土地问题缓提为念也。”

④ 《中局致北方区信》（1926年8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295页。

⑤ 《革命文献拓影》第6册，《蒋中正总统档案》；又1926年9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报告》称：“蒋介石重新转向了社会舆论，他的政治行为又变得更明确了。国民党中央收到了蒋介石要求起草土地法的建议。”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477页。

1926年12月7日，国民党中央部分人员及鲍罗廷等在庐山开会，讨论各地工农运动问题。会议“对工人运动主缓和，对农民运动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只要农民问题解决，则工人问题亦可解决也。”^①这一时期，蒋介石所率领的北伐军受到湖南各地农民协会的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因此，蒋介石对农民运动和农民协会都相当有好感。8月3日日记云：“各村人民与农会有迎于十里之外者，殊可感也。农民协会组织尤其发达，将来革命成功，还在湖南为最有成绩。”

民国期间，使用奴婢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奴婢们大多没有人身自由，受到各种虐待。蒋介石对奴婢有一定同情，主张禁止蓄奴。1918年，蒋介石在福建永泰军中，听到一陈姓主妇毒打婢女之声，很为之不平。1919年9月，又见到邻妇虐待婢女，较往日陈妇尤甚，愤慨地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奴婢之制不革除，尚何有社会平等之可言乎！吾觉欲求人类平等，第一当先除奴婢毒制也。”^②

蒋介石还反对家族观念。1920年1月23日日记云：“家族观念打不破，家族范围跳不出，埋没古今多少英雄。”^③

以上种种，都表现出蒋介石所受五四后新思潮的影响。

出于对旧社会的厌恶，蒋介石有改造中国社会的志向。1919年11月，蒋介石在日本，发现各书坊中社会主义书籍特多。4日日记云：“吾知其社会改革必不远也。以中国人民不识字者之众，提倡革命，不及十年而得实行，则今日日本人民之智识普及，其改革进程之速，更可知矣！”当时，日本自然主义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接受空想社会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思想影响，提倡新村主义。蒋介石在日本读到了《新村记》一书，有所

^① 手稿本残损，此据《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12月7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19年9月14日。

^③ 手稿本残损，此据《蒋介石日记类抄·家庭》。

触动，即萌生“改造本乡”的念头。^①1920年12月，他自觉“矜张自肆，暴躁不堪，对于社会厌恶更甚”。^②日记云：“我对中国社会，实厌恶已极，其将何以谋脱也？”^③这一时期，他对邵元冲等宣称：“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④

早期，蒋介石认为中国缺乏实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对共产主义并不反感。1920年2月2日日记云：“书厨包工来，欺伪百出，心甚嫌恶。中国工人之无道德，无教育如此。对于共产事，甚抱悲观。非从根本上待其心理完全改革，教育普及之后，断乎谈不到此。”^⑤1923年蒋介石出使莫斯科时，认为中国革命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实行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第二阶段才是宣传共产主义，实行“经济革命”、“社会革命”。^⑥1925年12月，他在《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中称：“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⑦云云。衡之以他在日记中表现出来思想，他的上述言论当非完全是违心之言。

左右之间

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部在联俄、容共等问题上，即有不同意见。孙中山去世后，迅速形成对立的两派，通称左派与右派。

① 《蒋介石日记类抄·文事》，1919年11月22日。

② 《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0年12月31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年12月11日。

④ 转引自《邵元冲致蒋介石函》，《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7页。

⑤ 手稿本残损，此据《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补。

⑥ 蒋介石：《孙逸仙代表团关于越飞5月1日东京电中所提建议的备忘录》，英文打字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蒋介石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31-333页。

⑦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68页。

蒋介石最初站在左派方面。1925年11月23日，林森、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通过《取消共产党员国民党党籍》、《鲍罗廷顾问解雇》等案。12月24日，在上海另立中央。同月下旬，广东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王柏龄等人准备示威响应。28日晚，蒋介石从汪精卫处得到有关消息，当日日记云：“王柏龄糊涂至此，可恶殊甚，严电阻止，不知有效否？”

当时，蒋介石反对在军中形成派别。1926年1月2日日记云：“下午，对各将士痛诫派别之恶习，不禁泪下。”当时，在黄埔军校中，与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是左派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2月2日，他约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两派干部开联席会，限令高级官长退会，同时要求双方干事互入两会，企图消弭二者之间的界限。4月，又进一步要求两派组织同时取消。

“三·二〇”事件后，右派纷纷做蒋介石的工作，企图争取他站到自己一边。4月3日，刘峙、古应芬、伍朝枢三人陆续见蒋，进行游说。蒋介石日记云：“右派徒思利用机会，联结帝国主义以陷党国，甚可叹也。”同月5日，宋子文向蒋介石反映，广州右派计拟召开市党部大会，举行示威，蒋介石立即函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加以制止。次日，蒋介石并通电反对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示“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依，惟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我革命之进行，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廓清之。”^①

蒋介石反对右派的立场一直持续了很久。北伐期间，樊钟秀一直在河南南部活动，组织军事力量，企图响应北伐。1926年8月，蒋介石听说居正、谢持有离间樊钟秀等与北伐军的打算，愤怒地在日记中写道：“彼等诚反革命矣！”^②同年9月16日，蒋

^①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54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8月21日。

介石会见田桐、周震麟后，在日记中留下了“其语不堪入耳”的记载。

不过，由于蒋介石在联俄、容共问题上和西山会议派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因此，最终必然会走到一起。1926年5月22日日记云：“总理责任交给国内青年，愿以奋斗之青年赞成国民党，然而非欲党员对三民主义疑为不澈底之革命也。如言不澈底，则俄国革命迄今仍未澈底也，不革命一语，为宣布革命党员之死刑，闻者无不反对，革命必致破裂。应联合革命的新旧党员对外也。”这段日记，已经预示着他和西山会议派矛盾的溶解。

“一个主义，一个党”

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原拟请苏方支持国民党人在蒙古的库仑建立军事基地，遭到拒绝。他满怀期望访问苏联，却没有得到什么具体成果。但是，他却总结出了一条经验——必须独立、自动、不受外人支配。

蒋介石在访问苏联时，遇到过一个名为赵世贤的中国青年，相谈融洽。离开苏联时，蒋介石又和这位年轻人作了一次谈话：“略述此次来俄经过情形，戒其毋为外人支配。”此后，蒋介石即力图摆脱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控制，并力图 and 左派及中共争夺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1926年3月8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商决“大方针”。蒋称：“中国国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实权皆不宜旁落，而与第三国际必能一致行动，但须不失自动地位也。”^①同月30日，又在日记中表示：“只要大权不旁落外人之手，则其他事皆可迁就也。前日政府事事听命于外人，以致陷于被动地位，此非外人之故，而精卫自让之也。”5月21日日记再云：“革命须求自立，不可勉强迁就。世界革命应统一指挥，但各国革命政权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3月8日。

仍须独立，不能以用人行政亦受牵制。”这时，蒋介石孜孜以求的是他能独立自由地处理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当年12月，蒋介石听说托洛茨基将要出使中国，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29日日记云：“党务、政治不能自由设施，则胜无异于败也，托氏来华，或能改正，而本身应具独立之心也。”

蒋介石的苏联之行还使他得到了一条经验，即革命必须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他开始致力于“一个主义、一个党”宣传和努力，并以此为指针，处理国民党内的左右派纷争。1926年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称：“俄国革命所以能够迅速成功，就是社会民主党从克伦斯基手里拿到了政权……什么东西都由他一党来定夺，像这样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我们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同月26日，他与邵力子谈话，强调“革命以集中与统一为唯一要件”。^①不久，他即派邵力子赴苏，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要求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谁妨碍革命的统一和集中呢？蒋介石觉得是中共。1926年3月9日日记云：“共产分子在党内不能公开，即不能开诚相见。办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内部分子貌合神离，则未有能成者。”于是，他的第一步便是限制共产党的发展。1926年5月14日日记云：“对共党提出条件虽苛，然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5月16日，他访问鲍罗廷，表示“甚以两党革命，小党胜于大党为忧，革命不专制不能成功为忧。”5月27日，他在高级训练班致开学词，声称为“集中革命势力”，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应退出共产党。6月8日，他明确向鲍罗廷提出：“共产分子在本党应不跨党理由。”^②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6月26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6月8日。

由于鲍罗廷等人的抵制，蒋介石要求跨党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的目的未能实现。此后，蒋介石日记中不满共产党发展与活动的记载日增。如：

1926年7月3日日记云：“各处宣传，多是CP，心甚不悦。”

1926年8月23日日记云：“阅《向导》报，陈独秀有讲议北伐言论，其用意以减少国民党信仰，而增进共产党地位也。”

1926年8月30日日记云：“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恶也。”

这样，他虽然知道“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表示“余不愿主张违教分裂”，^①但他最终还是走上了和共产党“分裂”的道路。

苏俄创立了一党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没有想到，蒋介石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以对付共产国际和中共。

“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

蒋介石的日记表明：1. 他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有一定思想基础；和共产党合作，也有一定思想基础。2. 在若干问题上，早年的蒋介石与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之间有一定分歧。这些分歧，属于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并非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后来在这些分歧基础上演化为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并进而演化为你死我活的生死斗争，是不幸的、遗憾的。3. 蒋介石既是国民党中心主义者，也是个人中心主义者。在蒋看来，他自己就是革命的化身、真理的化身，凡与他持不同意见或反对他的人都是“败类”或“反革命”，都需要加以“制裁”。1927年2月，他在南昌演讲称：“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5月14日。

要革他的命。”^①这段话，典型地表露出他的个人中心心态。同一时期，他在日记中表示：“鲍尔廷固为罪人，而一般趋炎附势之败类更可杀也。”^②这一段话，是对他上述演讲中“革他的命”一语的注脚，不久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已经在此埋下了伏笔。

本文中文本原载纽约天外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的《庆祝吴教授相湘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收入拙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原有“苏俄观”一节，因本书另有专文，故删去。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7年2月26日。

做“圣贤”还是做“禽兽”

——蒋介石早年修身中的“天理”、“人欲”之战

儒家学派认为：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项事业的起点。《大学》有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说法，又有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程序。到了宋明时代，道学家们提出了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核心的一系列修身主张，一方面将儒学伦理规范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一方面则前所未有地细密设计了各种遏制“人欲”的办法。

蒋介石很早就接触宋明道学，不仅是服膺者，而且是身体力行者。在他的日记里，有大量修身的记载。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的个人修养历程和极为隐秘的内心世界，而且可以看出他早年的三重性格特征：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道学信徒、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志士。

重视修身，按照道学家的要求进行修养

蒋介石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养成了许多坏毛病。辛亥革命之后，“狭邪自娱，沉迷久之。”^①1919年7月24日，他回

^①《蒋介石回忆民国元年以后之大事》（手稿本），1931年2月20日，〔美国〕胡佛研究院藏。

忆当时经历，在日记中对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办理无状”的八字考语。^①由于这些坏毛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朋友们不大看得起他。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时激动，闪过与戴拼命的念头，但他旋即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彼平时以我为恶劣，轻侮我之心理，亦于此可见一般”，“我岂可不痛自警惕乎”！^②一直到30年代，蒋介石想起早年种种劣迹，还痛自悔恨。日记云：“少年师友不良，德业不讲，及至今日，欲正心修身孝友，已失之晚矣！”^③又云：“少年未闻君子大道，自修不力”，“至今悔之不及”^④。一言之不足，反复言之，当系出于内心，而非泛泛虚语。

为了克服年轻时期形成的这些坏毛病，蒋介石曾以相当精力阅读道学著作，企图从中汲取营养。1919年5月24日日记云：“今日有研究性理书，思愤发改过，以自振拔之机，甚矣不求放心也久矣。”所谓“性理书”，指的就是宋明以来道家们的著作。蒋介石不仅读，而且选抄对自己进德有用的语录，写入日记，甚至作为自己的箴言或座右铭。例如，1919年，他为自己选择的箴言是“静敬澹一”四字，同年8月，增改为“精浑澹定，敬庶俭勤”八字。1923年1月5日，他模仿道学家的做法，自制铭文：“优游涵泳，夷旷空明，晬然自充，悠然自得，此养性之功候也。提纲挈领，析缕分条，先后本末，慎始图终，此办事之方法也。”^⑤在此之后，他仍然觉得意有未足，又抄录道家们常说的“修己以严，待人以诚，处事以公，学道以专，应战以一”诸语，作为对自己立身处世的要求。^⑥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② 手稿本残损，此据《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补，1920年3月3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月20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月25日。

⑤ 《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1923年1月5日。

⑥ 《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1923年1月9日。

宋明道学有所谓理学和心学两派。前者以朱熹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蒋介石涉猎过朱熹的著作，例如1923年1月4日日记云：“晨兴，思良友，窃取乎朱子‘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二语以自循省。”^①可见，他对朱熹的学说有所了解。哲学史上有所谓朱陆异同之争，或是朱非陆，或是陆非朱，蒋介石对两派均无所轩轻，日记中也常有读王阳明著作的记载。如，1926年11月17日日记云：“车中闷坐，深思看阳明格言。”

在这一方面，他是兼收并蓄的。

宋明以后的道学家中，蒋介石最喜欢曾国藩，很早就用功研习他的著作。1921年日记云：“晚编《曾文正公全集》。此书已经看过，甚以为遗失于永泰县之役。今竟复见，不啻旧友重逢也。”^②永泰之役，指1918年9月蒋介石在福建讨伐李厚基的一次战斗。此战中，蒋介石中敌缓兵之计，仓促中弃城出走，仅以身免，随身携带的曾国藩著作连同日记等物遗失殆尽。蒋既自称“不啻旧友重逢”，可见他对曾著的感情。

20年代，蒋介石仍然喜读曾国藩的著作。1922年岁首，他曾节录曾国藩的“嘉言”作为自己的“借镜”。其内容有：“虑忘兴释，念尽境空”；“涵咏体察，潇洒澹定”；“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以志帅气，以静制动”；“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言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爱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军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1925年1月2日，他又将曾国藩的“惩忿窒欲”、“逆来顺受”、“虚心实力”、“存心养性”、“殚精竭力”、“立志安命”等“嘉言”抄在当年日记卷首。可见，他在力图按曾国藩的训导立身处世。其后，蒋介石多

^① 手稿本残损，此据《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1923年1月4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1年4月29日。

次在日记中给予曾国藩以高度评价，如：

1925年1月9日日记云：“看《曾文正公杂著》，其文章真可告不朽矣！”

1925年2月10日日记云：“终日在常平站候车，看曾公日记，以勤、恕、敬三字相戒，可为规范矣。”

1926年3月8日日记云：“昨今两日，看曾公《嘉言抄》，乃知其拂逆之端，谤毁之来，不一而足。而彼劝其弟以咬牙立志，悔字诀与硬字诀，徐图自强而已。”

曾国藩之外，蒋介石也很敬佩胡林翼。胡有云：“林翼至愚，当不自作聪明；亦惟林翼颇聪明，当不自用其愚。”1922年3月，蒋介石读到这段话，不禁悚然叹惜，日记云：“可知我自作聪明，实为至愚之人，以后切不可自作聪明也。”^①胡集中曾论及“愚公移山”、“精卫衔石”等古代寓言或神话，蒋介石读后深有所感。日记云：“因知成功之难，非一朝一夕之可能也。今日之事，固非三五年不能收一段落，岂可心猿意马，朝三暮四，犹豫不决，轻举妄动，来往随便乎！以后应不再作回家扫墓之想，吾母有灵，其亦以此为慰安乎！”^②胡集书牍中云：“所望有兵柄者，日夜悬一死字于卧榻之旁，知此身之必死则于以求生，或有生机。”蒋介石读后特别将它们节录下来，用以自励。

道学著作中有《菜根谭》一书，蒋介石也很喜欢。1926年3月7日日记云：“途中看《菜根谭》，以毋忧弗逆与不为物役二语最能动心。”

蒋介石不仅认真读道学书，而且也真像道学家一样进行修身。道学家中朱熹一派普遍主张“省、察、克、治”，蒋介石也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2年3月19日。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2年3月21日。

照此办理。

1919年10月23日日记云：“过去之罪恶，悔恨莫及；将来之嗜欲，奢望无穷。若不除此二者，将何以求学立业也。”

1920年1月17日日记云：“中夜自检过失，反复不能成寐。”^①

1922年10月25日日记云：“今日仍有几过，慎之！”^②

1925年2月4日日记云：“存养省察之要，未能实行也。”

1925年9月8日日记云：“每日之事，自问有欺妄与愧怍之事否，日日以此相课。”

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是经常检讨自己的。

宋明道学家有所谓“功过格”，做了好事，有了好念头，画红圈；做了坏事，有了坏念头，画黑圈。蒋介石则专记自己的“过失”，较之道学家们还要严格。1920年1月1日，蒋介石决定自当日起，至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记事外，必提叙今日某某诸过未改，良知未致（或良知略现），静敬澹一之功未呈也”。^③他所警惕的过失有暴戾、躁急、夸妄、顽劣、轻浮、侈夸、贪妒、吝嗇、淫荒、郁愤、仇恨、机诈、迷惑、客气、卖智、好阔等16种。如果一旦发现有上述过失，就在日记中登录。因此，他的日记对自己的疵病，常有相当坦率甚至是赤裸的记载。

蒋介石很重视日记在自己修养过程中的作用。毛思诚根据他的指示将日记分类照抄，其中有《学行》一类，蒋介石命毛另抄一本寄给他，“以备常览”。^④

蒋介石之所以重视个人修养，不同时期有不同作用。早年是

① 《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

② 《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

③ 手稿本残损，此据《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1920年1月1日。

④ 《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卷首。

为了做“古来第一圣贤豪杰”^①。五四运动爆发，蒋介石从中看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他当时在修身上对自己的要求，应是上进、自强的表现。其后，蒋介石投身国民革命，参加广东革命根据地建设，反映出传统道学中“民胞物与，宏济群伦”思想对他的影响^②。北伐战争期间，国共矛盾逐渐尖锐，蒋介石处境困难，他企图通过修养锤炼自己，应付环境，获取突破难关的意志和力量^③。1927年以后，蒋之地位已定，继续修养则是为了做“国家代表”^④。

戒 色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很早就承认，人有两种天性：食与色。但是，孟子又主张，人必须遵守道德规范，否则和禽兽就没有差别。清朝的道学家唐鉴曾经提出：“不为圣贤，则为禽兽。”从蒋介石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好色，但是，同时又努力戒色，力图做“圣贤”，不做“禽兽”。为此，他和自己的欲念进行过长达数年的斗争。

1919年2月，蒋介石在福建曾勉励自己：“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戒之慎之！”^⑤次月，他从前线请假回沪，途经香港，曾因

① 《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1931年3月21日：“晨起，曾忆少年闻人道，古人如孔孟朱王之学，与禹汤文武周公之业，窃自恨前有古人，否则此学此业，由我而发明，由我而创始，岂不壮哉！平日清夜，常兴不能做古来第一圣贤豪杰之叹！”

② 蒋介石1925年12月9日日记云：“一曰慎独则心安，去人欲存天理。二曰主敬则身强，慎坎险，惕轻健。三曰求人则人悦，民胞物与，宏济群伦。四曰习勤则神敏，散精殚虑，困知勉行。”

③ 蒋介石1926年8月26日日记云：“寸衷郁结，看《嘉言抄》及《菜根谭》。阅之，知天下之长，而吾所处者短，则横逆困穷之来，当稍忍以待其定，又曰：逆来顺受、居安思危等条，志为之辟，气为之振，应以大无畏之精神，与此横逆决斗，以应环境，以破当前难关也。将其计而就之，则天下无难事矣。”（手稿本残损，此据《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补）

④ 蒋介石1931年1月9日日记云：“此时欲修身自立，不可不努力于学，思将哲学有统一之研究，以为修己立人之课，愿期有恒，以底于成，不愧父母之遗体，国家之代表。”

⑤ 手稿本残损，此据《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1919年2月9日。

“见色起意”，在日记中为自己“记过一次”。^①不料第二天，他就在旅馆中“见色心淫，狂态复萌，不能压制矣”。不过。他当晚又检讨：“介石以日看曾文正书，不能窒欲，是诚一生无上进之日矣”！他勉励自己，在花花世界努力“砥砺德行”。^②

到上海后，蒋介石与恋人介眉相会。4月23日，蒋介石返闽，介眉于清晨3时送蒋介石上船，蒋因“船位太污，不愿其送至厦门”，二人难舍难分，介眉留蒋在沪再住几天，蒋同意，在沪住了一周。事后深自忏悔。日记云：“母病儿啼，私住海上而不一省视，可乎哉？良心昧矣！”^③此后的几天内，蒋介石一面沉湎欲海，一面又力图自拔。日记云：“情思缠绵，苦难解脱，乃以观书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辙耳，岂独余一人哉！”^④在反复思想斗争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与介眉断绝关系。5月2日，介眉用“吴侬软语”致函蒋介石，以终身相许，函云：

介石亲阿哥呀：照你说起来，我是只想铜钿，弗讲情义，当我禽兽一样。你个闲话说得脱过分哉！为仔正约弗寄拨你，你就搭我断绝往来。

我个终身早已告代拨你哉。不过少一张正约。倘然我死，亦是蒋家门里个鬼，我活是蒋家个人。^⑤

从信中所述分析，介眉的身份属于青楼女子。蒋有过和介眉办理正式婚娶手续的打算，但介眉不肯订立“正约”（婚约）。蒋批评介眉“只想铜钿，弗讲情义”，而介眉则自誓，不论死活，都是蒋家人。

① 《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1919年3月8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19年3月9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19年4月23日。

④ 《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1919年4月27日。

⑤ 《介眉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蒋介石收到此信后，不为所动，决心以个人志业为重，斩断情丝。1919年5月25日日记云：“蝮蛇螫手，则壮士断其手，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立业！”同年9月27日，蒋介石自福建回沪。旧地重游，免不了勾起往事。日记中有几条记载：

10月1日：“妓女嫖客，热情冷态，随金钱为转移。明昭人窥破此点，则恋爱嚼蜡矣！”^①

10月2日：“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②

10月5日：“自有智觉以至于今，十七八年之罪恶，吾以为已无能屈指，诚所谓决东海之水无以涤吾过矣。吾能自醒自新而不自蹈覆辙乎？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

10月7日：“无穷孽障，皆由一爱字演成。”^③

上述各条，可能都是蒋介石为割断与介眉的关系而留下的思想斗争记录。从中可见，蒋介石为了摆脱情网，连佛家的“色空观念”都动用了。值得注意的是10月2日的日记：“潜寓季陶处，半避豺狼政府之毒焰，半避卖笑妓女之圈术。”当时，北京政府在抓捕作为革命者的蒋介石，而青楼女子介眉则在寻找“负心汉”蒋介石，迫使蒋不得不躲进戴季陶的寓所。

蒋介石谋求与介眉断绝关系是真诚的，但是，却并不能戒除恶习。10月15日日记云：“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④同月30日，蒋介石赴日游历，这次，他曾决心管住自己。关于这方面，有下列日记可证：

10月30日：“自游日本后，盲动不苟，色欲能制，颇堪自喜。”

① 《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1919年10月1日。

② 《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1919年10月2日。

③ 《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1919年10月7日。

④ 《蒋介石日记类抄·旅游》，1919年11月12日。

11月2日：“今日能窒欲，是一美德。”

11月7日：“欲立品，先戒色；欲立德，先戒侈；欲救民，先戒私。”

可见，蒋介石的自制最初是有成绩的，因此颇为自喜，然而，蒋介石终究难以羁勒心猿意马。11月4日日记云：“色念屡起，几不能制也。”同月8日，蒋介石到“森福家待花”，结果是“讨一场没趣”，自责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迁改，而又自取辱耶！”12日，又在日记中写道：“一见之下，又发痴情。何痴人做不怕耶！”“海外逆旅，岂有妙妓真心眷客者，先生休矣！”^①

同年11月19日，蒋介石回到上海，过了一段安静日子，心猿意马有所收敛。12月13日日记云：“今日冬至节，且住海上繁华之地，而能不稍应酬，闲居适志，我固为难事矣，近日固不知如何为乐事也。”^②12月31日岁尾，蒋介石制订次年计划，认为“所当致力者，一体育，二自立，三齐家；所当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欲。”他将这一计划写在日记中：“书此以验实践。”^③看来，这次蒋是决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制力实在太差，于是，1920年第一个月的日记中就留下了大量自制与放纵的记载：

1月6日：“今日色念突发，如不强制切戒，乃与禽兽奚择！”

1月14日：“晚，外出游荡，身分不知堕落于何地！”

1月15日：“晚归，又起邪念，何窒欲之难也！”

1月18日：“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次，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

1月25日：“途行顿起邪念。”

① 《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1919年10月2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部分文字据《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校订。

③ 手稿本残损，此据《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

可见，这一个月內，蒋介石时而自制，时而放纵，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不断交战中。

第一个月如此，第二、第三个月，也仍然如此。

2月29日：“戒绝色欲，则《中庸》‘尚不愧于屋漏’一语，亦能实行。污我、迷我、醉梦我者惟此而已，安可不自拔哉！”

3月25日：“逐日好游荡，何法以制之？”

3月27日：“晚，又作冶游，以后夜间无正事，不许出门。”

3月28日：“色欲不惟铄精，而且伤脑，客气亦由此而起。”

3月30日：“邪念时起，狂态如故，客气亦盛，奈何奈何！”

4月17日：“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

6月27日：“色念未绝，被累尚不足乎？”

7月2日：“抵沈家门，积善堂招待者引余等入私娼之家，其污秽不可耐，即回慈北船中栖宿。”

当年7月3日，蒋介石遇见旧友陈峻民，畅谈往事，蒋自觉“旧行为人所鄙”，因而谈话中常现惭愧之色。这以后，蒋又下了决心，日记中多有自我批判、自我警戒的记录。8月7日日记云：“世间最下流而耻辱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关，则茫茫尘海中，无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为众所鄙之虞！”可见，蒋有保持“高尚人格”的念头，因此“为众所鄙”始终是蒋介石心头的梦魇，迫使他不得不有所检点。8月9日日记云：“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23日日记云：“午后，神倦假眠，又动邪念。身子虚弱如此，尚不自爱自重乎！”^①

当时，“吃花酒”是官场、社交场普遍存在的一种恶习，其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谓“三陪”中的“陪酒”。9月6日，蒋介石

^① 以上各日日记，手稿本或残损，或被涂去，均据《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

“随友涉足花丛”，遇见旧时相识，遭到冷眼，自感无趣，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辙。^①11月6日蒋介石寄住香港大东旅社，晚，再次参加“花酌”，感到非常“无谓”。这些地方，反映出蒋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进一面。

1921年全年，蒋介石继续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交战中，其日记有如下记载：

1月18日：“我之好名贪色，以一澹字药之。”

5月12日：“余之性情，迩来又渐趋轻薄矣。奈何弗戒！”

9月10日：“见姝心动，又怕自馁，这种心理可怜可笑。此时若不立志树业，放弃一切私欲，将何以为人哉！”

9月24日：“欲立品，先戒色；欲除病，先戒欲。色欲不戒，未有能立德、立智、立体者也。避之犹恐不及，奈何有意寻访也！”

9月25日：“日日言远色，不特心中有妓，且使目中有妓，是果何为耶？”

9月26日：“晚，心思不定，极想出去游玩，以现在非行乐之时，即游亦无兴趣。何不专心用功，潜研需要之科学，而乃有获也。”

12月1日：“陪王海观医生诊治诚病。往游武岭，颇动邪思。”

12月8日：“邪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报国？”

道学家主张，一念之萌，必须考察其是“天理”，还是“人欲”。倘是“天理”，则“敬以存之”；倘是“人欲”，则“敬以克之”。上述日记，大都属于“敬以克之”一类。

1922年，蒋介石继续“狠斗色欲一闪念”。日记有关记述仅两见。9月27日云：“见色，心邪不正，记过一次。”10月14日，

^①《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1920年9月6日。

重到上海，日记云：“默誓非除恶人，不近女色，非达目的，不复回沪。今又入此试验场矣，试一观其成绩！”次年，也只有两次相关记载，3月1日云：“近日心放，色利之欲又起，戒惧乎！”6日云：“出外闲游，心荡不可遏。”两年中，蒋介石仅在思想中偶有“邪念”闪现，并无越轨行为，说明他的修身确有“成绩”。

1925年，蒋介石在戒色方面继续保持良好势态。4月6日日记严厉自责云：“荡念殊甚，要此日记何用。如再不戒，尚何以为人乎！”11日日记云：“下午，泛艇海边浪游，自觉失体，死生富贵之念自以为能断绝，独于此关不能打破，吾以为人生最难克制者，即此一事。”这段日记写得很含蓄，看来，蒋介石打熬不住，又有某种过失。同年11月16日晚，蒋介石参加苏联顾问举行的宴会，在—批外国人面前“讲述生平经过、恶劣历史”，对自己的“好色”作了坦率的解剖和批判。

1926年全年安静无事，仅11月21日日记云：“见可欲则心邪，军中哀感不遑，尚何乐趣之有！”

蒋介石的忏悔不仅见于日记，也见于他的《自述事略》中。例如，他自述辛亥前后的状况时就自我批判说：

当时涉世不深，骄矜自肆，且狎邪自误，沉迷久之。庸白冷眼相待，而其所部则对余力加排斥，余乃愤而辞职东游。至今思之，当时实不知自爱，亦不懂人情与世态之炎凉，只与二三宵小，如包、王之流作伴遨游，故难怪知交者作冷眼观，亦难怪他人之排余，以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也。且当时骄奢淫逸，亦于此为尽。民国元年，同季回沪，以环境未改，仍不改狎邪游。一年奋发，毁之一旦，仍未自拔也。^①

^①《自述事略》，稿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3041-181。

膺白，指黄郛，蒋介石的把兄弟。从这份《事略》里，可见当时蒋众叛亲离，为人所不屑的状况。本文一题《蒋主席自述小史》，这时，蒋显然已经成为“党国要人”，但他不仅不隐讳早年恶迹，反而有意留下相关记载，这是极其不易的。

愆忿，对自己的暴怒常常自责、愧悔

蒋介石除“好色”外，性格上的另一个大毛病是动辄易怒，骂人、打人。为了革除这一恶习，蒋介石也进行了多年修养。

《易经·损卦》云：“损，君子以愆忿制欲。”后来的道学家们因此将“愆忿”列为修身的重要内容，要求人们控制自己的感情，避免暴怒，也避免恶语伤人及相关行为。蒋介石对此也很重视，日记云：“以后修身之道，端在愆忿，其次窒欲也。”^①

蒋介石深知自身性情上的弱点。1919年1月3日日记云：“近日性极暴躁。”同月7日，有黄定中者来谈报销问题，蒋介石“厉斥其非，使人难堪”。事后追悔，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近日骄肆殊甚，而又鄙吝贪妄，如不速改，必为人所诬害矣。戒之！戒之！”几个月之后，蒋介石接见邓某，故态复萌，“心怀愤激，怨语漫言，不绝于口”。这样的情况发生多次，蒋介石“自觉暴戾狠蛮异甚。屡思遏之而不能”，因此，写了“息心静气，凝神和颜”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还曾有意阅读道学著作，用以陶冶性情^②。

然而，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种弱点如果已经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要改掉是颇为艰难的。1919年6月27日，蒋介石感叹说：“厉色恶声之加人，终不能改，奈何！”7月29日再次为“会客时言语常带粗暴之气”而对自己不满，在日记中写下“戒之”二字。但是，蒋介石有时刚刚作了自我检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5年4月1日。

^② 蒋介石1925年8月15日日记云：“近日恼躁如此，展读性理书陶养。”

讨，不久就再犯。同年8月5日，蒋介石与陈其尤谈话，谈着谈着，“忽又作忿恚状”，蒋深自愧悔，但是当晚继续谈话时，蒋“又作不逊之言”。这使蒋极为苦恼，日记云：“如何能使容止若思，言辞安定，其惟养吾浩然之气乎！”

除了骂人，蒋介石有时还动手。

1919年10月1日，蒋介石访问居正，受到人力车夫侮辱，不觉怒气勃发。居正家人与车夫辩论，发生殴打，蒋介石见状，忿不可遏，上前帮力，自然，蒋介石不是车夫的对手，反而吃亏。接着，又“闯入人家住宅，毁伤器具”。蒋介石自知理曲，他想起1917年在张静江门前殴打车夫，被辱受伤一事，真是与此同一情景。当日日记云：“与小人争闲气，竟至逞蛮角斗，自思实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绝无长进，奈何！”

蒋介石打车夫毕竟只是个别情况，更多的是打佣人。1920年12月，蒋介石在船中与戴季陶闲谈，戴批评蒋“性气暴躁”，蒋声称“余亦自知其过而终不能改”，认为要杜绝此病，只能不带“奴子”，躬亲各种劳役。

1921年4月，蒋介石因事与夫人毛氏冲突，二人“对打”，蒋介石决定与其离婚。4日，蒋介石写信给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缕诉与其妹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理由”。正在此时，发现毛氏尚未出门，又将毛氏“咒诅”一通。当日，蒋在日记中自责说：“吾之罪戾上通于天矣！何以为子，何以为人！以后对母亲及家庭间，总须不出恶声。无论对内对外，愤慨无似之际，不伸手殴人，誓守之终身，以赎昨日余孽也。”然而，自责归自责，蒋介石仍然时发暴性。见之于日记者有下列记载，试为分类：

(一) 打骂佣人、侍卫、下级：

1921年4月7日：“叱吓下人，暴性又发，不守口不誓人之誓，记过一次。”

1925年2月21日：“自误饮水，迁怒下人，逞蛮殴打，尚

有人道乎！记过一次。”

1925年2月22日：“吾勉为庄敬宽和，以药轻浮暴戾之病，则德可进，世可处也。叫人不应，有顷始至，又逞蛮根，日日自悔而不能改之，所谓克己者，如斯而已乎！”

1925年3月4日：“肆口漫骂，自失体统，几不成其为长官，记大过一次。”

1925年10月5日：“昨夜十时到黄埔，阁者弛卧，鼾声达门外，久叫始应，又动手打人。记大过一次。”

1925年10月11日：“为佣人蠢笨，事事不如意，又起暴戾躁急，如此将奈之何！”“暴戾极矣，动手打人，记大过三次。”

1926年1月5日：“脑胀耳鸣，心烦虑乱，对佣人时加呵斥，即此一事，已成吾终身痼疾矣！”

(二) 辱骂同事、同僚：

1921年10月22日：“庆华、颖甫先后就谈，又发暴性，犯不着也。”

1922年2月25日：“下午，回八桂厅，对礼卿发脾气，自知形态不雅。”

1926年1月13日：“茂如来会，以其心术不正，败坏校风，愤恨之余，大加面斥，毋乃太甚乎！”

1926年8月1日：“动手打人，蛮狠自逞，毫无耐力，甚至误殴幕友，暴行至此极矣！”

(三) 对象不明：

1925年3月3日：“欲为盖世之人物，不可不自深其学养。近日常多很（狠）厉愤狷，而无静默沉雄气象，其何以几及之也？”

1925年3月5日：“昨夜骂人太甚，几使梦魂有愧。今日在途懊悔不已。平日宅心忠厚，自揣差近长者，而一至接物，竟常有此恶态，尚何学养可言乎！”

1925年10月7日：“今日暴性勃发，几视国人皆为可杀。”

以上三种情况中，不论哪一种，蒋介石都知道自己不对，因此事后对自己也多所责备。他也曾设法改正，例如立誓做到“四不”，即“口不骂人，手不打人，言不愤激，气不嚣张”。又立誓作到“四定”，即“体定、心定、气定、神定”。还曾提出“三要”，即“谨言、修容、静坐”，但是，收效不大，暴躁狠蛮，几乎成为他的终身“痼疾”。

戒客气，警惕虚骄

蒋介石日记中常见“戒客气”的记载。所谓客气，指的是一种虚骄之气。《宋书·颜延之传》称：“虽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拟。客气虚张，曾无愧悔。”因此，宋明时代的道学家们也将“戒客气”作为修养要求。

根据现有资料，蒋介石批评自己的虚骄之气始于1919年。当年2月4日，蒋介石出席许崇智的晚宴，席间，蒋介石“客气与虚荣心并起，妄谈孙先生事”，当日即懊悔无已，在日记中自责，认为自己的言谈“不觉自暴其夸鄙，为人所嗤鼻矣”。同年，他自感人才难得，

检讨原因，认为自己“常有骄矜暴戾之色，盛气凌人之事”，不能“虚心包容”，所以有才之人不乐为己所用。^①

此后，蒋介石即将“客气”作为自己修养中的大敌之一，称之为“凶德”。1919年9月9日日记云：“言多客气，为人所鄙，良用惭咎。谨其言，慎其行，自强其志，不徇外为人，立身之本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19年8月26日。

也。”同年11月24日日记云：“近日思想渐趋平实，欲改就社会上做一番事业，奈私利心、野心、客气终不能消除何！”

蒋介石认为：“客气”的表现之一是“言语轻肆，举动浮躁”，针锋相对地提出：“我守我拙，言语迟钝。”^①表现之二是气质涨浮，行为佻达，说话太多，因此提出：多言不如少言，有言不如无言，能言不如不能言。日记称：“人之是非好恶，己之爱憎取舍，默会于心，斯得之矣，何以言为哉！”

1923年7月16日，蒋介石清晨醒来，自省差误，认为自己“为人所嫌弃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所妒忌者，乃在骄气太甚，而其病根皆起于轻浮二字”，因此，要求自身今后要“谨然自持，谦和接物”。他表示：“宁为人笑我道学，而不愿人目我为狂且也。”

戒名利诸欲

道学家们既反对纵情声色，也反对沉溺名利，视之为“胶漆盆”，要人们通过修养，从中滚脱出来。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到朱熹的白鹿洞书院讲学。陆的讲题是《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语。他说：“今人读书便是为利。如取解后又娶得官，得官后又娶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朱熹对他的这段讲词非常欣赏，认为“切中学者深微隐痼之病”。

蒋介石早年修身时，也很注意戒名利诸欲。1919年，他作《四言箴》自励：“主静主敬，求仁学恕，寡欲祛私，含垢明耻”，明确地要求自己“寡欲”。6月24日日记云：“今日馁怯有余，谨慎不足，终是名利患失之心太重，能于敬、澹二字上用功一番，庶有裨益乎？”

蒋介石这里所说的“敬”，指的是敬于所事；“澹”，指的是“澹”于所欲。蒋介石要求自己将事业放在首位，而不岌岌于求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2年1月23日。

名求利。这一层意思，他在1920年2月的一则日记中表述得更清楚：“事业可以充满欲望，欲望足以败坏各种事业，不先建立各种事业，而务谋饜足欲望，是舍本而逐末也。”

多欲必贪。蒋介石既要求自己“寡欲”，因此，特别注意戒“贪”，保持廉洁。1921年，蒋介石因葬母等原因，花销较大，欠下一批债务。次年9月，孙中山命他去福建执行军务，蒋乘机写信给张静江，要求张转请孙中山为他报销部分债务。写信之前，蒋矛盾重重，思想斗争剧烈，日记云：“今日为企图经济，踌躇半日。贪与耻，义与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为我所当辨。如能以耻字战胜贪字，此心超然于利义之外，岂不廉洁清高乎！一身之荣辱生死，皆为意中事，安有顾虑余地乎！”1923年7月，蒋日记有云：“戏言未成，贪念又萌，有何德业可言！”可见，像他努力戒色一样，对“贪念”，也是力图遏制的。

蒋介石长期生活于上海的十里洋场，习染既久，难免沾上奢侈、挥霍一类毛病。1920年岁末，蒋介石检点账目，发现全年花费已达七八千元之谱，顿觉惊心，严厉自责说：“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进步，所谓勤、廉、谦、谨四者，毫不注意实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两家著名的百货公司选购物品，自以为“奢侈”，在日记中提醒自己：“逸乐渐生，急宜防虑。”同年5月，自觉“心志渐趋安逸，美食贪乐，日即于腐化”，曾严厉自责：“将何以模范部下，而对已死诸同志也？”

道学家们大都要求人们生活淡泊，甘于“咬菜根”一类清苦生活。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在这一方面同样受到道学的影响。

在道学家的修养要求里，寡欲，不只是寡于物质生活，也包括求名一类精神生活内容。在这一方面，蒋早年对自己也有所要求。1925年1月22日日记云：“好名之念太重，一闻蜚语，即觉自馁，是不能以革命主义为中心，而以浮世毁誉为转毂，岂得谓知本者乎！”

尊“诚”，重视形貌

诚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原意为信实无欺或真实无妄，后来被视为道德修养的准则和境界。《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将“诚”视为天的根本属性，要求人们努力求诚。在《中庸》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大学》进一步将“诚意”作为治国、齐家、修身、正心的根本。自此之后，道学家无不尊诚、尚诚。北宋的周敦颐将“诚”说成“圣人之本”，要求人们经过“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后，回归“诚”的境界。

蒋介石深受道学影响，自然，他在早年也尊诚、尚诚。1922年11月20日日记云：“率属以诚为主，我诚则诈者亦诚意矣！”这里，“诚”被蒋介石视作一种取下之道。1923年5月4日日记云：“凡事不可用阴谋诡计，且弄巧易成拙，启人不信任之端。”这里，“诚”被蒋介石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1924年5月3日日记云：“机心未绝，足堕信义与人格。”这里，“诚”才被蒋介石作为一种道德修养准则。

道学们不仅提出了诸多内心修养方面的要求，而且在人的形体外貌方面也有许多规范。朱熹写过一篇《敬斋箴》，要求人们“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在这方面，蒋介石也是身体力行者。1925年2月11日日记云：“莅团部时履不正，为属下窥见，陡觉惭汗。”近年来出现若干影视作品，其中的蒋介石形象大多衣冠端正，这是符合蒋的性格的。

中世纪的修养方法

道学形成于宋明时代，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也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其总体作用在于将传统的儒学伦理规范哲学化，以便进一步强化其教化作用，借以整饬人

心，调节社会矛盾，巩固既定社会秩序。但是，其中，也包含着若干合理因素。

蒋介石少年顽劣，时代的激流将他推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大潮：留学日本，归国革命，追随孙中山。这样，蒋介石早年就具备了双重性格：既是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又是革命志士，两种性格相互矛盾而又长期共存。可以看出，在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漫长过程中，道学曾促使他励志修身，克服了浮浪子弟的某些劣根性。但是，这也使他比较拘守传统文化，未能在接受新文化、新思潮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也未能使他在近代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辨潮流，识方向，作出正确抉择。

中世纪的修养方法无法完全适应近、现代的社会生活，这是自然的。

原载台北《传记文学》2001年5月号

蒋介石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蒋介石下海从商的缘由、经过与感受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在近代中国政治史、经济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机构。从1918年至1923年，蒋介石和它发生过密切关系；它也曾给予蒋的生活、思想以深刻影响。1920年初，蒋甚至有以经纪人为职业，“作棉花、棉纱买卖”的念头。^①但是，前此有关论述大都依靠个别人员的回忆录，或流于肤浅，或谬误连篇。本文将根据确凿的文献和档案资料清理有关史实，希望能在大多数问题上作出比较准确、清晰的说明。但是，由于某些环节的资料尚感不足，因此，本文又还难以说明全部问题。进一步的探讨，有待于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和更多资料的发现。

上海交易所是孙中山倡办的

孙中山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为经费所窘。1916年12月，孙中山接受日本某政党的建议，决定与长期支持中国革命的

^①手稿本残损，此据《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0年1月1日：“今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番，将来做些事业，或学习英语，游历世界一周，访探各国政治，以资采择。二者如不能，即在事业方面立足，组织棉麦会社，种植棉麦，否则充当经纪人。作棉花、棉纱买卖。”

日本神户航运业巨头三上丰夷共同在上海开办交易所，企图以盈利所得资助革命。同月5日，由戴季陶出面与三上的代表中岛行一签订草约，规定资本总额为上海通用银元500万元，日方提供250万元，作为无息贷款，所得红利，日本资本团得十分之八，创立人得十分之二，同时规定，交易所须聘用日本资本团推选的精通业务之人为顾问，合议处理一切。^①其后，对草约个别条款作过修改，即行定案，签字者有孙文（中山）、赵家艺、虞和德（洽卿）、张人杰（静江）、洪承祁、戴传贤（季陶）、周佩箴等11人^②。次年1月22日，由孙中山领衔，虞洽卿、张静江、戴季陶等8人附议，向北京政府农商部呈请，成立上海交易所。呈文首先历述中国缺乏交易所的种种弊病，中云：

上海为全国物产集散之枢纽，所有大宗物产交易均由各业商人任意买卖，价格无适中之标准，交易无保证之机关，恐慌无从预防，金融不能活动，且经纪人亦漫无限制，于工商业之发展，窒碍实多，虽各业有各业之公会及任意集合之市场，然既无确实之资金，又无完备之组织，政府难于监督，商人无所置信，是以大宗物产之价格，一二外国经纪人常得自由操纵之，病商病国，莫此为甚。至于有价证券之交易，亦无一中心之机关，已发行之公司股票不能流通，新发生之公司不易招股，已发行之公债价格日见低落，将来国家或地方发行公债更难于办理。因此之故，中国公司多于外国政府注册，以图其股票可以赖外国交易所而流通，中国之投资者亦多弃本国公债于不顾，而乐购外国之公债，

① 《创立上海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协定豫约案》（戴季陶手迹），山田纯三郎档案，日本爱知大学藏。又，1917年2月28日日文《上海日报》对此有简要报道，并摘录了合同中的2、3、7、8、9各款。参见赵立人：《孙中山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孙中山与近代社会》，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165-174页。

② 《孙文垄断上海市面之大计划》，《晨钟报》，1917年4月6日。其主要修改为规定：“本借款之金额交款后，用创立人名义存入日本正金银行，以借用状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支用所存正金银行本店日本金额之上海银元交付股款。”

且各公司之内容，无一机关调查保证之，买入卖出，漫无所察，一旦破绽发生，股票顿成废纸，往往因一公司之内容缺陷，致市场大起恐慌。凡此种种祸患，皆由无资本充足、信用确实之交易所所有以致之，不能徒责商人之无爱国心也。

呈文声称：“交易所之组织，则以证券交易、物品交易二者同时经营为最有益于上海市场，尤能助中国一盘实业之发展。”据有关人员回忆，该文由朱执信起草，但既由孙中山领衔，应视为孙中山的重要佚文。

根据该呈文，上海交易所申报的业务范围有证券、花纱、金银、中外布匹、皮毛等7项。^①2月24日，北京政府农商部批准先行经营证券；关于物品交易，咨请江苏省长查复报部，再行核办。^②同月，戴季陶赴日，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内设立筹备处。但是，正当筹备工作紧张进行之际，张勋在北京拥溥仪复辟，上海市面顿时陷入混乱，银根突紧，拆息猛涨，商业停滞，交易所筹办暂停。

1918年，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共谋利用前案，继续申办。戴等秘密组织协进社，吸收原发起人虞洽卿、赵家艺、洪承祈为社员。同年3月，日人在上海成立取引所（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证券、棉纱、棉花等，企图操纵上海市场。各业商董认为，“我不自办，彼将反客为主，握我商权”^③，因此，虞洽卿等于同年7月成立预备会，推虞及赵林士、邹静斋、盛丕华、周佩箴五人为筹备员^④，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温宗尧、闻兰亭（汉章）、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纷纷

^① 《孙文等上北京政府农商部呈文》，原件，未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中华书局，1964，第149页。

^② 转引自虞和德：《致农商部事略》，《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19页。

^③ 虞和德：《致农商部事略》，《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9页。

^④ 《证券物品交易所创立会纪事》，《申报》，1920年2月2日。

加入为发起人。此后，遂由虞洽卿领衔，呈请北洋政府，以“时会之趋势，实不容再缓”为理由，要求“将证券、物品一并开办”，得到批准。但是，上海各商帮旋即产生分办、合办之争。原发起人金业董事施兆祥、徐甫孙拟申请成立上海金业交易所，原上海股票交易公会的范季美等人拟申请成立证券交易所。1918年4月，北京政府农商部要求分为三家交易所办理。虞洽卿等据案力争，农商部训令上海总商会召集各商帮讨论，并飭江苏实业厅详查。结果辗转迁延，不能决定。1919年6月27日，农商部认为合办资本势力较为雄厚，取决多数，以合办为宜，准予先行开办^①。此令既下，上海金业、股票两业仍有异议。12月20日，农商部再令，要求从交易所营业范围内除去证券、金类，以免纠葛，但虞洽卿等旋即提出异议，呈请免于修改。

1920年2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总商会开创立会。计股东572户，10万股，到场股东或代表408户，代表85408权^②，超过半数。会议公推虞洽卿为临时主席。虞在致词中追溯了中国交易会的发起历史，声称20年前，即有袁子壮及周熊甫二君提议创办，但未成事，“民国五年冬间，孙中山先生又复发起，鄙人追随其后”，“屈指二十载，交易所之创造艰难，一至于斯。幸今日股本已超过原额数百股，可知我国商业之程度日高，将来本所之成绩，必大有可观”云云。会议选举理事17人，监察人3人。虞洽卿以81633权居理事第一位。^③张静江被选为候补理事。蒋介石的同乡、同志周骏彦（枕琴）以53860权当选为监察人。对此，蒋介石日记云：“枕琴当选为交易所监察人。”^④可见，他是相当重视的。周骏彦在辛亥前被官府选派赴日留学，

^① 《上海县知事公署训令第404号》，《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

^② 权，指各股东的议决权，一股一权。

^③ 《证券物品交易所创立会纪事》记虞洽卿得票为82833权，见《申报》，1920年2月2日。

^④ 手稿本残损，此据《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0年2月1日，未刊。

入警监学校，与蒋介石结为同志。曾参加宁波光复之役，为奉化军政分府负责人之一。1911年冬，在蒋介石麾下任军需科科长。后任宁波商业学校校长。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受通缉，周曾将蒋藏于校内。^①2月6日，交易所召开理事会，选举虞洽卿为理事长，闻兰亭、沈润挹、赵林士、郭外峰、邹静斋、盛丕华为常务理事。^②其中，宁波人郭外峰曾在日本长崎道胜银行工作18年。

蒋介石组建茂新号，陈果夫充当经纪人

从孙中山倡办交易所之日起，蒋介石即奉命与戴季陶、张静江等共同参与筹备。

1920年4月，蒋介石因与陈炯明不合，从福建漳州的粤军总部回到上海，与陈果夫共同筹办友爱公司。同年6月3日蒋介石日记云：“拟与果夫订定友爱公司资本共银五千圆，先由中正全部垫付。先购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四百股为基本。定为十股。丰镐房七股，果夫、馥夫、干夫各约一股，推定果夫为义务经理。”陈果夫的岳父朱五楼原在上海经营福康钱庄。1918年5月，陈经其岳父介绍，到沪任晋安钱庄助理信房。1919年，他曾借用蒋介石存在晋安的一千多两银子，“做了一笔洋钿生意”，三个星期赚了六百几十两银子。^③因此，在革命党人中，陈比较熟悉金融，懂一点经营之道。这是蒋介石推陈出任义务经理的缘由。不过，这个友爱公司似乎并没有成立起来。计划刚定，蒋介石迅即碰到了国际金融风潮。伦敦、纽约银价下跌^④，上海的银价也随之突

① 王舜祈：《蒋介石故里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第200-201页。

② 《上海交易所电报举定理事长》，《申报》，1920年2月8日。

③ 陈果夫：《商业场中》，《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台北〕正中书局，1952，第54页。

④ 据中美新闻社消息，6月9日伦敦电汇及远期银价各跌6便士，纽约银价跌至8角4分。见《银市报告》，《申报》，1920年6月10日。

然大落。这一事件使蒋介石的经商遇到了第一次挫折，加之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家庭生活也出现矛盾。失意之余，蒋介石离开上海，寄情山水去了。《年谱》云：“公以戎谋莫展，而闺房与商业又连不得意，遂乃漫游以舒郁怀。浮海至普陀……凡游六日而倦还。”^①

普陀归来后，蒋介石继续与张静江等商量交易所事宜。1920年6月26日，蒋介石日记云：“往静江家，与配箴商议公司事。”配箴，指周佩箴，吴兴南浔镇人，与张静江有姻亲关系，原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1920年5月29日被补选为常务理事。这里所说的公司当即几天后出现的茂新公司。

同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王正廷、王正亭及江苏省长、上海道尹代表等三千余人出席致贺^②。当日，上海《申报》出现了一则广告：“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五四号经纪人陈果夫，鄙人代客买卖证券、棉花，如承委托，竭诚欢迎。事务所四川路1号3楼80室。电话：交易所54号。”^③关于此事，陈果夫回忆说：“蒋先生就要我和朱守梅（孔扬）兄，及周枕琴（骏彦）先生、赵林士先生等商量，组织第五十四号经纪人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推我做经理，守梅兄做协理。”^④

此后几天内，蒋介石日记连续出现关于茂新号的记载，可见此事已成为蒋的兴奋中心，也可见他为此焦思苦虑的情况：

1920年7月5日，蒋介石日记云：“今日为组织茂新公司及买卖股票事，颇费经营踌躇也，晚间不能安眠。”^⑤

1920年7月6日，蒋介石日记云：“晚在寓商议茂新公司组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第41页。

② 《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纪》，《申报》，1920年7月2日。

③ 《申报》，1920年7月1日。

④ 陈果夫：《商业场中》，《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55页。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年7月5日。

织法。”

1920年7月7日，蒋介石日记云：“到茂新及冶诚处。”

办友爱公司时，蒋曾表示，全部资本由他负责；但在组建茂新公司时，其资金则并非来源于蒋。据陈果夫回忆：它的开办，最初由朱守梅出资两千元，又由陈果夫向晋安钱庄借了一千两银子。资本总数不过三千数百元现金。

茂新号开业后并不顺利。第一天开张，就亏了一千七百余元。与此同时，蒋介石委托朱守梅代购股票，价格上也吃亏很大。朱原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毕业于两浙高等师范学校；初营商业，没有经验。6月25日，证券物品交易所股票上市试验，收盘价每股29.9元。^①27日，价格陆续上涨。到7月4日，已经涨到开盘价31元，收盘价31.2元；下午继续上涨（开盘价31.6元，收盘价31.9元，记账价32元）^②。以后几天中，价格陆续升高，至7月4日，已经涨到每股42元。朱守梅在低价时没有买进，到高价时，才突然收购。蒋介石得悉此讯，极为懊恼。当日日记云：“益钦〔卿〕来舍，知上交股票涨至四十二元，甚惊骇。即往茂新访守梅，乃悉前托代买股票，均四十二元之价购入，不胜忧虑。初做生意者之不可靠也。果夫来会，其形容甚悲伤，甚至含泪而诉，乃知其不能作生意也。”

蒋介石托人买进高价股票本已吃亏，他完全没有想到，几天后，价格却又突然回落。蒋介石在福建接到陈果夫电报，获悉有关消息。日记云：“接果夫电，悉上交股票大落，亏本至七千余元，乃知生涯不易做，而为果夫、守梅所害，亦一大半。星相家谓我五六月运气不好，果应其言，亦甚奇也。”^③两天后，又记云：“接果信，知其胆小多虑，不能作生意也。”

① 《申报》，1920年6月25日。

② 《申报》，1920年6月27日，第12版。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年7月18日。

蒋介石此次赴闽，本是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力劝的结果，目的是协助陈炯明。许崇智处理军务。蒋介石对陈炯明有意见，到闽后，又发现陈、许二人不和，认为事无可为，便于8月5日离闽返乡。在老家，他依然惦念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买卖情况，思考对策，并派人赴沪传达他的意见。^①下旬返沪后，又亲到交易所参观，污浊的空气和嘈杂的人声令蒋介石感到头晕脑胀，不禁产生经纪人难当的感叹。^②

茂新号初期营业不利，后来逐渐兴旺。陈果夫回忆说：“茂新的股本，由一万加至一万五千元，慢慢的又增到三万元。每天开支不到三十元，而每天生意，在最差的时候，佣金收入总在三十元以上，最好则有二千元。生意的兴隆可想而知。”^③于此可见，陈果夫在经营上还是有一套办法的。

扩大投资，成立恒泰号

茂新号初期营业不利，蒋介石等即集议另组公司。9月2日，蒋介石决定退出6股。^④第二天，蒋介石访问张静江，因为心情不好，狠狠地揍了车夫一顿。^⑤9月5日，蒋介石、陈果夫、朱守梅等人再次集议，研究公司改组事宜。蒋介石决定投资4000银元，作为与张静江合作的本钱；同时决定投资5000元，托人经营临时商业。^⑥9月22日，蒋介石再次访问张静江，谈经商事，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年8月20日：“甚愿以后交易所之买卖也，派阿顺赴沪。”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年8月31日。

③陈果夫：《商业场中》，《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57页。

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年9月2日。

⑤《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年9月3日。

⑥《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年9月5日：“果夫、守梅、梧冈诸君来，谈改组公司事，付新元洋四千元，作为与静江合本，五千元托孙鹤泉作临时生意也。晚结帐，茂新连资本五股及欠我四千四百元，尚欠洋九千四百元。”

蒋介石决定投资 15000 元作为成本。^①

当蒋介石雄心勃勃地要在商业上大干一场之际，粤桂战争正在紧张进行。9月30日，蒋介石离开上海，赶赴前线。但是，又因与陈炯明意见不一，于11月12日回到上海，次日回到老家。11月25日，孙中山应粤军许崇智的要求，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张静江、戴季陶要求蒋与孙中山同行，戴并曾到甬相劝，声色俱厉地责以大义，但蒋仍坚决拒绝。^②

12月上旬，蒋介石再到上海，15日，决定与张静江等 17 人合作，继续经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事业，定名为恒泰号。议定条件如下：

- 一、牌号。定名为恒泰号，经纪人由张君秉三出名。
- 二、营业范围，暂以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二项为限。
- 三、资本额，计上海通用银币三万五千元，每股一千元。
- 四、占股数目，蒋伟记四股，张静江五股。
- 五、此契约成立于上海租界，一式十八份。^③

该合同现存，下有吴俊记等 17 人签名，其中小恒记是戴季陶的化名，吟香记是周佩箴的化名，陈明记是陈果夫的化名，朱守记是朱守梅的化名，张秉记是张静江的侄子张秉三（名有伦）的化名，张静记是张静江的化名，张弁记是张静江的哥哥张弁群的化名，蒋伟记名下，蒋介石亲笔签了中正二字。^④不过，其股份是由张静江代认的。^⑤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年9月22日：“傍晚，访静江兄，谈生意事。余拟投资一万五千元资本以为共同事业。”

②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7页。

③ 《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05-107页。

④ 参见陆丹林：《蒋介石、张静江等做交易所经纪的物证》，《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

⑤ 蒋介石1921年1月10日与张人杰书：“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5页。

这一年，与蒋介石有关的商业继续亏本。^①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虞洽卿曾于1920年9月向农商部呈请注册，同年11月，虞并亲自到北京活动。但是，由于江苏省议会及张謇都致电农商部，要求在《交易所法》未修正前停发执照，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注册因此受阻。直到次年3月7日，虞洽卿再次向农商部呈请发给营业执照时，才出现转机。3月14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报告申领执照及扩大金银业务等喜讯，函称：“股票价格前日稍稍回头，大约今日可以望好，因为执照今日可以在北京发给，发给后，金即欲发表，所以只几天可以望好。”^②不过，直到当年6月25日，北京政府农商部才批准发照。^③

张静江等鉴于即将领到营业执照，决定扩大恒泰号的业务范围，增加代客买卖金银业务，资本额4万6千元，每股100元。计蒋伟记44股，张静记55股。^④但是，业务仍然很不顺利。

当年1月下旬，蒋介石在孙中山一再催促下，离开奉化，于2月6日抵达广州，参加讨论援桂作战计划。不久，因与陈炯明发生矛盾，于同月回返奉化，其后就一直留在家里。4月间，蒋介石接连收到张静江的告急电报，声称“商战为人环攻，请兄速来营救”。蒋介石不知道恒泰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既担心，又气恼，一时神情失常。但是，蒋介石很快就自觉不够镇静，在日记中严厉自责：“何养气不到一至于此哉！”^⑤

在张静江连电告急的情况下，蒋介石匆匆赶赴上海，和陈果夫、戴季陶、张静江、林业明（焕廷）等商量挽救办法。4月17

① 《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0年12月31日：“今年费用，除营商输本外，不下七八千元之谱。”

② 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24页。

④ 《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23-124页。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1年4月15日。

日，蒋介石日记云：“果夫来晤，谈及静公交易为人攻击事，往访焕廷先生。再到大庆里与季陶谈天，商量生涯解急之法。”次日日记云：“下午，与静江、季陶聚议，商量营业事。”两天日记，虽是寥寥几行，但蒋介石等人的焦急情状，历历可见。不过，半个月之后，命运之神就又给蒋介石等人送来了喜讯：股票价格上涨。5月2日：蒋介石日记云：“接静兄函，知交股价涨至百零八元。”5月5日，日记又云：“接守梅电，知交股票价涨至百廿四元。”对于股民来说，没有比股价暴涨更好的消息了，蒋介石兴奋之余，在日记中写下了四个字：“甚为欣幸！”^①

孙中山于4月7日在广州被选为非常大总统。计划发动讨桂战争。4月18日孙中山致电蒋介石，告以“军情紧急”，要他迅速来粤襄助；陈炯明、许崇智、胡汉民、戴季陶等人也函电交驰，敦促蒋介石赴粤。5月10日，蒋介石启程。在粤期间，蒋介石收到陈果夫一函，报告交易所情况以及他和张静江之间的矛盾，中云：

静公为欲取回高所没收证金之一部（即我们四家共做老股三万股，计纳证金一百廿万元，被没收者，外间只拿到七十五万，其余四十五万，原为本所填补差金，现拟取回者即此一部分）囑我去商者约七八次。然彼自作主意，未尝纳我丝毫意见。我亦因不善语言，故有意往往不能尽达。且此时以为可办，并不反对。近日彼大有急急动作之意，侄不得不细心考察。考察结果，以为此事现在万不可行，而二先生只顾自己一方面，不管他人为难。且此事由厉君为之奔走，难免为他方所利用，一举而成，则彼等坐失其利。否则我方名誉损失之外，尚须再弃若干辛苦钱。现在所中所怕者是空头，余款由空头来争，而且未必能得，如由多头争，则将由上海全埠之人所唾骂，即使用全力致胜，空头方面岂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1年5月2日。

不又有说话，甚至要和你办大交涉。因为当时糊里糊涂过去，现在明白了，做三万吸多头者原来是你，即使你拿得到，也是不得安枕，况且我们经纪人是代客买卖，现在我们代表买方出场，将何以对得起一班吃亏最大，空头、套头的客人！所以我想来想去，不能替他做这一件事。我已经拒绝他了。不知我叔之意见如何？我拟将客人的交易如数了清之后，经纪人也不要做了，将茂新停办。^①

函中所言“空头”，指卖出股票者；“多头”，指买进股票者；“套头”，指利用近期和远期股票的差价以套取利润者；“我叔”，指蒋介石。据此函所述可知：张静江等做“多头”，买进交易所“老股”3万股，由于判断错误，保证金120万元被没收，其中75万赔偿损失，另45万元有可能收回。张静江急于动作，挽回损失，和陈果夫商量过七八次，但陈认为此时万不可行，如做，不仅钱收不回来，而且有可能被全上海人唾骂，因此坚决拒绝，和张发生争论。同函又云：

他前天晚上说名誉不顾这些气话，但是我不能不顾他和我们的名誉，况且还是名誉坏了也必无效果的事情。

可以看出，张、陈之间已从挽回损失的时机发展为要不要名誉的争论。张静江声称“名誉不顾”，可见此次生意失败给予他的刺激。

与张静江、戴季陶等合资经营利源号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始营业后，半年内即盈利50余万元。于是，各业“如发狂热”，纷纷效法，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面粉交易所、杂粮、油饼业交易所、华商棉业交易所等陆续成立。

^①《陈果夫致蒋介石函》，1921年5月12日，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申报》调查报告称：“本年（1920年——笔者）秋后，交易所鼎盛一时，风起云涌，各业以有交易所为荣耀。”^①至1921年10月，上海已有交易所140余家，额定资本达1亿8千万元。^②

此际的张静江、戴季陶等人自然更加兴奋。1921年5月31日，张、戴与徐瑞霖等签订合同，决定合资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利源号经纪人营业所，以吴梅岑为经理。该所资本总额3万元，每股1000元，共30股，其中，张静江1股，戴季陶1股，蒋介石3股，由戴季陶代签。^③

利源号办起来了，也和茂新、恒泰的最初的命运相似，受到同行排挤，使蒋介石极为愤慨。7月8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报告营业疲软的情况，函称：“静公因公司尚未了结，日来交易不做，公司进行以廿余元为事。近日价格极疲，俚看势头不至于大涨。且二元半之息，不能引起投机与投资家之兴会也。”^④信中所反映的完全是一种事无可为的心态。但是，事实正好相反，7月10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召开第三次股东会，张静江被选为理事。18日，张静江等决定扩大利源号的业务范围，“兼办金业”，同时决定每股追加股本200元。计蒋介石追加600元，张静江、戴季陶各追加200元，共6000元。^⑤后，利源号的业务越做越大。陈果夫致函蒋介石，报告张静江大量购进股票和股票价格飞涨的情况：

静江先生近来对于股票买进有增无减，公司益打益大，听说和从前做空头的人也有联络。不过时局不好，多拿在手中，不免危险耳！前日价格涨到二百四十二元，如照此价格出去，赚钱一定不少。

① 《辛酉年各业交易之概况》，《申报》，1922年1月23日。

② 《旧金山日报》（*The San Francisco Journal*），转引自《外人论中国商人道德之堕落》，《申报》，1921年3月16日。

③ 《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20-121页。

④ 《陈果夫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⑤ 《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22-123页。

这一段时期，上海股票业正处于黄金时期。不仅张静江等人干劲十足，而且蒋介石、陈果夫等最初发起的茂新号，也大赚其钱。陈果夫在同函中向蒋介石报告说：

茂新自去年九月至今年六月止，共净盈洋一万八千四百零一元七角八，清单明后日可以寄上。新丰名下应得发起人酬金洋一千零八十二元四角，又红利一千八百六十四元九角。下星期拟开股东会，吾叔到申一行否？否则请将意见知下，加股若干？^①

除茂新外，函中提到的“新丰”，应是蒋介石参加发起的另一个经纪人营业所，不过，关于它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资料。

从陈果夫函还可以发现，这一时期，蒋介石和朱孔扬等又在组建“第4号经纪人鼎新号”，做棉纱与金银生意，由朱孔杨任经理，陈果夫为协理。函云：

现在资本一万五千，除花、证、金三种，保证金一万八千元外，尚有付鼎新资本洋二千元。如将红利分派，无活动余地，故非加添资本不可。

至此，蒋介石已先后投资茂新、恒泰、利源、新丰、鼎新等五家经纪人事务所，可谓竭尽全力了。

畸形发展后的衰落，张静江、蒋介石大亏本

事物的发展规律是盛极必衰。上海的交易所事业虽然一时繁荣，但是，当时国内商业并不景气，交易所畸形发展，每个交易所的营业额必然大量减少，资金不足，紧跟着的必然是衰落。从

^① 《陈果夫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21年8月起，上海的交易所事业开始走下坡路。^①9月28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云：

交所情形仍恶，市价变动非常，纱尤甚，花次之。所做客人因交所不可靠，多存于号者绝无，积欠于号者渐多，此次纱之下跌，鼎新因循，不免有吃亏矣！^②

函中，陈果夫告诉蒋介石，由于担心商情危险，决定从10月1日起停止茂新号的业务，辞去鼎新号的协理职务，将家眷迁回湖州老家。陈并称：“茂新结束事已与静江先生接洽，静江先生亦赞成，想吾叔亦必赞成也。”不过，后来茂新并未“结束”，可能出于蒋介石的反对。

陈函所反映的情况实际上是整个上海交易所事业的缩影。据统计，1921年11月，上海有38家交易所歇业。12月，歇业者几乎每天都有。次年2月，上海法租界工部局发布《交易所取缔规则》，规定了严格的管理和惩罚条例。^③至1922年3月，各交易所惊呼“空气日非，社会信仰一落千丈”^④，纷纷停业清理，经纪人因破产而自杀者也颇不乏人，蒋介石的同乡、同志周骏彦也曾一度自杀。以见之于《申报》广告和有关报道为例，3月份即有棉布匹头证券交易所、中国糖业交易所、中华国产物券交易所、上海绸商丝织匹头股券交易所筹备处、公共物券日夜交易所、中美证券物产交易所、上海五金交易所、上海糖业交易所、上海纱线证券市场、上海华煤物券交易所、上海内地证券交易所、神州物券日夜交易所、中外交易所、浦东花业交易所、东方物券交易所等宣布停业，成立清理处。当月上海全市能维持营业

① 参见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433页。

② 《陈果夫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申报》，1922年2月4日。

④ 《上海绸商丝织匹头股券交易所筹备处通告》，《申报》，1922年3月7日。

的交易所只剩下12家。^①3月25日，具有同业公会性质的上海交易所公会决议解散。^②4月8日，江苏督军和省长会衔训令：未经领照各交易所，一律解散；已领照者，劝令改营他业。^③

交易所属于投机事业，其兴也勃，其衰也速。当时有人撰文云：“去年海上各种交易所勃兴以来，风起云涌，盛极一时，投机事业，举国若狂……不及匝年，噩耗迭起，某也并，某也闭，某也讼，某也封，某也逃，某也死，而最近若最初开张之某交易所，亦以风潮闻。昨日陶朱，今日乞丐。飘焉华屋连云，飘焉贫无立锥。”^④

大环境不利，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自难独善其身。

最初，情况还是不错的。1922年1月8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资本总额已达18719752元，盈利661129元^⑤。当日股东会决定提取50万元作为第三届股东红利。“每一老股5元，新股4股作一老股。”^⑥会上，戴季陶提出，增加股银500万元，作为附加份股。分为25万股，每股20元，一次缴足。各股东均表赞成。随后，虞洽卿提出成立上交银行，经讨论。决定资本总额1000万元，分作20万股，每股50元。这次会上，周骏彦以69806权继续当选为监察人。1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报上刊登《发给红利公告》，通告股东前来领取红利。但是，情况迅速发生变化。2月24日，交易所在买卖本所股票时，因买方资金不足违约，证券部停止交割，引起恐慌。

① 朱彤芳：《旧中国交易所介绍》，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参见《取缔后之法租界交易所》，《申报》，1922年3月7日。

② 《交易所公会议决解散》，《申报》，1922年3月26日。1921年9月上海交易所公会成立。

③ 《苏长官取缔交易所之会令》，《申报》，1922年4月8日。

④ 《交易所之教训》，《申报》，1922年3月6日。

⑤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东会纪》，《申报》，1922年1月9日。

⑥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发给红利公告》，《申报》，1922年2月22日。

关于此事，周骏彦向蒋介石写信报告说：

查上交风潮之起，初由于卖空者造谣，实由于做多头者乏款收现。二月二十三日，彦因茂新号电召到申，此时外面已有谣言，所中拍板如常。果夫先生询之做多头者，犹云资本已备，可无患。迨二十四□□□，证券部倏然停版，闻因做多头者向某处所□（借）英洋三百万元一时被绝，致有此变。证券部因此停止交割，大起恐慌。后由闻兰亭等双方调解，做多头者贴现洋五十万元，所中垫洋五十万元（以九六盐余公债一百万元相抵），并将多头家代用品一百万元没收，以支配卖出者，计卖出六万余股。

同函并提出，此次事故，由交易所洪承祈、盛丕华造成。函称：“此次交易所被做多头者拆坍，非特前此开办时一番之热心及功绩尽归乌有，且市面动摇，宁帮大失体面，实为洪、盛诸恶所害（此中原因极复杂，大约洪、盛诸君实为首祸，做多头失败，亦因洪君之故居多，今洪君俱已先后相逝矣），言之殊堪痛心。”^①这次风潮，使得蒋介石前所未有地大亏其本。3月15日，蒋介石日记云：“今日接上海来电，言交易所风潮，静江失败，余必被累，损失不少，或一文不留，亦未可知。”

关于此次风波，魏伯桢另有说法。魏是上海交易所的理事之一。他晚年时回忆说：戴季陶、张静江等“以为他们有实力（有每股一百二十元市价的四万股股票），因而大做本所股买卖”。“不仅不缴证据金反而强迫常务理事郭外峰、闻兰亭（他们是管理市场业务的）等收受空头支票，充作现金。同时现货与期货（本月期货与下月期货）的差价越来越大，差金打出愈多，致会计上的现金大量支出。交易所由外强中干到捉襟见肘，拖延到1922年2月，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变为废纸，大富翁变

^①《周枕琴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为穷光蛋了”。^①魏与周，二人关于责任者的说法不同，但关于破产原因的说法则有一致之处。

违约事件发生后，2月28日，由闻兰亭及经纪人公会出面调停，劝卖出一方认亏，其办法为，由违约者交出现金50万，由交易所垫出盐余公债100万元，抵作50万元，连同违约者的代用品150万元，赔偿卖方（共61025股）。卖方每股仅得现洋6元1角9分，公债票抵额8元2角（代用品另拟）。^②

4月4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云：

此次静江先生所认之二十三分三的公司份头，又分为四份，其中四份之一是吾叔的。照现在拿出一百万现洋，应派吾叔名下，约三万二千六百元，又一百五十万代用品，应派吾叔名下约四万八千九百余元，两共洋八万一千五百元。^③

信中，陈果夫告诉蒋介石，计核之后，“约数亏去五万元”，“静江先生损失，应与吾叔相等”。同函并称：“恒泰号去年下半年之红利，每股四百六十余元。利源结至去年底止，约盈七八千元，并未分派。茂新至年底，约盈有二万余。此次损失，茂新约在二三万左右，利源损失或比茂新多。”

蒋介石事后反思，一是觉得过于相信张静江。1922年5月23日日记云：“以二十万金信托于静江，经营商业，全权交人，自不过问，虽信人不能不专，其病则在自不预问，不知机，不留心，无经验之累也，有何悔也。”一是觉得陈果夫有问题。同年6

① 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文史资料选集》第49辑，第152-153页。

②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纪人公会关于该所股票买卖违法问题的会议记录及通告》，《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11-116页。原记录有月份，无年代，该书编者系于1921年，误。参见《物品交易所之和解讯》，《申报》，1922年3月9日。

③ 《陈果夫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月6日，蒋介石日记云：“果夫之为人，利己忘义，太不行也，当痛斥之。”

关于在交易所的经营情况，陈果夫后来回忆说：“从开始到交易失败为止，大约做了数万万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二十余万元。可惜到第三年，交易所风潮一起，所有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进去，好比一场春梦。到交易所将倒的时候，‘茂新’办理交割，把收入股票出售所得之款，与代商人买入股票应付出之款，两相抵过，尚须付交易所六十万左右。客人看见情势不稳，款亦不交来了。我们在事前略有所知，便做了种种准备，一面保护客人，尽量减少他们的损失，一面却须为自己的号子打算。我为计划调度，一连几晚没有安睡。毕竟客人的保护已尽力所及，而自身部分本钱的保持，也算顺利达到。这也不能不说是钱庄做了两年半伙计的好处。”他又说：“我们这样的尽了人事，到交易所倒账的时候，我们自问没有对不起别人的事，心里很安。”^①

风波之后

证券物品交易所发生买方违约事件后，处于停业状态。其间，从上海全球货币物券交易所借得20万元。3月18日，两所成立契约，营业合并，双方理事用合议制执行业务，资本共同运用，但两所仍各自单独存在，损益按资金比例分担。3月27日，重新开市。增加了几位“洋员”，意味着外国资本和外国势力的增加。^②但是，证券部的本所股，仍然停版。^③3月30日，虞洽卿、闻兰亭等宴请上海新闻界，感谢报刊在风波期间的善意支持，宣布与全球货币物券交易所共同营业的消息。^④4月1日，证

^① 陈果夫：《商业场中》，《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57-58页。

^②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部明日开市》，《申报》，1922年3月26日。

^③ 《各交易所之最近状况》，《申报》，1922年4月3日。

^④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宴报界》，《申报》，1922年3月31日。

券物品交易所全面开市。^①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全球”合作，周骏彦不放心，向蒋介石报告说：

信用已失，营业一时能否复元，尚未可知。且与全球合并，难保无存心破坏者起而攻击，后事真难逆料。惟近闻静公云：现有人集款组织公司，拟将交所股票准与押款。此公司如果实现，将来或有生机。总之，且此次损失最大者为套利者。^②

信中，周骏彦称，此次失利，系张静江决策错误：“彦屡闻静公言，套利甚稳，且云借款套利，亦属便宜。”它不仅打击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周骏彦在宁波开设的交易所也因之停业。可能蒋介石曾以蒋经国与蒋纬国的名义投资宁波交易所，因此周函称：“经、纬事，彦前谓无希望，亦以甬交做品不佳，难免发生危险。”函末，周骏彦称：

总之，吾辈非商人，经营新商业，究嫌其经验之少。然事已如此，后悔莫及。惟望后局诸公，煞费经营，或尚有转机，并望阁下尽心爱国，以国事为重，不必以此为念。

当时，蒋介石正在广西军中，周骏彦表示：“拟来桂愿随阁下之后，冀为国效劳。”他因套利欠债20万元，两次跳黄浦江自杀。^③

当年4月，蒋介石返乡。6月15日，陈炯明兵变，孙中山避居永丰舰，蒋介石闻讯，从上海赶到广东，与孙在舰上相见。据魏伯桢回忆，蒋行前，要虞洽卿资助，“开始时虞说蒋搞垮了交

① 《全球与上交合同成立》，《申报》，1922年3月20日。

② 《周枕琴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魏伯桢：《蒋介石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文史资料选集》第49辑，第153页。

易所，还要捣蛋，不能同意。最后谈判结果，虞答应可由交易所拿出六万元，但要蒋在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给钱。”^①同年8月，蒋随孙中山抵达上海，23日返乡。

陈炯明兵变后，许崇智率粤军转入福建。孙中山支持粤军，企图以武力推翻李厚基在福建的军阀统治，然后回师广东，讨伐陈炯明。为此，孙中山计划组织东路讨贼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为参谋长。9月18日，蒋介石于入闽之前致函张静江，叙述所欠债务。函云：

中秋节前，弟尚欠二千五百元之数，未知可为我代筹若干汇雨？在乡以去年用度太大，至今未了之事尚欠七千余元，在沪亏欠亦与此数相等，故今年以来不能稍资周转。舍儿经国在沪上学，竟于十五元衣服费亦被茂新拒绝不支，思之伤心。

函中所称“去年”，当指1921年。当年6月14日，蒋母病逝，医药丧葬，自然花费不小。交易所破产之后，蒋经国所需衣服费虽仅十五元，但茂新号竟然拒付，可见其极端困难的状况。同函中，蒋介石提出，请张从交易所卖方所赔“代用品”中借出若干，以便还清私债，安心赴闽。函云：“此次物品讼款，如能为弟借出若干，不致久苦涸辙，徒呼庚癸，俾得稍资活动，以了此私债，将来如能如数还清最好，否则以弟个人亏空名义报销，想孙先生与汝为亦必见谅邀准也。”这一时期，蒋介石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他向张静江倾诉说：

贫富生死，率有定数，得此不足为富，无此不足为贫，况预备死者未必死，但求生者未必生，亦不必竞于此金钱，以贻平生之羞也。惟债留后人，于心不安；教育无费，终难辞责。此所忝

^①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第155页。

在爱下，故敢不避公私，剖腹一谈。^①

写完此函，蒋介石又很后悔，日记云：“往沪为金钱所苦迫，贪私之言，非我所应出，不胜悔恨，故不愿往沪也。”^②不过张静江接到此函后，立即向孙中山汇报，孙即命陈果夫汇寄2500元给蒋介石。张在复函中表示：“代用品之事极易办，来沪接洽可也。”^③10月1日，蒋介石日记有与周骏彦“谈生意事”的记载，可能即与处理交易所善后事宜相关。^④12日，蒋介石决定抛开各种个人考虑，献身革命。日记云：“家何为乎？子何为乎？吾非尽吾力以铲除恶类，则誓不生还沪、甬也。”

蒋介石于10月22日启程赴闽，就第二军参谋长之职。其后，曾数度往返于福建、上海、奉化之间。1923年3月3日，陈果夫到宁波，与蒋商谈“交易所起诉事”^⑤7月17日，蒋介石到上海，即访问张静江，“谈交易所讼词”。^⑥此后，蒋介石日记中连续出现与叶琢堂、张静江谈交易所事务的记载。^⑦同月29日日记云：“交易所腐败，非出而整理不可，故不准其今日开第七次股东会，先令其清理前账。”这样，蒋介石就开始了和交易所董事之间的艰难谈判：

8月1日日记云：“晚，与友商议交易所事。能自立者，人能助之。势利逼人，可闷也。”

8月3日日记云：“下午琢堂、洽卿来谈交易所事，其言比算

①《致静公函》（手迹复印件），湖州张静江故居藏。此函仅署“制弟中正顿，廿八日。”据此可知，当时蒋介石尚在为母亲守制。又据函中所述“中秋节前”及“安心赴闽”等语，推断此函为1922年夏历七月廿八日（9月19日）之作。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2年9月26日。

③《张静江函》，《蒋介石年谱初稿》，第99页。

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2年10月1日。

⑤《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3月3日。

⑥《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7月17日。

⑦《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7月18、26、27日。

盘之加减还凶。余心滋难过。晚，尤生变故，市儉之可恶极矣。”

8月4日日记云：“琢堂、端如兄前后来谈，以交易所事未了，不克回甬。”

从上述日记可见，蒋介石与叶琢堂、虞洽卿讨论交易所事务，发生严重分歧，方案反复变卦，经反复磋商，直到8月5日下午五时以后，才得以最终定案，蒋介石日记云：“为交易所事未了，几不能安眠。天下事之难，莫难于共事人之不良也。”“心神之不快，乃甚于不了。以后莫管闲事，以免讨气。”同月16日，蒋介石受孙中山委派，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此后，蒋介石不再过问交易所事务。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以蒋介石为委员长。在上海的茂新、鼎新经纪人事务所相继歇业，同人纷纷南下，到黄埔军校找寻新的出路，只有陈果夫留在上海，清理遗留事项。1924年，由陈希曾出面，新创一家买卖棉纱号的经纪人事务所。1925年，陈希曾也南下黄埔，陈果夫只在春秋两季“各做一次生意”，用以“补助生活或应付特殊用途”。1930年，又做过两笔。^①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国民党的关系

如前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初办由孙中山倡议并领衔申请，那末，1920年的重办是否仍和孙中山有关，它和国民党人的革命事业有无联系呢？

陈果夫回忆说：“在民国九年的秋天，总理命令本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先生把这件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这问题。”^②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时，孙中山虽远在广州，但寄来贺词：“倡盛实业，兴吾中华。”^③1921年12月11

^① 《事在人为》，《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60-61页。

^② 陈果夫：《商业场中》，《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55页。

^③ 南伯庸：《上海大亨——虞洽卿》，海南出版社，1996，第248页。

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告以“孙先生之款已收到”。这里所说的“孙先生之款”，联系下文“孙先生待款甚急”等语，当系蒋介石通过陈果夫资助孙中山的款项。同函云：

叔款现在晋安者约五千四百余元，存侄处。金融公债二千，静江先生告我，孙先生待款甚急，侄乃以此款移交静公，并声明作为侄个人向晋安借款。静江先生亦说一月后归还。侄已向索回六百元，其余一千四百元待陆续归还后收入叔账。此事吾叔勿与静公说起，作为不知可也。^①

据此可知，陈果夫还将蒋介石存在晋安钱庄的金融公债2000元移交张静江，以此解决孙中山的急需。当时，孙中山正在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筹备北伐。张静江所称“孙先生待款甚急”，当指此事。

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和国民党人在经济上的联系，目前尚难一一厘清。周祖培称：“当时国民党基金完全由张掌管，国民党有很多散在各地未到粤随同孙中山担任工作和职位的人，经孙中山批准，可到张处支领津贴和活动费。为了避免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付账用种种暗号，如火柴代军火，一角代一百元等。”^②这说明，张静江经营交易所所得，有相当部分用于公。陈果夫也回忆说：“歇业之后，清算结果，有几笔作抚恤同志遗族的股本，都能提出，加倍送去。”^③这说明，交易所有些股本是预留作为革命事业之需的。国外有的学者认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为孙中山和革命筹集政治经费的巧妙渠道。^④此说虽尚待一

① 《陈果夫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张静江事迹片断》，《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79页。

③ 《事在人为》，《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59页。

④ 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233-234页。

步证明，但并非全无道理。至少，就孙中山倡办的初衷来说，确实如此。

这种情况，也表现在广东交易所方面。居正诗云：“吾党中心政策行，必从经济树先声，金融交易粗成就，百万输将始出兵。”^①1920年11月29日，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次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任命居正为总统府参议，兼理国民党本部事务。居正即利用外资，创办广东交易所及国民储蓄银行。曾拨借一百万元，用为出兵广西的军饷。同年6月10日，蒋介石日记云：“接静江函，知粤交易所只留二万股与吾辈，当全数放弃。本党作事如觉生者，诚令人灰心，决无良美结果也。即复静江书、觉生函。”这则日记所涉及的史实目前也还难以完全厘清，但广东交易所的股本既可以留出二万股给上海的张、蒋等人，则其间的关系可想而知。

陈果夫回忆说：“当时我们的招兵接洽机关，设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挂了陈希曾经纪人的牌子，表面是做生意，实在每天按时前去，暗中接见客人，秘密接洽招兵事情。”^②据此可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还是国民党人的一个特殊的联络站。

交易所生活对蒋介石的影响

蒋介石虽然出身盐商家庭，但是，父亲早故，家道中落，以后又留学日本，投身革命，可以说，是交易所的活动，才使蒋介石和商业、商人阶层发生关系。

1920年1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赴开元会议交易所选举董事。商人积弊，仍不能脱把持与专制，大股份压制小股份，大多数压迫小多数，舞私牟利，垄断其间。小商人中虽有达材正

^① 陈三井、居蜜编：《居正先生全集》（上），【台湾】中研院近史所，1998，第114页。

^② 《建军史之一页》，《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67页。

士，不能施展一筹，以致中国实业，日趋衰落，安得将此种奸商市侩一扫而空之，以发荣社会经济也。”^①根据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章程，可设名誉议董15名，由有商业、工业学识，或有丰富之经验者担任，和理事共同组成评议会。^②但实际上，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办时，只有名誉议董12人，为朱葆三、沈联芳、顾馨一、姚紫若、项惠卿、徐庆云、邵声涛、张纶卿、许松春、叶惠钧、贾玉山、宋德宜。^③蒋的这则日记可能反映的就是名誉董事的选举过程。从中可以看出，蒋对上海商帮中的把持、垄断、倾轧是极为不满的。

蒋介石对上海商人的不满和反感可以说贯彻他参与交易所活动的始终。如：

1921年6月12日日记云：“得焕廷、瑞霖各函，见沪上奸市友人之报，不胜愤恨。交易所各理事之营私舞弊，思之痛心，刺激感触，公私交迫，几欲隐避林泉，独善其身而不可得。恐病神经，万事当胸襟澹然，达观一切为要也。”

1922年11月28日日记云：“中国商人，见之头痛，商家利禄之心，狡猾之谋，过于官僚也。”

1923年2月3日日记云：“又因奸商妒忌，发怒激激，殊非其道。”

上引各日日记，表现出蒋介石对“奸商”们的强烈愤懑之情。

交易所的活动也使蒋介石了解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困境。前文已经提到，1920年6月，蒋介石刚刚决定拿出5000银元，

① 手稿本残损，此据《蒋介石日记类钞·杂俎》。

② 朱彤芳：《旧中国交易所介绍》，第159-160页。

③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申谢》，《申报》，1920年7月2日。

与陈果夫共同创办友爱公司，就赶上国际金融风潮，银价大落。《申报》探讨这一突变原因时曾称：“或谓系进口货多结汇水，或谓某国有意外金融风潮，或谓因西历六月底解款，或谓某国银矿有大批现银放出之故，总之大上大落，华商之对外营业，受其影响不鲜也。”^①这一事件激发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情绪。日记云：“银价大落三日，贱六片士。金融机关在外人之手，国人时遭损失，可叹也。”^②

经营交易所的失利增强了蒋介石的社会改造思想。1920年12月，他自觉“矜张自肆，暴躁不堪，对于社会厌恶更甚”。^③日记云：“我对中国社会，实厌恶已极，其将何以谋脱也？”^④他对邵元冲等宣称：“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⑤这一时期，正是他在交易场上一再亏本的时候。

当然，交易所的活动也增强了蒋介石和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联系。1924年，蒋介石要陈果夫在上海为黄埔军校采办制服、皮带、枪带、刀鞘等物，为上海海关扣留。叶琢堂、王一亭、沈田莘、虞洽卿等出面斡旋。^⑥1927年，北伐军进展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江浙金融资产阶级寄望于蒋，纷纷出资，支援他和左倾的武汉国民政府相抗，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原载台北《近代中国》第139期，2000年10月

① 《两日来金融之大变动》，《申报》，1920年6月10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年6月10日。

③ 《蒋介石日记类钞·杂俎》，1920年12月31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年12月11日。

⑤ 转引自《邵元冲致蒋介石函》，《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7页。

⑥ 《建军史之一页》，《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63页。

附记：孙中山也是股民

蒋介石《民国二十六年杂录》（手稿本）云：“当时总理与余及季陶、静江四人所有之优先股最高价时亦约值百余万元，其后皆为静江一人投机输完。总理与余并未有获得毫利，更于革命无关。当静江投机倒账时，余反由粤借汇廿万元补救静江也。惟总理赴粤之时，确由交易所董事公开贡给廿万元之数，以为发起提倡者之报酬而已。”据此，孙中山不仅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发起人，而且也是投资者，是股民，他和蒋介石等共拥有股值百余万元。《杂录》中所称“总理赴粤之时”，当指1920年11月。当月15日，孙中山应粤军许崇智要求，偕伍廷芳、唐绍仪等离开上海，前往广州，重组军政府，继续“护法”，并于次年发动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的战争。据《杂录》可知，孙中山离沪前，曾得到交易所董事20万元的资助。

二、北伐前后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苏联之行

——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纪实

关心俄国革命，早蓄游俄之愿

俄国十月革命引起世界列强的恐慌与敌视。美、英、法、日等国首先选定在俄国远东、西伯利亚等地区发动进攻。4月5日，日军在海参崴登陆。继之，谢苗诺夫、邓尼金等纷纷起兵，攻城掠地，成立政府。蒋介石很早就关心俄国革命。1918年7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

西伯利亚霍尔瓦斯政府与海参崴政府两相分离，皆为日本所利用，而置国家于不问，其不步中国之后尘者几稀矣！^①

从上引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指斥那些投靠日本的白卫军头目，认为他们将走上与中国军阀同样的卖国道路。1919年11月，蒋介石在游历日本期间，得悉反苏维埃力量所组织的“西伯利亚政府”被迫迁离鄂木斯克，攻击彼得格勒的白卫军也已被击退。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18年7月24日。

他高兴地在日记中记下这一消息，并且写了一句：“列宁〔列宁〕政府之地位，为此更加巩固矣！”^①随后他写了一篇题为《列国政府对付俄国劳农政府的手段如何》的稿子，投寄在上海出版的《星期评论》。这是一份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不过，蒋的这一尝试并不成功，文章未被刊出。11月15日，他从神户乘轮回国，在船上阅读《俄国革命记》，在日记中写下“想望靡已”4字。^②

蒋介石原来羡慕欧美，这一年夏天，还曾有过“筹措费用，游历欧美三年”以及“先赴法国，游历世界”的想法，不过，很快他就决定游历俄国，为此下工夫学习俄文。11月27日，蒋介石日记中开始出现“究俄文”三字。次日，出现“上午，往读俄文；下午，习俄文”的记载。当时，孙中山也已在观察和研究俄国的革命道路，决定派人赴俄留学，特别请了一位俄国教师在廖仲恺家里为革命党人上俄语课。蒋介石“往读”的地方应该就是廖宅。蒋介石学俄文坚持了好几年，一直到1923年底，他的日记不断有类似记载出现。其间，朱执信还为蒋介石讲过一次俄语。^③

1919年12月3日，蒋介石日记云：“复沧白信，研究俄国事情。”沧白，指杨庶堪，四川巴县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重庆起义的领导人。1918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省省长。蒋介石在与杨庶堪通信，“研究俄国事情”之后，1920年1月9日日记又云：“下午往□□生处议事，命我以代表名义赴□。”很可能这是孙中山派遣蒋介石访问俄国的最早记载，可惜由于日记字迹漫漶，不能确定。1920年3月14日，蒋介石萌生投身“世界革命”的想法，日记云：“革命当不分国界，世界各国如有一国革命能真正成功，则其余当可迎刃而解。故中国人不必要在中国革命，亦不必望中国革命先成功。只要此志不懈，则必有成功之一日，当先助其革命成功能最速之国而先革之也。”4天以后，戴季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19年11月5日。

② 手稿本残损，此据《蒋介石日记类抄·文革》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年2月14日：“下午，执信来教俄语。”

陶到蒋介石处，商议赴俄。蒋介石思考之后，觉得广东局面不佳，赴粤只能“为人作嫁”，“不如往俄，自练志识”。^①几天之后，这种想法更加炽烈，日记云：“近日看得国事皆非国内所可解决，极思离国他行。”^②5月26日晚，蒋介石邀约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到住处来一起商量，拟于1月内启程，蒋介石和戴季陶各出三千元作为旅费。不过，蒋介石不久即遵孙中山之命，赴福建漳州指挥作战。7月19日，蒋介石再生赴俄之想。同年9月，俄罗斯共产党阿穆尔省中国支部书记刘谦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建议联合中俄革命力量，在新疆集中兵力，打倒中国北方的反动政府。孙中山决定派大元帅府参军李章达使俄，蒋介石同行。22日，孙中山打电话给蒋介石，以俄国、四川、广东三地，让蒋介石选择；蒋觉得：去广东，“则公益大而个人损失不小”；去俄国，“同行者非知交，暂不能行”。^③蒋选择去四川，但最后听廖仲恺的话，去了广州。

1921年1月1日，蒋介石预定当年应做之事4项：其中第一项即是“学俄语，想到俄国去视察一回，实在做一些事业”。最后一项则是到北京去，“研究北京社会的内容，侦察北京附近的地形。还要借着议员的名义，结交几个新朋友，或者就在北京组织一个新学社，团结狠好同志，否则如有机会，即可以借议员的名义，到俄国去视察一回。”^④从上述日记可见，蒋介石梦绕魂牵的还是想去俄国考察。

1922年9月，苏俄代表越飞的军事随员格克尔将军到沪，与孙中山会谈。孙中山于8月30日致函蒋介石，要他从溪口赶来上海，参加会谈。9月10日，蒋介石到上海，但第二天就离沪还乡。12日，孙中山再次致函蒋介石，要他到上海住十天，详筹种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年3月18日、19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年4月26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年9月22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1年1月1日。

种。9月21日蒋介石的日记中出现下列8个字：“往俄无害，往赣有利。”不过，一直到10月3日，蒋介石才带着蒋纬国再次来沪，直奔孙府，“谈时局”。他是否与格克尔见过面，日记中没有留下任何讯息。

机会终于来了，出任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

1923年，机会终于来了。

孙中山一直在努力和苏俄联系，争取苏俄支持。1922年11月21日，孙中山致函蒋介石称，肯定他的访苏之愿。函称：“兄前有志于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①12月，孙中山写信给列宁，告诉他，“本人拟派遣全权代表于近期往莫斯科，与你和其他同志磋商合作事宜，以裨俄中两国的合法利益”。^②同月，孙中山写信给苏俄代表越飞，声称自己可以调动大约1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进攻路线。他询问越飞：“贵国政府能否通过库仑支援我？”^③同年年底，俄罗斯与乌克兰等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俄代表越飞在上海会谈。孙中山要求苏俄给予200万金卢布的援助，同时表示愿意派遣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5月1日，越飞自日本东京转给孙中山一封苏联政府的电报，同意提供200万金卢布，并且宣称，准备提供军事物资，帮助孙中山在中国北部和西部建立作战单位，开办军校。12日，孙中山复电越飞，感谢苏俄的慷慨援助，表示将派代表去莫斯科磋商。^④5月10日晚，孙中山设宴招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①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第616页。

② 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7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166页。

④ 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第174页。

蒋介石应邀作陪，“研究一切”。12日，蒋介石日记有“商议赴欧事宜”一语，可见，在孙中山的“联俄”计划里，蒋介石占有愈来愈重要的位置。不过，孙中山当时想亲自访问莫斯科。6月17日，孙中山任命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但蒋介石因对许崇智及西南各军不满，觉得广东事无可为，于7月12日，向孙中山辞职返沪。

7月13日，蒋介石在香港致函时任孙中山大本营秘书长的杨庶堪，自述性格特点，说明“如欲善用弟材，惟有使弟远离中国社会，在军事上独当一方，便宜行事，而无人干预其间，则或有一二成效可收”。函称：“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①

此后，蒋介石日记陆续出现下列记载：

7月23日：“接季新（汪精卫）转来（廖）仲恺电。”

7月24日：“复季新函。”

7月26日：“上午，往访季新、焕廷（林业明）兄，决定赴俄之议，于个人设想，则心甚安乐也。”

廖仲恺电今尚未见，显然，其内容应为通知蒋介石使俄一事。至7月26日，蒋介石和汪精卫以及国民党本部财务部长林业明商量之后，“赴俄之议”就定下来了。多年宿愿，即将实现，蒋介石非常高兴。这以后，进入筹备阶段。蒋介石忙着找人商量，物色成员，阅读资料，其日记载：

7月27日：“往访焕廷，致仲恺电。”

7月28日：“晚季新、溥泉（张继）诸兄来，商赴欧事。”

7月30日：“下午，剑侯（沈定一）、季新、仲辉（邵力

^①《与杨庶堪纵谈粤局与个人行止》，《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别录》，〔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第91页。

子)、焕廷诸同志来谈，共宴于小有天。”

7月31日：“上午与玄庐（沈定一）谈天，下午看《新疆游记》。”

8月5日：“晚，约会马林及各同志，商决赴俄事。”

马林是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1921年初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推动组织中国共产党，促进国共合作。蒋介石在和马林等商量之后，组织孙逸仙代表团一事最后定案。蒋介石任团长，成员为：

沈定一，浙江萧山人。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省议会议长。1920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党员，但不久即脱党。

张太雷，江苏常州人。代表团中的唯一中共党员。1921年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时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邵元冲，浙江绍兴人。中国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机要秘书。1919年留学美国，后受孙中山之命，考察国民党海外组织。

王登云，陕西醴泉人。美国留学生，曾任旧金山华文报纸主笔，代表团的英文秘书。瞿秋白视之为“无赖”。中共方面曾企图阻止王登云参加代表团，未能成功。

次日，蒋介石会见汪精卫。同日，瞿秋白、张太雷来访，“详谈一切”。下午，蒋介石赶制军服。三时后，乘船回乡。到溪口后，整书检衣，预备启程。蒋介石自称其心情悲喜参半。喜的是符合自己尽快脱离“中国污秽社会”、根本解决国事的心愿，“前程发轫有望”，悲的是“吾党在国内缺少人才，苦我党魁，且对儿女不免恋爱也。”^①

8月14日，蒋介石回到上海，会见林业明和王登云。其后，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8月6日、7日。

蒋介石忙着量衣、照相、看牙。15日一早，蒋介石写信向廖仲恺报告，又给交易所同事周骏彦、夫人毛氏的二兄毛懋卿等人写信，拜托各事。其后，又访问张太雷和瞿秋白。当晚，汪精卫设宴饯行。午夜，沈定一从绍兴匆匆赶来。

快要远行了，蒋介石面对经国、纬国两个儿子，自感时有依恋不舍之心，有时甚至背着人流泪，仿佛十二三岁离开母亲出外读书时一样。蒋介石对自己的这种心情也有点奇怪。

起行赴俄，心系纬国

8月16日是预定出发的日子，蒋介石6时起床，首先给许崇智、杨庶堪、胡汉民、廖仲恺及姚冶诚等人写信，然后外出拜会汪精卫、张静江、邵力子诸人。回时已是正午，经国、纬国及陈果夫、陈洁如都到蒋介石的住处大东旅社送行。1时15分，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一行四人登上日轮木神丸。邵元冲当时在欧洲，准备从那里直接赴俄。2时正，轮船启碇。纬国虽不是蒋介石亲生，但最受宠爱。蒋介石在船上听到小儿的声音，就以为纬国在喊父亲，梦中都会惊醒。18日，船抵青岛。入口时，雨雾连连，山色不青，但见港湾污秽，秩序紊乱，除少数苦力外，并不见有一警察及港吏，像似无人管理的自由港。1922年，王正廷代表北京政府与日本交涉，收回青岛，出任青岛商埠督办，被北京政府视为外交重大胜利。如今蒋介石看到其成绩不过如斯，徒负虚名，担心将来收回其他租界时发生困难，深觉可叹。

在船上，蒋介石除写信，想念纬国外，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抄录《蒙古地志》，为赴苏后的谈判作准备。19日，船抵大连。上岸后，发觉街道颇似日本的横滨。华人在大连约7万人，一切诉讼均听命日人，连会审公堂都没有。整个“关东州”，不能设立一所中国学校，不能派一中国官吏，连租界都比不上。蒋

介石觉得“言之可叹，思之伤心，莫甚于此”。^①当日10时，换乘火车。20日到长春。一路七百里，所见所闻，皆是日本势力，好像进入日本国境一样。21日到哈尔滨。24日，由哈尔滨搭车赴莫斯科。25日，到达中俄交界地满洲里。当地居民约有千家，华俄杂处，市况萧条。蒋介石等一行由俄方代表迎接，换乘汽车过境。所谓国界，不过是一条延长的土塄而已，双方皆无人监视，可以自由进出。45分钟后，到达孟邱夫斯克，重上火车。

8月26日，车抵赤塔。一路山明水秀，森林浓郁，蒋介石想不到西伯利亚居然有此佳景。27日，车抵上乌金斯克。蒋介石眺望风景，观察形势，觉得地形类似中国南方的山河。他南望蒙古，觉得从此离国日远，颇有“不胜依依”之感。27日，车过贝加尔湖，一望无际，风涛如海，被蒋介石视为“佳景”。29日之后，道路住宅，渐渐整齐，有点欧洲景色了。

曾经和孙中山共同发表宣言的苏俄代表越飞也在这列车上，由于病重，蒋介石等未能与之相叙。

抵达莫斯科，称苏联共产党是“姐妹党”

9月2日下午1时，蒋介石等一行经过长途旅行之后，抵达莫斯科车站，随即乘汽车前往招待所。当日，正值莫斯科召开群众大会，22万游行群众高举红旗前往会场，街道上到处挤满了人群。蒋介石从未见过如此盛大而沸腾的场面，心情也跟着高昂起来，视为生平一大快事。第二天，蒋介石等拜会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部部长，会谈一小时，商量会见苏联人民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日期。蒋介石对会谈和受到的接待很满意，日记云：“相见时颇诚恳，皆以同志资格谈话，尚未有失言过语之辞，私心亦安。”^②9月5日下午2时30分，蒋介石等会见契切林，谈话一时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8月19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9月3日。

半，由沈定一担任记录。蒋介石觉得契切林“语颇诚挚”，自己的谈话也很“适中”，“无失当之处”，彼此都觉得“甚为投机”^①。当天蒋介石就致电汪精卫和林业明，向孙中山报告。

9月7日，蒋介石等会见俄共（布）中央书记鲁祖塔克。

“我们是被派到莫斯科来的国民党代表，来这里的目的是要了解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听取对我们在中国南方的工作的一些建议，并互相通报情况。”蒋称。

“我受俄共（布）中央委托，欢迎代表团来访。国民党按其精神与俄共（布）非常接近。此外，还有另一些重要情况使中国的劳动群众同苏联接近。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俄国，两国人民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苏联的领土有几千俄里与中国的边界毗连，因此苏联人民同中国劳动人民发生联系是很自然的。遗憾的是，中苏两国劳动人民之间没有任何接触，这有碍于加强这种自然的联系。代表团的到来是向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鲁祖塔克回答。

鲁祖塔克的话使蒋介石听来倍感舒服，他以更为热情的话语回报鲁祖塔克：

“国民党一向认为，苏联共产党是自己的姐妹党。今天，代表团希望听到对俄国革命的一些最重要的阶段、对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的以及对共产党在革命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的简单介绍，因为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可能对国民党在中国的工作很有教益。”

鲁祖塔克乐于满足蒋介石的要求，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谈到了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发展工业和组建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蒋介石很重视，当日日记称：“其革命成功之点：一、工人知革命之必要；二、农人要求共产；三、准俄国一百五十民族自治，成联邦制。其革命缺点：一、工厂充公后无人管理；二、集中主义过甚，小工厂不应同样归国有；三、分配困难。”对鲁祖塔克所谈到的俄国当时建设情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9月5日。

形，蒋介石记录称：一、儿童教育周密；二、工人皆施军队教育；三、小工厂租给私人。除了在日记中记下的鲁祖塔克的言论大纲外，蒋介石还表示：“详言另录”，可见他对此次谈话的重视。

鲁祖塔克向蒋介石等介绍了俄国革命的成功之点与缺点外，提议国民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代表组成专门委员会，讨论一些细节问题，并且协调国民党同俄共（布）中央的行动。鲁祖塔克提议，为了双方的利益，最好有一名国民党代表常驻莫斯科。蒋介石对鲁祖塔克的“盛情的同志式接待”和所介绍的俄国情况表示感谢，声称不反对成立委员会和国民党代表常驻莫斯科。谈话至此结束。^①当天下午，蒋介石等拜会共产国际东方局局长吴廷康（维经斯基）。这是位“中国通”，1920年被派到中国，推动组织中国共产党，与李大钊、孙中山都有交往。

会见红军高级领导人，畅谈进军北京计划

9月9日，蒋介石等再次访问吴廷康。下午3时，访问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等。此前，孙中山任命的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一度占领湖南省会长沙，因此，斯克良斯基首先向代表团祝贺，说：“为国民党而高兴，因为我们将国民党视为战友。”在互相问候之后，蒋介石向斯克良斯基提出几项要求：

1. 俄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尽量向中国南方多派人，去按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
2. 向孙逸仙代表团提供了解红军的机会。
3. 共同讨论中国的军事作战计划。

斯克良斯基答复说：已经向中国南方派去了一些人，需要等

^① 以上对话，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282-283页。

一等，看南方军队怎样使用已经抵达的同志。俄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没有多少了解中国并且懂得汉语的干部，不可能向中国南方派出大量军事指挥员。他表示，因为大约有 30 名中国人在俄国东方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俄国为中国人成立专门的军事学校。经过交换意见，双方迅速达成协议：在俄国境内为中国人建立两所军事学校：一所高级学校，培养懂俄语的指挥员（不低于营级）30 人，校址设在彼得格勒或莫斯科；一所是中级军校，建在靠近中国的地方，海参崴，或伊尔库茨克，培养 500 人。关于代表团了解红军问题，斯克良斯基表示完全可以接受。

谈到军事作战计划，蒋介石声称：代表团拥有孙逸仙授予的全权。他介绍说：孙逸仙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工业，香港距离广州只有 40 里，英国人阻止向广州运输军事物资，因此，南方军队长期装备不足。而且，香港对孙逸仙军队的后方构成严重威胁，一旦南方军队向北挺进，英国人就会收买附近几个省的军队在后方暴动。此外，外国人在长江流域拥有大型内河舰队，南方军队一接近这个地区，英国和美国的炮舰就会立刻阻止。外国人绝对不会允许南方军队打败吴佩孚。因此，南方军队的总参谋部和国民党的代表团在动身来莫斯科前夕决定，将战场转移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这是孙中山派出代表团的目的是。

蒋介石接着向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介绍中国的军事形势以及孙中山和吴佩孚的力量对比。他建议：“在库仑以南邻近蒙中边境地区建立一支孙逸仙的新军。由招募来的居住在蒙古、满洲和中国交界地区的中国人，以及由满洲西部招募来的一部分中国人组成。在这里按照红军的模式组建军队。从这里，也就是从蒙古南部发起第二纵队的进攻。”^①

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听完蒋介石的说明，建议蒋介石用书面

^①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 287 页。

形式阐明这项计划。这次会谈进行到当晚七时，持续三个多小时。蒋介石觉得斯克良斯基“和蔼可亲”，参谋长克姆热夫也热心帮助中国。他在日记中写道：“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比我国人民诚实恳切，令人欣慕，此点各国所不及也，其立国基础亦本于此乎！”^①

从9月10日起，蒋介石开始在招待所起草“作战计划”。11日下午，蒋介石和苏联军事学校管理总部主任彼得罗夫斯基叙谈一小时，彼得答应向代表团提供各种学校教材，同时向代表团详细介绍俄国军队中政治委员制度和共产党组织状况：每个团部都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员常驻，参与团中主要任务；凡有命令，均须经其签署才能有效；团里的共产党员，不论士兵或将校，在团的活动中担当主干，凡有困难勤务，皆由其党组织负责人担任。12日上午，蒋介石写完“作战计划”，加进可能是由沈定一起草的“宣传计划”，总名为《中国革命的新前景》。13日，开始起草《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14日写成。

《中国革命的新前景》与《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

《中国革命的新前景》与《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是蒋介石亲自起草的两份文件。

《中国革命的新前景》共18个部分。在《绪论》部分，蒋介石表示：“中国人民不但饱尝中国国内军阀暴政的痛苦，并且还备受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已经下决心要使中国完全彻底革命化，并且实行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1. 各民族独立自由；2. 人民自由行使各项政治权利；3. 大工业国有化。接着，蒋介石开宗明义地提出：

从军事观点看，我们暂时还不能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内，在中国东南地区奠定永久的基础，所以，我们希望在靠近俄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9月9日。

国友邦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找一个适当地方，作为我们实行革命计划，与中国军阀和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战斗的军事基地。^①

还在1921年1月，蒋介石就曾上书孙中山等人，建议“当以西北为第一根据地”。^②至《中国革命的新前景》，蒋就作了更充分、明确的阐述。《绪论》以下为《中国目前形势》、《敌人》、《军事行动目标》等部分，蒋介石称：“中国的军阀和由他们组成的北京政府已经向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彻底投降。”“他们正在进行同国民党截然相反的活动，因为后者不让他们毁灭中国，正在全力以赴进行公开的秘密反对他们的斗争。”“中国的内战看起来是内部事务，实际上是国民党和外国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蒋介石接着说明国民党和中国军阀之间的实力对比，提出国民党的敌人是直系军阀，其主义是“做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赤裸裸的傀儡”，其领袖是曹锟和吴佩孚。蒋称：当时有包括奉系和“安福系”在内的十多省正在计划反对曹、吴，学生和工人的运动，平汉铁路工人的罢工，已经戳穿吴佩孚的爱国主义口号，中国人民都非常支持孙博士关于成立“工人队”的意见。国民党的最后目标是北京。

第五部分为《两个拟议中的军事基地》。第一个在蒙古库仑，第二个在新疆的乌鲁木齐。蒋介石从军事根据地和军事目标之间的距离、地理位置、行军时间、国际关系、战略等方面将两者作了详细比较，认为库仑比乌鲁木齐具有“更多的优越性”。蒋介石建议，在库仑，从平汉铁路招募工人和从灾区招募农民，以年轻、有觉悟的中国人做军官，用红军的名义进行训练，两年以后开始进攻。但是，蒋介石又建议，用乌鲁木齐作永久根据地，同

^① *New Prospec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原存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第54页。

俄国合作，帮助东方其他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他说：“我主张在这两个地区同时建立军队，在库仑建立主力部队，在乌鲁木齐建立增援团队。”

第六部分为《中国的自然特点和它的交通情况》。以下依次为《敌人的兵力》、《敌人如何部署部队》、《敌人内部情况》、《国民党的兵力》、《国民党军队情况》、《国民党和它的敌人的军事供应及其财政状况》、《用库仑做根据地和以北京为目标的军事准备时间》、《进军的西翼》、《军事行动阶段》、《拟议中的军事编制和兵力》、《军事预算》、《各种筹备组织工作》。

军事计划之外，可能由沈定一起草的“宣传计划”全名《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方案》，共10条。提出建立上海大学，在上海建立大型出版社、更多的通讯社，扩大上海《民国日报》，在广州和北京创办两种大型报纸，出版一种月刊和一种周刊，成立一个委员会，出版各种不定期的小册子等。最后提出，《方案》将在联席会议上讨论。

在《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中，蒋介石对比中俄两国革命，一个“将陷于绝境”，一个“收效之速，一日千里”，自感有愧于心。《意见书》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其原因在于党魁“注全力于外交与政党”，未能直接掌握军事。蒋称：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在于革命军占领彼得格勒这一政治中心，并且固守不失。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在于未能“直捣北京”，反将全国的政治中心袖手让予袁世凯，以致中外结合，使北京成为恶势力中心，根深蒂固。蒋表示：“为今之计，中国革命之法，唯有军事与宣传双方工作，同时并进。以实力为铲除现在恶势力之张本，而以宣传事业作主义上之根本培养。”蒋介石批评南方的“革命军队”已经没有革命精神，只在“借革命名义以谋其私人之权利”。他提出：“中国恶势力之根据地，反革命派之大本营以及其一切内乱与外侮之策源地，皆在其政治中心地之北京。如望中国革命之奏效，非先打破此万恶政治中心地之北京，则革命

绝无成功之望。”蒋介石并且认为，要“对列强作战，打破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亦非打破北京不为功”。^①

《意见书》中，蒋介石还声称，无论内乱与外侮之压力如何强暴，中国革命党决不当调和派，也决不代表资本阶级，革命精神始终如一，只要变更方法，改善环境，三年之内，必有成效可睹。

蒋介石将这两份文件起草完成后，略感轻松。不过，他没有就此定稿，一直在修改中。

根据鲁祖达克的建议，沈定一于9月15日起草“两党联结文稿”，并且拟于下星期二成立有国民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16日，沈定一完成“草约”，蒋介石又忙着和沈一起研究“条文”。^②

被热情的红军士兵抬了起来，批评外交人员“下流无赖”

9月16日，俄国陆军学校学生举行毕业典礼，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及红军各领导人都出席并发表演说。下午，蒋介石等应邀参加，受到与其他各国出席人员不同的特别招待，使蒋介石等颇感自豪。17日，参观步兵第144团。事先，军事院校管理总局秘书卢果夫斯基向莫斯科军区司令穆拉托夫等人打好招呼，指示说：有中国共青团团员来访，举行欢迎仪式，访问尽量秘密进行。蒋介石本来是准备穿上全套军服的，结果，接受俄国人建议，改穿便服。当时，这个团刚刚演习归来，营房还在修缮，生活尚未进入正轨。蒋介石等参观了连队、营房、红角、号令、修理部、医务室、俱乐部、图书室、机枪小队、厨房、面包房、俄共支部，而且品尝了红军战士的食品，了解了每周的食谱。不过俄国人对蒋介石等还是有点警惕，没有让他们参观武器库。卢果

^① 《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筹笔》（一），00001，《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9月16日。

夫斯基在向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书面汇报时，特别声明：“我也没有介绍特别秘密的资料”。^①

在有 400 名红军士兵出席的大会上，蒋介石发表演说，首先称赞“红军是世界上的一支最勇敢、最强大的军队”，他接着说：

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们！你们战胜了你们国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但你们还没有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你们要准备同他们决战，因为你们要在其他民族的帮助下完成这一事业。请记住，每一个战士的义务就是牺牲。要时刻准备为你们的事业去牺牲，这就是胜利的保证。

我们是革命者，是革命的国民党党员，我们是军人，我们是战士，我们也准备在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牺牲。

蒋介石表示：“我们来这里学习并与你们联合起来。当我们回到中国人民那里时，要激发他们的战斗力，战胜中国北方的军事势力。”^②

蒋介石的讲话不时被经久不息的掌声和高昂的《国际歌》乐声打断。讲话结束时，与会者高喊“乌拉”。蒋介石情绪激动。据俄国人记述：“看来，他讲话时充满着强烈而诚挚的感情。他在结束讲话时几乎是在吼，他的双手在颤抖。”离开军营时，蒋介石等被红军战士抬起来，轻轻摇摆，一直抬到汽车前。上车后，蒋介石等仍然非常激动，不断赞美红军战士的“精神”和“热情”，认为这是他们在其他任何一支军队中都没有见过的。蒋告诉全程陪同的卢果夫斯基说：“印象非常好。他为红军的‘精神’所感动。他们所有人——指挥员和战士——并不是首长与部下，而像是农民兄弟。”^③

①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 291 页。

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 292 页。

③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 292-293 页。

蒋介石在参观红军第144团的表现并不是故意造作。当日，他在日记中有同样的记载：“其军纪及整理虽不及日本昔日军队，然其上下亲爱，出于自然，毫无专制气象。”对于红军中的“双首长制”，即司令员之外，还有一位党代表，蒋介石也感觉不错，认为两者之间分工恰当，“亦无权限之见”。“大约军事指挥上事务皆归团长，而政治及智识上事皆归政党代表，尤其是精神讲话及平时除军事外之事务，皆归代表也。”^①

9月19日，蒋介石等参观步兵第二学校。20日，参观研究毒气的军用化学学校。22日，参观高级射击学校，看到了15世纪以来的各种枪支，共约数百种，其中俄造骑兵用机关手枪，可连发35响，轻便非常，给了蒋介石很深印象。他在日记中慨叹道：“俄国武器之研究及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等，不比我国之腐败也。”

初到莫斯科，受到热情接待，蒋介石的印象是好的，只是觉得物价高。9月8日晚，蒋介石等往前皇家剧院观剧，听说正厅票价每人约需五个金卢布，感到莫斯科生活程度不低！14日，蒋介石外出买鞋，定价九十金卢布，蒋介石惊诧地叫起来：“太贵了！”不过，蒋介石对这些均觉得无所谓，并不十分在意。使他在意的是苏联政府工作人员的态度。

9月23日，代表团中唯一的共产党员张太雷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发生争论，蒋介石为张太雷帮腔。事后闷闷不乐，认为“其部员之下流无赖，实使人讨厌”。^②24日，蒋介石仍不能释怀，日记云：“为外交部员无礼怠慢，使人嫌恶，几欲回国。余之性质，实太狭褊，不能放宽，奈何！”蒋介石早年性格的特点是任性。前些年在孙中山、陈炯明手下工作的时候，常常因与人不合，立刻甩手走人，辞职不干。这次虽因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不敬，萌生回国念头，但是，这毕竟是在外交场合，他还是忍住了。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9月17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9月23日。

参观彼得格勒等地，为市况萧条及海军士气担忧

9月25日晚9时，蒋介石等一行乘火车前往彼得格勒等地参观。

9月26日下午，参观冬宫。先参观博物馆，收藏以瓷器、图画为多，宫殿的墙壁、柱子，均用红、白、绿三种大理石为原料。其后参观冬宫的觐见厅、寝室、书房、餐厅、浴室、会议厅、礼堂等处，或称为金间，或称为银间，或称为翡翠间，给蒋介石的印象是“铺陈华丽”。不过，其中最吸引蒋介石的却是展出的俄国革命党历史，特别是革命前的艰苦斗争与巨大牺牲。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惟其中新设一层，皆述革命党经过历史之惨状，殊令人兴感也。”

9月27日，参观海军大学及海军学校。

9月28日，参观海军博物馆。该馆陈列彼得大帝以来俄国海军的发展史，包括人员及舰船模型等。俄国海军的发展迅速，使蒋介石颇感“惊骇”。同日，乘船游览涅瓦河，一直到海口为止，使蒋介石等充分领略了彼得格勒形势的宏壮。三时后参观制造潜艇的工厂。第二天，再由彼得格勒乘船，参观喀琅施塔得军港，登上“摩拉塔”战舰及第二号潜水艇。9月30日，参观大剧院和“伊晒克”教堂。蒋介石一直登上教堂的最上一层，彼得格勒四郊百余里之内的风景，一一收入眼底。对这一教堂建筑的宏大壮丽，蒋介石叹为“实所罕睹”。

10月1日，参观前皇村，这是历代沙皇居住的宫殿，蒋介石日记称：“其建筑之宏大，装饰之华丽，诚所谓穷奢极欲。大理石与翡翠之柱壁、地板，不足奇也。”对沙皇尼古拉西的宫殿，则认为远远超过法国的凡尔赛宫，“世无其比”。归途中顺道访问一户人家，受到亲切接待。一位既漂亮又热情的俄罗斯女郎一会儿翩翩起舞，一会儿挥指弹琴，使得一向贪恋女色的蒋介石叹

为“诚尤物也”。^①

从9月26日到10月1日，蒋介石等在彼得格勒参观、访问共6天。当时，俄国经济还处于困难时期，喀琅施塔得军港两年前还发生过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暴动。蒋介石的总印象是：“市况凋零，民气垂丧，皆不如莫斯科之盛，而其海军人员之气象，更不良佳，殊堪为苏俄忧也。”^②

再回莫斯科，向托洛茨基等呈递《备忘录》

10月2日上午十一时，蒋介石等回到莫斯科，又因为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弄鬼”生气，蒋介石觉得自己意志不坚。日记云：“宽容大度，包罗万象，方能成伟大事业。器小如此，奈何！”

还在彼得格勒访问期间，蒋介石就在起草一份信稿。9月27日日日记云：“早起，致函稿成。”28日日日记云：“早起修正函稿。”30日日日记云：“上午，缮正函稿。”回到莫斯科的当晚，蒋介石将函稿誊录一遍，大功告成。10月3日，代表团内部为函稿及《中国革命的新前景》发生争论，只是“稍有龃龉”，情况并不严重，但蒋介石却很不高兴，日记云：“交友实难，吾自不慎，有何言也。”10月5日，蒋介石修改《中国革命的新前景》，定名为《孙逸仙代表团关于越飞5月1日东京电中所提建议之备忘录》。一直到晚上十点才睡。日记云：“同伴参差，萧然寡欣。交友之难，可叹！”10月6日，蒋介石检点《函稿》及《备忘录》，一份送交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一份送交革命军事委员会托洛茨基、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函稿》目前只有英文打字稿留存下来，现翻译如下：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0月1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0月2日。

亲爱的同志：

我们受孙逸仙博士委派，为建立中国国民革命的主要军事力量，前来讨论在中国的西北边境建立革命的军事组织的计划细目。5月1日，苏维埃政府通过越飞发自东京的电报，答应给我们的领导者以相关援助，对此，我们首先要充分表达感激之情。5月12日，孙博士复电，接受俄国人的建议并陈述说，他将为此投入很大的精力。该电已自广州电达越飞和达夫谦。有信通知我们，孙博士的回答已经电告莫斯科。

我们受我们党的领导人的委托，前来和你们讨论建议的军事部分。但是，我们也将利用这一机会，讨论建立政治思想战线的方案，作为成功地执行我们计划的基础。俄国同志在此领域有伟大的经验，因此，我们期待关于我党宣传工作的讨论将给予我们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这些，我们在不远的将来会需要。

在所附《备忘录》中，我们已经陈述了这一计划的两个方面，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是我们的特别任务，以达到一项军事组织的明确决定。它将不仅是中国革命成功的绝对需要，而且会在太平洋地区的斗争中有伟大的实际作用。在这一斗争中，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军队将抵抗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这一力量，企图将中国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并且成为苏俄的真正危险。^①

函末，蒋介石表示希望尽早与苏方会见，讨论《备忘录》，以便尽快执行计划。可以看出，这封信和前述蒋介石写就的《致苏俄负责人员意见书》已经大不相同了。

《备忘录》分《绪论》、《军事计划》、《宣传》、《结论》四大部分，共8200余字。^②

^① To Comrade Trotsky, Skliansky & Kameneff.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Memorandum of the Delegation of Dr Sun Yat Sen with Relation to the Proposal Mentioned in the Telegram of A.A. Joffe Sent from Tokyo May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从笔者见到的部分英文打字稿看，它在篇章结构上作了较大调整，但和《中国革命的新前景》并无很大不同。

好坏印象夹杂的苏俄观感

蒋介石递上《备忘录》后，主要任务完成，就等着俄国人回答，因此日子过得并不紧张。俄国人乘机安排蒋介石等人看戏、看芭蕾舞，参观莫斯科的工厂、农村和克里姆林宫等处。

10月8日晚，往莫斯科大剧院观剧。“此剧系俄国各民族各种演剧模型”，大概是一场综合性晚会，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卡斯基亲自登台演出。蒋介石日记称：“台上印刷机器随时印布宣传品，实乃共产主义国之特色也。”^①

10月25日下午，参观莫斯科的灯泡制造厂及发电厂，考察厂中的工人俱乐部、教室、音乐补习室、贩卖合作社、图书室、阅报室、膳厅、剧场等地，感到“应有尽有”。对工厂为工人配备“专科教师”，以备工人业余学习，以及职工会与共青团，蒋介石都表示满意。对工厂举办的展览会，展示厂史及工人状态，列表说明厂中资本盈亏，供工人观览，注重社会科学等做法，蒋介石也都赞成。

10月28日，看芭蕾舞。演员们的精湛舞姿看得蒋介石等人目瞪口呆，叹为观止。蒋介石日记称：“演剧妇女之活泼动作，无异机械，吾国优伶万不及也。”

10月30日，参观莫斯科西郊的农村。先进入村苏维埃，蒋介石觉得类似奉化乡间的自治会，但制度不同。继而参观消费合作社、小学校。小学展览的是学生自制的工具和自绘图画，蒋介石感觉较中国教育为新颖。最后参观乡苏维埃。蒋介石觉得规模较大，司法、行政、立法三权皆由出于此，乡村警察亦出于此。

11月1日，参观克里姆林宫，正值卫生人民委员报告，蒋介石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0月8日。

石坐在台下听了约一小时。克里姆林宫留给蒋介石的印象是建筑宏大，但装潢则比不上彼得格勒的冬宫等处。

11月5日，参观俄国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故居。

11月6日晚，到莫斯科市苏维埃，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听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以及当年起义水手、海军士兵等演说。

11月7日为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六周年纪念日。上午9时，蒋介石等到红场参观阅兵式及群众游行。自11时起至下午6时止，游行尚未完毕。参加者有军队2万，飞机16架，炮车8门，机关枪车1队。炮车和机关枪车，蒋介石都未见过，充分感到俄国军械的先进和军容的威严。典礼让蒋介石看到了俄罗斯人民对政府的拥护，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观今日之运动，足知苏维埃政府对于人民已有基础，殊足以破帝国主义之胆。吾于苏俄无所间言。”但是，蒋介石仍然觉得，俄国“中級以下人材缺乏，办事时间延迟不准，缓慢非常，而其高级人员处事或尚感情，是其短处。至于其有否自满之志，则吾尚未敢断言也。”

11月15日下午，参观博物馆。

闲暇时，蒋介石自己参观市场，或者独自沿着美丽的莫斯科河散步。有一次，蒋介石一个人搭船，顺流到莫斯科西南的“不寂之园”去观光。那里是莫斯科的最高处，风景优美，蒋介石感到有些像东京的上野公园，但比上野还要美。公园的最西边是府雀山，相传拿破仑到莫斯科后，曾先登此山。蒋介石徘徊于山径和森林之间，眺望全城，自觉精神爽快，称誉此地为“莫斯科第一胜景”。此后，蒋介石又去过三次。

11月16日，拜访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加里宁给蒋的感觉是“完全一农民”，“言语诚实，行动自在”。蒋介石和他谈起国外大势，不知所答。蒋介石暗自将加里宁和曾任中国总统的黎元洪比较，觉得黎“狡猾懦弱”，因此转而赞美加里宁，

“诚不愧为劳农专政国之议长也”。^①

11月19日晚，参观莫斯科市苏维埃大会。内容为报告一年来的工作成绩：工业已恢复至战前的60%；工资比去年增加一倍；新增工人宿舍可容一万余人；3万失业工人，政府每月津贴每人8元。蒋介石日记称：“是其重要报告也。”

11月21日蒋介石访问越飞。下午，访问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卡夫斯基。卢称：苏联的教育方针：1. 废除宗教；2. 男女同校；3. 接近实际生涯；4. 学生管理校务；5. 统一教育制度；6. 注重劳工学校；7. 专门学。卢并称：中央与地方合计，现在常年教育经费约占国家总预算的14%，共为1亿4千万元。蒋介石对卢的谈话很重视，将其所谈比较详细地记在日记里，但他还觉得教育预算偏低，“尚不足其预算三分之一也”。

从俄国人那里，蒋介石得知各地都有共青团组织，蒋介石称之为“少年共产党支部”。对“少年共产党支部”注重培植青年，蒋介石赞美其为“第一优良政策”。^②蒋介石也了解到，当时的苏维埃政府，看不起知识分子和商人，“优待农工而轻士商”，这本来是一项“左倾”政策，但蒋介石也赞成，在日记中表示：“吾亦无间言也。”^③

俄国人拒绝国民党在库仑建立 军事基地的要求，蒋介石大失所望

俄国人长期将蒙古视为其势力范围。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沙俄乘机派兵进入蒙古，导演“独立”。1921年，红军为追剿沙俄白卫军，进占库仑，此后即长期不肯撤兵。蒋介石要求在库仑建立军事基地，自然不能为俄国人所接受。10月18日契切林约蒋介石往见，但临时有病，未见。10月21日下午，蒋介石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16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4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4日。

石拜会契切林，集中谈“蒙古自治问题及根本计划”。契切林没有正面回答可否，只笼统地强调“蒙古人怕中国人”，要蒋介石与苏共领导人商谈。26日，蒋介石致函契切林，反驳说：

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蒙古人惟其有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这种动作，在国民党正想把他能够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间亲密协作底目的。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须知国民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是说各个民族分立，乃是主张在民族精神上做到相互间亲爱的协作。所以西北问题正是包括国民党要做工作的真意，使他们实际解除历史上所遗传笼统的怕。^①

访苏前，蒋介石没有料到事情会如此不顺利。发出致契切林函后，蒋介石一整天都心神不佳，闷闷不乐，日记云：“可谓缺少经验，自讨其苦也。”^②25日，蒋介石致斯克良斯基一函。28日，再各致契切林和斯克良斯基一函。这时候，蒋介石已经对他所受到的接待和苏方的拖延不复表示不耐。11月1日，契切林写信向季诺维也夫报告，说明蒋介石“已经神经过敏到极点，他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看在眼里。”^③

苏联方面对国民党的要求迟迟不复，固然由于蒙古问题，同时也由于苏联正热衷于在德国、保加利亚、波兰等地发动革命，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11月2日，托洛茨基致函契切林与斯大林，要求“极其果断地和坚决地”向国民党代表团“灌输”：“他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准备时期”，“军事计划以及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计划，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和中国完成某些政治准备

①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37-138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0月26日。

③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08页。

工作之后。”^①11月11日，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再次与蒋介石等人会谈。

当日上午，蒋介石检出《意见书》，仔细审查，精心作好谈话准备。下午见面时，斯克良斯基开门见山，表示不赞成国民党代表团的计划：

“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做好政治工作，因为不然的话，在现有条件下的一切军事行动都将注定要失败。”他以“十月革命”为例，说明那是“俄国共产党长期坚持不懈的工作”的结果。他要求国民党在中国也做同样的工作，首先全力搞宣传，办报纸、杂志，搞选举运动，等等。

“孙逸仙同越飞会谈以后，国民党加强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但党认为同时也有必要开展军事活动。”蒋介石还想尽力一搏，针锋相对地与斯克良斯基辩论。他接着说明：“在俄国，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而在中国，地球上的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都反对中国的革命者，所以，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是必要的。”^②

斯克良斯基寸步不让，要国民党“首先应该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用在工农的工作上”。他说：“有必要在近几年只做政治工作，军事行动的时机只有当内部条件很有利时才可能出现。”他尖锐地批评蒋介石提出的军事计划：“发起你们方案中所说的军事行动，就是事先注定要失败的风险。”为了不让蒋介石完全失望，斯克良斯基提出，可以允许“中国同志”到苏联军事学校学习。参谋部学院可以接受3-7人，军事学校可以接受30-50人。至此，会谈已经进行了两个小时，蒋介石等无话可说了，表示将于11月22日回国，希望再一次会见斯、加二人，并且请他们转交一封信给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③

①《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09页。

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11页。原件为俄文，本文引用时对中译文的口气略有变动。

③《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10-312页。

在归途中，张太雷向陪同的俄国人表示：“在学习了苏联的经验之后，本代表团应该同意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意见。”据这名俄国人事后的汇报，会谈前，蒋介石由于神经紧张，过度劳累，一再要求送他去疗养院休养两周，而在与斯克良斯基会谈之后却表示：不要张罗疗养院和医生，自己感觉好多了。这名俄国人由此作出结论说：“中国人对同斯克良斯基同志的会见是满意的。”^①

事实是，俄国人拒绝了蒋介石的库仑军事计划，蒋介石的内心极为愤懑、失望。当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翫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②

11月12日，蒋介石给汪精卫发了电报，又给契切林写了封信。整天“心绪沉闷”。他想起了当时国内的情况，更加抑郁，日记云：世人虚伪，本党同志，优秀者或死节，或远离，现在所见者，只有“趋炎附势，争权夺利，吹牛拍马，以公济私，卑陋恶劣，互相利用挑拨之徒”，其他人则“贪似狼，猛似狗，蠢似豕”。想到这里，蒋介石在句末重重地写下了“可叹”二字。

蒋介石又给斯克良斯基和契切林各写了一封信。

批评苏俄政府“无信”，察觉斯大林等人“排斥异己”

蒋介石在俄国时间久了，对俄国社会了解渐多。11月24日日记云：“俄国中级人才太少，政府往往为其下所蒙蔽，而其轻信、迟缓、自满，为其切要弊端，遇大事不能深重观察，专尚客

^①《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12-313页。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11日。

气。人而无信，尚不能立，况其国乎！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亦其国之一大弊也。吾为之危。”这一段日记前半段批评苏俄政府“无信”，后半段，批评“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

1919年7月，苏俄政府曾由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宣称：“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的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①1920年9月，加拉罕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声称：“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②当时，蒙古问题是中苏之间的重大纠纷。1923年1月，越飞与孙中山会谈时，曾向孙表示，俄国现政府从来不想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也绝无使其脱离中国的目的。^③1923年9月16日，加拉罕到北京谈判，专门向报界声明：蒙古应为中国之一部，俄国决无若何侵并计划。^④现在，苏方坚决拒绝蒋介石在库仑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自然要被蒋视为“无信”。

俄国共产党从1921年起进行“清党”，至1922年3月召开联共（布）第11次代表大会前，已经开除了17万党员，占全体党员的25%左右。第11次党代表大会上，由于列宁已经病重，出生于格鲁吉亚的斯大林当选为总书记，并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陆续形成“三驾马车”以至“七人小组”，垄断苏联党和国家大权，将托洛茨基排除在外。1923年4月，联共（布）召开第12次代表大会，“清党”仍在进行。同时，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也渐次进入火热状态，开始批判托洛茨基本人和他的

^①《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15-16页。

^②《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第18页。

^③《孙越宣言全文与国共联合》，《外交月报》第2卷第1期。

^④《时报》，1923年9月19日。

拥护者拉狄克和克拉辛等。这些，不能不给蒋介石留下印象。11月24日日记所称“排斥异己”，显指斯大林等人。蒋介石认为这是苏联的“大弊”，并且声称“吾为之危”。

蒋介石晚年回忆说：“在苏俄党政各方负责诸人之中，其对我国父表示敬重及对中国国民革命表示诚意合作的，除加密热夫、齐采林是俄罗斯人之外，大抵是犹太人为多，他们都是在帝俄时代亡命欧洲，至1917年革命才回俄国的。这一点引起了我特别注意。我以为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拉迪克与越飞等，比较关切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的合作。可是越飞自中国回俄之后，已经失意了。我并且注意到当时列宁卧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党内，以托洛斯基为首要的国际派与史达林所领导的国内组织派，暗斗如此激烈，我就非常忧虑他们这样斗争，必于列宁逝世之后，对于中俄合作的关系，更将发生严重的影响。”^①蒋介石的这一段回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11月24日的日记。

认真攻读马克思著作，但崇拜孙中山，婉拒加入中共

在苏联期间，蒋介石有较多空闲。除了学俄语，读吴承恩的《西游记》，学习拉手风琴，弹琵琶外，不少时间都用在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上。其日记载：

9月21日下午，看《马克思学说》。

9月22日下午，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9月24日，看《马克思学说概要》。日记云：“颇觉有趣。上半部看不懂，厌弃欲绝者再。看至下半部，则倦不掩卷，拟重看一遍也。”

9月25日下午，看《经济学》。

10月3日晚，看《共产党宣言》。

^①《苏俄在中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29-30页。

10月4日，上午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下午看《概要》。

10月7日，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10月9日下午，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10月10日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之《经济主义》。日记云：“复习第三遍完，尚不能十分了解，甚叹马克思学说之深奥也。”

10月16日，看《共产党宣言》。

10月17日，看《共产党宣言》。

10月18日，上午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悬卷”。

10月20日下午，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11月1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从上述日记可见，蒋介石这一时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仅很积极，很认真，一遍、两遍、三遍地读，有时还读得很有兴趣，乐不释手。但是，蒋介石仍然高度崇拜孙中山。

当蒋介石访问苏联之际，苏联政府也正派其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来华和北京政府谈判。9月8日，加拉罕致电孙中山，称孙为“新俄国的老朋友”，表示希望得到孙的帮助。^①9月16日孙中山复电加拉罕，其中谈到：“中俄两国之真实利益使双方采取一种共同政策，俾吾人得与列强平等相处，及脱离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压迫。”^②10月9日，蒋介石从苏联报纸上读到孙中山这一电报，高兴地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俄报登载中师复喀拉汉宣言，甚为得体，且有反对帝国资本主义之决心，不胜欣喜。”

10月10日是当时中国的国庆节。从下午起，蒋介石就在预备演讲，题目是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当天晚上，在莫斯科的全体

^①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2003，第1687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第216页。

中国学生到蒋介石寓所，共同庆祝“双十节”。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苏联共产党都派代表前来祝贺。蒋介石讲了大概一个半小时，自觉“颇有条理”。接着是演剧、献技，奏《国际歌》，一直到夜12时方散。

大概蒋介石在演说中比较突出地宣扬了孙中山的功绩，第二天，蒋介石就听到批评：“有崇拜个人之弊”。当时在俄国的中国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在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上，在孙中山的个人作用上有某些新看法，本是很自然的事，但蒋介石却不能理解，他联想到中国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内的情况，更增添一层忧虑。日记称：“甚笑中国人自大之心及其愿为外人支配而不愿尊重国内英雄，此青年之所以能言难行而无一结果也。党人好尚意气，重妒嫉，而俄党下级人员较吾中国更甚，此实为俄党虑也。”^①

10月13日，蒋介石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在那里读到孙中山致列宁、托洛茨基和契切林的三封信，其中称蒋介石为“我的参谋长和密使”，声称“蒋将军要和贵国政府及军事专家一起提出一项由我的军队在北京西北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建议。兹授权蒋将军代表我全权行事。”^②蒋介石感受到孙中山的“至诚”，心头一热，不觉泪下。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奋斗多年，尚未成功，蒋介石颇为孙中山不平，日记称：“天何不欲至诚之人成功而使其久屈也！”^③同日，蒋介石还收到汪精卫、廖仲恺的来信，也都对蒋充满期待，使处在异国他乡的蒋介石感到温暖。10月18日，蒋介石再次接到孙中山手拟长电，又一次受到感动，日记云：“中师诚挚之辞，每使人读之泪下，其非比长于文字者故为此笼络之语，此其更可贵也。”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0月11日。

^② Allen Sues Whiting,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234.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0月13日。

其间，曾有人动员蒋介石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答以“须请命孙先生。”蒋的答复使动员者失望，批评蒋是“个人忠臣”，这一批评又很快为蒋介石得知，大为不满。^①到当年12月13日，蒋介石离开苏联回国，见到“留俄同志”致孙中山函稿，其中论及孙中山周围“忠臣多而同志少”，更使蒋介石“阅之甚骇”。其实，这本是一句要求加强国民党内民主建设的善意劝告，但蒋介石不能理解。日记云：“少年轻躁自满，诋笑道义，殊为可叹！排人利己之徒，诱引青年，自植势力，而不顾党谊，其实决不能自成其势。梦梦之人，惟有一叹而已。”^②这里所批评的“少年”和“排人利己之徒”，显指当时的部分年轻的共产党员，这是蒋介石对中共发生嫌隙的开始。第二年3月，蒋介石更致函廖仲恺诉苦说：“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非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洋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宁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戴）洋奴光荣之衔。”^③

与共产国际领袖季诺维也夫争论，主张中国革命“两步走”

蒋介石等到莫斯科后，曾于10月中旬通过吴廷康向共产国际提交过一份《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该报告认为：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政权一直掌握在军阀手中，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剥削日益增强。国民党的任务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中国的国民革命具有国际性质。《报告》对三民主义提出了新解释：民族主义意味着“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帝国主义，扶助弱小民族。民权主义指每个人都拥有言论、结社、集会、出版等自由，政府必须来自人民，取得人民帮助并为了人民。民生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所有大工业、所有土地

①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8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2月13日。

③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8页。

都属于国家，由国家管理，以便避免私人资本主义的危害。但是，由于现时的经济条件，中国不可能立即实行共产主义。民生主义是当前中国“最能接受的经济制度”。《报告》还提出：国民党必须进行改组，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宣传工作寻找政治口号。同时，必须在反帝运动中同苏维埃俄国合作。这种合作不仅为中国革命带来好处，也会为世界革命带来好处。^①

吴廷康收到国民党代表团的《书面报告》后，约蒋介石在适当时刻拜会共产国际主席团，但其时间却一再延宕，不能确定，蒋介石觉得很失面子，不大高兴。11月25日，吴廷康再次相约，而又不定具体时间，蒋介石“愤激不堪，婉言拒其约会”，但吴廷康一再要求，蒋介石勉强答应。当晚7时，蒋介石到共产国际主席团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先会见主席季诺维也夫等人，据蒋介石日记称：“各国共产党主席皆履会，情形颇佳”。会上，蒋介石发表演说：

国民党代表团是奉国民党领袖孙逸仙之命派出的，目的是在这里，在莫斯科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同共产国际的同志们进行坦率的讨论。

演说中，蒋介石重点对孙逸仙的民生主义，特别是“两步走”的设想作了阐释。他说：

民生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我们认为，对中国革命来说，目前最好政策是，作为第一步，使用“(争取)独立的国家”、“人民政府”、“民族主义”之类政治口号。作为第二步，我们将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做一些事情。

蒋介石说明，由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民不识字，属于小农阶

^①《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297-302页。

级和小资产阶级，因此中国“目前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使用“共产主义口号”，否则，“就会造成小土地所有者对这些口号的错误理解”，“会使他们加入反对派阵营”，“跟随中国军阀反对我们”，“会使中国革命不能取得成功”，“所以目前我们的纲领是旨在联合中国人民的所有人士，以便借助于统一战线来取得革命的巨大成功”。接着，蒋介石说明，孙逸仙博士30年前开始革命时，就使用三民主义为口号，人民已经习惯，军阀也不会特别注意，小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不会反对。

演说中，蒋介石还阐明了国民党对世界革命的设想：“主要基地在俄国”，赞成“俄国同志帮助德国革命取得成功”。他说：

国民党建议，俄国、德国（当然是在德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和中国（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组成三大国联盟来同世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借助于德国人民的科学知识、中国革命的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该国的农产品，我们将能轻而易举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我们将能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

蒋介石展望，三五年之后，中国的国民革命就能成功，一旦取得成功，“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二阶段，即在共产主义口号下展开工作。我们认为，那时，中国人民将更容易实现共产主义。”^①

蒋介石对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的报告很满意，日记中自称，访苏以来所作报告、讲话，“亦以今日为最从容而有条理也”。^②演讲后，蒋介石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科拉罗夫等人的提问并作了答复。季诺维也夫在总结中声称，共产国际的中国问题委员会将继续开会，同国民党代表团讨论，作出决议。

季诺维也夫关心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之间已经开始

^①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30-331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25日。

的合作，希望国民党做工作，将两党部分成员之间可能发生的困难和误解减少到最低程度，要求在中国工人罢工的时候，始终站在工人一边，积极支持工人斗争，并且特别强调，这种支持应该是“认真的和积极的”。季诺维也夫表示，他不能肯定，得到的消息是否确实，有人对他说，汉口“二七罢工”时期，国民党的支持不够“强而有力”，其“冷淡态度使人感到很失望”。他希望，国民党注意这一点，在工人的所有冲突和发动中，国民党的支持真正是坚决有力的，以便不给埋怨和抹煞带来口实。

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季诺维也夫明确表示，“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要使这些口号“更具体，更明确”。关于“民族主义”，季诺维也夫说：它应该“不为新的资本家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提供可能”，“它不应用中国资本家的统治去取代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也“不应导致建立中国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的霸权地位”，“不应该导致对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压迫”。关于“民权主义”，季诺维也夫表示，“民权主义在欧洲已是一个反动的口号，民权主义不赞成革命。”在中国，它能否成为“进步口号”，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居民中的劳动群众有可能捍卫自己的权利，并把自己的事业推向前进”。

关于“民生主义”，季诺维也夫称，未必有必要详细讨论，如果把它理解为“致力于把劳动群众，如耕种土地的庄稼人”从赋税重负等压迫下解放出来，那就不必反对。但是他明确表示，“这完全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是“有可能导致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发展”。^①

蒋介石表示，原则上同意季诺维也夫的讲话，但他强调：“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目前我们希望，小资产阶级和我们建立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但

^①《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35-337页。

是，我们并不为它的利益而斗争。”

季诺维也夫对蒋介石的回答作了有条件的肯定：“当然，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否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政党。”

会议最后，蒋介石要求共产国际派一些有影响的同志到中国，仔细研究中国局势，领导国民党，就中国革命的问题提出建议。季诺维也夫接受蒋介石的建议，答应向中国派出一位负责的代表，并请代表团转达对中国国民党，特别是孙逸仙同志的“热烈的兄弟般的问候”。^①

11月28日，共产国际主席团发布《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该决议由布哈林、科拉罗夫、库西宁、阿姆特尔以及吴廷康组成的委员会起草，共8条。它批评国民党“没有吸收城乡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斗争”，把希望寄托于国内反动派，建议对三民主义作出新解释，使之成为“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

关于民族主义，《决议》认为，它的含义是：“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不仅要消灭外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而且也要消灭本国资本的残酷剥削。”决议提出，民族主义对外体现的是“健康的反帝运动的概念”；对内，和“同受中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进行合作”，公开提出“民族自决”原则，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关于民权主义，《决议》认为，应使其有利于劳动群众，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享有权利和自由，决不能为在中国的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军

^① 以上对话，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37-338页。

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

关于民生主义,《决议》认为,应该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同时,对中国的民族工业实行“国有化原则”。《决议》认为,不能提出“土地国有化”,只能提出,“消灭大土地所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将“土地直接分配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

《决议》要求国民党重视中国工人阶级,放手发动其力量,“把全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上”,善于运用在华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同工农国家的苏联建立统一战线,同日本的工农解放运动和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建立联系。^①

共产国际的这份决议有正确的部分,也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部分。蒋介石读后,在日记中写道:

普〔浮〕泛不实,其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骄傲虚浮。其领袖徐诺微夫(按,即季诺维也夫——笔者)似有颓唐不振之气,吾知不久必有第四国际出现,以对待该党不正之举也。^②

下午,蒋介石赴共产国际会见其秘书,“应酬数语,即辞行”。

会见托洛茨基,蒋介石和沈定一差点打起来

托洛茨基是列宁的战友,十月革命的重要领导者。此时虽然受到斯大林的批判、排斥,但仍然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到苏后,一直希望见到他。

10月16日,蒋介石致函托洛茨基。

11月9日,蒋介石草拟致托洛茨基函稿。

11月18日晚,改正致托洛茨基函。

^①《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42-345页。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28日。

11月19日，发致托洛茨基函，大意云：“此次负国民党使命，代表孙先生来此，要求贵政府于本党所主张西北计划，予以赞助。华人怀疑俄国侵略蒙古一点，务望注意避免。并即辞行。”^①但是，直到11月27日，托洛茨基才接见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全体。

托洛茨基表示早就想会见代表团，但由于生病，未能这样做。现在健康恢复，有可能同苏联的朋友——孙逸仙的代表们交谈。他说：“只要孙逸仙只从事军事行动，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业人的眼里，就会同北方的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别无二致。”他建议“国民党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应当放到宣传工作上”，说是“一份好的报纸，胜于一个好的师团。在目前情况下，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他要求国民党“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对于国民党提交的备忘录，托洛茨基明确表示：“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蒙古发起军事行动。”^②

蒋介石试图作最后的争辩，力图说明各国帝国主义残暴地压制一切革命宣传，国民党政治活动困难，但托洛茨基则表示：政治宣传必须适合于具体情况。报刊上只发表那些根据新闻检查条件可以发表的东西，告示和传单可以宣传自己的观点。应该有合法的工作和地下的工作。托洛茨基的这些话再次坚决地表明，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不支持国民党在蒙古的军事计划。

蒋介石的日记没有记录托洛茨基的上述态度，只有简单的几行字：“其人慷慨活泼。其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相辅并行而不可一缺也云。余之性质，厌倦与消极，此所以不能成事也。”^③

会见托洛茨基后，蒋介石很生气，认为托洛茨基在骗他们。他在代表团内部说：“如果蒙古想独立，那需要我们承认，需要

①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0页。

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40—341页。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27日。

我们给予他独立，而不是他自己承认自己。”沈定一反对蒋介石的意见，二人发生口角，差一点打起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传说：“中国代表团内部在打仗！”^①

在抑郁无聊中归国

会见托洛茨基的当晚，蒋介石向契切林辞行。28日下午3时，应外交人民委员部之宴。叙谈3小时，“凡想说的话，大略各露其端倪，使其自绎。”^②6时，送邵元冲登车回德国。在邵元冲到莫斯科以后，蒋、邵已经结为兄弟，交换了兰谱。临别时，蒋介石颇有“不尽依依，良友去之何速”之感。当晚，蒋介石与赵世贤谈话，“略述此次来俄经过情形，并勉其不使为外人所支配而已。”^③赵大概是留苏学生。11月18日，蒋介石与他有过一次谈话，认为是“青年有为之士，殊可贵也。”29日，蒋介石向越飞夫人辞行。下午2时登车。张太雷留在莫斯科，没有随蒋介石等归国。此次访苏之行，蒋介石主要的目的没有达到，劳而少功，加之与沈定一吵架之后，两人关系紧张。蒋介石自悔“择友不良”，见沈心烦，在车上也懒得说话。3时正，火车开动，蒋介石感到“抑郁无聊已极”。11月30日，从车上望去，“冰天雪地，一望无际，日色沉沉，惨淡无光”。21日，车过一座盛产宝石的城市，蒋介石本想买点宝石玩具，带给经国、纬国，但因钱不多，只得作罢。12月8日，到中国国境，一片平原，只有由东北至西南一带，有不甚高峻的山脉。蒋介石是军人，立刻想起北方战事适合采取攻势。8时后到满洲里。当地长官前来迎接，颇为殷勤。代表团全体均无护照，因事前有电报通知，一律放行。当日到哈尔滨，地方高级长官来接，蒋介石因用的是假名，回避

①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83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28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28日。

不见。

12月10日蒋介石到大连，逛老虎滩。12月12日，登亚拉伯船。本定下午4时启碇，因装货不足，至第二天早晨方开。蒋介石感叹道：“日商信用，远不如前，而船中腐败形状，不堪言尔。吾知东邦帝国主义之运命不久将尽矣。”^①13日，蒋介石开始在船上写作《游俄报告书》。14日续写，时作时辍，不写时便在甲板上与王登云一起跑步。访苏4个月以来，蒋介石至今才感到心地舒畅。日记云：“风平浪静，船位宽畅，亦一乐事也。”14日，继续写作《游俄报告书》。15日，船入吴淞口。9时登岸回家，陈洁如还未起床。

当天下午，蒋介石往访张静江后，即登上江天轮，赶回奉化。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林业明、陈果夫诸人都到船上与蒋介石相会，详叙别情。蒋介石向廖仲恺等人简要汇报了访苏之行，说明俄国人对代表团“很同情”，“他在一些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人们把他抬了起来，音乐打断了他的讲话；人们向他说明了与政治工作有关的各种情况，甚至向他讲了党内在中国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蒋概括说：“这一切给他留下了很诚恳的印象。”“苏联有给予支援的真诚愿望，问题在于，国民党人是否充分理解自己的任务。”^②此前二日，孙中山在广州已经启动了在近代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的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重新进行党员登记，委任廖仲恺、谭平山、陈树人、孙科、杨庶堪等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因此大家都劝蒋介石回沪，参加上海地区的党务改组，但蒋介石执意不从，一心赶回溪口，纪念母亲王太夫人的六十冥诞。他只向孙中山捎去一个建议，任命杨庶堪为广东省省长。回奉化后，蒋介石又将他所写的《游俄报告书》寄给孙中山。不过，这份《报告》至今尚未发现。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2月12日。

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384页。

去广州向孙中山报告，孙认为蒋“过虑”

12月16日早7时，蒋介石船抵宁波，雇了座轿子，兼程赶回溪口。2时半到家，没有休息，就赶往母亲墓地参拜。当晚就住在新近落成的慈庵中。24日，又赴祖父母墓地参拜，同时视察亡弟的坟墓。

这边蒋介石在家乡省墓，那边廖仲恺、孙中山急如星火地等待蒋介石汇报。12月20日，在上海的廖仲恺致电蒋介石，告以鲍罗廷有事商量，黄埔军校急待开办，要蒋立即乘轮来沪，共同南下。22日，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联名致函蒋介石，说明已将蒋的建议向孙中山提出，“待商之事甚多”，要求蒋介石勿因省长问题未决而拖延来沪时间。26日，胡、廖、汪三人再次致函蒋介石，转抄杨庶堪复电，中称：“鲍先生日盼兄至，有如望岁，兄若不来，必致失望。”又称：“军官学校由兄负完全责任办理，一切条件不得兄提议，无从进行。”^①27日，张静江也致函蒋介石，认为“似不宜再缓”。28日，汪精卫转来孙中山24日电报，中称：

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于时局、政局有所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并希约静江、季陶同来，因有要务欲与商酌也。^②

同日，廖仲恺也致函蒋介石，说明上海诸人最迟1月4日搭船离沪，要求蒋“万不能再延”。函件以前所未有的语气责备说：“否则事近儿戏，党务改组后而可乘此惰气乎！”^③

^①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4-145页。

^②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4页。

^③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5页。

尽管众人一再催促，蒋介石还是在1月16日才到达广州。4天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24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30日，孙中山任命杨庶堪为广东省省长。2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

到广州后，蒋介石即向孙中山口头报告访苏情形，同时提出对国共合作的意见。孙中山原本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计划。1923年10月9日，他就向苏联派遣来华的顾问鲍罗廷表示：我还等待着派赴莫斯科的代表所进行的谈判的结果。很明显，我期待着在莫斯科的这些谈判能够取得丰硕成果。^①苏俄政府拒绝蒋介石的计划，孙中山不能没有失望之感。不过，孙中山认为，“唯一的朋友是苏联”，因此，他批评蒋介石“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对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也认为蒋介石过虑。^②据蒋介石多年后的回忆，孙说：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何况，苏俄也承认，中国并无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可能呢！因此，孙中山决心坚持联俄容共的决策。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蒋介石认为参加大会的共产党员“挟俄自重”，“本党党员盲从共产主义”，于2月21日向孙中山辞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职务，离粤还乡。3月14日，他致函廖仲恺，将共产党区分为“国际共产党”与“俄国共产党”，又将“俄国共产党”的“主义”与“事实”分开，表示“主义”虽可信，而“事实”则不然。信中，蒋介石强烈指责“俄党”对中国的政策，他说：“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

^① N.Mitarevsky, *World Soviet Plots*, Tientsin Press, 1927.

^② 《苏俄在中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32页。

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①苏联支援中国革命，有其真诚的一面，蒋介石将其与英、法、美、日并视，称其为变相的“凯撒之帝国主义”，是错误的，但是，揆诸历史，苏联在其国家发展中，确有其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的一面，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共的批评并没有坚持多久，很快，他就以坚决主张联苏、联共的左派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原载上海《世纪》2007年第2-3期

^①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7页。

中山舰事件之谜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拐点

1926年3月20日在广州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扑朔迷离，它的许多疑团至今尚未解开。本文拟探讨这一事件发生前后的真实过程，以进一步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

“三·二〇”之前蒋介石的心理状态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曾多次谈到有关经过，但是，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6月28日，他在孙中山纪念周上演说称：“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了。”^①现在，该是对这桩公案彻底清理的时候了。下面，就我们所能见到的蒋介石这一时期的部分日记及有关信件、资料，对它进行一次考察。

根据日记、信件等资料，自1926年1月起，蒋介石和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以及汪精卫之间的矛盾急剧尖锐。先是表现在北伐问题上，后又表现在黄埔军校和王懋功第二师的经费增减问题上。

^①《黄埔潮》第2期。

1925年末，蒋介石从汕头启程回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张立即北伐。12月28日日记云：“预定明年8月克复武汉。”^①1926年1月4日，他在国民政府春酌中发表演说：“从敌人内部情形看去，崩溃一天快似一天。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可以将军阀一概打倒，直到北京。”^②两天后，他在向大会所作的军事报告中又声称：“再用些精神，积极整顿，本党的力量就不难统一中国”，“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③季山嘉反对蒋介石立即北伐的主张。他在黄埔军校会议上以及在和蒋介石的个别谈话中，都明确表示过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从顾问团写给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中可以知其梗概。该报告认为：“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它的成员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成份，经常摇摆不定”；又说：“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们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反叛政府，并且在国民党右翼的政治口号下，联合人口中的不满成份。另一方面，国民革命军何时才能对北军保持技术上的优势还很难说。当然，革命军的失败将给予广州内部的反革命以良机。”^④文件未署名，但季山嘉身为顾问团团团长，报告显然代表了他的意见。据此可知，季山嘉和顾问们认为，由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北伐应该从缓。然而，蒋介石容不得反对意见，二人的裂痕由此肇端。

但是，这一时期，蒋介石与季山嘉之间的关系还未彻底破裂。1月中旬，奉、直军阀在华北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为此，季山嘉提出两项建议：1. 由海道出兵往天津，援助国民军；2. 蒋

① 本文所引蒋介石日记，原据毛思诚的分类摘抄本，现改用手稿本，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②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7日。

③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第18号，1926年1月9日。

④ Document, 22, Wilbur and How: *Document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56, p.246.

介石亲赴北方练兵。其地点，据说是在海参崴。^①对于这两项建议，汪精卫赞成，蒋介石最初也同意。1月26日日记云：“往访季山甲〔嘉〕将军，商运兵往津援助事。”^②28日日记又云：“往访季山嘉顾问，研究北方军事、政治。实决心在北方寻得一革命根据地，其必大于南方十倍也。”^③然而，蒋介石很快就改变了态度。2月6日，军事委员会会议议决黄埔军校经费30万元，王懋功第二师经费12万元。7日，军校经费减至27万元，王懋功第二师的经费则增至15万元。此事引起蒋介石的疑忌，怀疑是季山嘉起了作用。^④当日，蒋介石和季山嘉进行了一次谈话。从有关资料看，季山嘉担心中国革命重蹈土耳其的覆辙，对国民革命军军官的素质表示不满，对蒋介石也有委婉的批评。蒋介石“意颇郁郁”，抱怨苏俄顾问“倾信不专”，在日记中说：“往访季山嘉顾问，谈政局与军队组织，针砭规戒之言甚多，而其疑惑戒惧之心，亦昭昭明甚。以中国之社会与空气，难怪其以土耳其为殷鉴，亦难怪其疑中国军人为贪污卑劣之品也。呜呼！国家若此，军人如彼，欺凌侮辱，诚令人格丧失，无地自容矣。”^⑤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急思跳出环境，免成军阀也。”季山嘉觉察到了蒋介石的不满，曾于事后立即向汪精卫表示：“我等俄国同志，若非十二分信服蒋校长，则我等断不致不远万里而来，既来之后，除了帮助蒋校长，再无别种希望。”又称：“至于其他一切商榷，我等既意存帮助，则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此正由十二分信服，故如此直言不隐。若蒋校长以为照此即是倾信不专，则无异禁我等不可直言矣。”^⑥季山嘉的这一态度，柔中有

① 参见《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第202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1月26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1月28日。

④ 蒋介石：《复汪精卫书》，稿本，1926年4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2月7日。

⑥ 汪精卫：《致蒋介石书》，原件，1926年2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刚，一方面表示“信服”蒋校长，“帮助”蒋校长，另一方面又毫不妥协地声明，在有不同意见时应该“直言不隐”。汪精卫随即于8日致函蒋介石，将季山嘉的上述表态源源本本地告诉了他。蒋介石的直接反应是，决定辞去一切军职。^①8日，蒋介石表示不就军事总监一职；9日，通电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职务。11日日记提出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积极进行，冲破难关”，一条是“消极下去，减轻责任，以为下野余地”，并云：“苏友疑忌、侮慢、防范、欺弄之行，或非其本来方针，然亦无怪其然，惟有以诚义感之而已。”^②13日，日记中突然有了准备赴俄的记载：“如求进步，必须积极，否则往莫斯科一游，观察苏俄情形也。”

在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中，汪精卫支持季山嘉。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蒋介石提出北伐问题，汪精卫曾表示同意，并开始准备经费，但不久转而赞同季山嘉的意见。二大未就北伐问题作出任何决定。2月8日，汪精卫在向蒋介石转述季山嘉态度的信函中，又盛赞季山嘉“说话时，一种光明诚恳之态度，令铭十分感动”，要蒋介石创造条件，使季山嘉等能够“畅所欲言，了无忌讳，了无隔阂”^③。对于蒋介石的辞职，汪精卫则一再挽留，2月9日函云：“广州卫戍司令职，弟实不宜辞，是否因经费无着？此层铭昨夜曾想及，故今晨致弟一电，请开预算单。”^④12日再致一函云：“以后弟无论辞何职，乞先明以告我。如因兄糊涂，致弟办事困难，则兄必不吝改过。”^⑤14日，汪精卫并亲访蒋介石，从上午一直谈到晚上，劝他打消辞意。^⑥但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2月8日：“晚傍回校部，拟辞军职及此生不复认军职通电稿成。”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2月11日。

③汪精卫：《致蒋介石书》，原件。

④同上。

⑤同上。

⑥《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2月14日：“季新兄来谈终日，终无善法，以解决辞职之意也。”

是，蒋介石毫不动心。19日，蒋介石向汪精卫正式提出“赴俄”一事。当日日记云：“余决意赴俄休养，研究革命，以近来环境恶劣，有加无已，而各方怀疑渐深，积怨丛生，部下思想不能一致，个人观念亦难确定，安乐非可与共，亦不得不离粤休养也。”同日，季山嘉到蒋介石寓所访问，谈话中，蒋介石透露了“赴俄”的意图，并且观察季山嘉的反应，于日记中写下了“状似不安”四字。大约在此期间，蒋介石拟派邵力子赴北京，请鲍罗廷回粤。随后又致电鲍罗廷，要求撤换季山嘉。

2月22日晚，蒋介石应邀参加苏联顾问的宴会。席上，蒋自感有人“嫌”他。23日，原代理军校教育长、第二十师师长王柏龄见蒋，说有人诋毁他。蒋介石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疑虑重重。日记云：“闻茂如言，人毁我，昨夜又见人嫌我。”^①24日，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任命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白崇禧为委员，将广西军队改编为第八军、第九军，以李宗仁、黄绍竑为军长。此事进一步引起蒋介石的疑忌，他认为广东有六个军，照次序，广西军队应为第七、第八军。但是，现在却将第七军的建制空下来，必然是季山嘉企图动员王懋功背叛自己，然后任命他为第七军军长。^②于是，蒋介石听从王柏龄的建议，于26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王懋功扣留，任命自己的亲信刘峙为第二师师长。当日日记云：“上午，茂如来谈，撤革王懋功之师长职，扣留之。此人狡悍恶劣，唯利是视”，“其用心险恶不可问，外人不察，思利用其以倒我，不知将来为害党国与革命至于胡底，故决心革除之”。^③扣王之后，蒋日记云：“今晚略得安睡矣。”次日，将王押送赴沪。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2月23日。

②蒋介石：《复汪精卫书》，1926年4月9日；参见《晚宴退出第一军党代表及CP官长并讲经过情形》，《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2，第40-42页。

③《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2月26日。

王懋功政治上接近汪精卫，王部是汪可以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蒋介石驱王之后，觉得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27日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凡事应认明其原因与要点。要点一破，则一切纠纷不解自决。一月以来之难境心战，至此稍安，然而险危极矣。”他找到汪精卫，声言季山嘉“专横矛盾，如不免去，不惟党国有害，而且牵动中俄邦交。”又称：“如不准我辞职，就应令季山嘉回俄。”下午，季山嘉在和汪精卫议事时，表示将辞去顾问职务。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此称：“不知其尚有何作用也？”^①

尽管蒋介石在驱除王懋功问题上取得了胜利，但仍然疑虑重重，觉得自己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3月5日日记云：“单枪匹马，孤苦零丁，忤逆毁蟻，此吾今日之环境也。总理与诸先烈有灵，其当怜而援之，不使我陷于绝境至此也。”^②3月7日，刘峙、邓演达二人告诉蒋介石，有人以油印传单分送各处，企图掀起“反蒋”运动，这更增加了蒋介石的危险感，觉得有人在陷害他，企图把他搞掉。3月10日日记云：“近日反蒋运动传单不一，疑我、谤我、毁我、忌我、排我、害我者亦渐显明，遇此拂逆，精神颓唐，而心志益坚矣。”这时，蒋介石和季山嘉的矛盾更形尖锐，以致于公然“反脸”^③。12日，季山嘉和他讨论北伐问题，他居然“力辟其谬妄”^④。蒋介石曾同意季山嘉由海路运兵往天津的计划，此时却认为这是“打消北伐根本之计”，与孙中山的“北伐”之志完全“相反”^⑤。对于季山嘉劝他往北方练兵的建议，更认为是心怀叵测，是有意设法使他离开广东，“以失军中之重心，减少吾党之势力”^⑥。“赴俄休养”本来是蒋介石自己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2月27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3月5日。

③ 蒋介石：《复汪精卫书》，1926年4月9日。

④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1，第77-78页。此句为蒋介石亲笔所加。

⑤ 蒋介石：《复汪精卫书》，1926年4月9日。

⑥ 蒋介石：《复汪精卫书》，1926年4月9日。

提出的，而当汪精卫为了缓解他和季山嘉的矛盾，同意这一要求，惟其“速行”时，蒋介石却又恐惧起来。3月14日，蒋介石和汪精卫谈话后，在日记中写道：“晚，与季新兄谈话，其催予离粤乎？”3月15日日记云：“知王懋功之恶劣及世道人心之险诈，诚不能办事矣。革命绝望。晚在家愤闷已极。”又云：“忧患疑惧已极，自悔用人不能察言观色，竟陷于此，天下事不可为矣！”这一时期，他和秘书陈立夫的赴俄护照也得到批准^①，就使他更加惶惶然了。

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右派乘虚而入，利用蒋介石多疑的心理，制造谣言和事端，以进一步挑起蒋介石和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

中山舰调动经过

要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还必须查清中山舰调动经过。

根据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的报告，事件的开始是这样的：“18日午后6时半，孔主任因外洋定安火轮被匪抢劫，飭赵科长速派巡舰一只，运卫兵16名前往保护。职奉令后，时因本校无船可开，即由电话请驻省办事处派船以应急需，其电话系由王股员学臣接。”^②孔主任，指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叟。赵科长，指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定安轮是由上海开到广州的商轮，因船员与匪串通，在海上被劫，停泊于黄埔上游。^③根据黎时雍的上述报告，可知当时调舰的目的在于保护商轮，最初并没有打算向李之龙管辖的海军局要舰，更没有指定中

^① 蒋介石对曾扩情等人口述。见曾扩情：《蒋介石盗取政权和蓄谋反共的内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参见陈肇英：《八十自述》，《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6年3月20日，〔台北〕正中书局，1974。

^② 《交通股员黎时雍报告》，原件，1926年3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所引各原件，均同。

^③ 参见《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12日、19日。

山舰开动，所求者不过“巡舰”（巡逻艇）一只，卫兵16名而已。只是由于黄埔军校“无船可开”，才由黎时雍自作主张，向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请求“速派船来，以应急需”。

驻省办事处接电话的是交通股股员王学臣。他事后的陈述是：“3月18日午后6时30分，接驻校交通股黎股员时雍电话云：因本晚由上海开来定安商轮已被土匪抢劫。现泊黄埔鱼珠上游。奉孔主任谕，派卫兵16名，巡舰一只，前往该轮附近保护，以免再被土匪抢劫。职因此时接电话听不明了，系奉何人之谕，但有伤赵科长限本夜调巡洋舰一二艘以备巡查之用。职当即报告欧阳股长……想情系教育长之谕，故此请欧阳股长向海军局交涉。”^①欧阳股长，指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根据上述报告可知，向海军局要舰的是王学臣，所谓邓演达“教育长之谕”则是因为电话听不清，“想情”之故。至于舰只规模，也因“想情”之故，由“巡舰”而上升为“巡洋舰一二艘”了。

欧阳钟得到王学臣的报告后，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由作战科科长邹毅面允即派舰只一二艘前往黄埔，听候差遣。此后，据欧阳钟自称，他“于是即返办事处”^②。而据海军局的《值日官日记》则称：“因李代局长电话不通，无从请示办法，故即着传令带同该员面见李代局长，面商一切。”^③又据李之龙夫人报告：当夜，有三人到李之龙家，因李仍不在，由李之龙夫人接待，“中有一身肥大者”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同时又交下作战科邹科长一函，中称：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由此两舰决定一艘。李之龙归来阅信后，即去对门和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商

① 《交通股王学臣报告》，原件，1926年3月26日。

② 《欧阳钟报告》，原件，1926年3月23日。

③ 《值日官日记》，抄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量，因自由舰新从海南回省，机件稍有损坏，李之龙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当即下令给该舰代理舰长章臣桐。^①同夜10时余，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电话，据称：向海军局交涉之兵舰，本晚可先来一艘□即宝璧舰□，约夜12时到埔，请嘱各步哨不要误会。季方当即询问因何事故调舰，抑奉何人之命交涉，答称：系由本校黎股员时雍电话嘱咐，请保护商轮之用。^②

19日晨6时，宝璧舰出口。7时，中山舰出口。同日晨，海军局参谋厅作战科科长邹毅要求欧阳钟补办调舰公函，欧阳钟照办。此函现存，内称：“顷接黎股员电话云：奉教育长谕，转奉校长命，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迅速派兵舰两艘为要。”中山舰于上午9时开抵黄埔后，代理舰长章臣桐即到军校报到，由季方委派副官黄珍吾代见。章出示李之龙命令，略称：派中山舰火速开往黄埔，归蒋校长调遣。该舰长来校，乃为请示任务。并称：若无十分重要事情，则给其回省，另换一小舰来候用。黄珍吾当即报告邓演达，邓谓并无调舰来黄埔之事，但他“公事颇忙”，命黄转知该舰长听候命令。^③

当时，以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中山舰停泊黄埔期间，海军局作战科邹科长告诉李之龙，因俄国考查团要参观中山舰，俄顾问询问中山舰在省河否？李之龙即用电话请示蒋介石，告以俄国考查团参观，可否调中山舰返省，得到蒋介石同意，然后李之龙便电调中山舰回省。^④

中山舰的调动经过大体如上。这一经过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点：

1. 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汪精卫、季山

① 《李之龙夫人报告》，原件，1926年3月31日。

② 《季方报告》，原件，1926年3月24日。

③ 《黄珍吾报告》，原件，1926年3月24日。

④ 《李之龙供词》，原件，未署日期。

嘉无关，也与共产党无关。多年来，蒋介石和国民党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传的所谓“阴谋”说显然不能成立。

2. 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因此，所谓蒋介石下令调舰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

3. 中途加码，“矫”蒋介石之令的是欧阳钟。他明明去了李之龙家里，却在事后隐匿有关情节；他在海军局和李之龙夫人面前声称“奉蒋校长命令”调舰，而在给作为校长办公厅秘书的季方的电话里，却只能如实陈述；在给海军局的公函里，他清楚地写着要求“迅速派兵舰两艘”，而在事后所写的报告和供词中，又谎称只是“请其速派巡舰一、二艘”^①，有意含糊其词。因此，欧阳钟是中山舰事件的一个重要干系人物。此人是江西宜黄人，1925年5月任军校代理辎重队长，不久改任少校教官，其后又改任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他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之侄。^②了解了他的这一身份，将有助于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

蒋介石的最初反应和“三·二〇”之后的日记

据蒋介石自述：3月19日上午，“有一同志”在和蒋介石见面时曾问：“你今天黄埔去不去？”蒋答：“今天我要去的。”二人分别之后，到九点、十点时，“那同志”又打电话来问：“黄

^① 《欧阳钟报告》，又，《欧阳钟供词》，原件，1926年3月31日。

^② 季方在关于“中山舰事件”一文中回忆说：“在那年3月18日夜晚，有一艘来自上海的商船，于虎门驶过来遭到水盗的劫持后，即驶来军校要求缉查保护。当时由管理处（军校的后勤机构）的欧阳格（科长级干部，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用校长的名义打电话给海军局，要调两艘炮舰到黄埔军校来。”见《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第34-35页。这里所说的管理科的科长级干部欧阳格系管理科交通股股长欧阳钟的误记。此点笔者曾函询季方同志，蒙季方之女季明相告，可以订正。

埔什么时候去？”如此一连问过三次。蒋介石觉得有点“稀奇”了：“为什么那同志，今天总是急急的来问我去不去呢？”便答复道：“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蒋介石所说的“有一同志”，他当时表示名字“不能宣布”，但实际上指的是汪精卫。到下午一点钟的时候，蒋介石又接到李之龙的电话，请求将中山舰调回省城，预备给俄国参观团参观。蒋介石当即表示：“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此后，蒋介石愈益感到事情蹊跷：“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又要来问我？”“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在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城。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①当日，蒋介石有这样一段日记：“上午，往访季新兄。回寓会客。准备回汕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自容，不胜愤恨。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思为何必欲私行，予人口实，志气何存！故决回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粹尽矣。终夜议事。四时往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陷我也。权利可以放弃，名位可以不顾，气节岂可丧失乎？故余决心不走。”^②蒋介石的这一段日记提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他在判断所谓“陷我”的阴谋之后，最初的反应是离开广州，退到他所掌握的东征军总指挥部所在地汕头。已经行至半途了，才决定返回，对中山舰采取镇压措施。蒋介石的这一段记载，证以陈肇英、陈立夫、王柏龄等人的回忆，当是事实。陈肇英时任虎门要塞司令，他在《八十自述》中回忆说：3月19日，蒋介石专使密邀陈肇英、徐桴（第一军经理处处长）、欧阳格三人筹商对策。“当时蒋校长顾虑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内，拥有相当势力，且驻省城滇军朱培德部，又有共党朱德统率之大队兵力^③，且获有海军

^① 蒋介石：《晚宴退出第一军党代表及CP官长并讲经过情形》，《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2，第45-46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3月19日。

^③ 此说误，当时朱德尚在莫斯科。

的支持，颇非易与，主张先退潮、汕，徐图规复。我则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并请命令可靠海军，集中广九车站待变，以防万一。初时蒋校长颇为踌躇，且已购妥开往汕头之日轮‘庐山丸’舱位。迨车抵长堤附近，蒋校长考虑至再后，终觉放弃行动，后果殊难把握，亟命原车驰回东山官邸，重行商讨，终于采纳我的建议，布置反击。”^①陈立夫则称：“汪先生谋害蒋先生”，“蒋先生发觉了这个阴谋，很灰心，要辞职，要出亡”。19日那天，检点行李，带他坐了汽车到天字码头，预备乘船走上海。在车上，他劝蒋先生干，“有兵在手上为什么不干？”^②又称：“昔秦始皇不惜焚书坑儒，以成帝业。当机立断，时不可失。退让与妥协，必贻后悔。”^③汽车到了码头，“蒋先生幡然下决心，重复回到家中发动三月二十日之变。”^④陈肇英和陈立夫的回忆在回汕头或去上海上虽有差异，但在蒋介石一度准备离开广州这一点上却和蒋介石的日记完全一致。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确实相信有一个“陷害”他的阴谋，否则，他是不必在自己的亲信面前演出这一场戏的。

关于此，还可以在蒋介石“三·二〇”之后的日记和其他资料中得到证明。

20日晨，根据蒋介石命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城戒严；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50余人；占领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与此同时，苏俄顾问也受到监视，卫队枪械被缴。21日，汪精卫致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请

① 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6年3月20日。

② 陈公博：《苦笑录》，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第75页；参阅陈立夫：《北伐前余曾协助蒋公作了一次历史性的重要决定》，台北《传记文学》第41卷，第3期。

③ 文心珏：《国共合作与国共分离的回忆》，湖南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作者在“三·二〇”事件后，曾亲自听陈立夫讲述有关经过。

④ 同②。

病假，声称“甫一起坐，则眩晕不支，迫不得已，只得请假疗治”，所有各项职务均请暂时派人署理。^①当日傍晚，蒋介石去探视汪精卫，日记云：“傍晚，访季新兄病。观其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甚矣政治势力之恶劣，使人几乎无道义之可言也。”

22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汪精卫寓所召集临时特别会议。会议上，汪精卫对蒋介石擅自行动表示了不满，会议决定：“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俄同志暂行离去”；“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②会后，汪精卫即隐居不知去向。25日，蒋介石日记云：“4时后反省，与子文兄商议，找觅精卫行踪不可得。后得其致静兄一书，称余疑其、厌其，所以不再任政治、军事之事。彼之心迹可以知矣。为人不可有亏心事也。”此后数日内，蒋介石日记充斥了对汪精卫的指责。

3月26日日记云：“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精卫如果避而不出，则其陷害之计，昭然若揭矣，可不寒心！”

3月28日日记云：“某兄始以利用王懋功，离叛不成，继以利用教育长陷害又不成，毁坏余之名节，离间各军感情，鼓动空气，谓余欲杀某党，欲叛政府。呜呼！抹煞余之事业有所不计，而其抹煞总理人格，消灭总理系统，叛党卖国，一至于此，可不痛乎！”

4月7日日记云：“接精卫兄函，似有急急出来之意，乃知其尚欲为某派所利用，不惜党国之败坏也。”

蒋介石的这些日记表明，他当时确实认为，“陷害”他的阴谋的核心人物是汪精卫。4月20日，蒋介石在演说中声称：“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

^① 《时报》，1926年3月30日。

^②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油印件。

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①话虽然说得有点游移，但却道出了他的心病。

汪精卫于政治委员会临时特别会议之后隐居不出，据陈璧君说，一是为了“疗病”，一是为了让蒋介石“反省一切”。^②但蒋介石除了装模作样地给军事委员会写过一个呈子，自请处分外，并无什么像样的“反省”行为。其间，汪精卫读到了蒋介石致朱培德的一封信，信中，蒋介石毫不掩饰地表露了他对汪精卫的疑忌，于是汪精卫决定出国。3月31日汪精卫致函蒋介石，内称：“今弟既厌铭，不愿与共事，铭当引去。铭之引去，出于自愿，非强迫也。”^③蒋介石于4月9日复函云：“譬有人欲去弟以为快者，或有陷弟以为得计者，而兄将如之何？”又称：“以弟之心推之，知兄必无负弟之意，然以上述之事实证之，其果弟为人间乎？抑兄早为人间乎？其果弟疑兄而厌兄乎？抑吾兄疑弟而厌弟乎？”^④这封信也说明了蒋介石当时认为，汪精卫受人离间，怀疑并厌弃自己，和其日记是一致的。

此外，还可以考察一下蒋介石这一时期的精神状态。3月20日下午，何香凝曾去见蒋介石，质问他究竟想干什么，派军队到处戒严，并且包围罢工委员会，是不是发了疯，还是想投降帝国主义？据记载，蒋介石“竟象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⑤阳翰笙也回忆说，当他代表入伍生部到黄埔开会，见蒋介石“形容憔悴，面色枯黄”，作报告时讲到“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时，竟然哭起来了”。^⑥邓演达也因为蒋介石“神色沮丧”，甚至

① 《晚宴退出第一军党代表及CP官长并讲经过情形》，《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2，第46页。

② 陈璧君：《致介兄同志书》，原件，1926年4月1日。

③ 汪精卫：《致蒋介石书》，原件，1926年3月31日。

④ 蒋介石：《复汪精卫书》，1926年4月9日。

⑤ 陈孚木：《国民党三大秘案之一》，连载之七，《热风》第74期，〔香港〕创垦出版社，1956，发表时署名浮海。

⑥ 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第105页。

关照季方：“要当心校长，怕他自杀”。^①这种精神状态，从蒋介石认为自己处于被“陷害”的角度去分析，也许易于理解。

尽管蒋介石内心对汪精卫恨之人骨，但是，汪精卫当时是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公认的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蒋介石这时还不具备彻底倒汪的条件。于是，一方面，他不得不在公众面前透露某些情节，以说明有人企图陷害他；另一方面，却又不能全盘托出他的怀疑。其所以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要人们在他死后看日记者，盖为此也。

西山会议派与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把戏”

据陈公博说，邹鲁在1930年曾告诉他：当时，西山会议派谋划“拆散广州的局面”，“使共产党和蒋分家”，邹鲁等“在外边想办法”，伍朝枢“在里头想办法”，于是，由伍朝枢出面，“玩”了下面这样一个“小把戏”：有一天，伍朝枢请俄国领事吃饭，跟着第二天便请蒋介石的左右吃饭。席间，伍朝枢装着不经意的样子说：昨夜我请俄国领事吃饭，他告诉我蒋先生将于最近期内往莫斯科，你们知道蒋先生打算什么时候起程呢？事后，蒋介石迅速得到了报告，他怀疑“共产党要干他”，或者汪精卫要“赶他”，曾经两次向汪精卫试探，表示于统一东江南路之后，极端疲乏，想去莫斯科作短暂休息。一可以和俄国当局接头，二可以多得些军事知识。在第二次试探时，得到汪精卫的同意。自此，蒋介石即自信判断不错。他更提出第三步试探，希望陈璧君和曾仲鸣陪他出国。陈璧君是个好事之徒，天天催蒋介石动身。碰巧俄国有一条船来，并且请蒋介石参观，听说当日蒋介石要拉汪精卫同去，而汪因已参观过，没有答应，于是蒋便以为这条船是预备在他参观时扣留他直送莫斯科的了。因此决定反共反

^① 季方：《我所接触到的蒋介石》，《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第98页。

汪。“这是三月二十日之变的真相”。^①

这段记载说明了伍朝枢在挑起蒋介石疑惧心理过程中的作用。应该说，陈公博没有捏造邹鲁谈话的必要。但是，我们还必须结合其他材料加以验证。

1. 这一段话的核心是蒋介石怀疑共产党和汪精卫要“干他”或“赶他”，以自请“赴俄休养”作试探，得到汪精卫同意，便进一步增强了他的怀疑。此点和前引蒋介石日记大体一致。

2. 陈孚木在《国民党三大秘案》一文中说：其时，伍朝枢知道有一艘装载军械送给黄埔军校的俄国商船，不久会到广州，便编造“故事”说：“苏联从蒋介石与俄顾问季山嘉的不和谐，判定蒋是反革命分子，已得汪精卫的同意，不日以运赠军械为名，派遣一只商船来广州，即将强掳蒋介石去莫斯科受训。”“他把这‘故事’作为很机要秘密的消息，通传给在上海西山会议派中央的许崇智、邹鲁等几个广东人，很快便传到蒋介石在沪的亲密朋友如戴季陶、张静江、陈果夫等几个人耳朵里了。”^②陈孚木的这一段记载认定伍朝枢是编造谣言的主要人物，谣言的核心情节是利用俄船强掳蒋介石去莫斯科，伍并将这一谣言通传给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凡此种种，均可与邹鲁对陈公博所述相印证。陈孚木当时是国民政府监察委员，曾任《广州民国日报》的总编辑，和国民党上层人物广有联系。他看过中山舰事件制造者欧阳格1927年写的有关回忆稿^③，所述自然具有相当的可靠性。

^① 陈公博：《苦笑录》，第77-78页。

^② 《国民党三大秘案之一》，连载之三，《热风》第70期。

^③ 据陈孚木叙述，欧阳格的回忆写于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想乘“清党”之机出版表功，曾请陈看过。后来送呈蒋介石，蒋约略一翻阅，脸色一沉，骂他道：“吓！你懂什么？有许多问题你哪里知道，这种小册子可以出版的吗？把稿子留下来！”说着把稿本向抽屉内一丢，硬把这稿子没收了。见《国民党三大秘案之一》，连载之十八，《热风》第85期。按，《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7年7月11日：“会蓝、方、欧阳葛〔格〕诸友。”可见，“四·一二”政变后，欧阳格确实找过蒋介石。

3. 1926年4月1日，柳亚子致柳无忌函云：“反动派陷害共产派是确实的，李之龙是一个共产派的军人（属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而蒋部下很有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在那里捣鬼，他们制造一个假命令，叫李把中山舰开到黄埔去，一方面对蒋说，李要请你到莫斯科去了，蒋大怒，即下令捕李。”柳亚子所述的核心情节是，有人造谣，以李之龙将劫蒋“去莫斯科”，煽动蒋介石反共，此点和邹鲁、陈孚木所述基本一致。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各方面交游颇广，他的这一段话不会没有来历。同函中，柳亚子又说：“在两星期前，沈玄庐（定一）告诉陈望道，广州不出十日，必有大变，所以反动派的阴谋是和上海通气的。”^①沈定一是西山会议派的重要人物，当时在上海。如果他不了解伍朝枢“玩的小把戏”，是不会作出“广州不出十日，必有大变”的判断的。6月4日，陈独秀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里也说：“先生要知道当时右派正在上海召集全国大会，和广东孙会互相策应，声势赫赫。三月二十日前，他们已得意扬言，广州即有大变发生。先生试想他们要做什么？”^②这些材料，都可以反证陈孚木所述：伍朝枢曾将他编造的故事，通传给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中央。

4. 邓演达曾告诉季方，蒋介石之所以“仓皇失措”，是因为“得到密报”：“共产党利用其海军局长李之龙的关系，将中山舰露械升火，与黄埔邓演达联合行动，图谋不轨。”^③此说虽未提到伍朝枢，但在指出蒋介石“得到密报”这一点上，仍有可资参证

^① 《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70页。

^② 《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向导周报》第155期。

^③ 季方：《白首忆当年》，《纵横》，1985年第2期。原文未说明消息来源，承季明女士相告，系季方直接得之邓演达者。当时，中山舰事件的制造者们确曾企图将邓演达牵连在内。季方回忆说：3月20日晚，新任中山舰舰长欧阳格曾将中山舰开到黄埔，要求邓到舰上去商量要事。季方、严重、张治中等怕有阴谋，劝邓不要上当，邓因此托故未去（见上文）。关于此，陈肇英回忆说：当时曾由他和欧阳格“具函请军校的重要共党分子来舰谈话，而后予以扣押或驱逐出校”。见其所著《八十自述》。

之处。

从1926年1月起，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就在广州和香港散布谣言。第一次说李济深阴谋倒蒋，广州并发现以四军名义指蒋为吴佩孚第二，想做大军阀的传单；第二次说第一军要缴四军的械；第三次说，二、三、四、五各军与海军联合倒蒋；第四次说，蒋介石对俄械分配于各军不满，将驱逐俄顾问全体回国；第五次说，蒋介石倒汪。^①如此等等。很显然，散布这些谣言的目的在于制造广东国民政府内部的不和，煽起蒋介石心中疑忌的火焰。事实上，它们也确实起了作用。这一点，前引蒋介石日记已有充分的证明。蒋介石之所以在那样一个特定时刻对中山舰采取镇压措施，应该说，西山会议派和伍朝枢的谣言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邹鲁把中山舰事件完全说成是西山会议派和伍朝枢的“功劳”也并不全面。其中还有柳亚子、陈独秀所指出的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作用。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发端于1925年6月的中山学会，其核心人物为王柏龄、贺衷寒、潘佑强。这一组织成立后，即与西山会议派相勾结，阴谋反对国共合作。其间的联络人就是时任国府委员，兼任广州市市政委员会委员长的伍朝枢。李之龙说：“这种组织（指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笔者）在广州的主要工作，最初是對抗青年军人联合会，其后经伍朝枢、吴铁城之介绍，遂与西山会议派结合，遂受其利用而扩大为倒汪、排共、仇俄之阴谋。他们在广州发难，领过了上海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数万元之运动费，陈肇英领了一万五千元，欧阳格领了五千元。”^②中山舰事件发生前，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异常活跃。王柏龄很早就到处散布汪精卫反蒋。^③2月22日，蒋介石日记中有王柏龄进谗的记载。3月17日早晨，王柏龄在黄埔军校校内又散

^① 李之龙：《汪主席被迫离职之原因、经过与影响》，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印发；参见《邹鲁、胡毅生秘密到港》，《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16日。

^② 李之龙：《汪主席被迫离职的原因、经过与影响》。

^③ 《包惠僧回忆录》，第204页。

布说：“共产党在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①王柏龄并在他的部队内，对连以上军官训话，要他们“枕戈待旦”，消灭共产党的阴谋。^②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上午议事。所受苦痛，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入地狱耶！”显然，蒋介石的这段日记和王柏龄的谣言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正是在这一状况下，作为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之一的欧阳钟出面假传蒋介石命令，诱使李之龙出动舰只，以便和王柏龄的谣言相印证。他的活动是整个阴谋的组成部分。关于此点，如果我们将几个有关回忆录综合起来考察，就可以真相大白。陈孚木写道：“那时伍朝枢所说的俄国商船已经到达，起卸军械之后，停在黄埔江面。一连几天，没有什么动静。于是，王柏龄便与欧阳格商量，决定‘设计诱使中山舰异动’。”^③章臣桐写道：“在三月十八那一天，欧阳格打电话给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副官欧阳钟（欧阳格之侄），叫他用办事处的名义向海军局要一只得力兵舰开往黄埔，说是校长要的。所谓得力的兵舰，即暗指中山舰而言。”在章臣桐接到李之龙命令，上舰升火试笛之后，“欧阳格就在蒋的面前报告说：‘中山舰已出动，正在开往黄埔，听说共产党要抢黄埔的军火’。”^④自由舰舰长谢崇坚也有类似回忆。他说：“三月十八日欧阳格侦知中山舰上发生混乱，戒备不严，有机可乘，密令欧阳钟伪称接到校本部电话，通知海军局立派一艘得力军舰，驶往黄埔听用。据说十九日上午中山舰在东堤起锚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立即向蒋介石控告，说海军李之龙异动，已出动中山舰要逮捕校长，夺取军火。”^⑤这就

① 马文车：《中山舰事件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②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05页。

③ 《国民党三大秘案之一》，连载之十八，《热风》第85期。

④ 《中山舰事件》，《上海文史资料》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⑤ 《中山舰事件亲历记》，《上海文史资料》第19辑。关于欧阳格谎报共产党要“抢黄埔的军火”一事，还可从蒋介石当时的活动中得到佐证。据民生舰舰长舒宗肇及黄埔军校军械处长邓士章回忆，3月19日（原文误记为3月18日），

很清楚了：欧阳格与王柏龄定计之后，一面唆使欧阳钟矫令，一面向蒋介石谎报，其结果便演出了震惊中外的“三·二〇”的一幕。

中共很快就对孙文主义学会在中山舰事件中的作用有所了解。当年5月，上海区委主席团开会，有人报告说：“中山舰问题，纯由孙文主义学会的挑拨而成。”^①多年以后，王柏龄曾得意地说：“中山舰云者，烟幕也，非真历史也，而其收功之总枢，我敢说，是孙文主义学会。”^②这不啻是自我招供。

偶然中的必然

就蒋介石误信伍朝枢、欧阳格等人的谣言来说，“三·二〇”事件有其偶然性；但是，就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状况来说，又有其必然性。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左、右派力量都有所发展。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左派的胜利。会议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实际上主持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进一步阐明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持了“一大”的革命精神。会议选出的中央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员占7人，国民党左派占15人。在随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中，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工作。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中大约已有一千余名共产党员。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人担任。一军三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

他们曾接到“紧急通知”，要把黄埔库存的军火迅速装上民生舰，计三八式步枪一万支，俄式重机枪二百挺，装好后停泊与新洲海面。事后，蒋介石并登舰检查，对舒宗鎣说：“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把军火交给任何人。”见覃异之《记舒宗鎣等谈中山舰事件》，《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如果没有欧阳格的谎报，蒋介石是不会这样将军火搬来搬去，折腾一气的。

①《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报告政局、党的策略及内部组织问题》。

②《黄埔创始之回忆》，《黄埔季刊》第1卷第3期。

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七个是共产党员。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群众基础也大为加强。当时，有组织的工人队伍约10余万，农会会员约60余万，其中工人武装纠察队2千余人，农民自卫军3万余人。

苏俄顾问团这一时期也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顾问团向苏俄驻华使馆报告说：“总参谋部是军事委员会的专门组织。罗加乔夫，我们的军事指挥者（团长助理）实际上担当总参谋长”；又说：“我们的顾问事实上是所有这些部门的头头，只不过在职务上被称为这些部门首领的顾问。（1925年）12月末，我们的顾问甚至占有海军局长（斯米诺夫）和空军局长（列米）的官方位置。”该报告又称：“现存的国民党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它的计划、章程、工作都是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下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标准制订的，只不过使它适合中国国情罢了。直到最近，党和政府一直得到我们的政治指导者的周密的指导，到目前为止，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当我们提出一项建议时，不为政府所接受和实行。”^①

汪精卫也表现为前所未有的左倾。据张国焘回忆：他“一切事多与鲍罗廷商谈”^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前夕，莫斯科来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内容为反对帝国主义，汪精卫还没有读完就说内容很好，可作大会宣言的资料。在会议召开期间，汪精卫多次强调共产派与非共产派在历次战役中，热血流在一起，凝结成一块，早已不分彼此。既能为同一目的而死，更可为同一目的而生存下去。^③在选举中央委员以前，他预拟了一份名单和中共商量，其中左派以及和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④1926年2月1日，

① Document 22, Wilbur and How: *Document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pp.245-247.

② 《张国焘回忆录》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第82页。

③ 《张国焘回忆录》第2册，第82-83页。

④ 《张国焘回忆录》第2册，第85页。

他在中执会常委会会议上，提议任命周恩来为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为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为第三军副党代表。5日，又提议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①2月22日，他在纪念苏俄红军成立八周年联欢会上，继季山嘉之后发表演说，声称：“吾人对于如师如友而助我的俄同志，真不知如何表示其感激之情，惟有镌之中心而已。”^②对于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之间的冲突，他也鲜明地左袒，曾命令王懋功“严厉制止”孙文主义学会的游行。^③3月初旬，他又召集两会会员训话，激烈地批判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共倾向，曾称，“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④

国民党右派不能容忍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俄顾问影响的增强，不能容忍汪精卫的左倾。西山会议派称：“现在的国民政府，名义上是本党统治的，事实上是被共产党利用的。”又称：“俄人鲍罗廷操纵一切”，“军政大权已完全在俄人掌握之中。”蒋介石虽然因依靠苏俄供应军械而仍然主张联俄，对共产党也时而表现出愿意合作的姿态，但在内心里，却早已滋生出强烈的不满。3月8日日记云：“上午与季新兄商决大方针。余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实权皆不宜旁落，而与第三国际必能一致行动，但须不失自动地位也。”9日日记云：“吾辞职，已认我军事处置失其自动能力，而陷于被动地位者一也；又共产分子在党内活动不能公开，即不能相见以诚，办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内部分子貌合神离，则未有能成者二也。”4月9日，蒋介石在复汪精卫函中也说：“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事事陷于被动，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会常委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464—465、471页。

②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24日。

③ 王懋功：《致张静江书》，原件，1926年3月7日。

④ 转引自蒋介石：《复汪精卫书》，原件，1926年4月9日。

余地。”这一切都说明了蒋介石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必不可免，即使没有右派的造谣和挑拨，蒋介石迟早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的。

原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略有增订。

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

战争是一门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既需要正确的战略，也需要正确的政治策略与之配合。1926至1927年的前期北伐战争是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援助下由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其战略、策略的制订者有蒋介石、鲍罗廷、加伦、张静江、谭延闿、陈独秀等人。本文将着重考察这一时期蒋介石在制订和执行有关战略、策略中的作用，借以推进对北伐战争和蒋介石其人的研究。

关于北伐时机

发动战争必须选择恰当的时机。这一选择的正确与否，常常影响战争的胜负以至结局。

1925年12月第二次东征结束后，蒋介石即有意于北伐，设想在次年8月克复武汉，年内打到北京。1926年1月4日，他发表演说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①6日，他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乐观地宣布：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第503页。

“国民革命的成功，当不在远。”^①2月24日，他向广东国民政府提出，早定北伐大计。

在北伐时机上，蒋介石和苏联军事顾问团、苏共中央、鲍罗廷以及陈独秀等人的意见相抵触。1926年初，苏联军事顾问团即向苏联驻华使馆报告，认为：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成员复杂，经常摇摆；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权力过大，部分人可能反叛政府。^②3月2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广东政府应该竭其全力进行土地改革、财政改革、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动员广大人民参加政治生活，加强自卫能力。决议明确声称：“在现时期，应当着重抛弃任何军事讨伐的念头，一般说来，应当抛弃任何足以惹起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行动。”^③此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多次作出类似决定，如4月1日决议云：“广州（政府）不应占领广州地区以外的目标，而应在现阶段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工作。”4月15日决议强调上述指示“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④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也于4月27日决议：“致函中共中央，说明目前提出广州进攻的问题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宣传角度来说都是错误的。”参加会议的中共党员蔡和森并建议，由共产国际致函中国方面，“批评广州政府提出的关于组织北伐的建议”。^⑤直到5月6日，苏共中央的口气才有所松动，同意派遣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去保卫湖南，但不久就再度严厉起来，要求在广东的中共成员坚决谴责广州政府“在目前进行北伐或准备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代大日刊》第18号，1926年1月9日。

② Report o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rmy and the Kuomintang, Early 1926, C. M. Wilbur and J.L.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613-614.

③ Problems of Our Policy with respect to China and Japan, Leon Trotsky on China, Monad Press, New York, 1976, pp.107-108.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191、203页。

⑤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228、230页。

北伐”。^①

鲍罗廷积极贯彻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上述决议，他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力陈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以保证北伐的结局有利于革命。5月1日，他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达4小时的谈话，对北伐多所争执。但是，蒋介石坚持己见，争论以鲍罗廷的妥协告终。

蒋介石的主张得到部分中国将领的拥护。当年3月18日，军事委员会即议决进行北伐准备。同月30日，冯玉祥的代表马伯援到达广东，表示国民军愿与国民党合作，希望集中革命力量，向长江发展。此事加强了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将领的决心。4月3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建议：“整军肃党，准期北伐”。建议书分析国民军退出京津以后的形势，认为“以后列强在华，对于北方国民军处置既毕之后，其必转移视线，注全力于两广革命根据地无疑，且其期限，不出于三月至半年内也”。^②他提出，在三个月内，即在国民军未被消灭，吴佩孚的势力尚未十分充足之际，出兵北伐。其时，江西方本仁的代表蒋作宾也到达广州，声称国民政府倘能于近期北伐，江西可不劳而获。4月16日，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议决由蒋介石、朱培德、李济深三人筹拟北伐准备计划，由宋子文筹办军饷。同月20日，赴湘联络唐生智的陈铭枢、白崇禧回粤，向军事委员会报告，联络成功：“将来实行协同出师北伐，当收事半功倍之效。”^③这些，使原来对北伐持谨慎态度的将领也乐观起来。在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等人的一再催请下，军事委员会于5月29日会

①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241、268页。此后，类似的意见存在了很久，如，6月21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称：“在广州内部业已形成的形势下举行北伐是有害的。”维经斯基甚至肯定，“依我看，北伐必然遭到失败。”见上书第307、309页。

② 《蒋校长建议中央请整军肃党准期北伐》，《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54页。

③ 《赴湘代表陈铭枢、白崇禧回粤》，《申报》，1926年4月28日。

议决定，命第七军刻期出发援湘，北伐大计遂决。

尽管北伐已经见之于实际行动，但是，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意见仍然并不一致。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曾议决，当时的第一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①但是，也有部分共产党人认为，南方革命阵营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首先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两种意见并存的结果是摇摆不定。6月下旬，派赴广州调查中山舰事件真相的张国焘、彭述之回到上海，中共中央一度倾向于进行北伐，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的唯一出路”。^②然而没过几天，中共中央的态度又大幅度改变。7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发表文章，认为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的全部意义。他说：“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文章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当前的问题是防御吴佩孚南伐，防御反赤军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③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独秀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认为广东国民政府出兵，只能是“防御反赤军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彻底北伐”。^④9月13日，陈独秀又在答辩文章中说明，北伐成熟的标准一为“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文章特别提出，当时孙中山的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政策，“都几乎推翻了”，“这样来革命，

① 《国民党工作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60页。

② 文件63、6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317、321页。

③ 《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向导》第161期。

④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向导》第163期。《中央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第153页。

其结果怎样呢！”^①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已经牢固地掌握了领导权，中共的权力、活动受到限制，在这一情况下北伐，不能确保其结局有利于工农，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陈独秀关于仓促北伐的危险有一定见地。但是，1926年上半年，吴佩孚正集中力量在北方进攻国民军，无力南顾；湖南实力派唐生智又驱逐赵恒惕，倒向广州国民政府，因此，这一时机对保证北伐的军事胜利又是有利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各个击破与远交近攻

北伐前，中国存在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集团。同时，在西南、东南、西北、中原等地还存在着若干军阀小集团。这些集团既彼此争斗，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勾结。如何利用矛盾，因势利导，分化联络，确定打击的先后主次，是北伐出师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从1926年初起，蒋介石就在考虑北伐战略问题。1月11日日记云：“联络东南，然后直出武汉为上乎？或统一湖南，然后联络西南、东南，而后再问中原为上乎？其或先平东南，联络西南，而后再问中原乎？殊难决定也。”^②最初，他倾向于同时攻占湖南和江西，但加伦将军则主张各个击破，先取两湖。6月21日，军事委员会接受加伦提出的北伐计划。^③7月1日，蒋介石下达北伐部队动员令，宣布其进军计划为“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④。随令

① 《向导》第171期。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1月11日。

③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16—417页；关于军事委员会的开会日期则据《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2，第88页。

④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1页。

颁发《集中湖南计划》，规定以第七军李宗仁部、第八军唐生智部、第四军陈可钰部进攻长沙，以第二军谭延闿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六军程潜部防备江西。这就表明，蒋介石接受了加伦的“各个击破”战略。

根据“各个击破”战略，北伐的首攻目标是吴佩孚。为了与这一战略相配合，蒋介石和广州国民政府又采取远交近攻策略。

对孙传芳，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最初企图“收抚”，承认其地位，与之共同夹击吴佩孚；后来则企图使之保持中立。

孙传芳与吴佩孚同为直系。1925年10月，自任浙、苏、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旋又被吴佩孚委任为江苏都督。浙、苏等省是中国的富庶之区。孙传芳虽有进一步扩张地盘的野心，但最为重视的是保持现有势力范围。他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后，即多次派人赴粤“修好”。北伐出师前夕，孙传芳派人向蒋表示，如能答应不进攻江苏与浙江，则孙军不反对国民革命军占领江西；在国民革命军占领汉口后，孙传芳可以参加未来的政府。^①北伐开始后，孙传芳改变主意，向蒋介石提出，希望不用北伐字样，不侵犯福建与江西。蒋介石则要求孙传芳摆脱和吴佩孚的关系，倒向粤方，并以承认孙的“五省总司令”地位相许。^②8月，蒋介石指令驻沪代表何成浚和孙传芳接洽，要求孙有确切表示，或提出加入国民政府的具体条件。^③8月下旬，何孙在南京会谈。何成浚提出：由广州政府委派孙传芳为东南五省首领，要求孙军自江西西进，会同国民革命军夹击湖北，会师武汉。孙传芳则要求国民革命军退出湖南，将湖南作为南北缓冲地带。^④会谈中，

① 文件7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364页。

② 《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3，第77页。

③ 《蒋介石致何雪竹电》，1926年8月18日，台湾《近代中国》第23期，1987年6月30日。

④ 《何成浚致谭延闿密函》，1926年9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粤蒋代表何成浚之谈话》，《申报》，1926年9月4日；何成浚：《八十回忆》，《近代中国》第23期。

孙传芳表示，赞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但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对何成浚的具体意见则始终不答复。^①9月初，张群再次赴宁谈判。孙传芳表示，不能接受国民政府的任命，但又同时声称：愿保持和平与中立。孙的左右手杨文恺则提出办法三条，其内容为：在现下不犯人其辖境；将来与广东国民政府立于对等地位，商量收拾全局；粤方“须表明非共产”等。^②自然，这些条件，广东国民政府也不能接受。

湘赣互为犄角。北伐军的作战特点是长驱直进，夺取大城市，自然，不能不顾虑侧翼的安全。7月11日，北伐军克复长沙。24日，唐生智在长沙召集第四、第七、第八各军将领会议，研究下期作战计划。唐生智、李宗仁主张同时进攻鄂、赣，第七军第二路指挥官胡宗铎则主张迅速进取武汉，对江西暂取监视态度。^③会议结果，通过了唐、李主张。^④8月5日，蒋介石在湘南郴州与加伦、白崇禧等会议，研究唐、李送来的意见书。加伦顾虑到武昌时会遇到帝国主义的阻碍，主张多加兵力，先攻武汉，对江西暂取守势，蒋介石赞成加伦的意见。^⑤会议决定，以第一、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军担任洞庭湖以东之线，为主攻，以第十军担任洞庭湖以西之线，为助攻，仅以少数兵力监视赣西。^⑥12日，蒋介石抵达长沙，当晚即召开有加伦、白崇禧、唐生智、李宗仁、邓演达、朱培德、陈可钰和黔军袁祖铭的代表等20多人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会上，蒋介石重提攻鄂、攻赣先后问题，征求与会者意见。会议经过反复讨

① 《粤蒋代表何成浚之谈话》，《申报》，1926年9月4日。

② 《何成浚致谭延闿密函》，1926年9月7日。

③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卷2第1编第四章。

④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北伐阵中日记》，1926年8月2日，《近代稗海》第1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45页。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8月5日。

⑥ 《北伐阵中日记》，1926年8月6日，《近代稗海》第14辑，第64页。

论，决定仍依出师前原定方案进行。^①蒋孙之间的谈判虽然未能取得成效，但它延缓了孙传芳援助吴佩孚的军事行动；在湘鄂战场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对江西取守势，也保证了北伐军得以集中兵力，首先击溃吴佩孚军阀集团。

对于张作霖，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采取“联盟”政策，力图离间奉系和吴佩孚、孙传芳的关系。

1926年7月，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的李大钊、李石曾等通过叶恭绰等人与张学良交涉，要求奉方断绝对吴佩孚的军火接济，并在广东国民政府和奉系之间建立反对吴佩孚的联盟。^②同时，谭延闿也派奉军总参议杨宇霆的同学杨丙赴奉联络。^③1922年至1924年期间，孙中山曾和张作霖、段祺瑞等缔结反直同盟，杨丙到奉后重提旧事，希望建立新的联盟。杨对张作霖表示：“两家事实，原无冲突，三角同盟，久有联络”，“此番用兵之原因，只全在吴一人”。^④奉方同意：与国民政府之间“互以实力（兵力弹械）相助，并规定切实联络办法”；在孙传芳出兵援赣的情况下，奉系出兵攻取南京；政治问题，如五权宪法、国民会议本是孙中山主张，有协商地步；双方用对等协商方式或各派专使负责讨论方案，由双方当局签字。但是奉方提出的条件则很苛刻：（一）湘、鄂、浙、川、滇、黔、两广，统由西南悉心支配，及设法收拾联络，苏、皖及黄河流域，统由东北支配，负责收拾。（二）未来选举，正属北，副及第一期国务总理属西南，委员则尚待商。这就是说，奉系要与国民政府分治中国，并由张作霖任总统。奉方提出的其他条件还有：外交背影，互相设法自行疏远，免使由内战而牵动为国际大战；党治行之西南，北方暂难办到。^⑤

①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卷2第1编第四章。

② 《陆山致畏公（谭延闿）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杨丙与杨宇霆同为日本士官学校学生。

④ 《杨丙致谭延闿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⑤ 《杨丙寄来件》，革命文献拓影，北伐时期第5册，《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

8月17日，张静江、谭延闿派蒋作宾赴奉，动员张作霖设法阻止吴佩孚率兵南下，同时合作讨孙，其条件为：南京让与奉系，安徽作为缓冲地，双方各派代表数人协商政治问题。^①9月18日，蒋作宾抵达沈阳，与奉方谈判。奉系和吴佩孚、孙传芳虽有共同的“反赤”关系，但吴、孙的失败有利于奉系的扩张，因此，奉系同意和广东国民政府联合。谈判中，奉方表示：（一）决不援吴，听吴自灭；（二）决不援孙，虽王（占元）、靳（云鹏）等坐此要求，亦不过为口头之敷衍。现已令张宗昌赴鲁，相机出动，无论如何，不使孙全部力量对北伐军作战；（三）以后政治结合，俟孙解决后再商量。奉方再三表示，对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绝不反对。^②同月，蒋作宾派汤荫棠携带致谭延闿密函南归，内称：“此行已得圆满结果。”^③下旬，蒋作宾南归，携回杨宇霆、张作霖致张静江、蒋介石、谭延闿等人函件，其中，张作霖追述奉粤合作历史，声称“时事益棘，非得海内二、三豪杰而合力挽救，不足以奠国本”。^④张、谭等接信后认为：“中国混乱已久，不可失此唯一之良机”，建议于“最短时间成立具体协定，解决大局”。^⑤鲍罗廷也同意张、谭的意见。一时间，广东国民政府与奉系的关系似乎再次热烈起来。^⑥

蒋介石支持和奉系结盟。当年8月，国民党宣传品中出现

① 《张静江、谭延闿致蒋介石函》，《蒋中正总统档案》。

② 《蒋作宾致蒋介石函》，《蒋中正总统档案》。

③ 谭延闿手抄《蒋作宾致谭延闿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 《杨宇霆致张静江等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⑤ 《张静江、谭延闿致李石曾等电》，《蒋中正总统档案》。

⑥ 广东国民政府和奉系的谈判进行得很秘密，但还是有所泄露。9月21日，张宗昌、韩麟春、张学良联名致电张作霖：“顷闻蒋介石处派代表蒋作宾到奉，商洽一切，倘为他方所闻，不免滋生误会，摇动大局。如该代表到奉时，务乞严密拿办，立予枪毙，以表示我方坚决不挠。”23日，张作霖复电，声称确有蒋作宾来奉之说，“当即注意，久未来见，详细调查，闻已潜行离奉。想知我方对彼意思不良，不敢来见也”。张作霖要张宗昌将此意转告孙传芳，以安其心。见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电》第3册，中华书局，1987，第128-129页。

“打倒张作霖”字样，蒋介石立即致电纠正：“中央议决，此次独对吴攻击，而不与张。今本部兼言张逆，殊违中央方针。”^① 10月中旬，蒋介石估计江西战事即将结束，准备制订向长江下游进军，彻底消灭孙传芳集团的计划。他希望奉系出兵，夹击孙传芳。同月16日，蒋介石致电张静江、谭延闿，要他们询问奉方“究能何时出兵入苏”，电称：“应催奉方从速对南京出兵，并表明此间非歼除孙传芳决不终止，望其同时夹击，则收效更速。”^② 12月7日，蒋介石、鲍罗廷、徐谦、宋子文、孙科等在庐山会议，决定“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③ 16日，蒋介石接杨丙函，得悉奉方“毅然与革命军为敌”的情况，估计与奉方的大战即将爆发。但是，为了首先消灭孙传芳集团，蒋介石仍然希望与奉方缓和。18日，蒋介石致电鲍罗廷，同意在奉方“有重要人员来商，或有缓和希望”时，派孙科、蒋作宾赴奉。^④

中共中央在10月份才得知国民政府和奉系的谈判情况，当时奉方提出的条件已进一步发展为：1. 承认张作霖为总统，取消国民政府；2. 粤、贵、川、黔、湘、鄂、闽、赣、浙、滇等十省归粤，苏、皖归奉；3. 川、滇由蒋介石自由解决，冯玉祥、吴佩孚由奉方自由解决。^⑤ 这些条件较之杨丙正式传递回来的条件还要苛刻，因此，中共中央认为“十分奸险，绝无容纳之余地”，主张一面拖延时间，一面调兵入赣，迅速解决孙传芳之后再与奉系谈判。后来又建议：1. 在奉系势力之下，各地一切政治设施，奉张均可自由为之，即张要做总统也不反对；2. 奉方如不进攻国民

① 《蒋介石致军人部曾秘书电》，《蒋中正总统档案》。

②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65页。

③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18页。

④ 《蒋介石致宋子文转鲍罗廷电》，《蒋中正总统档案》；参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43、52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419、478页。

军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也不反奉。3. 江苏、安徽地盘归属问题，视哪方面的军队先取为断。如奉方先取，可以属于奉方。^①

当时，奉系正积极向南扩张，企图从孙传芳、吴佩孚、靳云鹗等人的手中抢夺江浙、河南等地，因此，也想与国民革命军“缓和”。约在1927年1月间，杨宇霆邀李石曾会晤，声称：“奉军即入河南，解决吴、靳各部”，表示在占领武胜关后将与北伐军议和。杨并约李石曾与他同伴出京，转赴南方主持和议。^②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出面劝说国民政府与奉方实行南北分治。李大钊表示，国民政府方面“极欲与奉方谋和平”，但是，他对奉方的和平诚意表示怀疑，询问日方“对奉天有没有把握使之不对南作战”？^③

由于奉方胃口太大，要求太高，通过多渠道进行的对奉谈判最终都没有结果。1927年3月，李石曾曾说：“奉系军阀杨宇霆要与我们妥协，五六个月来派人来说话，也非止一次，但是条件终是做不到一路。我同守常君商量，有时大家都发笑。我屡次不愿理它了，倒是守常君几次嘱我与他委蛇。守常以为我们打仗，胜负未可定，把奉天和缓住了，亦很好。”^④

尽管与奉方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但是，张作霖也没有给予吴佩孚以实际援助。口头上，张作霖信誓旦旦，一再对吴佩孚表示，要共同讨赤，合作到底，并保证提供吴所急需的100万发子弹，实际上，却一再“延宕”、“敷衍”，吴佩孚连一粒子弹都没有得到。^⑤1927年春，张作霖又不顾吴佩孚的强烈反对，毅然派兵南下，强占了吴佩孚恃以再起的根据地河南。

国民革命军出师时，兵力约10万余人，实际作战兵力仅有5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08、419—420页。

②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1024页。

③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第1031页。

④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25日。

⑤ 《于国翰致张学良电稿》，1926年10月1日；参见《张景惠等复何恩溥电稿》，1926年10月11日，《奉系军阀密电》第3册，第108、109页。

万人。^①三大军阀集团的联合力量远远超过国民革命军，如果彼此联合，国民革命军将难以应付。根据情况，利用矛盾，远交近攻，将消灭三大军阀集团的任务分解为几个阶段，在打击第一阶段的敌人时，暂时与第二、第三阶段的敌人联盟，以利于各个击破，这一战略是正确的。

保护侧背，转战江西

按照北伐出师前的决策，第一步是打下武汉，第二步是进取河南，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关于江西，在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有过讨论，但未作出正式决定。当时，蒋介石认为占领江西，对前方、后方都有利；鲍罗廷赞成蒋的意见，认为如不占领江西，战线就过于狭窄，不能防御各方面的进攻。^②8月27日，国民革命军占领汀泗桥，蒋介石即部署进攻江西。

当日，蒋介石电告程潜，决于9月1日对江西实行攻击。29日，蒋介石决定亲自指挥江西战事。31日，北伐军击溃吴军主力，占领贺胜桥。同日，蒋介石和加伦商量。加伦当时在攻克武汉后是进取河南还是回兵江西问题上方针未定，处于矛盾状态。^③其顾虑是：如果“取江西，必与孙传芳冲突，同时英帝国主义为维持其长江势力，亦必出死力帮助孙传芳”；“如果放弃江西，一直进攻吴佩孚，先联络樊钟秀取得河南，再同国民军联络，抛弃长江下游，只向内地发展，这样做固然有这样做的好处，但是，战线太长，江西、福建都可以从侧面进攻，很有后顾之忧；对于军事上也有不利的地方。”^④尽管如此，蒋介石决心已

^①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8，第233页。

^② 文件7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364页。

^③ 《中央局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第68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36页。

下。^①9月2日，命第二军鲁涤平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六军程潜部协同动作，三天后进攻。

这一决策的改变主要由于孙传芳态度的变化。北伐军向湖南进军后，孙传芳一面与广东国民政府谈判，讨价还价，一面坐山观虎斗，准备在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的时候，出而收渔人之利。8月中旬，孙传芳觉得形势有利，又经杨文恺等劝说，决定出兵援赣^②。同月下旬，孙部10余万人陆续到达赣北。月底，孙传芳任命卢香亭为援赣军总司令，同时下达进攻计划：以皖军王普部为第一军，进攻通山、岳州；以苏军为第二、第三军，进攻平江、浏阳；以赣军邓如琢部进攻醴陵、株州；同时命闽南周荫人部进攻广东潮州、梅县。^③这样，不仅广东革命根据地受到威胁，而且进攻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的侧背也处于孙军的攻击目标之中。孙军随时可以截断北伐军和广东的联系，使之处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

其二是和唐生智的矛盾。长沙军事会议后，第八军的实力迅速扩充。由唐生智指挥主力第四、第七、第八军夺取武汉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一路节节胜利，出现了“武昌指日可下”的形势，蒋介石急于另辟战场并迅速取胜，以提高自己的威望。8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余决心亲督江西之战，以避名位”，正是这一心情的曲折表现。^④其后，在进攻武昌过程中，蒋介石和唐生智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以至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9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接孟潇总指挥函，其意不愿余在武昌，甚明也。”14日日云：“余决离鄂赴赣，不再为冯妇矣，否则人格扫地殆尽。”^⑤这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8月31日：“与加伦将军谈天一次，彼对攻赣尚有犹豫之意，而余则决心入赣矣。”

② 《何丰林致张作霖电》，《奉系军阀密电》第3册，第96页。

③ 《孙传芳世电》，《申报》，1926年9月19日；参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19页。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8月29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9月14日。

样，他终于在17日离开湖北前线，并于19日到达江西萍乡，开始指挥江西军事。

为了松懈孙传芳的作战意志，指挥江西军事期间，蒋介石一面部署进攻，一面继续与孙传芳谈判。孙传芳曾提出，双方于10月3日停战，恢复原状。同月14日，蒋介石复电孙传芳代表葛敬恩等，要求孙先行确定撤退援赣军队日期，同时邀请江浙和平代表蒋尊簋、魏炯诸人到前方面商。23日，葛敬恩、魏炯在奉新会见蒋介石，声称孙传芳“可放弃闽、赣，惟须保江、浙、皖，暗中结约，共同对奉，商妥后，即由赣撤兵”。^①加伦主张“表面答应，实则准备总攻击”。蒋介石与邓演达商量之后提出：1. 浙江归国民革命军；2. 江苏、安徽作为孙传芳的势力范围，但应允许国民党自由宣传；3. 孙传芳撤退援赣之兵前一日为停战之期。^②28日，蒋尊簋自南昌抵达蒋介石行营所在地高安，表示只要保持孙传芳的五省总司令的头衔，其余皆可商量。蒋介石坚持要求孙传芳首先确定撤兵日期，限于11月1日前答复。^③至期，孙传芳没有回答，战事再起。11月8日，北伐军攻入南昌。11月9日，江西战役结束。孙传芳的第一、第二、第三方面军歼灭殆尽。孙传芳率残军逃往长江下游。

蒋介石率军入赣，改变了原定计划，但是，这一改变有其战略需要。由于吴佩孚的主力大部已在贺胜桥被击溃，另一部分被包围于武昌城内，因此，这一改变没有影响战争局势。

围城强攻的教训

战争是两军军力的较量，着重点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战争中当然也要攻城掠地，但那应该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

^①《特立同志由汉口来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10月24日。参见《蒋介石致张静江、谭延闿电》，《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109页、117页。

^③《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10月29日。

果。在敌人的有生力量还很强大，或者在条件还不具备时勉强攻城，都必然损兵折将，导致失败以至惨败。

北伐战争中，蒋介石有过两次围城强攻，导致失败的教训。

一次是1926年9月至10月的武昌攻城战。9月2日，北伐军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军、第七军等开始进攻武昌。武昌城垣高大，易守难攻，进攻未能奏效。9月3日，蒋介石偕白崇禧、加伦等人到洪山麓视察。蒋介石自恃有东征时惠州攻城的经验，决定第二天拂晓，由第一军第二师“带头冲锋”，各军“跟着冲上去”。^①第一军第二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出师以后一直作为预备队。蒋介石此举，意在让自己的嫡系取得头功。当日，召集各将领紧急会议。唐生智对第一军第二师的战斗力已丧失信心，坚决要求蒋介石将该师调离前线，蒋介石认为唐“以下凌上”，是一种不能忍受的“奇辱”。^②他训斥第二师师长刘峙说：“如不争气，不能见人！虽积尸累城，亦所不恤！”^③5日凌晨，蒋介石颁发第二次攻城计划，指示各将领“肉搏猛冲”。^④各军奋勇队多次冲到城下，都被城上守军的密集火力击退。刘峙唯恐其他部队已攻城得手，为抢夺头功，竟通报称，第二师第六团已攻进城内。^⑤第四、第七军得讯后，调动预备队再次进攻，结果又付出许多伤亡。当日上午，蒋介石得到第二师入城消息，信以为真，非常高兴。后从白崇禧处得知，消息不确，“不胜愁虑”，自称“有生以来，愧悔愁闷，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⑥

北伐军两次攻击武昌失利，伤亡2000余人。9月5日，蒋介石和李宗仁、陈可钰等到前线视察后，也感到硬攻无望。6日，

① 唐生智：《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文史资料选辑》总10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第177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9月4日。

③ 同上。

④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15页。

⑤ 《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第80页。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9月5日。

蒋介石和各军将领会议，决定以少数兵力在城外对敌保持警戒，主力撤到城外较远的地区集结整顿。15日，北伐军发布封锁令，禁绝武昌城内外的一切水陆交通，实行长期围困。至10月10日，吴军发生内变，北伐军攻入城内，历时46天的武昌攻城战胜利结束。

第二次是1926年9月和10月的南昌攻城战。

蒋介石决定进军江西后，北伐军迅速占领萍乡、赣州、修水等地。在胜利的鼓舞下，蒋介石于9月12日电令朱培德，要求他从速督军，“猛进南昌”。^①当时，敌军主力正在樟树布防，与北伐军第二、第三军相持，南昌城内守敌很少，第六军军长程潜变更原定攻击德安和涂家埠的计划，于9月19日奇袭南昌得手。其后，敌军迅速由南北两面来攻。程潜感到孤城难守，下令撤离，旋即陷入包围，结果，第六军受到巨大损失。

10月9日，蒋介石以自湖北调来的第一军第二师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第二次进攻南昌，守敌退入城内固守。12日，蒋介石赶到南昌，与白崇禧、鲁涤平会商。白崇禧反对围城硬攻，但蒋介石求胜心切，亲往北门第二师阵地，决定夜半爬城。当夜，第二师正在作攻城准备之际，敌军敢死队从城下水闸中破关而出，袭击攻城部队。时值黑夜，不辨虚实，第二师秩序大乱。白崇禧下令全军沿赣江东岸南撤，由事先搭好的浮桥渡江，退往西岸。^②此役，蒋介石自感指挥无方，既烦恼，又紧张，“终夜奔走，未遑休息”。^③混战中，部队及装备受到很大损失。13日，蒋介石下令撤围。他在日记中悔恨地写道：“因余之疏忽鹵莽，致兹失败，罪莫大此，当自杀以谢党国。”不过，他并没有执行的意思，自己又补写了一句：“且观后效如何。”^④

① 《民国十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29页。

② 《李宗仁回忆录》第28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409页。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10月12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10月13日。

再攻南昌的失利使蒋介石冷静了下来。10月14日。他通知各军，暂取守势。他一面决定调第四军及贺耀祖的独立第二师来赣。一面与白崇禧、加伦重订计划，准备第三次进攻。10月下旬，日本军事专家称：“孙军精锐在沿南浔路，南昌只少数军队利用坚城而守，因此，九江、南昌得以相互策应；南军不先向沿南浔路击破孙军精锐以断九江、南昌间之交通，而突然集大兵于南昌城下，久攻而疲，后援不继，敌人则由南浔路更番来援，甚易活动，因此，‘攻城’是南军失策之一云云。”^①中共中央随即

将日本专家的意见转告加伦，加伦、蒋介石等采纳了这一意见。鉴于孙军主力集中在南浔路九江、德安、建昌、涂家埠等地，得交通之便，可以及时转移兵力，相互增援，因此，第三次进攻以截断南浔路，歼灭孙军主力为主，而不急于夺取南昌。11月1日，总攻开始，南浔线及南昌郊外的孙军一一被击溃，南昌成了孤城，守军不战而降。关于蒋介石进攻江西之役的经验，中共中央在有关文件中总结说：蒋介石作战“注意攻城而不先击破敌人在南浔路之主力军，故牺牲极大，北伐军几有覆灭趋势，幸而挽救得快，尚能转败为胜。”^②

顺流而下，继续追歼

江西之战结束后，北伐军的进军方向再次成为国民革命阵营内部争论的焦点。

加伦、鲍罗廷等反对向长江下游进军。其原因，一是不愿和帝国主义列强发生直接冲突；一是担心蒋介石脱离革命。^③中共中央赞同加伦等人的意见，主张为便于北伐军专力向北方发展，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10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82页。

^③ 参见文件7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364页；文件201、268，同上书（4），第227、494页。

可以设法使长江下游地区的各军阀“分头独立”，“成为纷乱局面”，令“帝国主义无法为一致的对付”。^①后来又曾主张守住武胜关以南，不轻易与孙传芳开衅，也不轻易进入河南，而以主要力量统一西南，准备进攻奉系的军力。^②11月8日，蒋介石与加伦商量向长江下游进军问题，加伦认为：继续向安徽、江苏前进，不仅“现在不是时候，并且危险”。加伦建议：利用夏超、周凤岐等地方武装占领浙江，使江苏、安徽成为缓冲地。^③11月9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决定改变攻克江西后不再东下的意见，赞成蒋介石向长江下游进军，完全消灭孙传芳的势力，“至于前进至浙江、安徽为止，抑直到江苏，则应视北伐军的实力及奉军南下的迟速而定”。^④

北伐开始以后，蒋介石集党权、军权于一身，鲍罗廷和中共中央逐渐感到扶持和向蒋介石妥协的失策，力求削弱蒋介石的权力，于是有迎汪运动的展开，企图以蒋汪合作代替蒋介石的个人专权。自此，蒋介石即产生与左派分家，另立门户，分庭抗礼的想法。1926年12月迁都之争发生后，蒋介石的这种想法更为强烈，向长江下游另谋发展的计划也就日渐具体了。

1927年1月1日至7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南昌召开军务善后会议。会上，蒋介石提出向长江下游进军问题。邓演达认为此举是蒋介石“欲在东南别开局面的政治问题”，因此持反对态度。加伦也表示：“用兵东南实在毫无把握，我也不知怎样计划才好！”^⑤但由于蒋介石的坚持，会议决定对河南吴佩孚部暂取守势，对浙江、江苏、安徽的孙传芳等部取攻势。

①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知识出版社版，1987，第150页。

②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36-337页。

③ 《加同志报告》，《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28-29页。

④ 《对于目前时局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41页。

⑤ 陈铭枢：《我为什么要打倒共产党》，《中央》半月刊，1927年6月15日。

会议同时决定：将北伐军分编为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三个作战序列。东路军自闽赣入浙，占领浙江，进取上海，夹攻南京。中路军一部由赣东北进取南京，一部由鄂东北进取安庆、合肥，侧击津浦路敌军。会议期间，蒋介石将有关部署电告何应钦：“闽平后应即以全力入浙，一俟浙局统一，再图苏皖，暂以画江而守，以待时局之变迁。总之，上海不得，则长江形势闭塞，而海内外交通亦难自如，故南京与皖南亦应急谋收复。”^①该电值得注意之点是蒋介石关于北伐的阶段性设想：“河南不得，则中原难定，西北军不能与我联络，阎锡山亦不能表示态度。阎已派代表正式声明，一俟我军入豫，或至津浦路，彼必响应也。中意如此，占河南，南得南京，晋必响应，则奉军危，不出关而不可得。否则攻守亦得自如，北伐乃可告一段落。”蒋介石的这一设想可能与他政治上准备与左派摊牌有关。

江西之战中，孙传芳的主力受到了巨大打击。但是，孙部在长江下游仍保有相当力量，而且，孙部的再生力量很强，经过一段时期，其战斗力即会得到恢复。北伐军沿京汉路北伐，孙传芳部仍可向江西、湖北发动进攻，从而斩断北伐军的南北联系。因而，蒋介石在江西战役之后，趁热打铁，向长江下游进军，除了其政治上的目的外，从战略方面考察，可以追歼孙传芳军阀集团，不使其有喘息修整、卷土重来的时间。中共中央从反对到改取支持态度，正是基于后一方面的考虑。

不为遥制

战争中的形势瞬息万变，很难拘守某一既定的程序和方案。最高统帅既须有原则性，又须有灵活性，特别是赋予下级统帅以一定的灵活性。因此，当下级统帅远离主战场，独立作战时，不为遥制历来是兵家重视的一条原则。

^①《蒋介石致何应钦电》，《蒋中正总统档案》。

9月初，在福建的周荫人接受孙传芳指示，宣布就任五省联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积极企图进扰粤边，进而进攻广州。当时，国民革命军驻防潮州、梅县一带的军队，仅有第一军第三师、第十四师、独立第四师等部，计枪6000支，炮8门，而周荫人所属张毅等部则有枪3万余支，机枪60余挺，炮20余门。^①双方力量悬殊，因此，蒋介石确定作战方案时，力主稳健，要求采取攻势防御，不可急切进攻。9月13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指示其对周荫人声明：“如闽不派兵侵粤与赣，则闽、粤仍敦睦谊。”^②但是，何应钦则认为，由于北伐军在鄂、赣节节胜利，周军士气已馁，又多为北方人，不善山战，更兼竭力搜括，闽民恨之入骨，因此，致电蒋介石，详细罗列周军弱点，要求率师入闽作战。何的要求得到蒋介石同意，福建战役于是开始。^③

北伐战争以军事打击为主，但是，也注重对敌军的策反。由于国共两方的共同工作，周部曹万顺、杜起云两旅于10月8日在粤北蕉岭起义。接着，何应钦又在闽、粤交界的永定、松口取得胜利。15日，蒋介石电任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指示何乘胜平定闽南。19日，蒋介石再电何应钦，告以和加伦研究结果：“如我力能胜张毅，则速进取，否则暂守边境，以待赣局发展”，但蒋介石表示，相信以第一军之力，“必能胜周克闽，新开东南之局”。^④20日，三电何应钦，认为“此刻对闽作战，我已处于主动地位”，要求何“相机处理”。^⑤当时，蒋介石正专注于江西战场，不可能深入地研究福建的情况并指挥作战，因此，只能要求何应钦“相机处理”。何应钦接电后，即积极部署，发兵入闽。周荫人部兵败如山倒。12月3日，东路军收复福州。

①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记略》，武汉印书馆，1930，第19页。

②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4，第32页。

③ 《国民革命军东路战史记略》，第21-22页。

④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92页。

⑤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5，第98页。

浙江之役与福建之役类似，也是不为遥制的成功战例。

1926年12月11日，浙军第三师周凤岐部在衢州起义，奉命进攻富阳，掩护东路军主力进入浙江。当时，东路军主力还在福建，周凤岐部作战失利，孙传芳浙江总司令孟昭月进逼衢州。东路军人浙部队分电何应钦及蒋介石，要求迅速增援。何应钦电告白崇禧称，在不得已时，可以退守浙、赣边境仙霞岭之线，待本部主力到达后，再采取攻势。1927年1月20日，白崇禧到达衢州，召集各将领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衢州无险可守，为使东路军安全集中，必须占领严州以西地区。如等待闽中部队，不免坐失良机。会议期间，蒋介石来电告知：皖南陈调元、王普已表示与我合作，侧背威胁减轻，尽可全力对付当面之敌。^①蒋介石还表示：衢州为战略要点，战守由白崇禧自决。白崇禧获得“自决”权后，即决定转守为攻。^②2月16日，击败孟昭月部。17日，收复杭州。白崇禧仅用了约20天时间，即占领整个浙江。孟部的被打垮，使孙传芳联合奉鲁军，以浙江为基地实行反攻的计划彻底粉碎，为北伐军进攻江苏、安徽，夺取上海、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中国近代史上，北伐战争是一场胜利的革命战争。其所以胜利，原因很多，既和战争的性质、人心向背、国共合作以及国际国内环境有关，也和战略、策略的运用得当有关。这一方面的历史经验，是近代中国军事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原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略有增补，此据拙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收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① 《北伐简史》，〔台北〕正中书局，1968，第105页。

^② 《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第40页。

“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

——追求法治始，破坏法治终

南京政坛的一次强震

自1931年2月上旬起，蒋介石日记中逐渐出现对胡汉民的强烈不满和攻击之词。

2月9日日记云：“见人面目，受人束缚，小人不可与共事也。纪念周时几欲痛泣，而又止，何人而知我痛苦至此耶！”^①这里，蒋介石仅用了“小人”一词，没有点名，但是，这位“小人”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就登场了。10日日记云：“胡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私心自用，颠倒是非，欺罔民众，图谋不规〔轨〕，危害党国，投机取巧，妄〔罔〕知廉耻，诚小人之尤者也。惟余心暴躁发愤，几忘其身矣，戒之！”^②从这一段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认为，“胡某”也者，罪大恶极，他使得蒋介石“暴躁发愤”，“几忘其身”。

其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某”的攻击就接连不断。13日日记指责其“挑拨内部，诋毁政治，曲解遗教，欺惑民众”。^③15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日日记指责其“破坏党国，阻碍革命”，“以‘司大令’（斯大林）自居，而视人为‘托尔斯基’（托洛茨基）”。^①25日日记则称：“今日之胡汉民，即昔日之鲍尔廷（鲍罗廷）。余前后遇此二大奸，一生倒霉不尽。鲍使国民党徒受恶名，而共产党受其实惠。今胡则使国民党受害，而彼自取利。鲍使国民党革命破坏，不能建设，胡则使国民党革命阻碍，不能进取。”^②十几天之中，由“小人”，而“胡某”，而直书“胡汉民”，标志着蒋介石怨愤的迅速加深和增强。

这一时期，胡汉民问题使得蒋介石性情乖戾，难以自制。18日日记云：“近日躁急，恐将僨事。”^③25日日记云：“为胡事又发愤怒。”^④26日日记云：“在汤山俱乐部痛述某之罪状，几为发指。”当日中午，蒋介石与邵力子谈起胡汉民的“罪状”时，再次动情，日记云：“心为之碎，自知失态。”^⑤

也就在25日，蒋介石制订了一个处理胡汉民的14点计划。前4项对胡本人：1. 请胡到家；2. 监视护兵；3. 令警察监视其家；4. 请孙科往见，在“公开审判”和“自行辞职”两者中问胡自愿；同时要胡保荐立法院正副院长，并要胡函慰立法院各委员，使其安心供职；最后将胡迁往中山陵。其他10项为善后，其内容为：明告中央委员；开国民党中央临时政治会议；开中央常务会议，推任立法院院长；由监察委员提起弹劾，令国府紧急处分，严重监视；监察院提起政治弹劾；通告各地党部与各军队等。当然，蒋介石也没有忘记控制新闻，“令各报不准登载中央未发表之消息”。其中还包括“请立法委员组长明午吃饭”一条，考虑得相当周密。^⑥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28日晚，蒋介石以宴客为名，邀请胡汉民到自己的住所晚餐。胡汉民到后，便从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手里得到了一封蒋介石列数其“罪状”并有其亲笔修改手迹的信件^①，又从邵元冲口里得知：“蒋先生想请胡先生辞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坚决要求蒋介石出面，蒋出面后，两人激烈辩论到深夜。第二天，胡汉民具书“辞职”。当日，移送汤山软禁。3月8日，移回南京，仍然处于软禁状态中。

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的胡汉民“被囚”事件。早在同盟会时期，胡汉民就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长期充任孙的助手，堪称“党国元老”。他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长。“事发以后，举世骇然。”^②他的被软禁无异是南京政坛上的一次强震。

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的“党治”与“法治”之争

要了解蒋胡之争，首先必须了解孙中山的有关思想和蒋胡之争的历史环境。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的目标一开始就定位在将中国建设为世界上的头等民主国家。但是，他又认为，这个境界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还在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即将中国实现民主和法治的进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军政时期适用于革命军初起之时，军民共同受治于军法；训政时期适用于三年之后，各县军政府将地方自治权归之于当地人民，由人民选举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员，同时制订约法，规定军政府和人民之间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宪政时期适

^① 《蒋介石致胡展堂书》，原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行文，简称《致胡函》，不一一注明。

^②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中国国民党之复兴》，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印行，1931年9月。

用于全国实行约法六年之后，其特征为制定宪法，由国民公举大总统，公举议员，组织国会，一切国事，均依宪法而行。此后，孙中山对他的“三阶段论”作过多次说明，其大原则虽始终如一，但也出现了某些相异或模糊之处。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迅速制订了相当于宪法的《临时约法》，它规定了此前中国从未出现过的一系列民主原则。但是，曾几何时，《临时约法》即被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扔进了字纸篓。为了捍卫《临时约法》，孙中山曾多次发起护法运动，但是，也均一无所成，护法的旗号反而为曹锟、吴佩孚辈所利用。这种情况，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源远流长和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和当时社会中强大的封建势力。但是，晚年的孙中山总结经验，却认为其原因在于人民没有经过必要的训练，“未经军政、训政两期，而即入于宪政”，他说：“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之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他甚至说：“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①这一时期，他接受苏俄经验，比较多地强调“以党治国”，即所谓“党治”。1924年1月，孙中山起草《建国大纲》时仅云：“（训政时期）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没有出现“约法”二字。^②这就为后来滋生论争留下了缝隙。

1928年6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人所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和平占领北京和天津，奉系军阀退出关外。至此，虽有东北和新疆的易帜问题有待解决，但大体上完成了全国统一。1928年8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宣称军事告终，训政开始。会议决议，遵照孙中山“遗教”，迅速起草并颁布约法。^③10月3

^① 《制定建国大纲宣言》，《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5，第102页。

^②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7页。

^③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534、543页。

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胡汉民、孙科提出的《训政纲领》。该纲领规定：训政期间，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平日则将政权付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该委员会中的政治会议指导国民政府施行重大国务。同日，通过胡汉民等提出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设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其正副院长均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这样，国民党就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以一党专政为特征的政治体制。胡汉民的《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将这一点表述得很清楚，很坦率：“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①次年的有关决议甚至说：“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②

1929年3月13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胡汉民在开幕词中声称：“总理给我们的遗教，关于党的，关于政的，已非常完全，而且事实上都已条理毕具。我们只要去奉行，只要摸着纲领，遵循着做，不要在总理所给的遗教之外，自己再有什么创作。”^③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会议“确定总理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④这样，孙中山思想就被凝固化、绝对化、法律化，而不能允许有任何发展和匡正。会议并就此作出说明，声称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当时就“不惬总理本意”，所以后来总理即“不复以约法为言”^⑤，这就明确否定了训政时期有制定“约法”的必要，也否定了二届五中全会的决议。

胡汉民、蒋介石等推行的“党治”受到了自由知识分子和国

① 胡汉民：《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上海民智印刷所，1932，第416页。

② 《革命文献》第76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78，第82页。

③ 《国闻周报》，第6卷第11期。

④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654页。

⑤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655页。

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以及部分地方实力派的反对。

早在1928年8月，上海48个商业团体就曾组织请愿团，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十项要求，其第一项即是“颁布约法”。^①1929年5月，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批评当时中国社会严重缺乏人权的现象：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招牌，就可以任意侮辱其身体，剥夺其自由，宰制其财产；无论什么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就可以禁止。他要求制订宪法，至少，也应该制订训政时期约法，用以“规定政府的权限”和“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②7月20日，胡适进一步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孙中山手拟的《建国大纲》提出疑问。该文认为，民国十三年孙中山“简直是完全取消他以前所主张的‘约法之治’”。该文由此进一步地批评孙中山“根本不信任中国人民的参政能力”，其言论中有“根本性大错误”。文称：“民国十几年的政治失败，不是骤行宪政之过，乃是始终不曾实行宪政之过；不是不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遽行宪政，乃是始终不曾脱离扰乱时期之过。”胡适明确地要求迅速制订宪法。他说：“我们不相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③

胡适的呼吁受到他的朋友罗隆基、马君武、张元济等人的支持。罗隆基称：“人权破产是中国目前不可掩盖的事实。”他尖锐地提出：“明火打劫的强盗，执枪杀人的绑匪”，其“蹂躏人权”的危害，“远不如某个人，某家庭，或某团体霸占了政府的地位，打着政府的招牌，同时不受任何法律的拘束的可怕”^④。同年12月，胡适将他自己和朋友们的文章编辑为《人权论集》。

① 《商业请愿团请愿书》，上海钱业公会档案，卷66。

② 《人权论集》，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529页。

③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人权论集》，《胡适文集》（5），第539页。

④ 《人权论集》，《胡适文集》（5），第548页。

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批评锋芒直指国民党的“党治”，在当时的思想界掀起了要求民主、人权和法治的波澜。继胡适等人之后，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和地方实力派相结合，进一步掀起批判独裁，要求实行民主和法治的潮流。

国民党三大之后，以蒋介石、胡汉民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掌握中枢，权倾一时，但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和以邹鲁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则处于失势地位。他们以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要求“民主”、“法治”为名，积极进行反蒋活动。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有晋系阎锡山、西北军冯玉祥、桂系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1929年1月编遣会议后，他们的利益、权力、地盘受到损害，因此，力图武力倒蒋。

1930年2月10日，阎锡山首先发难，提出“礼让为国”，要求蒋介石与自己同时下野。3月15日，冯玉祥部鹿钟麟等人通电，拥护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自然，南京国民政府视此为叛逆，下令通缉阎锡山，并于5月1日发布讨伐令，持续6个月的中原大战由此展开。同年7月13日，反蒋各派在北京联合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汪精卫等在《联名宣言》中指责蒋介石：“背叛党义，篡窃政权”，将民主集中制变为个人独裁。宣言称：“本党目的在扶植民主政治，蒋则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一无保障。”^①8月7日，再次发表宣言，指责蒋介石借党治名义实行独裁，“号称训政，于今三年，而约法一字亦未颁布”。宣言称：“吾党提出民主政治四十余年，民国成立亦已十九年，而仍滞于极端专制之境，此诚吾党之大耻，而国民之大不幸。”宣言表示，决于最短期内按照孙中山遗教筹备召集国民会议，制订约法。^②汪精卫为此特别说明，孙中山晚年所批评的是民初制订的“实际即是宪

^①《联名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839页。

^②《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843、844、845页。

法”的《临时约法》，至于《孙文学说》中所说“训政时期的约法”，其目的在于确定政府对人民的关系，限制政府对于人民的权利的干涉程度，仍为革命时代所必要。^①汪精卫不是胡适，他不敢对孙中山稍有批评，只能在其学说的范围之内做文章。

9月1日，“扩大会议”诸人在北平成立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15日，成立包括罗文干、周鲠生等六名法学家在内的约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约法并向全国征询意见。其间，曾计划聘请胡适为起草委员，胡也认真地和罗作过讨论，意见“大致相投”。^②

在南北两个“国民政府”兵戎相见的关键时刻，张学良支持蒋介石，率兵入关。阎锡山被迫退回山西。汪精卫、邹鲁等眼看失败在即，决定抓紧时间演出最后一幕，向南京政权作一次“悲壮”的宣传战。10月27日，“扩大会议”在太原继续开会，通过约法起草委员会所拟《中华民国约法草案》，用以作为“宪法未颁布以前的根本大法”。该草案所规定的人民人身、财产、居住、集会、结社、言论等“私权”和选举、罢官、创制、复决等“公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现代民主思想，与胡适等人权派的观点一致，而与南京国民政府一党专政下的情况迥然相反。《大公报》曾评之为“从理论言，此项草案实有许多优点”，“极合人权法理”，“比较任何国家现行宪法为周密”。^③同日会议即将草案公布，“征求全国人民真实意见及正当评判”。^④次日，汪精卫等人离开太原，转到天津、上海等地活动。

“扩大会议”的组成人员很复杂，其中大部分人员并不是民主派，其反蒋目的也并不都很纯洁，但是，他们是非主流派或在野派，在和主流派斗争时，有可能看到主流派所不可能看到或不

①《起草约法的意义》，《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881页。

②《胡适的日记》，1930年9月12日、10月11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影印本。

③《大公报》社评，1930年11月1日。

④《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849页。

愿意承认的现实，为争取民心，他们所批判的，所用以作为旗帜的，也可能反映出人民的某些要求或愿望。民主和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应该承认，“扩大会议”诸人对南京国民政府以“党治”为名而专制、独裁为实的批判，对民主和法治的呼喊，以及太原“约法”的起草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曲折地反映出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要求。

胡适等人权派的出现，中原大战的爆发，“扩大会议”的召开，这一切表明，在当时的中国，要求制订约法不仅已经形成一股思潮，而且形成了一股势力，威胁着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

蒋胡在制订“约法”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

面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扩大会议”派的“法治”要求，国民党主流派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蒋介石企图接过胡适等人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制订约法。而胡汉民则坚持一贯主张，反对在当时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

胡适要求制订宪法、批评孙中山的文章发表后，招来了国民党对自己的一场颇具声势的“围剿”，极端分子甚至要求将胡适逮捕法办。但是，蒋介石特予“优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1930年10月3日，蒋介石所率领的南京“讨逆军”克复开封，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等人的失败已成定局。同日，蒋介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前所未有的首先作出自我批评，声称“中正自维凉德，诚信未孚，对人处事，每多过误”。电报建议，在军事大定之后，赦免陈炯明、阎锡山之外的所有军事、政治上的“罪犯”，“取消通缉，复其自由”。电报甚至提出，共产党员个人如能“悔过自新”，“得有切实保证人”，可以“暂予缓刑”，三年之后，实无“犯罪行为”时，得确定赦免之。^①同日另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在最短期内召集四中全会，讨论提前召开国民党第四

^① 《中央日报》，1930年10月3日。

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便进一步讨论召集国民会议，起草宪法，“准备以国家政权奉还于全国国民”等问题。蒋并提出，在宪法未颁布以前，先行制订训政时期适用的约法，“使《训政纲领》所规定，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之《政纲》，益能为全国人民所了解”。^①上述两电，通常称为“江电”。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文告，进一步作出革新姿态，声称“负责建国之中央，则尤必于讨逆胜利之后，紧接之以政治之刷新。”^②

蒋介石的“江电”受到部分舆论赞许，视为“制度上之重要改革”，“开政治的解决之端”。^③但是，却遭到胡汉民的顽强抵制。胡面谕中央通讯社负责人，“要等到中央常委会讨论决定后才能公开。”^④该电到10月8日方见之于《中央日报》。11月1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三届四中全会开幕，蒋介石的提议虽被列为主席团提案，但在会前审查时，由于胡汉民力持异议，作了很多修改。15日，张群等人提案，支持蒋介石，要求采纳“扩大会议”等“反对者的意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提案称：“今日通称党国，固非党高于国，或党即国之解释；党与国的机关，不能混合。”又称：召开国民会议，可以密切国民党和人民的关系，增进与人民的团结。该提案还对三全大会将孙中山遗教定为“最高之根本法”的有关决议明确地提出异议，认为孙中山的遗著“不含法律性质者亦复不少”。^⑤但是，该案遭到胡汉民的强烈反对，胡称：该案已经三全大会决定，不必讨论。他并称：孙中山所指约法，乃是军政时期，对军政府而言；民元时期

① 《中央日报》，1930年10月8日。

②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31页。

③ 社评《蒋请开国民会议之江电》，胡适存剪报，见《胡适的日记》，1931年10月7日。

④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第43页。

⑤ 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速记录，转引自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第493-494页；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记录》，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印，第19页。

的“约法”就是宪法，“非我们之约法”。“总理在《建国大纲》内，就没有提到约法两个字，而单讲训政了。”^①

胡汉民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的有关发言不是偶然的。早在1928年，他就在《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和有关演说中批判民初制订《临时约法》的举措，强调必须坚持孙中山设计的“训政程序”，反对“躐等而上”。^②1929年9月23日，他在一天中两次发表演说，重申孙中山晚年的观点，指责民初制定《临时约法》，“不遵守总理训政方案，已误国家”。他说：人民必须首先受训练，“到了能运用自治民权，方能有宪法”；如果“人民不知如何运用参政权，宪法岂不是假的”。他并以三全大会的决议为依据，不点名地批评胡适等人，声称“总理的一切遗教就是成文的宪法”，“如再要另外一个宪法，岂非怪事！”^③1930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集易堂提出《人权法原则草案》13条，拟作为“实质约法”的一部分，但是，在胡汉民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会上，此案也以上文同样的理由被决定“缓议”。^④对于“扩大会议”诸人提出的制订约法的主张，胡汉民更斥之为“胡闹”，再次强调，孙中山的“主要遗教”已被定为“效力等于约法的根本大法”，不应将之“一齐搁开，另寻一个所谓约法”！^⑤

由于胡汉民的反对，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未能就是否制订约法一事作出决定，仅议决于次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会议通过的蒋介石有关提案也是模糊的。这次会议，蒋虽被加推为行政院长，但“江电”所提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等意见，或被否定，

^① 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速记录，转引自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496页。

^② 胡汉民：《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411、403页。

^③ 《中央日报》，1929年9月24日；参见胡汉民《从党义研究说到知难行易》，《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132-133页。

^④ 《胡适的日记》，1930年1月29日附存资料。

^⑤ 《国家统一与国民会议之召集》，《中央周报》，124期。

或被搁置。

三届四中全会结束后，蒋介石加紧筹备召开国民会议。1930年12月末，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次年1月，成立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总事务所，以戴季陶为主任，孙科为副主任。2月15日，加派陈立夫为总干事。

按蒋介石的意思，这个国民会议仍然要制订约法。但是，胡汉民继续持反对态度。1月5日，胡汉民在立法院演讲，列述孙中山的有关主张，而不及约法二字。他说：“关于国民会议的一切，无论是会议前的召集，会议中的讨论，必须完全遵从总理的遗教。”^①他表示，希望大家“能深识国民会议的性质、组织效能，避免许多无谓的误解。”^②话虽含蓄，意思是明确无误的。2月24日，胡汉民、戴季陶、吴稚晖、张群等在蒋介石处聚会，商讨约法问题。张群力主“立宪救国”，受到胡汉民的强烈批驳。胡称自己是“真的为约法宪法而奋斗者”，但他坚持当时条件不够，“各项法律案还没有完备”，“军权高于一切”，“约法这件东西，寒不能为衣，饥不能为食，有而不能行，或行而枉之，只于人民有害”。^③同日，《中央日报》记者访问胡汉民，征询胡对于国民会议的意见。胡称：“我追随总理数十年，总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参加若干意见，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他提出，国民会议的议题只应限于孙中山手定的三项：谋中国之统一；谋中国之建设；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④这就将他反对国民会议讨论约法的态度彻底公开了。

胡汉民的态度使蒋极为愤怒。2月25日胡汉民谈话见报的当天，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道：“彼坚不欲有约法，思以立法院任意毁法、乱法，以便其私图，而置党国安危于不顾。又言国民会

① 《遵依总理遗教开国民会议》，《中央日报》，1931年1月13日。

② 《遵依总理遗教开国民会议》，《中央日报》，1931年1月21日。

③ 《胡汉民自传续编》，《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2期，第54页。

④ 《胡院长谈国民会议意义》，《中央日报》，1931年2月25日。

议是为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不言约法，试问无约法何能言建设！”28日，他在《致胡汉民函》中尖锐地责问说：“遍查各国历史，在革命政府成立而统一亟需巩固之时期，是否均有一全国国民公守之大法？今即退一步而政府不提出训政时期之约法案于国民会议，亦必由国民会议自身决定应否议及约法，乃先生必预欲剥夺国民会议提及约法之权，是直欲限制国民会议，压迫国民会议，使国民会议之真意全失，仅预为捣乱者再留一为约法而战之题目而已。”^①

蒋介石高度评价约法的作用，称之为“本党与中国生死存亡之最大关键”。^②他认为，孙中山晚年并无不要“约法”的主张。《日记》称：“总理革命，不欲民国元年参议院之约法，而主张重订训政时期之约法，重订革命之约法，而非不欲约法也。”^③他和汪精卫一样，也只能在孙中山思想的范围内做文章。

蒋介石虽然早年就参加辛亥革命，但始终并无多少民主思想。他此际之所以重视约法，主要是中原大战和北平扩大会议的刺激。《致胡函》称：他的“江电”是“积数十万将士之鲜血、战地无数人民之牺牲，疮痍满目，痛定思痛，惩前毖后，滴滴血泪之所成”。这段话虽不无美化自己之嫌，但道出了他的“政治刷新”主张和中原大战之间的关系。同函又称：“两年以来，党国多故，叛变纷起”，“不能不为拔本塞源之计，以求战祸之永不复行”。这段话比较真实地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中原大战是国民党统一中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双方动员兵力高达160万人，其中“逆军”伤亡20万，“讨逆军”伤亡近10万。它不仅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也严重威胁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接过

① 《蒋介石致胡展堂书》，亲笔修改本。

② 《蒋介石关于胡汉民辞职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2月25日。

政敌的口号来，力图以此争取人心，剥夺反对派的借口，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

这一时期，蒋介石思想中确有某些“刷新”的念头。除赦免军事、政治犯、制订约法外，废除国民党代表大会的指定和圈选制度亦是一例。

国民党采用指定或圈选制由来已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共有代表406人，其中指定者211人，圈定者122人，选出者仅73人。当时就受到不少地方党部的反对。三全大会甫经闭幕，所谓“护党救国第一方面军”等反蒋力量即乘时而起。北平扩大会议宣言更称：“本党组织为民主集中制，蒋则变为个人独裁。伪三次代表大会指派圈定之代表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①针对这种情况，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今后“各省党部选举绝对自由，不再圈定，而一切议案亦绝对公开”。他还表示，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必须自由提案，自由决议，不加限制”。^②

尽管蒋介石的目的是“闳绝乱源”，巩固统治，但是，赦免军事、政治犯，制定约法，自由选举，自由提案，议案公开，等等，毕竟是在向着现代民主和法治前进。他在“江电”中重提曾作为国共合作基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颇有耐人寻味之处，无奈蒋介石专制、独裁成性，一遇到反对意见，他就又用起老套路来了。

蒋胡矛盾的其他方面

除了约法之争，蒋胡矛盾还有其他一些方面：

一、胡汉民多次批评国民党、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蒋介石本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以“造成廉洁政府”相号召。2月

^①《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839页。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2月15日。

16日，胡汉民发表演讲，指出四年中不曾检举过一个贪官污吏。他质问道：“我们能相信今日之政府，是真实廉洁了吗？政府之下的公务人员，是真实都奉公守法了吗？不待言，是一个绝大的疑问。”^①同日，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演讲称：“目前我们党的生气，似乎一天一天在那里消沉了。”“从前国民党包办一切，不许人家来染指，现在则包而不办，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②胡汉民当时此类言论很多，其最尖锐者为批评南京国民政府“政不成政，教不成教”，这使蒋大为不满，指责其“谤毁行政院”，“漫肆讥评”，“若必欲使中央信用丧失，革命无由完成而后快者”。^③在国民党历史上，胡汉民是老资格，而蒋介石只是后生小辈，因此，胡汉民对蒋介石批评、教训起来也常常不留余地，蒋介石对此尤为恼火，指责其“以政治一切罪恶推于中正一人之身，而以军人不懂政治之诽谤，诋之于中外人士之前”^④。

二、胡汉民反对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蒋介石辞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江电”中：蒋要求提前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胡反对；及至法定时间已到，胡仍然反对。其原因，据蒋称，是由于胡要求蒋辞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未能如愿。《致胡函》称：“先生尝对中正等自诩政治手腕，惟史太林差可比拟，其不欲第四次代表大会早为召集，是否以强迫中正辞退组织部未遂所欲，乃致先生之个人布置未周妥，所以模仿史太林者尚须逐渐准备？”

三、胡汉民企图以立法院牵制以蒋介石为首的行政院。胡汉民认为：“立法者只该忠于党，忠于国，忠于由法律案所产生的政治设施。”^⑤他企图以立法来限制行政，补救行政的过失。对

① 《监察权意义及其运用》，《中央日报》，1931年2月20日。

② 《党的训练问题》，《中央日报》，1931年2月23、24日。

③ 《蒋介石日记类抄》，1931年2月25日；《蒋介石致胡展堂书》。

④ 《蒋介石关于胡汉民辞职的报告》。

⑤ 《胡汉民自传续编》，《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2期，第56页。

此，蒋介石指责其为“阻碍革命，破坏《建国大纲》之精神。”^①《致胡函》称：“今先生对于政制之应单纯简捷者，必使之复杂纷纠，以致一切政治皆东牵西制，不能运用自如。”“必欲以五院院长牵制行政，且皆欲以立法院主张是从，而以立法院为国民政府之重心。”

四、立法院搁置《邮政储金法》。1930年，行政院交通部曾将《邮政储金法》交立法院审议，但胡汉民认为，邮政储金关系国家财政的周转和挹注，因此持审慎态度，该案始终未获通过。对此，蒋介石指责说：“行政院要案，有搁置一年之久不得通过者。”^②

五、立法院对《中日关税协定》提出质疑。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即推行“改订新约”运动，企图修改近代以来列强陆续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其内容之一是改订关税条约，实现关税自主。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一正当要求却遭到了日本政府的蛮横拒绝。经过艰难谈判，直到1930年5月，日本才在列强中最后一个与中方签署协定。中方承诺每年从海关税收中提取500万元，用以偿还北洋政府向日方的借款，同时允诺三年内不提高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主要货物的关税率；日本则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③由于让步较大，立法院提出质问，蒋介石当时在前方，命人询问胡汉民：“军情紧急，胡先生这样干，是不是想推翻政府？”^④胡对来人答称：“签订法律案，不经立法院认可，是违法。”他指责主持谈判的外交部长王正廷“昏聩糊涂，擅签协定”，建议撤职查办。^⑤对此，蒋介石指责为“反对外交，妨碍税法，搁置要案，不与通过”。^⑥

六、胡汉民反对以官职为手段拉拢东北将领。1930年，为了

① 《胡汉民自传续编》，《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2期，第56页。

② 《蒋介石致胡展堂书》。

③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82，第798-805页。

④ 《胡汉民自传续编》，《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2期，第49页。

⑤ 同上。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2月25日。

动员张学良出兵攻打“扩大会议”诸人，蒋介石曾于当年6月提名以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中原大战结束后，张学良于同年11月到南京，蒋介石又准备简拔张的部属为国府委员及部长，对胡表示：“要与汉卿合作，非这样办不可。”但胡立即驳蒋说：“在一个政府的立场，不应该用这种拉拢凑合的卑劣手段”，“合作并不在分配官职，国家的名器也不应该这么滥给人，而且既然是一个中央政府，在‘中央’的意义之下，对于国内的任何个人，都谈不到什么‘合作’”。^①对此，蒋介石指责为“阻碍和平，破坏统一”。《致胡函》称：“当统一告成，东北竭诚拥护中央，我中央正宜开诚相与，示以大公，使各省心悦诚服，怀德知威，不致再启纠纷，贻祸党国，使我人民得有休养生息之机。乃先生褊狭怀疑，必曰东北无诚意，严防固拒，屏诸化外，凡有提议东北之人与东北之事者，先生必从中阻挠，竭力反对。推先生之意，若必欲使中央失信于东北，引起东北对中央之恶感，使中央原定之和平政策不能实现，军政不能统一，党国永无安宁之日，诚不知先生是何居心也？”

七、反对蒋介石提出的“赦免军事、政治犯”的方案。胡汉民认为，蒋的方案过于宽大，在制订《政治犯大赦条例》时没有完全采纳其意见。对此，蒋介石指责说：“其对于赦免政治、军事犯亦多不赞成，今《大赦条例》与余‘江电’条例相左甚多，以胡同志要主张如此，故中央同志亦无所异议。”^②

蒋介石对胡汉民的指责尚多，如“任意破坏财政”，包庇援引廖仲恺案的嫌疑分子，引用许崇智，接济曾计划谋害蒋介石的陈群、温建纲等。或无事实，或非事实，本文不拟一一列举。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胡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密切的合作时

^① 《胡汉民自传续编》，《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2期，第47页。

^② 《蒋介石关于胡汉民辞职的报告》；参见《香翰屏揭破蒋中正挑拨离间电》，《为什么讨伐蒋中正》，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宣传科编印，第66页，1931年6月15日。

期，也逐渐积累了若干矛盾，涉及许多方面。但是，在各项矛盾中，胡对蒋的批评和牵制则是招致蒋不满的主要原因。一直到1934年，蒋还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五院制乃总统集权制之下方得实行。否则未得五权独立之效，而必起五院斗争之端；未得五权互助相成之效，而反生五院牵制纠纷之病。胡汉民不明此理，专以私心自用，竟至党国衰败，而无法建立健全之中央，其肉岂足食乎！”^①蒋是个独裁主义者，追求、神往的是大权在握、个人专断的“总统集权制”，岂能容得别人的批评、牵制和反对呢！

软禁胡汉民事件的影响

软禁胡汉民的当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体到蒋宅赴宴，得知胡汉民的“罪状”后，相顾失色，“皆噤不作一言”^②。蒋称：“诸同志既认展堂举动不对，应即请其辞职。”他提议于明日召集中常会，推举林森继任立法院长，邵元冲继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立法院副院长。诸人仍不敢开口。蒋称：“诸同志既一致同意，明日即照此办吧！”^③

陈立夫依仗他和蒋多年的密切关系，客散后拉着叶楚傖去见蒋，叶仍然一句话不说，陈也不敢提出相反意见，只劝蒋“就此罢手，千万不要走极端”，“再予监禁是不妥的”。但蒋一不做，二不休，盛气表示：“已经做了，就没有办法再掩饰了。”^④3月2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面带怒容”^⑤，指责胡汉民“在中央未有具体决议以前，徒凭个人见解，发为国民会议不当议及约法之言论”。^⑥蒋报告后，国民党中央随即召开临时常务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4年6月9日。

②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③ 同上。

④ 《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第174页。

⑤ 《国闻周报》，第8卷第9期。

⑥ 《蒋主席报告约法问题》，《中央日报》，1931年3月4日。

会议，通过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蔡元培、孙科等 12 人提议，决定召集国民会议，“排除一切困难与谬见”，确立约法，推吴稚晖、王宠惠等 11 人为约法起草委员。会议同时通过决议，声称“胡汉民同志因积劳多病”，“不足膺重要繁剧之任”，辞去本兼各职。^①据孙科回忆，会议情况是：“半句钟之久，无一发言，后蒋作默认，糊涂通过”。^②3 月 9 日，蒋介石再次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一方面继续用“辞职”说掩盖暴力软禁的真相，一面大肆鼓吹“党员、官吏无自由”论，声称：“革命的党和革命的政府，因为革命的需要”，“随时可以限制党员与官吏个人的自由”，“所以胡同志的行动是否自由，不是什么重大的问题”，云云。^③

软禁胡汉民是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的一次典型政治事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自此，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仅存的一点民主气氛扫地以尽。国民党元老们记取教训，“咸袖手结舌，莫敢一言”。^④

然而，任何独裁统治的力量又都是有限的。人们在鞑鞑之下的南京无法吭声，但是，在蒋介石鞭长莫及的地方就无所顾忌了。

从 3 月 3 日起，属于改组派系统的上海《华东日报》连续发表评论，抨击蒋介石的“独断专行”，认为“欲谋解放，除彻底反对个人独裁，实现民主政治外，绝无他道可循”。^⑤天津《大公报》也发表评论，认为“政治意见既不能无争，要当以言论为工具，以多数决从违”，“轨道内之论争，无论党治、法治之国家胥应允许。盖不如此，则政治必腐化，国家必退步”。^⑥8 日，上

①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130 次常务会议记录》，油印本，〔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藏；参见《中央日报》，1931 年 3 月 3 日。

② 《胡展堂先生被扣事件发生之经过》，《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 100 页。

③ 《反蒋运动史》，〔台湾〕李敖出版社，1991，第 260-261 页。

④ 孙科：《致蒋介石电》，《反蒋运动史》，第 300 页；参见《陈立夫回忆录》，第 175 页。

⑤ 《华东日报》，1931 年 3 月 16 日。

⑥ 《政治之正正轨与常道》，《大公报》，1931 年 3 月 5 日。

海各省公团驻沪联合办事处通电指出：“专制民主，誓不两立”，要求南京各院长，各部长，“去职远引”，“勿为一姓之走狗”。^①同月底，中国国民党党权运动总同盟发表《讨蒋宣言》，要求开除蒋介石党籍，撤销其本兼各职。^②

古应芬是胡派重要人物，软禁事件发生后，他最早致电蒋介石表示不满，旋即在广东联络陈济棠、邓泽如、萧佛成等人组织“策划机关”，研究救胡及组织“西南政府”方案。^③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四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身份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有“违法叛党”等六大罪状。5月3日，陈济棠以第八路总指挥的名义，率领所部陆海空各军将领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引退”。11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率张发奎等全体将领通电，声援陈济棠等，声称“本军业经下令动员”，愿与各方袍泽“趁时奋起，会师长江，底定金陵”。

“扩大会议”诸人自离开太原后，反蒋活动的重点转入舆论宣传方面。汪精卫于3月14日发表宣言，指责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架之行径”。^④其后，连续发表文电，以“颠覆个人独裁，树立民主政治”及“恢复民主集权制”相号召，呼吁各反蒋派系联合起来。^⑤他探悉粤方酝酿反蒋后，即积极表示愿意参加。广东方面秘密征询胡汉民的意见，胡表示同意。^⑥

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此际也发生分化。孙科原是蒋倒胡依靠的人物，但他由于看不惯蒋的作为，离宁赴沪，消极抗议。5月5日，致电蒋介石称：“历代各国元首罪己，事本平常”，要蒋

① 《反蒋运动史》，第274页。

② 《反蒋运动史》，第273页。

③ 《程天固回忆录》，〔香港〕龙门书局，1978，第226页。

④ 《反蒋运动史》，第282页。

⑤ 《反蒋运动史》，第297、314页。

⑥ 《程天固回忆录》，第231页。

“自讼自劾”。^①21日，秘密偕唐绍仪、许崇智、陈友仁离沪赴港，和汪精卫、白崇禧等会面，讨论两广合作讨蒋问题。此后，他即成为西南反蒋阵线中最激烈的人物，演说中有云：“蒋不是寻常老鼠，是一个疫鼠，传染甚速，倘我们不忍些痛，急扑杀之，则全国皆亡不可！”^②

联络既有端绪，唐绍仪、邓泽如、古应芬、林森、萧佛成、汪精卫、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陈友仁等于25日联署，通电要求蒋介石在48小时之内下野。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成立“国民政府”。除了原北平扩大会议的人马之外，又新增了一批反蒋分子，形成国民党内非主流派系的更大联盟。一个北平，一个广州，前后两个反蒋的“国民政府”，用以号召的旗帜都是“民主”与“法治”。

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广州非常会议所成立的“国民政府”虽然很快撤销了，但是，宁粤对立的局面却一直延续到1936年，长达五年之久。

追求法治始，破坏法治终

“民主”与“法治”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历史的基本走向。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法律又是极为重要的。其中，约法、宪法等“根本大法”规定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民主原则，规范执政者和人民彼此的权利义务，就尤为必要而不可缺。在强权统治下，法律有时会成为具文，但是，它提供了人民保护自己、揭露强权的武器，还是比无法好。因此，20世纪20年代末期，胡适等人要求在国民党统治下制订约法或宪法，保障人权，虽有其局限，但却是中国现代化

^① 《反蒋运动史》，第301页。

^② 《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102页。

进程中的合理要求。扩大会议承继这一要求，以之作为反蒋口号，正是看到了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蒋介石将这一口号接过来也是看到了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中国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个人专断和独裁已经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和行为定势。当蒋介石与胡汉民发生政见分歧时，既不能诉诸于民主的协商和讨论，又不能诉诸于辩论与表决，而是无限上纲，暴力软禁。原本是追求民主和法治的努力（虽然是表面上的和形式上的）却变为反民主、反法治的演示。这一事件深刻地说明了现代中国民主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胡汉民与蒋介石的矛盾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是多重交叉的。就胡汉民将孙中山“遗教”绝对化，反对在当时制订约法来说，他不懂得现代的民主和法治，但是，他又企图运用现代的多权分立制度来反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就蒋介石来说，他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显示出他企图迈上民主和法治的道路，或者说，他企图以民主和法治来装点门面，但是，当他遭到牵制、面临反对意见时，他又用粗暴的办法践踏了现代民主的原则。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附记：蒋介石的追悔

对胡汉民事件，蒋介石后来曾多次追悔。1941年4月5日《上星期反省录》云：“对溥泉斥责事，愧悔不知所止。此为余每十年必发愤暴戾一次之恶习。回忆民十对季陶，民廿年对汉民，而今民卅对溥泉之愤怒，其事实虽不同，而不自爱重之恶习则同也。”又同年6月9日日记云：“（民国十九年冬）当时讨平阎、冯叛乱以后，乘战胜余威，应先积极统一各省军、民、财各政，而对中央内部谦让共济，对胡特予信任与尊重，以国府主席让之，则二十年胡案不致发生，内部自固矣。”

三、抗日期间

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

——调整国内外政策的开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占领东北全境，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受到普遍责难。同年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这是蒋介石一生中极为困难的时期，也是他开始调整国内外政策的起点。

痛愤于日本侵略，但下不了抗战决心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乘舰自南京赴江西“剿共”。他迅速感到了事变的严重性。9月19日日记云：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

并有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持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①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19日。

20日日记云：

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①

这里，蒋介石除了表示收复失地的决心外，同时也对自己忙于“安内”、“外交太不注意”的状况作了初步检讨。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确定了“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的方针。这一方针成为蒋介石调整国内外政策的起点。当日召开干部会议，蒋介石提出，首先提交国际联盟与1928年《非战公约》签字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②22日，南京市国民党员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说，声称“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他并追述1928年北伐为日军所阻的情况：“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身。”日记云：“众乃益悲愤，因知爱国者多，而（甘心）亡国者少，国事犹可为也。”^③

同日，国际联盟决议中日两国停止战事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派员调查裁判，蒋介石认为这是外交的转机，也是对内统一的好机会。23日，张学良派万福麟等到南京，要求蒋介石早日与日本交涉，通过外交解决东北问题，引起蒋的不快。蒋认为张学良“不问国际地位与国际形势，以及将来单独讲和之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20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21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22日。

丧辱”。当日，蒋介石与万福麟谈话，认为“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①

蒋介石依赖国联，寄希望于“国际仲裁”，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却不把国联放在眼里。24日，日本政府复函国联，蛮横地拒绝调查，声称“满洲事件”不容国联及第三国置喙，主张中日直接交涉，国联态度因之软化，转而赞成日本主张。26日，蒋介石获悉有关讯息后，曾有主战的念头。当日日记云：“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聒〔器〕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他准备将首都迁到西北，同时集中主力于陇海路。^②28日，蒋介石写下遗嘱：

持此复仇之志，毋暴雪耻之气。兄弟阋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服从纪律，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上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③

10月3日，蒋介石与熊式辉商量备战计划。蒋介石认为，无论和与战，西北实为政府第二根据地。如南京陷落，即迁都洛阳。同日日记云：“倭寇威胁之行未杀，实不知余为何如人耶。可笑！”^④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巨大愤怒，各地抗日救国运动迅速高涨。为了对中国人民施加压力，10月2日，日本军舰在南京下关示威。5日，日本政府决议对南京国民政府提出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23日。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26日。

③《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28日。

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0月3日。

严重警告，同时扬言将派 50 余艘军舰到长江举行大示威。次日，日舰四艘即开入黄埔江。蒋介石估计日军有“上陆、入城”甚至开战的可能，准备届时通告《非战公约》签字国各国元首，提请他们注意保守《公约》之责任。日记称：“余决心与倭寇一战，此心反觉安定无事也。”^①10月11日，英国外交部致电其驻华公使，要他劝中国不要坚持以撤兵为交涉之条件。蒋介石感到非常“骇异”，日记云：“余决心既定，不论各国态度与国际联合会结果如何，为保障国土与公理计，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且非与日本决战，中国断难完成革命也。”^②11月17日，蒋介石更在日记中明确地写道：“晚与各同志谈话，余决心统师北上抗日。”^③

蒋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同情五四和五卅爱国运动。九一八时期，痛愤于日本侵略，有准备北上抗日的打算，这是他后来之所以能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原因。但是，在很长时期内，蒋介石又怯于和日本作战。10月7日日记云：“国民固有之勇气、之决心，早已丧失，徒凭一时之奋兴，不惟于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故无可恃也。而所恃者，惟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之精神与主义而已。”由于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人民中出现了爱国救亡的热潮，但是，这在蒋介石看来，却只是“一时之奋兴”，“不惟于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蒋介石靠什么呢？“惟在我一己之精神与力量”。当然，蒋介石不会认为他个人可以打赢日本，因此，他必然是悲观论者。日记云：“成败利钝，自不能顾，唯有牺牲一己，表示国家之人格与发扬民族之精神，不能不与倭寇决一死战。明知战无幸胜，但国家至此，亦无可再弱，决不比诸现在再恶也。”^④11月24日日记又云：“余不下野，则必北进与倭寇决战。虽无战胜之理，然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0月6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0月11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1月17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0月7日。

留民族人格与革命精神于历史，以期引起太平洋之战争，而谋国家之复兴。”^①

蒋介石爱惜“民族人格”，准备与倭寇决一死战，并预留遗嘱，其抗战决心可以说是壮烈的，但又是虚弱无力的。

这一时期，蒋介石的主要努力仍然放在外交上。

9月25日，蒋介石组织外交顾问会。30日，组织特种外交委员会，任命施肇基为外交部长。10月3日，先后召见顾维钧与颜惠庆，预定顾为国际联盟会代表，派颜赴北平与各国公使接洽。4日，蒋介石在南京北极阁祷告，向中国基督教领袖余日章提出三项要求：1. 以国民外交名义，联络各国国民，与日本国民主持公道。2. 嘱各国新闻记者往东三省监察，公平报告。3. 嘱太平洋协会各国有力者督促其政府注意日本之暴行。^②8日，蒋介石与张群谈话，表示“备战不屈之决心”。同日，又与宋美龄谈“为国牺牲之决心”。^③12日，蒋介石在军校、国府纪念周报告，声称“以忍耐不屈之精神维护领土，以牺牲无畏之精神维护公理，尽国际一分子之责任”。当日日记云：“英美二国对余拥护公理抗御强权之训词皆甚震动。”^④当时，日本政府为了掩饰其侵略行为，欺骗国际舆论，拟订了一份所谓《中日和平基本大纲》，表面上声称“尊重中国领土之完”，同时则赤裸裸地要求“尊重在满洲之日本既成条约”。^⑤10月15日，蒋介石决定坚决拒绝日方的这一大纲，他和戴季陶及特种外交委员会商量之后，决定另提《东亚和平基本大纲》以为对抗。《大纲》明确说明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但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企图利用矛盾，吸引列强反对日本。^⑥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1月24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0月4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0月8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0月12日。

⑤ 《蒋作宾日记》，1931年10月26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第360页。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0月15日。

17日，蒋介石与各国公使谈话，表示对日抵抗，不签丧辱条约之决心。19日，再见各国公使，嘱其电告出席日内瓦国联会议的本国代表及其政府：如国联失败，则东方与中国之前途不可预料，请其切实注意。^①

国联会议几经曲折。10月23日，法国外长白里安向国联理事会提出解决满洲问题决议草案，限日军在11月16日以前完全撤兵。24日表决，13票赞成，仅日本一票反对。中国在外交上打了一个胜仗，日本代表芳泽对新闻记者称：“今日为余有生以来最痛苦之一日。”^②25日，蒋介石日记云：“昨日国际联合会决议，倭寇虽未承认，但公道与正理已经表现。白利〔里〕安之才能究为可佩，以决议方式甚为得体也。”^③

通过国联，进行外交斗争，广泛团结世界上一切反战国家，在道义和舆论上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蒋介石的这一策略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但是，国联的决议并不能约束日本，对侵略者，必须还之以反侵略战争，才能制止凶焰，维护民族利益和世界和平。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称：“事在自强，而不在人助也。”^④但是，他还是过分相信并依赖了国联。

与粤方和解

1931年2月底，蒋介石软禁胡汉民。5月，汪精卫、孙科、邹鲁、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粤两个政权。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意识到这种分裂的局面必须迅速结束。9月20日日记云：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0月17日、19日。

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三联书店，1982，第268页。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0月25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0月14日。

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内部当谋统一也。^①

21日，他在南京干部会议上即提出：“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对广东以诚挚求合作”。同时表示：1. 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2. 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3. 胡、汪、蒋合作亦可。^②当日会议并决定：“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③22日，蒋介石约见吴稚晖、戴季陶等，表示愿交出政权，与胡、汪合作。当日，戴季陶即受蒋之命，前往汤山，劝胡汉民重新视事。23日，蒋介石又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到香港与汪精卫、李宗仁、孙科等会谈。双方在29日决定：1. 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同时通电取消；2. 双方组织统一会议，产生统一国民政府。^④30日，蒋介石接到汪精卫所拟通电稿，认为“多诬辱之句”，极为恼怒，但他决定暂时忍耐。日记云：

当此横逆之来，既要余屈服，又要余负责。而若辈毫无负责勇气，既不顾大局，一意捣乱，而又无能力来组织政府。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且乘此外侮之机，勾结敌国，动摇国本，能不痛心！此时只有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以求万一之补救。^⑤

10月1日，蒋介石电复粤方，表示在港、粤所定条件须斟酌修改，同时表示：随时可以恢复胡汉民、李济深的自由；本人去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20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21日。

③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8，第129页。

④ 《粤事已有解决》，《申报》，1931年9月30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30日。

留问题，俟和平会议时讨论。他要求粤方到南京召开统一会议。^①10月2日，陈铭枢、蔡元培向蒋介石转达了粤方的意见，要求蒋先行通电表示，准备下野，蒋介石极为恼火，日记云：

是直等于儿戏！国事危急至此，而若辈尚以敌对态度要胁不止。对国内与中央则施压迫，对倭寇则勾结迁就，是诚无人心矣！^②

当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等赴日活动，企图在粤派与日本之间建立“中日同盟”。^③据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密告南京国民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称：陈友仁表示，将以“满洲利权”换取日本对粤方的援助。^④因此，蒋介石一直认为，日本出兵东三省，源于粤方“卖国”。本日日记所称“(粤方)对倭寇则勾结迁就”，指此。

10月12日，陈铭枢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赴粤和谈经过，声称粤方坚持须先恢复胡汉民自由，然后再谈和议。13日，蒋介石、胡汉民在中山陵会见，蒋介石同意胡汉民次日去上海。14日，蒋介石访问胡汉民，表示“过去之是非曲直，皆归一人任之，并自承错误”。日记云，胡汉民“亦感动”。^⑤当日，胡汉民赴沪。不过，这以后蒋介石对粤方的态度并未好转。16日日记云：“晚，以粤方与展堂阻碍，内忧甚于外患，可叹！”18日日记云：“晚，商粤方要求事，与胡汉民之态度，可叹、可怜又可笑也。”21日，蔡元培、张继偕同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伍朝枢、邹鲁、陈友仁等6人到达上海。22日，蒋介石与宋美龄飞抵上海，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会谈，议定外交方面先求得

① 《京粤和平前途》，《申报》，1931年10月1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0月2日。

③ 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东京〕读卖新闻社，1951，第146-150页。

④ 《蒋作宾日记》，1931年9月31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0月14日。

一致，以利共赴国难；党政军诸方面问题，留待以后会议详商。蒋介石当日日记云：

各报所载粤方所谓代表者谈话，诋毁讥刺，未改旧态，为之骇异。与各中委相见，乃知对方提推倒中央现有组织，否认根本法纪，是胡汉民有意捣乱，使余进退两难，而若辈既不敢负此重责，又不愿知难而退，更不愿置之不问，可痛、可鄙、可恶、可笑、可怜，莫基于此，而反以为得计，不仅壁上观火，下井推石，必欲使一切罪恶责任归之一身，置党国败亡于不顾，立待国家纷乱而后快，此种卑劣政客，既陷总理于前，今且毁卖党国，不顾一切，胡贼之罪，是在毁灭党国于其一人之手也。^①

对孙科，蒋介石也很不满，日记云：“以阿科为最不争气，甚为总理叹惜也。”当日，蒋介石回京。23日，粤方托蔡元培、张继携带汪精卫、孙科等联名函件赴宁，提出7项要求：1. 为共赴国难，先谋外交一致行动；2. 关于党国诸疑难问题，请宁方派代表赴沪共商；3. 党国根本问题在于集权于党，完成民主政治乃根本原则；4. 召集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产生健全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5. 国民政府主席拟仿法、德总统制，以年高德劭者任之，现役军人不宜当选；6. 拟废除陆海空军总司令一职；7. 在统一会议决定以前，彼此应尽之责，双方应照常担负。^②这7条的矛头所向是蒋介石已经掌握的权力与地位，因此，蒋介石极为反感，日记云：

（粤方）以为中央已无办法，故提此苛刻无理之要求。倭寇藉粤方捣乱之机以逼迫中国，粤寇借倭奴之力以倒中国，而且其推出代表全为粤人，是广东毅然成一粤国，与倭国攻守同盟以攻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0月22日。

^② 《粤代表致蒋介石函》，《申报》，1931年10月27日。

中央。形势至此，殊为我中华民族羞。对此叛逆，不可再以理喻，惟有负责坚持，以报党国，岂有退步之馀地乎！^①

根据这一认识，蒋介石一面于复函中表示：“事关内部，无不可以开诚相见，从容商谈”^②，一面则决定略加反击。10月27日，宁粤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预备会议。28日，蒋介石复电粤方各代表，“指明其无诚意之真相”。当日日记云：

胡汉民之捣乱不法，阴谋行动，不特使余个人置于死地，且必欲毁坏党国，将总理革命至今所有革命之历史尽毁灭无余。小人不可与同群，信乎！^③

30日日记云：

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阻碍，而汪、孙则愿来合作，以不愿与胡破脸，故不敢明白表示，当使之有迂回馀地。对粤应决定方针：一、如其愿就范，不破裂，则暂维统一之局面，固于对外有益也；一、如其不愿就范，必欲破裂，则避免内部纠纷，使之回粤自扰。胡汉民已成过去，而其过去历史，为阻碍总理，反抗总理，今则欲灭亡本党，叛乱革命，无足计较也。^④

尽管蒋介石对胡汉民满腔怒火，但是，还是决定忍耐。31日日记云：

此时中央实处于内外夹攻之中，各报舆论皆为反动派所蒙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0月23日。

②《蒋介石复粤代表函》，《申报》，1931年10月27日。

③《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0月28日。

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0月30日。

蔽，是非不明，人心不定，此国家之所以乱也。吾人唯有忍辱负重，以尽职责，虽举世非之而不能动摇我坚定之志。^①

11月2日，蒋介石发表演讲，声称：“只要团结能早日实现，任何委屈痛苦，都能忍受。”^②此后，蒋介石一让再让。3日，蒋介石召开干部会议，决定与粤方“无条件合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党内争端。当晚再议，决定“京粤两处分开，或在中央合开，皆随粤方之便”。^③11月5日，张继会见蒋介石，传达粤方意见，要求分别开会，蒋介石虽然不赞成，但决定“顺其意迁就”。^④7日，上海会议决定，在南京、广州分别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双方各自选出24人，成立统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分裂、对峙的双方就找到了团结统一的途径。

11月12日，南京方面以“团结内部，抵御外侮”为主题，先行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7日，蒋介石决定带兵北上抗日，以此表示“对内退让，又欲使本党挽救对民众之信仰，非使代表放弃选举竞争，诚意与粤方合作，一致对外不可”。^⑤当日，蒋介石派陈铭枢赴上海邀请汪精卫来京主持会议。11月19日，蒋介石召集中央干部会议，决定全部接受粤方所拟中执、中监委员136人名单，蒋介石的这一意见为四次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1日，会议通过“追认恢复党籍案”，承认在不同时期开除的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冯玉祥、顾孟余、汪精卫、阎锡山等314人的党籍。^⑥蒋介石作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风格的发言。他说：“以前党员之叛变，皆非为中央与政府，而独为中正一人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31日。

②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45页。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1月3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1月5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1月17日。

⑥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45-47页。

之故，自觉愧惶无地，使党国益陷于艰危。故从前一切错误，皆由余一人任之。”^①22日，会议闭幕，蒋介石自觉度过了对内的一个“难关”，日记云：“增加奋斗勇气不少，令人发生对党国无穷之希望也。”^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蒋介石与粤方矛盾已深，缓和与化解都需要时间，蒋介石11月22日的日记显然过于乐观了。

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在外敌入侵时，必须抛弃旧日的嫌隙与纠纷，一致对外。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曾宣称：“不先剿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则不能攘外”^③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力谋与粤方和解，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与共产党和解，从而导致全民抗战局面出现，这是顺乎潮流、合于人心的举措。

学生运动的困扰

中国学生富于爱国传统，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大片国土沦陷，学生们不能不奋起抗争。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蒋介石却感到烦恼。9月24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代表到南京请愿，蒋介石日记中即有“上海学生狂激”之语。28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1000余人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其后，又到外交部请愿。外交部部长王正廷避而不见，引起学生愤怒，冲入王的办公室，殴伤王的头部。同日，上海复旦大学学生800余人到达南京，会同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学生到国民政府请愿。当日蒋介石日记云：

今日中央大学学生攻击外交部，打破其头部。上海学生来请愿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1月21日。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1月22日。

③《蒋总统秘录》第7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6，第185页。

者簇队络绎不绝，必为反动派所主使，显有政治作用。时局严重已极，内忧外患，相逼至此，人心之散坠好乱，国亡无日矣！^①

29日，蒋介石接见上海第二次进京请愿学生5000人，训话1小时余。蒋称：“本席亦抱定与国民共同生死之决心”。又称：请愿分散政府精力，要求学生返校读书；如愿从军，可编入义勇队训练。当日，学生大批返沪。这使蒋介石略感安慰，日记云：“此乃最好现象，青年爱国守法，接受痛训，是难得之宝也。”^②

其后，蒋介石日记中不断出现关于学生运动的记载。

11月17日，南京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央大学学生向会议请愿，要求迅速出兵东北，收复失地。蒋介石在对学生训话后自觉“火气过甚”。

11月18日，蒋介石出席会议途中，见到学生集合请愿，“心甚嫌恶”。

11月23日，蒋介石对杭州来京请愿学生700余人训话，“以诸葛孔明《出师表》与岳武穆尽忠报国自况”，日记云：“听者动容。”

11月25日日记云：“下午，各方学生为反动派所鼓〔蛊〕惑，来京请愿北上，故意捣乱，破坏政府，勾结日本、广东，人格丧失殆尽，而余处境之悲惨，亦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胡逆汉民之肉，不足食矣！”

11月26日，蒋介石与上海中学生谈话。下午，学生千余人聚集国府，要求蒋介石亲书誓师词。日记云：“国民程度至此，殊为国家危也。共产与粤派必欲毁灭国府，败坏国家，灭亡民族而后快，可叹亦可恨也。”

不过，这一时期蒋介石尽管讨厌学生运动，并且怀疑背后有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28日。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29日。

人操纵，但总的来说，还是有耐心的。11月27日日记云：“数日以来，对各地来京之学生接见训话，约二万人，可谓用尽精力以应之。幸未发生事故，且受〔收〕几分好影响，是乃对内最难最险之关键乃以平顺过去，岂非至诚足以动人乎！”日记又云：“对日固难，而对内更难。倭事乃由国内卖国者所发动也，胡展堂、陈友仁之肉，不足食矣！”

国难危急，蒋介石的空言保证自然平息不了学生们的请愿热潮。面对方兴未艾的学生运动，蒋介石的憎恶之情日渐增加。11月30日，对上海工人代表及北平国民大学生训话。日记云：“可惜而最可痛者，乃一般盲从幼稚之青年，令之安心求学以尽救国之道则不听，煽以浮躁曠荒则乐从。国无纪律，人无道义，此国事之所以纷乱，胡、汪、孙肉，不足食矣。”12月2日，蒋介石接见北平及徐州各校学生请愿团，表示接受请愿各点，并表示中央全会之后，即当北上抗日。日记云：“（学生）无理取闹，殊可怜。国事至此，人不成人，未知党部所为者何事，竟使一般群众皆为邪说所诱，邪党所操纵，而与政府为难，此皆余用人不得其任之过疚，而于他人无与也。”^①

尽管蒋介石一再接见学生，表示抗战决心，但是，由于不见实际行动，学生们对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态度日趋激烈。12月4日，北平大学生示威团到达南京。蒋介石日记云：“殊为可叹，不向敌国示威，而向政府示威，此中国之所以被辱也，设法制止之。”当日下午，蒋介石对北平各校代表及各处大学生1200人作长时间训话。次日，北大南下示威团在南京游行示威，呼喊“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打倒卖国政府”等口号，南京国民政府即采取镇压措施，蒋介石日记云：“北平大学生示威团在京暴动，殴辱军警，乃即拘捕百余人，惟禁止军警开枪。”^②

南京国民政府的镇压措施进一步激起了学生的反对。济南、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2月2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2月5日。

北平、上海学生大批在车站候车，准备到南京请愿。12月7日，蒋介石接见武汉大学及南京抗日会学生，日记云：“青年之无智无礼，殊为民族寒心也。”8日日记云：“中大学生嚣张已甚，各处学生亦为少数共产党所操纵。”这时，蒋介石已决定进一步镇压，日记云：“于此危急之局，若畏杀戮惨痛，若不准备最大牺牲，何能达此目的。如能幸免流血，则为党国之福；否则，惟有以菩萨心肠而下雷霆之怒，有何惧哉！”所谓“雷霆之怒”，自然是超乎拘禁以上的手段了。但是，蒋介石的主张受到部分人的反对。12月9日日记云：“一般书生对万恶反动盲从之学生仍主放任，不事制裁。呜呼！天下事皆误于书生之手也！”同日，上海各校学生5000多人赴市府请愿，要求惩办市公安局局长及市党部工作人员，释放被绑架学生。下午5时，学生300余人到市党部请愿，因无人接见，将市党部办公室捣毁。10日，蒋介石与有关人员商量对付办法，决定“姑以缓和办法应付之”。当晚，会商镇压办法，何应钦态度犹疑，引起蒋介石不满。日记云：“敬之到紧要关头，彼必毫不负责，而且怨恨无权，此最可恨之事也。”^①15日，北平南下抗日救国示威团500余人赴外交部示威，将各办公室捣毁，续赴中央党部，将蔡元培、陈铭枢殴伤，架出门外。警察鸣枪，夺回蔡、陈二人。日记云：“学生暴横至此，而先辈犹主宽柔，竟使全国秩序不安。如此无政府放任主义，何以能完成革命立国之责任也？”17日，南京、上海、北平、江苏、安徽等地学生万余人在南京举行总示威，砸毁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徽。下午，因抗议对运动的不真实报导，捣毁中央日报社。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出动军警镇压，重伤30余人，拘捕63人。^②日记云：“无法已极，若再不制裁，诚欲败坏学风，灭亡种族矣！”

不过，蒋介石这时还坚持接见学生。12日，接见济南学生3000余人，在冻天立谈2小时。日记称：“几受侮辱”，“余挺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2月10日。

^② 《申报》，1931年12月18日、19日。

身和解，至少四分之三以上之学生能受理解感化，而极少数之学生亦可奈何也？”14日日记云：“对请愿学生代表解释一一。青年有理性者居多数，而少数败类，横行无忌，毫无礼义，殊为国家悲痛也。”

学生年轻热情，有时不免有过激举动，但是只要南京国民政府改对日妥协为对日抵抗，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就会转化为爱国的巨大力量，对政府的态度也会随之相应改变。蒋介石只看到学生运动“分散政府精力”以及反对政府的一面，这就走进了误区。

12月4日，蒋介石总结失败原因，认为其一是“对于学者及知识阶级太不接近，各地党部成为各地学者之敌，所以学生运动全为反动派操纵，而党部毫无作用，且有害之”。^①应该说，蒋介石的这一总结没有抓到关键。

下野及其反思

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进退问题。

为了化解与粤方的冲突，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当晚就有召开四中全会，本人“引疾〔答〕辞职”的考虑。^②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又与吴稚晖、戴季陶谈话，表示“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权”之意。^③但是，蒋介石内心矛盾，犹豫不决。

10月15日，蒋介石与戴季陶商量，决定电告粤方：“统一会议开始之日，即为中正辞职之时；或粤方委员能既允担任中央政治，则中正以付托有人，即当引退。”^④这是决定退了，然而，10月27日日记云：“当此国难，决心负责到底，任何诽谤，在所不计。”31日日记又云：“吾人惟有忍辱负重，以尽职责，虽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2月4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18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22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0月15日。

举世非之，而亦不能动摇我坚定之志。完成革命，挽救危亡，惟在此一片坚决之心耳。”这就是又决定不退了。

这一时期，蒋介石不断与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商量，意见不一。11月24日，蒋介石与熊式辉商量，声称：“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如果余下野之后，国家能统一，外交能解决，则余之下野不失为革命者之立场。”^①12月6日，蒋介石设想了一个解决矛盾的办法。日记云：“此时对国事只有进退二途。进则积极负责，对内开国民大会，解决国事，对外在国联公证之下解决交涉，成败毁誉，皆由余一人任之，以待后世之公论。退则消极负责，以助继任人之成功。”同月7日，蒋介石与干部们谈话，表示要召开国民大会，“以本党政权提早奉还国民”，但吴稚晖认为“此着太险，现在只有安定制动”。^②

吴稚晖是蒋介石的智囊。蒋介石觉得吴的“安定制动”说很有道理，准备接受。但是，广东方面却不让蒋介石“安定”，始终坚持以其下野为合作条件。不仅孙科等如此，连这时还站在南京方面的陈铭枢也如此。12月11日，蒋介石日记云：

闻真如之言，乃知哲生等必欲强余辞职始快，真如亦受若辈之迷而未深思国家大计，以余之领袖而坚强之干部动以退让为得计，内部之心不一，领袖之志难行。然而余不能用人，而干部左右又不能容人，此国家之所以不定也。余对于政治哲学近得二语曰：“政者进也，贪者退也。”领袖欲进而干部欲退，虽有大力，无以推动也！

12日，蒋介石再次与干部们商量进退问题。李石曾、吴稚晖、戴季陶、吴铁城不主张蒋介石下野，何应钦、陈铭枢则希望蒋介石尽快下野。蒋对李石曾等称：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1月24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2月7日。

此时救国，惟有余不退之一法，而欲余不退，唯有改为军事时期，一切政治皆受军事支配，而听命余一人，则国始能救。否则，如现在群言庞杂，主张不一，不许余主持一切，彼此互相牵制，徒以无责任、无意识、无政府之心理，利用领袖为傀儡，则国必愈乱而身败名裂，个人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救国之危亡也。^①

召开“国民大会”，是以民主的办法解决矛盾；“改为军事时期”，“听命余一人”，是以独裁的办法解决矛盾。然而这两点当时都不可能做到，蒋介石想来想去，只有下野了。

13日，蒋介石与吴铁城谈话，表示决不能将权力让给孙科。日记云：

与铁城谈哲生不肖，总理之一生为其所卖。彼到结果，不惟卖党，而且卖国。余为总理情义计，良心上实不敢主张哲生当政，乃爱之也。

同日，蒋介石与陈铭枢谈话，声称如粤方16日尚不来，则以后不再与之调和；如16日以前能来，则自己可早一日退让。12月14日，蒋介石决心辞职，邀请各干部会商办法。15日，蒋介石向中央常务会议提出辞呈，声称“国事至此”，必须“从速实现团结”，要求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②会上，“群言庞杂”，蒋介石觉得极度凄酸，日记云：

以手造之国家，辛劳八年，死伤部下三十余万，犹亲生扶长之子，欲使一旦放弃，不能相见。经国赴俄不归，民国扶持不长，皆欲使我一旦弃去。而今日又为慈母六十八岁诞辰。呜呼！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2月12日。

^②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60页。

于国为不义，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能不愧怍，未知以后如何自反，报答亲恩与党国也。

16日，蒋介石到国民政府办理交代。17日，孙科等5代表到蒋介石寓所见面。18日，蒋介石与汪精卫、陈璧君、陈公博谈话。汪精卫要求蒋介石出任监察院长，蒋介石表示同意，他对孙科出任行政院长表示疑问，认为外交部长一职，陈友仁不如伍朝枢。19日，蒋介石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谈话会，日记云：

汪派在沪选举十人，与粤方争持，始则粤与中央之争，今则粤又自争，此种争攘权夺利之政客，毫无革命精神。

汪精卫本来与胡汉民合作反蒋，11月18日，在广州共同召开另一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不久即闹翻，汪派改到上海，举行又一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2月20日，蒋介石与陈布雷商量后，决定不参加党务。^①21日日记云：“明日开一中全会，腐、恶化分子麇集一堂，诚所谓一丘之貉也。”22日，蒋介石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宁、粤、沪等各方合流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见到了他所憎恶，以及曾被他打倒过的许多人，大受刺激。日记云：

腐恶败类，凡为余之仇敌，皆被余打倒者，今皆齐集一堂，与之相晤。余对彼等，惟有可怜、可笑、可叹，而毫无芥蒂之嫌。以若辈败类，皆不足为我仇也。

蒋介石既然认为这帮人都是“腐恶败类”，自然也就认为不值得与之“同群”。同日，蒋介石不顾出任监察院长的许诺，乘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2月20日。

机离宁。

蒋介石返里后，曾进行反思，12月24日日记云：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允纳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陈济棠勾结左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致陷于内外夹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

“老者”，应指孙中山。蒋介石这一则日记批评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人，而且将“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余不能自主”，这是一句反映蒋介石个人思想的高度性格化的语言，不过，这并不是他“失败”的真正原因。前文曾谈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有开始调整国内外政策的动向。这一则日记说明，他的思想认识还远远落后于现实。真正将国内外政策转轨到对日抗战上来，还是几年以后的事。

原载台北《传记文学》1995年10月号

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

1937年的淞沪之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规模巨大、作战最烈的一次战争，时间长达三个月，日方动员兵力约25万人，中方动员兵力约75万人，其后的南京之战实际上是它的尾声。两次战争时间相连，地区相连，可以看作是一次大战役的两个不同阶段。

蒋介石决定拒和、应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长期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摸不清日方底细，方针难定，日记云：“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将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①次日，他一面派遣中央军北上，支持宋哲元部“守土抗战”，同时电复北平市长秦德纯等，“应先具必战与牺牲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失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②

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因此，在国民政府内外，都有一部分人积极主和，或者设法推迟大战时间。在国民政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8日。

^②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总第1120页。

府内部，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永昌为代表。他认为，中日空军力量之比尚不足一比三，抗战准备至少尚须六个月。7月14日，徐永昌致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张“和平仍须努力求之”。^①16日，徐致电阎锡山，“请为和平运动”。^②18日，通过魏道明转告外交部长王宠惠，“在能容忍的情势下，总向和平途径为上计”。^③何应钦同意徐永昌的意见，建议徐向时在庐山的蒋介石陈述。21日，徐永昌致函蒋介石称：“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盖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系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④24日，他又向蒋介石建言，“勿忘忍是一件很难挨的事”。^⑤

在知识阶层中，胡适、蒋梦麟等都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为此，胡适两次面见蒋介石。7月30日，他向蒋提出，“外交路线不可断”。五日，他向蒋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⑥8月6日，胡适要求在大战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他在面交蒋介石的书面建议中提出：1. 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 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 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⑦胡适希望经过努力，能在中日间维持五十年的和平。

① 《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14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1。

② 《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16日。

③ 《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18日。

④ 《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20日。本函所述，徐永昌已在19日的会上作过口头陈说。

⑤ 《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24日。

⑥ 参见拙作《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抗战与战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42页。

⑦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第1598-1612页。

和战是攸关国家命运、前途的大计，蒋介石不能没有矛盾。7月10日，蒋介石认为，日军挑衅，意在夺权卢沟桥，“此为存亡关头，万不使失守也”。^①12日，蒋介石得知日本关东军已到天津，内阁宣言动员全国政界与产业界拥护阁议，感到“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当日下午，与汪精卫商谈时局。^②同日晚，蒋介石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作持久战，严令制止与日方的妥协行为。16日，蒋介石邀集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应战宣言》。该《宣言》空前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③但是，对于这份宣言应否发表，何时发表，众议不一，蒋介石自己也犹豫不定。16日日记云：“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④17日日记云：“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⑤19日，蒋介石决定排除阻力，公开发表“应战宣言”，“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日记云：“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⑥当日决定核发战斗序列。为了减少这份《宣言》的冲击力，他将之改称为“谈话”。

庐山谈话的措辞空前激烈，但是，蒋介石并没有下决心关闭“和平解决”的大门，所以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此后，随着日本军事行动的扩展，蒋介石的抗战决心逐渐坚决。27日，日军全面进攻北平附近的通州等地，蒋介石日记云：“倭寇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10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12日。

③ 《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总第1131页。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16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17日。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19日。

既正攻北平，则大战再不能免。”“预备应战与决战之责任，愿由一身负之。”^①28日，日本政府下令长江沿岸近三万日本侨民撤离，显示出异乎寻常的迹象。同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沦陷。蒋介石感觉到，再不抗战，必将遭致全国反对。其日记云：“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蒋介石认为：中国方面可谓完全没有组织与准备，弱点很多，“以此应战，危险实大”，但日本“横暴”，“虚弱”，“以理度之，不难制胜”，“为民族之人格与振兴民族之精神，自有转危为安，因祸得福之机”。^②7日，蒋介石召开国防会议，会上，何应钦报告军事准备情形，提出第一期拟动员一百万人投入作战，其中，冀、鲁、豫方面约60万人，热、察、绥方面约15万人，闽粤方面约15万人，江浙方面约10万人，可见，当时尚未将上海地区视为主战场。何陈述的困难有财政开支扩大，枪械、子弹勉强可供六个月之需，防御工事未完成，空军机械不足等。蒋介石在谈话中对胡适主张颇有讥刺，参谋总长程潜甚至指责胡适为“汉奸”。会议决定“积极抗战与备战”。^③通过此次会议，抗战遂被正式确定为国策。

当时，蒋介石估计中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战期大约一年，而且估计“对外战争易于内战”。^④

中国军队力图“先发制人”， 但缺乏重武器，攻坚战未能取胜

上海处于东海之滨，距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不过三百公里。1932年5月的中日《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在上海只能由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27日。

②《本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8月31日；《困勉记》系此于1937年8月4日。

③《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8月7日；参见同日《王世杰日记》，〔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

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8月13日。

“保安队”维持秩序，而日军则可在上海公共租界及吴淞、江湾、闸北等地驻兵，建立据点。为防止日军自上海入侵，南京国民政府于1934年起密令修筑上海周边工事，在吴县、常熟等地，利用阳澄湖、淀山湖构筑主阵地——吴福（苏州—福山）线，在江阴、无锡之间构筑后方阵地——锡澄线，同时在乍浦与嘉兴之间兴建乍嘉线，以与吴福线相连。其后，又在龙华、徐家汇、江湾、大场等地构筑包围攻击阵地，并且拟有《扫荡上海日军据点计划》。^①卢沟桥事变发生，蒋介石为加强上海防务，接受何应钦推荐，任命张治中为京沪警备司令。张受命后，即命所部化装为保安队入驻上海虹桥机场等处。7月30日，张治中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一旦上海情况异常，“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蒋介石同意张治中的设想，复电称：“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②

日本海军积极主张向华中地区扩张。7月16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向日本海军军令部报告：局限战将有利于中国兵力集中，造成日方作战困难，“为制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要着”。^③8月7日，米内海军大臣建议杉山元陆军大臣向内阁提出，为保护青岛和上海日侨，应迅速准备派遣陆军赴华。^④次日，长谷川清得到指示，为因应事态扩大，实施新的兵力部署。9日，上海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长大山勇夫中尉携带士兵斋藤要藏，以汽车冲入虹桥机场，开枪射击中国保安部队，中国保安队当即还击，将大山等二人击毙。^⑤日

①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40页。

② 张治中：《揭开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序幕》，《八一三淞沪抗战》，第17页。参见余湛邦：《张治中——张治中机要秘书的回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第27页。

③ 《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4页。

④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1，第1页。

⑤ 《中央日报》，1937年8月10日。

军乘机在上海集中兵舰，以陆战队登陆，要求中国方面撤退保安队，拆除防御工事。海军中央部通知第三舰队称，除武力外，别无解决办法，将在陆军动员之后20天开始攻击。10日，日本内阁会议同意派遣陆军。长谷川清命在佐世保待命的舰队开赴上海。12日，陆军省决定动员30万兵力分赴上海与青岛。

保安队是上海地区仅有的中国部队。蒋介石认为，撤退保安队，上海将与北平一样为日军占领，决定拒绝日方要求，同时下令准备作战。11日，蒋介石得悉日舰集中沪滨，决定封锁吴淞口。同日，命张治中将所属八十七师王敬久部、八十八师孙元良两师自苏州等地推进至上海围攻线，准备扫荡在吴淞和上海的日军，拔除其据点。^①当时，日本在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总兵力不超过5千人。^②12日，国民党中常会秘密决定，自本日起，全国进入战时状态。^③何应钦在会上表示：“和平已经绝望”，“如果他稍有动作，就要打他，否则，等他兵力集中，更困难了。”^④

张治中原定于13日拂晓前开始攻击，但蒋介石因英、美、法、意四国驻华使节等方面正在调停，要张“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⑤同日上午九时15分，日本陆战队水兵冲出租界，射击守卫横浜路东宝兴路段的中国保安队，中国军队还击。^⑥10点半，商务印书馆附近的中国军队与日军发生小冲突。^⑦同日黄昏，八字桥附近日军炮击中国军队，中国军队以迫击炮还

^① 《上海作战日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263页。

^② 当时日本在上海的兵力说法不一，此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4页。

^③ 《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12日。

^④ 《中常会第50次会议速记录》，1937年8月12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1987。

^⑤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265页。

^⑥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35页。

^⑦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35页。

击。^①日军并以坦克掩护步兵攻击八十七师阵地，日舰连续炮击上海市中心。^②14日拂晓，张治中奉蒋介石令，发起总攻。同日，中国空军出动，轰炸日第三舰队旗舰及在虹口的海军陆战队本部。淞沪之战爆发，意味着中国在华北之外，又开辟了第二战场，名副其实地进入“全面抗战”。很快，淞沪战场就成了中国对日作战的主战场。

战争初起，中国方面以优势兵力进攻日军在沪各据点，双方在上海虹口、杨树浦等处进行巷战。15日至18日之间，中国军队进展至闸北、虹口、杨树浦之线。20日夜，推进至汇山码头，将日军压迫至黄浦江左岸狭隘地区，同时包围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等据点。但是，日军在上海的据点大都以钢筋、水泥建成，异常坚固。8月17日，张治中向蒋介石报告说：“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这种攻坚战，中国军队必须配备相应的重武器。张治中报告说：“本日我炮兵射击甚为进步，命中颇佳，但因目标坚固，未得预期成果。如对日司令部一带各目标命中甚多，因无烧夷弹，终不能毁坏。”^③仅有的三门榴弹炮，一门因射击激烈，膛线受损；一门膛炸；一门不能射击。这种情况，自然无法克敌制胜。

中国军队当时是否完全缺乏攻坚武器呢？并非。关键在于何应钦没有想到，蒋介石也没有想到。11月20日，蒋介石检讨说：“绪战第一星期，不能用全力消灭沪上敌军。何部长未将所有巷战及攻击武器发给使用，待余想到战车与平射炮，催促使用，则已过其时，敌正式陆军，已在虬江码头与吴淞登陆矣。敬之（指何应钦——笔者）误事误国，实非浅鲜。”^④

①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35-336页。参见《日军对华作战纪要》。

②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36页。

③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42页。

④ 《本周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20日。

蒋介石对张治中的指挥不满意。8月20日，陈诚向蒋介石提出，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事以牵制之。^①蒋介石对陈诚的这一战略思想没有表示肯定或否定，仅答以一定要打。同日，军事委员会将江苏南部及浙江划为第三战区，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陈诚为前敌总司令。张治中被任命为淞沪围攻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被任命为杭州湾北岸守备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守卫上海左翼浦东。这些举措，说明蒋介石开始重视上海战场，但是，蒋当时还没有在上海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对这次战争的艰难与严酷也还缺乏认识。当日日记云：“本日沪战颇有进展，南口阵地已固，此心略安。对英提案运用其能实现，使倭得转圜离沪，以恢复我经济策源地，以今日战况或有退却可能也。判断情报，倭寇陆海军意见纷歧，政府内部不一致，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势也。”^②次日，日本拒绝英国调停，蒋介石感到事态严重，“忧心倍增”。^③22日，蒋介石下令成立第十五集团军，以陈诚为总司令，守卫上海右翼长江江岸。

日本陆、海、空军协同，中国反登陆战失利

日军在上海的兵力有限，要持续进攻，必须通过海上的远距离运输，将军队源源不断地送到中国战场。中国海军的军力本极有限，舰艇在战争开始时或被炸沉，或奉令自沉长江，封锁航道，已经没有和日舰进行海上作战的能力；空军能作战的飞机不过一百八十余架，不足以从空中遏制日本运兵舰艇的航行。^④中国军队所能进行的只有反登陆，在海岸及相关纵深据点布置军

① 《陈诚私人回忆资料》，《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8月20日。

③ 《困勉记》，1937年8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

④ 《王世杰日记》，1937年10月12日。

队，阻遏日军，但是，中国方面又未予以足够重视，守卫江岸、海岸的兵力都很薄弱。

8月13日夜，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出兵。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为讨伐中国之暴戾，以促使南京政府之反省，如今已到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之地步”。^①同日，日本政府下令，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领第三、第十一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协助海军，扫荡、歼灭上海附近的中国军队，占领上海。17日，日本阁议决定：“放弃以往所采取之不扩大方针，采取战时态势上所需要之各种准备对策。”^②22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率第三、第十一师团到达上海东南的马鞍山。23日，日军第十一师团在三十余艘军舰密集炮火的掩护下，于长江南岸川沙口强行登陆，占领川沙镇，第三师团在吴淞铁路码头登陆，进攻上海北部的吴淞、宝山等地。据中国方面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长史说回忆：“在23日拂晓以后，日空军开始猛烈轰炸，使我援军不能接近，日海军也以猛烈炮火支援日军登陆。我沿长江岸守备的第五十六师和沿黄埔江口守备的上海市保安总团，兵力薄弱，日陆军登陆成功。”^③

日军登陆后，中国方面力图阻止敌人向纵深发展。张治中在敌机猛炸下骑自行车赶赴前线，一面任命王敬久为淞沪前敌指挥官，指挥部队固守原阵地，一面抽调第十一师彭善在部、第九十八师夏楚中部北上，拒止登陆之敌。双方在罗店等地激战。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数次猛攻，虽有进展，但均未奏效。28日，守卫罗店的中国军队伤亡过半，日军第十一师团占领罗店。31日，日军第三师团攻占吴淞镇。9月1日，日军精锐部队久留米第12师团等三个师团到达上海，实力大增，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攻击。

① 林石江译：《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7，第373页。

② 林石江译：《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第374页。

③ 《八一三淞沪抗战》，第95页。

9月5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及战车、炮舰、飞机联合进攻，中国第十八军第九十八师姚子青营奋力抗战，激战至第二日，全营官兵壮烈牺牲。^①蕴藻浜沿河之战，“双方死亡俱奇重，浜水皆赤，所谓流血成河，显系实在景况。”^②据陈诚报告，该部自8月22日参战，至9月7日，仅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八、第五十六五个师即伤亡官兵9039名，第六师吴淞一役，即伤亡过半。“大部受敌飞机、大炮轰炸，人枪并毁”。其三十六团第二连，守卫火药库，“死守不退，致全部轰埋土中”。^③

由于江岸地形有利于日本陆海空军协同作战，日军又源源增援，中国军队为减少损失，只能主动退守。史说回忆说：“日军在长江沿岸及黄埔江沿岸继续登陆，与我军一个点一个点地争夺，往往日军白昼占去，夜间我又夺回。”“在日军舰炮火下，伤亡惨重，往往一个部队，不到几天就伤亡殆尽地换下来了。我亲眼看见教导总队那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付伙食担子。”^④9月10日，第十五集团军右翼阵地被突破。11日，第九集团军奉命向北站、江湾等地转移。

反登陆战争失利，日军后续部队源源增加。9月11日，自青岛调来的日军天谷支队进入月浦镇。12日，由华北方面军转调的后备步兵十个大队陆续抵达上海战场。14日，自台湾调来的重藤支队登陆。中国军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为维护中苏交通线，蒋介石决定吸引日军改变主战场；

为配合外交斗争，蒋介石决定坚守上海

9月11日以后，中国军队转入顽强的守卫战。

作为淞沪战场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最先感到了中国军队的不

^①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54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37年9月6日。

^③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56页。

^④ 《八一三淞沪抗战》，第96页。

利态势。8月28日，罗店失陷，蒋介石日记云：“近日战局，渐转劣势，人心乃动摇矣。”31日，吴淞失守，蒋介石再次在日记中表示：“我军转入被动地位矣。”在这一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重新思考，仗将如何打下去。9月2日日记云：“战略应尽其全力贯注一点，使敌进退维谷，以达我持久抗战之目的。”“敌之弱点，以支战场为主战场，故其对华战争全在消极，且立于被动地位，故我如处置得策，不难旷日持久，使敌愈进愈穷也。”^①这则记述说明，尽管上海战场形势不利，但蒋介石决定“全力贯注一点”，在上海长期拖住日军。其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作战组长刘斐等向蒋提出，淞沪会战应“适可而止”，部队应及时向吴福线国防工事转移。蒋介石一度接受这一意见，下令执行，但第二天又决定收回命令。^②同月14日蒋介石日记云：“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长期抗战乎？”^③两种方案，前者意味着在上海和日军决出胜负，后者意味着向吴福线转移。这则日记，说明蒋对自己的战略决定有过犹疑。但是，这一时期，蒋从全国各地抽调的部队正陆续到达淞沪战场，因此，蒋仍然决定长期坚守上海。其日记云：“各部死伤大半，已觉筋疲力尽，若不支撑到底，何以慑服倭寇，完成使命也？”^④16、17日，日军发动总攻击，中方阵地动摇，前线指挥官向蒋要求撤退，蒋严令死守，并亲往昆山督师。^⑤21日，蒋介石调整部署，将中国军队

①《本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困勉记》系此条于9月2日。

②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3-4页。

③《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14日。

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10日。

⑤《王世杰日记》，1937年9月21日。此际，李宗仁也曾劝蒋，“淞沪不设防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见《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第692-693页。

分为右翼、中央、左翼三个作战军。右翼军以张发奎为总司令，下辖第八、第十两个集团军；中央军以朱绍良代替张治中为总司令，下辖第九集团军；左翼军总司令陈诚，下辖第十五、第十九两个集团军。

当时，中苏之间的枪械、弹药有两条运输线。一条是经外蒙古、内蒙古、山西大同至内地，一条经新疆、甘肃、山西，连接陇海路。9月11日，大同失陷，蒋介石极为震痛。14日日记云：“阎之罪恶甚于宋之<失>平津，其为无胆识，一至于此，实为梦想所不及也，可痛之至。对于苏俄之运货交通更生困难矣。”当日，蒋介石向自己提问道：“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长期抵抗乎？”^①25日，蒋介石得悉平汉线中国军队溃退，河北沧州不守，估计日军将进攻河南郑州，中俄之间的第二条联络线有可能截断，决定加强上海战场，吸引日军主力。^②27日，蒋介石决定四项抗敌策略：“一、引其在南方战场为主战场；二、击其一点；三、持久；四、由晋出击。”^③10月8日，蒋介石决定调骁勇善战的桂军加入上海战场。10月15日日记云：“相持半年，迟至明年三月，倭国若无内乱，必有外患，须忍之。”17日，蒋介石到苏州督师。次日，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场发动总反攻。

蒋介石之所以决定坚守上海，一是为了减轻华北战场的压力，维护中苏交通线，同时也是为了配合外交斗争，争取对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有较好的影响。《九国公约》签署于1922年2月，其签字国为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等九国。该条约表示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强调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与中国的门户开放。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国联申诉，要求“谴责日本是侵略者”。国联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14日。“运货交通”，《困勉记》改作“运械交通”。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25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27日。

没有采纳中国的要求，提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讨论。10月16日，比利时向有关19国发出邀请，初定同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蒋介石希望通过该次会议，“使各国怒敌，作经济制裁，并促使英、美允俄参战”。^①因此，蒋希望在该会召开之前，上海战场能有较好的战绩，至少，要能坚守上海。据唐生智回忆，蒋介石曾向他表示：“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②同月22日，蒋介石通电全军将士，说明九国公约会议即将举行，全体将士“尤当特别努力，加倍奋励”，“于此时机表示我精神力量，以增加国际地位与友邦同情”。^③为此，蒋介石向全国各地普遍调兵。24日，蒋致电龙云，询问滇军出发各部到达何处，要龙命令该军“兼程急进，望能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初到沪参战”，急图在会前有所表现的企图跃然欲出。^④

日本政府采取对应措施，不断从华北、东北及国内向上海战场增兵。10月1日，日首相近卫、陆相杉山、海相米内、外相广田会议，通过《中日战争处理纲要》，决定发动十月攻势，扩大华北和华中战局，将中国军队分别驱逐至河北省及原上海停战协定规定区域以外，迫使南京政府议和，结束战争。此后，上海战场日军参战兵力超过华北，达9个师团，20万人以上。17日，日本陆军省限令上海作战部队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前攻克闸北、南翔、嘉定一带。^⑤

双方既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较量，战场上的拼杀自然更加激烈。10月21日，广西增援部队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率部到沪，向蕴藻浜沿河之敌发起全线反攻。桂军作战勇敢，但武器落后，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0月23日。

② 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4页。

③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第55页。

④ 《蒋委员长致龙云十月敬电》，《革命文献·淞沪会战与南京撤守》，《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

⑤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281页。

缺乏与现代化武装的日军作战的经验，未能挽救危局。22日蒋介石日记云：“沪局以桂军挫败顿形动摇。满拟以桂军加入战线为持久之计，不料竟以此为败因也。”^①次日，桂军因伤亡过大，撤至京沪铁路以南地区整理。^②其他部队也伤亡惨重，第三十三师打到官兵仅剩十分之一，师长负伤，旅长失踪。^③25日，中央军第七十八军第十八师朱耀华部防地为日军突破，朱军放弃位于上海西北的战略要地大场。至此，蒋介石才觉得“沪战不能不变换阵地”，决定命中国军队作有限度的撤退，转移至苏州河南岸。但是为了给世人留下仍在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印象，他决定在闸北“派留一团死守”。^④27日夜，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团附谢晋元奉命率部留守闸北四行仓库，演出了八百壮士（实只四百人）孤军抗敌的悲壮一幕。31日，该团退入上海公共租界，坚持至1941年12月18日。

蒋介石认识到，中国的对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消耗战，但是，他提出的战略原则却是防守战。8月18日，他发表《告抗战将士第二书》，主张“敌攻我守，待其气衰力竭，我即乘胜出击”。“要固守阵地，坚忍不退，以深沟高垒厚壁，粉碎敌人进攻。”^⑤9月13日，蒋介石手拟《告各战区全军将士文》，再次强调固守，“虽至最后之一兵一弹，亦必在阵中抗战到底”。^⑥10月28日，他在松江召开军事会议，仍然表示：“要严密纵深配备，强固阵地工事”，“要不怕阵地毁灭，不怕牺牲一切”，“我们已移至沪战最后一线，大家应抱定牺牲的决心，抵死固守，誓与上海共存亡”。^⑦

要杀敌卫国，自然需要强调牺牲精神，但敌人拥有海、空优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0月22日。

② 《陈诚致蒋介石密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72页。

③ 《顾祝同致何应钦密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73-374页。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0月26日。

⑤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总第1148页。

⑥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总第1167页。

⑦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总第1179页。

势，配备重武器，呆板的防守战必然带来巨大的伤亡，最终也难以守住阵地。当时，日方有各种飞机 1500 架，而中国仅有战斗机、轰炸机 300 架。^①8 月 24 日，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云：“连日敌机甚为活跃，全日在各处轰炸，毫无间断，我军日间几无活动余地，威胁甚大。”^②白崇禧也表示：“无制空权，仗无法打。我官兵日间因飞机不能动，夜间因探照灯亦不能动。长期抵抗，须另有打算。”^③淞沪之战，中国军队士气旺盛，英勇抗敌，但蒋介石单纯防御，将几十万精锐密集于长江南岸狭长地区内，层层设防，硬打死拼，大量消耗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是很愚蠢的作战方法。后来，蒋介石回顾淞沪战役，就曾自我检讨，认为自己没有在九国公约会议之前，及早退兵于吴淞线、乍嘉线阵地，“而于精疲力尽时，反再增兵坚持，竟使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此余太坚强之过也”。^④

“坚强”是好事，但不顾条件，“坚强”太过，没有任何灵活性，就是执拗了。

蒋介石的大失误，忽视杭州湾防务

日军最初制订的作战计划是：在上海西北的白茆口和西南的杭州湾登陆，占有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地带。为此，日军早就对杭州湾实施侦察，收集地志资料。^⑤金山卫水深，可停舰艇，又有利于登陆的沙滩，明代倭寇扰浙时，即在此登陆。8 月 20 日，蒋介石得报，金山卫有日本水兵登陆侦察，指令“严防”。^⑥10 月 18 日，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情报提出，日军有在杭州湾登陆

① 《蒋介石秘录》第 4 卷，第 28 页。

② 《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 294 页。

③ 《徐永昌日记》，1937 年 11 月 12 日。

④ 《困勉记》，1938 年 2 月 2 日。

⑤ 《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第 554-555 页。

⑥ 《困勉记》，1937 年 8 月 20 日。

企图，但估计登陆部队最多一个师，不会对上海战局有什么影响。^①倒是张发奎有警觉，亲到当地巡察，并配置了兵力：以第六十三师担任乍浦、澉浦防务，以第六十二师担任全公亭、金山嘴防务。10月26日，中央军撤到苏州河南岸后，浦东防务紧张，张发奎遂将第六十二师主力调防浦东，当地仅余该师少数兵员，实力空虚。^②

11月5日，日军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以三个半师团的兵力，在舰炮掩护下，于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登陆。中国军队因兵力悬殊，无法阻挡。中国统帅部急令已调浦东第六十二师的主力回兵，会同新到枫泾的第七十九师合力反击，并令从河南调来、新到青浦的第六十七军向松江推进。蒋介石希望借此稳住阵地。6日，蒋介石日记云：“如我军能站稳现有阵地，三日以后当无危险矣。”^③但是，由于天雨泥泞，加上日机轰炸，中国部队行动迟缓，日军后续部队源源登陆。第六十七军从河南调来，尚未集中，即遭敌各个击破。8日，松江失陷，这样，退守苏州河南岸的中国军队侧背受敌，有被围歼危险。

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战场中国军队的侧背受到严重威胁，有可能陷入包围，使退却无路，全军覆没。有鉴于此，白崇禧再次向蒋介石提议，中国军队向吴福线后撤。11月7日，朱绍良、何应钦等也提出，“已到不能不后撤之时会”^④。蒋介石权衡利害，这才认识到保存有生力量的重要，日记云：“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失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相较，当以前者为重也。”^⑤同日，蒋下令中国军队自上海苏州河南岸撤退。^⑥但是，

①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282页。

② 《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81页。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

④ 《徐永昌日记》，1937年11月7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7日。

⑥ 参见《徐永昌日记》，1937年11月6日。

他仍然担心此举会对《九国公约》会议造成不良影响，痛苦地写道：“苏州河南岸以兵力用尽不能不令撤退，但并非为金山卫登陆之敌所牵动耳，惟藉此战略关系退，使敌知我非为力尽而退，不敢穷追与再攻，是于将来之战局有利，然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影响必甚大也。”^①

忽视杭州湾北岸防务是重大的战略错误。后来蒋介石总结说：“由大场撤退至苏州河南岸以后，易朱绍良，以张发奎为指挥官，使金山卫、乍浦一带，负责无人，而且不注重侧背之重要，只注意浦东之兵力不足，调金山大部移防浦东，乃使敌军乘虚直入，此余战略最大之失败也。”^②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必须既善于组织进攻，又善于组织撤退。蒋介石下令在苏州河南岸撤退后，中国军队争相夺路，秩序混乱，作战能力丧失殆尽。郭汝瑰说：“淞沪战役我始终在第一线，深知三个月硬顶硬拼，伤亡虽大，士气并不低落，战斗纪律良好，只要撤下来稍事整理补充，即可再战。唯有大溃退，数日之间精锐丧尽，军纪荡然。如在敌攻占大场时，就有计划地撤退，必不致数十万大军一溃千里。”^③11月11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南市，上海市长发表告市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据日方统计，至11月8日止，日军在上海战场阵亡9115名，负伤31257名，合计40672名。^④但是，中国方面损失更大。据何应钦11月5日报告，淞沪战场中国军队死伤187200人，约为日军的4倍半。^⑤更加严重的是，溃退后的军队虽然仍有庞大数量，但缺乏武器、弹药、粮食，士气低落，丧失斗志，不经整顿，已经很难再次投入战斗了。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8日。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20日。

③《八一三淞沪抗战》，第252页。

④《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第555页。

⑤《徐永昌日记》，1937年11月5日。

南京：守乎？弃乎？

日军攻占上海后，军方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军队已经非常疲劳，必须休整，一种意见认为，军队虽然疲劳，但仍应攻占南京。11月7日，日军编组华中方面军，以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规定以苏州、嘉兴连结线为“统制线”，在此以东作战。但是，第二天，日军就兵分两路。一路以上海派遣军为主力，沿沪宁铁路线西进，一路以第十军和国崎支队为主力，沿太湖南岸向湖州集结。13日，日军一部在常熟白茆口登陆，声势更盛。15日，第十军幕僚会议认为，中国军队已处于溃散状态，如果把握战机，断然实施追击，二十天即可占领南京。华中方面军赞同占领南京的意见，认为“现在敌军的抵抗，各阵地均极微弱”，如不继续进攻，“不仅错失战机，且令敌军恢复其士气，造成重整其军备的结果，恐难于彻底挫折其战斗意志”。^①

日军自太湖南北同时西进，威胁南京。11月13日，蒋介石决计迁都，长期抗战，粉碎日寇迫订城下之盟的妄念。日记云：“抗倭最后地区与基本线在粤汉、平汉两路以西。”“抗倭之最大困难，当在最后五分钟。”“决心迁都于重庆。”^②但是，南京是战是守，意见不一。高级将领中普遍反对“固守”。有人明确表示，不应在南京作没有“军略价值之牺牲”，白崇禧主张改取游击战，刘斐主张适当抵抗之后主动撤退，只作象征性防守。^③蒋介石一时也拿不定主意。11月17日，他曾经考虑过请美、德两国出面调停，也曾考虑请英美促进苏联参战，在南京固守或放弃之间“踌躇再四”。^④不过，蒋介石和唐生智都认为，南京为首都

① 《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作战》，第601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13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19日；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南京保卫战》，第8-9页。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17日。

所在，总理陵墓所在，不可不作重大牺牲。蒋并表示，愿自负死守之责。将领们认为统帅不宜守城，时在病中的唐生智遂自动请缨。^①19日，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刘兴为副司令长官，负责守卫南京，时间为三个月至一年。^②不过，蒋介石也确知南京难守。11月26日，蒋介石拜谒中山陵及将士公墓，叹惜道：“南京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无以为怀矣。”^③这正是蒋内心矛盾的表现。

淞沪之战打响后，主和之议一直未歇。9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主和意见派应竭力制止。”“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④次日日记云：“除牺牲到底外，再无他路。主和之见，书生误国之尤者，此时尚能议和乎！”^⑤及至淞沪战败，主和之议再盛。居正原来坚决反对和议，力主逮捕胡适，此时转而力主向日方求和，并称：“如无人敢签字，彼愿为之！”^⑥11月30日，蒋介石处理南京战守事毕，慨叹道：“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毫无革命精神，究不知其昔时倡言抗战如斯之易为何所据也。”^⑦

为了守卫南京，中国统帅部的第三期作战计划规定：京沪线方面，以最小限之兵力，利用既设工事，节节抵抗，同时抽调兵力，以一部转入沪杭线，抵御向太湖南岸进军的日军，一部增强南京防御能力。计划称，在后续援军到达时，将以皖南的广德为中心，与敌决战，在钱塘江附近歼灭日军。^⑧当时，中国军队已

① 《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19日；参见唐生智：《卫戍南京之经过》，《南京保卫战》，第3-4页。

② 《徐永昌日记》，1937年11月6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26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8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9日。

⑥ 《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21日。

⑦ 《本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30日。

⑧ 《淞沪作战第三期作战计划》，《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31页。

退至第一道国防线——吴福线，但是，这道被誉为中国兴登堡防线的国防工程却“无图可按，无钥开门，无人指示”。^①19日，日军进占苏州。俗语云：“兵败如山倒。”吴福线不守，中国军队主力继续向锡澄线及太湖西南的安吉（浙江）、宁国（安徽）等地溃退，蒋介石原来以为“有良好地形，坚固阵地，可资扼守”的锡澄线同样没有发挥作用。11月20日，蒋介石调集第二十三集团军川军刘湘部五个师、两个独立旅，由四川赶到皖南广德、浙西北的泗安、长兴一线。不过，川军作战能力很低，纪律很坏，“闻敌即走”，并未发挥多大作用。^②11月23日，蒋介石到常州，召集前方将领训话，局势也并无改变。11月25日，无锡失守。26日，位于太湖南岸的吴兴失陷。蒋介石得悉锡澄线守军撤退秩序不良，日记云：“不分步骤，全线尽撤，亦未得呈报，痛心盍极！”^③29日，日军侵占宜兴。30日，日军攻陷广德，从东南、西南两个方面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12月1日，江防要塞江阴失守。同日，日方下达“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应与海军联合进攻中国首都南京”的皇命，日军分三路进攻南京

蒋介石反对与日本议和，但不反对国际调停。早在日军金山卫登陆之际，德国大使陶德曼即受日方委托，向蒋转达日方媾和条件，“防共协定为主”，蒋介石“严词拒绝之”。^④24日，蒋介石曾经寄以希望的《九国公约》会议闭会，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性成果。12月2日，蒋介石为行“缓兵计”，再次会见陶德曼，表示愿以日方所提条件为谈判基础，但要求先停战后谈判。6日，蒋介石得悉句容危急，决定离开南京，他在日记“雪耻”条下写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三年组织，三年准备。”^⑤7日，蒋

①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33-334页。

② 《徐永昌日记》，1937年12月3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26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5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6日。

介石飞离南京。日记云：“人民受战祸之痛苦，使之流离失所，生死莫卜，而军队又不肯稍加体恤爱护，惨目伤心，无逾于此。”又写道：“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此外并无其他办法。”^①到庐山后，蒋介石即研究、制订全国总动员计划，准备在“全国被敌占领”的最坏情况下仍然坚持奋斗。^②他勉励自己：“宁为战败而亡，毋为降敌而存。”^③

南京的防御工事分“外围阵地”与以城墙为主要依托的“复廓阵地”两种。12月5日，日军进攻“外围阵地”。8日，汤山失守，唐生智下令中国军队进入“复廓阵地”。9日，日军逼近南京城墙，两军在光华门、雨花台、紫金山、中山门等处激战，光华门几度被突破。松井石根限令唐生智在10日午前交出南京城，遭到唐的坚决拒绝。12月11日，松井石根下令总攻。

淞沪战后，中国军队消耗过大，蒋介石百方拼凑，守城兵力仅得12个师，约12万人，而且士气极端低落，其中新补士兵约3万人，未受训练，匆促上阵，官兵间尚不相识。这种情况，本已不能再用守卫战、阵地战一类的作战形式。蒋介石之所以坚守南京，一是如上述，南京轻易失守，攸关体面；二是对苏联出兵有所期待。

当时在国际列强中，苏联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8月2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久议未决的互不侵犯条约，苏方允诺中国可不以现款购买苏联军火。9月1日，蒋介石就在国防最高会议上预言，苏联终将加入对日战争。^④28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奉召返国，曾和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谈及苏联参战的必要条件。^⑤10月22日，蒋致电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军事代表团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7日。

② 《困勉记》，1937年12月9日蒋介石称：“此次抗战，即使全国被敌占领，只可视为革命第二期一时之失败，而不能视为国家被敌征服，更不能视为灭亡，当动员全国精神力自困之。”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9日。

④ 《王世杰日记》，1937年9月1日。

⑤ 《王世杰日记》，1937年9月28日。

团长杨杰，询问如《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失败，中国决心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日期。11月10日，伏罗希洛夫在宴别中国代表张冲时，要张归国转告：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俄当出兵，决不坐视。30日，蒋介石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电称：“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①当时，蒋介石将苏联出兵看成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12月5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回电称，必须在《九国公约》签字国或其中大部分国家同意“共同应付日本侵略时”，苏联才可以出兵，同时还必须经过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该会议将在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后举行。^②此电与杨杰、张冲的报告不同，蒋介石内心感到，苏俄“出兵已绝望”^③，但他仍然再次致电斯大林，表示“尚望贵国苏维埃能予中国以实力援助”。^④不仅如此，他还继续以之鼓舞身边的高级将领，声称“俟之两个月，必有变动”。^⑤12月6日，蒋致电李宗仁、阎锡山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必可转危为安。”^⑥这里所说的“国际形势必大变”，仍指苏联出兵。12月11日，蒋已经指示唐生智等，“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⑦但第二天却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等称：“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

① 《蒋委员长致蒋廷黻、杨杰（请伏元帅转斯大林先生）电》，《革命文献·对苏外交》，《蒋中正总统档案》。

②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致蒋委员长十二月电》，《革命文献·对苏外交》，《蒋中正总统档案》。原电无日期，此据《徐永昌日记》考订。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5日。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340页。

⑤ 《徐永昌日记》，1937年12月6日。

⑥ 《蒋委员长致李宗仁、阎锡山等鱼电》，《革命文献·淞沪会战与南京撤守》，《蒋中正总统档案》。

⑦ 《南京保卫战战斗详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413页。

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惟我革命转败为胜唯一之枢纽。”蒋指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①不难看出，蒋所说所的“内外形势必一大变”的“外”，仍然包含苏联出兵在内。“苏俄无望而又不能绝望”^②，这正是蒋介石当时的无奈心理。

苏联与中国同受日本侵略威胁，因此，支持中国抗战，但是，苏联更担心德国入侵，日苏之间的矛盾又尚未发展到必须干戈相见地步，苏联自然不可能轻易在远东有所动作。

12月12日，日军继续猛攻，中华门、中山门、雨花门、光华门等多处城门被突破，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决定大部突围，一部渡江撤退。但是，由于情况混乱，撤退命令无法正常下达。除少数部队突围外，大部分军队拥至长江边，形成极度混乱的局面。挹江门外，“被踏死者堆积如山”。^③“仅有之少数船舶，至此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④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

在淞沪战败之后，南京失陷有其必然性，但是，突围与撤退时的严重混乱及其损失仍然是可以避免的。

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坚持抗战国策

首都失陷，常常和国家沦亡相联系，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有的现象。一时间，日军骄横气焰达于极点，中国政府、中国军

① 《蒋委员长致唐生智、刘兴、罗卓英电》，《革命文献·淞沪会战与南京撤守》，《蒋中正总统档案》。

② 《困勉记》，1937年12月6日。

③ 《宪兵司令部战斗详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433页。

④ 《陆军第七十八军南京会战详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424—425页。

队、蒋介石个人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怎么办？中国的路应该怎样走下去？

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当时的情况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①汪精卫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这时更加缺乏信心。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②显然，汪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孔祥熙这时也从“倾向和议”发展为“主和至力”。^③18日，蒋介石日记云：“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④当时，陶德曼的调停还在继续，蒋介石担心日方有可能提出比较“和缓”的条件，诱使中国内部发生争执与动摇。26日，蒋介石得悉日方提出的新议和条件，发现较前“苛刻”，认为“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内部不致纠纷，心头为之一安，决心“置之不理”。^⑤2月7日，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讨论，主和意见仍占多数，于右任等甚至当面批评蒋介石“优柔而非英明”。^⑥会上，蒋介石坚持拒和。28日，蒋与汪精卫、孔祥熙、张群谈话，声称“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⑦次日，再与于右任、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针，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也。”^⑧蒋介石认为，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国家定将出现大乱局面。次日日记云：“今日最危之点在

① 《困勉记》，1937年12月15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16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37年12月2日、27日。

④ 《本周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18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26日。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27日。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28日。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29日。

停战言和。”^①1938年1月2日，蒋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②他最终决定，拒绝德国方面的斡旋，坚持既定的抗战国策。

从8月13日至12月13日，蒋介石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指挥抗战四个月，战略、战术呆板，对国际力量共同制裁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未能及时组织战略撤退，造成中国军队空前巨大的损失，但是，淞沪、南京之战显示了中国军队、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的坚强不屈的精神，打击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和在短时期内速胜的美梦。此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广大战场上就愈陷愈深，终致不能自拔。

从战争学习战争。淞沪和南京之战期间，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认识到，中国对日抗战是持久战，必须以空间换时间，必须懂得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而不能在局部地区拼消耗；必须懂得运用阵地战、守卫战以外的其他作战形式。9月16日，蒋介石日记云：“上海之得失不关最后之成败，不必拘泥于此也。”^③11月7日，日记再云：“此时各战区以发动游击战争，使敌所占领各地不能安定，且分散其兵力，使之防不胜防也。”^④12月1日日记云：“战败敌军制服倭寇之道，今日除在时间上作长期抗战，以消耗敌力；在空间上谋国际之干涉，与使敌军在广大区域驻多数兵力，使之欲罢不能，进退维谷，方能制敌之死命，贯彻我基本主张，此旨万不可稍有动摇。”^⑤同月16日，南京失守后的第三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称：“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30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月2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16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7日。

⑤ 《本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30日。

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堡垒，以制敌之死命。”^①这些地方都说明，通过挫折和失败，蒋介石的战略思想有了长进。

还在淞沪之战的紧张关头，蒋介石曾经在日记中写道：“凡我中国之寸土失地皆洒满吾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血迹，使我世世子孙皆踏此血迹而前进，永久不忘倭寇侵占与惨杀之历史，必使倭寇侵略之武力摧毁灭绝，期达我民族斗争最后胜利之目的。”^②淞沪之战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军人所表现出来的浴血苦战、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与牺牲精神必将长留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① 秦仪孝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总第1200页。

^② 《本周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11日。

附记：蒋介石为何开辟新战场

当华北战场危急之际，蒋介石主动开辟淞沪战场。旧说之一以为，这是蒋介石为了将日军的进攻矛头由自北而南引向由东而西，以免日军过早地攻占武汉，截断国民政府自南京西迁的道路，是一项很高明的战略决策云云。此说曾引起激烈争论。一派主张蒋在事前即有明确意识，一派主张蒋在事前并无明确意识。两说长期相持不下。

关于开辟淞沪战场的原由，蒋1938年5月5日曾在《杂录》中写道：“敌军战略本以黄河北岸为限，如不能逼其过河，则不能打破其战略，果尔，则其固守北岸之兵力绰绰有余，是其先侵华北之毒计乃得完成，此于我最大之不利。我欲打破其安占华北之战略，一则逼其军队不得不用于江南，二则欲其军队分略黄河南岸，使其兵力不敷分配，更不能使其集中兵力安驻华北。中倭之战必先打破其侵占华北之政策，而后乃可毁灭其侵略全华之野心。总之，倭寇进占京沪，其外交政策已陷于不可自拔之境，而其进占鲁南，则其整个军略亦陷于不可收拾之地也。”^①据此可知，当时蒋介石开辟淞沪战场的目的，在于分散日军兵力，粉碎其首先占领华北的侵略计划。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年末。

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

——日方诱和与蒋介石的应对及刹车

中日秘密谈判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期间最诡异的事件。这不仅表现在中日双方，而且也表现在中国内部。一方面，蒋介石屡屡对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加以阻遏，但是，蒋介石本人又亲自掌控过几次对日秘密谈判。不将这些情况研究清楚，就无法真正了解谈判全局，也无法了解蒋介石的真实对日意图。

精心指导的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

南京陷落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主和派一度抬头，但蒋介石坚决拒和，力主坚持抗战国策。1938年3月13日，蒋介石专门在日记本中写了一段话：“中国对倭抗战，决非争一时之胜负与得失，而为东亚千百世之祸福有关，故不惜任何牺牲，非达到此目的，终无战乱终止之期。”^①但是，同年4月，中国军队在山东台儿庄取得胜利，蒋介石觉得中国有了和日本侵略者谈判的筹码，思想的天平开始倾向“和平”一端。4月9日日记云：“此时可战可和，应注重和局与准备。”^②此后，日方有希望英国

^① 《民国二十七年杂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4月9日。

出面充当调人之意，而蒋介石也曾决定派张群使英，在当地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以便于英国从中斡旋并担保。^①5月下旬，日本内阁局部改组，近卫首相以陆军前辈宇垣一成大将出任外相，企图借助他来抑制陆军。蒋介石看出宇垣将对华主和，准备利用宇垣，压制日本陆军中的少壮派。但是，蒋介石也提醒自己，防备宇垣对中国内部实行“挑拨离间”。^②日记云：“敌国阴狠，讲和时更增危机也。”^③果然，宇垣上台后，即不断向中国摇晃橄榄枝。蒋介石则以“刚柔得宜”的政策相对应。^④一面抵抗日本侵略军对武汉的进攻，一面也和日方代表在谈判桌上周旋。8月下旬，蒋介石开始指导萧振瀛和日本军部特务和知鹰二进行谈判。

萧振瀛（1886-1947），字仙阁，号彦超，吉林扶余人。曾任西安市长。1930年任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总参议。1935年任天津市市长。次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其间，曾多次与日军驻华北将领多田骏等人谈判。1937年抗战爆发，萧振瀛任第一战区长官部总参议。1938年7月下旬或8月初，日本军部特务“兰工作”负责人和知鹰二到达香港，萧振瀛与和知是“旧友”，因此受命与和知谈判。谈判中，和知提出总原则6条，其中有诱饵，也有新的侵略要求：1. 停战协定成立之时，两国政府正式命令，停止一切陆、海、空军军事敌对行动，中国政府以新的姿态，恢复七七卢沟桥事件以前状况。2. 日本政府绝对尊重中国主权、领土、行政之完整。3. 两国军事完全恢复战前原有状况后，以平等互助为原则，商订经济协定，以谋东亚经济全面的合作。4. 两国谋国防上之联系，在共同防止共产主义目标下，商订军事协定。5. 两国政府努力恢复两国人民情感上之亲善与谅解，取缔一切互相排侮之言论。6. 两国在此次事变中所发生之一切损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4月18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5月27日、30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6月7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6月28日。

失，以互不赔偿为原则。和知提出的《经济协定基本原则》共4条：1. 本平等互助原则，尽先欢迎日本投资，如日本财力不逮，可向欧、美各国商借资本。2. 资源与市场之紧密调整与提携。3. 两国互惠关税之协定。4. 战后复兴之合作。其《军事协定基本原则》共3条：1. 中日两国共同防卫，共同作战。2. 平时训练，得聘请日本军事顾问及教官，向日方订购及补充器材。3. 国防之联系。军事内容与情报之交换。^①

当时，日军正节节向武汉逼进，和知“求和”，使国民党内部的部分“主和”派觉得是个机会，但蒋介石对此却不抱希望。8月26日，蒋介石与智囊、《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商谈，对张表示：“观察倭寇在华之权益与设施，岂能随便放手还我乎？若无重大变化与打击，彼决不罢手。一般以为和知来求和抱乐观者，实未究其极也。”^②他在日记中明确写道：“对和知应拒绝。”“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乃可使倭寇失败，中国独立，方有和平之道也。”^③9月23日，蒋介石返回汉口，主持汇报会议，决定对策。由于和知的条件首先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梦想，自然勾起蒋的兴趣。会议决定：“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与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允停战。”^④此前，国民政府一直要求，在与日本谈判时必须要有第三国保证，但是，就在几天前，英、法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捷克主权以绥靖纳粹德国；因此，汇报会议决定，可直接与日方谈判。9月26日，蒋介石增派曾任北平社会局长、有对日交涉经验的雷嗣尚到港，加强谈判力量。这一时期，蒋介石正在观察欧战的状况，

^① 《对方特提稿》，1938年10月，《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和平酝酿》，[台北]“国史馆”藏，本文以下简称“蒋档”。

^② 《困勉记》，1938年8月26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8月26日、9月3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9月23日。

认为如欧战不能即起，有机即和；如欧战果起，“则对倭更须作战到底”。^①

9月27日，萧振瀛、雷嗣尚与和知鹰二第一次会谈，首先告以军事协定不能签订。和知答称，军事协定与经济协定，均在恢复七七以前原状后再办。事后，萧电蒋报告。蒋复电指示：“1. 与对方谈话，切不可稍有一点增减，必须依照所面述之范围，万不可有所出入。2. 不可抱有成就之望，要知我方全处被动地位，迁就不但无益，必受大害。如主动方面有诚意，我方不迁就，亦能成就也。3. 每日在途中住宿地，能通长途电话时，请通电话一次，以便随时接洽，恐逐日局势有变化，俾可随时洽商也。4. 对于无商量余地之事，如彼方再三试探，必须坚强拒绝，以我方本不望有所成就，而所欲望成者，实在对方也。此意须特别认识，并知我国至此，实毫无其他希望，只有死中求生之一途也。5. 一切言语态度，须十分稳重从容，万不可带有急忙之色。缓急先后，皆由其便。我方必须以无所为〔谓〕之态度处之，更不要求其必答，有所期待也。须知我方除此之外，并无再可商洽之事，即以此为最后之办法也。6. 所写具体各件，切不可书面明示彼方，且须对彼言明，无具体成文之件携来，一切皆以口头商洽，作为临时相商之事可也。”^②

当日午后，萧振瀛等与和知第二次会谈。萧等向和知说明：1. 中国方面，自孙总理至蒋委员长，对于日本之强盛，均有深刻之认识与敬意，企求自存、共存，与日本共定东亚大计。日方苟有和平诚意，中国必以诚意应之。2. 日方尝强调东亚主义，以“东亚之事，东亚之人自了之”为内容，中国亦甚同情，但因弱国恐受强国欺凌之故，始终不愿直接交涉，必须有第三国介入并保证，方能重建和平，但如日方确有诚意，尊重中国行政、主权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9月26日、28日。

^② 《无题》，见“蒋档”，但据〔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事略稿本》1938年9月27日条，该文系蒋介石复萧振瀛“感辰电”的后一部分。

及领土之完整，则中国自当以最大诚意，与日方直接谈判，不要第三国介入。此事如能实现，即东亚主义之大成功，即日方之大胜利、大收获，其重要性尤在一切之上。3. 现在日军进攻武汉，大战方酣，中国方面不能作城下之盟，故目前最要之着，为停止军事，恢复七七前之状态。4. 如果军事停止，一切恢复七七前状态后，中日两国诚意展开两国、两民族之全面合作，将来定可做到经济合作，外交一致。5. 中国自十六年清党以来，即站在坚决剿共立场，日方必有正确认识，共产主义断乎与中国国情不能相容。中国国内之防共，中国自能为之。6. 日方尊重中国行政、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中国内政绝不干涉。中国人最恨者，为日、鲜浪人之贩毒，认为是灭种政策，必须切实取缔；中国最疑畏者，为日方所设在华特务机关，认为是亡国政策，必须加以取消。7. 中国不骗人，作敌彻底，作友也彻底，将来必做到中国人爱日本如爱中国，同时日本人爱中国亦应如爱日本。8. 如果日方能以强国大国风度，照此做去，不问国际形势如何演变，即在日本极不利之环境下，中国亦必以最大诚意直接谈判，重建和平。^①

和知认为萧振瀛的谈话在原则上、精神上与日方认识相同，双方取得初步结论：1. 停战协定中不涉及军事协定字样。2. 俟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后即订经济协定。3. 对中方提出的不订军事协定问题，和知本人认为可以商量，但恐东京方面坚持，故对此点表示保留。4. 和知同意，由日本先发和平宣言，中方以和平宣言响应，即停止进攻若干日，作为双方正式代表签订停战协定的时间，其签订地点可在香港。5. 双方和平宣言须以电报事前商定原稿，方得发表。6. 和知定28日晚回东京，作最后决定，于10月10日前电告，和知本人随后即来香港。7. 和知离港后请雷嗣尚飞汉，面陈详情。^②

^① 《此次谈判经过》，1938年9月30日，“蒋档”。

^② 《萧仙阁（振瀛）感亥电》，见《困勉记》，1938年9月28日。

同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要求向对方坚决表示：“原状未复，诚信未孚，即未有以平等待我中国之事实证明以前，决不允商谈任何协定。不仅军事协定之字样不得涉及于停战协定之中，即经济协定，在原状未复以前，亦不能商谈。”关于“经济协定”，电称：“兄等携来经济协定之原稿，无异亡国条件，更无讨论余地。”关于“停战协定”，电称：“只可订明停战之时间、地点与日本撤兵及恢复七七以前原状之手续与月日，此外不能附有任何其他事项。”关于“停战日期”，电称：“停战之日，即为停战协定同时发表之日，决不可以停止进攻若干日为签订协定之时间。换言之，中国于停战协定未签订之前，绝不愿停战。”蒋介石并要萧振瀛郑重声明：“原状未复，且未有以平等待我之事实证明以前，决不能再提军事协定，且绝无保留之余地，否则请明告对方，无从再约续谈也。”^①萧振瀛收到蒋的电报后，于当日与和知进行第四、第五次会谈，反复讨论，和知表示愿作让步：1. 对停战协定中不出现军事、经济协定字样一条，认为可以商量。2. 对中方要求日方以事实表示诚意，非恢复七七前原状后，不商谈任何协定一条，表示“颇谅解”。但是，和知也表示，关于将来中日合作的具体内容，事前须取得一种“无文字的谅解”，“否则，日方无以自圆其立场”，证明中方“毫无诚意，日本断难相信”。^②28日晚12时，和知离港回国，行前向萧振瀛透露：日方此举的国际根本原因是，希特勒最近多次电请日方与中国谋和，共同对苏；其次要原因则为日本国内困难重重，不堪应付长期战争，拟在军事优势下，以较大让步取得和平。和知称：近卫文麿、板垣征四郎、多田骏等虽有远识，但日本朝野各方，尚无普遍认识。此次回东京，遭遇困难必多，将拼死努力，于10月10前以日方最后态度相告。^③

^① 《9月28日复萧仙阁电》，“蒋档”。据《困勉记》1938年9月28日记载，知此电为蒋介石所发。

^② 《萧仙阁艳辰电》，1938年9月29日收，“蒋档”；又见《困勉记》。

^③ 《此次谈判经过》，“蒋档”。

9月29日，萧振瀛致电蒋介石，报告28日与和知会谈情况，声称前后谈话，均以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为唯一前提，与蒋的指示并无出入。在转述和知临行前密告的日方谋和原因后，萧称：和知此次奉近卫、板垣、多田之密令而来，态度确甚诚恳、坦白，条件亦较以前多次提出者为合理。最近东京将举行重要会议，决定武汉会战之后的对策，但日方亦有主张“硬干到底”者，南京伪组织、北平伪组织又多方破坏和局，故前途定多周折。^①他要蒋介石表态，“若双方意见，距离尚不甚远，而和知再度来港，我方应如何应付，应请预筹”。^②

萧振瀛与和知在香港的谈判以日方承认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前提，符合蒋介石的要求，谈判也似乎进展顺利，蒋介石甚至开始研究和谈成功时的停战、撤兵要点。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甲、分区交代。乙、交接与冲突时之地方治安维持办法。丙、交接时防制（止）误会。丁、预防察绥与冀东及伪组织之处置。”又云：“停战、撤兵后，先订不侵犯条约，后商互助协定。”^③10月2日，蒋介石从孔祥熙处读到香港情报一件，其中谈到日人百武末义回国活动中日议和情形，百武希望了解，如果日本发表和平声明，中国是否能够发表声明响应。蒋介石当即电询孔祥熙，“其言是否可信”。他指示：“总要前途先拟整个确实办法，再谈双方宣言也。”^④此后，中国方面即开始草拟《和平宣言》。

中方草拟的《和平宣言》称：

中国所求者，惟为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民族自由、平等之实现。日方诚能如其宣言所声明，对中国无领土野心，

①《萧仙阁艳辰电》，“蒋档”。

②《此次谈判经过》，“蒋档”；《事略稿本》，未刊，1938年9月30日。

③《困勉记》1938年10月1日；参见同日《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④《事略稿本》；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0月2日。

且愿尊重主权、行政之完整，恢复卢沟桥事变前之原状，并能在事实上表现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则中国亦愿与日本共谋东亚永久之和平。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此为中国立国唯一之政策，亦为世界各友邦所深信，况与日本为同文同种之国家，诚能共存共荣，何忍相仇相杀！苟日本能以诚意相与，中国亦以诚意应之。倘使能以此次战争之终结为枢纽，一扫荆棘，开拓坦途，共奠东亚永久之和平，是不仅为中日两大民族之幸，亦为世界全人类和平之福也。

蒋介石特别在“中国亦愿与日本共谋东亚永久之和平”一句下以红笔加写了一段话：“我政府对于和战之方针与其限度，早已屡次声明，即和战之标准全以能否恢复七七以前之原状为断。盖始终以和平为主，认定武力不能解决问题也。”^①中方也草拟了《停战协定》草案等有关文件。《停战协定》草案共5条：1. 停战协定成立之同时，两国政府即命令各该国陆、海、空军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日本并即撤兵，在本协定签字后三个月内恢复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之原状。2. 日本政府绝对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3. 两国政府努力恢复两国人民情感上之亲善与谅解，取缔一切互相排侮之言论行动。4. 两国在此次事变所发生之一切损失，以互不赔偿为原则。5. 本协定自发布之日起发生效力。草案提出：该协定可在福州或九龙签字，在中国方面发表《和平宣言》后一日公布。日军撤兵分三个时期，每期一个月，至第三期时，日军完全撤出黄河以北及黄河、长江以南，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考虑到清末《庚子条约》规定外国军队在平津一带有驻兵权，蒋介石特别以红笔加添了一句：“日本在平、津一带之驻军人数务须与庚子条约相符，勿多驻兵。”^②关于当时存在于华北、华中的两个伪政权，草案提出：1. 自停战协定签订之日起两

① 《中国宣言原文》，“蒋档”。

② 《停战协定原文》，“蒋档”。

星期内，南北两伪组织即行取消。2. 国民政府对于伪组织之参加者，宽大处理，但绝不能有任何条件。关于中日两国合作问题，中方提出：“必须在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后，方能商订协定，事前只能交换意见，成立精神上的无文字的谅解。”关于《经济协定》，草案提出：“绝对以平等互惠为原则”，日方“所提原则，尚须修改”，“将来举行经济会议，决定具体内容”。在此，蒋介石以红笔批示：“此时绝对不得商讨内容与具体办法。”^①关于《军事协定》，草案提出：“在恢复原状后，可先商订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批示称：“此可研究。”^②关于“满洲国”问题，草案拟订了“相机应付”的三条谈判意见：1. 日方自行考虑，以最妥方式及时机，自动取消“满洲国”，日本保留在东北四省一切新旧特权，但承认中国之宗主权。2. 中国承认东四省之自治，而以日本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为交换条件（如租界、领事裁判权、驻兵、内河航行等等）。3. 暂仍保留。蒋介石在第三条后加了一句：“待商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再谈。”^③

10月8日，雷嗣尚到汉口向蒋介石请训，蒋当面指示：1. 对方如确有诚意，应在10月18日以前完成一切手续，否则不再续谈。2. 我方绝对不要停战，更不害怕汉口失守，尽有力量支持长期抗战，此层应使对方彻底认识。3. 直接谈判系指此次事件之解决而言，并非永久受此限制，但对方如不质询此点，我方自不必自动说明。4. 此次谈判，系对方主动，我方诚意与之商洽，对方不得故意歪曲事实，散播不利于我方之宣传，否则认为对方毫无诚意。5. 停战协定系两国政府间之协定，不可作为前线军队与军队间之协定。6. 谈判重点应集中于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若对方能做到此层，以后双方定能开诚合作。^④蒋特别强调：“绝对拒

① 《关于将来双方合作之谅解部分》，“蒋档”。

② 《关于军事协定者》，“蒋档”。

③ 《关于满洲国问题之考虑》，“蒋档”。

④ 《面训要点》，1938年10月8日。参见《事略稿本》同日条。

绝之事，宁死勿允。”“凡将来之事，不可先提限期，自处束缚。”“破裂则不怪，越范则不可。”^①

和知于9月28日离港返回日本后，于10月15日再到香港。16日，与萧振瀛会晤称：回国后向近卫、多田、板垣等人汇报，都认为蒋介石“有诚意”，愿意放弃此前历次宣言，以诚意商谈。日方并经最高会议决定，中日停战协定可以不涉及任何其他协定，但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后必须有七项谅解。甲、防共军事协作及驻兵；乙、中国政府之调整；丙、伪组织之收容；丁、“满洲国”之承认；戊、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己、日、华、“满”经济提携；庚、战费互不赔偿。这七项“谅解”表明，日方虽然声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但顽固地要求中国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国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并且狂妄地要求中国政府改组。和知深知这些条件不可能为中国政府接收，因此有意作了“弱化”，其“解释”是：甲、如中国政府自动实行反共，则可秘密约定。所谓驻兵，指将来在内外蒙边防，双方作军事布置之意。乙、所谓“中国政府之调整”，指“酌令接近日本之人员参加，以便促进中日两国亲善之关系”。丙、所谓“伪组织之收容”指对其主要人物酌予安置。丁、满洲国问题暂可不谈，待合作三、二年后再商解决。戊、日、华、满经济提携，满字可不涉及，军事协定亦可不再订。和知称：前次所谈原则，只有军、参两部最高首脑同意，此次则已取得内阁全体之同意。表面虽近烦苛，实际已经让步。如防共问题，倘使中国自有办法，则协定之有无，仍可从长商讨。又称：自天皇以下对于此事均盼速决，只须双方诚意努力，当可顺利解决。关于日军当时仍在向华南进兵问题，和知解释说，此系以前预定计划。如和谈有眉目，即可停止。和知并表示，可致电日本军部，通知前方，对于夜间飞机，不加袭击，以便代表在香港、汉口之间往来。对于和知提出

^① 上述指示，无题，且时间不明。“蒋档”整理者置于《10月14日电萧》之后，但其中有“以十八日为限期，防其缓兵”之句，可知必与《面训要点》同时。

的上述条件，萧振瀛称：“超出前谈范围，不能答复。”17日夜，萧振瀛致电何应钦，请示“究应如何”。^①

10月18日，何应钦复电指示：日方所提“谅解”，甲、乙、丙、丁四项，都是“干涉中国内政”。“若行政不能独立，无异等于亡国，万不能承认。如其再提此等事，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必续谈”。关于戊项，何应钦认为，日方仅提“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而未提尊重“中国行政之完整”，“是其居心仍欲亡我中国。如其有诚意，则其宣言必须言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决不能将行政二字删而不提也”。关于己项，何应钦称：中日经济提携，必须在恢复原状后方可商讨。他表示，“我方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可言”。日方有无诚意，以10月20日为期，过此即作罢论。何应钦提醒萧振瀛说：“须知侵粤以后，内外情势大异，不容有从容商酌余暇也”。^②该电在当时的谈判文件中被称为“巧未电”。

何应钦发出“巧未电”后，又迅速发出“巧酉电”，补充说明：关于日方所提甲项，历年以来，委员长及中央所发宣言一再声明，除三民主义外，不容有共产主义存在，此为我方坚决立场。如对方不提甲、乙、丙、丁四项，则将来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后，在内外蒙边境军事布置一层“或可情商”。电称：“若对方果有诚意，弟可向委座恳切进言，但不能作为军事协作或防共之谅解事项。又互不侵犯协定，我方愿在恢复事变前之原状后，即行商订，然后再商经济协定也。”^③不过，“巧酉电”发出后，何应钦觉得其中有不妥之处，又于19日发电纠正：“该电末句‘然后再商经济协定也’，应改为‘再商经济合作也’”。当时，中方《和平宣言》已经起草完毕。何应钦在电中特别指示：“在日

^① 萧振瀛：《致汉口何部长》，“蒋档”。

^② 何应钦10月18日电，“蒋档”。此电无题，未署名。据内容考证，知为何致萧振瀛电。

^③ 何应钦：《致九龙森麻宾道18号萧彦超》，“蒋档”。

方宣言稿未提出之前，不可先将我方宣言稿示之。”^①该电称为“皓卯”电。发出此电后，何应钦仍不放心，又于同日发出“皓午电”，电称：

密。奉谕：昨日各电，关于经济合作与军事布置等事，必须待恢复原状后，以能否先订互不侵犯协定为先决问题。又无论何项合作，必以不失我独立自主之立场而不受拘束为法则，请于此特别注意。^②

两日之内，连发四电，可见何应钦的重视。“巧酉电”中，何应钦在“或可情商”四字后加注说明“系遵电话谕所改”；在“恳切进言”四字后，何应钦加注说明，“系遵电话谕所增”；本电一开始就是“奉谕”二字，这些地方都说明，上述各电，反映的都是蒋介石的主张。

10月19日，萧振瀛与回汉请示又于18日赶回香港的雷嗣尚继续与和知谈判。在长谈7小时之后，双方在六个方面取得“大体接近”的意见。1. 双方《和平宣言》原稿，须互相同意，宣言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再发表，作为协定之解释而发。2. 《停战协定》内容只载以下三项：（1）规定停战日期及地点。（2）日本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3）在恢复战前和平状态后^③，中国政府诚意与日本谋两国间之全面的^④亲善合作。3. 日军撤退问题，中方要求规定撤退期限，和知表示，日本天皇诏令班师，约须一年方能撤完。4. 经济合作问题：（1）以绝对平等互惠为原则；（2）在恢复战前和平原状后召集中日经济会议，决定具体内容。5. “满洲国”问题，保留二年，中国再考虑日方所关心

① 何应钦：《致九龙森麻宾道18号萧彦超》，“蒋档”。

② 同上。

③ 萧振瀛原注：“原为‘恢复七七前原状后’，和支〔知〕坚请改如上文。”

④ “全面的”，萧振瀛原注：“三字亦和支〔知〕所加。”

之满洲问题，诚意谋合理解决。6. 双方因战争所发生之一切损失，互不赔偿。^①

萧振瀛在电报中称：上述六点，“均接近我方腹案”。此外尚有三点，和知极端为难，研究费时甚久，即：1. 和知欲将撤兵及其将来谅解留交正式代表团谈判，我方则坚持须先商定一切内容，方能成立停战协定。此点经讨论，和知表示同意。2. 关于防共军事协定及驻兵问题，萧等恐其别有打算，坚请说明具体办法。和知称，防共可不要协定，只要中国自行铲共，问题即可解决。所谓军事协作及驻兵问题，系指内外蒙一带之军事共同布置而言。对此，萧等表示：1. 中国自行清共，日方不必提及。2. 在恢复战前和平原状后，内外蒙边军事共同布置可商，但其他区域必须完全恢复战前原状。^②萧称：此点和知已电东京请示，尚未得复。关于收容伪组织，和知闪烁其词，若有难言之隐。萧等称：取消南北伪组织，系和议一切前提，否则，恢复原状一语，毫无意义，且此问题，前已完全解决，此次应不再谈，否则，无从再谈和议。对此，和知及参与谈判的何以之均称：土肥原一派仍支撑伪组织，王揖堂、梁鸿志听说和知赴港，已聚集沪上，问题趋于复杂化，须去电请示，得复后尚须再听取北平、上海现地意见，方能定案。萧等遂声明：1. 南北两伪组织及战区内一切伪组织，必须即刻取消；2. 中国方面可表示，凡参加战区维持治安者，一律宽大处置。和知最后表示，个人同意，仍须电东京请示。^③

蒋介石在收到萧振瀛与和知 19 日的长谈资料后，立即研究并以红蓝铅笔作了修改。其一，在“大体接近”的第三条上以红笔眉批：1. 撤兵日期必须在停战协定详细载明；2. 必须载明恢复七七前原状。3. 此“全面的”三字不能加入。其二，在“为难”

① 《和知第二次到港会谈经过》，1938 年 10 月 21 日，“蒋档”。

② 萧振瀛原注：“以上表示，系遵巧酉电训。”

③ 《和知第二次到港会谈经过》；参见《限即刻到汉口何部长》，1938 年 10 月 21 日，均见“蒋档”。

问题的第二条上以蓝笔眉批：“必须先行撤兵，恢复七七原状，然后再商驻兵问题。内外蒙交界之线最多以张北、沽源与大青山以北之线，对于兴和、陶林、武川、固阳、安北，必须驻扎华军。其三，在萧等坚决表示的第二点“其他区域”四字下，以红笔加了问号，在“必须完全恢复战前原状”句上以红笔眉批：“区域二字，应改为事项，否则对方将解释为察、绥二省全境矣。”^①以上情况表明，为了换取日方承认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即行撤兵，蒋介石考虑过：同意日军在长城以外某些地区驻兵的要求。

10月21日清晨，和知离港，返回东京。行前，与萧振瀛密谈，声称因防共军事协定、驻兵及伪组织问题，颇形烦难。上海方面，梗阻尤大。土肥原曾来电，请其返沪，故决定先回东京，向中央部陈述，拟在10月25日以定案电告中方。萧振瀛称：如和局可成，必须在10月30日前完成手续，11月10日前在福州签订停战协定，否则即作罢论，不再续谈。^②同时约定，由和知通知日军，自23日至27日午后九时至午前三时之间，停止攻击香港至汉口的夜间航班，以便往来。关于中方全权代表，和知要求由何应钦出任；日方全权代表，何以之暗示，土肥原偏见颇深，以多田骏代替土肥原最佳。^③

萧振瀛在写给蒋介石、何应钦的报告中称：和知态度，确甚恳挚，一切问题，有研究而少争执，但是，日方动员60个师团，耗财百亿，死伤数十万，必须求得代价，方能自圆立场，因此，我方“惟有善用内外形势，示以不可克服之力量，又饵以将来可以合作之诚意，似可就我范围，实现和局”。^④

① 《和知第二次到港会谈经过》。

② 《萧仙阁皓亥电》，1938年10月19日；《和知第二次到港会谈经过》，蒋档”。《经过》在“11月10日前签订停战协定”句下有萧振瀛原注：“上约时期，因事实需要，故与巧西电训，略有出入。”

③ 《和知第二次到港会谈经过》，1938年10月21日。

④ 《和知第二次到港会谈经过》。

萧振瀛对和谈前途有某种乐观，蒋介石却一直心情矛盾，举棋不定。9月27日，蒋介石萌生“欧战如不能即起，对倭有机即和”的想法，但他又担心和议达成后可能出现的三种状况，一是停战后日方不撤兵或不缴还华北，二是共党扰乱，不从命令；三是英美不悦。^①10月3日，蒋介石继续研究和议，日记云：“媾和险矣。敌军对支院与特务总监之既经设立，岂肯轻易放弃？”他除继续担心日军停战后拒不从华北、上海、察、绥等地撤退外，还担心“对内宣言”以及“死伤军民之抚慰”等问题。^②5日日日记云：“敌既欲求和而又稽延不决，以探我军虚实缓急之情。小鬼可鄙，何能施其伎俩也？余惟有以拙制巧，以静制动而已。”^③7日，蒋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敌来求和是否为缓兵消耗我主力之计”，决定确定限期，不许日方拖延时日，同时绝对拒绝军事协定与经济协定。^④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鹏湾（应为大亚湾——笔者）登陆。13日，攻占河南信阳。日军的这两次军事行动使蒋介石强烈怀疑日方的和平诚意，决心坚持抗战。日记云：“倭既在粤登陆，我应决心持久抗战，使之不能撤兵。”“勿以国际外交之关系而影响作战方针。”“勿忘三年前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之准备，况平汉粤路以东地区抗战至今十五月之久，而敌犹不能占领武汉，则以后抗战必更易为力。敌军侵粤，实已达成余第三步之计划矣。”^⑤此前，蒋介石早有利用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解决中日一切问题的打算，日军侵粤，战区扩大，不仅让蒋看到了日军陷入被动，会出现更多的“灭寇良机”，而且让他感到，英国与日本妥协的可能将会减少，召开太平洋各国和平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9月27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0月3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0月5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0月7日，参见同日之《事略稿本》与《困勉记》。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0月13日。

会议，共同对付日本希望已经大为增加。10月14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称：“敌既在粤登陆，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可与之多谈。”^①他随即决定将前此准备的“谅解”方案作废。此时，进行多时的武汉会战已近尾声，预定打击日军的计划已经完成，为保存有生力量，蒋介石决定自武汉撤退，正在草拟《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10月21日，蒋自思云：“敌方答复延缓，并无诚意之表示，余当考虑发表宣言以示决绝。语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非下此决心，无以救国。”^②24日，蒋介石接受各将领要求，离开武汉。次日，下令对武汉若干要害地区，进行爆破，以免为日军所用。

和知麿二返日密商后，旋即来华，10月25日到达上海，立即致电萧振瀛，盼何应钦急赴福州，同时声称将派人携函赴港，28日可到。萧振瀛认为“和局当已有望”，于26日致电何应钦及蒋介石，声称待和知所派之人到港，即询明详情，如与在港所谈没有大出入，即请和知到福州商定，同时请何应钦前往。电称：“何部长应即准备，待电即行。”^③29日，和知所派之人到港，声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方“争持甚烈”，正在上海会谈。如果难以作出决定，和知仍拟返回东京，请“最高干部”决定。^④同日，萧振瀛致电孔祥熙，报告上述消息，声称此外各问题，仍与在港所定腹案大体无出入，统由雷嗣尚带到重庆进呈。^⑤

前文已经指出，蒋介石对和知的活动本不抱希望。10月27日，蒋介石得悉日本同盟社宣传电及板垣征四郎于26、27两日先后发表的好战谈话，认为“敌寇野心并未减杀，而且有缓兵与

① 《10月14日电萧》，“蒋档”。

② 《事略稿本》，1938年10月21日。

③ 萧振瀛：《致长沙何部长》，1938年10月26日，“蒋档”。

④ 萧振瀛：《院长钧鉴》，1938年10月28日，“蒋档”。

⑤ 同上。

诱惑之狡计”，决定发表早就在草拟中的《告全国国民书》，以示决心。^①28日，蒋介石又接到重庆行营主任张群来电，认为日本外相宇垣辞职，求和空气已淡，必须我方持久抗战，使敌益感疲乏之后，由英美联合，形成国际中心力量，着手调停，才能实现“差强人意之和平”。他说：“抗战至现阶段，决无抛弃立场、根本改变国策之理。”^②30日，蒋介石命何应钦转令萧振瀛，停止和谈，返回重庆。^③同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要他们考虑对日宣战的利害问题。电称：“今后沿海各口既全被封锁，故我对于海外交通，不再有所顾虑。若我宣战，则美国必实行中立法，可断绝敌人钢铁、煤油之来源，实于敌有害也。又我如宣战，对于国联及各国关系，均应精密研究，切实探明，望即令我驻外各大使全力进行。如何？请核。”^④31日，蒋介石在南岳致电张群，要他立即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不可再缓。日记云：“发表告国民书后，敌必又受一不测之打击，使其以后之威胁失效，更使其进退维谷。”^⑤同日，《告全国国民书》正式公布。该文说明抗战根据，不在沿江沿海，而在广大、深长之西部诸省。武汉会战予敌重大打击，任务已毕，目的已达，现决定放弃武汉，转入主动有利之地。文称：

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定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唯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亦正唯我之抗战为全面长期之战争，故必须力取主动而避免被动。敌我之利害与短长，正相悬殊；我唯能处处立主动地位，然后可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0月27日。

② 《困勉记》，1938年10月28日。

③ 《事略稿本》。

④ 《事略稿本》。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0月31日。

以打击其速决之企图，消灭其宰割之妄念。

文末，蒋介石号召国人“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悲壮、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①文告发表后，蒋介石很满意。11月1日日日记云：“《告全国国民书》自读之，觉为最近第一篇之文字，必使国民知感，且使敌国知畏也。”^②大概当时主和派对发表此文有意见，同月2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唯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所惑。”^③12月17日，日本特务土肥原到香港，邀萧振瀛见面，蒋介石指示：“不准萧赴港”，“应坚拒不理。”^④

萧振瀛与和知的谈判因蒋介石的刹车而中止，但日方对这一线索仍存有期待。1938年12月，汪精卫自重庆逃到越南河内，加紧与日方勾结，日本对华政工人员中出现两派。一派将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一派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1939年3月，何以之及和知鹰二相继抵港。12日，何以之致电在重庆的萧振瀛说：日方正在实行“拥汪倒蒋”毒谋，为国家大局，“在内必先除汪，在外必多联美”。土肥原与和知二人均以“收拾时局自负”，希望萧到港一谈。^⑤萧振瀛在香港的孙、施两位助手也向萧报告，认为土肥原与和知“与联汪派主张不同，暗斗甚烈，实为我方利用、以敌制敌之良好机会”。报告称：“此时如能利用土、和，继成前议，固属圆满，即难完成，至少可以牵制联汪政策不能决定，亦于我有利而无害。”孙、施二人要求萧振瀛将有关函电密呈蒋介石，从长考虑。同时建议萧本人速来香港一谈，“在

①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书告》，第305-306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1月1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1月2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18日。

⑤ 《仙阁兄缓密》，“蒋档”。

国际情形好转之下，奸党勾结未成之前”，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新途径”。^①萧振瀛接获上述电报后，于13日致函蒋介石称：“伏查汪日关系，乃由日本军部影佐等从中斡旋，不仅土肥原等极为愤慨，皆抱收功在我之愿，板垣近于议会中亦郑重声明，汪既不能号召国内，而与日本尤无历史关系，欲求中日永久之合作，绝非汪辈之所能为力者，言外之意，当系仍欲与钧座间取得谅解。”萧向蒋请示：“对方既极端欲赓续前议进行，和知又将来港，究应如何应付之处，恭请鉴核示遵。”^②对萧振瀛此函，蒋介石未作答复。1939年9月，和知麿二通过其助手转告萧振瀛，汪精卫将于本年11月在南京成立政府，要求萧来港重开谈判，在汪组府之前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阻碍汪的计划实现。10月6日，孔祥熙致函蒋介石，要求允许萧振瀛再次赴港谈判。10月9日，蒋介石复函孔祥熙称：“兄与萧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③这是蒋阻遏与日方和谈的最严厉的一次指示。^④至此，萧振瀛与和知麿二的关系遂告结束。

面对特殊的日方代表

在秘密谈判中，日本方面出面者大多系军部或政府人员，但是，也有个别谈判，其出面者系“民间人士”。例如萱野长知与小川平吉。萱野在辛亥革命前曾参加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友善，多次支持或直接参加中国革命。小川平吉也曾支持辛亥革命，组织有邻会，提倡日中友好。1927年任铁道大臣，是已经退出日本政坛的元老级人物。二人在头山满的推动下，得到近卫

① 栋（孙维栋）、驥（施驥生）《中央银行速转萧总参议》，“蒋档”。

② 萧振瀛：《委座钧鉴》，“蒋档”。

③ 蒋介石：《致孔院长》，《革命文献》，未刊，〔台北〕“国史馆”藏。

④ 详情另见本书《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

首相等政要支持，出面在中日间斡旋和平。^①

1938年7月，萱野长知首次到港活动，其谈判对手为孔祥熙系统的贾存德与被孔派到香港的马伯援。同年10月初，萱野再次到港，近卫首相及头山满均派人到港协助，其谈判对手改为军统局在香港的工作人员郑东山。萱野向郑表示：1. 目前形势甚迫，但日本政府及人民均不愿战，军部方面，仅少壮军人主战，高级将领则不尽然。如双方能开诚相见，仍不难觅取和平办法。2. 宇垣外相去职后，萱野曾向近卫首相请示，和平谈判应否进行，嗣接近卫复电，声称方针不变，仍照前约进行，政府当负全责。谈话中，萱野并以近卫原电相示。和萱野同时来港的外务省政务次官松本忠雄则称：萱野年高德重，中国各院院长均为其友辈，必须派能代表中央，并与彼有交谊之大员，如孔祥熙、张群、居正等前来谈判，且须军统局郑介民陪同。经郑东山解释，萱野同意由郑介民来港商谈。10月15日，戴笠向蒋介石请示：“兹事关系重大，该员所请先派郑介民秘密赴港试与商谈一节，是否可行，理合转呈鉴核。”^②蒋介石没有批准郑介民赴港，戴笠遂决定由杜石山与日方联系。杜石山，亦作杜石珊，广东兴宁人，早年留学日本，为士官生，娶一日女为妾。民国初年曾出任统领，后长期息影香港。抗战爆发后经曾政忠^③介绍，参加军统局工作。杜石山与萱野长知等人的谈判由戴笠领导，目的在收集情报，因此，与日方交谈中的许多言词均虚假不实。但是，戴笠曾多次书面向蒋介石汇报，因此，我们可以从留存档案中窥知谈判的真实情况。

^① 参见拙作《抗战前期蒋介石集团和日本“民间人士”的秘密谈判》，原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后收入拙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② 《戴笠呈》，1938年10月15日，“蒋档”。

^③ 曾政忠，广东台山人，美裔华侨，先后肄业于岭南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1938年10月加入军统。1940年曾冒充宋子良与日方谈判。

据萱野向杜石山称，近卫首相曾屡次致电萱野催促，萱野则仍坚持要求郑介民迅速到港。他说：“中日事件，如久延不决，于日本固有重大祸害，而中国之不利，则尤甚于日本。”“现日本当局，灼见及此，深愿和平解决。其整个决策，为积极求和，不得则继续军事行动，并从事第二伪中央政府之产生。中国似应趁机派员来港接洽，以无条件、无理由之和平解决。”^①其后，萱野又直接打电话给杜石山^②，声称拟与郑介民先生进行之事，已与近卫首相、头山满、宇垣大将、有田外相、荒木大将等疏通妥当，近卫并已奏准天皇，定期停战，请迅速督促郑介民来港晤商。12月9日，戴笠再次将上述情况向蒋介石报告，蒋仍无批示。1939年1月6日，萱野回日活动。

蒋介石不能长期不理萱野长知这样和中国革命有过密切关系的日本友人。1939年3月4日，蒋介石致电杜石山称：“历次来电暨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之基础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伫候详复。”^③杜石山收到此电后，即电邀萱野返港。3月10日，萱野返港，告诉杜石山，他回日后遍访朝野要人，新上任的平沼首相、有田外相都了解蒋的“伟大”，头山满准备亲自来华与蒋会晤。中日之间应当“平等言和，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和平的基本原则为：甲、中日两国同时发表和平宣言；乙、由中日两国政府各派遣大员会议于约定地点，议明逐步退兵、接防之日期。丙、至于防共与经济提携问题，重在实事求是，以便互相遵守，而奠中日共存共荣之大计。^④12日，萱野提出，双方

① 戴笠：《报告》，1938年12月9日，“蒋档”。

② 同上。

③ 《小川平吉文书》，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抄件。

④ 《戴笠呈》，1939年3月20日。

政府代表可在军舰上见面。^①3月16日，宋美龄到港指导谈判。^②17日，萱野、柳云龙、杜石山商讨条件，最初为九条，后经修改，定为七条：1. 平等互让。2. 领土（完整）主权（独立）。3. 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4. 撤兵。5. 防共协定。6. 经济提携。7. 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关于满洲，另议协定。^③宋美龄对七条、九条都有意见，批评说：“此种条件，何能提出于国防会议耶！如能办到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字，便符政府累次宣言。此事当时时记住。蒋先生可以提出国防会议者，即可成功。”^④18日，杜石山等将七条电告蒋介石。^⑤杜在电文中劝蒋在汪精卫“所欲谋者未成熟之前”作出决定。^⑥19日，蒋复电命继续进行，同时称，得“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字便可，余请商量改删。^⑦关于“防共协定”，宋美龄及蒋介石都表示，可以密约办理。

3月29日，小川平吉到港参加谈判，行前致函萱野，说明此行得到首相平沼、外相有田、陆相板垣及近卫、头山满等人支持，受命来华情况，要求蒋介石派遣“有权威之代表”到港谈判。^⑧小川到港后，命萱野转交杜石山亲笔函一件，内称，日本政府尚未确认蒋介石有和平诚意，“最良之方法则为代表的要人之派遣”，又称，日本要求国民政府改组，而国民政府认为不可能，他本人有一打破僵局的方案，但该案“内容极微妙，而须秘

① 《萱野长知电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日本みすず书房，1973，第612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3月17日云：“送妻登机飞赴香港。”

③ 《萱野长知电报》，1939年3月18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14页。

④ 《宋美龄对条件的意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15页。

⑤ 戴笠：《呈校座》，“蒋档”。

⑥ 《杜氏笔记》，《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15页。

⑦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14-615页。

⑧ 《小川致萱野函译稿》，转引自戴笠：《即呈校座》，1938年4月3日，“蒋档”。其日文原本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13页。

密，非亲见蒋委员长或其心腹的要人不能尽其委曲”。^①4月初，戴笠到港，向军统局在港人员指示：“此时我与日本绝无和平可言”，“必须以热衷和平姿态为饵，以遂行吾人之谋略，首要之图，为阻滞汪伪组织，不使于短期内成立。”^②同月2日，戴笠致电蒋介石云：

中央于此次小川来港之机会，可否密派一绝对可靠而与小川认识，且在现政治上不甚重要之人员来港，与小川晤谈，藉以刺探对和平之真实态度。如此事钩座认为绝不可行，则生处可设法令杜石珊置之不理。是否如何，谨乞鉴核示遵。^③

4月3日，杜石山也电蒋催促。这以后，蒋的日记中连续出现对战和问题的思考。

4日日记云：“吾人必须苦撑一年，必待倭寇筋疲力尽，方得有和可言，此时决非其时也。”^④

5日日记云：“如有以近卫建立东亚新秩序之声明为和平根据者，即为卖国之汉奸。”

6日日记云：“敌求和之急与其对俄屈服之情状，可知其图穷匕见，应付之方应特别审慎。”“对敌宣传：甲、须由倭王下令撤兵；乙、恢复七七前原状后谈判。丙、取消东亚新秩序声明；丁、太平洋会议。”

4月8日日记云：“对记者发表，在东亚新秩序声明之下，绝无和平之可言。”

4月14日日记云：“倭派小川探和，以平等互让、领土完

①《小川之亲笔书》，戴笠：《即呈校座》，1938年4月2日。

②刘方雄口述：《抗日战争中军统局谋略战一例》，台北《传记文学》第39卷第2期，第98页。

③戴笠：《即呈校座》，1939年4月2日。

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4月4日。

整、主权独立三点为原则，而不言行政完整，可笑。”^①

以上日记足证，蒋介石当时并无与日方议和的想法。不过，这时候，蒋尚未决定如何对待小川。4月9日日记云：“对敌探小川应否回复？”10日日记云：“对小川策略应速定。”

可见，这时候，蒋尚在研究思考中。

小川在向蒋发出第一函后，又于4月10日再次致函蒋介石，声称“为东亚前途以及中日两国百年大计而来，幸有以教之”。^②13日，蒋介石复电称：“小川先生本为余等生平所敬慕，但在此两国战争之中，不能派代表来港致敬。惟托其在港友人马伯援君致意也。”^③马伯援早年留学日本，曾任中华留日基督教学生青年会总干事，虽是日本通，但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从未担任过重要职务，顺便委托这样一个时在香港的“政治上不甚重要之人”与小川周旋，说明蒋意在敷衍。

对与马伯援接谈，小川尚未来得及表态，马即于4月14日突然去世。21日，萱野、小川二人与杜石山见面，严厉批评杜向蒋报告不够详尽，声称马即使不死，也非讨论“秘密大计”之人，如居正、孔祥熙不能来港，则应与蒋先生直接晤谈。萱野、小川称：与中国方面约定大计之后，即可赶程归东，报请政府，恳请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藉天皇之谕旨，压服一般军人。现在王克敏、陈中孚、温宗尧、吴佩孚、汪精卫等均与日方已有联系，力量不弱，如不从速约定，乘机解决，则在王、汪等人的谋划根深蒂固之后，吾人虽欲爱护国民党，亦恐难以为力。二人不无情绪地埋怨说：“待命日久，仍无消息，似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此应请蒋先生乾纲立断，速下决心。想多年相知，必不致难

^①《杂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年末。

^②《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19页。

^③《蒋笔》13678号，“蒋档”；又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20页。此前一天，蒋日记有“问马伯援地址”的记载。

为老朽也。”^①同时，日方则积极宣扬，如在5月10日前不能得到和议的复函，即在江汉地区成立伪组织。^②

军统人员面对萱野与小川这两个自称与蒋“多年相知”的“老朽”，不敢怠慢，立即将情况转报蒋介石，声称“小川翁既以垂暮之年，奉命前来，其诚意可嘉，其爱我尤切”，要求蒋指示马伯援去世之后的继任人选及应付小川等人的办法。^③4月24日，蒋在日记中明确写道：“拒绝小川等之求和。”^④5月11日，蒋介石制订“和平前提三原则”，其内容为：甲、以九国公约为依据。乙、以英、美、苏、法共同调解下，尤须以英、美二国为保证，恢复和平。丙、必先恢复七七战争之前状况后再谈和平条件。^⑤15日，蒋介石继续研究欧洲局势，认为如国际民主阵线胜利，则中国亦可获最后胜利，“故我国之决胜时期，仍取决于国际战争之结局，而抗战到底，不与倭敌中途妥协，是为独一无二之主旨”。^⑥这就说明，蒋在思想上再次坚定了抗战路线。这以后，国民党人员虽仍和小川等继续接触，但属于虚应故事了。

5月11日，小川通过杜石山再次致函蒋介石，叙述自己多次“援助”中国，卢沟桥事变后与近卫首相商量收拾时局办法，以及与头山满组织主和团体等经过，要求蒋介石“当此难关，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函称：“如蒙幸领鄙意，愿派遣要员来港商议，倘足下以仆之赴渝为便，仆应偕萱挺身赴渝，面聆大教。若不然者，则仆即去港归国，一任局面如何恶化。”^⑦16日，重庆方面派专机取走该函。21日，蒋介石指示：“杜石山绝

① 之光：《致重庆钟先生》，特急电，1939年4月22日。“蒋档”。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4月22日。

③ 同①。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4月24日。

⑤ 《杂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年末。

⑥ 《杂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年末。

⑦ 戴笠：《报告》，1939年5月22日。

不准与小川来往”，同时命将小川原函退回。^①27日，杜石山遵命办理。其情况，据戴笠报告：萱野除叹息外，默不一言，小川则莞尔而笑，并调侃说：“仆此行，诚不出板垣将军之所料矣。”他告诉杜石山：板垣认为，蒋先生自西安事变后，受共产党之计，实行抗日政策，日本虽欲和，而蒋先生不能和，因此不希望自己以老耄之年，徒劳往返，自己曾十二次提出意见书，才得到板垣批准，现在“所提条件，不蒙明察，辜负余心，是板垣将军诚有先见之明。呜呼，岂非天乎！”^②二人决定于6月2日离港。

萱野、小川都是曾对中国革命作过贡献的人，背后又有头山满及日本政要支持，因此，蒋一度对谈判有兴趣，宋美龄到香港指导即是明证。蒋介石之所以在关键时刻下令中止谈判，其原因在于欧战爆发，蒋介石由此看到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和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因此积极调整国际战略。1939年4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必使欧洲战局扩大至远东，且使包括全球，如此，则英在远东势力勿使为倭或俄乘欧战之机，取得渔利。”^③同时，他也看到了日本经济能力的严重不足。自记云：“余已催英与俄速订军事同盟，使俄、倭对欧战不能旁观坐大，而倭连日五相会议，对欧外交政策举棋不定，然其最后必实行与德、意订立军事同盟，以其军阀之嚣张，如倭王不准，则有革命之可能也。至其对我国，一面恫吓，一面求和，犹想从中取巧，未知其经济尚有支撑二年之力否？此次小川等求和，余拒绝之宜矣！”^④

萱野、小川在香港除与杜石山等谈判外，还曾于5月6日约见在香港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小川表示：日政界多数人愿“和”，但少壮军人有领土野心，如果“和”不了，日本可能会以重兵驻扎华北及沿海，永久占领半个中国。张季鸾答称：中国纯

① 戴笠：《报告》，1939年5月22日；又《报告》，1939年5月31日。

② 戴笠：《报告》，1939年5月31日。

③ 《本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4月30日。

④ 《困勉记》，1939年4月30日。

以保卫国家为目的，只求日本承认中国为对等的独立国家，达到此目的，一定“和”；否则，一定拼命打。关于日本要求与中国订立反共协定一事，张表示：这就等于让中国“无端抛弃抗战以来同情中国之英、法、美、苏诸朋友，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精神上亦有抵触也”。关于中共，张称：“蒋公看此问题很轻。战后之中国完全根据三民主义及法律处理一切，即凡不违法之人与事，皆可承认。”^①对张季鸾所言，小川不能反驳，只能苦笑。

小川决定离港后，于5月27日约曾任驻日领事的罗集谊谈话，表示愿在行前与张季鸾一晤，张拒绝不见。5月30日，张季鸾致函蒋介石称：“小川个人未必无诚，但在敌方并无正式好的表示以前，政府断不可派人来谈。焯虽在局外，亦当拒不与见。”^②不过，重庆方面并未对小川等采取决绝态度，双方始终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直到1941年6月。有关情况，我在《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一文中已有论述，兹不赘述。^③

“和平”底牌与张季鸾香港谈判的夭折

张季鸾是报人，但是，从1938年1月起，张季鸾即受蒋介石派遣，到上海从事“对敌运用”，后来又参加蒋介石的外交谋划、国际宣传和对日秘密谈判，成为蒋的高级智囊。1940年7月2日，蒋介石收到张季鸾的报告，当日日记提醒自己注意研究“敌阙求和之诚伪”。^④几天后，蒋复函张季鸾，指示谈判机宜，日记云：“敌方间接求和之心虽切，然其方法与政策，仍毫无变更。我应嘱季鸾以最低限度转示之：甲、谈政策，不谈条件。

① 《董野、小川约见谈话要点》，1939年5月6日，“蒋档”。

② 焯章（张季鸾）：《致委员长》，1939年5月30日，“蒋档”。

③ 《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后收入拙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7月2日。

乙、谈情感与利害而不谈权利、得失；丙、对于中国人心之得失，应令特别注意苏俄对华之宣言（放弃在华特权）；丁、放弃北平至山海关驻兵权；戊、汉口租界提前取消。己、内河航权应取消。庚、青岛与海南岛完全交还。辛、热河先行交还。壬、东三省问题、借用港口问题、东亚联盟问题，待和平完全恢复，撤兵完全实行后再谈。癸、天津与上海租界定期交还。子、保障问题。丑、撤兵手续，平绥路、张家口与归绥一带，必须在第一期撤完。”^①前文已述，日军自山海关至北平的驻兵权，为清末《庚子条约》所规定，1938年萧振瀛与和知鹰二谈判时，蒋曾同意保留。但是，这里蒋却明确要求日方放弃。此事表现出，在与日方谈判中，蒋的妥协性逐渐减弱。此后，蒋介石在与张季鸾会面时又不断指示，其7月19日日记云：“季鸾来谈，敌寇野心如昔，毫未改变。”^②25日，张季鸾再来，谈东北问题以及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事。^③蒋日记云：“敌在华之工厂与营业，各项商民之处置，敌非万不得已，决不愿撤退也。”^④显然，这是蒋与张讨论中的议题。

1938年10月，和知与萧振瀛的谈判因蒋的刹车停止后，和知继续寻找和重庆方面联系的线索。1940年8月，和知动员一位希腊商人，到重庆上书蒋介石，“其内容无异乞降，此为从来所未有”，蒋介石由此推断，日本急于向东南亚发展，向中国求和已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⑤他与张季鸾讨论，认为可以利用这一形势，谋求在于我有利的条件下，与日本媾和。^⑥但是，他很快就认为，“敌寇求和益急，而其方法越幼稚毒劣，应即切戒严防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7月7日。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7月19日。

③《困勉记》，1940年7月25日。

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7月25日。

⑤《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8月6日、10日。

⑥《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8月4日。

之”。^①13日，蒋介石发表《“八一三”三周年纪念告沦陷区民众书》，盛赞淞沪之战中国军民的英勇表现，中云：

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伟大的历史，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有至大至刚的民族正气；我们在沦陷区的同胞们，要知道我们中华民国的版图，决不会放弃寸地尺土的，要知道敌人有必然失败的道理，更要知道我们前方后方的军民，都在加紧努力来迎接这最后的胜利。^②

蒋介石将这篇文告的发表看成是对日本的沉重打击和对自己的警策。日记云：“余于八一三纪念日告民众书，仍以光明正大态度痛斥敌军之凶暴，激发同胞敌忾之精神，发挥殆尽，此为对敌当头一棒，冀其有所觉悟，勿敢轻来尝试也。自后对余之认识或能更进一步乎？否则，不仅不能使之醒悟，而且反中其软化利诱之计，更不可为计矣！”^③这段日记表明，蒋已经意识到，自己既要抵挡日本的军事进攻，又要谨防日本的“和平”诱惑。

这一时期，蒋介石大概每个月都会收到日本方面的一条求和消息。为了确定谈判“底牌”，蒋介石命张群等人开始起草一份文件，参加者有张季鸾、陈布雷等人。至8月下旬，文件定稿，题称《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该文包括《建国原则》、《对敌策略》、《平和条件》等内容，其《对敌策略》总原则为：保卫国家独立、民族自由，而作战媾和之实际策略以度德量力为依归。下分五条：

1. 领土之完整，主权之神圣不可侵，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自由之确保，为国家民族存亡、主奴所关，故必须牺牲一切，长期抗战，以求其贯彻。

①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8月10日。

②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书告》，第201页。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8月15日。

2. 利于长期抗战，而不利于迅速反攻，此量力之义也……确保长期抗战之实力，巩固全民族救亡自卫之精神，由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疲困敌人，逐渐减少其“力”的方面之优势，而增加其“德”的方面之弱点，以期敌我间之形势逐渐于我有利，以终达作战目的之成功。

3. 不论时间如何长久，环境如何困难，必须贯彻成功，不容中途自馁。惟作战为现实的问题，必须自定最大限与最小限之成功条件，衡量彼我，根据事实以为运用。

4. 最大之成功为完全战胜，收回被占领、掠夺之一切，不惟廓清关内，并收复东北失土。最小限之成功，则为收复七七事变以来被占领之土地，完全规复东北失地以外全国行政之完整，而东北问题另案解决之。以上两义，前者战胜之表现，后者则为胜败不分，以媾和为利益时之绝对要求。

5. 我国为被侵略国家，故和议之发起，必须出自敌方……应深切考查，其条件是否无背于我建国原则，而足以达到我最小限之成功，必须在确认为我作战目的已得最小限之贯彻之时，始允其开始和平之交涉。

以上五条，其最重要之点在于将抗战成功分为“最大限”和“最小限”两种。必须在保证“最小限”，即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时才能开始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

关于《平和条件》，《纲领》分《理论原则》与《具体条件》两方面。其《理论原则》规定：1. 日本必须真实承认中国为绝对平等的独立国家。2. 此次议和之后，期成立平等互尊之新关系。3. 日本须放弃过去战前及战时对华不友善之政策及宣传。4. 除东北悬案另作专案解决外，其余一切有损中国主权之事实，皆须彻底纠正。

《纲领》中有一部分为《坚持之件》，共8条，其中关系重大者为1-4条及第7条。

1. 凡作战而来之军队，应限期完全撤退。河北及华北部队，应撤离河北及察哈尔省境以外。

2. 凡所占长城以内及察绥之土地，与沿海及海上各岛屿，应完全定期交还。

3. 凡占领地内之伪组织，均应自战斗终止之日，由日本负责撤销，不能作为中国内政问题。所有伪组织之法令与契约，一概不能承认，并不能要求任何占领地内行政上之特殊化。中国行政完整必须完全恢复，不容有任何干涉内政之举。

4. 东北问题，须待和平完全恢复后另案交涉，现在不能提议（但热河不在东北范围之内）。

……

7. 不平等条约之废除，须于和约发表时，同时自动声明且有定期之实行。^①

在上述各条旁，有注称：“8月31日张携港之件”，可见，这份文件是为张季鸾赴香港谈判准备的。

8月25日，蒋介石与张季鸾谈话，日记云：“和战要点：一、打破敌国侵略灭华政策；二、消灭敌人优越奴华心理；三、恢复中国独立自由地位。和战方针：甲、以基本条件为标准；乙、以不失时机为要旨；丙、国际期待为下策。”26日日记再云：“一、我有实力可恃，不患其违约。二、我有根据地存在，不患其和议决裂。三、敌人有求于我，国际上、地理上、经济上、军事上，皆非我合作不可。四、敌有惧于我。甲、领袖权威。乙、革命精神。丙、三民主义。”^②29日，再次与张季鸾、陈布雷会晤，拟定“最低限度”条件，指示交涉时，应持坚决态度，“对条件不可迁就”。^③31日，张季鸾飞港。但是，也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又改变主意，日记云：“敌寇时时以日、满、支名词为对象，如何而望其彻悟与和平？我国损害伤亡如此重大，如何而可

① “蒋档”。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8月26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8月29日。

轻易言和？”^①9月1日，蒋介石命陈布雷起草致张季鸾函，有所指示。陈因当日没有飞港班机，改发短电。^②陈电今不可见，但9月2日张季鸾复函云：“在未得尊电前，即决定不与和某见面。”可见，陈电内容为，要张不与和知会晤。7日，蒋介石干脆命陈布雷致函张季鸾，要他从香港回来。^③

张季鸾8月31日抵港后，即得悉“桐工作”的有关情况，感到日方“愚昧凌乱”，“可决其今后无大的作为”。^④此前，和知曾告诉张季鸾，日本政府将收回军方的对华谈判权，另作准备，又托人带话，东京只主张内蒙暂驻少数兵员，其他无大问题。9月1日，张季鸾召见和知的助手何以之，要何转告和知：1. 日本政府如准备自办对华交涉，“须彻底觉悟，重新检讨”，“必须互相承认为绝对平等的独立国家”，“凡不合此义者，概不必来尝试，劝彼亦不必奔走，更不必找我见面”。2. “中国是不许任何地方驻兵，不许任何地方特殊化的。”^⑤此后，张季鸾即利用和知，以“桐工作”中的问题反对板垣，制造日本内部矛盾，同时则抬高身价，拒不与和知见面。9月3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表示：“弟意非和氏有东京敌总部之新意见，决不与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8月31日。

② 《陈布雷日记》，1940年9月1日，内部排印本，〔台北〕“国史馆”藏。

③ 《陈布雷日记》，1940年9月7日。

④ 焜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2日，“蒋档”。关于“桐工作”，请参阅拙文《“桐工作”辨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收入拙著《杨天石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据《今井武夫回忆录》记载：“桐工作”过程中，宋美龄曾于1940年3月5日到港，“从侧面协助中国的代表”，“宋美龄抵港的消息，经报纸作了报道，因此，我们相信了中国方面的言词”。有些历史学家据此怀疑宋美龄此行大有文章。其实，宋此次到港，完全是为了休养。1939年12月7日，蒋介石日记云：“今日吾妻以疗鼻疾割治，甚忧。”1940年2月12日日记云：“送夫人到珊瑚坝机场，往香港休养。”可见，宋美龄此行与“桐工作”无涉。中方“代表”所云，与冒充“宋子良”一样，同为对日方的哄骗。我在《“桐工作”辨析》一文中对此未作分析，今补述于此。

⑤ 焜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2日。

之见面。”^①次日，和知离港，返回东京，张季鸾命何以之电告和知：“不是日政府诚意委托不必再来；不是日本诚意改变对华政策，诚意谋真正之和平，则不可接受委托。要之，与弟何时见面并不重要，日政府苟无真正诚意，见我何用！”^②

尽管张季鸾拒绝与和知见面，但是，他内心还是希望继续维持与日方的秘密谈判的。9月17日，何以之面见张季鸾，告以和知来电称：已于9月10日在福冈会见东京要员，偕飞南京，与板垣协商，决定以和知、板垣为核心，办理对华交涉，将再飞东京，取得正式委托，然后南来。同日，张致函陈布雷，要求代为向蒋请示，“是否在港逗留一见”？17日，蒋指示可“在港静候”。^③但是，蒋介石很快就失去耐心。20日日记云：“和知求和迂延之原因，其必待敌军侵越时来见有所要胁。”^④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对张季鸾等“无方而好事”的批评。^⑤同日，陈布雷即致函张季鸾，要他结束在港工作，立即回渝。不过，张季鸾仍然有自己的想法。日本方面一直宣传愿与中国政府谋和，他要“试验”其真伪。23日，张季鸾致陈布雷函云：“对今后看法，弟微有不同。弟以为判断局势之第一关键，在看是否以敌大本营之名义来开正式交涉，果来交涉，即当认定其有若干诚意……盖既来交涉，则为承认是国家与国家间之正式议和，一也；汉奸当然取消，二也。”^⑥可以看出，张季鸾与陈布雷的“微有不同”在于，张相信日本可能有“若干诚意”而陈相反，显然，陈的态度反映蒋的观点。

9月24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表示遵嘱结束在港工作。25

① 焜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3日（原文作9月12号，当系误书——笔者）。

② 焜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6日午前。

③ 《陈布雷日记》，1940年9月19日。“蒋档”。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9月20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9月22日。

⑥ 焜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23日下午。

日，张季鸾与何以之“最后晤面”，告以一两月之内，如东京确有正式讲和诚意，许可和知通信一次，本人亦当“拚其最后之信用”，转达一次。谈话中，张季鸾并按照陈布雷来函指示，通知日方，如欲讲和，须有与中国建立平等“新国交”的决心，承认伪满、中日联盟等要求万不可向中方提出，本人也不能转达。9月27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承认蒋介石比自己高明：“前年以来之悬案一宗，至此完全告一段落。弟此次判断有误，幸行动上未演成错误，一切处理尚近于明快，此则近年特受委员长之训练，得不至拖泥带水，就弟个人论，诚幸事也。”^①10月4日，张季鸾回到重庆，其精心准备的与和知的谈判计划终于成为废案。

企图以“和谈”阻挠日本承认汪伪政权

1940年7月，近卫文磨第二次组阁，松冈洋右出任外相。松冈对军部和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所做的“诱和”工作不满，决定收归外务省掌握和领导。他将这一工作委托给自己的门生西义显和松本重治等人。西义显将希望寄托在交通银行董事长家钱永铭身上。钱是江浙财团的重要成员，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一度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松冈对钱永铭这一人选很满意，夸口说很快就会成功。当时，日军计划南进，从英国和荷兰手上夺取东南亚，急于和重庆国民政府达成妥协，以便拔出深陷于中国战场的泥足。

同年8月，西义显到香港访问正寄寓在那里的钱永铭，动员他投入对重庆的“和平工作”。钱提出：如果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前的状态，日军能够全面撤兵，或许能同重庆进行谈判。^②他表示，自己可以负责促成宁渝合作，但须请上海金城银行经理

^① 焜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27日午。

^② 船津辰一郎：《华南谈判失败日记》，《近代史资料》总第69号，第254页。

周作民出面与日方接洽。^①据西义显回忆，钱当时提出三项条件：1. 重庆、南京两政府合并，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统一政府。2. 日本政府以中国的新统一政府为谈判对象，从中国全面撤退为推行日华战争所派遣的全部兵力。3. 日本政府与新中国政府缔结防守同盟。9月18日，西义显借钱永铭的代表张竞立等到东京访问松冈洋右外相。10月，松冈签字同意钱永铭提出的条件。^②不过，后来松冈实际向重庆提出的是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课长太田一郎所拟六条：1. 承认“满洲国”（必要时以秘密文书约定）。2. 共同防共。3. 撤兵。4. 经济提携（作若干让步）。5. 治安驻兵（长安三角地带不驻兵）。6. 不要求蒋介石下台。^③

松冈洋右除委托西义显外，又亲自致函时在上海，与钱永铭、周作民关系深厚的船津辰一郎，拜托他协助进行。^④船津曾任日本驻天津、上海、奉天总领事，有和国民党人员打交道的丰富经验。10月17日，西义显携带松冈的亲函访问船津。同日，船津访问周作民，说明本人应松冈要求，将去香港活动，周表示恢复两国间的和平也为本人所希望。10月19日，松本重治会见周佛海，面交日方所拟“和平”条件，托周作民转交钱永铭。周佛海的印象是：“与在京所谈判者大致相同，惟完成撤兵由二年减为一年，蒙疆及特定地点驻兵，虽形式略异，实质完全相同。”^⑤21日，船津与周作民同船赴港。在港期间，周作民与钱永铭以日方提出的方案为核心，草拟报告与意见书，托因事来港的金城重庆分行经理戴自牧带回重庆。^⑥

① 《周佛海日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第346页。

② 西义显：《日华“和平工作”秘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241、261-262页。

③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4卷，第241页。

④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大东亚战争开战经纬》（3），此据台湾译本《对中俄政略之策定》，【台北】“国防部”史政局印行，第154页。

⑤ 《周佛海日记》，第367页。

⑥ 《周佛海日记》，第384页。

11月7日，蒋介石研究钱永铭、周作民转来的“和平”条件，大为不满，日记云：“周作民受敌方请托条件转达者，商人不察，以为较倭汪之条件减轻，其实文字变换而内容无异也。”^①不过，当时蒋介石正在向美、英两方提出“合作方案”，建立同盟，尚未得到答复，^②日本方面又准备在11月30日承认汪记南京国民政府，这使蒋介石感到忧虑。他担心德国、意大利会跟随承认，担心正在和德国拉关系的苏联会对华冷淡，也担心国内民心、军心的动摇。17日日记云：“英美未与我确实合作以前，对倭不使其承认汪伪为宜，此亟应设法运用者也。”^③18日，蒋决定派张季鸾赴香港，日记云：“派季鸾赴港，作钱、周之答。”^④

松冈洋右除利用钱永铭等与重庆谈判外，又通过德国出面，对重庆政府施加压力。11月11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约中国驻德大使陈介谈话，声称：“近闻日自新内阁成立后，亟图解决中日问题，已拟于近日内承认南京政府。日如实现，义（意）、德因与同盟关系，亦必随之，他国或尚有继起者。此于中国抗战，或益加困难……倘阁下认为有和解可能，则请转达蒋委员长及贵政府加以考虑，以免误此最后时机。”^⑤14日，蒋介石接到陈介来电，认为这是“倭求和进一步之表示”，于18、19两日分别接见英、美驻华大使，告以陈介来电情况，说明日本承认汪伪之举，将动摇中国民众抗战信心，进而影响中国国内日趋严重的经济与军事问题。^⑥21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1月7日。《困勉记》同日所引文字为：“此条件，不过文字变换，而内容实无少异。钱新之不察，以为较汪奸之条件减轻矣，希望政府采纳，是真只知私利而不顾国家者也，可痛！”

② 参见《先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1642页。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0月17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1月18日。

⑤ 《陈大使自柏林来真电》，“蒋档”。

⑥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谈话》，《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第116-117页。又《困勉记》1940年11月21日：“与美大使谈已，曰：‘今以陈介来电，德愿保证中倭将来和平条件之履行者告之，期关于月内对我合作之提议有一决定也。’”

日，蒋介石电复陈介：“日本果欲言和，自应将其侵入我国领土之陆、海、空军全部撤退。”“若日方以承认伪组织为词，使我与其议和，则彼既无恢复和平之诚意，我方亦决不以此有所措意也。”^①这通电文，表面上致陈介，实际上是说给日本人听的。同日，日方宣称，重庆方面如不在12月1日之前与日方言和，将承认汪政权。蒋介石不受威胁，日记云：“此种宣传，只有增加我对英美合作提议之效。盖倭寇宣传，以此为恫吓吾人之计，实拙劣无比也。”^②24日，蒋介石得到苏联通知，继续援助中国武器，感到宽慰。26日日记云：“如何能使俄与英美合作，此为今日唯一之要务也。”^③这则日记表明，蒋介石当时所孜孜以求的是与俄、美、英等国结成抗日联盟，与日本谈判不过是为了阻挠其承认汪伪政权，并非根本之计。27日，汪精卫致电蒋介石，声称已与日方完成“调整国交条约”，与“友邦”内定，只须“恢复和平，确立治安，则撤兵期限，仍践前诺，无所改变”，要求重庆方面“立下决定，宣布停战”。28日，蒋介石得知有此电文，在日记中斥以“为敌寇作伥”。^④

张季鸾到达香港后，即向钱永铭提出：国民政府对于日方诚意仍有怀疑，因为日方宣称，如重庆方面在一定期间内没有肯定答复，就要承认南京政府。对于此类威胁，国民政府“非常不满”。张向日方提出两项条件：1. 无限延期承认汪政权。2. 无条件全面撤兵。^⑤张称：倘若日本政府答应履行上述条件，中国政

① 《事略稿本》。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1月22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1月26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1月28日。

⑤ 关于张季鸾向日方提出的两项条件，各书记载稍有差异。西义显《日华“和平工作”秘史》的记载为：“（一）原则上承认在华日军的全部撤兵；（二）取消承认南京傀儡政权。”见该书第278页。《今井武夫回忆录》的记载为：“日军的全面撤兵与日方是否可以不承认汪政权问题”，见该书中国文史出版社版，第175页。此据船津辰一郎的《华南谈判失败日记》，见《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华书局，第257页。

府准备同日本政府进行和平交涉。11月23日，在松冈外相的力促下，日本五相会议决定接受张季鸾提出的条件，要求中国政府迅速任命正式代表来日，日本政府将延期承认汪精卫政府。其后，钱永铭即将有关情况电告重庆，并请杜月笙携带详函飞渝，要求指派前驻日大使许世英为首席正式代表。^①27日，重庆拟派许世英赴港。至此，谈判似乎颇有进展，但第二天就发生变化。

日本内部的拥汪势力一直很顽强。28日，日本内阁会议由于受到军方和日本派驻南京的阿部信行特使的压力，决定按原定日期承认汪伪政府。同日深夜，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得到东京电告，力谋挽救已成局面，改变日本政府的决定。他立即要求钱永铭电告重庆，必须迅速同意日本的“和平原则”，任命正式谈判代表。^②同日夜，蒋介石接到钱永铭来电，得知日方变卦，非常愤怒，日记云：“观察敌倭与钱新之所谈及其态度，仍以威胁为主。其松冈外长尤为荒唐。无论文武人员皆不可理，若一交手，即以卑污恶劣狰狞之形态毕露。无礼无信之国，不可再理，焉能不败哉。”^③他决定通知钱永铭，对日“决绝不理”。30日，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蒋介石的第一反映是“东亚战争不知延长到何时方能结束”，第二反映是：“我促英、美、俄更进一步之表示与助我，此其时乎！”^④同日，松冈洋右致电钱永铭，表示愿继续与重庆议和。12月1日，钱永铭和张季鸾分别将有关情况转报陈布雷，陈的强烈感觉是：“敌之狼狈失态，可谓无所不至。”“松冈之可笑，洵无以复加也。”^⑤12月3日，蒋介石读到陈布雷摘录的钱、张报告，愤怒地在日记中对松冈写下了“仍想

① 西义显：《日华“和平工作”秘史》，第288页。

② 《田尻爱义回想录》，〔东京〕原书房，1977，第86页。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1月28日。

④ 《困勉记》，1940年11月30日。

⑤ 《陈布雷日记》，1940年12月1日、3日。

继续欺诈，恶劣极矣”的考语。^①

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一事使蒋介石忧心忡忡。1940年12月1日，蒋与其宣传干部研究“如何能安定民心”，夜不能寐，自称当夜只熟睡了三个小时。^②次日，他在“国父纪念周”上报告，说明这是近卫内阁的“自杀”行为，自感“颇费心力”。^③其实，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一事对当时的政局、战局并无多大影响，蒋介石过于紧张了。

1941年之后，还有个别日本人士企图在中日间斡旋和平，但蒋介石已了无兴趣。1942年4月，和知鹰二的机关总务部长黑木清行，受头山满及萱野长知鼓动，携带萱野名片到桂林，要求到重庆面见蒋介石，调解中日战争，恢复两国邦交，否则自杀。贺耀组、陈布雷二人认为“不可任其自由往返，拟令扣押，密解息峰，留交王芑生讯问。如果不能利用为反间，则应拘留，不许释放。”蒋介石批示：“应即拘押监禁。”^④

日方求和，蒋介石主动刹车

日本侵华，采取的是以战为主，以诱和为辅的两手策略。同样，蒋介石也用这两手策略对付日本。一方面，蒋介石坚持以武力抵抗日军进攻，同时，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也不排斥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如前述，蒋介石虽对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不抱希望，但是，由于和知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诱饵，这使蒋觉得不妨一试。谈判中，蒋细心研究情况，指导起草并亲自修改有关文件，除将东北问题搁置另议外，蒋曾准备以同意日本在长城以外某些地区驻兵为条件，换取日军自中国关内地区撤兵。但是，当蒋发现日方拖延不决，并无诚意之外，立刻下令终止谈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2月3日。

② 《困勉记》，1940年11月30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2月2日。

④ “蒋档”。

判，后来并以“杀无赦”警诫孔祥熙、萧振瀛与和知重开谈判的企图。1939年，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与中国军统人员谈判，力图面见蒋介石。这是两位和中国有过特殊关系的日本人，在他们后面，又有日本“主和”人士头山满和近卫等政要的支持。最初，蒋介石对谈判持有兴趣，宋美龄、戴笠都先后到港指导。但是，欧战的爆发使蒋介石看到了中国抗战胜利的途径和希望，因此毅然采取决绝态度，禁止军统谈判人员再与小川等来往。1940年8月，蒋介石为了应付日本方面频繁的谈判要求，指导张群、张季鸾、陈布雷等制订《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作为对日谈判的原则和准绳。该文件的最大特点是将抗战结果分为“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之成功”两种，但是，当张季鸾于同月底带着这份文件赴港，企图首先争取“最小限之成功”时，蒋介石却阻止张与和知鹰二见面，并且迅速命他回渝，使这次经过郑重准备的谈判还没有开始就夭折了。同年7月，近卫第二次组阁后，为了抽出兵力，侵略东南亚地区，一面紧锣密鼓地准备给予汪伪政权以外交承认，一面通过外相松冈洋右推进“钱永铭工作”，继续诱惑重庆国民政府和谈。蒋介石担心日本承认汪伪会在外交和内政两方面严重影响中国抗战，派出张季鸾赴港谈判，企图加以阻挠。日本政府虽曾一度接受中方的“全面撤兵”等条件，但是，最终还是在军方的压力下承认了汪伪政权。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长期对日妥协，力图延缓对日全面作战时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被逼抗战，但是，他仍长期为战与和的矛盾所纠缠。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几次谈判说明，他在坚持抗战的同时，也还在某些时候对和平解决中日战争存有期待。谈判中，他虽不肯承认“满洲国”，不肯立约放弃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但在一段时期内，他却只将抗战目标定在“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最小限之成功”上。这些，都反映出蒋在对日抗战中的软弱一面。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所有他掌控的谈判，都是日方求“和”，蒋只是被动应对而且都由蒋主动刹车。在谈判中，他的态度逐渐坚决，条件逐渐提高，是日渐强硬而非不断软化的。

蒋介石思想中的战、和矛盾存在过很长时期。就在蒋介石受松冈洋右欺骗，愤而斥责日本为“无礼无信之国”后不久，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对敌宣传，使知非由美国或苏、德出而保证，决不能解决战事之意。”“敌次任内阁，如果为海军系联美派出任，使美得调停中倭战事，则和平有望矣。”^①1941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访问重庆。居里向蒋提出：本人来渝，常闻传言，某某等秘密对日进行和议，请直率相告。蒋答：

自由中国绝对无一人愿与日本言和。倘英、美能继续予以援助，亦决无人表示不满。此间人士皆决意除最后胜利外，他无所求，何言隔〔个〕别之和平！我人已作此最大之牺牲，日本已陷无援助、无希望之绝境，英、美已在精神上、物质上予我以一切援助，故不论日本以任何动人之条件向我求和，而此未成熟之对日和平，余将一律视为中国之失败。余可向阁下保证，对日和议必在英、美参加之和平会议席上谈判之，此外无中国可以接受之可能。余愿时机成熟之时，此项会议由美国召集之，一如召集九国公约之华盛顿会议。惟华盛顿会议时，无苏联参加，深盼此会议亦有苏联一席耳。^②

这个时候，中国虽还在孤军奋战，但已得到英、美、苏三国的援助，因此，蒋介石说话底气足，腰板硬，但是，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其“和平”幻想的阴影。彻底抛弃“和平”幻想，转过来劝止英、美对日妥协，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彻底胜利，蒋介石的面前还有一段路程。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2月10日。

^②《战时外交》（一），第588-589页。

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国力、军力都相距很大，因此，还不能立即与日本展开大规模的战争。他们主张，仍应以妥协方式与日本达成“和议”。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军队主动向日军进攻，标志着抗战国策的确立和全面抗战的展开，但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都仍有部分人主张“和平”。淞沪之战失利后，主和之议更盛，孔祥熙是这一部分人中的重要代表。现存档案表明，中日之间的许多秘密谈判虽由日方主动，但中方的掌控者则是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后于1938年初升任院长的孔祥熙。多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活动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真实态度的反映，代表蒋介石的意志。然而，事实出人意料，蒋介石对孔祥熙掌控的这些谈判大都持反对态度，曾多次批评，甚至以极为严厉的口吻加以阻遏。这种情况，与我们的传统认识大相径庭，值得郑重讨论，以求推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加深对蒋介石其人的全面认识。

拒绝被孔祥熙视为“天赐良机”的陶德曼调停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南京危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

接收日本政府委托，向蒋介石提出停战议和条件：1. 内蒙古自治，一切体制类似外蒙古。2. 华北非武装区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3. 扩大上海的停战区，由国际警察管制。4. 停止排日。5. 共同防共。6. 降低日本货的进口税。7. 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同月9日，陶德曼通过蒋介石身边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威胁孔祥熙：“如果战事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①28日，陶德曼在汉口会见孔祥熙，重申上述条件。29日，孔祥熙致电在南京的蒋介石，告以他本人多次和在汉“重要同志”会晤，都认为“长此以往，恐非善策。既有人出任调停，时机似不可错”。电称：“复查近来党政军各方及民间舆论，渐形厌战。弟意此次战争，我已牺牲甚钜，除非军事确有胜利把握，不若就此休止，保全国力，再图来兹。”^②30日，孔祥熙再次致函蒋介石，认为陶德曼出面调停，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乘风转舵”，改变抗战国策，函称：“前方战事既已如此，后方组织又未充实，国际形势，实远水不救近渴。而财政经济现已达于困难之境，且现在各方面尚未完全觉悟，犹多保存实力之想。若至寄人篱下之日，势将四分五裂，此时若不乘风转舵，深恐迁延日久，万一后方再生变化，必致国内大乱，更将无法收拾。”^③他认为日方所提条件“尚非十分苛酷，多系旧案重提，亦非迫我必须一一接受，尽可作为讨论之范围”，建议蒋介石在接见陶德曼时原则表态，至于具体条件，可由行政院“趁此先行停战，稍事整理”。可见，孔祥熙对抗战形势极为悲观，陶德曼出面调停，对他说来，可谓喜出望外。

① 《陶德曼致德外交部》，《德国外交文件》，第4辑第1卷，第784页；转引自中国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外交》（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第165页。

② 〔台北〕“国史馆”藏光碟，07A，00085。

③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11月3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和平酝酿》，以下简称“蒋档”，〔台北〕“国史馆”藏。

蒋介石与孔祥熙不同，这一时期，蒋的抗战意志相当坚决。11月20日，蒋介石发布迁都重庆命令，决心持久抗战。日记云：“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①他对武将也很失望，感叹道：“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竟无革命精神，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如是之易为何所据也！”^②但是，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前方军事失利的严重情况。29日，蒋介石得悉日本委托陶德曼调停的消息，立即决定加以利用，约其来京面谈。日记云：“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③12月2日，蒋介石与陶德曼谈话后，一度对日本有过幻想，希冀其能有所“觉悟”。日记云：“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有觉悟，则几矣。”^④但不久，日军即以加紧进攻南京粉碎了蒋的幻想。12月7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到达江西星子，日记云：“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此外并无其他办法。”^⑤9日，研究全国总动员计划，日记云：“团结内部，为国相忍。”“统一抗战指使〔挥〕，使共党归服，消除矛盾行动。”^⑥26日，日方由于军事上已经取得巨大胜利，通过陶德曼提出四项新的强硬条件：1. 中国政府放弃亲共、抗日、反满政策而与日、满共同防共。2. 必要地区划不驻兵区，并成立特殊组织。3. 中国与日、满成立经济合作。4. 相当赔款。四条之外，另附两项条件：1. 谈判进行时不停战。2. 须由蒋委员长派员到日方指定地点直接交涉。蒋介石认为“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决置之不理”。^⑦27日，召开最高国防会议讨论，参加者多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20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30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29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2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7日。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9日。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26日。

数主和，蒋介石坚持不可，受到于右任等人的讥笑。^①28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孔祥熙、张群等谈话，声称“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与民族永远之束缚。”^②29日，蒋介石与于右任及另一位主和的国民党元老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针，不可变更”。他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也。”^③1938年1月2日，蒋介石再次见到陶德曼转达的日方条件，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决定严词拒绝。^④但是，当时日军攻势锐利，中国军队需要休整与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不得不虚与委蛇地敷衍日方。1月12日，在孔祥熙和张群的指导下，外交部拟具口头答复稿，认为日方所提四项条件，“太属空泛，愿明晰其性质与内容后，予以详细考虑与决定”。^⑤这一口头答复稿的目的在于“拖”，以便既不明确拒绝日方条件，又为中国军队争取时间。但是，口头答复稿所提出的要求日方答复的四个问题却被蒋介石否定。这四个问题是：

1. 所谓中国放弃亲共政策而与日、“满”合作，实行排共政策，日本政府意，中国究应采取何项步骤？
2. 所谓非武装区与特殊制度，究拟设在何处？特殊制度之性质如何？
3. 经济合作一层，其范围如何？
4. 日方是否坚持赔偿一点，是否对于中国方面所受之巨大损失，可予考虑？^⑥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27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28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29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月2日。

⑤ 《口头答复稿》，1938年1月12日，《德国调停案》，见〔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案卷》，00062A，第65页。

⑥ 同上。

蒋介石当时正在河南开封布置防务，见到此件后，认为这将使谈判具体化，立即以“限一小时到汉口”的特急电通知孔祥熙与张群，表示“最后四项问句切不可提”。^①15日，孔祥熙会见陶德曼，面交英文答复，委婉地表示：“为以真诚的努力寻求在中、日两国间重建和平的可能性，我们已经表示，热诚希望得知日方所提‘基本条件’的性质与内容。以便更好地表达我们对日本所提条件的看法。”^②16日，蒋介石决定，通知陶德曼：“如倭再提苛刻原则，则拒绝其转达。”^③17日，蒋介石日记云：“拒绝倭寇媾和之条件，使主和者断念，稳定内部矣。”^④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极为恼怒，将蒋视为对华“诱和”或“诱降”的最大障碍，必欲去之而后快。1月1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否认“蒋政权”。次日，近卫首相发表声明，声称“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⑤蒋介石对此的反应是：“此乃敌人无法之法，但有一笑而已。”^⑥此后，日本政府即决定，以蒋介石“下野”作为中日“和平”的必要条件。

制裁唐绍仪谋和

日军占领上海后，即企图物色在中国政坛上有过重要地位和声望的人，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判，或直接出面组建傀儡政权。其

① 《蒋委员长致孔院长》，1938年1月12日，《德国调停案》，见《外交部案卷》，00062A，第64页。

② 《孔院长接见陶大使口述英文稿》，1938年1月15日，《德国调停案》，见《外交部案卷》，00062A，第76页。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月16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月17日。

⑤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文书》，〔东京〕原书房，1978，第386-387页。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月17日。

中之一就是唐绍仪。唐绍仪，字少川，清末任外务部右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武昌起义后任袁世凯内阁的全权代表，与革命党人在上海议和。民国建立，临时政府北迁，唐绍仪任第一任内阁总理。此后，唐绍仪历任要职，其地位和声望都符合日本人的要求。上海沦陷后，唐绍仪留居法租界，日本船津辰一郎等人便多方设法，企图拉唐下水。唐的住处，不断有各色人物登门。重庆国民政府为防止唐为敌所用，也不断与唐联系，许以国民参政会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交委员长或驻德大使等职，任其择一。据说，蒋介石还曾致函唐绍仪，拟聘请其为“高等顾问”。^①1938年5月，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会见汪精卫、孔祥熙等人。汪称：“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孔祥熙则表示，最好由唐个人与日本方面试谈条件。^②

唐绍仪接受汪精卫和孔祥熙委托后，即于5月底或6月初在上海与日方谈判，其条件大略如下：1. 取消以前一切不平等条约，如二十一条、塘沽、何梅等协定。2. 日本军队完全撤退。万一拘于庚子条约，其所驻军队亦不得超过欧美各国所驻军队数目之上。3. (中国方面) 绝对不赔款，因自动停战议和，非战败和议可比。4. 中、日、满经济合作。唐并表示，中国方面如必欲取消满洲独立，可在今后和议中由唐出面交涉。^③唐绍仪的计划是：在两个月后日军到达河南鸡公山时，或由中国“最高领袖”授意前方将士自动停战，或由孔祥熙邀同戴季陶、汪精卫等与日本素有关系的“老同志”，代表政府或人民团体赴香港谈判，他本人届时当前往参

^①《南湖致刚父电》(胡鄂公致孔令侃)，1938年6月11日，“蒋档”。

^②同上。

^③克克：《致孔院长转居觉生先生》，1938年6月9日，“蒋档”。

加，但决不单独负责。^①6月17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鸟工作”计划，准备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强有力的政权”。^②27日，唐绍仪托大女儿（诸昌年夫人）持函，到武汉会见孔祥熙，声称“以国难为虑，渴望于国事有所襄助”，“欲得公正和平，须中日公开谈判”。^③7月5日，诸夫人回沪，携回孔祥熙致唐绍仪函，函云：“战争初期，我方别无选择；时至今日，或有公正和平之望。”孔要求唐凭借自己的有利地位，试探日方和平意向，同时，联络中日有名望的民间人士，呼吁双方当局进行和平谈判。^④8月上旬，孔祥熙在香港的亲信访问诸夫人。诸称：有日本东京陆军最高长官的全权代表向唐绍仪提出三项条件：1. 停止反日运动；2. 反共；3. 经济合作。该代表称，日方没有领土野心，愿保障中国领土、主权完整，无赔款。诸夫人向孔在香港的亲信表示：“此次因系院座（指孔祥熙——笔者）再三劝慰，少老（指唐绍仪——笔者）始肯与日人见面，探询条件。该日军代表之来，亦极不易，所持条件，可作基本谈判之初步原则。”“如我方认为可商，当再与进行详洽。”诸夫人并称：该代表定8月5日返沪，如有所命，请在8月15日前示下，免过时机，在日人前反露我求和之意。^⑤8月9日，孔祥熙致电蒋介石，汇报上述情况。

蒋介石这一时期仍然不赞成孔祥熙的谋和活动。6月23日，蒋介石与孔祥熙谈话称：“敌人至今灭亡我国之野心，固已为我粉碎，即其对粤汉速战、速决之信心，亦已为我消灭。最后胜利于我确定矣。”他嘱咐孔祥熙“不可另自接洽”。^⑥7月12日，日

① 克克：《致孔院长转居觉生先生》，1938年6月9日，“蒋档”。

②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第98页。

③ 转引自《孔祥熙致唐绍仪密函》，《近代史资料》总第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278-279页。

④ 《孔祥熙致唐绍仪密函》，《近代史资料》总第74号。

⑤ 《孔祥熙致武昌蒋委员长》，1938年8月9日，“蒋档”。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6月23日，参见同日《困勉记》。

机大炸武汉，警报解除后，蒋介石再次与孔祥熙谈话，劝止他的谋和活动。谈毕，蒋介石慨叹道：“庸之对敌行同求和，彼犹不知误事，可叹！”^①蒋在接到孔祥熙关于诸夫人的活动情况报告后，立即于8月10日复电孔祥熙，电称：“关于少川接洽和议事，弟极端反对。请其于政府未决定整个政策与具体办法以前，切勿再与敌人谈话，以免为敌藉口。”^②当时，蒋介石对于孔祥熙秘密与日本谈判的情况已经有所察觉，苏联驻华外交官也为此向中方了解情况，因此蒋在电报中特别提醒孔祥熙：“日人近时特放一种空气，甚传兄屡提条件交敌人，皆为日敌所拒。此种空气，影响于我内部心理甚大，而且俄人亦以此相谈。务请兄注意为禱。”^③

8月11日，孔祥熙电复蒋介石，首先表示尊重蒋的意见，“承嘱一节，自应注意。”接着，为自己转报唐绍仪女儿谈话一事解释，向蒋道歉：“此次诸夫人谈话，显系买好，原电转陈，藉供参考，不意增兄烦虑，殊觉不安。”关于他本人和唐绍仪发生关系的原因，孔声称目的在于争取唐，阻止唐为敌所用。电称：“少川为人秉性及过去在粤经过，为我兄所深悉。前因首都沦陷后，日方对少川多方诱惑，时思利用。且闻伊不甘寂寞，曾发牢骚，恐其万一为敌利用，影响大局，同志中屡为弟言，嘱早设法，故利用其亲友尽力劝慰，使其为中央用。”关于蒋电所称向日方提交和平条件问题，孔坚决否认：“和议问题，完全彼方自动，时有报告前来，所以未曾拒绝者，原欲藉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日人放造空气，原属惯技。与弟绝无关系。”^④

在历史上，唐绍仪反对过孙中山。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恢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7月12日；参见同日《困勉记》及《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② 蒋介石《致重庆孔院长》，1938年8月10日，“蒋档”。

^③ 同上。

^④ 《致武昌蒋委员长》，1938年8月11日，“蒋档”。

复军政府，唐不愿支持，退居家乡。1931年，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对抗，唐是常务委员之一，后来胡汉民与蒋介石对立，领导“西南派”从事公开的与秘密的反蒋活动，唐又曾出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因此，蒋介石不喜欢唐绍仪，更反对唐出面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当时，日本方面正在动员唐绍仪出面，在南京组织伪政权，1938年1月，蒋介石即得知有关情报，日记云：“其急欲造成唐绍仪为南京之傀儡者，亦无法中之一法也。”^①7月9日，蒋介石分析日本对华强硬的原因，其第三条就是：唐绍仪“希冀拆散我政府”。^②9月11日，蒋介石再次分析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对华政策，认为当年6月至7月之间，板垣之所以强硬，其原因在于，“错认我内部有分裂及强逼余下野之可能”，同时，也由于“我内部文人态度暧昧与唐绍仪老奸之施弄阴谋”。^③同月下旬，日本特务土肥原到上海访问唐绍仪，说服唐起草了《和平救国宣言》。^④9月30日，唐绍仪即在家中被军统特务刺杀。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实为革命党除一大奸。此贼不除，汉奸更多，伪组织与倭寇更无忌惮矣。总理一生在政治上之大敌，我党革命之障碍，以唐奸为最也。”^⑤唐绍仪被刺一事，扑朔迷离，多年来成为疑案。蒋介石的这一则日记表明，此事当出于蒋的决定。

制止贾存德、马伯援与董野长知等人的谈判

日本侵华，采取的是“和战两用”政策，即一面武力进攻，一面政治诱“和”。1938年2月，日本将在长江下游的侵华部队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月23日。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7月9日；《事略稿本》作“企图以唐绍仪领导伪政府”。

^③《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9月12日。

^④《今井武夫的证词》，《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第54页。

^⑤《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0月1日。

改编为华中派遣军，以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畑俊六接任后，即一面筹画进攻武汉，一面通过萱野长知、松本藏次等人与中方联系。萱野在辛亥革命前即与孙中山、黄兴结识，参加中国同盟会，曾多次参预援助中国革命的活动。抗战爆发后受头山满及松本石根大将之命来华，找寻与重庆方面谈判的机会。畑俊六对萱野说：“战事无论延长至何时，总有和平之一日，希望有一了解日本者出而负责收拾善后局面，缔两国共存共荣之同盟。”^①又当面召见孔祥熙在上海的亲信贾存德^②说：“现在日本的对象已不是蒋委员长了，而是南京新成立的维新政府，但是，蒋委员长、孔院长想到同盟会时日本人好意的援助而有觉悟，亦未尝不可谈判和平。”^③他指示萱野直接致函孔祥熙。当年5月，贾存德密携萱野致孔亲笔函，自沪至汉。函称：“现在中日战争，无异箕豆相煎，势将两败俱伤，绝非东亚之福，希望捐弃小嫌，维持大局。”^④贾并向孔转述萱野意见：现在日军对和平要价过高，实难谈商，必须设法使国内和平派抬头。如中方暗示同意，本人极愿回国为和平奔走，并已派人与头山满接洽云云。^⑤萱野所言，符合孔祥熙心意，复函称：“中日接壤最近，唇齿相依，在历史上地理上关系极为密切，互助则能共存，相残必致偕亡。”“究修百年之好，抑种百年之仇，似全在贵国少数军人之一念。”孔要求萱野联络日本的“忠君爱国之士”，“责以正义，晓以利害”，促使少壮军人早日醒悟。孔本人则声称：“为奠定中日真正共存共荣之百年大计起见，亦当竭尽绵薄，以

① 转引自孔祥熙：《致介兄函》，1938年6月23日，“蒋档”。

② 贾存德，字辛人，孔祥熙的同乡、学生，长期在中央银行工作，负责收集日本经济情报。

③ 伯良（胡鄂公）：《致王主任（良甫）虞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226页。

④ 转引自孔祥熙：《致介兄函》，1938年6月23日，“蒋档”。

⑤ 孔祥熙：《致介兄函》，1938年6月3日，“蒋档”。

从事焉。”^①同时，孔祥熙还准备了一封致头山满的信件，也交贾带回。6月初，贾回到上海，与松本藏次见面，代表孔祥熙表示：“中日相持，仇者快，亲者痛，利害详如来函，如能保领土完整，修万代之好，两国幸甚。现以院长地位，亦乐与公等挽救两国之危局，不知公等有无善策？”^②6日，萱野询问有无孔祥熙复电，贾当时尚未接到孔的新信息，只好编造了一通假电报出示萱野。7日，萱野偕松本飞返东京。^③13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实业总长王子惠告诉贾存德：日本军部训令，如蒋介石不表示休战时，决定三路进攻汉口。^④21日，萱野回到上海，与贾存德讨论与孔祥熙会面地点。^⑤23日，孔祥熙向蒋汇报此事，声称“在此时期，似不妨虚与委蛇，以分化其国内主战派与反战派之势力”。^⑥

此函发后，蒋介石迅速回电批评。蒋电未见，但其基本精神从孔祥熙6月25日复蒋电可以窥知。孔电云：“顷奉手示，至佩卓见。弟前接贾生来电，当即复电切戒。兹承尊嘱，已又去电严谕。”孔特别向蒋表白，为避免发生意外情况，已预留地步，本人所有致贾存德之电，均系秘书具名；前致萱野函，也是采取另附名片的办法，并未签字盖章，希望蒋宽心。孔同时向蒋汇报，刚刚接到贾存德来电一件，“已答以现尚无暇，嘱将切实办法先行探明电复，备作参考，此外，仅对萱野奔走辛劳略表慰勉而已。”^⑦

当时日方认为，与中国“和平”的最大障碍是蒋介石，因此

① 孔祥熙：《致萱野先生函》，1938年5月22日，孔祥熙档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参见《日蒋谈判的重要资料》，拙著《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524-525页。

② 贾存德：《孔秘书（令侃）转呈孔院长》，1938年6月12日，“蒋档”。

③ 贾存德：《致孔秘书（令侃）转呈院座》，1938年6月12日，“蒋档”。

④ 贾存德：《致孔秘书（令侃）转呈院座》，1938年6月13日，“蒋档”。

⑤ 转引自《上海贾存德来电》，1938年6月21日，“蒋档”。

⑥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6月23日，“蒋档”。

⑦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6月25日，“蒋档”。

坚决要求蒋下野。7月1日，孔祥熙致电贾存德，表示本人可代替蒋介石下野，电称：“苟有利真正共存共荣，为彼方转圜面子，不惜敝履个人地位。”^①萱野对孔祥熙的态度表示敬佩，声称对蒋下野一事，可不坚持。7月4日，萱野表示，以人格担保无欺诈，日本的军事行为最近暂可“不积极”，但完全停止，须待会见孔祥熙之后。^②7月5日，贾存德偕同萱野赴港，继续谈判。行前致电孔祥熙表示：将亲自携带“切实大略条件”到武汉，详细面禀。^③7月6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宣称，日本政府拟在8月以前夺取武汉，两国谈和，最好在此时期。日方条件仍如陶德曼转达的“订立防共协定”等四条，希望了解中方条件，再行商洽。中村要求孔祥熙直接致电外相宇垣一成商洽，同时表示，希望7月7日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时，“演词不致过分激烈，以免引起彼方民众反感”。^④同日，孔祥熙将贾存德的上述电报及中村谈话一并报告蒋介石：请示“所陈各节，是否可行”。^⑤7月15日，孔祥熙又将萱野的老朋友马伯援以及和萱野有干亲关系的居正夫人派到香港，参加谈判。^⑥

7月20日，马伯援偕同贾存德会见萱野及松本。马伯援表示：1. 日本军阀，不协助东亚民族，使之独立，为九亿有色人种之领袖，乃恃强奴隶中华民族，迫中国抗战，自相残杀，未免自坏长城。2. 日本不知中华民族之团结，由于日阀之迫逼与凌辱，反欲分化中国，利用汉奸，这种手段，已不适用于现代之中国。

① 转引自《上海贾存德来电》，1938年7月5日，“蒋档”。

② 转引自《上海贾存德来电》，1938年7月4日，“蒋档”。

③ 转引自《上海贾存德来电》，1938年7月5日，“蒋档”。

④ 《香港情报》，1938年7月6日，“蒋档”。

⑤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7月6日，“蒋档”。

⑥ 居正的女儿是萱野的养女。据贾存德回忆，贾到武汉后，孔邀马伯援与贾相见，对马说：“你明天就和贾存德一同到香港去。”又致函萱野长知：“关于和谈之事，特派马伯援先到香港候教。”见《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126页。

3. 中日战争结果，必陷日本于污泥中，更陷东亚于污泥中。4. 可惜日本无大政治家，无远见军人，理解孙总理的大亚细亚主张，促其实现，致有今日之悲剧，受到白色人种轻视。谈话中，马伯援警告萱野：中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将是共产党。他盛赞延安青年人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精神，说是“肤施之青年男女，日食小米饭两餐，工作十四小时不倦，精神方面，胜过今日之大和魂”。

萱野和松本表示同意马伯援的意见，陈述其观点说：1. 犬养毅临终时表示，日阀利用大亚细亚主义，强霸东亚，必惹大祸，拟改大亚细主义为亚细亚和平协会，使各国各民族乐于参加。2. 头山满最近常说：中日战争，起于日本不敬，轻视中国军人及中华民族；应当止于“诚”。倘中日以“诚”相见，各种问题均可解决。3. 现在中日军人，愈打愈对立，愈仇视。吾辈工作，以休战、恢复理性为先。4. 日本军人，最要假面子，倘蒋先生能理解，一时下野，即可停战，中日双方，同时派出代表，和平立刻实现，届时蒋先生东山再起，亦无不可。马伯援反驳萱野二人的意见，声称“蒋公为现在中国唯一的领袖，假使下野，无论何人，对于这个局面，不敢负责，不配负责，中国依然混乱，仍是抗战到底为是”。^①萱野表示，愿回东京传达上述意见。马伯援即鼓励萱野，倘能建议日本取消近卫宣言，不要求蒋下野，伯援可以个人资格，报告孔祥熙或其他党中旧友，请其转陈蒋公，促进和平实现。会谈后，萱野、松本等于7月23日前先后回日，向近卫首相、宇垣外相等人汇报。

蒋介石对宇垣一成的“和平”政策怀有戒心^②，自然，他对马伯援、贾存德与日方的谈判仍然持反对态度。8月4日，孔祥熙致蒋介石电称：“前奉尊谕，已切嘱马伯援、贾存德勿再活动，完全作为彼等私人接洽，藉以探取消息，备我参考，绝不能

^① 《马伯援呈》，1938年10月8日，“蒋档”。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5月27日。

谈及任何条件。”^①11日，他在回答蒋关于唐绍仪的批评时再次作了同样表示。^②8月下旬，已经返回上海的贾存德多次致电孔祥熙，声称畑俊六与第三舰队长官及川古志郎托人邀贾会面，表示日方已不再要求要蒋介石“下野”，近卫声明亦可由天皇出面表示取消；现在日方的条件仅为“防共”与“亲善”两条，如中方采纳，希望派负责代表到沪商谈。贾并称，日方已暗中成立休战特别委员会，畑俊六、及川古志郎为委员，土肥原等为进行委员。^③9月1日，孔祥熙再次将上述情况向蒋介石汇报。6日，蒋介石复电，命孔祥熙转告贾存德，向日方表示拒绝。^④10日，蒋介石决定迅速制订五年抗战计划，实行经济、政治、党、军队、教育、社会各方面的改造，以期自力更生与独立作战。^⑤11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孔祥熙，口吻空前严厉：

贾某事，应严令停止活动，否则即作汉奸通敌论罪。敌想复订停战协定，以亡我国，其计划极毒，请兄负责制止，免误大政方针。千万注意是荷！^⑥

蒋介石既甩出狠话，孔祥熙不敢再转呈贾存德的情报，于是，采取其他办法。

①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8月4日。

② 孔祥熙：《致武昌蒋委员长》：“至前马、贾两君与董野等之接洽，亦系藉私人关系刺探消息，作为情报，更未提及任何条件，不过不能不有所指示，免应付失言。”1938年8月11日，“蒋档”。

③ 《抄上海贾生来电》。1938年8月28日，“蒋档”。

④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9月7日）：“顷奉鱼（6日）机鄂电，遵即转告贾生，令其拒绝。惟前数日尚接有贾生来电三件，虽系过去情报，姑仍照抄奉阅，以备参考。”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9月10日；参见同日《事略稿本》。

⑥ 蒋介石：《致重庆孔院长》，1938年9月11日，“蒋档”。

不理睬孔祥熙与日方首脑会面的要求

萱野长知等于7月23日返日后，联络头山满、小川平吉等人，在政界上层活动。至9月上旬，宇垣外相表示，不再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但蒋须“预先作出准备下野的表示，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①9月17日，萱野再到香港，与马伯援、贾存德会谈，萱野称：宇垣“酷爱和平”，愿意仿效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访问德国的故事，在大海洋的军舰上与孔祥熙见面，不讲条件，仅以“和平”与“防共”两原则为谈话基础。^②马伯援将两原则略加修饰，改为：1. 东亚永久和平；2. 中日精神防共。对“精神”二字，萱野深表同意。23日，日本五相会议议决，同意宇垣与孔祥熙的会谈计划。25日，马伯援离港赴渝，向孔祥熙汇报。但是，宇垣因其主张遭到日本军方的强烈反对，于29日辞职。10月8日，马伯援写出报告，交孔祥熙转呈蒋介石。报告称：萱野等对和平运动，具有决心，正在运动头山满组阁。宇垣虽已去职，但近卫仍有决心，日本厌战心理，已遍全国，因此，中国应该利用这一时机。他说：“头山满为日本右派之典型人物，与总理有旧，现以八十四岁，老而且病之躯，热心和平，并派六十六岁之萱野，两来香港，设法沟通，此种精神，吾政府宜利用之。再中日战争，孰胜孰败，总有结束之一日，我政府纵不轻与之和，亦当与之周旋。”他建议重庆国民政府“通盘打算，本乎历史，鉴于大势，派得力人员与之接洽，鼓其勇气，或进而同去东京，察其虚实，宣传我政府主义”。^③

^①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598页；参阅拙作《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收入拙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410-411页。

^② 《马伯援呈》，1938年10月8日。

^③ 同上。

孔祥熙觉得马伯援的报告很有用，于10月15日上呈蒋介石，同时致函说明国际没有援助中国的可能，而中国国内的财政又已极为困难，无法维持。函称：

兹据顾大使报告及各方事实观察，国际援助既不可能，则此后对于内政外交均有切实检讨之必要。最近有西友自日来言，就其国内表面观察，似无大战状态，一切经济财政尚能勉维现状。至于我国，在我兄领导之下，虽将士用命，民众动员，抗战年余，已博各国之彩声，只以战场尽在我国境内，虽不免土地日促〔蹙〕，交通困难，工厂既遭摧毁，货物亦难出口，所有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实不可以数计。非惟我兄多年来苦心孤诣之种种建设，付诸东流，而今后财政上之维持，更将难乎为继。^①

该函进一步渲染财政危机和武汉失守后中国的困境，声称：“后方情形，为我兄所深悉，长此以往，武力固属重要，而国内物质及人民团结如何，均应顾及。如果军事方面确有把握，不仅武汉可保，且能继续支持，日本方面不出三数月即有变化可能，自属不成问题，万一无甚把握，恐武汉一经退出，则人心不免因厌战而动摇，各省态度有无变化，亦难预料，且敌机现已屡向我后方扰乱，将来大多数军队究宜退至何处，倘使拘于一隅，补充与给养似皆成为问题。加以目前我之现金及外汇已拨用殆尽，而以货易货又因交通困难运输亦极不易。弟忝负行政责任，对于军事事实不甚谙，对于财政外交，则不能不悉心研究。近来多病，杞忧尤甚。”他建议蒋介石抓住机会，乘时进行。函称：“如外援方面不能再求进展，而军事方面亦无十分把握，则此后遇有解决机会，即应乘时进行，否则机会至时，我无应付之策，稍纵即逝，更难再得，心所谓危，不敢缄默。”

^①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10月15日。

同函附呈孔本人撰写的《最近国际情势》及《日本最近情势》报告。前一报告对蒋“攻心”，历述各国情况，声称寄希望于国际援助，无异画饼充饥。中云：

我以开罪于日本，故英国对我各项借款，非完全拒绝即多所顾虑，而法国对我所购之器械，现亦多方为难。俄虽对我极表同情，然因德、义（意）、英等国对俄均甚歧视，俄内部情形复杂，故斯大林不敢言战……至美国因鉴于欧洲形势，虽心理上为我不平，实际上亦难积极助我……若望其为我出力，仍恐等于望梅止渴。^①

后一报告说明日本国内和平派的活动，内称：“日本元老重臣文治派，现在希望和平者颇不乏人，如头山满、近卫、宇垣已合组秘密委员会，暗中活动，设法制止军阀跋扈……萱野为头山之代表，现在香港，仍思尽力奔走。”接着，孔祥熙着重说明，宇垣虽已去职，但日本国内的和平派仍在活动。报告称：

昨接港电云，松本最近由东京抵港，据言，对和平大纲，近卫与宇垣一致，方针未变。现矢田回国，拟请近卫亲自出马，以效张伯伦。顷又闻知萱野接东京来电，谓海、陆相急盼与弟及居觉生兄会面。^②

还在宇垣一成刚刚出任外相时，蒋介石就得悉日方曾要求中方派员赴日谈判，对此，斥之为“想入非非”、“可笑之至”。^③自然，对于“近卫亲自出马”以及陆军大臣、海军大臣要与孔祥熙、居正等见面的说法也不感兴趣。对孔祥熙此函，蒋介石未加

^① 孔祥熙：《最近国际形势》，1938年10月15日，“蒋档”。

^② 同上。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5月30日。

理睬。同年11月，褚民谊、樊光致电汪精卫、孔祥熙，再次声称“近卫甚愿效张伯伦赴德故事，赴华晋谒委座”。^①同月7日，孔祥熙将此电转呈蒋介石，蒋仍然未加理睬。

阻止孔祥熙答复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

近卫的第一次对华声明发表后，遭到日本许多人士的批评。11月3日，近卫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题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改变此前“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声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结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企图以此诱使重庆国民政府上钩。^②果然，孔祥熙觉得是个机会，准备在11月7日的行政院“国父纪念周”上发表讲话，给予“非正式答复”。拟稿称：“我人所注意者，仅彼对我态度，以平等待我者，即我之友，以暴力侵我或武力乱我者，即我之敌。”拟稿批评日本政府“好用定义不明之词句以淆惑视听，如彼所谓安定东亚，是否独霸东亚之别名？所谓求中国之合作，是否剥夺我经济之独立自由之变相？我人于此亟愿得知其真意。”^③这里，貌似对日本提出批评、谴责，而实际上将为日本政府提供答辩、粉饰其侵略政策的机会。拟稿并称：“解决中日之关键，全在日本，日人果能尊重我主权，而抛弃其侵略政策，则东亚之安定一举手耳，即世界之和平亦易如反掌也。”11月6日，孔祥熙将拟稿电送蒋介石审阅。同日，蒋介石以“限卅分钟到的特急电”通知孔祥熙：“此文应慎重斟酌，切不可发表。”^④11月9日，孔祥熙复电蒋介石称：“电发之后，弟觉似仍未尽妥，经再修改，原文另电陈闻，顷奉尊电

① 《褚民谊、樊光致汪精卫、孔祥熙电》，1938年11月7日，“蒋档”。

②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文书》，第400-401页。

③ 孔祥熙：《致重庆蒋委员长》，1938年11月6日。

④ 蒋介石：《致重庆孔院长》，1938年11月7日。

嘱为缓发，经已遵办。”^①这样，蒋介石就阻止了孔祥熙与近卫文麿之间的一次远距离对话。

用“杀无赦”警告萧振瀛与日人重开谈判

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放心，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没有第三国的保证，决不与日本直接谈判。日本军部的“兰机关”负责人和知鹰二懂得蒋介石的心理，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饵，诱使蒋介石破例。1938年9月，蒋介石派原天津市长萧振瀛到香港谈判，由何应钦具体指导。孔祥熙未参预此项工作，但他对谈判非常关心，唯恐其不能成功。同年10月，他耳闻谈判因第三国保证问题陷入僵局，功败垂成，于21日致电蒋介石称：“弟意最重要关键，乃在对方之条件如何。至于方式，不难觅得合意途径。现在国内外状况，兄所深悉，倘军事确有把握，自无洽商必要，否则如条件相当，直接、间接无非形式问题，条件如能密商妥贴，则运用第三国出面，不致有何困难。”^②这封信再次表现出孔祥熙因国内困难而急于与日本妥协的心理，但是，萧振瀛与和知谈判的主要困难在于日方一面谈判，一面进攻，毫无诚意，因此，蒋回函称：“萧事与兄所谈者内容完全相反，我方并未争执形式问题也。此事我处被动地位，在我限度之内，能否接受，实在于对方也。”蒋并告诉他：“此事于武汉之得失无关，请勿虑。”^③不久，蒋介石察觉日方谈判的虚伪，决心坚持抗战，下令停止谈判，召回萧振瀛。

第一次谈判失败，和知鹰二继续在东京政要之间活动。当时，日本正准备扶持从重庆逃出的汪精卫成立政权，和知觉得是个机会，决定利用此事再次迫使蒋介石派人坐到谈判桌前来。

^① 孔祥熙：《致重庆蒋委员长》，1938年11月9日。

^② 《事略稿本》，1938年10月23日。

^③ 同上。

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次月，成立“中央党部”。17日，汪精卫致电重庆国民党中央，要他们毅然改图，努力与日本实现和平。同月，和知鹰二到香港，要其助手何以之转告重庆方面：汪精卫之事，经近卫、平沼两届内阁决定，又经阿部信行特使承认，奏明天皇，势难中止，但日本对汪之信念已经摇动，认为其人大言不实，贪索无厌。影佐祯昭本是汪之主谋，现在亦已失望，引为歉憾。目前日方之所以仍然支持汪精卫，在于无别路可走，不能不就既定政策，听其一试。何以之称：大约11月初，汪即可组织政府。意大利已劝日本促成此事，应允即日承认，德国则劝日本与重庆谋和。综观内外情形，尚在徘徊之际，最好乘汪精卫政府成立之前，断然成立全面停战协定，而将汪之问题包括于取消伪组织之中。中国如有和平决心，日本定以诚意直接谈判。军部方面，和知可与板垣征四郎负责；政府方面，可由政界元老松井石根、山之辅等出面商谈原则。和知要求何以之转告萧振瀛，或派专使来港商谈，或仍由萧先来，以资进行。^①31日，何以之致电时在重庆的萧振瀛，告以上述各点。10月4日，何以之两电萧振瀛，声称和知认定汪精卫为“东亚和平之障，极愿剪除”，催萧即速来港。^②10月6日，孔祥熙将何以之各电转呈蒋介石，同时致函，要求允许萧振瀛再次赴港，以私人资格与和知“慎密试谈”，同时“藉以刺探他方消息，备我参考”，函称：“弟意此次和支〔知〕奔走各方，对于去汪事颇为努力，似可令仙阁前往一行，略与周旋，使其对我信仰益趋坚定。如能达到吾人之目的，不妨加以利用。否则仙阁不去，彼必感觉失望，甚或老〔恼〕羞变怒，反又趋于助汪之一途，则前途更多障碍。”^③函上，不料却引发了蒋介石的雷霆之

^① 何以之：《致彦超（萧振瀛）》，1939年9月31日，“蒋档”。

^② 何以之：《致彦超》，1939年10月4日。

^③ 孔祥熙：《致介兄》，1939年10月6日。

怒。10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萧、孔见解之庸，几何不为敌方所轻！国人心理之卑陋，殊堪悲痛！”^①9日，蒋介石复函孔祥熙称：

兄与萧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②

这封信，表面上对萧，实际上断然批驳孔祥熙的意见，语气严峻，没有给孔留一点面子。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萧、孔求和之心理应痛斥。”^③可见，蒋的这封信明确针对孔祥熙。蒋介石此次之所以如此坚决、激昂，一是萧振瀛曾将去年在香港与和知谈判的部分情况透露给秦德纯，秦又秘密转告冯玉祥，其间讹传严重，冯据此向蒋及国防会议揭发，使蒋很愤怒。^④二是自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蒋即加强了对汪的批判火力，声称“汪逆卖身降敌，罪恶昭著”，“人人得起而诛之”，正处在和“汪逆”不共戴天的情绪中。^⑤

同年11月，何以之在香港与孔令侃会谈，何称：倘中方确有接受和平可能，则和知愿赴重庆面洽。^⑥次年1月，何以之向孔祥熙的亲信盛升颐转达板垣征四郎的议和条件，并称：只要中方派大员前来，板垣可以亲自出马，甚至飞往内地亦可。^⑦对于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10月8日。

②《革命文献》，1939年10月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

③《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10月9日。

④《冯玉祥日记》（5），1939年5月29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660页。参见高兴亚：《冯玉祥将军》，北京出版社，1982，第187页；施乐渠：《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投降阴谋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第67页。

⑤《严斥汪逆卖国降敌》，《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谈话》，〔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第126页。

⑥《孔令侃为呈再晤何一之给孔祥熙的密电》，《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第75页。

⑦《盛升颐为呈评述日方和谈条件由给孔祥熙的密电》，《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第77页。

这些情报，孔祥熙就不敢再报呈蒋介石了。

1940年6月28日，蒋介石在日记“预定”栏中写道：萧振瀛“应监禁”。^①

查究受日方之命到重庆接洽的蔡森、贾存德

自蒋介石严令贾存德停止活动后，孔祥熙虽不敢再向蒋转呈贾的情报，但仍命其在上海继续联系日方。

早在1938年，贾存德即与伪维新政府官员王子惠相识。王为留日学生，早期同盟会会员，与畑俊六、及川古志郎等日军头目都有联系。伪维新政府成立时，任实业部长。当年夏，王向贾等表示，如能给以自新之路，可随时脱离伪组织，牺牲一切，专诚为中央效力。贾存德等曾将王氏情形电告孔祥熙，孔即复电勉励，命其辞去伪职，伺机去东京团结日本主和派，抵制主战派。王奉令照办。1940年4月，王子惠自东京返沪，声称已将主和派人物闲院宫津子伯爵、头山满等联成一气，主张和谈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对手，反对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政权。王并透露，板垣征四郎想从速结束对华战争。5月间，板垣在面谈时口头提出五项条件：1. 声明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2. 中日以平等互惠之原则，经济合作。3. 共同防共。4. 撤兵。5. 取消一切伪组织。^②在谈到第四条时，板垣表示，希望孔祥熙指定地点，以极秘密的方式与板垣等会面；如孔允许，约定会面日期后，可通知板垣，即由板垣等请求天皇下密诏，实行全面秘密休战。王子惠并称，板垣亲口表示，如孔祥熙同意，将亲自签名发出正式公文，望孔在6月6日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6月28日。又8月12日日记云：“约萧交存件。”据此，蒋并未监禁萧，而是要求他交出保存在手中的中日秘密谈判文件。

^②《敌情报告录呈参考》，“蒋档”。据贾存德回忆，以上五条由板垣以铅笔亲自书写，交王子惠转贾。见《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的片断》，《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128页。

天皇承认汪政权前对上述条件表态。^①

6月26日，贾存德化名吴复光到达重庆，孔祥熙表示可以接受板垣的五项条件。但是，7月4日、8日、9日、10日，日机连续轰炸重庆，这使孔祥熙很不满，对贾存德大发牢骚，责问“日本人搞的什么鬼”，埋怨因此妨碍了向蒋的“进言之机”。^②不久，板垣应允，自16日至22日止，停止轰炸一周。这一时期，孔祥熙情绪低落，告诉贾存德“事不好办”，要他“不要着急”。7月底，王子惠再派蔡森抵渝，会见孔祥熙，声称“如有谈判可能，彼方即行统一军、政、党意见，取消一切枝节活动，决定专责，以资进行”。^③其后，日方急于得知蔡、贾谈判消息，致电称，将派专机到广州迎接蔡、贾。孔祥熙觉得这又是一次好机会，于8月24日致函蒋介石，摘抄蔡、贾报告及有关电报，函称：“敌思结束对华战事，以便南进，可以想见。弟意值此抗战严重、外交诡变时期，对于各方消息，似应互相印证，以冀把握机会，决定大计。”函末，孔祥熙特别要求蒋介石“阅后付丙，不必交存”。又附言称：“就最近国际情势观察，友邦对我实力援助甚少，我应设法别寻机会，以谋自立自主，蔡、贾所述各节，亦有可以供我利用之处。弟已告其设法各方鼓动，促成敌之南进。一则使其主战、主和意见分歧，分化团结力量；二则使其侵略政策转移方向，减少对我力量；三则证明敌人野心甚大，欧美列强亦必与之发生摩擦，于抗战前途，或不无裨益也。”^④

板垣曾向王子惠表示，可以发出亲自签名的公文。孔祥熙向蒋介石上书后，要求蔡森回沪，取到板垣正式公文。又命贾回沪，暗中监视王、蔡二人。其后，二人即陆续离渝，经香港回

① 贾存德：《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的片断》，《孔祥熙其人其事》，第128页。

② 贾存德：《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的片断》，《孔祥熙其人其事》，第129页，参见孔祥熙：《致介兄书》，1940年8月24日。

③ 《敌情报告录呈参考》，1940年7月，“蒋档”。

④ 孔祥熙：《致介兄书》，1940年8月24日。

沪。8月下旬，蔡、贾的行踪被军统在香港的特务发现，戴笠亲自向蒋报告，蒋即命戴笠向孔祥熙查询。9月上旬，孔祥熙复函戴笠，谎称吴复光系中央银行某职员别名，因受敌伪注意，调令来渝。蔡系靳云鹏旧部，受靳之命来渝报告北方情形，二人均系“普通人员”，敌人不会相信，更不会赠以巨款。^①其后，军统打入日方的特务毛丰又向戴笠报告，蔡森已于27日偕同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东条佑铃专机飞沪，此事系日本实业家背后策动，曾拨款二百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云云。^②9月10日，戴笠将有关情况再次报告蒋介石。同月19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称：“敌人曾购买山西人蔡某等二人赴渝，携孔先生假信而归沪。现由敌人特许设电台通电，尚在乌烟瘴气中，此事尊处想早已闻及矣。”^③20日，蒋将有关检举报告转给孔祥熙，要他回答。22日，孔祥熙复函，首称检举报告“所载各节，恐多揣测误会，以讹传讹，原报告人有意邀功，遂不免捕风捉影，或另有作用者希图对弟中伤”。接着，孔向蒋辩白：一是孔祥熙致函板垣及头山满问题，孔称：蔡、贾来渝时，携有日本老友名片，向弟问候，弟因多年故交，在情理上不能不理，因此在蔡、贾临行之时，以名片回报，所谓寄板垣与头山满等人的亲笔函件，绝无其事。二是蔡、贾与王子惠、板垣的关系与接受巨额资助问题，孔称：王子惠派人赴港迎接蔡某，或有其事，但蔡、贾到沪后，是否赴南京，已否晤见板垣，均不得知。孔承认：蔡、贾来重庆之前，确曾与板垣会面，也承认，二人可能得到日方资助，但他说：“敌方实业家因反对军阀厌恶战事，渴望真正和平早日实现者甚多，既派其来，或有赠送旅费之事。若谓拨款二百万元，恐未必有此巨额。”他认为这些情况，“真伪无从证明”，属于敌人“内部互相猜忌，设词毁谤”。三是关于蔡、贾的身份与贾存德往来沪、

^① 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10日，“蒋档”。

^② 戴笠：《报告》，1940年9月10日。

^③ 焜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19日。

渝之间的目的。孔在重申“调回”说之外，又加了一个“迁移眷属”说。函称：“上海沦陷业已三载，敌伪方面无时不思毁我法币，俾我财政不能接济军事，对中行人员极力压迫，彼等既无寸铁，政府亦难为保障，故不能不有一熟悉敌情者为我刺探消息，藉便戒备。贾在过去，虽曾任此项工作，因其参加倒汪运动，为汪方特务队所注意，前已将其调回。此次赴沪，即拟设法迁移眷属。至蔡本非弟之属员，亦无任何名义，在无所谓调回矣。”^①

蒋介石下令戴笠调查之后，陈布雷又于22日接到香港张季鸾的检举信，中云：“王子惠所购买之蔡、贾二人之事，其情形甚堪发指。盖敌人以专机送至广州，而公然入渝，其归也，亦由敌人由港接至广州，而专机送往上海。此辈宵小，本无足深论，然敌人购买之人而能公然出入重庆，且能带孔先生之假信而来，再不能以小事看矣。”^②陈阅后“甚感离奇”，立即转呈蒋介石。^③蒋阅后再致孔祥熙一函，严厉批评孔祥熙等人的行为“摇撼军心、人心”，显示“政府零乱”。^④同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军人之愚拙无才，比我国尤甚，其行动幼稚欺诈，实非常情所能想像，几乎令人倭寇有不可交手之感。若理会者，必受无妄之祸也。”又称：“为庸之与季鸾等无方而好事为叹也。”^⑤这里批评到了两个人。“无方”，指孔祥熙；“好事”，指张季鸾。

蒋介石的批评很严厉，显然，孔祥熙要认真想想对策了。9月30日，孔祥熙于八天之后才复函蒋介石，函称：“今细绎手示，对蔡、贾事实情形，似尚有未尽明了之处，恐系根据一方面之情报所致。既承谆谆相诘，弟不忍不略陈衷曲，期解疑虑。”

孔函除说明蔡、贾的身份及离渝情况外，指责情报提供者

① 孔祥熙：《致介兄》，1940年9月22日。

② 焜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21日晨。

③ 《陈布雷日记》，1940年9月22日，内部排印稿，〔台北〕“国史馆”藏。

④ 转引自孔祥熙：《致介兄》，1940年9月22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9月22日。

“以讹传讹，竟至张大其词，骇人听闻”。孔函特别说明，在接待蔡、贾的整个活动中，自己对蒋既无隐瞒，又持慎重态度，没有文字贻敌，更未假借蒋的名义，函称：“一言丧邦，古有明训。事关国家兴亡，何敢擅自主张！当蔡来见时即本我兄素来之主张，晓以日本如不撤兵，不恢复七七事变以前之状态，决不与之谈判。此外绝无文字表示贻人手中，更何能涉及我兄名义？又何来我兄名片？蔡、贾两人谅亦无此巨胆敢事伪造。”接着，孔函强调掌握敌情、善于利用反间的重要：“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侦探重要，无人不知……今如有人，本其爱国热忱，窥得敌伪隐情，甘冒危险，不远千里而来，向我告密。若不假以颜色，使其乐为我用，势必为渊驱鱼，反被敌伪利用。弟虽愚，窃期期以为不可。故蔡之来谒，不能不见，惟所告之言，皆系勉以大义，并未派以任务，且暗示种种，使其有机会时，于不知不觉间言于敌方，以期于我有百利而无一害。”孔函还强调，从事这方面的活动难免遭人误解，甚至遭到攻击，但自己完全出于忠诚：“弟亦深知接见此种人物，难免物议，小则受人攻击，大则自招巨祸，然为效忠党国，使我兄抗建大业早日成功，故不惜利用各种机会，各方力量，期达目的，从未对自己本身之安危着想。”^①

孔函接着分析日本少壮军人中的两派。甲派主张先用全副武力，解决中国事件，然后再行南进，此种主张对于中国最危险，非极力破坏不可。乙派主张用温和手段，得到中方谅解之后，再行南进。孔函由此论证利用乙派的必要及利用蔡森的正当。函称：“至乙派今日之肯降阶表示寻求和平者，确因千载不易得到之南进政策，今可不费力拾得之，故不容轻轻放过。弟既认定此时如能诱其南进，确属于我有益，前曾向兄言及，兄谓恐做不到，弟亦深知其难，不容强求，然苟有时机，弟以为不应放过，必随机设法暗示，希接近敌方者，于无形中促助其乙派之主张，

^① 孔祥熙：《致介兄》，1940年9月30日。

故蔡来见时，弟亦晓以此意，暗示其促成。于上次报告中最后一页，业向我兄陈明。”

针对蒋函所批评的“摇撼军心、人心”之说，孔祥熙辩解道：“蔡此来，原出敌方之意。据情报所载，敌既派其前来，又复巨款运动，自系敌方力竭，敌方情急，适足以暴露敌人之弱点，足可摇撼敌人之军心、人心，而我之军心、人心，更当因此而益振，其理自明。”接着，孔祥熙又反驳蒋的“政府零乱”说。声称“蔡既来渝传达敌人之意，是时至今日，敌已深知欲谋全面之和、真正之和，非向我兄请求不可，亦非听由我兄裁决不可，似无零乱之可言”。

孔祥熙在逐一反驳蒋对谋和活动的批评后，着重说明自己对蒋的耿耿忠心：“在过去二年中，弟对于敌伪或其他方面，凡有利于我兄之抗建大业者，均不惜任劳任怨以谋利用者，一则因承我兄重托，付以行政责任，不能推诿，一则因我兄为最高领袖，身任统帅，意欲保护其威望，故决志为国为兄，自甘牺牲，决不愿使我兄因一言一动，受有半点怀疑，致被奸人藉口攻击。”^①函末，孔祥熙表示，将遵蒋之嘱咐人查究此事。函称：“现蔡、贾事，既蒙尊嘱，遵即饬查，如有假冒招摇情事，贾当撤职严办，蔡已托人设法予以警告。”自然，这是孔祥熙对蒋的敷衍之词。

孔祥熙这封信写得很用心。在正函之外，还附有《情报摘要》两份。其内容之一是，褚民谊曾在南京宴会席间对人说：“先从倒孔入手，使重庆内政发生纠纷。”孔祥熙附呈这一情报，意在告诉蒋介石，所有反对他本人的行为，均有汪伪背景。其二是，张季鸾对人表示，衔蒋之命到港与日方谈判和平，到港前曾见蒋11次，等等。孔要求蒋阅读这些情报后“仍乞准予赐还，以便存查”，并称：“弟向不道人长短，在过去更不欲以此种复杂琐碎之报告，烦扰我兄心神。现在事既牵涉及弟，恐其中别有

^① 孔祥熙：《致介兄》，1940年9月30日。

作用，不能不请兄注意，但仍不愿使他人知之，以为弟亦有所攻击，或影响人心也。”张之赴港，确系受蒋之命。^①孔向蒋呈送有关张的情报，其潜台词是：你蒋介石不也在和日本人发生关系吗？孔祥熙这一手很厉害，蒋自然无话可说，追查蔡、贾一事不了了之。

蔡、贾回到上海后，即列席王子惠与板垣代表岩奇清七所举行的会谈。岩奇称：“中国的维新大业必须由蒋委员长领导才能成功”，“要共同防共，中国方面就需要邀请日本在华北边区枢纽地留兵协助”。会议记录提出，察哈尔、绥远铁路线及北平、奉天线各枢纽地均由日本驻兵。至此，贾存德才发现上了王子惠与日方的当，拒绝签字。会议不欢而散。1944年9月，贾存德在上海会晤日本“兰工作”负责人和知鹰二，得知和知与板垣之间存在矛盾，深感变化难测，打电报给孔祥熙，声称才识不足，难以胜任，自此退出与日方的谋和活动。^②可见，此前孔祥熙并未对贾采取“饬查”、“撤职严办”等举动。

孔祥熙对蒋介石的汇报有重大隐瞒

孔祥熙在1940年9月20日函中向蒋介石表白：“弟在过去，凡有所闻，均曾择要抄陈，后因奉命，亦即停止。”似乎他在与日方谋和中，所有重要事情都曾向蒋汇报，而且奉命即止，没有违背过蒋的意志。读者从上文中已可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下文我们将进一步提供新的论证。

根据日文档案，早在1938年6月，孔祥熙即派遣秘书乔辅三赴香港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谈判。二人先后在6月23日、28日、7月1日、13日、18日、19日多次会谈。在7月18

^① 参见本书《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

^② 贾存德：《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片断》。

日的会谈中，乔曾转述孔祥熙起草的和平条件：

1. 中国政府积极实现对日好感，停止一切反日行为，希望日本也要为远东永久和平积极为日华关系好转而努力。

2. 满洲国以签订日、满、华三国条约而间接承认。其次深切希望满洲国自发地成为满洲自由国，给中国人民以好感。

3. 承认内蒙的自治。

4. 决定华北特殊地区非常困难，但是中国承认互惠平等的经济开发。

5. 非武装地带的问题，有待日本的具体要求提出后解决，中国军队不驻防，希望由保安队维持治安。

6. 虽然还未充分讨论，但清算与共产党的关系，或签订加入防共协定的特别协定等，必须再加研究。

7. 中国现在非常荒芜而且穷困，因而对中国政府说来，（日方）虽有赔偿的要求，亦无力支付。^①

以上七条，包括实际上承认伪满、承认内蒙“自治”、设立非武装地带等问题，都是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谈判中，乔辅三向中村丰一称：“孔曾和蒋见面，除了蒋介石本身下野问题外，其他全部都和蒋商酌过的。”直到今天，也还有学者坚信乔辅三的这一表白。其实，档案资料证明，这些条件和蒋在对日秘密谈判中一贯坚持的条件完全相反；档案资料也证明，孔祥熙从未向蒋汇报过上述条件。上引8月11日孔祥熙致蒋函称，他之所以不拒绝和日方谈判，“原欲藉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在其他函件中，孔也一再做过类似保证。可见，孔祥熙的上述条件是背着蒋擅自向日方提出的。不仅如此，连派乔辅三赴港谈判一事对蒋都是完全封锁的。现存蒋档中，孔有许多关于秘密谈判的汇报，但是，没有一件提到乔辅三。在必须提到的地方，也竭力掩饰。如1938年7月6日孔令侃致孔祥熙，

^① 日本外务省档案，S487号，中译文见《孔祥熙其人其事》，第135-136页。

又由孔转蒋的电报说：“据所派与驻港日领事密洽者报告：该领事称：‘钧座在位，各事总有办法。’言下似有议和须以委座下野为条件之意。当以此种观念决不能任其系怀，故照钧座在汉面谕，对该领事表示，目下政府系钧座负责主持，如确有必要时，钧座当可辞卸。”该电所称驻港日领事，指中村丰一；钧座，指孔祥熙；委座，指蒋介石。其中所称“所派与驻港领事密洽者”，显然就是乔辅三。之所以不称其名，说明孔祥熙父子不愿意让蒋了解乔赴港谈判的真情。

在对日秘密谈判中，孔祥熙对蒋介石所做的隐瞒非止一端。例如，前文已述，蒋一再嘱咐，令贾存德停止活动，孔也屡称“遵瞩”，但实际上一直在支持和指挥贾的活动。又如马伯援赴港谈判，明明是孔祥熙所派，但马伯援所写，经孔祥熙转蒋的报告却说成事出偶然：“伯援因事赴香港，适日友萱野长知亦在该地，时相过从。”之所以这样写，完全因为此前蒋介石已不只一次与孔谈话，要他停止谋和。此外，孔祥熙还长期利用曾是共产党员，后向国民党自首的胡鄂公^①在上海与日方谈判，次数频繁，接触面很广，但是，孔祥熙也从未向蒋汇报过。

孔祥熙长期追随蒋介石，和蒋利益相共，荣辱与俱。但是，他却背着蒋一再向日方谋和，甚至在个别谈判中向日方提出丧权辱国的条件，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对长期抗战丧失信心。从本文前引他写给蒋的多通信件看，他认为国内财政极端困难，国际援助又毫无希望，因此才一意主和，谋求妥协。

不过，也应该看到，孔祥熙与日方的秘密谈判除谋求妥协外，也还具有若干策略目的。例如：掌握敌情，扩大日本国内的主和派与主战派的分歧；阻挠、延缓汪伪政权的成立；引导日军南进，减弱中国战场压力等多种原因在内。因此，孔的谋和活动

^① 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有胡鄂公者，籍隶鄂省，曩为国会议员，嗣与李大钊等加入共党。民国廿三年间，经生处在汉破获拘禁，旋奉经准予自首，并交由生处运用。”

与汪精卫有别。1940年以后，孔的谋和活动基本停止。他在协助蒋介石掌控战时经济、保证抗战资源方面还是做了若干有益的工作的。

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

如上文所述，蒋介石对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屡加批评、阻遏，而孔祥熙则一再坚持，多方联系，并且背着蒋向日方提出严重的妥协条件，这种情况说明，蒋、孔二人虽公私关系均极为密切，但二人在对日态度上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卢沟桥事变后，孔祥熙在伦敦致电蒋介石，分析美、英、苏三国的对华态度，反对立即抗战，电称：“中日事件，如非确有把握，似宜从长考虑。”“应付日本，仍须以自身能力为标准”。^①21日，蒋复电称：“情势日急，战不能免。”30日，孔祥熙再次致电蒋介石，询问“中央今日作何主张”，蒋电复称：“中央必决心抗战，再无回旋之余地矣。”8月3日，孔再次电蒋，以“我军处处失利”为忧，蒋则复电表示：“战事果起，弟确有把握，请勿念，一时之得失不足计较也。”这些地方，说明二人在对日抗战问题上确有分歧。1995年，我在《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一文中，曾判断“蒋介石思想中，抗战成分较孔祥熙为多”。现在看来，这一看法还是可以成立，但是，当时我认为孔的议和活动“显然得到蒋的默认和支持”，这一看法需要修正。^②

蒋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蒋强烈反对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后来又反对日本侵略。1928年的济南惨案，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

^① 本电及以下各电，均见《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光碟，07A-00085。

^② 《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收入拙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第450-452页。

也是对蒋介石个人威权的羞辱。当年5月，蒋日记云：“倭军人城后，将我徒手兵及伤兵尽行射死，发炮二千余颗，人民死伤二千余，有一家尽死于一弹者，城内延火甚惨。呜呼！济南七日记之耻辱惨痛，甚于《扬州十日记》。凡我华人，能忘此仇乎？”^①又云：“倭寇第一要求为总司令谢罪。呜呼！国耻身辱，其可忘乎！”^②因此，蒋有抗日的思想基础。但是，他又患有恐日症，认为中国不是日本的对头，因而长期对日采取妥协政策，总想尽可能推延对日作战时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接着沦陷，这就将蒋逼到了“最后关头”。他深知，如果他再不抗战，必将受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会处于全民的对立面。他也深知，如果他与日本议和，签订新的丧权辱国条约，他也必将遭到全民反对。1937年11月5日，蒋介石曾经“很机密地”告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③这确是蒋的肺腑之言。他在同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外战可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除抗战以外，再无其他办法。”^④所谓“外战”，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所谓“内战”，即指包括中共在内的各爱国力量会起而推翻他的统治。显然，蒋对这一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长期和日本打交道的过程中，蒋介石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完全不讲信义，日本政府和军部之间存在矛盾，政府完全缺乏控制军部强硬派的能力，因而与日本虽可达成协议，但都时时有被撕毁的危险。1938年8月，蒋自记称：“倭非待其崩溃与国际压迫至不得已时，决不肯放弃其华北之特权，而中倭和平非待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8年5月12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8年5月18日。

③ 《陶德曼致德外交部》，《德国外交文件》第1卷，第780页，中译文见中国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外交》（上），第164页。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29日。

至国际干涉，共同会议则不能解决，故对倭不可望其退让求和，如其果有诚意，则必须其无条件自动撤兵之后方能相信也。”^①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虽有恐日症，但卢沟桥事变后，他在对日作战的实践中却逐渐认识到，日本是个资源小国，其国力、军力与其不断鼓胀起来的野心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外虽强而中干，有其的虚弱一面。此外，蒋介石也看到了日本的野心终将驱使其和英美冲突，世界大战必将爆发，只要中国“苦撑待变”，抗战的胜利终将属于中国。1937年9月，他在日记中表示：“主和意见派应竭力制止。”“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②次月31日，他总结十年来与日本打交道的经验，认为“与其坐以待亡，致辱招侮，何如死中求生，保全国格，留待后人起而复兴”。^③他本人也有“尽忠竭智，死而后已”的想法。^④1938年1月，正是南京失陷、中国抗战最艰苦、最难以看到希望的时候，蒋在日记中写道：“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⑤所谓“国际形势”，指的就是英、美、苏联合，国际共同干涉，以至出兵对日作战。以上，都是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也是促使蒋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八年中没有和日方达成任何妥协协议、将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的思想原因。

一切战争都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作战到底，直至敌方完全被消灭或投降，一种是双方谈判，达成“和平”协议，适可而止。至于“和平”协议，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利于敌，丧权辱国，一种是有利于己，无损或基本上无损国家主权。以上种种，都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1941年之前，蒋介石长期陷在战与和的矛盾中，举棋不定。蒋曾寄希望于国际共同干涉或

① 《事略稿本》，1938年8月18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9月8日。

③ 《本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0月31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2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月10日。

第三国调停，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争，也有过直接和日方秘密谈判，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事的幻想。这就是蒋虽对孔的谋和活动有所阻遏，但又显得力度不足的原因，也是蒋虽批评孔谋和，但又长期付以国家行政重任的原因之一。档案资料证明，蒋本人也亲自掌控过几次对日谈判，有关情况，已见本书《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

原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 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

——兼述蒋介石如何对待被日本侵占的东三省

抗战时期，蒋介石在公开谈话或与日方的秘密谈判中，曾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条件或“抗战到底”之“底”。部分学者对此的解读是，蒋准备放弃、出卖东三省，因此他们对蒋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持严厉批判态度。但是，批判者实际上并不了解这一问题提出的过程及其来龙去脉，往往好从既定观念出发，对之加以解读、引申，因此，有关批判也就很难准确。

历史学应该是一把最公平的秤。人们对某一个历史人物的好恶可能因种种原因而不同，但是历史科学应该力求还原历史本相，并给予正确解释，不离开历史真实去有意拔高或贬低任何人，要做到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是关涉蒋介石和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大问题，要重建科学的、真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必须研究清楚。

为《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准备的预案

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也有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

1937年7月，日军制造“卢沟桥事件”，中国军队奋起抗战。此后，中国政府一面坚决抵抗日本的军事进攻，一面仍对和平解决抱有希望。7月1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华大使馆，要求该馆迅速转电华北日军当局，“严令肇事日军撤回原防，恢复该处事变以前状态，静候合理解决。”^①12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接见日本驻华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要求：1. 双方出动部队各回原防；2. 双方立即停止调兵。^②15日，外交部再次照会日本使馆，重申12日照会内容，要求日方“将此次增派来华之日军悉数撤回，并将本案肇事日军撤回原防，恢复事件以前之状态，静候合法解决”。^③至此，恢复“事变以前状态”只是解决卢沟桥事变中双方军事冲突的方法，尚非解决中日两国战争的外交原则。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提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不能要求任人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领土，不能受任何约束。蒋称：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蒋的这些主张，已经超出卢沟桥这一具体事件的范围，发展为解决中日两国间冲突的一般原则，成为后来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的思想基础。

卢沟桥事件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如既往，将问题提交国联，以争取国际的支持和援助。9月13日，国联在日内瓦开会。

^① 《外交部致日本驻华大使馆》，〔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1966，第211页。

^② 《王宠惠与日高信六郎谈话记录》，《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223页。

^③ 《外交部致日本驻华大使馆》，《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212页。

会议将问题交给国联远东咨询委员会。远东咨询委员会指责日本“诉诸武力”的行为，但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建议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讨论。会前，列强的设想是：通过有关国家的共同帮助，“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以斡旋或调停的方法达成一项和平解决的办法”。为此，列强希望在中日两国军队之间达成停战或停火，同时邀请日本参加会议，直接对话，劝导日本接受调解。当时，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通过其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同僚们已经了解到，有关国家“把重点放在先实现停止敌对行动，然后通过斡旋或调解取得迅速解决”。^①但是，现地“停战或停火”对中国并不利。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军已经迅速占领北平、天津以及河北省的广大地区，上海也正处于日军的包围中。现地“停战或停火”将意味着首先承认日本侵略者的这些“战果”。

为准备参加《九国公约》会议，争取对中国最有利的结果，中国政府曾在国内外的少数智囊人士中征求意见，从而形成了一份文件，题为《关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初步研究》。该文件提出，无条件的“先行停战”对中国不利。文件称：

会议之时，或先提出一要求双方停战，留出时间以便接洽……日本方面若不允停战，应付极易，但虑日本方面军事或到利于停战之时，未尝不可允许，果尔，中国方面地位极感困难，因中国方面立足在自卫二字，无拒绝停战之理由……但先行停战，除军事上或有作准备之利益外，皆有害无益。

因此，智囊人士建议，中国外交人员应提早与英、美、法、苏等国暗中接洽：“声明如有先行停战之要求，至少须附有‘日本军队应迅速退还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一条件，否则事实上无异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中华书局，1985，第589页。

帮助日本压迫中国也。此点为会议前应暗中请英、美等国谅解之一重要点。”^①智囊人士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中日两国军队之间“停战或停火”的条件，那就意味着剥夺日军在卢沟桥事变以来所取得的各种“战果”（包括已经占领的土地），是一个有利中国而且易于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方案。

当时，中日之间的最大问题是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广大土地，并且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怎样面对这一现实呢？智囊人士在另一份文件中提出：

吾人共同最后之希望，固在收复东三省暨其他一切失地，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若不先在一强有力中央政府统治之下，完成经济、社会、军事上之新建设，似尚不足以言此，故吾人认为：一、在此会议，不必坚持收复东三省失地及修订条约两问题；二、于日本要求，应慎重考虑，不必一概予以拒绝，且须以具体对策应付之。^②

智囊人士认为，收回东北三省及其他一切失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是中国的奋斗目标，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的强大，《九国公约》会议作用有限，因此，不应在会上提出它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智囊人士的意见显然得到蒋介石的肯定。10月21日，陈布雷代表蒋介石致电顾维钧，对出席《九国公约》会议的中国代表作出指示：1. 促动苏俄参战决心，并设法减免其未能决心之忧虑。2. 继续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3. 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

^① 《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和平酝酿》，〔台北〕“国史馆”藏，本文以下简称“蒋档”。

^② 《中日两国在九国公约会议所采取之态度及应采取之办法》，“蒋档”。

借款及军械贷款。同时，陈布雷要求代表们于会前先向英、美、法、苏等国说明“最要各点”：

1. 调解方案未妥协前，无条件之先行停战，于中国大不利，至少必须有“日本军队应退还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一条件。

2. 华北已成为中国国家最后生命线……不能容任日本所谓“特殊化”之组织存在。

3. 必须设法令日本将在中国之驻兵及军事特务机关完全撤退。^①

这样，“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就成为中国代表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预案。

《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于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中国代表不仅会前做了相应的工作，而且也在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11月6日，顾维钧偕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会见美国首席代表戴维斯。此前，日本政府已经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提出，要求德国政府出面斡旋，因此戴维斯询问程天放：如果德国真想提出愿意为中国调停，中国是否接受调停？什么样的条件中国方面可以接受？程天放当即回答：“任何调停应有先决条件，即须恢复7月7日以前之状态。”^②

根据以上叙述可见，在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方案的同时，蒋介石及其智囊人士并未准备放弃东北，而是准备将这一“老大难”的问题留待适当时机，以免干扰当前较易解决问题的解决。此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很长时期内一直采取这一策略。

在陶德曼“调停”过程中的运用与苏联政府的支持

1937年10月，日本四相会议决定，以军事和外交双管齐下

^① 《应令顾大使等注意要点》，“蒋档”。

^② 《顾维钧等致外交部》，1937年11月6日，《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396-397页。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第617页。

的办法，迫使中国政府取消抗日政策，放弃抵抗。^①22日，日本参谋本部派马奈木敬信上校到上海，邀请德国驻华大使出面“调停”中日战争。11月2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威胁蒋接受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教训，及时结束战争，不要落到“无条件投降”的悲惨下场。11月3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致电陶德曼，转述日本外务省提出的7项和平条件：内蒙建立自治政府，与外蒙国际地位相等；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以南一线设立非武装区；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停止排日政策；共同反共；降低日华关税税率；尊重外国权益。日方同时声明：如日本被迫延长战事，则条件必数倍苛刻。^②同日，德国外长牛赖特训示陶德曼，将上述条件转告蒋介石并劝其接受。

11月5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及孔祥熙，转告日本条件，再次警告蒋：“千万不可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再想主意。”蒋介石当即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问题。他说：只要日本不恢复原状，他就不会接受日本任何条件。至于具体条件当然可以讨论，但“首先必须恢复原状”。^③可见，蒋提出这一问题，目的仍在剥夺日本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战果”，抵制日方以其武力胜利为基础所提出的新的侵略要求。蒋自感当天的谈话很强硬，在当日日记中自述云：“敌托德使传达媾和条件，试探防共协定为主，余严词拒绝。”^④12月2日，蒋介石在会见陶德曼时重申：“中国在华北之主权与行政必须不变，并须保持其完整。”“如德国元首向中日两方建议停战，作为恢复和平之初步办法，则中国准备接受此项建议。”^⑤当日，蒋介石决定将谈判情况通知英、美、法、

① 《日本四相会议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纲要》，《年表及文书》下卷，〔东京〕原书房，1978，第370页。

② 《德国调停案》，《外交部案卷》，〔东京〕原书房，1978，00062A，0556。

③ ADAP, Serie D (1937-1941), Bd,1, No.516, 中译文参见中国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外交》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第164页。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5日。

⑤ 《陶德曼12月2日电》，《德国调停案》，《外交部案卷》。

苏四国。^①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提出“基本条件”（新四条），要求中国放弃容共反抗日、“满”政策，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对日本赔款。^②中国政府认为“上项条件无考虑之余地”。28日，蒋介石密嘱杨杰，将上项条件密告苏联政府并听取意见。^③

当时，中国和苏联在反对日本侵略上有共同利益。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命其向苏方询问，如《九国公约》会议失败，中国用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时期”^④。11月，伏罗希洛夫、斯大林在会见杨杰和张冲时都表示，在紧急关头，苏联将参战。^⑤但是，苏方的答复不过是一种表态。因此，当南京危急，蒋介石要苏联“仗义兴师”时，苏联却借词推脱了。12月5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致电蒋介石，声称“假使苏联不因日方挑衅而即刻对日出兵，恐将被认为是侵略行动，日本在国际舆论的地位将马上改善”。斯大林等开出的“参战”条件是：《九国公约》签字国全部或其中主要国家的允许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批准。电中，斯大林等表示，在上述条件未能满足时，苏联将用种种途径及方法，极力增加对中华民族及其国民政府的技术援助，同时，支持蒋介石在和陶德曼谈判中的立场。电称：“日本如撤回其侵华中及华北之军队，并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时，中国为和平利益计，不拒绝与日本实行和平谈判。”^⑥

① 《困勉记》，1937年12月2日。

② 《日本内阁会议议决的日本外务大臣致德国驻日大使复文》，《年表及文书》，下卷，第380页。

③ 《王宠惠致杨杰电》，《德国调停案》，《外交部案卷》。

④ 《蒋委员长致蒋廷黻转杨杰养电》，《对苏外交》，《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第46页。

⑤ 《苏中关系（1937-1945）》俄文版，第1册，第111号、121号文件，第138、156页。

⑥ 《对苏外交》，《蒋中正总统档案》。

这样，将“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作为中日谈判的前提，就不仅是蒋介石和中国政府的主张，而且也成了苏联政府的意见。

蒋介石在对日谈判中一贯坚持的先决条件

陶德曼“调停”因中国政府的婉拒而失败，但是，日本政府和军方都仍然“战和并用”，一面军事进攻，一面暗中谈判，蒋介石对日本事实上也采用同样的对策。在公开的声明和演讲中，蒋介石多次批判与日本的谈和、妥协活动，他对孔祥熙通过多种渠道和日方的联系也常持严厉的批评、阻遏态度，但是，在日本多次伸出“和平”触角时，蒋介石也曾“姑妄试之”，小心翼翼地亲自掌控过和日方的几次秘密谈判。在这些谈判中，蒋介石始终坚持非“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不可。它既是与日方的谈判条件，也是谈判的前提。

1938年9月，萧振瀛与和知鹰二在香港谈判。9月23日，蒋介石在汉口主持汇报会，决定“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与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允停战”。^①27日，萧振瀛在谈判中强调：“现在日军进攻武汉，大战方酣，中国方面不能作城下之盟，故目前最要之着，为停止军事，恢复七七前之状态。”^②当时，和知鹰二以同意“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饵，要求与中国签订军事与经济协定。28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要求萧向日方坚决表明：“原状未复，诚信未孚，即未有以平等待我中国之事实证明以前，决不允商谈任何协定。”^③10月8日，蒋介石在对参加谈判的另一人员雷嗣尚“面训”时再次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参见《事略稿本》，未刊稿，〔台北〕“国史馆”藏。本稿正陆续刊行中。本文所引，凡注明册数者为已刊，反之为未刊。

② 《此次谈判经过》，1938年9月30日，“蒋档”。

③ 《9月28日复萧仙阁电》，“蒋档”。

指示：“谈判重点应集中于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①19日，何应钦又向萧转达蒋介石指示：“关于经济合作与军事布置等事，必须待恢复原状后，以能否先订互不侵犯协定为先决问题。又无论何项合作，必以不失我独立自主之立场而不受拘束为法则，请于此特别注意。”^②

萧与和知的香港谈判中，中国方面曾准备了一份宣言，中称：“中国所求者，惟为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民族自由平等之实现。日方诚能如其宣言所声明，对中国无领土野心，且愿尊重主权、行政之完整，恢复卢沟桥事变前之原状，并能在事实上表现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则中国亦愿与日本共谋东亚永久之和平。”^③在这段文字下面，蒋介石曾经以红笔加写了一段：

我政府对于和战之方针与其限度，早已屡次声明，即和战之标准全以能否恢复七七以前之原状为断。盖始终以和平为主，认定武力不能解决问题也。

中方草拟的《停战协定》规定：“停战协定成立之同时，两国政府即命令各该国陆、海、空军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日本并即撤兵，在本协定签字后三个月内（恢复）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之原状。”^④

关于“满洲国”问题，中方认为，此为“中日间之瘤”，此问题若不能成立谅解，预示未来解决之趋向，以后各项合作协定，均难签订成立，因此，萧振瀛等提出“相机应付”的三条原则：（一）日方自行考虑，以最妥方式及时机，自动取消“满洲国”，日本保留在东北四省一切新旧特权，但承认中国之宗主权。

①《面训要点》，“蒋档”。

②何应钦：《致萧振瀛皓午电》，“蒋档”。

③《中国宣言原文》，“蒋档”。

④《停战协定原文》，“蒋档”。

(二) 中国承认东四省之自治，而以日本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为交换条件（如租界、领事裁判权、驻兵、内河航行等等）。(三) 暂仍保留，待商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再谈。^①其中“待商订互不侵犯条约时”为蒋介石亲笔所加，可见，蒋介石主张先为其易，后为其难，将东北问题留待未来解决。

1939年1月9日，蒋介石研究“和平原则”，确定：“甲、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乙、以《九国公约》与国际联盟为保证有效。丙、非先恢复七七以前原状无恢复和平之可言。（以恢复七七战前原状为恢复和平之先决条件）”^②同年，在军统局人员杜石山与萱野长知、小川平吉等人的谈判中，蒋介石仍然坚持“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原则。当年3月4日，蒋介石致杜石山电云：“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之基础之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③17日，柳云龙、杜石山在与萱野长知的会谈中提出七项条件，其中第三条即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同年5月，小川平吉通过杜石山致函蒋介石，要求蒋“快刀斩乱麻”，迅速解决中日谈判问题。27日，蒋未拆阅即将原函退回，并且禁止杜石山等与小川往来。小川从辛亥革命时期即和中国革命关系密切，蒋的举动使小川极为生气，宣称将于6月2日回国，但蒋仍不加理会。6月2日，陈布雷致张季鸾函云：“如彼果延期回国，可知其前所称欲回国者，全为装腔。请注意。兄函中有休战二字，以后如有接谈时，应特改变，以我方于未恢复七七战前原状之先，决不允其休战也，亦请注意。”^④陈布雷当时是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代表蒋指导张季鸾的工作，此函当然代表蒋的主张。

① 《关于“满洲国”问题之考虑》，“蒋档”。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1月9日。

③ 小川平吉文书，抄件，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

④ 《陈布雷致张季鸾函》，“蒋档”。

在秘密谈判中，蒋介石虽然提出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先决条件，不过，蒋介石并未对此抱有过大期望。1938年9月，武汉会战正酣，蒋介石分析形势，于3日自述云：“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乃可使倭寇失败，中国独立，方有和平之道也。”^①5日又自述云：“敌将于武汉未陷以前，求得一停战协定而罢兵乎？此则无异城下之盟也，应严防。”^②

从谈判先决条件变化为“抗战到底”之“底”

对如何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有一个漫长的摇摆、矛盾、反复的过程。

1929年，日本曾向蒋介石提出，希望取得在中国东北的“商租权”，即为了商业和农业需要，日本人可以在东北购买土地。蒋介石觉得可以借此暂时缓和其侵略野心，拟予同意，但受到国民党其他大员反对，未成。1931年12月，蒋介石因丢失东北，在内外各方指责声中下野。次年1月，日本陆相荒木贞夫以支持蒋介石复出为诱饵，要求蒋赞同日本在东三省的“商租权”，并且假意表示中国可以驻兵。蒋介石即明确表示拒绝。日记云：

荒木甚畏共党，亟愿余主持国事，共同防共，而其商租权，是不欲明订驻军，以有限数，不致不能驻兵也等语诱余。倭奴卑劣，亦视余为可欺也，诚不知中国尚有人也。^③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9月3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9月5日。《事略稿本》引用本日日记时多出数语：“如无国际变化或英美向倭压迫，则中倭决无和议可言。即使敌国承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亦决无实现之可能。国家存亡，革命成败，皆在于我之能否坚忍不拔，勿为和议之说所摇撼耳。”

^③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7日。

同年5月16日，蒋勉励自己：“对俄外交，当不能放弃外蒙；对日外交，不能放弃东三省。”^①随后，他并制订对朝鲜和东北的工作计划，指派齐世英联络东北，滕杰、黄绍美联络朝鲜。^②6月，蒋决定迅速派定东北义勇军指导员，并致函张学良，嘱其出兵热河，一面与东三省各义勇军打成一片，一面威胁山海关日军。^③同月，他在牯岭听翁文灏谈，东北三省煤矿，几占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铁矿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自悔此前决策错误，日记称：“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梦，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④同年9月13日，他自记称：“预期十年以内恢复东三省。凡为中华人民血气之伦，当以此奋勉。”18日，蒋介石在汉口，听到日本人在租界鸣炮奏乐，庆祝占领东北，蒋介石受到极大刺激，在日记中表示，期望能于1942年以前，“在中正手中报复国仇，湔雪此无上之耻辱。”^⑤这些，都反映了蒋介石思想中确有捍卫东北主权的一面。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施压，中日两国形势一紧张，他又软弱、动摇。1933年4月3日，他回忆1929年的旧事时写道：

民国十八年，明知应与俄复交，而老朽阻碍。倭寇欲东三省之商租权，余欲以此而暂缓其侵略野心，老朽目短，无识如番人，强持反对。及至苏俄进攻吉林，张氏屈服，则倭寇野心益

① 《困勉记》，1932年5月16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32年5月29日、31日；参见《事略稿本》第14册，第517-520页。

③ 《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4日、6月15日；参见《事略稿本》第15册，第95页。

④ 《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17日。

⑤ 《蒋介石日记》，1932年9月13日、16日。

炽，致成今日内外交迫之局。及至胡朽事出，宋子文弄权，国益纷乱，是皆余自无主宰之所致也，何怨何尤，惟自承当耳。^①

从这页日记看，蒋在1931年1月拒绝荒木提出的在东三省的“商租权”后，至1933年4月，又有所动摇。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次动摇为时短暂。蒋介石写下上述日记之后的第22天，他就又“研究对倭战略”，认为“与倭决最后之胜负，惟在时间之持久耳”。^②

日本侵占东北，特别是扶植溥仪成立所谓“满洲国”后，曾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有关问题，但蒋介石大都拒绝不谈。其原因，在于蒋认为这种谈判只能使中国“丧权辱国”，不如不谈；即使谈判成功了，日本政府并没有控制、约束其军方的能力，谈了也等于白谈。^③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认为“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决心应战。他预估：再有两年时间，将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十年后，不只收复东北全境，而且可以收回台湾，扶持朝鲜独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④8月5日，胡适和陶希圣联名给蒋介石上条陈，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换得日本让步，从根本上调整两国关系。蒋介石即表示：日本没有信义，“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⑤次年2月2日，他在日记本中写道：如去年乘国内统一，对倭形势较优之时，急谋解决东北问题，或割让，或策封保留宗主权，而不出于承认形式，非特势所不能，即使解决一时，以彼倭少壮派军人之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3年4月3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3年4月25日。

③ 《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第193页。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25日。

⑤ 参见拙著《杨天石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5月，第467-468页。

侵略思想，与其政府之不能控制，不能守信，则一二年间仍必向关内侵占，绝非根本解决之道也。”^①此后，蒋介石在3月22日、23日的日记中都写过类似的话。一言之不足而反复言之，这就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持此说者非止一人。当时，蒋介石正筹备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在提前写作的演讲要旨中写道：“和战问题，降不如战，败不如亡。若我不降，则我无义务，而责任在敌，否则敌得全权，而我全责。民不成民，国不成国，则存不如亡也。”并说：“敌国政府，无权失信。若我放弃东北，徒长敌寇侵略之野心，永无和平之一日。”^②当年9月18日是东北沦陷的第七个年头，蒋介石自我反省云：“收复失土，痛雪国耻，全在一身，能不自强乎？”^③

不过，蒋介石虽然希望收复东北，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又不准备，甚至反对采用战争的手段。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说中，他说：“‘兵凶战危’，古人常说‘不得已而用之’。凡是真正懂得军事的人，一定不愿轻于作战，尤其自本党当政以来，一向以和平为职志，决不愿轻启战争，这是一定的道理。”话题转回现实之后，蒋介石表示：“我们这几年，一方面抱定保持我独立生存的决心，同时对于和平，始终为最大的努力，也不但是东北问题，就是其他中日之间的悬案，我也常常表示，只要经过正当、合法的外交方式，只要无害于中国国家的独立生存，我都可以负责解决。其理由就是保持和平为我们固有的理想，所以百事应着眼于民族久远的利害，而不在于计较一时的恩怨得失。”^④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标示国民党转变政策、确立抗战建国方针的会议，但是，即使在这时，蒋介石对解决东北问题的底牌也仍然是“经过正当、合法的外交方式”。

① 《民国二十七年杂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3月23日。

③ 《省克记》，1938年9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

④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第198-199页。

1939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发表演讲《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将这一解决东北问题的“底牌”表达得更明确：一方面，他坚决表示：“外蒙有自治之可能，而满洲完全是中国人，绝对不能独立。”接着，他解释“抗战到底”之“底”时说：

我们要解释“到底”两字的意义，先要检讨这回抗战起头是在什么地方，才可以得到结论。我们这次抗战是起于卢沟桥事变。凡是一种战争，要有目的，要有限度的。

如果随便瞎撞，会使国家民族自趋灭亡。我们这次抗战的目的，当然是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和日本开始谈判，假使能够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可以开始谈判，以外交的方法，解决东北问题……若在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没有恢复，即与日本谈判，便是我们最大的失败。……这是我抵抗的机会，也是我们不能不抵抗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无论如何只有和他拼命。……若恢复了平津，我们再不以外交政治的方法与日本谈判，也是自趋灭亡之道。^①

在这一段演讲中，“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仍然是与日本谈判的条件和前提。如前述，在特定条件下，这一主张有其正确的、策略性的一面，是一个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日本的方案。但是，蒋介石将收回东北的希望只寄托在“外交的方法”，说什么“若恢复了平津，我们再不以外交的方法与日本谈判，也是自趋灭亡之道”，这就有问题了。外交的方法，谈判的方法，可以是方法之一，但是，要让日本侵略者将已经进口的肥肉吐出来，在一般的状况下，“外交的办法”难于济事。因此，还必须准备另一手，即武力收复，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东北。然而，在蒋介石看

^①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速记录》，〔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来，这就是“自取灭亡之道”。显然，这是危言耸听。此事说明，自卢沟桥事变起，全面抗战爆发已经一年半，但蒋介石的对日恐惧症仍然很严重，对将抗日武装斗争进行到底，既缺乏信心，也缺乏决心，反映出蒋介石在对日斗争中特殊的软弱性。

蒋介石对“抗战到底”之“底”所作的新解释

如前述，将“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中日谈判的先决条件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抗战到底”之“底”则不妥。蒋介石不久改正了这一错误。

1939年7月7日，蒋介石发表《抗战建国二周年纪念告日本民众书》，指责日本侵略中国，抢夺中国东北领土，建立伪满洲国等行为：“把一大群人看成奴隶了，反要说是给了自由；把中国一部分领土占据了，反要说是建立了独立国。”^①同日，蒋介石发表《告世界友邦书》，指出“今日国际间一切无法律、无秩序之无政府状态，实由1931年之九一八，日本强占我东北四省始作之俑所造成”。文告表示：“在敌人未澈底放弃其侵略政策以前，我国抗战，无论遭受如何牺牲与痛苦，决不有所反顾或中止也。”^②这里“抗战到底”之“底”就被说成日本“彻底放弃其侵略政策”，较之“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前进了。

当年11月1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批判国民党内要求变更抗战建国方针，及早结束对日战争的错误思想。他说：“如果我们国家民族一天没有得到独立自由平等，抗战就一天不能停止，而我们的牺牲奋斗和努力，也就一刻不容松懈，更丝毫不容有徘徊观望、半途而废的心理，幻想苟且和平！否则抗战失败，国家灭亡，我们就作了中华民族千古的罪人！所以现在如有人以为敌人已无法进犯，他的侵略之技已穷，

^①《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第80页。

^②《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第102-103页。

我们可以乘此机会与他讲和，或者以为友邦都不可靠，不如自己早些设法和平，这就是陷入与汪精卫同样错误危险的心理。”蒋介石主张：“一面坚持抗战，一面抓紧建国，再要埋头苦干三五年，非获得彻底的胜利和成功，使敌人根本放弃其侵略政策，决不能停战言和。”

讲话中，蒋介石对抗战到底之“底”作了新的解释。他说：

所谓“抗战到底”究竟是怎么讲呢？我们抗战的目的，如何乃能达成？我们抗战的目的，率而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我在五中全会说明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法。若以整个国际范围来论断中日战争的归趋，就一定要坚持到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乃有真正的解决。

他强调：“如果那一个国家想单独调停或想藉此谋他一国的利益，不论出于何种方式，结果都必然失败。”^①这里，蒋介石所说中国“抗战到底”的“底”就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合起来，扩大了视野，提升了要求，因而纠正了前说的错误。

蒋介石的这一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蒋介石早就认为，中日战争是国际问题，它的解决也有赖于国际形势的变化。1938年5月26日日记云：“不能引起世界大战，恐不易使倭国失败也。”^②7月27日自记云：“中倭战事问题，实为国际问题，非有国际干涉，共同解决，则决不能了结。否则，直接讲和，则中国危矣。”^③当时，蒋介石已在研究，如欧洲战争爆发，

① 《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第474-479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5月26日。

③ 《困勉记》，1938年7月27日。《事略稿本》系于1938年7月28日条下。

则中国将与英、法、俄共同作战。日记云：“速谋与英、法、俄进行共同作战之计划，以期中倭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又云：“向英、法政府恳切商谈，使国际盟约中之制裁条款为有效条款，藉以号召多数国家共同制裁，且须同样运用于欧亚三洲之战争。”^①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同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这一形势使蕴藏于蒋介石心中的期待成为现实，因此，他才能在五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战争联系起来，并对中国抗战目标作了修正和提升。

“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度之成功”

欧战的爆发燃起了蒋介石的希望，使他敢于公开倡言，中国“抗战到底”之“底”与世界战争之“底”同步，但是，欧战最初并不顺利，法军和英军相继战败。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英军撤出欧洲大陆。同月，法国宣布封闭滇越铁路。7月，英日之间达成妥协，宣布封锁滇缅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道先后断绝。苏俄则因准备对德国作战，拒绝对中国的进一步援助。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继续对日本采取战与和的两手策略，同时相应地将抗战目标区分为“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度之成功”两种类型。

当年8月，日军积极谋划南侵，向东南亚进军，力图结束对华战事。在这一形势下，蒋介石曾准备利用时机，争取与日本实现于中国相对有利的谈判。同月，在蒋介石指导下，张群、张季鸾与陈布雷等起草过一份《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中云：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9月18日。

最大之成功为完全战胜，收回被占领掠夺之一切，不惟廓清关内，并收复东北失土；最小限之成功，则为收复七七事变以来被占领之土地，完全规复东北失地以外全国行政之完整，而东北问题，另案解决之。以上两义，前者战胜之表现，后者则为胜败不分，以媾和为利益时之绝对的要求。

关于“最小限度之成功”，《纲领》提出：“满洲伪国”的土地，“被日本侵占已久”，“在我国不能用兵力收回之过渡期间”，可以“扶助溥仪之伪政府，第一步使取得满洲内政上自治之政权，使该地汉、满、蒙人民先脱离被占领地人民之境遇，第二步，与溥仪直接协商，先求得一过渡的解决之办法”，最后与蒙古等地一样，作为“联邦之一，完全复归于中国”。

《纲领》又将东北问题的解决分为甲案与乙案：

东北问题：1.甲案，现在不提，战后另作交涉。2.乙案。现时先取得一种谅解，约期交涉。关于此点，我方又分两案：（1）要求日本承认我国在东北之主权，而中国承认东北之自治。我中央派驻满指导长官一人，常驻长春，代表中央，但不干预其通常施政。（2）要求日本先行改革满洲制度，使溥仪之政府确有施政用人之自由，废除日籍官吏制度，还政东北人民。此项改革完成之后，我中央得与溥仪之政府直接协商以求东北悬案之解决。

在此项协商开始以前，中日可订临时办法，以便利关内外人民之交通与经商。我方尤当注意要求日本善遇我东北同胞，废弃九一八以来仇视、贱视我人民之政策。

蒋介石等估计，和日本谈判时，日本可能提出承认“满洲国”时，《纲领》强调：“我国应声明不能承认。”“东北问题，须待和平完全恢复后另案交涉，现在不能提议（但热河不在东北范围之内）。”

《纲领》规定：“我国为被侵略国家，故和议之发起，必须出自敌方……应深切考查，其条件是否无背于我建国原则，而足以达到我最小限之成功，必须在确认为我作战目的已得最小限之贯彻之时，始允其开始和平之交涉。”张季鸾等还在起草的初稿中提出召开停战会议的原则：1.（日本）凡作战而来之军队，完全撤退；2.凡所占领长城以内及察绥之土地完全交还；3.不平等条约定期取消。”^①上述原则表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仍然是中日谈判的一项前提条件。

该方案先后有几种稿子，名称和内容都不尽相同。《中日恢复和平基本办法》规定：“日本政府保证永不将东北各省划入日本领土，或采取其他行动使各该省在名义上或事实上成为日本之保护国。”《中日恢复和平协定要点》规定：“东北问题即满洲问题之悬案，于恢复和平后一年以内特开会议，另案解决。”《对敌策略的几个疑点》规定：“我国既不能收回（东北），又不容放弃，故利在延搁不决。”又称：“实质的收回，在将来为可能，此当在我国防完成，而敌人有求于我之时，或敌人在国际战败之时，因此，我又决不可自弃东北，以失去将来实质收回之根据。”上述资料表明，蒋的抗战方案有“最大之成功”和“最小限度之成功”、“军事”和“外交”两种。当他着眼于“最小限度”时，也没有放弃争取“最大成功”的希望。

9月18日，蒋介石发表《“九一八”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明确宣告，将收回东北列为“抗战到底”之“底”。文称：“我们到今天，还不能解放我们东北的同胞，收复我们的失土和

^① 有下划线的文字为蒋介石所加。

主权，这就是没有达到我们抗战的目的，无以安慰已死的英灵。”他明确宣布：“我们九年来忍苦奋斗，三年来奋勇抗战的目的，就为要恢复我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要解救我们三千余万的东北同胞。”又称：“我们四万万同胞和东北三千余万的同胞是一脉相承的黄帝子孙，是手足同气、呼吸相通的兄弟。为了拯救国家，我们大家都负有相同的责任；为要解救我们水深火热中三千余万的东北同胞，我们在关内四万万同胞更觉得牺牲奋斗是自己的责任。”“我们今天多抗战一天，就是恢复我们国家独立自由和达到我们雪耻复仇目的日子更接近一天，也就是收回东北和解救东北同胞的日子更接近一天。”^①9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东北被侵已足九年，但愿为收回东北开始之日也。”^②次日，蒋介石检阅旧日记中预期收回东北、台湾等地的文字时写道：“以天意与最近时局之发展及上帝护佑中华，不负苦心人之意与力测之，自有可能。”^③

反对苏、美两国的妥协、错误主张，力保东北主权

欧战爆发，英、法作战不利，原为西方殖民地的东南亚成为“真空地带”。日本眼红该地的富饶资源，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力谋冒险南进。这种情况，使英、美更多地关心中国战场。1941年3月，美国罗斯福总统发表广播演说，声明一定要“援华到最后胜利为止”。在此情况下，蒋介石的抗战信心日渐增强。日记云：“此后只要我能自强奋勉，则十年困难，四年苦斗，……不惟恢复失土已得有把握，而太平洋之和平，亦从此奠定，要在我之自力更生耳。”^④但是，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一个月之后，就

①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1，第220-228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9月29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9月30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1年3月31日。

发生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事件。

当时，德军进攻苏联在即，苏联为全力对德，避免两面作战，力图稳住在东方的日本。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在莫斯科缔结《中立条约》。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性，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14日，蒋介石自我检讨云：“竟未想到其互认满蒙之领土，此乃余对事理未能究其至极之过也。”^①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言赘。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所为妨害中国领土行政权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②24日，蒋介石密电各战区将领及各省党部、省政府称：“只要我能独立自强，战胜暴敌，则收回失土，恢复主权，势所必至，理亦当然。区区苏、日一纸不法之声明，岂能永为我领土与主权完整之障碍！”^③同年9月1日，重庆国民政府在被日机炸毁的礼堂废墟上举行“纪念周”，蒋介石自励云：“此乃余前年所谓即在瓦砾中，亦在重庆国府原址作纪念周之决心也。安知吾于廿一年立志，欲于卅一年收复东北之志不能贯彻乎？”^④

这以后接踵而来的消息有如噩梦连连。9月12日，蒋介石得到情报，美日达成妥协，美国已同意日本占领中国的华北与满洲。蒋介石日记云：“今日问题，权操在我，非美国默认所能解决。今日中国政府绝非甲午战争时之政府可比，在此不惟美国之自杀政策，乃为美国之不利，而于我抗战政策根本不变之下，顾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1年4月14日。《省克记》引本日日记时尚有二语：“此过不改，必致误国。”

② 《新华日报》，1941年4月15日。

③ 蒋介石：《苏日中立条约之检讨》，机密。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2081，〔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1年9月1日。

无损也。”^①18日，蒋借东北沦陷十周年之机，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文称：“我们非完全驱逐寇军于我们的国境以外，彻底消灭他侵略的野心，我们的抗战，是决不能停止的。我们若非使东北同胞获得真正的自由，东北的失地完全恢复，在我们神圣的抗战，亦决不会停止的。”“我们东北同胞与全国同胞的生命是整个的，东北四省的土地与全国的土地，也是完全整个不容有寸土分割的。我们整个民族和整个领土，是存则俱存，亡则俱亡，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这是我们天经地义的道理。”^②蒋介石的这篇文章，明为“告全国军民”，实为对国际的宣告。同年12月6日，蒋介石与拉铁摩尔顾问谈话，嘱其转告罗斯福总统：“中国决不能放弃东北，否则新疆、西藏皆将不保，外蒙亦难收复。”^③此后，拉铁摩尔即成为蒋介石这一主张在美国的积极宣传者。^④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中国由单独抗战进入与同盟国联合作战阶段，国际形势对中国越来越有利，蒋介石保护东北主权的意识也就越来越强烈。

还在太平洋战争初起时，蒋介石就积极研究同盟条约，确定对英、对俄、对各国要求：“东四省、旅顺、大连、南满，要求各国承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⑤1942年3月，蒋介石设想，在日本“北进”，进攻苏联之时，中国军队乘机与日本决战，“收回失地，恢复旧有领土与民族固有地位，以为解放亚洲各民族之张本。”^⑥15日，他甚至乐观地设想，将于1961年之前完成自蒙

①《困勉记》，1941年9月12日。此后，蒋介石也曾反对英国的类似态度。其1942年12月21日日记云：“（英国）不仅明示日本在东三省保有其经济权，而且以邻国二字使俄国对我东三省有同等权利。呜呼！其用心之险恶可谓极矣！”

②《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1，第268页。

③《民国三十年杂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1年。

④《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第680页。

⑤《困勉记》，1941年12月18日。

⑥《困勉记》，1942年3月14日。

古库仑至东北满洲里之间的北疆铁路。同年8月3日，蒋介石与罗斯福总统代表居里谈话，得知美国方面有人主张东北由国际共管，作为日本与苏联之间的“缓冲国”。这对蒋介石说来，宛如“青天霹雳”，感到“国际诚无公道与是非可言，实足寒心”，^①但他立即声明：“中国东北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绝无讨论之余地。此实为中国抗战之基本意义。盖我抗战若非为收复东北失地，早可结束矣。”蒋要求居里尽一切可能纠正美国人的上述包含极大危险的错误观念，让他们明白，中国民众之所以甘于忍受重大牺牲与各种困苦，支持抗战，其原因就在于要收复东北。他并进一步向居里透露中日谈判中的许多机密：日本曾表示，只要中国允许日本保留东北，可以接受中方的一切条件；又曾提出，中日共管东北亦可商量。蒋称：这些，都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拒绝。为了让居里记忆明晰，蒋用三句话概括说：1. 我等已作一切牺牲抵抗日本侵略，唯一目的在收复东北。2. 我等之所以尚须继续抗战，因尚未收复东北。3. 东北四省就历史、法律、人种、事实各方面言，五百年来皆为中国不可分之一部。蒋要求居里转请罗斯福发表声明，重申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蒋强硬表示：“倘此问题不解决，则平等、自由以及其他一切悦耳之名词，皆无意义可言。”^②次日，蒋再次与居里谈话，态度更为强硬，他说：“倘和平会议席间，不能返我东北失地，仍为我不可分割领土之一部分，我人仍将继续抗战，即招致国家之毁灭，亦在所不惜。凡不承认东北为我领土之一部分者，皆为我仇。”^③5日，蒋介石再与居里谈话，仍然表示“整个东北为中国之一部，望罗总统早日声明”。^④在蒋介石的一再坚持下，美国政府于9月18日发表声明，承认东三省为中国领土，蒋介石感到欣慰，日记云：“此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8月3日。

② 《战时外交》（一），第680-682页。

③ 《战时外交》（一），第701页。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8月5日。

乃由余对居里所提问题之一也。”^①

同年9月，罗斯福派威尔基作为总统特使访华。30日，蒋介石研究与威尔基谈话要点，其第二条即为：“东北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必须完全归还中国。”^②11月9日，因宋美龄赴美在即，蒋介石研究须与美国商讨事项，有长期同盟；东三省与旅大完全归还中国；台湾归还中国；外蒙归还中国，予以自治等。^③这以后，蒋介石日记中频繁地出现关于东北问题的记载。1943年3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伪满傀儡组织，至今恰九年矣。”^④5月4日日日记云：“溥仪昨日到安东州，汪奸本日六十一岁生日，皆为国家之羞耻也。”^⑤25日，蒋介石研究美国访苏代表戴维斯谈话，日记云：“其提及旅顺为自由港一点，是越出余之主张矣。”^⑥

在开罗会议上与英国争论，要求明确声明， 将东北、台湾等地归还中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1942年11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区组织反攻，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11月22日至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及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等问题。

为准备参加开罗会议，蒋介石于1943年7月起草拟各项文件。当月9日，蒋介石研究与罗斯福会谈后的共同宣言要旨，提出“必须获得无条件之胜利”，这就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目标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⑦8月9日，蒋研究与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9月18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9月30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1月9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1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5月4日。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5月25日。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7月9日。

罗斯福谈话要点，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东北问题”。15日，蒋介石研究战后中国国防建设，自记云：“东北收回后则维持其原有之工业与国防，以其余力充实我本部之建设。”^①24日，研究对美策略，认为“战后在台湾与旅顺之海、空军根据地应准与美国共同使用”。^②11月9日，蒋介石研究与罗斯福、邱吉尔谈话要点，问题之一为“东北”。14日，研究与罗斯福商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处理方案，确定“日本在九一八以来所侵占中国地区所有之公私产业应完全由中国政府接受”。18日，确定会谈应注意之重大问题，其内容之一为“东北与台湾应归还我国”。^③22日，再次研究会谈要旨，“东北与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仍为重点之一。

在蒋介石指导下，军事委员会为开罗会议所准备的文件提出：日本应自其在九一八起所占领之中国及其他联合国之地区撤退；将旅顺、大连两地一切公有财产及建设，以及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无偿交还中国；将台湾与澎湖列岛交还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赔偿中国自九一八起一切公私损失。国防委员会所准备的文件提出：“收复1894年以来日本所取得及侵占之领土。”11月23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在预拟的政府方面提案中提出：日本自九一八事变后自侵占之中国领土，包括旅大租界地及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

开罗会议开幕后，蒋介石在与罗斯福总统讨论中提出：“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应皆归还中国。”^④讨论确定的原则为：日本攫取中国之土地应归还中国，应使朝鲜获得自由与独立，战后日本在华公私产业完全由中国政府接受等。11月24日，开罗

① 《困勉记》，1943年8月15日。

② 《困勉记》，1943年8月24日，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8月15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18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23日。

会议公报草案提出，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等，当然应归还中国。讨论中，英国代表贾次干企图将中国主权模糊化，提出将草案改为：“日本由中国攫去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王宠惠认为，英国的这一修改，“不但中国不赞成，世界各国亦将发生怀疑”。他说：“世界人士均知此次大战，由于日本侵略我东北而起，而吾人作战之目的，亦即在贯彻反侵略主义。苟其如此含糊，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故中国方面对此段修改文字，碍难接受。”他表示：“如不明言归还中国，则吾联合国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美国代表支持王宠惠的意见，英国草案被否决。26日，草案送请正在讨论的罗斯福、邱吉尔和蒋介石审阅，得到一致赞成。会议定稿的公报宣称：“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公报称：“我三大盟国将坚韧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

这样，中国对日作战的目标就进一步提升，远远超出“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了。

1938年4月1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曾传达孙中山的遗志：“恢复高台，巩固中华。”蒋解释说：“中国要讲求真正的国防，断不能让高丽和台湾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中国几千年来是领袖东亚的国家，保障东亚民族、树立东亚和平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为要达成我们国民革命的使命，遏止野心国家扰乱东亚的企图，必须针对着日本积极侵略的阴谋，以解放高丽、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①现在，这些理想都已纳入开罗会议宣言，实现在即，蒋介石很兴奋，于1944

^①《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第187页。

年元旦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内称：“在这次开罗会议中，英、美两国和我们中国一致同意，要剥夺日本第一次大战后所夺得或占领的太平洋上一切岛屿，要将日寇逐出于其以武力贪欲所攫取的土地，要归还东北四省和台湾、澎湖等岛屿与我们中华民国，要使朝鲜自由独立。……这不但使热望归还祖国怀抱的台湾、澎湖同胞闻而兴奋，使我们沦亡十二年以上的东北同胞鼓舞奋发，使不堪日寇奴辱的朝鲜国民闻风兴起，而且也是亚洲所有被日寇欺凌压迫的海上、陆上一切民族，都感到解放之有期，共同为消灭敌人而奋斗。这样一个重大而有力的共同决议，可以说在十年以前我们只是一个志愿，而到了今天已成为事实了。”^①

国民政府为完全收回东北主权所作的斗争、让步与代价

《开罗宣言》虽然明确宣布，将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但是要将纸上的宣言转化为现实并不是容易的事。其关键的关键是要击溃日本的强大军事力量。

依靠国民党的军队吗？1944年3月至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虽然在缅北等地的战斗中取得胜利，挫败日军精锐师团，但是，却在豫湘桂战役中溃败。自1944年4月日军渡过黄河，进攻河南始，至当年12月，占领贵州独山止，8个月之内，日军长驱两千余公里，占领中国二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一切，使罗斯福感到，国民党的军队当时还不具备击溃日军的力量。倚靠美国人吗？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军队和日军实行逐岛争夺与越岛作战，已经付出了惨重的牺牲，罗斯福不愿付出更大的牺牲。为了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罗斯福企图利用苏联红军的力量。1945年2月，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在雅尔达秘密决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和欧洲战事结束时，协助中国对日宣战。但是斯大林提出，必须满足苏方下列要求：1. 外蒙古

^①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2，第50-51页。

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加以保存；2. 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此权利因 1904 年日本之诡谲攻击而受破坏者：（1）南库页岛及其毗连各岛应归还苏联。（2）大连商港应辟为国际港，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旅顺仍复为苏联所租用之海军基地。（3）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双方共组之公司联合经营，苏联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中国对满洲应保持全部主权。3. 千岛群岛应割于苏联。以上各条，除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的有关规定外，均严重损害当时中国的主权。蒋介石对斯大林所提条件强烈不满，4 月 5 日日记云：

关于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国强权占领，而决不能以租借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被其武力占领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盖弱国革命之过程中，既无实力，又无外援，不得不以信义与法纪为基础，而不能稍予以法律之根据。如此则我民族之大，凭借之厚，今日虽不能由余手而收复，深信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要在吾人此时坚定革命信心，勿为外物胁诱，签订丧辱卖身契约，以贻害于民族，而得保留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光荣也。^①

对于与斯大林达成交易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蒋介石也指斥其“卖华”、“侮华”，“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实为其一生政治难涤之污点”。^②他担心罗逝世后，“美国对华政策恐将比现在更坏”，于 5 月 23 日致电时在美国的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转告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要求其向斯大林说明：“美国必坚持其对远东一贯政策，使中国之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不受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 年 4 月 5 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 年 3 月 15 日、4 月 13 日、30 日；参见《困勉记》相关记载。

损害，凡在华领土之内，不能有任何特权之设置也。”^①6月3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说明“本人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希望苏联能帮助中国的独立、行政与领土之完整，希望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与行政独立”。他一方面表示，如苏联帮助中国恢复东三省领土，中国将在东三省的铁路、商港等方面，给予苏联便利，苏方如有军港需要，亦可与苏方共同使用。但是，蒋又以委婉语气表示：“我全国人民咸认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及租界等事为国家的耻辱，一致痛恨，吾人为革命党人，自应注意人民之心理与要求，而期其要求之实现。”^②这实际上又在提醒苏联，不要将新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方。6月6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旅顺至少限度必须中俄共同使用，“若俄提归其独占，则我必须反对到底，决不许可也。”^③11日，蒋介石两电宋子文，表示可以同意与苏联共同使用旅顺，但“租界”地名称“为我国之历史耻辱”，“今后不能再有此污点之发现”，“此点非坚持不可”，“否则所谓东北领土主权与行政仍不完整，仍非独立也”。^④12日，彼得洛夫向蒋介石提出缔结中苏友谊互助条约的五项先决条件，其第一条即是“恢复旅顺港之租借”，他表示，苏联是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需要有不冻港。蒋介石坚决反对，他从历史角度说明，此例不可开，苏联不应使中国成为“不平等的国家”^⑤。

6月30日，蒋介石派宋子文访苏，会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旅顺可不用“租借方式”，但坚持中国必须承认“外蒙独立”。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企图将这一问题“搁置”。但是，斯大林的态度极为强硬，毫不让步。7月6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

①《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第547页。

②《战时外交》（三），第549-550页。

③《战时外交》（三），第554页。

④《战时外交》（三），第558页。

⑤《战时外交》（三），第561页。

“若苏联能协助我对日抗战胜利，对内切实统一，则为苏联与外蒙以及我国之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我政府或可忍此牺牲。”^① 7月7日，蒋介石两次指示宋子文，在苏联保证中国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的条件下，可以同意苏联要求。7月10日，蒋介石接到宋子文转来的苏联方面所提大连、旅顺、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等多项条件，认为比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与沙俄所订条约还要“苛刻”，日记云：“明知其为讨价，而寸衷刺激不堪，所受侮辱亦云极矣。”^② 7月19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时再次强调：“外蒙独立，则于我国牺牲极大”，苏联必须同时“协助我东三省领土、主权与行政权的完整，及解决国内共产党的问题，和新疆变乱的解决。必须这三点做到，我才可排除一切，解决外蒙问题”。^③ 他坚持：“两条铁路和两个海港的中国主权，一定要完整的。”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数十万苏军攻入中国东北。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改名为中国长春铁路，主权属于中国，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大连辟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于中国；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民事、行政权属于中国旅顺政府。在《条约》所附照会中，苏联政府承认“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④ 同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

蒋介石并非不懂得，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首先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1938年8月15日，他就表示过：“战事只有自力为

① 《战时外交》（三），第594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10日。

③ 《战时外交》（三），第637页。

④ 《战时外交》（三），第656页。

可恃耳。”^①但是，蒋介石在事实上无法做到，他还是只能将希望建立在外力上。当蒋介石决定接受斯大林的条件时，中国虽已跻身“四强”，但是，名强而实不强，外强而内不强。国民政府自身无力全部歼灭日寇，收回东北，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不得不仰仗外力，而其结果是付出了巨大代价。

综观抗战八年的历史，蒋介石兑现了自己“抗战到底”的诺言，他为此确定的“底”也逐渐变化，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发展为收复包括东北、台湾在内的所有失地，解放朝鲜等东亚被侵略民族，再发展为与盟国共同作战，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无条件之胜利”。这种情况，当然有蒋的个人作用在内。对于这种作用，人们应该承认而不应该抹煞，但是，我们又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中国抗战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形势日益明朗的结果。

原载《中国文化》第22期，三联书店2006年5月出版，略有修订。

^①《事略稿本》，1938年8月15日。

蒋介石与史迪威事件

——战时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

史迪威事件是抗战期间中美关系上的大事，自梁敬鐔的《史迪威事件》一书出版以来，研究已多，但是，由于此前的研究者都未能利用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档案，甚至，也未能充分利用史迪威本人的日记，因此，就给我们留下了仍可开辟、耕耘的广大空间，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一事件的全貌、实质、由之激起的中美关系的巨大波澜以及蒋宋关系的曲折变化。

史迪威被派到缅甸战场，急于进攻，蒋介石则主张防守。

蒋在日记中批评史“无作战经验”，

史在日记中称蒋为“固执的家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即谋求与美、英、苏等国结盟，组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1941年年末，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建立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部，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当时，中国抗战正处于艰难时期，蒋介石对盟军的合作自然期望甚殷，但是，美国此后并无重要动作，引起蒋介石严重不满。1942年1月30日，蒋介石日记说：“美英对于整个战局与太平洋战局，仍无具体整个之组织。”“彼轻蔑我国，可谓异甚，应严加

责问。”^①3月，史迪威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美国总统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及美国援华物资监理人。最初，蒋介石持欢迎态度，其后，二人间逐渐发生矛盾，并且不断发展、强化。

日军于1942年初攻入缅甸，英军不堪一击，一再溃败。2月26日，蒋介石命令中国第五、第六两军紧急开进缅甸，协助英军固守缅南海口城市仰光，确保当时中国仅存的滇缅路这一国际通道。3月4日，蒋介石面谕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要他在史迪威到任之后“绝对服从”其指挥。杜问：如果史的命令不符合你的决策时怎么办？蒋称：可打电报请示。但蒋回重庆后，又以手书告诉杜聿明，强调绝对服从史迪威的重要性。^②6日，蒋介石在重庆与史迪威第一次见面，就向他表示，准备将缅甸战场的指挥权交给他。^③同月8日，英军放弃仰光，中国人缅部队失去目标。蒋担心日军乘中国军队入缅之际，自越南进攻中国云南，有调回入缅军，加强云南及长江流域各省防务的念头。日记云：“英军之怯弱，殊为可耻。以后我军入缅部队之战略，应特加审慎，重新研讨也。此时必须自固根基为第一，不可以外物〔鹜〕国际不可靠之事物而自误也。”^④3月10日，在史迪威赴缅指挥前夕，蒋介石又与史谈话，声称“我军此次入缅作战能胜不能败”，“苟遭失败，不但在缅甸无反攻之望，即在中国全线再发动反攻，滇省与长江流域后备不坚，亦将势不可能”。^⑤他主张保卫

^①《困勉记》卷70，1942年1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

^②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4卷，文史资料出版社，1996，第871页。

^③黄加林等译：《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第50页。

^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3月9日。

^⑤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第238页，以下简称《作战经过》（三）。史迪威当日日记称：“蒋大谈中国人的气质和他们所受到的局限，他们不能去进攻的理由……在缅甸失败对于士气将是灾难性的一击。第五军和第六军（是）‘军队中的精华’必须慎重。”见《史迪威日记》，第54页。

当时距离中国后方据点较近的缅甸的首都曼德勒（瓦城），待日军深入，予以痛击后再行反攻。

仰光是美国援华物资的转运站。史迪威视之为“生命线”，认为“一旦失去仰光，供应线将被切断”，因此，他在入缅后不久，即雄心勃勃地迅速拟订计划，准备推动中国远征军尽量南下，收复仰光。3月18日，史迪威飞返重庆，向蒋提出此项建议，但蒋介石认为，仰光濒海，日军具备海陆空三方面的优势，中国军队如无空军和炮兵掩护，很难克复该地。史蒋二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蒋每提一个论点，史迪威即加以反驳。^①当日，蒋在日记中批评史迪威“无作战经验，徒尚情感”，“不顾基本与原则”。^②3月19日 蒋介石再次与史迪威谈话，分析缅甸战场形势，提出“目前应取守势，切勿轻进以求侥幸”。^③蒋称：“如果再过一个月，防线平安无事，他将考虑进攻的问题。谈话中，蒋要求史迪威保证不要让第五、第六军吃败仗，但史则表示无法办到，要蒋“另外找一个能保证这一点的人来，因为我无法保证做到这一点”。^④这次谈话，史迪威大为不满，当日即在日记中指责蒋为“固执的家伙”。^⑤在此期间，美方发表消息，声称中国第五、第六两军归史迪威指挥，入缅作战，蒋介石认为此属泄密行为，日记云：“美国又发表我入缅军之番号，无异详报于敌军，其可虑可危，未有如此事之甚者。故寝为之不安。”^⑥

① 《史迪威日记》，1942年3月18日，第60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3月18日

③ 《作战经过》（三），第257页。

④ 《史迪威日记》，第61页。

⑤ 原文为 Stubborn bugger，瞿同祖译作“顽固的畜牲”，见《史迪威资料》，中华书局，1978，第19页；黄加林等《史迪威日记》译作“顽固的家伙”，第61页，此从黄译。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3月20日。

中国远征军初战失利，史迪威下令退入印度， 弹尽粮绝，损失惨重，蒋介石愤恨交加

为了保卫曼德勒，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二百师戴安澜部在缅甸南部的同古（东吁）设防。自3月18日起，与日军血战12天，歼敌5000余人。其间，史迪威坚主进攻，杜聿明则认为兵力不足，反对进攻，二人发生争执，以致闹翻。史迪威要求杜“服从命令”，并派人监督杜执行，但杜认为此举关系远征军存亡，中国军队既未能适时集中兵力与敌决战，即应在予敌一定打击之后及时转移，以保存战力。^①29日晚，戴部奉令突围，安全转移。蒋介石与杜聿明的想法一致，日记云：“我第二百师已放弃同古，自动转进至叶莲西之东南地区，与新二师取得联系，心窃自慰。敌军遭此重大打击，而我军并无多大损失，自动撤退，更足寒敌军之胆，彼倭必不敢向缅北轻进。”日记批评史迪威：“以为应在同古全力决战，此不知敌军心理与战地实情之谈也。故此次放弃同古，乃达成余一贯之意图也。”^②

史迪威也对杜聿明的抗命不满，在日记中斥责杜聿明和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为“卑怯的杂种”和“十足的懦夫”。^③3月31日，史迪威愤而返渝，向蒋介石提出：对指挥中国第五、第六军，“深感所得权限未足，未能令出必行，致有三次可以发动反攻之机会，皆蹉跎坐失。”^④他要求蒋介石免去其本人职务。对史迪威的态度，蒋介石自然感到不快，日记云：史迪威“以我军师长不听其进攻同古敌军之命令，呕〔愆〕气回渝辞职，殊出意外。我出国作战，对敌对友，对当地民心，皆多困难。客卿指

①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第875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3月31日。

③ 《史迪威日记》，1942年3月30日，第71页。

④ 《作战经过》（三），第271页。

挥我军，又不熟悉各方内情，皆须面面顾到，较之国内作战之单纯者，其难易相去有天壤之别，殊为可虑。而史氏受英方宣传与运动，更可顾虑。于缅战英军无力，而必欲掌握指挥权，图保其虚名，殊为可羞。明知我虽牺牲而无益，而为全局与美国关系计，又不能不撑持到底，惟有照预定方针进行以待时局之推移而已。”^①同样，史迪威也感到不快，日记称：“由于愚蠢、恐惧和态度消极，我们失去了一个在东吁打退敌人的绝好机会，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的插手。”“他身处距前线 1600 英里的地方，写下一道接一道的指令，要我们去做这做那，其根据是零散不全的情报和一种荒谬的战术概念。他自认为懂得心理，事实上，他自认懂得一切，他反复无常，随着行动中的每一个微小变化而不断改变主意。”“其结果是使我本来就很小的权威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没有军队，没有警卫，没有枪毙任何人的权力。”^②

4月1日的谈话，史迪威有意向蒋“摊牌”，自称“发作了一番，言辞激烈”，“投下的那些炸弹发出了巨大的轰响”。^③但是，蒋介石仍然极力忍耐。4月2日，蒋介石与史迪威谈话，告以杜聿明“少年气盛”、“过分固执”，决定以年事较高、经验丰富的罗卓英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在史迪威指挥下统率中国人缅部队作战。蒋并决定亲自陪同史迪威回缅。^④蒋介石《反省录》云：“一、对缅战事，思虑异甚。既忧部下在国外过于牺牲，补充为难。又忧失败时丧失国威与军誉。二、史迪威乃动气请辞，此乃于中美邦交有关。故决定约之同回缅甸，予以全权，表示对彼诚意，使之勿加怀疑也。”^⑤

4月5日，蒋介石与史迪威、罗卓英同机飞赴缅甸北部城市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4月1日。

② 《史迪威日记》，1942年4月1日，第72-73页。

③ 《史迪威日记》，1942年4月1日，第73页。

④ 《作战经过》（三），第274页。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4月4日。

腊戍。6日，到美苗（卑谬），与史迪威及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商谈。7日，蒋与史讨论后，又与罗卓英、杜聿明、戴安澜各将领谈话，宣称史迪威是“老板”，“有提升、撤职、惩罚中国远征军中任何一名军官的权力”，“他们应无条件服从命令”。^①蒋的这些做法，可以说给足了史迪威面子，但是，蒋很快又因事对史不满。8日，蒋介石向孙立人师长授以曼德勒五万分之一地图，面示防守要略，并令与史迪威、罗卓英同往实地设防。蒋在视察新筑机场工程时，发觉进度缓慢，日记云：“史氏称美苗机场十三天可以完工，是彼受英方之欺负，而又欺骗我者也。可痛极矣。”^②

当时，英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战场，在亚洲，其战略是“弃缅保印，保存实力”。在缅英军或听任中国远征军独立作战，或利用中国部队掩护自己撤退。4月24日，蒋介石指示：“国军今后在缅甸之作战指导，应以不离开缅境，而又不与敌主力决战为原则。依此原则，以机动作战，极力阻止并迟滞敌之发展。”^③同时，指示远征军守卫腊戍、密支那、八莫等邻近中缅边境的城市。但是，史迪威和罗卓英都还醉心于组织曼德勒会战。5月1日，曼德勒失陷。5日，日军攻占八莫，威胁中国远征军的归国通道。6日，英军决定放弃缅甸，史迪威下令中国远征军向印度撤退，史本人拒绝美方派来接他的飞机，亲率少数人员徒步西行。蒋介石对史迪威未经请示就下令向印度撤退大为不满，日记云：史迪威“擅自令我华军赴印度而彼且离开队伍，先自赴印，并无一电请示。此种军人，殊非预想所及。然此乃余考察无能与人太过之罪，而于人何咎！”^④18日，蒋介石要美国驻华军事代

① 《史迪威日记》，1942年4月7日，第77页；参见《作战经过》（三）第290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4月8日。

③ 《作战经过》（三），第299页；参见罗卓英《报告》，1942年6月25日。《宋子文文件》，第64盒，〔美国〕胡佛研究院藏。

④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5月9日。

表团团团长马格鲁德转告史迪威，“中国军队无退入印度之意”。^①在撤退过程中，远征军一度粮尽药绝，饥病交迫，牺牲惨重，直至7月25日，杜聿明所部直属队等才到达印度。入缅时，远征军兵员约10万人，至此，仅余4万人左右。^②

6月4日，史迪威自印度德里回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严厉批评中国远征军的高级将领：“殊令人失望”，“或缺能力，或缺胆略”，声称“彼等居处离前线太远，且无意亲上前线”。“因循迁延为各高级将领之通病”。他甚至点名批评杜聿明“个性刚愎，不易应付”。他自称这次汇报为“开门见山，指名道姓”，“那情形就如同在踢一位老妇人的肚子一样”。^③蒋对这些批评大不以为然，认为史对此次撤退负有重大责任，但却“不知自反，而专事毁人利己”。^④6月5日日记云：“我军在缅如此重大牺牲，其责任全在史氏之指挥无方，而彼乃毫不自承过失，反诋毁我高级将领至此。当失败之初，彼乃手足无措，只顾向印度逃命，而置我军于不顾，以致我第五军至今尚未脱险。呜呼！史迪威诚不知耻者也。”^⑤由此，蒋介石更进一步指责美国军事代表团，“大部皆自私自大之流”。^⑥6月16日，蒋研究对史迪威的处理办法，产生“军法审判”的念头。日记云：史迪威“推诿责任，掩埋罪过，故不得不毁坏他人名誉，诬蔑我国将领。此应提议开军法审判，使美国政府能知史之不法与无礼也”！^⑦至此，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印象可谓恶劣至极，而史迪威对蒋的印象也同样很糟糕，日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第146页，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三）。

②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第882页。

③ 《史迪威日记》，1942年6月4日、7日，第103、104页。

④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6月6日。

⑤ 《困勉记》卷72，1942年6月5日。

⑥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6月6日。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6月16日。

记称：“中国政府是一个建立在威恩兼施基础上的机构，掌握在一个无知、专横、顽固的人手中。”^①

蒋介石指示宋子文等向美国提出史迪威问题， 要求实行军事审判，查明功过

为了援助被侵略国家，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和其他目的法案》（租借法案），授权美国总统以出售、转让、交换或租借等方法向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提供国防物资。先后受援的国家有英国、苏联、中国、自由法国等。但是，其间的条件并不平等，给英国、苏联的援助物资可直接拨交，而对中国的援助物资，则必须通过监理人史迪威分配。此外，在华盛顿成立的联合参谋长会议（参谋团），也将中国拒之门外。

蒋介石企图改变上述情况。1942年4月19日，蒋致电时在美国争取援助的宋子文，要求宋与罗斯福总统作“肺腑深谈”。电称：“在联合参谋会议及军用品供应之主要事项中，中国并非受有英、苏之同等待遇，不过类似一受保护人而已。”“将来英美联合参谋会议，如不扩大包括中国，或将中国置于军用品分配董事会之外，则中国势必成为棋中之末卒。”他指示宋子文，“须坚执予等有予等本身之立场，予等须维持本身独立之地位”。^②5月18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时直率表示：“今日之参谋团，惟有英美参加，拥五百万大军与日本作殊死战之中国反不能厕及，实非中国所愿见。”“中国军民对此措置，刺激实深。深感中国名为同盟国，实被歧视。战时之待遇已暴露不平等之痕迹如此，战后如何，未敢想象矣。”^③6月18日，蒋介石致函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及宋子文，批评

^① 《史迪威日记》，1942年6月19日，第105页。

^② 熊式辉文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③ 《战时外交》（三），第145页。

美国方面对中国战区的组织与筹备工作进行不力：电称：“中国战区至今并未有何组织与筹备进行，对于维持中国战区至少限度与其可能之方案，亦尚未着手，空军建立与补充以及空运按月之总量，陆空军作战与反攻时期之整个方案，彼等皆视为无足轻重，一若中国战区之成败存亡皆无关其痛痒。”电报不指名批评史迪威：“不重视组织与具体方案及整个实施计划。”“仍以十五年以前之目光视我国家与军人，故事多格格不入。”在缅战失败撤退过程中，罗卓英与史迪威一度失去联系，史向美国军部报告，罗离开军队，逃往云南保山。^①蒋介石事后查明，并无其事。对此，蒋极为反感，批评史迪威“谎报”，“完全归罪于我高级将领”，“彼竟自赴印度，并擅令我军入印，而彼亦并未对我有一请示或直接报告（中与史本约有特用密本，平时皆直接通电），于情于理，皆出意外”。他表示，从未见过像史迪威这种“推诿罪过，逃避责任以图自保”的人，提出应按照国际惯例，实行军事审判，查明功过。如果美国政府有意，中国政府可将有关高级将领解送华盛顿接受审判。但是，蒋又表示：中国哲学的原则是厚于责己而薄于责人，为维护中美国交及友邦荣誉计，要严格保密，切不可向外人“略露一点”，使人对中国政府有“以怨报德”之想。可以看出，蒋对史迪威已经不能忍耐，但是顾虑中美关系，因此，在要求宋子文等向罗斯福汇报的时候，显得特别小心、谨慎。电中，蒋介石也表述了中国作为“弱国”参加“国际战争”的心情：“不仅利未见而害先入而已，即将来战后是否能获得我所牺牲者相当之代价，实成问题。然而此时我国尚有一块立足之干净土地，而我政府幸亦未托足于外国以寄人篱下，且亦有自立之道耳！”^②

^①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5月9日）：“军部密告，接史梯威电，罗卓英离军队遁宝〔保〕山。”见林孝庭等编：《胡佛研究所所藏蒋介石、宋子文往来电稿》，初稿，未刊。

^② 熊式辉文件，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战时外交》（三），第603-604页，所载文字有小异，此据熊式辉文件引。

宋子文对史迪威本具好感。当年4月28日，宋子文曾致电蒋介石，担心缅战不利，将降低中国国际地位，影响美援争取，要求与史迪威合作，联合如实向美方提出报告，电称：“史迪威亲历其境，利害相关，所知当更透彻，此事必能与我合作，设法使联合国间明了真相。”^①5月6日，宋子文再次致电蒋介石，报告所闻史迪威在撤退过程中拒坐飞机，率领副官步行的表现，称赞史迪威“不失军人本色”。电报提出，史迪威身负如空军援华、中印空运、军货接济等多重任务，要求蒋介石命其自印回渝。^②但是，宋子文也亲身感受到史迪威掌握美援物资分配大权所带来的困难。5月19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称：“美军部以史梯威有全权，每有所商请，辄以史梯威并未要求，为不负责任推诿之词”。宋子文再次要求蒋将史迪威调到重庆，“常依左右，遇事随时饬报，勿使远驻印度，否则种种计划进行愈感延滞”。^③

宋子文接到蒋介石向美方提出史迪威问题的指示后，感到相当为难。当时，德国正倾全力进攻苏联南部，苏军情况危急，英美无暇东顾。同年6月，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提出，应尽力于以下工作：（一）中印空运；（二）美空军多派数大队来华助战；（三）美根据史迪威要求，派陆军二、三师赴印，助我克复缅甸，以利我陆运。根据上述情况，宋子文要求蒋介石“对史迪威万分忍耐”。^④

滇缅路封闭后，中国对外通道被堵。美方不得已，将已经拨给中国的10余万吨机械大部分收回。此后，美国援华物资只能依赖中国、印度之间的空运。根据中国抗战需要和美国援华计划，最低限度每月必须向中国运输3500吨军械，而中印之间的

① 《宋子文文件》，第60盒。

② 同上。

③ 宋子文《加码呈委员长电》，1942年5月19日，林孝庭等编：《胡佛研究所所藏蒋介石、宋子文往来电稿》，初稿，未刊。

④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6月。

空运当时实际上只能运输 500 吨。这种情况，将导致有关援华计划的取消。为此，宋子文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与史迪威切实商谈：（甲）中印空运计划；（乙）中美在华空军计划；（丙）国内及赴印陆军计划及附带军械问题，等等。但是，始终得不到蒋的回答。宋子文询问美国空军参谋长，美国空军参谋长答称此为史迪威责任；宋子文向罗斯福总统汇报，罗答以史迪威为蒋的参谋长，诸事可由蒋向史下达命令。6月12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要求蒋明白示知：“文追随钧座二十年，必知其素性憨直，绝非意存推诿，更不愿敷衍因循，事实如此，不得不一再晓谕，即请钧座明白示知，钧座对史梯威感想如何？文各电所列问题，是否已与其商洽？有何困难？美方认定，接济中国必须史梯威商承钧座之后来电证实，始克有济，是以文必须明了钧座对史之感想及史对我之态度，始可设法相机应付也。”^①

这时，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已经感到，蒋对史迪威“无十分信任之表示”，二人关系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6月12日，史汀生约宋子文专谈史迪威问题。宋称：如美国将本国陆军交给苏俄军官指挥，将非常困难，而蒋介石却将中国人缅部队交给史迪威指挥，这是历史上的“空前之举”。史汀生则表示：史为“第一流战将，美军官中无出其右，故特派充蒋公参谋长，但余等崇拜蒋委员长及爱护中国之热切，不能以对史个人感情为比例，如蒋公以为史不适当，务请直言无隐，俾得更换其他将领，决不因此发生丝毫意见。”^②6月16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建议蒋将对史的意见向美方和盘托出，同时大胆对史迪威进行指挥，电称：“文意钧座愿顾全大局之苦心，为中外所共见，但如史梯威确不能共事，不妨此时乘机直说。”“钧座似可表示，对史梯威固至信任，但对其见解当然不能事事俯从。如此一方面不伤感情，一

^①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6月12日。

^② 《作战经过》（三），第514-515页。

方面可留他日地步。陆长等既自动有另调之意，且自总统以次，均认史为钧座部属地位，钧座尽可照部属指挥命令之，不必以上宾相待，但善为利用其地位，以推动美军部充量之接济。”^①可见，宋子文关心的是利用史迪威的地位，推动美援，并不希望蒋、史矛盾激化。然后，一件意想不到的风波发生了。

**史迪威向蒋提交《备忘录》，声称自己虽是中国战区参谋长，
但又是美国总统代表，暗示不能完全听命于蒋；
蒋认为史“不法无礼已极”，“以殖民地之
总督自居”，“实行太上统帅职权”**

6月下旬，德国加强了对非洲的攻势。为解救危机，美国军方将全部重型轰炸机和所需运输机调往埃及，其中包括驻扎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队。26日，史迪威将这一“坏消息”告知蒋介石。蒋认为这是美方“置我中国危急于不顾，心殊愤激”，他在“强忍”之下，仍然责问道：“罗斯福总统来电明言已令将美国空军第十军由印度调来中国作战，想令出必行，岂容擅改！”“倘英、美以为中国抗战实力尚有保持之必要，绝不应一再无视中国之利益如此。盖中国最近所受之待遇，不啻在英美心目中已失其存在矣。”^②事后，宋美龄、宋子文都提出质问，史迪威“狠狠地反驳了他们”。同日，史迪威秘密致电美国军部，声称“蒋公极为激动，嘱予电呈总统，其大意为：同盟国家未认中国战场为同盟国家战场之一部”，“中国全力抗战已有五年，而同盟国家并未以全力援华。利比亚战事固紧张，但中国战场状况亦属紧张。”^③

6月29日，蒋介石向史迪威面交“手谕”一件，提出保持中

^①《作战经过》（三），第514—515页。

^②《战时外交》（三），第168页；参见《史迪威日记》，1942年6月26日，第109页。

^③《战时外交》（三），第613页。

国战区的最低限度的需要三项：1. 8、9月间美国派三个师去印度，与中国军队合作，恢复中缅交通；2. 自8月份起应经常保持第一线飞机500架；3. 每月经过驼峰运送5000吨物资。蒋批评自美国军事代表团抵华以来，在建设中国空军方面，尚无特殊成就；罗斯福对中国战区，尚有未能完全明了之处；太无视中国战区。^①7月1日，宋美龄与周至柔、陈纳德、史迪威会议。宋美龄要求史迪威将蒋的“手谕”转交罗斯福总统，并附上史本人的推荐信。史当场拒绝，对宋称：“这是大元帅给总统的最后通牒，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借此机会阐明自己的身份，一是大元帅的参谋长，二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其职权超出中国之外，三是战争委员会的美方代表，代表和维护美国的政策，四是总统负责租借事务的代表，五是一名宣誓要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国军官。”史并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她不懂得这一点，那她就比我想象的还要愚蠢。”^②

7月2日，蒋介石拟从美国已经拨给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中，转拨两架运输机给中国空军，遭到美员拒绝。史迪威为此向蒋致送备忘录，一面同意此两架飞机可由蒋介石支配应用，但同时声称自己是“出席中国任何军事会议之美国代表”，“在任何上述会议中，本人所有其他地位皆不适用”。又声称自己是美国“总统代表”，“负责监督及管理租借器材，并决定移转其所有权之地点与时间。俟所有权转移之后，委座即具此项器材管理之权。”^③史迪威的这份备忘录意在告诉蒋介石，自己虽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但又是“美国总统代表”，可以不接受蒋的命令。美国租借物资只有在经过他同意之后蒋才能调用。蒋介石长期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令出必行，何曾受过这种对待！

接二连三类似事件，特别是史迪威的《备忘录》将蒋惹恼

① 《战时外交》（三），第171-175页。

② 《史迪威日记》，1942年7月1日，第110-111页。

③ 《战时外交》（三），第608-609页。

了。同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表示“中国对租借物之受予形同乞怜求施”，指责史迪威“以总统代表资格胁制统帅”。蒋强烈表示：史既在中国战区内担任参谋长，“则所有其他地位皆不能适用”。^①7月3日，蒋介石日记指责史迪威“愚拙，其言行之虚妄，可谓无人格已极”。次日日记称：“自觉惭愧，国势贫弱，所以遭此侮辱。”^②5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他促请美国政府注意。6日，宋子文电复蒋介石，支持蒋对史迪威《备忘录》的态度，首次提出撤换史迪威问题。电称：“史迪威态度殊属离奇。阅其原函，强词夺理，谬解职权，非神经错乱，不能狂妄至此。文日内即进谒当局，谅能加以纠正。但文亟欲知者，重新明确规定参谋长职权后，钧座是否仍拟留其在华供职，抑或乘机更换，另选他员？”^③9日，蒋介石再电宋子文，要宋观察美国政府态度，暂不表态，“先看美政府对史之来函如何处理，最好能由其自动召回也”。^④18日，蒋介石与史迪威谈话，产生不再要求美援的想法，日记云：“英美对亚洲有色人种观念，根本不易改变，非我国独立奋斗至百年之后，决难平等。”又云：“美国对我冷淡接济事，不如不再要求，亦一对策也。”^⑤

宋子文受蒋之命后，即与美方接洽，并亲见罗斯福，陈述意见。7月23日，美国军部向宋子文转告罗斯福意见：史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当然听命于蒋委员长，同时为美国驻渝租借法案代表，及国际军事会议美国代表，当然听命于美方。如蒋以为不便，可将史的参谋长职务和美国代表职务划开，分由两人担任。美国军部称：总统因史迪威对中国及蒋公一向友好，而且熟悉中国情形，甚盼蒋公能继续任用。宋子文认为美方“语气仍不免袒

①《战时外交》（三），第609-610页。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7月3日、4日。

③《战时外交》（三），第611页。

④同上。

⑤《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7月18日，参见同日《困勉记》。

护”，再次谒见罗斯福，解释内中情形，说明史函的不当。罗斯福称：史的职权中有代表美国出席在渝国际军事会议一项，现在既无此类会议，事实上形同虚设。关于租借法案，此后一切由宋子文代表蒋，霍布金代表我，在华府共同解决。这样史迪威即成为“专属参谋长”。“如蒋公仍以史为未妥，余当更换之，但美国干练适当之军官甚少，另觅妥员，确有相当困难。”27日，美国陆军部代拟罗斯福复蒋介石函，仍取维持史迪威《备忘录》态度，要求宋子文转呈蒋介石，宋得悉其内容后，紧急谒见罗斯福，说明理由，告以“未便转呈”。罗斯福对宋子文所言，“极以为然”，决定撤销此电。^①

为了向蒋介石说明同盟国全盘战略，调解蒋史纠纷，罗斯福于1942年7月派行政助理居里再次访华。7月22日，蒋介石会见居里，批评同盟国战略不当。居里问蒋，是否将史迪威调回美国？蒋答：“由美国政府自定，余不愿参加意见也。”^②25日，蒋思考史迪威的《备忘录》，认为应向美方声明四点：“甲、史以听命与不能听命，由其自便之意，此为侮辱统帅。乙、租借法案〈物资〉之发与不发，由史自便，非由我求其不可，此为欺凌。丙、我认史过去之态度、行动，一人而利用其两种职权，实以殖民地总督自居，以参谋长为名而实行太上统帅职权。此必于美国助华平等政策有碍。丁、认史此函太不认识中国，侮辱余革命人格，故不能忍受。”^③同日，蒋介石再次与居里谈话，进一步确认西方世界歧视中国，美国与英国并无差别。日记云：“更觉西人皆视华为次等民族，无不心存欺侮，可以进一步压迫，乃必压迫不止。美国所谓道义与平等为号召，其实其心理与方法无异于英国之所谓。”他觉得，“对帝国主义，应争则争”。^④26日，蒋介石

① 《战时外交》（三），第615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7月22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7月25日。

④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7月25日。

石分两次与居里长谈三个半小时，痛斥史迪威“来函不敬之过恶与美国军部藐视与侮辱态度”。蒋自觉大义凛然，居里初时“矜持”，最后“乃亦不敢不折服”。蒋介石感到精神上的胜利，日记云：“对帝国主义者，无论其为何国，其对被压迫之国家，皆无诚意可言，非利用即高压，皆抱可欺则欺、可侵则侵之心，吾人若一以克己复礼、谦恭自持之道待之，则适中其计谋矣！”^①同时，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声称如罗斯福来电肯定史迪威《备忘录》，则宋可代表自己向罗表明：取消中国战区，辞去中国战区总司令职务。^②至此，蒋介石已向罗斯福摆出“摊牌”架势。7月30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居里在重庆期间，“凡不满史梯威之种种事实，最好向其直言无隐”。^③同日，蒋介石与居里第五次谈话，居里提出“过渡办法”，声称不可让史迪威太失体面，以免他回美后反华，可令史先赴印度，美国另派一人来华暂代。蒋同意这一办法。^④

史迪威受命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 杜聿明等指责史“擅权改制”、“毁辱国体”

上文已述，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援英战争失败后，部分军队退入印度。1942年6月，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得到批准。同月24日，蒋指令史迪威担任这支训练部队的司令。7月16日，蒋进一步任命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8月上旬，史迪威赴印，以蓝姆伽为营地训练中国部队。他提出，“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将领”，从美国调来300多名军官，拟将驻印军营长以上军官均改由美国人担任，受到中国将士的强烈反对。史遂将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7月27日。

② 《战时外交》（三），第614页。

③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7月30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7月30日。

这部分美国军官改为联络官，派往各部。^①但这部分联络官权力很大，可以直接调动营以下部队，而无须通知中国部队长官。同年9月，史迪威下令将第三十八师改为10个炮兵营，将原师长孙立人及廖耀湘等改任炮兵指挥或步兵指挥。12日，杜聿明致电蒋介石，声称：“国家军制系我政府法定之建制，史将军擅权改制，实属毁辱国体，损害主权。”^②同年12月，美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拨济30个师的军械。11日，蒋介石与来重庆参加会议的史迪威谈话，史乘机竭力批评中国军队办事延缓，罗卓英有“十大罪状”。蒋介石虽然不高兴，但尚能“忍耐”，决定撤换罗卓英，代之以邱清泉。^③不久，因担心邱脾气暴躁，不易与史迪威相处，又改为郑洞国。^④至1944年1月，蓝姆伽营地共训练中国军官2626人，士兵29667人。这支部队在后来的反攻缅甸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除退入印度者外，中国远征军的主力大部分退入云南西部。1943年2月，军事委员会决定重建远征军，以陈诚为司令长官。3月10日，陈诚与史迪威商量，决定在昆明设立训练基地，调集干部分批轮训后空运至蓝姆伽实习。

**计划攻缅，蒋、史矛盾再度激化。史认为蒋是
“伟大的独裁者”，蒋认为史“卑劣”、
“可恨”，“无常识，无人格”**

日军占领缅甸全境后，史迪威多次提出反攻缅甸计划。1942年7月19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交《反攻缅甸计划》，其要点为“南北缅水陆同时夹击”：1. 中、英、美三国联合出兵，自印度攻入缅甸，同时，另一路中国军队则自云南进攻。两路会师曼德

①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团结出版社，1992，第295-296页。

② 《作战经过》（三），第515页。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2月11日。

④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第272-273页。

勒，会攻仰光。2. 在盟军从陆路进攻的同时，英国海军确立在孟加拉湾的制海权，从仰光登陆。这一计划后来被称为“安纳吉姆”计划。8月1日，计划得到蒋介石的批准。11月3日，史迪威自印度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和英军统帅韦维尔商谈结果，要求在1943年3月1日前后发动攻势。蒋介石表示，中国可由云南方面出动15个师，但胜利关键在于英方是否能调拨足够的海空力量，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他说：“倘海空实力不充，中国实不愿派一卒参加此役。反攻开始以前，余必须知英国用于缅甸海空军之实力，方能下令前进。”“此次不反攻则已，一旦反攻，非胜不可，绝不能再受第二次之失败。”^①

1943年1月，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要求罗敦促英方，调动陆、海、空力量，共同克复缅甸。^②同月，罗斯福、丘吉尔在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卡港）会议，决定实施“安纳吉姆”计划。2月4日，美国陆军航空军司令阿诺尔、空军补给司令萨默维尔（Somervell，或译薛莫维尔、索摩微尔）、英国联合参谋代表团团长迪尔到重庆，向蒋介石通报卡港会议情况及1943年战略。同月7日，双方会谈，蒋介石同意英美方案，但要求英美方面增加空运与空军，切实支援中国。其标准为：空运物资每月1万吨，飞机500架。蒋强调，必须达到这一标准，并有确切日期。史迪威对蒋所提要求不满，当即质问蒋：是否不达到标准，即不对日抗战？史的质问含有明显的轻蔑成分，蒋认为史迪威作为自己的参谋长，提出这一质问，“可恶不敬已极”，但是，他忍着没有发作，只回答说：“中国抗战已经六年，即使太平洋战争不起，英美不来援助时，中国亦可独立抗战。”史迪威再问：所谓标准是否为条件？蒋答称：“此非条件，乃是余负责作战者最低限度之要求也！”接着，蒋以温和的语气要求阿诺尔转告罗斯福与丘

^① 《作战经过》（三），第355、357页。

^② 《战时外交》（三），第211页。

吉尔：“余当尽其所能，不惜牺牲一切，以期不辜负友邦之期望也。”^①8日，蒋介石打电话给宋子文，指责史迪威会议上的“不敬”，要宋转告史，令其以后“戒慎”，限史切实设法，达成蒋在会上所提条件，以赎过失。^②9日，中、英、美三方印度加尔各答会议，一致同意实施“安纳吉姆”计划，以1943年11月至1945年5月为入缅作战期。会议期间，宋子文向史迪威转达了蒋的批评。据宋致蒋电称：“彼极为懊丧，并谓当时谈话有失体统，甚以为歉，但信钧座必谅其忠实及一番热忱。”^③不过，史自己的日记则是：“见他的鬼吧！”^④

5月初，史迪威与飞虎队的陈纳德之间在对日实施“空中攻击”问题上发生分歧。陈纳德主张，只要中美用500架飞机对日军进行空中攻击，即可消灭日本大部分在华空中力量，阻遏其船运，破坏其交通线，使缅甸和中国本部的陆战易于进行。史迪威则认为，中国军队缺少军械给养补充，也缺乏训练，不足以保护机场。如对日“空中打击”实施过早，引敌来攻，则云南、广西、湖南各地的机场均将丧失，以中国本部为基地空袭日本的计划也将落空。争论虽发生于史、陈二人间，但不久即发生于史迪威与宋子文之间。5月5日，美国海陆空三方会议，邀请史迪威、陈纳德、宋子文参加。宋支持陈，主张当前急务为增强空军力量，史则认为，中国陆军勇敢苦战，损失巨大，“目前实不堪一战”。宋即批评史“对中国陆军未免过于悲观”。^⑤同日晚，宋美龄谒见罗斯福，罗表示，拟将反攻缅甸计划缩小为占领缅北。^⑥

史迪威早就制订过一份“有限度地进攻北缅的计划”，但遭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2月7日。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2月8日。

③《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2月。

④《史迪威日记》，未注明日期，第175页。

⑤《战时外交》（三），第224—226页。

⑥《战时外交》（三），第226页。

到蒋介石的否定。蒋的理由是：六年来，中国对日作战得到的经验是“迫使机械优越之敌人，运用恶劣之交通线，使其机械设备失其效用”。而在北缅，日军可以利用伊落瓦底河及仰光线路，中国方面可利用的只有正在建造中的两条公路。即使中国军队在北缅成功，日本人仍可利用交通便利，派军增援。他向史迪威一再说明，“不可再蹈覆辙”。^①5月8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他在罗斯福、丘吉尔会谈期间，力争照卡港会议及其后的重庆会谈决议实施，首先以英、美海空军截断日军供应线，占领仰光，然后收复整个缅甸。电称：“如果仅仅占领北缅甸至蛮德勒为止，非仅无益于中国战场，而且费力多，牺牲大。结果必不能达成目的，徒然牺牲兵力。”^②5月13日，宋子文专访到华盛顿参加太平洋军事会议（三叉戟会议）的丘吉尔，要求英方照卡港、重庆、加尔各答等会议决定，如期攻缅，但丘态度消极。宋问：是否准备放弃攻缅？丘答：英美军事专家正在研究。^③丘吉尔的回答使宋子文倍感紧张，立即致电蒋介石汇报，蒋也跟着紧张起来。

1943年春，蒋介石为准备进攻缅甸，曾将原来部署在长江两岸的第六战区主力抽调赴云南、贵州，司令长官陈诚也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随部队入滇，鄂西空虚。同年5月，日军在湖北宜昌集结大军，进攻三峡地区，威胁重庆。当蒋得知太平洋军事会议有放弃攻缅计划的可能后，大为恼怒，致电宋子文称，如此，“则我军民对联合国从前所有各种宣言与决议之信约，不仅完全丧失信用而已”。他觉得，又上了史迪威的当。电称：“史迪威始则强催我军集中攻缅，今乃因抽调部队，而使重庆门户大受威胁，而结果则谓可以取消打通仰光与滇缅路计划，则我军上下对美国用意与作为，岂啻视为儿戏，直认为有意陷中国于灭亡之境，不啻协助日本完成其大东亚之新秩序，岂不令人惶栗不

① 《战时外交》（三），第236页。

② 《战时外交》（三），第227页。

③ 《战时外交》（三），第228页。

已!”^①他要宋子文将这一看法明告史迪威及罗斯福左右。

5月17日，宋子文应邀出席联合参谋长会议，转述蒋的态度，坚决反对放弃攻缅，也反对史迪威仅攻缅北的计划，阐述其理由说：“我如不占领缅甸南，断其后路，必归失败，徒作无为〔谓〕之牺牲。蒋委员长彼时之决心如此，今日对此之决心益强。”^②在此前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上，史迪威公开批评蒋介石：“诸事犹豫，于战略无一定见解。”针对史的批评，宋特别为蒋辩护，声言蒋并非初次与外国军事专家合作。他以蒋曾任用苏联的加伦、崔可夫、德国的塞克特及佛采耳为顾问为例，说明他们在任期内“无一不恪遵蒋委员长意旨”。^③18日，蒋介石从宋子文来电中得知有关情况，日记云：“英人毫无进攻缅甸之意，史迪威之言词对我军污蔑轻侮，忧戚之至！”^④21日，在太平洋军事会议上，宋子文再次要求，坚决执行卡港会议及加尔各答会议的攻缅决议，丘吉尔辩称，当时“只有计划，并无决议”，“英军事当局如有允诺，实属越权”。他表示：“将来当极力设法使印度与中国军队得以连合，或须经缅甸北部。”^⑤宋子文担心罗斯福会向英方妥协，于同日谒见罗斯福，重申史迪威的进攻北缅计划，“徒耗军力，蒋委员长绝不能接受”。罗斯福则称：“攻复仰光，确有困难，但可先向西南岸进攻，以从后面袭击仰光”，将来拟派新锐部队赴缅。罗要宋子文转告蒋介石：“攻缅计划，余有决心进行。”^⑥

重庆危急加深了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恶感。5月22日，蒋介石日记云：“美国史迪威之陷弄乃其总因，此人诚误事不浅矣！”^⑦27日，蒋介石致电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云：“近日战况确甚紧

①《战时外交》（三），第229-230页。

②《战时外交》（三），第231页。

③《战时外交》（三），第232页。

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5月18日。

⑤《战时外交》（三），第234页。

⑥《战时外交》（三），第236页。

⑦《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5月22日。

急，本星期内关系最大，所以致此之故，实由史迪威催促我精兵抽调入滇，准备攻缅，以致前方空虚，为敌所乘。其实去年至今，自缅战至此次战争，皆为史所陷害也。”^①6月21日，蒋介石再电宋美龄，要求她在向罗斯福告别时，相机提出史迪威问题：“甲、史对余不能合作，余为大局计，均能容忍，惟其对中国军民成见太深，以廿年前之目光看我今日之革命军民。乙、故自史来华，我军队精神因之消沉颓丧，盖史视中国无一好军人，无一好事，而根本不信我军能作战，更不信我胜利，故欲其指挥盟军以求胜利，无异缘木求鱼。而彼对自己所处理之事与计划，以为无一不好，固执不变，毫无商洽余地。丙、故现在我军对史失望，以为如再听其指挥，不惟无胜利，必大受牺牲，非至全败不可。”电末，蒋介石称：“彼之态度，是来胁制中国，而非协助抗日，其结果与美国之热忱援助及友爱精神相反。余为史对于一般军官严加劝戒，令与合作。惟长此以往，时时发生误会，则不胜防制之苦。故为作战及大局计，深望罗总统明了此事真相与现状，盖甚恐其对华盛情将来失望，故不敢知而不言也。”^②但是，蒋介石又叮嘱宋美龄，不必太正式，也不必采取“不可不撤换”的强硬方式，只告以“实情”即可。

在罗斯福的坚持和说服下，原来坚决反对攻缅的丘吉尔同意一致进行，英美参谋团会议随即制订新的攻缅计划。史迪威曾答应向蒋呈阅会议记录，但史迪威第一次交给蒋的并非全文，而且缺乏重要部分。当时，蒋认为，海军是这次行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非保住孟加拉湾，否则进攻缅甸也就没有用处。因此，他关心英美“将提供多少海军”。^③6月27日，蒋介石命外事局局长商震催史迪威来见，询问会议关于海军兵力数量等文件是否带来。史称，此件不能交任何人，继而改称，回去后交商震代呈。

^① 转引自《古达程渝来电》，1943年5月27日，《宋子文文件》，第58盒。

^② 转引自《古达程渝来电》，1943年6月21日，《宋子文文件》，第58盒。

^③ 《史迪威日记》，1943年6月28日，第187页。

在商震去史处催索后，交来者仍非蒋所需要的文件。^①6月28日，史迪威致函蒋介石，说明联合参谋团为取得孟加拉湾制海权所必须派遣的“适当之兵力”。据史自称：“列了一长串战舰、重型巡洋舰、航空母舰及驱逐舰等，而且第七次解释了‘适当’一词。”^②史迪威非常不情愿这样做，日记云：“这超越了所有界限。这个小人令人厌恶，他十分傲慢地询问我们将能做些什么，谁在妨碍我们帮助他，以供应一切——军队、装备、飞机、医药、通讯、汽车运输，建立他该死的后勤供应部，训练他的劣等军队，甩下他那后娘养的参谋总长和总参谋部，而他却对我们的准备工作挑三拣四，对海军问题支支吾吾。主啊，救救我们吧。这个伟大的独裁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③同日，蒋介石召见史迪威，当面加以批评。日记云：“此人之无常识、无人格，实难令人想象者。”又云：“史之愚拙、顽劣、卑陋，实世所罕有。美国有此军官，而其长官马歇尔且视为一等人才，岂不怪哉！”^④这说明，彼此之间的恶感都发展到了极点。

美国是强国，史迪威是美国派到中国的将军，因此，蒋介石将他和史迪威的关系看成弱国和强国之间的关系。6月30日，蒋介石日记云：“凡弱国参战，无论如何努力与牺牲，强国皆视为不能与彼相比。又以史迪威之指挥我军在缅甸战役，彼不以我军牺牲为英勇，总以我军怯弱，而一以北洋军阀旧日之军官〔队〕视我也。”^⑤

不久，史迪威又有几件事加剧了他和蒋介石的矛盾：

一是擅自撤委中国军官。8月14日，总指挥部副参谋长温剑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6月28日。

② 《史迪威日记》，1943年6月28日，第187页；《战时外交》（三），第628页。

③ 《史迪威日记》，1943年6月28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6月28日。

⑤ 《本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6月30日。

铭因事与国内军政部通电，被史认为“有违军纪”，下令调温为高参，委美国人博金为副参谋长，引起全军大哗。新编第一军军长郑洞国劝史收回成命，为史拒绝。史的助手参谋长波德诺甚至说：“驻印军是由美国装备训练的，因此军中事务，包括人事必须听命于总指挥部，即使中国政府也不得干预过问。”^①郑及参谋长舒适存、师长孙立人等愤而致电蒋介石。郑电称：“今竟有此不幸事件，则人无保障，势必媚外图存，军队纪纲如何维持，国家体制其何以堪！”^②舒电称：“美方一贯政策，为打破中国高级指挥机构。”“美方微员僚佐，皆代表史将军，须听其命以驰驱，稍不遂意，责难侮辱随之。”蒋介石批示：“为何史于人事，不先请准本委员长，而擅自撤委？”^③

二是给蒋介石写报告、备忘录时所署职衔和语气。史通常均署“美国陆军中将”，引起中国将领不满。^④9月21日，史在给蒋介石的意见书末改署“中国战区参谋长”。蒋介石阅后称：“书中仍有不逊之言，此种恣睢态度，殊令人难受，隐痛已极！”^⑤

三是史迪威对中共的态度。史对蒋失望，自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寄以希望。1942年6月至10月，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多次在重庆访问周恩来。1943年3月，戴维斯再次访问周恩来，周提议美国派代表常驻延安。6月24日，戴提出报告，主张接受周恩来建议，向延安派驻观察员。9月6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备忘录》，建议调动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及胡宗南、傅作义、邓宝珊等部向山西出击，这些都触犯了蒋的大忌。蒋日记云：“此其必受共匪所主使，而且其语义有威

①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第301页。

② 《作战经过》（三），第516-517页。

③ 《战时外交》（三），第630-631页。

④ 《史迪威日记》，1943年9月18日，第200页。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9月21日。

胁之意。且名为备忘录，是将来制裁中共时，证明曲在于我之意。此史实一最卑劣、糊涂之小人！余不屑驳复，乃置之不理，表示拒绝其干涉之意。”^①9月10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指责史迪威“徒听共党之煽惑，助长共党之气焰，殊为可叹！”^②

宋子文受蒋之托，说动美方同意撤换史迪威，

但蒋介石临时改变主意，二人发生激烈冲突。

蒋怒而命宋“滚蛋”，自此拒不见宋

在罗斯福的推动下，丘吉尔勉强同意实施攻缅计划。其内容为：于1943年雨季结束后自印度对缅甸西北部进行陆空有力攻势作战，同时以海、陆军攻袭缅甸海岸，中国军队则由云南进攻。^③5月26日，罗斯福将关于此项决定的通知书交给宋子文。29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他提醒罗斯福，陆军对北缅进攻与海军对仰光进攻，务须同时行动。8月18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丘吉尔，告以雨季将过，不能再事迁移。同月，罗、丘等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开会，决定在未来的干燥季节中，反攻缅甸，同时决定成立东南亚战区统帅部，以英国海军中将蒙巴顿为统帅（旋升大将），史迪威为副统帅。

1943年9月，宋子文鉴于英美联军对日攻势渐趋积极，认为有调整与英美军事关系的必要。他设计了两项调整方案：（一）最高级的组织，如华府的联合参谋团及支配军械委员会，均应有中国代表参加。供给中国的军械，由中国直接申请，毋须史迪威或其它驻中国的美国军官过问。（二）史迪威即行撤调，同时改组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美国将领为副统帅；以中国将领为参谋长，以美国将领充副参谋长，统帅部各处长、副处长

①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9月12日。

② 《战时外交》（三），第632页。

③ 《战时外交》（三），第243-244页。

均以中美军官分任。^①宋计划先与罗斯福总统作原则上的讨论，在10月偕同美国陆军次长麦克洛来渝时，再与蒋商量决定。

9月16日，宋子文会见美国总统助理霍浦金斯，霍赞成宋所拟调整方案，并称：在参加联合参谋团及改组战区大前提之下，更换史迪威轻而易举，史汀生虽反对亦将无效，马歇尔也不像以前那样绝对维护史迪威。^②同月29日，宋、罗见面。事后，宋子文电蒋汇报：美方同意撤换史迪威，调整中国战区，在华盛顿另组包括中国在内太平洋军事参谋团。电称：本人将陪同蒙巴顿到重庆，向蒋报告国际情形，并洽商蒋与罗斯福、丘吉尔会晤问题。^③10月，宋子文偕蒙巴顿及美国后勤部长萨默维尔中将来华。萨默维尔是美方预定的史迪威的接替人，还在途经印度德里时，宋子文就对萨透露说：“事情正在成功，他与大元帅（指蒋介石）一同进行了谋划。”^④他完全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改变主意。

10月2日，蒙巴顿等向蒋介石转呈丘吉尔致蒋介石密函及魁北克会议决议。同月11日，蒋介石与宋子文谈话，谈史迪威事。其后，蒋又和宋美龄谈论，当日蒋日记云：“此史正卑劣之小人，无耻极矣！”15日，蒋开始思考史迪威的去留问题，一是去史之后的代替人选，一是撤换史迪威的可能性。蒋认为：美国人员中无人适合出任东南亚战区副统帅，也无人能出任驻华美军主任。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非常袒护史迪威，美国政府未必决心将其撤换。^⑤这样，蒋介石原来的决心就动摇了。

10月16日，萨默维尔将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一事告知蒙巴顿，蒙巴顿强烈反对。他说：如果指挥中国军队两年之久的官员（指史迪威——笔者）在军事行动前夕被免职，他无意于使用

① 《战时外交》（三），第262-263页。

② 《战时外交》（三），第265页。

③ 《战时外交》（三），第267页。

④ 《史迪威日记》，1943年10月21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0月15日。

中国军队。蒙巴顿委托萨默维尔将他的观点转达给蒋介石。^①同日，蒋介石与萨默维尔谈话称：一年半以来，自己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总不能使史迪威与我军合作，殊为遗憾。^②17日下午，蒋介石再次与萨默维尔谈话。两次谈话，都是宋子文担任翻译。蒋虽有意改变对史迪威的态度，但经宋子文翻译之后，仍然是“非去史不可”。萨默维尔辞去之后，蒋介石决定“力图挽救，转弯百八十度”。他嘱咐宋美龄召史迪威来见，“警告其撤职回美，对于其个人之损失程度。如其此时能对余表示悔过，则余或有转回庶宥之可能”。据蒋介石日记称：史迪威“承认其错误”并且表示“彻底改过”，于是，蒋“允宥其过，再予以共事最后之机会”。^③当日，蒋介石在《反省录》中写道：“史迪威去留问题为本星期最重要之一事，子文力主去史，以快其私意。余之既定方针，几为其所摇惑，最后卒能自动补救，允史悔改，重加任用。此乃中美国际关系与战局影响一大转机，乃知安危祸福全在最后五分钟几微之间也。”他觉得，宋子文简直坏极了：“自私与卑劣至此，实不能再为赦宥。如不速去，则党国之祸患将不堪设想矣。”^④

10月18日一早，蒋介石召宋子文谈话，告以对史迪威的去留政策，应加变更，并告以昨晚史迪威已经表示悔过。宋子文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自悔对蒋“太忠”，愤而表示以后不能为蒋“赴美再充代表”。蒋最初沉默不语，及至宋表示今后不能再与蒋“共事”之际，蒋突然爆发，“愤怒难禁，严厉斥责，令其即速滚蛋”。^⑤据唐纵日记称：“宋部长不知因何使委座见气，委座摔破饭碗，大怒不已，近年来罕睹之事。”^⑥上午，萨默维尔再次来见，蒋告诉他，已取消昨日之议，允许史迪威悔过自新。同日下午

①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376-377.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0月16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0月17日。

④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0月17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0月18日。

⑥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第386页。

午，宋子文陪同蒙巴顿到黄山见蒋，蒋要宋美龄通知宋子文自动离开，否则宁可不与蒙巴顿相见。宋子文无奈，只能退出，蒋才走下楼梯，与蒙巴顿会谈。^①

1931年，蒋介石与胡汉民发生冲突，一怒之下，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汪精卫、孙科等因而在广州另立政权，引起国民党内长达五年的宁粤之争。蒋担心撤换史迪威会严重影响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巨大灾难。他想起宋子文自20年代以来与自己作对的种种事情，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余自十三年起，受其财政之控制与妨碍，甚至其愿受鲍尔廷之驱策，共同打击于余，不知凡几。二十年后复以其财政问题各种要胁，以致不能不拘胡，而致党国遭受空前之祸患。今复欲以其个人私见而欲党国外交政策以为其个人作牺牲，恶乎可！此诚一恶劣小人，不能变化其气质也。”^②这时候，蒋介石觉得宋子文简直坏透了，无论如何不能再用。

蒋宋关系中曾多次发生矛盾，蒋在日记中指责宋子文也屡见不鲜，但是，严厉至此却并不多见。处于局外的唐纵记载说：“日来委座火气甚大，宋子文不知因何碰壁？”^③

史迪威和宋蔼龄、宋美龄结成“联盟”，企图以 宋美龄出任军政部长；宋蔼龄声称，她在自己的 “血肉（兄弟）和中国的利益之间”做出了“选择”

蒋介石对史迪威态度的转变既与他担心影响中美关系，损害抗战大局有关，也是宋蔼龄、宋美龄姊妹共同斡旋的结果。据史迪威自述：他曾经向这一对姊妹谈过当时中国军队的真相，使她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0月18日。

②同上。

③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1943年10月21日，第387页。直到11月5日，唐纵才弄明白所以。见该书第389页。

们非常震惊；也曾经研究过改革的办法——让宋美龄代替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长。于是，史与这一对姊妹“订了攻守同盟”。^①10月17日晨，宋美龄打电话给史迪威，声称宋蔼龄认为“仍有个转败为胜的机会”。史表示“不想呆在不受欢迎的地方”。于是宋氏姊妹就向史“谈起‘中国’和职责来”，要史“大度一些，坚持一下”。宋蔼龄对史称：“你的星正在升起”，闯过这件事，你的地位就会比从前更为稳固。姊妹二人表示，将代史见蒋，对他说，史只有一个目标，即中国的利益，假如史犯了错误，那也是由于误解而非有意，史准备好了要充分合作。在二人的坚持下，史点头同意，宋美龄表示“那我们马上就去做”。其后，史迪威见蒋，其情况，据史自述：蒋“改变了立场，演起了戏，竭力显得态度和缓。他说了两点：1. 我应该明白总司令和参谋长的职责。2. 我应该避免任何优越感。这全是废话，但我有礼貌地听着。蒋介石说，在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谐地再次继续合作。”^②20日，宋蔼龄向史解释说：“她只能在‘她的血肉’（子文）和中国的利益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花生米’（指蒋介石），并让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她认为这是一个大胜利。宋蔼龄保证，史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将来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进攻”。

宋子文向蒋介石递交“悔过书”，蒋介石感念亲情 与西安事变时宋子文的表现，答应与宋相见

蒋介石改变主意，史迪威留任使宋子文“挨了一下猛击”。^③但是，蒋自感对宋的态度也有不妥之处。10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本周以宋子文横暴、愚诈，触余愤怒，实为近年来所未

^① 《史迪威日记》，1943年9月13日，第199页。

^② 《史迪威日记》，第205-206页。

^③ 《史迪威日记》，1943年10月21日，第207页。

有之现象，亦乃修养毫无成效之征象也，未免有惭！然子文奸诈卑鄙之情态不能不有此一举。如果再事容忍，则养痍遗患，公私两败矣！”11月6日，日记又云：“宋子文野〔夜〕郎自大，长恶不悛。二十年来，屡戒屡恕，终不能使之觉悟改过。野心难驯固矣，然余无感化之力，不能不自愧也。”这一段时期，蒋介石始终不见宋。11月16日，宋子安出面调解，要求蒋召见宋子文一次，遭到蒋的拒绝。日记云：“彼诚幼稚天真之人也。”^①最后，宋子文不得不自己出面打破僵局。

12月23日，宋子文致函蒋介石，自称两月以来，独居深念，自感“咎戾诚多，痛悔何及”。接着，阐述与蒋的关系“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平日所以兢兢自励者，惟知效忠钧座，以求在革命大业中略尽涓埃之报”。信件着重说明抗战以来，自己“无论在国内、国外，惟知埋头苦干，秉承钧座指导，为争取胜利，竭其绵薄”，但因“个性愚憨，任事勇锐，对于环境配合之考虑，任事每欠周详；甚或夙恃爱护过深，指事陈情，不免偏执而流于激切”。信件自承在蒋前无礼、“粗谬”、“顽钝”，要求蒋“曲予宽容”。函称：“此诚文之粗谬，必赖钧座之督教振发，而后始足以化其顽钝，亦即文于奉教之后，所以猛省痛悔、愈感钧座琢磨之厚。今文以待罪之身，诚不敢妄有任何渎请，一切进退行藏、均惟钧命是听。伏乞俯鉴愚诚、赐以明示，俾能择善自处，稍解钧座烦忧，则文此身虽蒙严谴，此心转可略安而曲予宽容。文无论处何地位，所以图报钧座之志始终不渝，尤必与青天白日，同其贞恒。”^②宋子文的这份“悔过书”打动了蒋介石。12月24日，蒋介石自思：“自十月痛斥宋子文以后，始终未准其相见，昨日来函表示悔悟，求见迫切，余乃从亲戚与内子之恳切要求，并为慰岳父母之灵，允于孔寓与之相见，当观其以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16日。

^② 《宋子文文件》，第64盒。

后事实如何，如果能真诚觉悟，则公私皆蒙其福矣。”^①26日，蒋介石日记云：“对子文训斥以后，拒而不理者已逾两月。本周得其悔书，乃于圣诞前夕，为其西安共同患难之关系，准予相见，以示宽容。”^②31日，蒋介石年末反省，自记云：“本年修身之道进步较多，而暴戾傲慢之气未能减除，是为最大之羞污。对道藩、文白、哲生、辞修、子文、显光各种行态，尤为粗暴失态。而子文与辞修之骄横跋扈，自应斥责，但其他同志不过愚拙无能，实为无心之过，是余指导无方之所致。乃不责己而责人，是为本年最大之惭。”^③

史迪威计划暗杀蒋介石，掌握中国军权

蒋介石留用史迪威，双方和解，固然与史迪威模模糊糊地承认错误有关，但关键原因还在于缅北雨季即将结束，中国军队计划反攻缅北，不能临阵换将。

10月1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召集会议，蒙巴顿、史迪威及何应钦等出席。史迪威对中国军队参与反攻缅甸的计划作了介绍，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迪威日记云：“‘花生米’现在又讨人喜欢了。”^④与之相应，蒋对史的印象也有改变。11月24日，蒋日记云：“史迪威态度改变甚速，表现颇好，是亦感召之力乎？幸未为子文所胁制，否则，必得相反之恶果。”^⑤不过，蒋介石看到的只是一时的现象。

美国军部早就密令史迪威“应利用一切机会，统率中国军队”。^⑥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2月24日。

②《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2月26日。

③《三十二年感想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2月31日。

④《史迪威日记》，1943年10月21日。第207页。

⑤《爱记》，1943年11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

⑥史迪威政治顾问（美国国务院所派）戴维斯告友人语，见《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6月8日。

11月22日，史迪威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准备了一份与罗斯福的谈话资料，中云：“无论蒋介石作何承诺，我们如不将掌握中国军队之权，早获明文规定，所有努力均将成为废纸。”^①但当日史、罗见面时，史未获提出机会。12月6日，史迪威会见罗斯福，罗问史：“你以为蒋能维持多长时间？”史答：“局势很严重，日本人再来一次5月份的那种进攻就会把他推翻。”罗斯福称：“好吧。那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②12月12日史迪威自开罗回重庆，途经昆明，与其助手多恩（Frank Dorn，或译窦恩）上校谈话。^③其内容，据多恩回忆：史迪威声称，在开罗时奉口头密令，准备一份暗杀蒋介石的计划。事后，多恩拟具办法三种：用毒、兵变、堕机。史迪威选择最后一种，令其准备，候令实行。^④此后，暗杀计划始终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史迪威愈来愈明确地认为：“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⑤“他们所应该做的是打死大元帅和何（应钦）以及这帮人中的其他人。”^⑥

蒋介石终于同意史迪威的进攻计划，

史高兴地哼起了歌曲：“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

开罗会议中，蒙巴顿提出了一项在北缅作战的计划，蒋介石向罗斯福及丘吉尔陈述：攻缅胜利关键在于海军与陆军配合作战，同时发动，掌握制海权，阻绝日本的海上补给线。^⑦24日，丘吉尔向蒋表示，英国海军须至明年5月，才能在南缅登陆，这

① 转引自梁敬鎔：《史迪威事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第194页。

② 《史迪威日记》，第220页。

③ 《史迪威日记》，第228页。

④ Frank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 New York, Y. Crowell, 1971, pp. 75-79.

⑤ 《史迪威日记》，时间不明，第279页。

⑥ 《史迪威日记》，1944年9月9日，第284页。

⑦ 《战时外交》（三），第537页。

使蒋大为失望。^①次日，罗斯福向蒋介石保证，北缅作战时，英海军必提早在南缅登陆。^②蒋介石对丘吉尔已完全失去信任，认为“开罗会议之经验，无论军事、经济与政治，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英国之自私与害人，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但他为了不给英方今后提供推诿借口，勉强表示同意蒙巴顿的北缅作战计划。^③30日，蒋介石归途经过印度蓝姆伽，视察史迪威指挥部与郑洞国军部。郑早就感到，史迪威及其美国同事不愿他过问军事，不允许中国师级将领行使前线指挥权，事事要由美国人决定，因此向蒋诉苦，称史迪威视之如傀儡，不给他丝毫指挥权。^④同日，蒋与廖耀湘、孙立人谈话，认为蒙巴顿、史迪威对中国军队的批评“皆非事实”，而且史迪威的指挥战略也“甚不当”。蒋并立即召见史迪威的参谋长白克，“据实用地图指正其误，并嘱转告史氏改之”。^⑤

开罗会议结束后，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于11月28日又在德黑兰集会。斯大林表示，在打败德国后，将对日作战。英国对在缅甸作战本来就没有多大兴趣，便借此机会企图取消原来在缅甸作战的承诺。12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明德黑兰会议希望在1944年末结束对德战争，需要大量巨型登陆舰艇，询问可否将对缅甸的总反攻计划推迟到1944年11月。^⑥蒋介石觉得此为罗斯福与斯大林的决定，已无法更改，只能表示同意，但提出中国经济危机较军事尤为紧急，要求美国贷款10亿美元，用以支持中国继续抗战。

罗斯福虽然有将总攻缅甸延期的打算，但并未最后决定，因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25日。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26日。

③《本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30日。

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30日；参见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第296-297页。

⑤《困勉记》，1943年11月30日。

⑥《战时外交》（三），第286页。

此，史迪威仍在作及早攻缅的努力。12月14日，史迪威到重庆，企图说服蒋介石，谈话很不愉快。蒋介石日记云：“以史迪威之神态与见解，引人不快。凡事靠己，必须我能加强本军为第一义也。”^①15日、16日两日，蒋、史二人反复讨论攻缅战略。据史迪威日记，史向蒋反复说明“放弃进攻缅甸的可能后果”，蒋则表示：“我们不能冒在缅甸失败的危险，那对中国人所产生的后果将极为严重”，以致史在日记中怒骂：“这个小畜牲根本不想打。”^②据史迪威称，宋蔼龄和宋美龄也同时出面劝说，宋美龄甚至向史宣称：“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杀了他”。16日，再次开会讨论，蒋称：“我们只有1%的获胜希望。”“除非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两栖行动，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又称：“如果我们采取守势而让日本人进攻的话，我们获胜的机会就会多一点。”^③据蒋介石日记，史“竭力怂恿如期攻缅”，但蒋“决心展期至明秋为止”。日记称：“此人既无军事常识，更无政治浅见，余表示展期之决心，勿使其再为我害也。”^④此际，1942年远征军初战失败仍像梦魇一样压在蒋的心头。蒋日记云：“为攻缅展期问题，内外阻力甚大，如无坚定决心，则此举必被动摇，将蹈去年失败覆辙矣。”^⑤他担心如攻缅再败，则昆明不保，空运根据地全失，国际通道断绝，国内军心、民心动摇，将更为美、英、苏所轻侮。蒋估计，最多不过两年，太平洋大战必将爆发，“届时，中国兵额未足，毫无精强部队参加决战，则我国地位绝无矣。故仅有之资本，决不愿再作浪费，而被英国之欺弄，致我国于万劫不复矣”。^⑥17日，蒋介石复电罗斯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2月14日。

② 《史迪威日记》，1943年12月15日。第230页。

③ 《史迪威日记》，1943年12月16日，第231-232页。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2月15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2月16日。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2月17日。

福，声称如登陆部队所需战舰及运输舰不能按原计划集中，则陆海的全面攻势延期至明年11月，一举歼灭在缅日敌，较为妥适。^①不过，蒋介石并不反对局部攻缅。

10月18日，蒋介石在重庆召见史迪威，布置自印度东北的列多（力多、立多）向北缅进攻的作战方针。19日，蒋介石与蒙巴顿、史迪威开会，确定以12月中旬为期，攻取缅北。蒋并且表示同意由蒙巴顿指挥全部在缅作战的中国部队，史迪威为副。^②会议结果使史迪威欣喜若狂。他在日记中写道：“有史以来头一次。大元帅授予我指挥使用（中国驻印军）部队的全权，没有绳索——他说没有干预，那是‘我的部队’，给了我解除任何一名军官职务的全权。”在给史迪威夫人的信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欣喜，甚至哼起了歌曲：“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圣诞节多快乐，我们坐在吉普上。”^③第二天，史迪威即飞返缅甸，转赴列多，与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研究作战计划。其后，驻印军在胡冈河谷、孟拱河谷等地迭获胜利。

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出动驻滇部队进攻北缅，蒋罗矛盾尖锐。

在日本“一号作战”的威胁下，罗斯福要求蒋将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交给史迪威

蒋介石所同意动用的只是中国驻印军，但是，在云南，还有另一支待命进攻缅北的远征军。12月21日，罗斯福又致电蒋介石，要求中国驻滇部队向北缅作战，以支援英、美部队由印度向北缅的进攻。蒋介石仍然觉得没有海军从缅甸南配合，并登陆协助，乃是自取灭亡之道。12月23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重申开罗会议南北海陆军同时发动的意见，批评“盟军战略置中国战区于不顾”，声称中国驻印远征军已交给蒙巴顿、史迪威指挥，

^①《战时外交》（三），第289页。

^②《作战经过》（三），第385-394页。

^③《史迪威日记》，1943年12月19日，第233页。

不能同意驻滇远征军再行出动。^①1944年1月15日，罗斯福再电蒋介石，要求出动滇西部队，尽力进逼，配合蒙巴顿。3月20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明缅甸形势已经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要求滇西远征军前进至腾冲及龙陵地区，以配合驻印远征军夺取缅北重镇密支那。^②当时，苏联空军与外蒙军队入侵新疆，正在与中国军队对峙。27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说明中国已抗战七年，国力、兵力均极疲惫，在新疆未安定，中国正面战场对日军的防线未有把握之时，中国主力军不可能由云南发动攻势。他重申在开罗时对罗的诺言，一旦英军发动对缅甸的海陆两栖作战，中国主力军必全力攻缅。但是，蒋仍然表示，将尽量抽调云南部队空运西线，增强列多方面的作战力量。^③当日，史迪威飞到重庆，蒋介石即批准由滇西空运第十四师、第五十师赴印作战。4月4日，罗斯福再次要求滇西远征军占领云南边陲要地腾冲与龙陵。在电报中，罗斯福不无牢骚地向蒋表示：“去年吾人装备并训练阁下之远征军，现正当利用此机会。如彼等不能用之于共同作战，则吾人尽其最大之努力，空运武器与供给教官，为无意义矣。”^④此函语含谴责与批评，此前还不曾出现过。5日，蒋介石日记云：“其措辞甚傲慢，为其自直接通电以来之第一次。”他认为，现在尚非驳斥之时，应暂时忍耐，也不回答，以观其后。^⑤6日，宋美龄特约史迪威助手贺恩（Hearn）参谋来谈，告以“此种压迫的行动，实非中国所能忍受”。^⑥7日，宋美龄致电史迪威，声称罗斯福致蒋电，“如此措辞，余恐其将使吾人共同企求之目的未克达成”，希望史设法向华府拟稿人说明，“当

① 《战时外交》（三），第291页。

② 《战时外交》（三），第296页。

③ 《战时外交》（三），第297-298页。

④ 《战时外交》（三），第299页。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4月5日。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844年4月6日。

此紧要之际，应竭尽全力，以促使吾人共同胜利之早日来临”。^① 10日，马歇尔下令暂时停拨援华军事物资，至滇西远征军出动时再予恢复。蒋介石认为此可忍，孰不可忍，嘱何应钦答复美方：“中国抗战与出击，自有一定计划，决不为美国武器之接济与否所转移”。^②

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决定调整对缅作战方针。4月13日，军事委员会电令滇西中国远征军于月底前完成作战准备，相机攻占腾冲，策应西线驻印军攻击缅北重镇密支那。17日，拟定怒江作战计划。5月11日，反攻怒江作战开始。

然而，就在中国远征军东西两路同时出动之际，日军的“1号作战”却在节节进展。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扫荡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首先向河南进攻。5月25日，攻陷洛阳。5月底，日军开始向粤汉路进攻，蒋介石致电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要他提请美国军事当局注意其严重性，将成都存油、配件及飞机全部交陈纳德作为粤汉路空战之用。同时，蒋介石两电召史迪威回渝商量，史迪威均置而不答，蒋深感痛愤，在日记中批评史“诚非以情义所能感”。^③6月初，蒋介石自我反省，深悔“去年既已决心解除其职务，而复留用”的“失计”，批评自己用人办事尚为环境所转移，有关重要问题皆不能主动自决。^④史迪威早就认为，蒋介石过于重视陈纳德的空中打击力量，忽视陆军的建设与改造，因此他对中国部队在河南的失败并不惊讶，日记称：“中国的局势相当糟糕。我相信‘花生米’将要为他的愚蠢迟钝付出重大代价。这个傻瓜蛋，救世军主动来拯救他，而他却不接受。现在一切都太晚了，他却大叫了起来。”^⑤6月

①《事略稿本》，1944年4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4月13日，参见同日《事略稿本》。

③《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6月1日。

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6月3日。

⑤《史迪威日记》，1844年6月2日，第262页。

5日，史迪威到重庆，如他所料，蒋的目的在于要求史迪威同意，为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增加汽油供应。这使史迪威很不屑，在日记中批评蒋说：“他想要整个世界，但又什么都不想吐出来。”^①自然，史迪威拒不加拨。^②6月18日，日军攻陷长沙，向粤汉、湘桂两路交叉点和战略基地衡阳逼近，情势更为危急。史迪威于7月2日致夫人函云：“如果危机到了足以摆脱掉‘花生米’而又不致毁了整艘船的程度，那就值了。”7月4日，史迪威致电马歇尔，报告中国战场危机，要求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以剧变形势应采剧烈手段”为理由，迫使蒋将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自己。电中，史迪威并称：“出兵晋豫以攻汉口，应是扭转中国局势之方法，此须使用中共部队。两年以前彼等愿听我指挥，今或仍能听命。”^③其实，中共长于敌后游击战争，不会轻易“听命”于史迪威，匆促去进攻汉口这样的大城市。

马歇尔同意史迪威的意见。7月6日，马备妥电稿，由李海签呈罗斯福，声称“中国局势近已颓落至可惊之程度”，“目下已到须将中国军权交与一个人物指挥抗日，使生效果之时，环顾中国政府与其军队之中，尚无一人能够综持军力以应日方之威胁，有之即是史迪威”。^④7月7日，罗斯福按拟稿致电蒋介石，提出日军进攻华中，局势严重，“应责任一人，授以调节盟国在华资力之全权，并包括共产军在内”，同时告以已升史迪威为上将，建议蒋将其从缅甸战场召回，“置彼于阁下直属之下，以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以调节与指挥作战”。^⑤这一电报虽宣称将史迪威置于蒋介石“直属之下”，但实

① 《史迪威日记》，1944年6月5日，第262页。

② 史迪威的助手贺恩称：“史迪威正想令华东机场失去，以证明其在华府会议中预测之证实。”见 *Way of a fighter*, p294. 转引自《史迪威事件》，第307页。

③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380-381.

④ 《史迪威事件》，第265-266页。

⑤ 《战时外交》（三），第634-635页。

质上是架空蒋介石，赋予史迪威以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7月8日，史迪威日记云：“罗斯福给蒋介石去电，乔治·马歇尔给我来电。他们在我的事情上一直在向他施加压力。罗斯福要蒋介石给予我指挥的全权。”^①

**蒋介石采取拖延战术，罗斯福紧逼不让，暗示将停止
对中国的援助；蒋介石愤而在日记中大骂
“美帝国主义”，准备放弃美援，与美绝交，独立抗日**

宋子文最先得知要蒋介石向史迪威交出全部军权的消息，因而最先致电霍浦金斯反对，电称：“今天华盛顿又做出了一项错误的决定，陆军部要强迫蒋接受史迪威将军”，“我个人可以无保留地向你担保，蒋委员长在这个问题上决不会而且也不能屈服。”^②蒋介石觉得难以硬抗，企图拖延。7月8日蒋介石致电在美代表孔祥熙，要他转呈罗斯福，声称“原则”赞成关于史迪威的建议，但中国军队及政治情况复杂，“必须有一准备时期”，建议罗派私人代表来华，调整蒋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增进中美合作。^③罗斯福看出了蒋意在拖延，于15日复电蒋介石催促，表示形势“需要有一迅速之处置”，尽早向史迪威交权。^④7月16日，蒋介石甚至在日记中大骂“美帝国主义”，声称“抗战局势，至今受美国如此之威胁，实为梦想所不及。而美帝国主义之凶横，竟有如此之甚者，更为意料所不及。彼既不允我有一犹豫之时间，必欲强派史迪威为中国战区之统帅，以统制我国。此何等事，如余不从其意，则将断绝我接济，或撤退其空军与驻华之总部，不惟使我孤立，而且诱敌深入，以图中

^① 《史迪威日记》，1944年7月8日，第267页。

^② 巴巴拉：《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重庆出版社，1994，第622页。

^③ 《战时外交》（三），第637页。

^④ 《战时外交》（三），第642页。

国之速亡，其计甚毒。”^①8月6日，蒋日记再云：“最近内外形势之压力日甚一日。尤以美国在精神上无形之压迫更甚。彼必欲强余无条件与共党妥协，又欲余接受其以史迪威为总司令，此皆于情于理不能忍受之事。”^②可见，蒋对罗虽表面顺从，而内心却充满强烈的对抗情绪。但是，蒋介石一时还不敢得罪罗斯福，与戴季陶、陈布雷研究后，决定暂用妥协政策。7月23日，蒋介石两电孔祥熙，要他当面向罗斯福陈述，蒋对罗的主张“原则上表示接受而毫不踌躇”，但实行上不可无“程序”，“须有一相当之准备时期”；罗所称指挥全部华军，应指在国民政府统辖下在前线的作战部队，其指挥范围与办法，应另行规定。要孔特别说明：“抗战七年，而中国全国国民之所以百折不挠者”，“全为求得国家之独立与自由，保障国家之尊严”，意在含蓄地指出罗斯福主张之不当。关于租借物资支配权，蒋提出：应完全归于中国政府或最高统帅，但可授予史迪威“考核监督之权”。^③

罗斯福不容蒋介石拖延，于8月10日致电蒋介石，声称中国战场形势危急，授予史迪威全部指挥权一事“必须立即行动”，同时提出，将派曾任陆军部长、中东特使的赫尔利为私人代表来华，调整蒋、史关系。至此，蒋介石已不能闪躲。同月14日，蒋拟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并拟在复罗电中表示“余已积极准备，甚望其能于短期内可以顺利实现”。^④蒋既松动，罗斯福也不想使中美关系弄得很僵。于8月23日致电蒋介石，继续催蒋尽早采取必要的措置，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电称：“稽延之思考及审慎之部署，于此军事严重之时，容有严重之后果。”同时，罗斯福也表示，正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7月16日。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8月6日。

③《战时外交》（三），第645-648页。

④《战时外交》（三），第651页。

拟订新程序，使史迪威不再负责拨发租借物资。^①这通电报，意在进一步催逼，但也有所让步。

9月6日，罗斯福特使赫尔利与纳尔逊抵达重庆。9月9日至11日，宋子文、何应钦与赫尔利、史迪威、纳尔逊谈话。其间，宋子文根据蒋介石指示，坚持美国租借物资到达中国后应交中国政府处理，声称“必须记住一个大国的尊严”，但史迪威、赫尔利均反对。^②赫尔利指斥宋子文“胡说”，对宋称：“记住，宋先生，那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生产的，我们拥有它们，我们愿意给谁就给谁。”^③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大元帅控制了分配权，我就完了。共产党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大元帅的亲信才能得到物资，我的部队（远征军）将只能去舔别人的屁股。”^④12日，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赫尔利、史迪威不愿交出租借物资支配权，蒋称：“此事非坚持不可。”^⑤同日，赫尔利与纳尔逊拜会蒋介石，给蒋的印象是“言辞虽婉而意甚严”。他认为，抗战以来，举凡军事失败、经济疲弱、“共匪猖獗”、政治恶化等各种问题，都是美国的“粗疏盲昧、无端诋毁”的结果。对于谈判再三而美国仍不愿将援华物资交给自己支配，以及不愿就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一事订立协定，蒋介石尤感恼怒，再次萌生“独立应战”的想法，日记云：“对余污辱欺妄，竟至此也。决与之据理抗争，不能再事谦让，并须预作独立作战之准备，以防万一也。”^⑥9月16日，美国大使高斯对蒋介石称：“希望中国将来在和会中能代表中国与亚洲，不失为四强之一之资格。”蒋自称听了这段话以后，有如“利刃刺心”，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若不自力更生，何以

① 《战时外交》（三），第655页。

② 《史迪威事件》，第278页。

③ 《史迪威日记》，1944年9月16日。第287页。

④ 同上。

⑤ 《事略稿本》，1944年9月12日。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9月15日。

立国？何以雪耻？而史迪威之刁难轻侮，更令人难堪无已。”^①

史迪威所指挥的中国驻印军迭获胜利。8月5日，驻印军攻克密支那。但是，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也进展迅速。9月12日，日军攻占广西全州，威胁桂林、柳州。滇西方面，远征军于9月14日克服腾冲，与盘踞龙陵的日军则陷于苦战状态。9月15日，蒋介石要求史迪威命令驻印军乘胜进攻缅北的另一要地八莫，以此策应滇西远征军，否则，即拟将远征军撤回怒江以东，保卫昆明。史迪威声称，在密支那的中国远征军需要休息，建议蒋调在陕西监视陕北的胡宗南部来援，同时反对滇西远征军撤回怒江以东。他在日记中斥责蒋介石为“疯狂的小杂种”，“一如既往的荒诞理由和愚蠢的战略战术观念。他很难对付而又令人讨厌”。^②事后，史迪威紧急电告马歇尔，声称“长江以南的灾难主要是由于缺乏适当的指挥和照例的远在重庆的遥控。麻烦仍然来自最高当局”。^③18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认为日军进攻中国东部是“诡计”，要求蒋介石立即补充缅北部队并且立即派遣生力军，协助怒江方面的中国军队。该电同时严厉批评蒋延搁委任史迪威指挥中国所有之军队，以致损失中国东部的重要土地。罗斯福以威胁的口吻称：“务希立采行动，方能保存阁下数年来英勇抗战所得之果实，及吾人援助中国之计划。”“不然，则在政治上及军事上种种之计划，将因军事之崩溃而完全消失”。^④这通电报有如最后通牒。史称赞说：“这一枪打中了这个小东西的太阳神经丛，然后穿透了他。这是彻底的一击。”^⑤19日，史迪威向蒋面交此电，蒋只说了一句话：“我知道了”，但内心愤怒异常，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年9月16日。

② 《史迪威日记》，1944年9月15日，第287页。引文参考了瞿同祖所译《史迪威资料》，中华书局，1978，第121页。

③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435-436.

④ 《战时外交》（三），第658-659页。

⑤ 《史迪威日记》，1944年9月18日，第289页。

日记云：“实我余平生最大之污点，亦为最近之国耻。”“今年七七接美罗侮辱我国之电以后，余再三忍辱茹痛，至今已有三四次之多，然而尚可忍也。今日接其九一八来电，其态度与精神之恶劣及措辞之荒谬，可谓极矣。”^①20日，蒋介石对赫尔利、纳尔逊说：“中国军民恐不能长此忍受美史等侮辱，殊为合作之障碍也。”^②

赫尔利来华后，曾与史迪威长谈。史称：自己与蒋之间，两人个性均极强硬，工作上不免发生困难。今后愿意接受蒋之命令。关于援华租借物资，赫批评史全面操控的做法，史同意今后全部交蒋支配。关于中共问题，史提出由彼提出调整方案，国共两党彼此谅解，将中共以及中央用以防共的部队，均调出抗战。赫称此为中国内政，吾人虽盼中国统一，但只能以“纯客观之立场赞助中国政府解决中共问题”，使所有中国抗日部队均听命于蒋的指挥。24日，赫尔利会见蒋介石，汇报与史晤谈情况。蒋称：罗斯福关于将中国军队交史迪威指挥提议，出于好意，有利中国，但“军队乃国家命脉，而军队之指挥权，乃操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自己不能不慎重处理。蒋要赫尔利转告罗斯福：“有三点不能稍事迁就：1. 三民主义不能有所动摇，故不能任共产主义之赤化中国。2. 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失。3. 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污辱，即不能接受强制式之合作也。”^③蒋称：已对史迪威“失去最后一分之希望与信心”，希望美国另派人员来华。宋子文当即配合，声称美国派任东南亚的盟军总部某参谋长，即可胜任。^④25日，蒋介石命宋起草致赫尔利备忘录，表示同意美方遴选将领一员为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兼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备忘录称，自赫尔利来华后，本人曾不顾以前之感觉与判断，考虑以史迪威为前敌总司令，但“史将军非但无意与余合作，且以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9月19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9月20日。

③ 《战时外交》（三），第675页。

④ 《战时外交》（三），第667-671页。

为受任新职后，余将反为彼所指挥，故此事因而中止”。^①

蒋介石拒绝罗斯福的意见，自知事关重大，中美关系有破裂的危险，准备恢复“独立抗战”。9月26日，蒋介石致电在美国的孔祥熙与宋美龄，声称罗斯福来电“其措辞实不堪忍受，余对其来电决置之不复。”“吾人如再恢复独立抗战之态势，则对内政与军事情势，决不能比现在更坏。只要内容简单，无外力牵制，则国内一切措施方能自如，决不如今日皆受人束缚之苦也。史决难再留，如有人来说情，应严正拒绝，并请其从速撤换，以免阻碍今后之合作也。”^②27日蒋介石日记云：“自史迪威由印回渝，半月来，即作有计划、有系统的威胁宣传：一曰，史已离渝回美。二曰，共党要求其赴延安。三曰，彼拟即飞延安。四曰，第十四航空大队将完全撤退。五曰，驻渝美军总部人员全部撤退等荒谬言论，散布于渝市，使吾恐怖，可将华军指挥权无条件交彼也。另一方，美国之内对华军之拙劣、纷乱等种种不堪之妄报，使其国人对华侮蔑，以为中国真绝望矣。……尤以罗于上周五在记者席上对华军事不满之表示，更见其险恶用心，非达其统制中国之目的不可也。若不与之决斗，何以遏制其野心与暴露其阴谋也！”^③28日蒋介石致电在华盛顿的孔祥熙，嘱咐他今后不可再向美国要求任何物品，以免为人轻视，并要求他迅速离美回国。这时候，蒋已经作了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准备。30日，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美国态度之恶劣已至极点乎？过此惟有绝交之一途。”“万不料联盟战争，得此逆报与窘境。”^④

① 《战时外交》（三），第673-674页。

② 《战时外交》（三），第675页。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9月27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9月30日。

**罗斯福不愿失去中国这一战略伙伴，向蒋让步，
同意撤回史迪威，蒋介石认为，
这是“中国解放之开始”**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虽是弱国，但是，中国毕竟是大国，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主要力量。蒋介石既然寸步不让，美国不愿丢掉中国这个战略伙伴，就只有向蒋让步了。10月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接受蒋的建议，解除史迪威的参谋长职务，命他不再负责租借物资，但罗坚持，为保证中印空运，仍须史负责指挥在缅甸及云南的中国军队。^①10月7日，蒋介石接见赫尔利，拒绝罗斯福建议，声称史迪威既不能服从命令，又缺乏与中国合作精神，故不能再委以指挥中国战区任何军队之名义与职务，要求美方另派人员。蒋并拟就致赫尔利的说明文稿和答复罗斯福电稿，当场由宋子文口译。^②8日，蒋介石约陈布雷谈话。陈认为应适可而止。蒋不赞成，表示：“应以要求撤回为唯一目的。”同日，孔祥熙也致电蒋介石，说明罗斯福召集美国陆海军首脑商谈，军方对撤换史迪威颇多顾虑，马歇尔又对史极为支持，史现升四星上将，与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权位相等，如另派他人，至为难得等为理由，要求蒋令史辞去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专心负责滇缅路联军军事。^③但是，蒋也不为所动。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要求调回史迪威，另换他人。^④

此际，蒋介石认为对美交涉已至最后关头，做了最坏准备。他在日记中表示，如罗斯福不改变其现在态度，则不能不准备决裂。在历史上，蒋在碰到困境时，曾经有过两次下野的记录。这

① 《战时外交》（三），第677-678页。

② 《战时外交》（三），第678-679页。

③ 《战时外交》（三），第683页。

④ 《战时外交》（三），第684页。

次，蒋自称：“非至万不得已时，决不可为内外形势恶劣之故而灰心下野，以放弃我革命之责任也。”^①10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会见宋子文，希望留住史迪威，声称撤换史将损害罗斯福的威信。宋向蒋汇报，蒋虽感到形势的“危险与恶劣”，但是，也还是不准准备收回决定。^②

赫尔利来华，本负有劝说蒋介石接受罗斯福决定的任务，但是，他在与蒋的接触中，却逐渐被蒋说服。10月13日，他致电罗斯福，声称“中国以劣势装备之弱国对其强大敌寇，抗战至七年以上，尚不能使之屈服，则美国对华交涉，决非用压力与威胁所能奏效”。他力劝罗斯福改变决定，另派能与蒋合作的年轻将领来华。电称：“如我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将失去蒋委员长，甚至还可能失了中国。”^③自然，罗斯福不愿失去中国，只能向蒋妥协。10月15日，赫尔利向蒋介石出示罗斯福来电，要求蒋从美国将领中圈选三人，交罗选定。^④10月1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声称现正颁发命令，即将命史迪威回国。在一场比赛智慧、比赛意志的较量中，罗斯福败在蒋介石手下了。蒋介石志得意满，10月22日，蒋介石日记云：“如果此次撤史不成，则美在东方必演成其帝国主义侵略之祸首。”“此举不仅救国，抑且救美矣。”^⑤28日，美国正式发布调史迪威回国命令。10月31日，蒋在日记中自夸云：“此实我中国解放之始也。”^⑥

宋子文最早提出撤换史迪威，在蒋改变主意后又因坚持己见而受到蒋的斥责，这时，自然很高兴。10月30日，宋子文致宋子安电云：“此次史迪威撤调回国，兄助回合（暗指蒋介石——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10月11日，参见同日《事略稿本》。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10月13日，参见同日《事略稿本》。

③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 1944, Vol.6. p.726. 参见《事略稿本》，1944年10月21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10月15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10月22日。

⑥ 《本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10月31日。

笔者)，出力不少。盖为纠正一年前历史上之错误也。”^①

1945年1月5日，美国政府自动撤回史迪威的助手多恩，蒋介石日记云：“此人为史迪威手下第一骄横侮华之人，美竟撤去，则其援华之诚意又进一步矣。”^②蒋介石当然不可能得知，就是这个多恩，曾经受命制订过一份暗杀计划，要让他高空的飞机上摔下来。同年7月7日，蒋介石想起一年前罗斯福强制自己交出军权的情况，认为“几乎宣判中国之死刑，为抗战以来所未有之耻辱”。^③6月23日，史迪威出任美国第十集团军司令，与日军在冲绳岛作战。8月2日，蒋介石得知，马歇尔决定由史率领第十军由琉球来华登陆，史则倡言“必先倒蒋以报去年之恨”。^④当晚，赫尔利拜会蒋介石，蒋将《史迪威事备忘录》交赫，嘱其转交杜鲁门总统，拒绝史迪威再次来华。^⑤史迪威和中国的关系自此结束。

**史迪威的优缺点都很突出。他既是对中国抗战
做出重大贡献的国际友人，又是美国
大国主义思想和作风的体现者**

史迪威是个优缺点都很突出的人物。他是中国通，真心诚意地帮助中国抗日，对中国社会、中国军队与蒋介石其人有许多敏锐的认识。远征军第一次缅北作战失败后，他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增强了中国军队的作战力。远征军第二次缅北作战胜利，显然与他的训练、指挥有关。郑洞国曾回忆说：史迪威“是一位正直的、很有才华的军事将领。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他的态度不仅始终是认真、积极的，而且颇具战略眼光，在指挥上很有一套办

① 《宋子文文件》，第47盒。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月5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7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2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3日。

法。最难他身为异国高级将领，却毫无官架子，待士兵们十分友善，喜欢同他们交朋友，慢慢赢得了不少中国将士对他的钦敬”。^①应该承认，史迪威是对中国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国际友人之一。但是，史迪威的性格中也有一些突出的缺点，例如傲慢、主观、急躁、偏激，特别是，作为美国将领，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大国主义思想和作风。

蒋史矛盾，开始于战略分歧。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际，中国远征军刚刚入缅，人地生疏，英国在缅军队则根本没有斗志，在这种情况下，就急于要求中国军队对日军发起强力进攻，是其不妥之一。蒋介石和中国将领与日军作战多年，熟悉日军的优势和特点，反对贸然进攻，后来又反对在缺乏盟国有力的支援和协同下由中国军队孤立作战，求稳防败，有其合理性，但史迪威却视之为“卑怯”，由此对蒋介石和中国将领的抗日积极性作了过低的估计，是其不妥之二。中国人缅军初战失利，史迪威擅作主张，未经请示就决定向印度退却，途中环境恶劣，给养困难，造成部队非战斗减员过大，史迪威完全缺乏自责，是其不妥之三。

中国与美国、英国等共同抗击日本侵略，是同盟国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的关系。蒋介石、宋子文等人期望尽可能多地得到美国的援助，但是，同时又不能容忍对中国的任何歧视，要求待遇平等，能和英国、苏联等受援国一样，自己掌握租借物资分配权，也有其合理性。当时，中国有关机构腐败严重，蒋介石又歧视和排斥中共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因此，史迪威等应该也完全可以坚持对援华物资分配的建议权和监督权，但是，史迪威等却坚持援华物资是美国人生产的，必须由美国人分配，中国人无权过问，这就是大国主义的作风了。史迪威批评蒋介石是“一条贪婪、偏执、忘恩负义的小响尾蛇”。其中所说“偏执”姑置不

^①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第302页。

论；说蒋“贪婪”，无非是指蒋对美援的不断争取；说他“忘恩负义”，则是典型的“施主”的“恩赐”心态。

抗战时期国民党领导的军队确实存在着较多问题，需要训练和改造，蒋介石对军队的指挥也确实有不少问题，需要改进、改革，但是，史迪威作为外国人，不应越俎代庖，大量任用美国军官来控制 and 操纵中国军队，更不应图谋全面掌握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甚至制订暗杀计划，企图除去当时还是中国政府和抗日领导人之一的蒋介石。1943年10月之后，中国军队两面作战，既需要迎击日军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又需要开辟缅北、滇西战场，应付为难。在这一情况下，罗斯福听信史迪威、马歇尔等人的意见，利用中国军队在河南、湖南等地的失败，要求蒋介石将中国军队、中国战场的全部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自然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军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部分，也是蒋介石集团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命根子。蒋介石坚决抵制罗斯福的要求，甚至不惜为此与美国决裂，独立抗日，既反映出蒋介石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成分和他性格中的倔犟一面，也反映出他充分懂得，维护军权对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性。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战场愈来愈显示其重要性。史迪威于对蒋介石集团失望之余，寄希望于中共，主张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援华物资中应有中共抗日部队的份额，并且建议将胡宗南的部队调往抗战前线。这些主张都是正确的。蒋介石对此采取疑忌和反对态度，是其反共思想和立场的必然表现。

宋子文是史迪威来华的促成者，但又是撤回史迪威的最早提议者，为此，他在美国斡旋疏通，一旦撤回有望，而蒋介石却临事而惧，改变主意，由此引起两人间的巨大冲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有意冷落宋子文，甚至连开罗会议也不让作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参加。但是，蒋宋之间毕竟基本观点一致，利害一致，在宋子文上书“悔过”之后，蒋介石就原谅了他。此后，蒋

宋合作，共同促使罗斯福作出了召回史迪威的决定。

2006年10月1日完稿，原载拙著《抗战与战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四、国共矛盾

第三国际的解散 与蒋介石“闪击”延安计划的撤销

——论“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未成“潮”

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为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由列宁倡导，1919年3月2日成立于莫斯科。凡参加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成立以后，在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它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将苏联经验教条化，忽视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性和独创性，不能适应日益复杂化的各国国情和各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莫斯科草拟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同月22日，交《真理报》发表。至此，共产国际已经活动了24年。

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计划“重新研讨”国内政策

5月24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了有关报道，题为《共产国际解散，各国共产党应效忠其祖国，英美舆论大体表示欢迎》，其中引述了共产国际主席团声明中的部分文字，如：“在反希特勒大联合各国之中，一切大众，尤其工人先锋队之神圣任务，为以全力支持各该国政府之作战努力，俾迅速击溃希特勒徒众，并获得国际间以平等为基础之友好合作。”^①等等。

^①《中央日报》，1943年5月24日，第3版。

蒋介石迅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当日日记云：

第三国际正式宣布解散以后，无论内容真假如何，但共产主义，尤其是苏俄对其主义上之精神及其信用必根本动摇，乃至完全丧失。此乃中国民心与内政之一大事，岂啻世界思想之一大转变而已。故以后对于国内共产主义之方针与计划，应重加研讨，是乃对内政策之重要时机，但知此为共产国际之改变方式，而事实上决非真正解散也。^①

共产国际实际上受苏联共产党中央领导，为苏共中央的国际政策服务。蒋介石富于反共经验，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只是“改变方式”，并非“真正解散”，但此事对共产主义，对苏俄，都是重大打击，必将影响中国的民心与内政。他决定重新研究“对国内共产主义之方针与计划”，转变“对内政策”。

从希特勒进攻苏联起，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呼吁支援苏联。1941年，美国政府将苏联列入租借法案受援国名单。1943年5月，罗斯福派前驻苏大使、以同情苏联著名于世的约瑟夫·戴维斯访问莫斯科，面交亲笔信，提议与斯大林作个人会晤，以便促进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此际，苏联虽然取得了斯大林格勒的重大胜利，但也还迫切希望西方的支持。虽然共产国际早就有解散的打算，但是，苏共中央选择在戴维斯抵达莫斯科之后的第二天公布这一决定，也具有向西方世界，特别是向美国示好的意味。

5月25日正午，蒋介石举行参事会报，讨论外交形势、俄国对英美的政策转变等问题，认为解散共产国际是苏联与西方“积极合作”的重大举动。当日日记云：“此实为划时代之历史，而其关键全在美国总统之政策运用奏效也。”其后几天，蒋都在日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5月24日。

记中继续评价此事。

5月26日日记云：“此次俄国取消第三国际，积极与美合作之表示，则倭对俄更不能不进攻矣。”

5月31日《本月反省录》云：“此实为二十世纪上半期之惟一大事，殆为世界人类前途幸福庆也，而吾一生最大之对象因此消除，此不仅为此次世界战争中最有价值之史实，且为我国革命三民主义最大之胜利也。”

在研究共产国际解散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时，蒋介石也在研究如何利用这一时机。5月24日，他与陈布雷商谈“宣传方针”，“口授令稿”。25日，召开党务会议，“讨论对取消第三国际之态度与宣传方针”。他指示：一、对中国共产党问题，我应尽力向政治解决之途为最大之努力；在宣传上尤不可造成政府准备以武力解决之印象。二、对苏联应强烈表示亲善，以促其对华政策之继续演变。^①6月7日，他接见准备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周恩来和林彪。这一天，他正因为中国大量飞机被日机突袭炸毁而严厉批评周至柔，“大加斥责，继之以痛骂”^②，但是，他在和周、林谈话时却很平静，日记自称：“心平气和，应对自如。暴怒之后，应对敌党，能中和至此，殊非易易。”因为毛泽东在此前的函件中曾有愿到重庆“聆教”的客气表示，所以蒋托周、林二人带回一封给毛泽东的亲笔函，向毛问好，邀毛到重庆会晤。^③6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共处理之方针，外宽内紧，先放后收。”这时的《中央日报》上，只登西方世界对共产国际解散一事的评论，而不登中国方面，特别是国民党对此事的评价。复兴社分子张涤非于6月12日在西安召集会议，以“各文化团体”的名义致电毛泽东，要求解散中共，取消陕北特区。这一消息也

① 《王世杰日记》，1943年5月，〔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

③ 《中华民国史料初编》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第370页。

长期压着，没有及时发表。^①同月13日，蒋介石日记云：“对中共应付与方针如计进行，尚能虚心自如也。”这里只说“如计进行”，但是，并没有透露其具体内容。

事实上，蒋介石正在命令胡宗南悄悄地准备一项“闪击边区”的军事计划。

“闪击边区”计划曝光，中共发动“政治攻势”

6月17日，蒋介石致电胡宗南，询问“对于边区之准备现至如何程度”，要求胡“详复”。^②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将原来在黄河边上防御日军的两个军调到陕甘宁边区外围，作进攻边区的准备，预定6月10日完成一切部署，听候蒋的手令即行进攻。^③其计划是，首先攻占关中分区的淳化、枸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这五个县城深入胡宗南统治区，通称“囊形地带”。6月29日，胡宗南复电蒋介石：“对边区作战，决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任碉堡部队外，另以三师为攻击部队，先夺马栏镇，再向北进，封锁囊口。”电称，预定7月28日进攻，一星期完结战局。旋得蒋介石批示：“可照已有岗电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④

蒋介石要胡宗南“切实准备”，并且“极端秘匿”，但是，7月3日，在胡宗南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就将有关情况紧急密报延安。^⑤中共中央得到密报后，立即行动。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声称“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

① 这一消息一直压到7月6日，才由国民党中央社作了广播。

② 《蒋中正总统档案·筹笔》，第15431号。〔台北〕“国史馆”藏。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454页。

④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第366页。

⑤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第15-16页。

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电报指责胡宗南的密谋：“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联邦之作战任务。”^①6日，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及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10日，再电胡宗南，声称“若被攻击，势必自卫”。7月12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该文首先提出国民党将两个集团军调离黄河河防，准备进攻边区这一事实，然后向国民党提出尖锐质问。在很长时期内，延安一直担心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妥协，走上和汪精卫同样的道路，因此，社论连续质问说：

这些国民党人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强抗战么？难道进攻边区，倒叫做增强团结么？

如果你们将大段的河防丢弃不管，而日本人却仍然静悄悄地在对岸望着不动，只是拿着望远镜兴高采烈地注视着你们愈走愈远的背影，这其中又是一种什么缘故呢？

社论接着批判国民党对中共的“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以及所谓“封建割据”等指责，文章说：

“鹬蚌相持，渔翁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第258页。

文章写到这里，就将国民党放到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位置上。接着，社论指责国民党内“专门反共的人们”是日本的“第五纵队”，所说所行，都和敌人汉奸一模一样，毫无区别。社论要求蒋介石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河防，也号召爱国的国民党人行动起来，制止内战危机。

中共擅长动员群众和舆论攻势。7月8日，中央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①

7月9日，延安三万群众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号召边区人民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其后，各地先后举行群众大会。

7月10日，陇东各界万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表示“如果顽固派敢来进攻，就坚决地消灭它！”

7月11日，陕甘宁边区庆阳分区党政军万余人举行大会及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炮击边区，决心紧急动员，准备痛击顽固派的进攻。

7月13日，晋察冀边区各界万余人举行制止内战、挽救危亡大会，通电全国，要求国民政府制止挑动内战的行径。

7月14日，中共太行分局召开反对法西斯内战挑拨分子、援助陕甘宁边区紧急动员大会，到会千余人，邓小平讲话。

此后，陆续召开大会的还有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以及绥德市等。

“闪击”计划在还没有付诸行动时就提前曝光，蒋介石于7月10日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日，复电朱德，否认有调动军队，进攻关中囊形地区一事。^②12日，胡下令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13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告以“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在七月十日不得不电胡宗南改变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决

^①《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52页。

^②复电为唐纵所拟，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68页。

心，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11日，又致电彭德怀，告以“延安紧急动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①8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声称“此次反共高潮已被打退”。

其实，蒋介石只是命令胡宗南准备，“潮”尚未成，更谈不上所谓“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危险尚未过去，毛泽东显然乐观得太早了。

面对中共的“宣传反击”，蒋介石决定“犯而不校”

蒋介石认为，第三国际解散，苏联积极与美英拉关系，表明反共形势大好，因此，尽管延安方面又是发社论，又是开大会，但蒋介石并不重视。7月18日，蒋介石日记云：“中共对我陕北之准备，其所表现者为恐慌与叫喊，或能发生间接作用，能早就范。”又云：“对内政策，今日已有主动自在之运用余地，实为数十年来所未能获得之环境，尤其对共党为然也。”显然，蒋介石正处于志得意满的状态中，不过，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所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却使他很难受。7月21日日记云：“此次中共七七在延安《解放日报》所发表之言论，其对我个人发表之污辱与党政军恶口痛骂，乃为从来所未有，已将其暴乱、谬妄、背叛之劣根性发泄尽净。”他分析，这是中共内部分歧，毛泽东处于困难时的一种策略：“可知其内部分歧，不能维系，故毛泽东乃不得不用此制造我政府之压迫，以维系其内部于一时之策略，思之可怜可痛。”7月23日，蒋介石决定发布《劝告中共党员书》，说明对共政策。其内容大致如下：

甲、第三国际解散以后，期望中共能照其解散之要旨，真正成为忠于民族之国民，共同致力于反法西斯之战争。

乙、对中共方针，除对军令、政令必须贯彻统一，不论任何名义，除有妨碍抗战计划扰乱社会行动之外，皆取宽大为怀一贯

^①《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56页。

之方针，无不任其自由。中国之军队只有国民革命军一个军队，中国之军令只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一个军令。

蒋介石的这一份《劝告中共党员书》强调“宽大为怀”，但又强调军令、政令统一，实际上还是要取消中共军队和中共所建立的抗日政权。由于是面向中共党员的，所以蒋又特别攻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声称“共产主义只有马克思〔思〕化，决无中国化之理论，亦无中国化之可能。如有之，则共产主义中国化者，即陷于杀人放火、叛国殃民之流寇化、土匪化而已”。

第二天，蒋介石想起延安方面发表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和接着发表的其他文章，愈想愈气，认为中共“既非仁义所能感化，则除武力之外，再无其他方法可循”，但他又认为：“时间未到，惟有十分隐忍，必以犯而不校之态度处之，不可小不忍则乱大谋。”同日晚，他与陈布雷商量《劝告中共党员书》的发表问题，陈认为，话说轻了，不好；说重了，也不好，“轻重皆非之时，惟有暂取静默”，用事实证明中共的反宣传“全出诬枉”。陈布雷还引用了《论语》中的“天何言哉”一语，劝告蒋介石不要发表这篇文章。7月25日，蒋决定听从陈布雷的劝告，对《解放日报》社论“置之不理”。28日，蒋介石再次研究该社论，突发“奇想”，认为这是毛泽东“危害周恩来”的一项举动。周恩来和林彪离开西安后，于7月9日到达西安，13日离开。蒋介石认为，毛泽东选择12日发表社论，就是为了激怒国民党，扣留周恩来。因此，他决定让周平安回到延安。日记写道：“决以犯而不校处之，并使周安全回到延安，试观其内部如何变化也。以后对共匪方针，只有促成其内部变化，乃比用兵进剿之策略胜过千万矣！故对共除军事防范特加严密外，其他一切皆应放宽为主。”其实，周恩来早在7月16日就已经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蒋的这一则日记，以及他分化毛、周关系的想法，说明他对于中共和当时的中共领导层非常无知，而且情报极其迟钝！

蒋介石决定进攻延安，风暴将起

蒋介石思想中常常存在许多矛盾，因此在政策上，也常常举棋不定。抗战初期，他摇摆于战与和之间，和中共结成联盟后，他摇摆于“抚”与“剿”之间。所谓“抚”，即是用“政治方法和平解决”；所谓“剿”，则是军事进攻。在延安方面发表《质问国民党》一文后，尽管蒋已经决定对中共以“放宽为主”，但是，进入8月以后，他的军事进攻的念头再度泛起。

当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宣扬只有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在第七章中，蒋介石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共在陕甘宁等地建立的边区为“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是“武力割据”，宣称“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该书并称：“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①蒋介石这样写，实际上是在为武力进攻边区制造舆论。7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陈伯达所著《评〈中国之命运〉》。8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再次发表历史学家吕振羽的文章，批驳《中国之命运》。蒋介石认为，延安方面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意味中共将坚持“割据”，用“政治方式和平解决”的希望已经完全失去，“不得不准备军事”。^②8月7日，蒋介石日记云：“此时在我以延长至有利时机再加讨伐，一面应积极准备，好在危机已过，匪乱不能妨碍我抗战大局也。”次日日记云：“共匪非武力不能解决，惟在减轻其程度而已。”

延安方面的“宣传攻势”让国民党的“闪击”计划提前曝光，自然，很快传到国外。不仅俄国人担心，也让美国人不安。

^①《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第126页。

^②《杂录》，1943年8月25日，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

8月6日，苏联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在莫斯科发表《中国内部发生严重问题》一文，宣称重庆政府中的投降与失败主义者要求解散中共军队，对日进行光荣议和，其结果可能促成内战或日本之胜利。^①同日，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也得到消息：国民党限中共于8月15日之前“归顺”政府，否则“采取对付办法”，急得马歇尔立即派员向宋子文递送急电称：“现值我同盟国正应全力应付日本之时，如所报属实，诚可焦虑，能否即设法避免此种情事？”宋子文立即电蒋报告，他猜测，美方消息可能源于苏联“密告”，表示“一时无法查悉”。^②蒋介石接到宋的报告后，大为吃惊，但他立即肯定，这是俄国的宣传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嘱咐陈布雷即时回电解释。日记云：“俄国一方面发表中国局势严重将有内战之消息，一方面对美国政府当局造谣宣传”，“可知俄国谋我之切与其所谓解散共产国际者皆欺世妄诞”。日记同时指斥中共“为俄作伥”，“其罪恶则又甚于汉奸十倍”。^③这样，他就又觉得必须尽快以武力消灭中共了。当时，美英联军已经进入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垮台，苏联红军正在库克斯克与德军决战，苏军胜利在望。蒋介石8月13日日记云：“共匪之制裁非在欧战未了之前解决，则后患更大也。”“对共匪计划，无时或忘。”^④

抗战初期，在各方推动下，国民党决定邀请各方人士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咨询性的民意机构。8月14日，蒋介石决定利用参政会宣布并判决其所谓中共“破坏抗战之罪状，警告其速归顺中央，完成统一”。^⑤17日下午，蒋介石“研究陕北地形与剿匪计划甚久”。^⑥18日上午，蒋介石致函胡宗南。同日，将“对共匪军

① 转引自《徐永昌日记》，1943年8月7日。

②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194页。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8月11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8月13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8月14日。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8月17日。

事准备”、“对共匪宣传计划”、“对共匪之总方略”作为三大要事，要求“切实决定，以便付之实施”。^①一方面，他在日记中为自己打气，“不能再事被动消极，顾忌太多”；另一方面，他又要求自己“熟虑断行”，“不敢出以孟浪之举”。^②24日决定召胡宗南来重庆，同时拨发胡准备金1000万元，闪击延安计划即将进入实质阶段。^③

蒋介石开始估计进攻延安后的各种可能情况：甲、持久不能解决；乙、倭寇乘机进攻洛阳、西安。丙、俄国干涉，进攻西安。丁、中共向晋西、陇东、宁夏逃窜。戊、在国民党军反攻倭寇时扰乱后方。^④8月25日，蒋介石用半天光景研究国际与国内形势，做出结论，在日记《杂录》中写下了一份详细计划。计划分中共问题、苏俄问题、中共与苏俄关系三大部分。他说：

中共问题，无根本消灭之法，但不能不有解决之方案。如果始终要用十军以上兵力防剿陕北之匪区，则不如先捣毁延安巢穴，使之变成流寇，无立足余地为上策。

这就是说，蒋介石经过反复长考之后，终于下决心要进攻延安，使中共中央放弃延安，成为“流寇”，然后以十军部队在后方各地，一面防范，一面搜缴，各个击破，分别肃清。

计划规定以三个月为“积极准备时期”，以威胁与压迫之手段，造成其内部之恐怖状态；以宣传与政治手段为主，而以军事力量为从。关于进攻时机，蒋介石选在日苏和战未决与德苏战争未决以前，认为这是最“有利之时机”。计划写道：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8月18日。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8月20日、22日。

③《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8月24日。

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8月24日。

延安必须于德俄战争未了之前与倭俄未确切妥协之时，更须于我对倭总反攻之前，从事肃清为妥，过此则无此良机，如是共匪坐大，中国莫救矣。^①

蒋介石为什么选择这一时机，主要考虑的是苏联因素。在蒋看来，如果苏联的对德战争胜利，或者苏日妥协，苏联都将能腾出较多力量来支持中共，不利于蒋的反共军事。他认为，在亚洲大陆，苏联必然与英美“平行瓜分中国”，也必然要利用中共，所以必须“冒大险，赌存亡”，解决中共问题。

接连几天，蒋介石紧张研究“进剿陕北计划”，开始调动兵力，如：调青海骑兵两团到陇东，令宁夏方面积极准备中共向西突围等。他甚至开始研究外蒙古地形与道路，大概是为了堵住中共向北转移吧！同时，蒋介石也在拟订“对共匪罪行宣布之重点”。8月29日开始写了四条，后来又写了五条。显然，这是为了从舆论上加以配合。31日，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共匪不灭，则对内对外之隐忧皆不能消除也。故一切问题，皆应集中于剿共一点。”又在《本月大事预定表》中写道：“对共匪宣传与进剿方略之决定。”

第三国际解散后，蒋介石即计划进攻延安。不过，他极端保密，只向胡宗南个人透露，军事委员会的要员们都蒙在鼓中。直到9月1日，他才在会报会上向徐永昌等出示手示，拟即令准备进攻延安、边区、中共等。^②9月3日，他与陈布雷、王世杰商量，提议由军事委员会或政治部正式宣布中共“罪状”，使中外人士皆能了解其“奸谋”。9月5日，他决定对边区和中共部队进行“隔离”，不再承认其为中国军队，更不承认其为抗战团体，

^①《杂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8月25日，1943年。

^②《徐永昌日记》，1943年9月1日。

预定解散第十八集团军在重庆的办事处，封闭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同日，蒋介石召见胡宗南，“研究对共方略”……

乌云密布，风暴将起，中国再次面临严重的内战危机。

蒋介石悬崖勒马，紧急刹车

国民党高层对进攻延安的意见并不一致。9月1日的会报会，当蒋宣布进计划时，徐永昌当场就表示时机未到。他说：“如尚能容住时，则发动时间实有再容忍至敌不能大举进扰之时为妥。否则敌必乘机扰我关中，而共党亦必窜乱甘省。当此时，敌已因之张目，英美或且停顿其进援。”^①9月4日，在重庆黄山官邸会上，徐永昌再次表示：对共产党，“尚应敷衍”。^②徐的这些意见逐渐对蒋发生影响。

9月6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会议内容之一是由中央秘书处向会议提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然后通过《关于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之决议文》。这两份文件最初由幕僚起草，蒋介石不满意，认为前稿“内容几乎全为共匪宣传其实力强大”，“拙劣已极”！后稿则“实不能用”。他慨叹道：“本党文字力量，亦薄弱至此，非亲自动笔，几无法公布，奈何！”他不得不自己提笔修改。在这一过程中，他反复思考，反复征求意见，终于决定抛弃原来进攻延安的打算，再次倾向于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

会议开幕之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指责中共“诋毁政府，造谣惑众”，已成为“敌寇变相之第五纵队”。这是蒋为“总报告”所定下来的反共基调。但是，蒋介石要求先写上一段：

应说明政府对中共无其他要求，只求其放弃割据地盘，服从

^① 《徐永昌日记》，1943年9月1日。

^② 《徐永昌日记》，1943年9月4日。

军令，遵命调赴前线，不再集中部队，阻碍北战场榆林于绥远交通线，实践其廿六年之宣言，则中央仍予以一视同仁，不仅不忍弃绝，且必爱护有加。

同时，他要求在“决议文”中增加一软一硬两条：第一，对中共里边的“爱国自爱分子”，“如能自拔来归，则应予以优容，并量才器使，俾得为国效命”。第二，对中共里边的“政府理喻德化，皆已失效”的“集团”，“人人可得而制裁之”。这就说明，蒋这时计划对中共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分化两手。

9月8日，蒋介石产生了对中共“不用武力讨伐”，而用“法纪制裁”的想法。蒋在日记中写下四条理由：甲、中共干部之间、上下之间已经离心离德，只要持之以久，中共将不攻自溃，如在此际讨伐，反而促进其团结。乙、对中共用兵“无异割鸡而用牛刀，若果持久不能解决，徒长匪焰而与敌寇以复活之机”。丙、今日中共，已非江西时期可比，只须“封锁匪区，使之自缚阴干为唯一方略”。丁、中共的强项在宣传，在希望美国干涉，吾人所应最注意者，唯此一点。日记的这一段显示，蒋介石又倾向于不进攻陕甘宁边区了。

9月9日晚，蒋介石召开会议，讨论“总报告”和“决议文”草稿。参加者对其中“取消中共军队番号”等内容意见不一。孔祥熙称：“辞意已成必打之势，恐英美以我内战，停止援助。”蒋介石和刘斐二人坚持原议，认为“不如此，中央成何体统”。徐永昌提出质疑：“此虽系声罪，不致讨，但意在于讨。如准备讨之，第一是时间是否不当？其次是否居于被动？”辩论中，戴季陶、王世杰和外交部次长吴国桢等陆续加入讨论。吴报告称：苏联大使和比利时大使谈话，对“中央将进攻边区”表示愤慨。王世杰建议，须俟英美对日军事再进，与苏联关系进一步明朗化时，方可对中共严责。孔祥熙再次发言，担心此举将使英美推迟打击日本。蒋介石坚决主张发表“决议文”，会议同意蒋的主张，

但决定将取消中共军队番号等“处分语”删去。^①当夜，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中共的处分要点：甲、《新华日报》之监视；乙、共籍参政员资格之取消；丙、各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之封闭。对于中共在重庆的电台与秘密通讯机关，他一时没有想好处置办法，只写了“应重加考虑”几个字。^②

10日上午，徐永昌打电话给蒋介石，说明三点：1. 如判断中共即将大举出扰，或认为国军利于进剿，则“决议文”的语气可以加重。2. 如判断共军“大举出闹尚有待”，或缓以时日对国军有利，则“决议文”可以写得“再轻”。3. 此时中共如“窜甘宁”，则日寇有窥视关中的可能，因此“决议文以轻缓为佳”。下午，蒋介石打电话给徐永昌，询问对“决议文”是否仍有意见。徐答：如共军“窜扰甘凉”等地，日寇进窥关中，而我又不能在短期内肃清共军，则共军又可能进入新疆，得到俄人帮助，共同占领新疆，则其祸患将超过九一八事件。徐的意见对蒋起了作用。当晚，蒋介石约集文武干部开会，再次从“法律制裁”后退，认为从国际环境与战争局势考察，“尚非制裁之时机”，决定将原定隔离边区及取消中共军队名号两点“完全取消”。

11日晚，蒋介石约集三十余人召开座谈会，其讲话的调子完全改变。他表示：中美英苏四国协定未成，滇缅路尚未开通，贸然进攻，万一不能速决，后果至为恶劣，故目前仍以“避战”为上。蒋提出三种处理方式：1. 封锁而严厉处分；2. 声罪而不致讨；3. 一字不提，而同时在英美宣传其“罪行”。他称此为“曲线的对付”。何应钦则称：全会既开，纵不用书面，亦须有口头报告，或者轻描淡写地作一决议。^③当日蒋介石日记云：“如我进攻迁延不决，则匪势更张，国际舆论对我更劣。如我能速战速胜，则匪不过迁移地区，不能根本消除其匪党，而我国内战既

① 《徐永昌日记》，1943年9月9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9月9日。

③ 《徐永昌日记》，1943年9月11日。

起，复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他决定，对边区，“围而不剿”，“用侧面与非正式方法以制之”，“万不宜公开或正面的方式应付也”。^①

12日全会例假休会。中午，蒋介石召集相关人员再次会商。他提出，不决议，不宣布，只将“总报告”译出，向英美宣传。他征询徐永昌的意见，徐称：如无所表示，国际间不免猜测、疑虑，建议历述中共的“不法自私”事实，要求其实践抗战开始时的诺言，期以“自新”。^②第二天的会议进程表明，蒋介石采纳了徐的意见。

13日为全会最后一天，由中央秘书处宣读经蒋介石修改的“总报告”。该报告从军事、政治、经济等三方面对中共进行全面指控，诬称中共“六七年来破坏抗战，以及违法乱纪之行为，事实俱在，无一不与该党所发表之共赴国难宣言相违背，理应早予依法处治”，但是，报告最后仍然表示希望中共“实践诺言，服从中央，使政令、军令保持统一，意志力量得以集中，以求抗战之胜利”。^③其后，蒋介石即席“指示”：

个人以为全会对此案之处理方针，要认清此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如各位同意余之见解，则吾人对共党之言论，无论其如何百端挑衅，其行动无论如何多方扰乱，吾人始终一本对内宽容之旨，期达精神感召之目的。^④

随后通过的《决议文》声称，对中共将“不惜再三委曲求全，加以涵容”，希望中共能遵守抗战初期的宣言，“幡然自反”。^⑤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9月11日。

② 《徐永昌日记》，1943年9月12日。

③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231、2234页。

④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841页。

⑤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上述文件表明，蒋介石此时继续坚持反共立场，其对中共的敌视、仇视丝毫未变，但是，由于对日抗战仍是当时的首要任务，也由于美苏两国都不赞成中国内战的国际压力，以及中共多年来所表现的顽强生命力和战斗力等原因，蒋介石一时还不能也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关系，不得不停止原定的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

一场严重的内战危机避免了。1943年年末，蒋介石在《感想反省录》中写道：“十一中全会期间，反复穷究，密察利害，以后改变计划，放弃军事行动，于是全局危而复安。”^①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

如何对待毛泽东： 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

抗战胜利，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共商大计”

1945年8月10日。

下午8时多，蒋介石做完默祷，忽然听到设于附近求精中学的美军总部传来一阵欢呼声，紧接着，是噼里啪啦的炮竹声。蒋介石问身边的蒋孝镇，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嘈杂？蒋孝镇回答：听说敌人投降了。蒋介石心头一阵惊喜：日本投降了？！他让蒋孝镇再去打听。不久，各方传来正式报告，日本政府宣布，除保持天皇尊严外，其余均按照中、美、英《波茨坦公告》所列条件投降。消息证实，日本确实投降了。苦熬八年、日盼夜想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当时，蒋介石正在宴请墨西哥驻华大使。抗战胜利，蒋介石有许多事急待决定、处理。偏偏这位大使不识相，不断提出各种问题，纠缠不休。外交部次长吴国桢两次提醒，这位大使才很不情愿地离去。蒋介石立即召开军事干部会议，按照早就拟定的令稿向前方各战区发电，并令吴铁城、陈布雷提出宣传与各党部应办之事，已经深夜12点了。

8月11日清晨，蒋介石约见美国大使赫尔利（Hurley, Patrick Jay，蒋介石日记作哈雷），对杜鲁门总统提出的咨询意见做出答复。蒋称：自己一贯主张，日本国体由日本人民自选。至于要求天皇出面签订降书以及将日本置于联军统帅之下各条，完全同意总统的意见。9时，再次约见赫尔利和魏德迈，就沦陷区军事紧急处置等问题表示看法。11时，到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提出今后大政方针与各种处置。

蒋介石最焦虑的是接受日军投降问题。早在8月10日深夜12时，朱德就以延安总部总司令的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要求敌军“于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如“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第二天，又连发第二至第七号令，命令中共所掌握的抗日部队“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①当时，在华日军有百万之众，不仅占有中国许多城市和交通线，而且拥有大量战略武器和物资。谁最早、最多接受日军投降，谁就将取得最多、最大的胜利果实。因此，11日这一天，蒋介石给各方发了许多电报，其中一份最紧急的就是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该电声称：“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要求该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②这份电报实际上剥夺了共产党人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8月14日，蒋介石做出了又一个重大决定，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共商大计”。电云：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第273-274页。

^②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8，第2626-2627页。

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①

抗战八年中，蒋介石和共产党维持着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他的日记中时而称“共党”，时而称“共匪”，飘忽不定。现在，他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斯大林两电催劝，毛泽东决定赴渝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颇感意外。1937、1938两年，蒋介石实行和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努力抗战，毛泽东比较满意。在延安作报告的时候，给过蒋很高的评价。但是，1939年，特别是1940年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对蒋的印象就愈来愈坏。接到蒋介石的邀请电后，毛泽东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想去。8月16日，毛泽东为朱德起草致蒋介石的电文，提出六项要求，其主要内容为：解放区一切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接受所包围的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解放区军队接受投降，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国民党军队接受投降。抗战八年中，国民党的部队退守西南，而中共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则深入敌后，因此这当然是一个有利于共产党人的方案。紧接着，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我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②

毛泽东的这通电报，没有说不要去重庆，而是要蒋表态，待表态以后再看。当时，美国正在调派飞机、军舰，向原为日军占领

^① 《中央日报》，1945年8月16日。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7页。

的地区运送国民党军，毛泽东曾一度雄心勃勃地计划在上海、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夺取这些大城市。^①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但不可不防其突变叛乱也。”^②当晚，他夜半醒来，反复思考，推敲词句，于20日再致毛泽东一电，声称“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接着声称，受降办法由盟军总部规定，不能破坏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盟军规定，亦持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资格将置于何地”？批评、责问之后再给朱德戴高帽子，声称“朱总司令果为一爱国爱民之领袖，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电报最后重申邀请：

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收益百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③

电报的这一段话写得情词恳切，似乎不容拒绝。不过，毛泽东仍然不想遽尔应邀。22日，毛泽东再次复电蒋介石：

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慰！^④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8-9页。

②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18日。

③ 《中央日报》，1945年8月21日。

④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9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8，第28页。

抗战中，周恩来长驻重庆，多次和蒋介石折冲周旋，由周作前驱，作“侦察战”，了解蒋的意图，自然再合适不过。^①蒋介石看到毛泽东仍然不想来，于23日再次发电邀请：

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②

古有刘备“三顾茅庐”的美谈，现在蒋介石是三电邀请，毛泽东似乎不能再次推拒。其间，斯大林曾两次致电毛泽东，声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又称：“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际、国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③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很不高兴，“甚至是很生气”，但是，斯大林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指导者，毛泽东不能不尊重他的意见。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说：“我们要准备所有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④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630页。

② 《中央日报》，1945年8月25日。

③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308页。

④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1页。

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①

对毛泽东的这份回电，蒋介石的感觉是“温驯已极”，“横逆与驯顺，一周三变”。^②在蒋介石三电毛泽东期间，赫尔利大使也曾两电表示，愿意到延安迎接。25日，毛泽东复电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魏德迈（Wedemeyer, Albert），对赫尔利来延表示欢迎，声称愿与周恩来将军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同日，他和即将回太行根据地的刘伯承、邓小平谈话，要他们回到前方以后，放手打，“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③28日，毛泽东由赫尔利与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陪同，与周恩来、王若飞同机抵渝。抵达时，毛泽东身穿蓝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布鞋。一手挥着巴拿马式的盆形帽，微笑着走下飞机。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开始了。

初谈不顺

早在8月26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下了“与毛商谈要目与方针”，包括“共部之处理”、“国民大会办法”、“参加政府办法”、“释放共犯办法”等内容。^④27日日记云：“对共方针，决予其宽大待遇，如其果长恶不悛，则再加惩治，犹未为晚也。”^⑤28日，蒋介石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对毛泽东来渝后的方针，确定“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⑥28日下午3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2页；《战后中国》（二），第29页。

② 《上周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25日。

③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3页。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26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27日。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28日。

时许，毛泽东等人到达重庆机场，毛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

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团结与富强的新中国。^①

当晚，蒋介石在林园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特意将毛安排在自己的对座，以示“诚恳”。宴会后，又邀请毛泽东下榻林园。

毛泽东等来渝前，中共中央曾发表《对时局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实施六项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物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对于这六条，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皆应留有余地，而不加以正面拒绝，但须有确定前提。”^②8月29日，蒋介石与毛泽东举行第一次会谈。蒋称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并称中国无内战。毛泽东则称，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蒋提出谈判三原则：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这个“三原则”，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确定前提”。当晚7时，蒋介石亲赴毛泽东所住莲屋访问，约谈一小时，蒋自称属于“普通应酬”。^③3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为德威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④

9月3日，毛泽东通过周恩来、王若飞向国民党代表张群、

① 《为和平而奋斗》，新华日报馆，1945年11月版。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29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29日。

④ 《上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31日。

张治中、邵力子提出十一条谈判要点，其主要内容为：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现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暂留原地待命。

八、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委员，及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公平合理的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解放区部队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设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释放政治犯；保障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机关。^①

毛泽东所提十一条中的“实现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等内容，蒋介石自然满意，他反感的是其中的九、十等条，批评其为“要求无贖”。9月3日，蒋介石日记云：

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

^①关于“十一条”，文本各有不同，分别见《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8-19页；《周恩来年谱》，第632页；《战时中国》（二），第39-41页。其中第十条关于北平行营主任的文字，采用毛年谱。

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共军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之三倍，最后将欲廿四师为其基准数乎？共匪诚不可以理喻也。此事唯有赖帝力之成全矣！^①

4日晨5时，蒋起身祷告，“愿共毛之能悔悟，使国家能和平统一也”。上午，他约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听取昨晚与周恩来谈话经过。蒋自感“脑筋深受刺激”，叹息“何天生此等恶劣根性，徒苦人类乃尔”！^②他将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群等。其主要内容为：

一、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

二、承认解放区，为事实绝对行不通。

三、拟改组原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在国民大会产生新政府后，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中央政府。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额。^③

国民党1927年执政后，长期实行以“一党专政”为核心的“党治”，因此受到国内外各阶层的严厉批评。1936年，国民党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政府，宣称将通过此途径“还政于民”。除选举代表1200人之外，国民党的中央及候补执、监委为当然代表，国民政府并直接指定代表240人。由于这批代表是在国民党一党包办下产生的，又事隔多年，中共主张代表重选，蒋介石则主张增补、调整，坚决反对重选。

按蒋的想法，要将毛泽东的提议从速公布示众，但张治中等认为为时过早。同日下午5时，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军事委员会召开的抗战胜利茶会。会后，蒋、毛再次直接商谈。从9时起，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受命与周恩来、王若飞开始第一次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9月3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9月4日。

^③ 《战时中国》（二），第44-45页。

会谈。至10月8日止，双方共会谈13次。

从9月4日起，蒋介石即将和中共谈判的任务交给张群等三人，而他自己，则退居幕后。但是，他仍然时时研究苏俄与中共动态，牢牢掌控谈判，日记中有许多对谈判情况的记载：

9月8日，蒋介石《上星期反省录》云：“共毛各种无理要求与不法行动，自受俄之主使，余亦惟有一意忍耐处之。”

9月11日日记云：“余今日对俄、对共，惟有以诚与敬对之，未知果能收效否？”

9月12日正午，蒋介石约毛泽东、周恩来到林园共进午餐。日记云：“余示以至诚与大公，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彼尚要求编其二十八师之兵数耳！”^①

9月13日日记云：“嘱毛泽东访魏德迈。”

9月15日《上星期反省录》：“共毛近来从容不迫，交涉拖延之故，其必等待美国政策之转变，期望国际共同干涉内政也。”

9月17日日记云：“正午，约毛泽东、哈雷照相谈话。据岳军言，恩来向其表示者，前次毛对余所言，可减少其提军额之半数者，其实为指四十八师之数，已照其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数也。果尔，则共匪诚不可与言也。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二十八师之数字也，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

9月20日日记云：“目前最重大问题为共毛问题。国家存亡，革命成功，皆在于此。”“不能不为国相忍，导之以德，望能感格也。”

9月21日日记云：“考虑共党问题对国家祸福利害甚久，此时主动尚在于我，不患其作恶卖国，吾仍以理导之。”“晚与哈雷谈共党问题，示以军额最大限为廿师，如其仍要求华北各省主席，则不再谈矣。”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9月12日。

9月22日《上星期反省录》云：“中共阴谋与野心虽被阻制，但险象仍在，不可稍忽，事已到了最大限度，彼仍不接受，则惟置之不理，任其变化，以此时主动全在于我也。”

从上述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虽然笑脸相迎，但内心却充满敌意。

谈判中，张群等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曾于9月8日对写了一份书面文件，逐条回答中共所提谈判要点。其第一项称：“和平建国自为共同不易之方针，实行三民主义亦为共同必遵之目的。”第二项称：“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承明白表示，甚佩。”第三项称：“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规，今可即行承认。”其他如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参加受降工作，停止武装冲突，释放政治犯，严禁特务逮捕、拘禁以及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原则，国民党代表都表示“自可考虑”，或“自无问题”，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所不能接受的是“重选国民大会代表”、“解决解放区办法”以及“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等问题。^①当时，毛泽东要求将中共部队改编为48师，而蒋介石只允许以20师为最高限额。至于五省主席、六省副主席、四市副市长、北平行营主任等职，蒋介石觉得中共是“狮子大开口”，根本不想考虑。

就在两党谈判僵持不下之际，蒋介石却于9月27日偕宋美龄飞往西昌，休息去了。

蒋介石的心态发生180度大变化， 企图扣留并“审治”毛泽东

在去西昌的飞机上，蒋介石读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提问中，毛泽东谈到，解放区已经拥有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

^①《战时中国》（二），第41-44页。

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①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勾起了蒋对中共所提十一条的回忆，也勾起了蒋郁结在胸中对中共和毛泽东长期的仇视。其实，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共早已不是和国民党并肩抗敌的战友，而是“汉奸”、“叛逆”；毛泽东也不是他盛情相邀的贵宾，而是“罪魁祸首”。他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

如欲不惩治汉奸，处理叛逆则已，否则非从惩治此害国殃民，勾敌搆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也。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饜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②

蒋介石表现在这里的情绪已经不是他在日记中一再表达的“诚”与“敬”，而是一股强烈的刚暴之气。他明确表示，要对毛泽东加以“审治”。

西昌，当时西康省的重要城市，位于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中部，始建于汉。蒋介石夫妇到达西昌后，下榻当地名胜邛海。从雾霾层层的重庆转移到风清鸟啭，花笑山明之地，蒋介石心情为之一舒。但是，他仍然系念在重庆谈判桌上和中共代表的斗争，反复考虑“共毛对国家前途之利害与存亡关系”。29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中共之罪恶”六条：

甲、资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

乙、借民主之美名而施阶级独裁之阴谋。

① 《重庆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第14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9月27日。

丙、违反四项诺言之事实与经过，欺民欺世，忘信背义，莫此为甚。

丁、藉民选之名义以行其拥兵自卫，割据地盘，奴辱民众，破坏统一之实。

戊、破坏外交政策，捕杀盟军官兵，阻碍联军行动，破坏国军反攻计划，诋毁英美参战为帝国主义之战争。不仅反对政府联合英美作战，而且始终破坏中苏国交之增进。

己、勾结敌军，通同汉奸，倾害国本，颠覆政府，以组织联合政府为过渡手段，而达到其多数控制，成立第四国际专政之目的。

在抗战中，国共两党虽然结成了统一战线，但国民党时刻想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将中共的活动纳入自己的政令、军令之下，而中共则坚持独立自主，力图突破国民党的限制，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双方虽共同对敌，但彼此间又充满限制和反限制，摩擦和反摩擦的斗争。从上述蒋介石列举的“罪状”里，人们不难看到，抗战虽然胜利了，但蒋介石积累的对中共的误解有多深，扭曲有多严重，仇视有多强烈。

宋美龄看到蒋介石如此忙碌，笑着说：你到西昌来哪里是为休息呀！蒋介石没有解释，但他心想：“孰知余此来，比之平时之思考与工作更为迫切而急要也。他日统一如能告成，或得之于西昌游程中也。”蒋接着写其所谓中共“罪状”：

庚、企图割据华北各省，盘踞热察，隔绝中苏联络，破坏中苏联盟，以期扰乱世界和平之建立。

辛、擅设军事委员会名义，劫持第十八集团军，促使新四军之叛变，反抗军令，毅然以共产红军自称。

壬、擅设延安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割据地盘，反对中央政令，私发钞票，擅征租税，强种鸦片，私设关卡，与敌伪公开贸易，交换货物，以接济敌军，助长侵略，此即中共所谓对敌抗战也。

癸、迹其宣传，直接以攻讦政府，诬蔑盟军，间接以协助敌伪，毁灭国本，必欲中华民国变成为第四共产国际而后已。

子、共军所到之地，所谓民选政府之实情：（甲）信仰言论行动皆为绝对统制而无自由，否则即以反动汉奸与叛徒之罪而加以逮捕。传教士绝对不能传教，且不准其进入其民选区。（乙）人民之纳租、出捐、抽丁、派粮不惟因战后而不奉令停止，且变本加厉，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抗战期间到处煽动人民，对政府抗粮抗役，以不出粮、不征兵，且借各种神道邪教以愚惑民众。

写到这里，蒋介石特别补充了一句：“以危害国家、破坏国家之事实，应略举要点述之。”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蒋介石兴有未尽，还要写下去。

蒋介石写这些“罪状”，当然不是一时兴至，“无所为而为”，显然，他是在为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作准备。

然而，毛泽东应邀，为两党谈判而来，要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大使赫尔利的保证和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想到苏联政府可能的反应。所以，他在日记里为提醒自己而特设的“注意”栏下写下了两条：一、哈雷（即赫尔利）保证共毛之安全函电，美国政府之地位及其预想之态度，应加研究。二、俄国之表示如何，亦应切实研究。^①

当时，蒋介石既要依靠美国，也不敢得罪苏联，甚至还想讨好。例如，在伦敦的中、美、英、苏、法五国外长会上，英、美、法为一方，苏联为一方，而重庆国民政府则“中立”，“对俄表示同情”。自然，蒋介石在采取行动之前，不能不将美、苏这两个大国的可能反应想清楚。

10月1日，蒋介石见到了中共提出的一份“公告稿”，其中提到毛泽东来渝的安全以及赫尔利的保证问题。蒋介石看到这篇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9月30日。

“公告稿”以后，十分反感。日记中写道：

此与会谈全无关系，仅为其贼胆心虚之表示。彼全不思本国商谈要由外人保证之耻。不思哈雷即使为其保证，亦已失效也。盖哈雷保证共党统一团结提议者之安全，并未保证其通敌卖国反动派之生命。次此为内政问题，无论任何外人，不能干涉我政府对内乱犯之处治，而且哈雷回国之前已对共党声明，今后国共问题全为中国之内政，不能如往日敌军未投降时，可由其盟国共同作战之关系参加调解，今后应由中国双方自动直接解决也。^①

蒋介石要扣留并“审治”毛泽东，赫尔利事前的保证是一道不能回避的门槛。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这篇日记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找解脱，力图证明，他的举动和赫尔利的保证没有冲突。

1936年国民大会的代表选出后，由于第二年抗战爆发，代表大会一直未能召开。抗战后期，蒋介石为了对抗中共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便于1945年元旦宣布，可以不待抗战结束，提前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政府，以使其统治合法化。同年3月1日，蒋介石又向宪政实施协进会宣布，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毛泽东到重庆后，中共在谈判中除主张国民大会代表须重选外，当年制定的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五五宪法草案》等也都须修改，召集大会的日期须延缓。对此，蒋介石都强烈反对。10月2日，蒋介石日记云：

共党反盗为主，其到重庆，在军事政治上作各种无理要求犹在其次，而且要将国民政府一切法令与组织根本推翻，不加承认，甚至实施宪政之日期与依法所选举之国民大会亦欲彻底推翻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0月1日。

重选，而代之以共党之法令与组织，必使中国非依照其主张，受其完全控制而成为纯一共党之中国，终不甘心。^①

想来想去，蒋介石“审治”毛泽东，彻底解决中共问题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几乎难以遏制了。

龙云长期统治云南，形成半独立状态。蒋介石早就想解决龙云，其办法是任命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将他从昆明老窝中调到重庆。但蒋介石又担心龙云不肯入彀，作了武力强迫的准备。10月3日，杜聿明的军队武装包围云南省政府，完全控制昆明，龙云的滇军仅有小反抗。蒋介石很高兴，认为龙云“经此一击，彼当不能不俯首遵命乎”！^②几天之后，龙云被迫到重庆接任新职。

龙云问题解决了，蒋介石的思绪再次回到中共问题上。当时，伦敦的五国外长会议因美苏对立，无果休会。蒋介石认为“俄国实力已耗，外强而中已干”，是他解决中共问题的好时机。10月5日日记云：

故于此时应不必为俄多所瞻顾，积极肃清内奸，根绝共匪，整顿内政，巩固统一为第一。如其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则彼干涉我内政，侵害我主权，否则仍使共匪余孽捣乱边疆，此乃彼一贯政策。不有此事，亦必不免也。余以为最多新疆暂失，东北未复而已，而本部之内，只少可以统一矣，此乃天子之时也。

读者应该特别注意这一段日记中的“不有此事”一句中的“此事”二字，显然，其内容就是扣留毛泽东，“审治”毛泽东，和共产党决裂，掀起剿共战争，“根绝共匪”。蒋介石估计，一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0月2日。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0月3日。

且他做了“此事”，苏联不会善罢甘休，有可能占领新疆，拒绝从东北撤兵。但是，蒋介石觉得还是合算，他还是要做。

毛泽东在重庆，如鱼游釜内，有点“悬”了。

蒋介石再次 180 度大转变，决定授予毛泽东等 “胜利勋章”，并且礼送回延安

然而，就在蒋介石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做“此事”的时候，他却又犹豫起来了。

10月6日，蒋介石反省上周作为，觉得龙云问题解决，西南巩固，“建国已有南方统一之基础”，“心神乃得自慰”。但是，对于解决中共问题，他觉得国内、国外反对者很多，困难很大。日记写道：

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蒋介石的“郑重考虑”是必要的。如果他悍然扣留并“审治”毛泽东，不仅美国、苏联通不过，在抗战八年中发展起来的百万中共武装通不过，那时已经站在中共一边的民主党派自然也通不过。其结果，必将出现“再起纷扰”的严重局面。这么一想，蒋介石又把他那颗强烈跳动的想扣留并“审治”毛泽东的心摠住了。当天正午，蒋介石与左右讨论中共方面所起草的《会谈纪要》以及毛泽东的离渝时期，蒋介石“立允其速行，以免其疑虑”。^①

10月8日，正午，蒋介石宴请国民党中央常委，讨论两党谈判情况。当时已经有了一份《会谈纪要》的初稿，准备公布。吴稚晖反对发表这份《纪要》。关于国民大会召开日期，会上意见分歧，莫衷一是，蒋介石只能宣布休会，另加研究。会后，蒋介石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0月6日。

石审阅《纪要》，采纳中常委们的意见，作了部分修改。又派叶楚傖去做吴稚晖的工作，说明这是将中央对共产党的“政治解决”的方针明示中外，可以体现中央“仁至义尽”的态度云云，吴才同意公布。

10月9日，毛泽东向蒋介石告别。蒋问毛：对国共合作办法有无意见？据蒋日记记载：“毛吞吐其辞，不作正面回答。”蒋对毛称：“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蒋继称：

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①

这段话，蒋介石觉得他是向毛掏了心窝子，毛的反应，据蒋日记记载：“彼口以为然”，但是，蒋不大相信，所以接着写道：“未知果能动其心于万一，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当日正午，蒋介石继续与毛泽东谈话，并且设宴招待。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共同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这个《纪要》由周恩来起草，是毛泽东、周恩来来到重庆后和国民党代表多次商谈的结果，也是双方求同存异、互谅互让的结果。共十二条，其中《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属于总纲性质，双方一致确认：“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将在蒋主席的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0月9日。

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纪要》宣布，双方“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①《纪要》并称：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其他双方一致同意或基本一致的条文有人民自由问题、党派合法问题、特务机关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等。毛泽东后来曾说：“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②有些问题，难度较大，如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表示愿缩编至二十四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国民党则表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双方意见趋近。有些问题，双方争持不下，如“国民大会问题”，中共坚持代表重选，延缓召开等主张，国民党则坚持原选出之代表有效，名额可以增加。中共表示，“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坏团结”，双方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先后提出四种方案，国民党均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为理由加以拒绝，中共方面只能提出，继续商谈。

《纪要》的签字是大喜事。饱经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终于向避免内战、化干戈为玉帛前进了一大步。这一天还发生了另一件喜事。这就是，国民政府发布授勋令，对大批抗战文武有功人员授予“胜利勋章”。蒋介石考虑再三，在受勋人员名单中加进了朱德、彭德怀、叶剑英三人，又加进了毛泽东和董必武，还加进

^① 《重庆谈判资料》，第19-20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3页。

了邓颖超。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他这么做的原因：

双十节授勋，特将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有罪，惟恐政府发其罪状，故亟欲抗战有功表白于世，以掩盖其滔天罪恶。余乃将顺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乎？然而难矣哉！^①

世界授勋史上大概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前例：内心深处认为其人有“滔天罪恶”，但是，还要为其授勋，表扬其功绩。“彼等自知”以下云云，揣度中共领导人心理，自作聪明，昏谬可笑！

同日下午4时，蒋介石到桂园访问毛泽东，为其送行。毛泽东提出，今晚住到蒋介石的林园官邸去。蒋介石觉得毛泽东可能“男生问题”，但仍然表示欢迎。蒋介石的这次拜访，前后只有10分钟。会谈后，毛、周同蒋一起乘车到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国庆祝酒会。酒会后，蒋、毛再次谈了半小时。毛泽东住到林园后，向蒋介石提出：1. 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待自己回延安，召开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后再定办法；2. 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由于蒋早就宣布，要在当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觉得国民大会召开无期，气得在心里狠狠地咒骂毛泽东。^②不过表面上，蒋介石仍故作平静，努力“和婉”地对毛说：“如此态度，则国民大会无期延误，我政府不能如此失信于民也。”又说：“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但至十一月十二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③蒋还向毛表示，即使政协会不能如期召开，政府也不能不于11月12日下令召集国民大会。谈至此，蒋向毛告辞，约定明晨再谈。

^①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0月13日。

^② 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0月11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0月11日。

10月11日晨8时，蒋介石约毛泽东共进早餐。餐后，二人再次对谈。除重复前几次谈话要旨外，蒋介石用非常坚决的口吻向毛泽东强调，“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所迁就，否则不能成为国家”。^①毛泽东则答以此事留待周恩来与王若飞在重庆继续商谈。通过抗日战争，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19个解放区，拥有1亿多人口。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这么大一块土地，这么多人口处于中共统治之下。

9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车到九龙坡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重庆各界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到机场送行的共约500余人。毛泽东发表了简短谈话：“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离开延安前，对到重庆后可能的危险作了最充分的估计。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但是，他估计，“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可以去，必须去”，“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②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正确的。

毛泽东告辞离去后，蒋介石独自在林园中逛了一周，心里想的是：“共党不可与同群也。”他似乎已经忘记，8月9日，他还和毛泽东谈过：“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12日，蒋介石回想他和毛泽东在重庆的多次接触，觉得共产党的这位领袖不好对付。日记云：“共毛态度鬼怪，阴阳叵测，硬软不定，绵里藏针。”对于中国的未来，他有“荆棘丛生”的感觉，不过，他仍然充满自信，相信在今后的较量中，他可以战胜毛泽东。其《反省录》云：“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0月11日。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4页。

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仍以政治方法制之，使之不得不就范也。政治致曲，不能专恃简直耳！”^①蒋介石一生作过许多错误判断，但是，其中最大的误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断。历史证明，蒋介石的“一握”并没有能控制毛泽东，相反，倒是毛泽东跳身出来，让中国在三四年的时间内天翻地覆，并且将他赶到了海峡彼岸。

原载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杂志，2008年1月号。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10月13日。

五、对内政策

蒋介石亲自查处 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

——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

孔祥熙等贪污巨款

发行公债是吸收社会资金，解决国家财政急需的重要办法。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国民政府为解决日益膨胀的财政需要，用美国对华5亿贷款中的1亿元作为基金，在西南、西北地区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每元折合国币20元。人民以国币购买，待抗战胜利后兑还美元。当时宣传称：“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人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其手续是，蒋介石以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主席名义，致函各省分会主任委员（省主席兼）、副主任委员（财政厅长兼），转令各市县劝储支会正副主委，按规定指标向各阶层摊派，照比率折缴国币，上解省劝储分会，向中央银行分行兑换美金公债券。实际上，由国民政府财政部交中央银行国库局分发各地银行销售。

同盟胜利美金公债虽有美金作底，但各地人民均采取多购不如少购，少购不如不购的消极态度，发行情况并不很好。至1943年秋末，全国实际售出还不到预定计划之半，约4300万美元。已购之人，也不很相信将来会兑还美金，因此大多在购得后即转

手求脱。在黑市上，美金公债券一元仅值国币 17—18 元。但是，其后由于通货膨胀，国币贬值，美金公债券的价值逐渐提升，由美券一元可值国币 30 元发展至可值 273 元。

由于美金公债券价格持续上涨，身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于 1943 年 10 月 9 日致函蒋介石，以“顾全政府之信誉”，“如不筹维办法，将来再请援助恐有妨碍”为由，申请于 10 月 15 日结束美金公债的发售。他向蒋表示，“当督促行局主管人员妥为办理，以期早日完成。”^①届期，财政部密函国库局，命令立即停止销售美券，各地尚未售出的美券，全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上缴国库。

按道理，美金公债在销售了一段时期后停止销售，并无不可。但是，当时的国库局局长吕咸却从中看到机会，企图乘机舞弊，损公肥己。他于 1944 年 1 月命债券科科长熊国清代拟了一个签呈，中称：“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贷，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用副国家吸收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这份签呈写得冠冕堂皇，似乎既符合国家发行公债的目的，而且照顾到国库局员工的利益。但是，当时美券一元的最高市格已经飞涨到国币 250 元，而国库局的同人却可仍以 20 元的低价购得；尚未售出的美券 5000 余万元，其市价将达 125 亿国币。按照吕咸的办法，这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就可以成为国库局少数“同人”的囊中财富。对于这样一个损公肥私的签呈，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居然批了一个“可”字，并且加盖了“中央银行总裁”的官章。^②

① 《孔祥熙致蒋介石函》，1943 年 10 月 9 日，〔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特交档案/财政/第 2 卷/金融，财政 2-3，3/48098-1。

② 据曾任孔祥熙官邸秘书处秘书，后任国库局局长的夏晋熊称：“国库局长吕咸看到郭（景琨）被捕，坐立不安，因为发给国库局职员这笔美金公债，孔只是口头同意，没有证据，等孔一回国，吕咸写了个倒填年月的签呈，恳求孔补批。孔居然也照补。”见夏晋熊：《在孔祥熙官邸的见闻》，《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 23 页。

事实上，“调剂同人战时生活”也仍然是一句掩人耳目的官话。据后来在国民参政会上提案揭发的参政员陈赓雅说：吕咸取得合法手续后，于1944年2月首先孝敬孔祥熙美金公债券350万元，其后，又用以票换票，买空卖空的办法贪污美券近800万元。两项合计，共1150余万美元，折合国币约26.47亿元。^①

国库局同人检举，蒋介石开始密查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孔祥熙、吕咸等人如此明目张胆地舞弊、贪污，自然不能做得天衣无缝、船过无痕。1945年春，国库局的几个知情的年轻人开始向重庆国民政府秘密检举。3月19日，蒋介石日记云：“研究中央银行舞弊案。”^②这一天的日记说明，几个年轻人的检举已经为蒋介石知悉，他开始注意美金公债的舞弊案了。此后，蒋介石日记中连续出现相关记载：

3月29日：“昨晚约侍从第二处组长与俞财政部长聚餐。与俞谈中央银行美金公债不清之数，责成其彻底追究。”

3月31日《本月大事预定表》：“彻查美金公债案。”

4月3日：“追究美金公债。”“处理战务以及中央银行美金公债案彻查计划。”“督促俞鸿钧办案。”

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发现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账目不清，开始重视，并且决定交财政部长俞鸿钧彻底查究。俞鸿钧（1898~1960），广东新会人。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37年7月，任上海市长。1941年6月任财政部政务次长，步入财界。同年，兼任中央信托局局长。1944年11月，孔祥熙卸任财政部长，俞鸿钧继任。

^① 陈赓雅：《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的内幕》，《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83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3月19日。

俞鸿钧虽然和孔家渊源甚深，但是，查究美金公债案出于蒋介石的“钦命”，自然不敢怠慢。从蒋介石的下列日记可见，调查有进展，蒋介石逐渐发现问题所在。

4月7日蒋介石《上星期反省录》云：“美金公债与黄金舞弊案正在彻查中。”“黄金舞弊案”是差不多与美金公债案同时发生的另一案件。1944年3月，重庆国民政府宣称出售黄金，收缩通货。28日，财政部预定自当晚起，每两黄金售价由2万元增加至3.5万元。但财政部官员高秉坊等事先走漏消息，预知内情的达官贵人投机抢购，致使当日重庆出售黄金数字剧增，成为轰动一时的“黄金加价舞弊案”。4月20日，财政部将该案移送重庆实验地方法院审理。

俞鸿钧接手美金公债案后，于4月8日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查账报告，其情况是：“美金公债自停止出售以后，所剩五千万左右也几乎售完。买主用的都是一些堂名、别名，地址含糊不清，有的甚至是南京、上海等沦陷区的地址。”^①蒋阅后认为“其中显有弊窦，应彻查”。当晚，蒋介石约陈布雷等人谈话，“指示查账手续”。^②陈布雷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是蒋介石的亲信。蒋介石向陈布雷等“指示查账手续”，说明蒋进一步重视此事并且加强了调查力量。4月10日，蒋介石满有把握地在日记中写道：“考虑彻查美金公债案已得要领，不难追究也。”

要查，蒋介石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孔祥熙不在国内。1944年6月，孔祥熙被派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他患有膀胱结石病，会后即留在美国治病。1945年4月10日，蒋介石致电在纽约的孔祥熙，指出在停售美金公债后，仍有1100万余债券在继续交易，应予追缴。电称：“拟查美金公债剩余部分有壹千壹百余万元，预定户在停售受，付价给券，不合手续，应即将此壹千壹百余万元之债券，飭令该行经管人员负责，全数追缴归还国

^① 夏晋熊：《在孔祥熙官邸的见闻》，《孔祥熙其人其事》，第22-23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4月8日。

库，不得贻误，并将追缴之确数呈报。”4月11日，孔祥熙复电称：“此事当时经过实情为何，弟不详悉，已将钧电转主管局长迅剋遵办，并严令责成负责，追缴齐全。俟弟病稍愈，即当回国亲自处理。”^①说“不详悉”，不是不清楚，也不是很清楚，可进可退；至于“迅剋遵办”，“严令责成”等语，都是老于官场的说法。

通过追查，蒋介石已经初步掌握案情，但是，孔祥熙不回国，调查难以深入。4月14日，蒋介石日记云：“美金公债舞弊案已有头绪，须待庸之病痊回国也。”接到孔的复电后，蒋介石很失望，4月30日日记又云：“接庸之电，令人烦闷，痛苦不知所止。”“中央银行问题甚难解决也。”中央银行长期掌控在孔祥熙手中，其势力盘根错节，蒋介石已经感到，美金公债舞弊案和中央银行的问题比较棘手。

后来，蒋介石逐渐发现，有大量债券去向不明，曾经在日记“杂录”栏中记下了一组数字：“美金公债案；甲、各省市售出四千三百万元。乙、国库局交业务局五千四百万。丙、预售户有收据者只四千二百万。丁、尚差数一千六百六十余万元。”这1660余万美金公债的差额就是蒋介石要追查的地方。5月22日，蒋介石因中央银行业务局的黄金舞弊案发现重大嫌疑，电召孔祥熙速回。^②

同年5月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日，选举国民党新一届中央委员。长期以来，孔祥熙的贪渎名声早已流传在外，口碑甚坏，但是，孔是蒋的姻亲，宋蔼龄、宋美龄都“护孔”，蒋在财政上也要依赖孔，因此，外间虽反孔，而蒋介石却常加维护。选举中，孔祥熙和粮食部长徐堪的票数都很低。后来选举常委时，孔祥熙竟至于落选。蒋介石感叹地在日记中写道：“其信望坠落至此，犹不知余往日维持之艰难也。可叹。”^③同月28日，六届一中全会开幕，任务之一是解决

^①《央行发行美金公债舞弊案抄件》，1945年4月，〔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特交档案/财政/第2卷/金融，财政2-3，3/48099。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5月22日。

^③《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5月31日。

行政院的改组问题。1938年1月，孔祥熙任行政院长，至1939年11月，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孔祥熙改任副院长。此后，社会“反孔”情绪更趋强烈，蒋介石不能不考虑“换马”。六届一中全会期间，蒋介石日记云：“为庸兄副院长职务亦甚烦恼，但为党国计，不能不以公忘私也，苦痛极矣。”^①从这一页日记不难看出，蒋介石既想甩开孔祥熙而又难于决断的矛盾心理。次日，蒋介石宣布，他本人和孔祥熙分别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职务，改以宋子文、翁文灏充任。6月1日，蒋介石考察干部状况，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孔祥熙的考语：“（庸之）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②至此，孔祥熙不仅在政治上失势，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不堪了。

陈赓雅、傅斯年联合，向国民参政会提案揭发

国库局的知情年轻人除了向国民政府秘密检举外，有些人又将所掌的舞弊情况提供给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陈赓雅。陈原任云南劝储分会委员，兼主任干事，负责云南全省的美金公债推销工作，熟悉情况。同年7月7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大会在重庆开会，陈赓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写成提案，题为《请政府彻查三十一年度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发行余额大舞弊嫌疑案》，该案揭发：国库局局长吕咸“利用职权，公然将该项未售出之债票，一方逢迎上司，一方自图私利，以致不可究诘，构成侵蚀公款至美金一千一百五十万余元巨额之舞弊行为嫌疑。该项债票市价因之狂涨，由二十元递涨至数百元，刺激物价，扰乱金融，莫此为甚。”^③该案共提出三笔可疑账款。其中最重要的一笔就是：吕咸“借推销公债之名，签呈中央银行当局，怂恿购买美债余额三百五十万零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5月30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6月1日。

^③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3202/7215。〔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又，〔美国〕胡佛研究院藏微卷，Reel 29.6。

四千二百六十美元”。这里所说的“中央银行当局”，指的就是孔祥熙。陈赓雅等提出，“如果舞弊属实，国库损失之巨，与官吏胆大妄为，可云罕见”，要求国民参政会送请政府“迅予彻查明确，依法惩处”。

7月10日，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到参政会报告。此前，参政员傅斯年也多次听到该局美金公债的舞弊情况，即在谢冠生报告后提出口头质询。他说：“中央银行国库局同人分购成都没卖完的两百多万美金公债，因为分赃不均，便向主管当局告发，已经在查了。这比黄金透漏消息还要严重，因为国库局事先呈请该行核准了‘可’字。”他要求法院、检察官“自动检察”。傅斯年的发言引起大会震动，被称为当天七个口头询问中最响的“一炮”。^①会后，陈赓雅向傅出示所拟提案，原原本本，既有数字，又有证据。傅为之大惊，立即签名联署。这一提案也得到其他几位参政员的支持，签名者共九人。

王世杰时任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他得知陈赓雅等人的提案情况后，便出面做工作。王称：“此案提出，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使仇者快意，亲者痛心。同时，案情性质尚属嫌疑，若政府调查事实有所出入，恐怕对于提案人、联署人以及大会的信誉都会有损的。为此，拟请自动撤销，另行设法处理。”陈答以证据确凿，请不必代为顾虑。接着，陈布雷又以新闻前辈的身份访问陈赓雅，对陈说：“这提案资料的搜集，可谓煞费苦心，准备在大会上提出，当然也很有价值。不过，有个投鼠忌器问题，就怕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恐使英、美、苏等友邦更认为我们真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那么，影响之大，将不堪设想。”陈布雷建议陈赓雅将议案改为书面检举，由参政会主席团负责人亲交蒋介石，认真查办。当年5月，美国财政部长毛根韬曾严厉指责中国在抗战期间的各种经济失策与舞弊，国民政府的国际信誉大受影响。陈赓雅觉得王世杰、陈布

^① 子冈：《疲劳的参政会》，重庆《大公报》，1945年7月11日，第2版。

雷的说法有道理，便同意了。该项提案因此未提交大会讨论。

傅斯年性情刚烈，嫉恶如仇。除了在陈赓雅的提案上联署外，7月15日，他在陈案的基础上又草拟了一份提案，题为《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以重国家之要务而肃官常案》。这份提案已经超出美金公债这一个案，而是要求对孔祥熙所掌握的财政金融系统进行一次总清算。联署者达21人。^①该案称：

中央银行实为一切银行之银行，关系国家之命脉。然其组织直隶国府，不属于财政部或行政院。历年以来，以主持者特具权势，道路虽啧啧烦言，政府并无人查问……其中层层黑幕，正不知几许。

这里所指“特具权势”的主持者，当然就是孔祥熙。傅斯年等提议：1.由政府派定大员，会同专家、监察院委员、参政会公推的代表，彻查其积年账目与事项，有涉及犯罪嫌疑者，一律移送法院。2.改组。使中央银行改隶财政部或行政院，取消中央信托局。两者历年主持之人，在其主持下产生众多触犯刑章之事，应负责一齐罢免。其有牵涉刑事者，应一并送交法院。^②对此案，17日的重庆《大公报》立即作了报道，还特别强调：“其中国库局职员私购美金储券一案，情节重大。”^③该案经参政会大会讨论，决议修正通过，送请政府迅速切实办理。

17日以后，傅斯年几次会见揭发弊案人员中的两位青年人，得知他们的揭发动机至为纯洁，也得知更多舞弊情况，并拿到全部证据。这两位青年人揭发说：吕咸其人，“平日在局中，一切用度取给于公，其所行为，俨然孔公馆之缩影，彼更使人随便写

^①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3578/7609。〔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②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纪录》，国民参政会秘书处，1946年编印，第183-184页。

^③ 《傅斯年等提案》，重庆《大公报》，1945年7月17日，第2版。

不合手续之账，亦不以为讳。因习为故常，更恃靠山也。”他们也将此案发现经过向傅作了倾诉：“局中青年爱国之士久感不安，并因记账等事与吕氏心腹冲突者。”“故有七八人常在商议，并有债券科科长熊国清之亲笔信稿为其中一青年所拾得（此人今已出洋）。彼辈见之，大为骇异，遂星夜另托一人抄出最重要之账两纸，共推一人向政府密告。”他们还告诉傅斯年，其中有人已多次受到警告、恫吓。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危险状况，已立下遗嘱。傅斯年听了这几位年轻人的叙述，深为感动，安慰他们说：“诸君爱国热情，不避险难，至可佩。我虽前已同意不在大会提，但此事总当使之发生效力。”^①

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慷慨陈词，坚决揭发贪污腐败分子，使他获得很大声誉。有些人特意到参政会旁听，就是为了看傅斯年一眼。还有素不相识的人打听：“傅先生今天发言不？”7月20日下午5时，国民参政会闭幕式。傅斯年“唱了最精彩的压轴戏”。他向会议主席团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交由副秘书长雷震在会上宣读。内容有三点：“1.国库局舞弊证据已有一部分蒐集在手，已以之呈交主席团。2.请法院提出公诉，傅自愿为证人，并已得提供证据之友人之同意，愿同为证人。3.傅愿绝对负法律责任，如无其事，亦愿受反坐之罪。”^②傅斯年的书面报告使全场激动、兴奋。傅的好友罗家伦为傅捏了一把汗，会后问他说话何以如此肯定。傅称：“我若没有根据，那能说这话。”^③

蒋介石的质问与孔祥熙的答辩

陈布雷劝止陈赓雅在国民参政会上捅出美金公债舞弊案，但他不能不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也不能不及时处理这一问题。7

^① 《傅斯年在本届参政会大会中提案及询问有涉中央银行国库局舞弊事说明书》，影印件，《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23-124页。

^② 高集：《参政会闭幕日速写》，重庆《大公报》，1945年7月21日，第2版。

^③ 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第55页。

月8日，孔祥熙回到重庆。7月11日，陈布雷告诉蒋介石，已有人在参政会提出美金公债舞弊案，蒋于是立即召见孔祥熙，将此案调查经过、事实、人证、物证，一一告诉他，“嘱其好自为之”。蒋这时的态度还是要保护孔祥熙，不料孔却“不肯全部承认”，以致蒋在日记中写下“可叹”二字。^①次日，蒋介石审读陈赓雅等揭发舞弊案的提案，研究有关情节，决定“全数追缴，全归国库”，同时决定或亲自“负责解决”，或“任由参政会要求彻查”。日记云：“此固于政府国际信誉大损，然为革命与党国计，不能不如此也。”^②13日下午，蒋介石再次召见孔祥熙。这一次，蒋就不只是空口白说，而是向孔展示证据了：“直将其人证、物证与各种实据交彼自阅。”但是，孔仍然坚决否认舞弊，甚至赌咒发誓。蒋介石看在眼里，大不以为然，觉得孔不配做一名“基督徒”。面对这位与自己多年共事的老姻亲，蒋介石不得不拉下脸来，“严正申戒”，孔这才“默认”。蒋介石见孔祥熙不再强辩，态度又转为温和，“嘱其设法自全”，将主动权交给孔，要他自己寻找解脱办法。当日蒋介石日记云：“见庸之，彼总想口辩掩饰为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③蒋孔关系一向良好，认为孔“可耻之至”，这是很少有的现象。14日上午，蒋介石再次与孔祥熙谈话，据蒋介石日记记载：“彼承认余之证据，并愿追缴其无收据之美金公债，全归国库也。”^④15日，蒋介石反省上周各事，非常感慨，在日记中写道：“傅斯年等突提中国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而庸之又不愿开诚见告，令人忧愤不置。内外人心陷溺，人欲横流，道德沦亡，是非倒置，一至于此！”^⑤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11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13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15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14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15日。

孔祥熙一面在蒋介石面前承认有问题，但同时紧急布置国库局采取应付措施，据传，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提出舞弊案的当夜，孔祥熙审问吕咸。盛怒之下，打了吕咸两记耳光。^①其后，就组织 18 个人连夜造账，对付审查。^②孔祥熙甚至向审查者出示蒋介石交给他阅看的检举资料。7 月 16 日，蒋介石审读中央银行的审查报告，再次召见孔祥熙。当日日记云：“彼将余所交阅之审查与控案而反示审查人，其心诚不可问矣！”^③17 日，蒋介石约见俞鸿钧及侍从室秘书、中央监察委员陈方，指示对舞弊案的“批驳要点”。^④17 日，蒋介石接阅国民参政会通过的傅斯年等 21 人对中央银行，实为对孔祥熙的“弹劾案”，蒋介石自称“苦痛无已”。^⑤

停售后的剩余的美金公债既由孔祥熙、吕咸等人私分，自然交代不出购券人的真实姓名等资料。7 月 13 日，孔祥熙曾向蒋介石递交《关于美金公债销售情形之折呈及节略》各一份，以购券人“无可查考”相推诿。孔称“人民购买均系款债对交，至各户户名均系来人自报，按照售债向例，无须详细记载”。7 月 19 日，蒋介石连致孔祥熙三函。其中第一函驳斥孔祥熙的购券人“无须详细记载”的说法。蒋称：

门市现款购债自可如此办理，但既称为认购户或预售户，而认购之户一不缴纳分文定金，二不填具认购单据，中央银行亦不给予准许认购若干之证件，三无确实姓名住址之记录，则停售之后，各认购户究竟凭何证据向中央银行交款取券？行方人员又凭

^①《国库局同人致傅斯年函》，影印件，1945 年 8 月 8 日，见《傅斯年文物资料选集》，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第 126 页。

^②《傅斯年在本届参政会大会中提案及询问有涉中央银行国库局舞弊事说明书》，影印件，《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 123-124 页。

^③《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 年 7 月 16 日。“其心诚不可问矣”以下被蒋介石涂去约半行，必有更激愤的语言。

^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 年 7 月 17 日。

^⑤《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 年 7 月 18 日。

何根据付给其债券？是否仅凭该认购户口头申报或人面熟悉，即行付给债券？此种情形，即一普通商号对私人定购些微货物，亦决无此理，何况政府机关之国家银行！办理巨额外汇债票之收付，乃竟如此草率，何能认为合法有效？

蒋函进一步向孔祥熙提出质问：各有关购券人购券均在停售命令公布之后，美债价格均已高涨，何能尚按最初的低价出售？函称：

查认购各户取券时期皆在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后至三十三年六月一段时间，距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停售之期少则月余，多则六七个月。其时美债价格高涨一倍至十余倍之多，而认购各户仍按国币二十元折合美债一元之原价交款取券。以在法理上毫无拘束之认购，此时何得享此意外之特殊利益，而损失国家宝贵外汇？

蒋函最后严厉提出：“此一期间，认购各户所领去一千六百六十万余元之美金公债，必须由兄责成经办人员，负责全数缴还中央银行，限期严密办妥。”在这段话之后，蒋又转变语气，特意写了一段：“此纯为稍减当前情势之应付困难，决非故意苛求。想兄当能深谅，务盼兄迅速处理，即日具报勿延为要。”

蒋介石的第三函则就孔祥熙所报账目进一步查问。函云：“查美金公债除去售出4310万余元及国库局缴交业务局5401万余元外，尚短287万4千余元，此款着落如何？应即详细查明具报。又据报三十三年8月19日，国库局曾收进美债35万5千元，账上仅列国币710万。该项债券下落如何，并盼查报。”^①7月21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庸之对一六六零万美金公债总不愿承认也。”^②

21日，孔令仪携孔祥熙复函来见蒋介石，报告对陈赓雅等九

^① 《事略稿本》，1945年7月19日，〔台北〕“国史馆”馆藏。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21日。

人检举提案的调查情况，内称：美金公债券一千一百五十余万元，系由各地分销处分三次解缴而来，其销售情况为：

第一次，三百五十余万元（3 504 260 元），已由国库局交业务局，并经业务局将债款国币七千余万元（70 085 200 元）送交国库。其中二百零二万余元（2 024 760 元）系以前认购各户交款交割，余数一百四十七万余元（1 479 500 元）系由中央银行自购。

第二次，七百六十五万元（7 650 660 元），由国库局交业务局，当经业务局将应行缴库债款国币一亿五千余万（153 013 200 元）送交国库。

第三次，三十五万五千元（355 000 元），由中央银行同仁认购，共收债款七百十万元。^①

孔祥熙的这份复函对陈赓雅等人检举的一千一百五十余万元美券的下落作了交代，仍然不肯承认这一过程中有任何舞弊不端行为。

孔令仪是孔祥熙的长女，自幼即深得蒋介石的喜爱。孔祥熙让令仪来递送报告，自有其考虑，但是，对令仪的喜爱和对舞弊案的查究是两回事。当日蒋介石日记云：“庸之图赖如前，此人无可理喻矣！”^②面对如此棘手的美金公债案以及孔祥熙的强词辩解，蒋介石深感苦恼，整夜“为庸之事不胜苦痛忧惶，未得安睡”。^③22日下午，陈布雷向蒋介石汇报：孔祥熙曾表示，“恐此美金公债或落于外人手中”。蒋介石听后，觉得到了此时，孔还不肯承认自己舞弊，深为痛愤。日记云：“更觉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④

蒋介石 19 日函中的两个问题很尖锐，何以在决定停售以后

①《事略稿本》，1945年7月22日。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21日。

③《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22日。

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22日。

继续出售？何以在美券市值高涨后仍按最初所定低价出售？7月24日，孔祥熙致函蒋介石，试图回答：

（一）关于认购户。孔函说明，发行美金公债历时年余，债券分散各地，不能预计何时到渝，故主管局对于认购各户只能请其待券到后缴款交割，不能责其预缴价款，或交纳一部分定金。后来各地陆续缴到债券，黑市市价虽然略涨，但认购在先，自不应以黑市价涨而不交割，致失国家银行信用。孔称：“以今视之，手续诚不无可议，而证以当时情形，实非故意草率可比。”

（二）关于损及国家。孔函说明：当初发行美债，原意在于协助民生经济、生产建设，战后据以购进机器材料，藏富于民。因此，就整个国家言，并无损失。抗战中，中国为美方在华人员垫付过大量经费，需要美方用外汇归还，因此，“必须尽力设法压制外汇黑市之上涨，方属于国有利”。

（三）关于购户。孔函说明：债券发行本属无记名交易，向无记录账册，仅记债券面额款项即可。券款交割之后，承购人在此战时迁徙无常，自难寻找。

（四）关于缴回停售后的余额债券。孔函称：钧命虽限期缴回，但据主管陈复，限于事实，无法奉行。经再三筹虑，反复研讨，都认为“此事处理设有不慎，影响国家信誉过巨”。孔建议，以“停付冻结”的办法“秘密取消”，请蒋考虑决夺。^①

孔祥熙的这封信，强词夺理，不仅不承认有任何舞弊行为和任何不当之处，而且还企图证明，以每券二十元的低价出售是为了“压制外汇黑市”，“于国有利”云云。美金公债券由重庆中央银行发往各地销售。因此，孔函所称“债券分散各地，不能预计何时到渝”的情况，只能发生在宣布停售，命令各地将销售余额解送重庆之后。这时，既已停售，何能再次广泛发行，接受认购？此外，孔函并以“限于事实”为理由，拒绝缴回停售后的余额债券。蒋介石接读此函后，决定不能让孔继续担任中央银行总

^① 《事略稿本》，1945年7月19日。

裁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正午，发孔庸之辞中央银行总裁职照准，其遗缺由俞鸿钧补之命令。”以下蒋自涂约16字，当系对孔祥熙的极度愤怒谴责之词。可能事后蒋觉得过于粗鲁，所以又涂掉了。

蒋介石止步停损

7月24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准予孔祥熙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同日，又手谕孔祥熙：

该行经办人员办事颞预，本应严惩。姑念抗战以来努力金融，苦心维持，不无微劳足录。兹既将其经办不合手续之款如数缴还国库，特予从宽议处。准将国库局局长吕咸、业务局局长郭锦坤免职，以示惩戒为要。^①

国库局美金公债舞弊案不是“办事颞预”的问题，蒋介石这样写，是一种大事化小的提法，旨在为以后的进一步调查规定基调。

抗战期间，孔祥熙长期兼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为从财政上支持抗战做了许多工作；“苦心维持”云云，则是对孔祥熙的抚慰。当时，宋子文很想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曾向蒋表示，中央银行总裁必须由自己推荐，否则将不担负行政责任，暗示将不出任行政院长。^②但是，蒋介石毫不为之所动。7月25日，蒋介石召宋子文谈话，告以“中央银行总裁人选，非绝对服从余命令，而为余所信任者不可，以此二十年来所得之痛苦经验，因此不能施展我建军、建政，而且阻碍我外交政策莫大也”。孔祥熙在其兼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任内，始终不肯将中央银行的实际存款数字告诉蒋介石，致使蒋在1944年向美方“强制要求”援助，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几至

^①《事略稿本》，1945年7月24日。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19日。

绝境”。蒋介石想起这一段历史，对孔祥熙更加不满，深悔撤孔不早。日记云：“庸人不可与之再共国事矣。撤孔之举，犹嫌太晚矣。”^①

与俞鸿钧接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同时，宋子文则接任孔的“四联总处”副主席。至此，孔祥熙在国民党党政系统中的重要职务，几乎全部失去。7月28日，蒋介石日记云：“免除孔庸之中央银行总裁之职，实为公私兼全与政治经济之成败最大关键也。”所谓“公”，指的是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统治；所谓“私”，指的是蒋介石本人和孔祥熙之间以及和宋蔼龄、宋美龄的关系。蒋介石要“公私兼全”，自然不可能有彻底的调查和公正的处理。31日，蒋介石日记再云：“免除庸之中央银行总裁与改组行政院实为内政重大之改革也。”

傅斯年于1938年3月上书蒋介石，认为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作来一切若不相似”。此后，傅斯年一直走在“反孔”前列。1938年7月，1939年2月、4月，1944年6月、9月、11月、12月，傅斯年多次致函蒋介石，揭发孔的腐败、贪污等问题，并且在国民参政会上大声疾呼：“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②至此，傅斯年算是大获全胜，功德圆满了。7月30日，傅斯年会见蒋介石，蒋肯定傅的揭发，表示“极好”。8月1日，他致函夫人俞大彩，高兴地写道：“老孔可谓连根拔去（根是中央银行）。”“老孔这次弄得真狼狈。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③

陈赓雅等9人的提案虽然没有提交国民参政会大会讨论，但是参政会主席团决议“径请政府严查，依法办理”。7月31日，参政会秘书处正式将提案签呈蒋介石，建议密送国民政府，指派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25日。

^② 参见拙作《傅斯年攻倒孔祥熙》，《抗战与战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515页。

^③ 影印件，《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20页。

人员查明办理。^①同时，司法界对此案也关注起来。重庆地方法院向中央银行发函询问，最高法院总检察署发公函向傅斯年要材料，“以凭参考”。检察长郑烈在报上发表通告，号召各界揭发腐败、贪污分子。8月2日，郑烈致函傅斯年，告以“此事以鄙意度之，决可成案，已交本署叶、李检察官侦办，弟亲自主持”。郑烈要求得到傅斯年的支持，函称：“满腔热血，不知洒向何地。此事如得公助，巨慙就擒，国法获申，当泥首雷门以谢也。”^②8月8日，傅斯年撰写《在本届参政大会中提案及询问有涉及中央银行国库局舞弊事说明书》，叙述他了解的有关情况以及提案经过，保证所述各节，“经斯年详核，确信其为真，故可在参政会会外，负法律之责任”。末称：“深望政府严办，以警官邪焉。”^③

蒋介石不仅再次接到了国民参政会转呈的陈赓雅等人提案，而且也了解到郑烈主张彻底查究态度。^④8月4日，他在《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列入“美金舞弊案之根究”一项。8月6日，他决定将此案交由国民政府主计长陈其采与中央银行新总裁俞鸿钧密查具报。同日，以孔祥熙官邸秘书处原秘书夏晋熊接替吕咸，出任国库局局长。9日、10日，他在日记中两次记载“处理美金公债案”、“处理美金券案”等字。但是事实上，他并不想彻底查清。8月16日日记云：“晚检讨中央银行美债案，处置全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惟庸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象也。”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提高其行政效率，蒋介石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反对贪污、腐化现象，但是，彻底查下去，反下去，就会“夜长梦多，授人口实”，发生影响、

① 《函送陈参政员等提案一件，请查照转陈办理由》，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3202/7215。

② 影印件，《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21页。

③ 影印件，《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24页。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8月2日：“最高检察官陈某力主彻究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其中“陈”字，应为“郑”字之误。

危害自己统治，所以他要下令“速了”。17日，他约请司法部长谢冠生、俞鸿钧及陈其采会商办法。8月26日，陈、俞二人向蒋书面报告，将此案的性质轻描淡写地定性为：“未按通常手续办理，容有未合”，“亦有未妥”，而且，债票已经追缴，吕咸、郭锦坤亦已免职，云云。^①蒋接到报告后，未有新的指示，一场轰动一时的舞弊案件就此画上休止符。

一个腐败的政权是不能真正反腐败的。

1945年年末，国民党元老张继偕夫人到昆明举办书法展览。他告诉陈赓雅说：监察院长于右任对此案也有弹劾，从孔祥熙等承认吐出款项多寡中，可以了解到，其分肥比例是：孔祥熙最多，占七成，吕咸二成半，其余所谓应行调剂战时生活的经办人，仅得微乎其微的半成。^②

本文收集资料过程中，承汪朝光教授、杨雨青副教授协助，特此致谢。

^① 《关于追缴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发行余额撤惩主管人员之经过及现据查复情形报告表》，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3202/7215。

^② 陈赓雅：《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的内幕》，《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4卷，第384页。

论国民党的社会改良主义

——对“百年老店”的新审视

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和许多志士仁人为“振兴中华”而创建的革命的、爱国的政党，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等一大批人也曾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献身于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什么后来其中的部分人成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对象？简单的“投机”说或“叛变”说不足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历史学的任务在于根据史实，科学分析，理清事件、人物的发展、变化逻辑，找出合情合理的答案。

革命和改良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广泛流行的政治词汇。对它的涵义，历来众说纷纭。为了避免陷入无穷无尽的学理纠缠并便于讨论，本文将根据多年来社会公众约定俗成的普遍理解，先对这两个政治词语作最简明的界定：采用暴力或激烈的方式彻底改变一种社会制度者为革命，采用非暴力方式以求对一种社会制度作温和的、缓慢的改革者为改良。这样的界定可能不十分严密，但两者之间的区分却是清楚、明白的。

从兴中会创立至今，中国国民党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有“百年老店”之称。本文将企图对其进行“新审视”，并企图从一个侧面考察历史上的国共矛盾。

孙中山思想中的改良成分

孙中山是革命家。为了拯救中国，孙中山坚决主张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和北洋军阀政权。在这一点上，孙中山意志坚决，态度鲜明，不屈不挠，终身如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在任何问题上都主张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和办法。

孙中山主张土地公有，认为土地和空气、阳光一样都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普遍馈赠，不应为个人私有。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提出，“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①但是，在解决中国的实际土地问题时，他采取的是比较温和的办法。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的核心内容是“涨价归公”，即土地原价归地主所有，因工业、交通、商业发达所增长的地价归全民所有。这一纲领承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所剥夺的仅是因社会因素所增长的地价，因此，可以视为一个改良主义的土地改革方案。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②会后，孙中山进一步提出“耕者有其田”，但是，他并不主张仿效俄国的办法，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土都分到一般农民”，而是主张“慢慢商量”、“和平解决”，采取让农民得利，地主也不吃亏的“双赢”方案。^③孙中山也曾说过，对地主，可以照地价去抽重税，如果地主不纳税，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来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但是，他又担心，“马上就拿来实行，一定要生出大反动力”。^④可见，他不愿意、也不敢以强力改变地主的所有权，仍然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

孙中山强烈地批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赞成资本公有，推

^① 转引自章炳麟：《遁书》，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第120页。

^②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第593页。

^③ 《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939页。

^④ 同上。

崇马克思为社会主义的“圣人”，但是，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能适用于高度发展的西方国家，连苏俄都不够格，中国自然更加不行。他说：“照俄国人说，俄国现在的实业和经济还没有大发达，实在够不上实行马克思主义；要像英国、美国之实业经济的那样发达，才可以实行马克思主义。”^①又说：“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程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的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的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国、美国，我们中国的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么能够行马克思的办法呢？”^②因此，孙中山提出，中国只可“师马克思之意”，而不可“用马克思之法”。^③他不主张全面、彻底地剥夺资本家的所有权，而是主张“节制资本”，即发达国家资本，奖励私人资本，允许老百姓自由兴办部分企业，政府加以奖励并以法律保护。孙中山认为，他的这种主张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完全一致，所以他曾很高兴地宣布，他的民生主义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在孙中山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中国的出路是“调和”这两种“动力”，利用外国的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④孙中山又认为，斗争的手段只适用于政治领域，在经济领域，他强调的是阶级合作、阶级互助。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看到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社会改良与社会福利政策之后，生产力迅速发展，工人工资、劳动状态、生活状况都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因此，孙中山认为，可以用和平的、调节的方法解决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矛盾，这就是：第一，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与工业之改良”；第二，将运输与交通事业收归公有，实行部分企业的国有化；第三，税收。实行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

① 《民生主义》第1讲，《孙中山选集》，第812页。

② 《民生主义》第2讲，《孙中山选集》，第811页。

③ 《民生主义》第2讲，《孙中山选集》，第843页。

④ 《建国方略之二》，《孙中山选集》，第369页。

得税和遗产税。第四，分配社会化，不由商人，而由合作社一类的“社会组织团体”来分配产品。孙中山称这四种办法为“社会经济进化”。^①孙中山相信，通过“社会经济进化”，资本主义还会有很强的生命力。他说：“究竟资本家应该不应该推倒，还要后来详细研究才能够清楚。”^②孙中山的思想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有变化，有发展，后人据此认为孙中山思想有新、旧三民主义之别，但是，他的社会改良思想并无重大变化，上述“社会经济进化”的办法是在国民党一大之后提出并加以阐述的。

孙中山的上述思想和主张，明显地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当时已在改变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苏俄，更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革命理念。

国民党和蒋介石对孙中山思想中改良成分的继承

国民党是孙中山建立的，以孙中山思想为旗帜。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等人宣扬孙中山是“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声称“先生的人格，以仁爱为其基本”，提出“孙文主义”，其目的就是使孙中山的言论成为国民党的长期指导思想，并以之和苏俄以及中共的社会革命论相对立。1929年，胡汉民等鼓吹将孙中山思想视为国家“最高之根本法”，可以代替“约法”和“宪法”，也是企图进一步巩固孙中山思想的无可动摇的权威地位。考察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的实际活动和历史文献，可以看出，国民党一方面继承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坚持以暴力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同时，他们也继承了孙中山在社会改革问题上的改良主义思想。

蒋介石早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表示过欣赏、赞赏之意，但是，他更为倾信的是孙中山思想，特别是其思想中的改良主义成分。在蒋介石与共产党第一次合作期间，蒋介石讲过，“必能包

^① 《民生主义》第1讲，《孙中山选集》，第814-816页。

^② 《民生主义》第1讲，《孙中山选集》，第823页。

括共产主义始为真正之三民主义，同时亦必能容纳共产党，始为真正之国民党。”^①但是，即使在那时，他也特别强调，二者之间，有方法与时期的不同，在现阶段的中国，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必须以三民主义为“中心”。^②他说：中国的商家、富翁的资产如果与欧美的大资本家比较起来，“算不得是资本家”，因此，“中国现在不是实行共产的时代”。只要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不许大地主、大资本家再现于中国”，全国人民都将得到“足衣足食的幸福”。^③他声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使千百年后也不能改变。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基础。“无论共产党或是那一党，加入了国民党，就要信奉三民主义，要相信三民主义是我们中国革命的唯一中心”。^④他有时甚至说，三民主义是救中国的“唯一的主义”。^⑤后来，蒋介石更将孙中山思想称为“尽善尽美唯一最高之革命指导原则”。因此，他的经济思想和执政期间的经济政策虽然各个时期不尽相同，但大体上仍然不超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范围。

1927年2月，蒋介石在和共产党分家前夕曾说：“民生主义对于土地承认私有制，而共产主义完全是取消私有制。这一点原则上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⑥这就是说，在蒋介石看来，国民党承认私有制，而共产党则反对私有制、消灭私有制。同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会上声称：他和共产党的

①《为西山会议告同志书》（1925年12月），《蒋校长演讲集》，1927年2月版，第216页。

②《校长第三次训话》（1925年4月9日），《蒋中正先生演说集》，1925年12月版，第70页。

③《在汕头市总商会的演说》（1925年11月16日），《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第460-461页。

④《校长在本校特别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选举大会演说词》，《蒋中正先生演说集》第155-156页。

⑤《对于联俄问题的意见》，《蒋校长演讲集》，第5页。

⑥《事略稿本》（1），〔台北〕“国史馆”，2003年7月印行，第79页。

分歧在于三方面：1. 我们是谋中国全民族的解放，所以要各个阶级共同合作，不是要一个阶级专政，使其他阶级不但不能解放，而且另添一个最残酷的压迫阶级。2. 我们认定中国民族当有处分自己之权。自己利害，只有自己知道亲切，自己能通盘打算；“东交民巷的太上政府”断不能代以“鲍罗廷的太上政府”。3. 我们既为解除全国的痛苦来革命，所以必须于革命过程之中，力谋减轻民众所受的痛苦。我们希望军事早日成功，从事建设事业，使社会有正当发展的道路可达，而共产党则力谋将所有社会基础破坏，用大破坏来造成大暴动，用大暴动来攫取政权。^①蒋介石所述三方面，第二方面涉及中苏关系，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内。其他两方面曲解中共政策，但从中可以窥知，当时国共两党的分歧，一在于国民党搞阶级合作，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包容在“合作”之列；而共产党则搞阶级斗争，要打倒地主阶级，将来条件成熟时还要消灭资产阶级；二在于国民党企图维护社会既定秩序，“和平解决”社会问题，而共产党则要捣毁旧的社会秩序，以“暴力”和“斗争”改造中国。1927年蒋介石反共、“清党”之后，两党各走各路，彻底决裂。中共转入农村，“打土豪，分田地”，以暴力破坏乡村的地主所有制；蒋介石和国民党则竭力“剿共”，保护乡村的地主所有制，同时企图实行某种程度的“社会改良”。

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人有过解决土地问题的打算。1932年5月13日蒋介石日记云：“听中外人士土地制度。”^②这段记载虽语义含糊，但说明，蒋在研究土地问题。6月2日日记云：“土地问题二说：一在恢复原状，归还地主；一在设施新法，实行耕者有其地主义。对于耆绅亦有二说：一在利用耆绅，招徕土民；一在注重贫民，轻视耆绅，以博贫民欢心。”蒋介石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两条完全对立的主张，但蒋却无所轩轻：“余意二者皆可兼用也。”可见，他并不反对使农民得到土地。此后，他曾急切

^① 《革命文献》第16辑，第2815-2816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5月13日。

地找寻“平均地权”的“实施计划”与“方案”，准备为此征奖，并设立专门的研究委员会。6月26日日记云：“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二方案，应即确定，不可再缓也。”^①1932年9月30日日记云：“对农，以土地农有为目的。”直至1942年4月23日，蒋仍在日记中写道：“以耕地农有解决土地问题。”^②可见，经过较长时期的研究后，蒋介石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土地政策，并且多年未变。与此相应，蒋介石也多次将“耕者有其田”或“耕者有其地”作为施政纲领，^③并且提出过部分具体办法，如成立“集团农场”；“发行土地证券，扶助自耕农”；设立“土地银行”，帮助佃农贷款购地；“提倡合作”，“发展合作社”等。^④其他国民党人也设计过一些“耕者有其田”的方案。这些方案虽然最终也要触动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但无例外地都是比较温和的“和平解决”方式。张继、吴稚晖等人攻击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是“夺产”或“抢产”运动，是“梁山泊强盗的老方法”，是“加些训练，加些组织的‘科学的’李自成、张献忠方法”，“把国民党直缩到太平天国以前”。^⑤蒋介石也特别强调：“土地问题不能够用暴力来解决。”^⑥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6月26日。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4月23日。

③《民国三十年大事表》第17条：“耕者有其地与平均地权方案之制定。”第51条：“土地政策（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地）之推行。”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卷首。《各部中心工作与政策》：“平均地权实施方案之积极制定与积极推进并注重耕者有其地政策与制度之推动”，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卷首。《民国三十三年大事表》：“经济政策与制度：耕者有其地，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卷首。《民国三十四年大事记》与此略同。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卷首。

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4月1日；1940年9月2日；1942年6月19日；《民国三十三年大事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卷首；《建国工作重点》，《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卷末；《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9月30日。

⑤《初以真凭实据与汪精卫商榷书》，《吴稚晖全集》卷9，第87-876页；《民生主义实现之途》，《吴稚晖全集》卷7，第319页。

⑥《中国经济学说》，《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94页。

在解决城市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关系上，蒋介石和国民党也没有提出超越孙中山的更多的办法。1932年9月30日蒋介石日记云：“对工，分配红利，奖励劳动保险，以增加生产为目的。对商，以保护私产，节制资本为目的。”^①同年10月23日日记云：“当在社会主义路线上，谋尽消灭帝国主义，以养成中国社会资本主义。”^②“社会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蒋介石没有在其他场合对之作过解释。其内容，应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是一种“改良资本主义”。1937年7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暑期训练团讲话，提出：“解决民生的方法，是要以生产为主，同时注意到分配的平均。”他认为，必须首先实行下列几件事，除“平均地权”外，就是“防止资本操纵，实施累进税率”、“促进劳资合作，实施劳资仲裁”、“发达国家资本，保障私人企业”、“政府与人民协力解决生产及分配问题”等，这大概就是他所称的“社会资本主义”了。^③到了1943年，蒋介石又曾将他的社会经济理想名为“国家资本主义”，“以社会福利民众共享为依归”。^④

国民党建党伊始，就以“全民党”和“全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长期提倡阶级调和、劳资合作。此后国民党的多次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都以之作为指导思想。如：

1931年5月，国民党三届中央第一次临时全会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临时约法》规定：“劳资双方，应本调协互利原则，发展生产事业。”会议将“劳资互助调协”定为“国民生计根本政策”之一，主张在这一原则下，通过法律保护，“谋求农村与城市中劳资双方的共同利益”。^⑤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9月30日。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10月23日。

③《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118页。

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17日。

⑤《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46、958页。

1935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努力生产建设以图自救案》，声称：“我国近奉遗教，以全民主主义立国，自不容有阶级之争。”“亟宜采用劳资协调政策，对于劳资两方之保护，无所偏倚。”^①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宣言称：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中的“病态”。所有工业生产的剩余价值，不专为工厂内工人劳动的结果，凡社会上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无论直接间接，在生产方面皆有贡献。因此，会议提出：“务使社会利益，相互调和，平均发达，以驯至于共有、共治、共享之域，决不纵容阶级斗争之谬说，以招致社会之扰乱；亦决不酿成贫富不均之厉阶，以重贻将来之纠纷。”^②

以上所引各次会议通过的议案、宣言，几乎句句可以从孙中山思想中找到渊源。

一次改良主义的重要实践

北伐后，国民党宣布其农村政策是：“改良农村组织，整理耕地，制定最高租额之法律，增进农人生活。”其城市政策是：“颁布劳工法及工厂保护童工及女工。”^③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军湘、鄂期间，为减轻农民负担，动员农民支援北伐，国民党在广州召开有大量左派参加的中央和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通过《最近政纲》，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统称“二五减租”。^④孙中山生前说过，农民“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⑤1926年的“二五减租”方案可以说是孙中山上述思

①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266页。

②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31-432页。

③ 《敬告全国人民书》，《蒋校长演讲集》第299页。

④ 《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录》，油印件。

⑤ 《民生主义》第3讲，《孙中山选集》，第849-850页。

想的具体落实。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方案，当时各方，包括中共在内，均无异议。同年底，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以极其严厉的口吻批评中共在土地问题上软弱，要求立即以激烈手段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1927年春，部分中共领导人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着手按国际要求开展农民运动，在中共和国民党内部都出现分歧，形成左右两派的对立。同年，蒋介石等在江浙地区发动“清党”，成立国民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标榜实行“二五减租”。1927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百分之四十”，“佃农对于地主除缴纳租项外，所有额外苛例一概取消”，“佃农对于所耕土地有永佃权”。^①根据这些精神，湖南、湖北、江苏都曾制订过相应条例，但是，真正实行过的只有浙江省。

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浙江党政联席会议曾公布《最近政纲》，宣称“减轻佃农佃租百分之二十五，遇有重灾歉时，更得酌量减轻之”。1928年，浙江省主席何应钦等人认为：“佃农终岁勤劳，三餐难得一饱；业主一次投资，子孙坐收其利。事之不公，无逾于此。”^②同年由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省政府联席会议通过《浙江省十七年佃农缴租章程》，规定“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为最高租额”，“佃农依最高租额减百分之二十五缴租”。这样，佃农只须向地主交纳收获量的百分之二十五，自己则可得百分之七十五。《章程》同时规定：“副产业之收入，概归佃农所有”。《章程》一方面对地主撤佃作了比较严格的规定，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佃农“不缴租”。^③同时颁布的还有《佃业理事局暂行章程》，规定省、县两级设佃业理事局，由省县党部、省县政府、省县农民协会等三方组成，处理农民和地主之间出现的纠

^① 《土地改革史料》，〔台北〕“国史馆”，1988年印行，第33-34页。

^② 《土地改革史料》，第36页。

^③ 《浙江省十七年佃农缴租章程》，《土地改革史料》，第37-38页。

纷。省党部在处理佃、业纠纷决议案中声称：“浙江省本年佃农缴租实施条例，绝对不含妥协性。”“土豪劣绅、恶田主及农人中之地棍、流氓，仍其本来面目，而有挟制压迫他人之行为者，治以反革命罪。”^①既反对土豪劣绅、恶霸地主，也反对农民中的所谓“地棍、流氓”，力图不偏不倚，站在中间。1929年2月，国民党浙江全省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及决议案，继续声称实行减租。会后举行常务委员会，决定会同省政府，成立缴租章程讨论委员会，讨论施行办法。

浙江省的“二五减租”幅度较大，佃农实际所得远大于地主，因此，自始即受到城乡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1928年10月，董士钧等以永嘉城乡全体等众名义上书，指责减租之举“苦乐不均，倒置主佃名义”。^②11月，董松溪等以浙江全省公民代表名义上书，指责浙江省党政两方“高坐堂皇，罔知民间情状”，“自党部至处理佃业各机关，以逮于各农协会，均为恶化、腐化、无产暴民所占据”，“中小地主生平千辛万苦，粗衣恶食，齿积蝇头，购得薄田数亩，或数十亩，藉为一家数口或数十口养生之资者，莫不俯首贴耳”。同月，永嘉城区业主上书，指责佃业理事局“每袒于佃方，致业主所得不及佃农十之二、三，不平太甚，众怨沸腾”。1929年2月，永嘉李芳等上书，攻击“永嘉近日农运，已入阶级专制状况，流毒所至，中等之家立见倾覆”。同月，叶清等上书，声称“二五减租原为调剂劳资冲突，实行阶级调和民生主义，应从全民利益着想。民等弱小业主，似此横受佃农非法压迫，心何以甘”。3月，叶何氏等上书称：“受佃农之压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夫岂训政时期实现民生主义之良象！”同月，屈映光、张载阳、吕公望、周凤岐联名上书，攻击浙江所订缴租章程“尚欠平允”，“共党乘机捣乱，勾结土匪、流氓，借

^① 转引自万国鼎：《二五减租述》，《中农月刊》第7卷第二期，1946年2月28日。

^② 《土地改革史料》第50页。以下所引呈文，均见此书，不一一注明。

减租问题向业方肆行抢掠，杀人烧屋，大祸频乘，势急倒悬。”上述四人中，屈映光是北洋政府大官僚；张载阳曾任浙江省省长、北洋政府时期的陆军上将；吕公望原为光复会会员，担任过任广州军政府参谋部长；周凤岐原为孙传芳所部师长，向北伐军投诚后被任命为军长，曾任国民党浙江省政治分会临时主席。他们的联合上书，反映出浙江城乡地主、官僚、士绅对“二五减租”及其相关规定的强烈不满。

在城乡地主、官僚、士绅的强烈反对下，浙江省政府当局终于坐不住了。1929年4月，浙江省政府继任省主席张静江等人以“纠纷迭起”，“政府税收逐年减少”为理由提出：

本省自前年试办二五减租办法以来，佃业两方纠纷迭起，微特无成效可言，又并深受其害。初则佃农因收获多寡之争执起而抗租，继则业主因减租影响收入，将田亩收回自种，纷纷撤佃，于是佃农之强悍者又群起反抗撤佃，往往霸佃不让，而懦者即缘此失业。各地方凡遇此项情事发生，即有地痞、流氓从中把持唆煽，甚至土匪、共党，亦即乘机骚扰，以此种种原因，遂致佃业两方之生计，并皆不得安定。不独佃农与地主不能合作，共谋农业生产之发达，且田价暴落，社会经济发生急激之巨变，影响所至，竟致政府税收逐年短少，尤以田赋为甚。^①

浙江省政府委员会随即召开会议，认为减租办法“洵属有弊无利”，决定暂时取消，此后田租多寡，由佃、业双方根据《佃农保护法》关于租额不得超过收获总量的40%范围以内，自行协定。^②这样，佃农应缴租额就又较此前的25%提升了。

浙江省政府的决定受到强烈反对，浙江许多国民党员、农会

① 《抄原提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3.3/26.12。

② 《浙江省政府呈国民政府》，1929年4月30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3.3/26.12。

及其工作人员纷纷呈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

武义县党务指导员胡福指责浙江省政府：“违背革命原则，莫此为甚。此等消灭民众对本党之信仰的议案，如不予以纠正，党国前途，何堪设想！”^①

国民党鄞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赵见微分析说：二五减租，浙江推行已经两年，成效渐著，基础已立，纠纷所在，源于“土劣地主之反动”。“此后凡属革命建设，谁能保无纠纷，一遇纠纷，即行取消，则所有革命建设必致无从进行”。他责问说：“与其空言积极，继续剥削佃农以增肥地主，何如实行政纲，努力解放佃农以取信国民？”

余姚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萧显称：此事缘起，在于“土劣因租既被减，心犹未甘”。他谴责浙江省政府的决定有“四不通”，“二不法”，声称这一决定“摧残农运姑置不论，其如农民将对党失却信仰何”！

国民党萧山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周旦充分肯定二五减租的“伟大作用”，认为它可以“培养农民自修之抵抗力，消灭土劣压迫农民之凭借”。他表示：浙江农民“因得本党之扶植，始稍稍有反抗之表示”，国民党应该继续前进，彻底解决“佃业两方之纠纷”。他担心，国民党的政策自此改变，“拥护农工诚恐转为压迫农工”。

浙江省杭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李尹希指责省政府的决定，不啻推翻本党最高权力机关之决议案，是“撕碎本党之政纲政策反革命之行为”。

海盐县党务指导委员顾佑民称：二五减租“为解放农民第一步，本党必须继续努力”。

佃农代表涂侠等十人要求浙江省党部：不可因困难而中辍，不可因噎而废食。

^① [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3.3/26.12。以下所引各呈文均同，不一一注明。

萧山国民党员陈荫楠要求浙江省党部出面纠正，呈文称“党部为最高机关，省党部固具监督省政府权。而今省政府取消减租，违背政纲，大冒不韪，应直起纠正”。

这些呈文，维护原定的二五减租方案，激烈抨击浙江省政府，反映出广大农民和不少国民党浙江基层工作人员的心声。

鉴于广大党员纷纷反对浙江省政府的决定，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召开常务委员会讨论。会议认为二五减租为党、政双方共同决议，不能由省政府单方取消，且亦与国民政府所颁布之《佃农保护法》大相刺谬。常务委员会朱家骅等人向浙江省政府提出《复议理由书》，要求开会复议。《理由书》首先提出：国民革命必须“首先解放农民”，“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党的政策，须着眼于农民本身之利益”。接着，《理由书》陈述“二五减租”和孙中山倡导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之间的关系：

土地问题为民生主义之基础，而农田问题又为土地问题之主要部分。农田问题设无适当之解决，则整个社会问题亦不能解决……总理遗教，实欲于最短期间内促进耕者有其田，而二五减租实为实现平均地权之捷径。二五减租之基本观念，诚为解放农民之最低限度之政策。

《理由书》批驳浙江省政府“由业佃双方自订缴租数量”的决议案，“实不啻驱农民于水深火热之境，使任受地主之蹂躏”。《理由书》要求按照孙中山的遗教，“对抗税者加以没收土地之处分”，认为这样做，“迟以五年，则土地泰半将为农民所有”。^①4月23日，浙江省政府复函浙江省党部，拒绝复议。《杭州民国日报》在省党部的支持下，大量刊登社评和各地反对取消“二五减租”的文电。张静江认为该报“妨碍省政府政策之推行，并损

^① [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3.3/26.12。

及省政府之威信，影响所至，尤关治安”，向该报提出警告。^①继即勒令停刊，逮捕该报主笔。

4月27日，朱家骅与另两位常委叶溯中、陈希豪联名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申诉。朱等充分肯定浙江实行二五减租以来的成绩：“二年以来，因该项决议案之实行，浙省农村经济，率较他省安定，自耕农之逐年增加，农村小学学童之激进，工商业以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等，皆为不可掩之事实。”朱等严厉指责浙江省政府的做法只能引起“各地贪污豪绅之益肆凶焰，贫苦农民之剥肤及髓”，“农村经济之破产失业者之繁多，社会各阶级之日趋尖锐化”，以致“影响于整个社会之秩序”，为共产党的发展提供“好机会”。《理由书》称：

以此而言民生，则日驱一千六百余万农民于绝境；以此而言建设，则徒增多一般贪污豪绅之发财机会，构血花于白骨之上，以为伤心惨目之点缀品。此种举措，在各国专以驱骗贫苦民众、延缓资产阶级之寿命为职责，主张社会政策者亦不屑为，况夫实行三民主义，以冀达到世界大同之本党！^②

朱等要求国民党中央迅速采取措施，纠正浙江省政府的错误决定。呈文称：“若中央对于浙江省政府此种违反党义党纲，僭越职权，以驱浙江千余万农民于绝境之取消二五减租不迅予纠正，严厉取消，则本党之所谓主义，所谓民生，将毋如屠人念佛，为本党仇敌所讪骂鄙夷，本党同志所疾首痛心。党国之威信无存，总理之遗教安在！”在浙江省党部向国民党中央申诉的同时，萧山县农民协会整理委员会也同时致电，表示将“率全萧三十万农民誓死力争”，并公推代表三人到南京请愿。^③

① 《土地改革史料》，第70页。

②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3.3/26.12。

③ 《快邮代电》，[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3.3/26.12。

国民党中央接到浙江省党部和浙江省政府双方的呈文后，于5月2日召开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常务会议，决定接受戴季陶建议：1. 核准浙江省政府的要求，取消《二五减租暂行办法》，但认为浙江省政府只是因实行上的困难而暂时停止，并非取消二五减租之原则，要求浙江省政府修正文字，以除误解。2. 已实行减租的地方，而又无纠纷者，不得再将租额复旧，以免再起业佃两方的第二次纠纷。3. 浙江省政府应于今后两年间，将乡村自治机关组织完全，土地调查办理清楚，并将二五减租之办法规定详密，以便施行。^①其后，国民党中央派戴传贤赴浙，召集浙江省党部与省政府人员共同讨论，制订《浙江省佃农二五减租暂行办法》和《佃业争议处理暂行办法》，规定“土地收获除副产应全归农民所有外，由业佃双方就各该田亩情形，以常年正产全收获量百分之三七·五为缴租额，自行协定新租约”。在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二十五之间，采取了一个折中的百分比。

可以看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与浙江省政府的矛盾是“清党”后国民党内两种力量之间的一次角力，实际上是坚持还是否定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的斗争，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是否真正贯彻其社会改良主义路线的重要考验。国民党中央党部虽然在口头上表示要坚持“二五减租”，但在实际上支持的却是浙江省政府的“取消”办法。这就表明，国民党的政策正在向地主阶级倾斜，其改良主义路线正在弱化。当时，浙江省政府委员陈布雷发表文章称：“实施减租之际，断不可含有片面的示惠佃农之观念。换言之，不能于二五限度以外，使田主再有所牺牲。”^②陈的言论明显地表现出袒护城乡地主阶级的态度。但是，浙江城乡地主阶级仍不满意。1931年11月，乐清县郑迈等53人致电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政府，继续指责二五减租办法“适以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常务会议记录，1929年5月2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② 陈布雷：《浙江省二五减租之前途》，上海《时事新报》，1929年5月9日。

奖励惰农，生产力因之骤减，纠纷又日甚一日”。^①同月，乐清徐可楼等 51 人具呈，认为“劳资合作，阶级乃能化合，而社会秩序始得维持。今平日感情极融洽之业、佃双方，因减租各趋极端，已足影响治安”。12 月，乐清里长卢选臣等上书，认为二五减租使业佃双方“争长竞短，各不相让，因此发生绝大冲突，阶级斗争已成不可免之事实”，“绝对有弊无利”。1933 年，上虞县糜虞封等控告该县农会干事“额外减租，煽获佃农，抗租不缴”，国民政府居然批示：“应向该省主管机关呈诉。”^②

在地主阶级的强大压力下，浙江省的二五减租运动逐渐成为具文。全省八十多县中，只有少数县的部分区、乡有所动作，大多数县份仍是一潭死水，不见波纹。浙江省之外，其他各省均未实行，大部分省份连装模作样的减租条文都没有。国民党仅存的改良主义火星只是闪烁了一下，就灰飞烟灭。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重提二五减租，然而，死灰难以再燃，连些微的火星也难以见到了。

一轮又一轮的改良呼吁

浙江省的“二五减租”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重要改良主义实践，它虽然夭折了，但是，此后的国民党继续标举其改良主义纲领，出现一轮又一轮的改良呼吁。这些呼吁，仍然比较多地集中在土地问题上。

1936 年 7 月，孙科、陈立夫、王用宾、傅汝霖、萧铮、周佛海、夏斗寅、徐恩曾、洪兰友等 17 人向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提出《请迅速改革租佃制度，以实现耕者有其田案》，要求调整“现有之租佃关系”，“庶几佃农生活能日益提高，而农村亦可有逐渐复兴之望”。其内容有：1. 由政府严定租佃条件。2. 组织土

^① 《土地改革史料》，第 110 页。

^② 《土地改革史料》，第 127 页。

地金融机关，援助其取得土地。3. 佃农得备地价百分之二十至五十，其余部分由政府担保其分年摊还。4. 从速实行累进地价税，使不自耕之地主逐渐放弃其土地，使佃农有取得所有权之机会。5. 政府应发行土地债券，征收土地，转让佃农及雇农。^①7月20日，决议交中央政治委员会详细研究。

1939年6月，地政学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萧铮向重庆国民政府提出《实验地政区办法大纲》，要求在四川选择一个地区作为“地政实验区”，进行土地测量登记，耕地重划，促进土地利用，增加生产，调整佃租制度，创立自耕农，规定地价与举办地价税，树立土地金融制度等方面的工作。同时，萧铮又提出《沿新建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办理地政纲要》，认为成渝、叙昆及滇缅各路沿线重要城镇土地，今已逐渐涨价，将来地价更高，亟须规定地价，并颁布沿线各地将来涨价归公办法，“庶不致国家以巨款建设，而其利益反归地主”。蒋介石阅后，于6月24日批示行政院秘书长张群称：“实行总理之土地政策确有必要”，“即希切实研究核办施行”。^②

1940年7月，萧铮、张冲、陈果夫、程天放、谷正鼎、徐恩曾等向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提出《拟请设立中国土地银行，以促进土地改革，实现平均地权，活泼农村金融，改善土地利用案》，其主要内容为，由国民政府特许，授予该银行发行土地债券及征收土地特权，官民合办，资本总额定为1亿元。其主要业务为：1. 实行照价收买政策，凡地政机关认为地主报价不实，应行收买之土地，由土地银行以所发土地债券收买之。2. 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扶助佃农购置土地，或依法征收土地转发农民。3. 实行“地尽其利”政策，贷款农地合作社或其他机构，供开垦荒地及土地改良之用。萧铮等建议，土地债券可分地价债券及抵押债券

^① [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档案，5-2-12。

^②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档案，003,885。

二种，前者用于征收土地或扶助佃农购地时发行，直接交付地主补偿地价，由借款农户以地租方式分年摊还。萧等并建议，以四川省为实验区域。该案由会议经济组审查后，认为“本案关系推行本党土地政策，至为重要，拟请大会通过，送国民政府限于半年内，成立土地银行”。^①

与萧铮等同时，方觉慧、居正、何成浚、王子壮、焦易堂、夏斗寅等12人提出《确立民生主义经济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要求“节制资本以防资本独占”，“实施平均地权以安定农民生计”，具体措施有“提倡合作方式之集体农场”、“设立劳工主管机关”、“组织工厂议会”、“仲裁委员会”等。经济组审查后认为：“本案所提各点关系民生主义之推行至为重要，拟请交宪法委员会参考。”最后决定“交常务委员会参考”。^②

1941年4月，陆宗骥、谭平山、胡秋原、王云五、罗文干等向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提出，“拟请政府切实推行合作耕种制度，以改进农业生产案”，提倡“以合作方式共同生产”。蒋介石批交农林部酌办。^③

1941年11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齐世英等23人向参政会提出《积极实施土地政策、改革租佃制度，以期根本解决粮食问题与社会问题案》。该案痛责“地主对于国家曾无丝毫之贡献，而利用国难，坐致巨富”，要求：1. “凡现由佃农耕种之土地，悉令地主限期报价，由国家发行低利土地债券照价收买，分授佃农耕种。”2. “佃农受田后，分年以谷缴还国家，国家逐年出售实物，即以所获资金收回土地债券。”3. “土地债券收回之日，佃农即完全取得其土地之所有权。”^④

上述议案，都以实行阶级合作，利益调和为特点，并不完全

①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750。

②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750。

③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1535。

④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1872。

剥夺城乡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其中，也有比较激进的，如1932年12月，孙科等27人向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整理本党实施方案》，要求“恢复本党自来代表最大多数被压迫民众利益之立场”，征收土地价值税、土地分归贫农；征收资本收入累进税、遗产税；甚至提出建设国有资本，树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等主张，其中“土地分归贫农”就是比较激进的方案。^①

上述议案并不只是少数党员的意见，其中不少议案经国民党的中央全会或代表大会接受，作出决议，成为共识。上述孙科等27人“土地分归贫农”的建议经四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萧铮等人的“成立中国土地银行，以促进土地改革”的建议，也经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通过。其他如：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规定地价，调整土地分配，促进土地使用，活动土地金融，以增加农业之生产，而谋平均地权，实现三民主义”等主张。会议通过萧铮等24人提出的《关于积极推行本党土地政策案》，要求成立中央地政机关和中央土地银行。^②

1941年12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将“实施土地政策”列为四大要政之一。宣称“全国土地应受国家之统制，由政府调整其分配，支配其使用”。^③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其《土地政策纲领》中提出，对于地主出佃的耕地，逐步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备价征收，尽先归原耕农及抗战将士耕作。在《农民政策纲领》中提出：“调节农地分配”，“规定标准地租”，甚至提出“征收地主超额土地”。在《本党政纲政策案》中提出：“都市土地一律收归公有，农地除公营者外，应以最迅速有效之方法，实

①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175-176页。

②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295、317-318页。

③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735、746页。

行耕者有其田。”^①这些方案，使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有了实施办法。同会通过的《劳工政策纲领》除提出“工会得有全国性之联合组织”外，也提出了一些改善劳工待遇的条件，如：取缔包工剥削制度，工资以同工同酬为原则；各地并应分别规定最低工资率；工时以每日8小时，每周48小时为原则；应有连续24小时之休息；每年应有定期休假，休假期内照发工资等，甚至还提出：奖励劳工人股，倡导劳工分红制；提高劳工政治认识，扶助劳工参政。^②

上述情况表明，国民党在思想上、理论上赞成改革中国传统的土地制度和社会制度，但是，国民党是党国体制，中央全会或代表大会作成决议后，要经行政机构研究，提出方案，还要经立法院审议，才能形成法律。有时，路走到半途就停止了。例如，1939年6月萧铮提出的《实验地政区办法大纲》经蒋介石批示，转到孔祥熙手上，孔以“需费浩繁”、当时“最重要之工作为兵役行政与生产”、《土地法》修正原则尚在“审议之中”等种种理由加以否定。^③又如，1941年12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飭由财政、农林两部及地政署分别拟具实施办法。1942年9月，行政院召开经济法联席会，提出《非常时期土地征收实施办法》及《非常时期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规定农地不得因出卖、赠与、继承或分割等原因而“移转于不自耕作之人”，农地所有人如“不自耕作，而将农地永佃或出租于他人”，得由政府依法征收之。这当然是对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的沉重打击。但是，行政院却主张暂时搁置。1943年3月24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院长名义致函国防最高委员会称：办法“关系人民权利义务至为重大”，“在此战时，骤为社会经济制度之重大变革，深虑影响全国之租佃关系，

①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26-927、936页。

②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3180。

③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885。

在推行之初，对于全国粮食生产，必发生不利之影响”，因此决定“暂缓制订”。^①

可见，国民党人提出的各种改良议案，即使作成决议，其命运，或者在反复研究、审查及审议立法中夭折，或者侥幸通过了，但令者自令，行者自行。国民政府虽一再声明：“如查有违反情事，应以命令强制遵守，不得稍涉宽纵”，但各地“仍系奉行故事，视若具文，佃农所受增高租额之剥削及违约解租之痛苦，不仅毫未减少，甚且倍于往昔”。^②这样，到了1945年5月，国民党的六大《宣言》终于承认：“过去对民生主义之经济建设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大政策，因种种障碍，未克实施，实为革命建国之最大缺憾。”其《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提出：“在抗战期中，农民出钱出力，贡献最大，而生活最苦。乃自二十三年公布《土地法》及二十五年公布《施行法》，迄今已及十年，多未见诸实施。”^③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有关《决议案》表明，国民党在其大陆执政期间，除浙江省“二五减租”的短命实践外，其改良主义只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

与共产党竞争，再次提出改良主张

八年抗战期间，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和日本帝国主义决斗，挽救民族危亡，在这一形势下，要求国民党人采取重大的社会改革行动并不现实。抗战胜利之后，形势改观，国民党人企图继续推行改良主张。它企图重提减租政策，并曾企图学共产党之所长，改变其土地政策，借以争取农民。

抗战中，国民党与共产党既是对日斗争的合作者，同时，又

^①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2085

^②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1871。

^③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13、916页。

是竞争者。蒋介石很希望国民党能在这场竞争中获胜，将共产党比下去。1939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开办党政训练班，曾亲拟问卷，要求学员回答。其问题有：本党党务为何如此消沉疲弱而不能及时振作？本党为何不能与共党抗争，一切组织、宣传、训练皆比不上共党？本党党员为何不肯深入民众，作基层工作？本党干部办事为何不切实际，不肯研究与负责？为何办事不彻底，无成效？为何党委变成官僚？为何民众不信任本党与党员？本党为何不能掌握青年？一般大学教员为何要反本党？等等。^①将这些极其尖锐的问题坦陈开列，说明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弊病了解甚深，也说明他改造国民党的心情相当迫切。1945年4月至7月，中共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以高度警觉的心情关注这次会议。^②对会议通过的中共党章的部分内容颇为欣赏。日记云：“研究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内容，对于其新增党章党员与群众及下级与上级之联系一条，殊有价值。本党诚愧不逮。若不急起直追，则败亡无日矣。”^③正是在这种危机感和紧迫感的驱使下，国民党重新捡起部分改良主义政策，以求挽回颓势。

1945年9月，蒋介石在《本月大事预定表》中提出：“实行二五减租。”^④11月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联合开会，讨论行政院所拟“二五减租办法”。出席者普遍赞成为农民“减租”，但讨论结果，都感觉难以推行。陈布雷称：“民生主义政策最具体的，也使农民得到一点实惠的，就是二五减租。本党政策，向来对于农工似乎不大顾到，所以共产党常常藉此煽动。”蒋梦麟则慨叹国民党的县长不行，乡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3月2日、3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5月9日：“看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文。”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7月16日；参见《民国三十四年杂录》。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9月30日。

镇长不行。他说：“办理时，如果不得县长帮忙，很难办得通。根本问题尤其在乡镇长，乡镇长、保甲制度不健全，不仅二五减租没有办法，任何制度都无法推行。”事实是，岂止“二五减租”，连不久前为庆祝抗战胜利而宣布的全国减免田赋一年的命令也无法施行。徐堪称：“免赋令下去以后，中央规定得很清楚，除了布告以外，又去了四五次电报，事实上中央免了，地方上并没有免，因为县级公粮等等，县政府依然在要，许多未经收编的军队也在要粮。”陈济棠称：“广东情形我最清楚，在过去人民没有钱，天天抓人，押了追缴。现在免了一年，还是天天抓人，人民真是不堪苛扰。”^①讨论来，讨论去，委员们除了决定，准予备案，由行政院申令各级政府彻底实施，由中央党部及行政院分令各省市党部、各省市政府随时具报实施情形，“务期达到增进佃农利益目的”外，什么具体解决的办法也提不出来。^②

有一些真正的贫苦农民曾经大胆上书，向国民党当局反映问题。1946年6月28日，四川省大足县佃农蒋泽乡等10人呈文国防最高委员会称：“国府立有土地一法，用维佃农生计，殊经颁行十年以来，毫未见诸实效。”“多数地主对于契约，不管定有期限与未定期限，任意揭退。”“租佃委员会者，纯希收租之人组织而成，以致国家善政，惠不及民，此非制度不善，实则人事不良所致。政府颁行一切法令，如对伊等稍有不利物，竟瞒上欺下，奸弊百出，以致普通佃农毫不知闻。”^③同年7月1日，四川大足县佃农张紫高等21人也具呈国防最高委员会，声称《土地法》十年前即已颁布，“无如地主势力浩大，竟视〈命〉令为弁髦，直至今日，未见实施”。呈文揭发，当地所谓“县租佃委员

① 《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75次常务会议速记记录》，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1,9,12。

② 《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7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96年影印本，第637页。

③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1,60,4。

会”呈报省政府的“二五减租之办法”，“对地主之利益早已安排妥当”，“真是德深一尺，弊深一丈”。^①可见，国民党颁布过的一些法令，用意虽或可嘉，但并未施行，或无实效，或者在施行过程中改变了性质。大足县的这几十位农民虽然给国民党最高当局写了信，但却被束之高阁，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走上中共所号召的革命道路。

1946年10月24日，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曾经颁布过一份《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其中第六条规定：“在变乱期间，农民欠缴之佃租，一概免于追缴。”第七条规定：“绥靖区内之农地，经非法分配者，一律由县政府依本办法征收之。”第十一条规定：“依本办法征收之土地，由县政府分配于现为耕作之农民，缴价承领自耕，但变乱之前原佃耕人有优先承领权。”^②这里所说的“非法分配”，显指中共在部分地区实行的土地改革。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军进攻苏区，一概实行“田还原主”政策，强迫农民吐出胜利果实。现在国民党则提出，将这一部分土地由县政府征收，“分配于现为耕作之农民，缴价承领自耕”，这是很大的政策改变。其后，江苏省政府并以宝应、盐城、东台等四县为“土地政策”实验县。但是，很快就受到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1947年1月3日，江苏宝应县地主成锡侯等一批“还乡队”成员上书国防最高委员会，要求“缓办”，其理由为：一、“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业经于今年元旦公布，对于人民自由财产等权利，予以保障”，“乃宪法甫经颁布，政府即举办土地政策，不顾人民之利害，所谓保障人民财产之权利者何在？”二、“吾邑自共军盘踞四郊，已有三年”，“现在仍无田租之可收，更无动产之可用”，“对于苦难人民，不特不怜恤抚绥，并私人田产，而亦不令其自由处分”。成锡侯等坚决反对国民党效法中共，

^①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1,60,4。

^②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4,145,452。

呈文声称宝应等四县土地，“共军仅于去年七八月间开始改革，草草分配”，“似不应继续接办，尤而效之”。^①同月31日，东台县旅镇同乡会从报上得悉，当局规定：“凡业户有田在八十亩者即予收缴公有”，立即致电国防最高委员会反对，声称：“吾东县城于胜利之后始为共军窃据，广大乡村虽多匪踪，但‘分租’‘分田’实行未久，地形既未变更，经界依然完整，地方一经规复，人民土地权利不难恢复原状，即分得土地之佃农，亦莫不自动归还原主，土地之无纠纷可见一斑。”电文为地主阶级诉苦称：“吾东有百亩以上之地主，为数甚罕，在共军占领期间，流亡异地，备尝艰辛，此种忠贞不二之气节，应表扬之不遑。及还乡伊始，田园未及整理，而实验之对象复以施行土地政策为主体，将使制造乱源者有所藉口，诚非善策。”^②经过地主们这么一叫唤，自然，所谓“土地政策”的“实验”就进行不下去了。

1948年8月，蒋介石在内战战场上再惨败，研究共产党胜利的原因，他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得到启发，认为其关键在于中共得到农民拥护，于是下达手令称：“吾人必须打破其优点，为尔后发挥战斗力之要着；其对策应考虑土地政策，实行耕者有其田，并于收复区已分配之土地，承认其所有权，以争取农民。”^③蒋介石的这一手令较之上述《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显然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但是，国民党正依靠各地的地主“还乡团”进攻中共的解放区，何能真正实行？

中国地主阶级是一股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强大社会力量。国民党要反共，除了依靠地主阶级外，别无他途。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训令各级党部称：“对于地方上纯正老成，办理社会事业著有成绩、乡望素孚之人士，应与之切实联络，使

^①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1,60,7。

^② 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1,61,4。

^③ 《土地改革史料》，第185-188页。

其劝导当地民众，共同组织，以增加剿匪工作之力量。”^①这是国民党明确依靠乡村地主阶级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宣言。1932年12月23日蒋介石日记云：“此时应积极剿匪，以求社会之安定。”^②当时的中国，乡村土地大部份为地主占有，中国要进步，要发展，就必须改变这种状况。然而，蒋介石却要“求社会之安定”。这样，他就必然要从改良主义进一步蜕化为保守主义，以维护和保持旧的社会秩序。

国民党在1927年“清党”之后，其成员的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940年11月8日，唐纵访问谭平山，谈对中国政治前途的估计，讨论从何处下手，挽救当时的政治危机。谭称：“救国必先救党”，“必须清理党的成分”。他说：“国民党的党员大都是地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与三民主义的精神正相反，何能望其执行三民主义之政策。”^③1949年7月，国民党非常委员会指出：“在上海、汉口、平、津及广州的同志，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和买办、流氓妥协；在其他各省的同志，亦均与土豪劣绅结不解的政治缘。买办、流氓、土豪劣绅本都是时代的渣滓，应在肃清之列，但由于一些同志的畏难苟安，不去肃清他们，结果他们的势力就反而壮大起来，变成了各地的实际统治者。”^④这一段话，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国民党及其政权的阶级基础的变化。其结果是，国民党党员中的地主阶级分子愈多，其实际政策的推行又要依靠地主阶级和“土豪、劣绅”，国民党所有的改良、改革自然无从实行。抗战时期，四川一度发生严重粮荒，国民党内很多人主张查封地主囤粮，唐纵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查封的事情，大致不会实行。我们的政策，依然放在资本家、地主、土豪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1007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2年10月23日。

③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第173页。

④ 《本党同志今后的认识》，重庆《中央日报》，1949年7月25日。

劣绅基础上，米荒的基本原因，是无法解消的。”^①米荒问题无法解决，其他改良主张当然更无法贯彻。

蒋介石看到了国民党党员结构中的严重问题。1942年，蒋介石曾设想将国民党改名为“中国劳动国民党”，“凡党员家庭或本身必有劳农与军人为社会服役者方能取得党员资格”。^②这说明，蒋介石企图对国民党进行脱胎换骨的根本性改造。他还曾提出，拟在三年内造就三万干部，每个革命干部必须下乡工作三年。^③甚至还曾提出，中学生毕业后，“必须任农村服务与社会行政工作”，才能考升大学。^④也曾效法毛泽东，要求党员“为人民服务”，“使智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以推行地方自治及建设社会”。^⑤还曾提出：“各级干部必须由民众产生”。^⑥这些地方，也说明蒋介石深知国民党的痼疾所在，企图有所变革。但是，当时的国民党已经陷入一种全盘性的体制无力与体制腐朽，蒋介石的这些愿望都只停留在他的日记中，无法转化为现实。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成立改造委员会，规定国民党“以青年知识分子，农、工及生产者等广大民众为社会基础”，要求地方党部征求新党员时，“农工约占百分之五十，青年及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生产者约占百分之十”。^⑦显然，这是其大陆时期有关思想的延续。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在台湾推行三七五减租，继而推行土地改革，也是大陆时期有关思想的延续。

改良并非是坏事。一个社会，能够通过改良，不断革故鼎新，避免与暴力革命伴生的对社会的巨大冲击和破坏，推动社会

①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56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0月14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8月10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0月23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卷首；2月11日；《民国三十四年杂录》1945年1月21日。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卷首。

⑦ 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怎样去征求新党员》，第3页。

生产和历史的有序发展，自然是好事。不断改良，也就不断进步。社会蒙发展之益，而无代价过大之虞。否则，不断革命，天天革命，社会将无宁日，也会走向进步和发展的反面。

改良和革命是如影随形的弟兄。历史的常例是：改良受阻，革命就会滋生、成长、壮大。原来的改良主义者，或者向前发展成为革命派；或者坚持原有立场，反对革命，甚至成为旧秩序的保护者。在近代中国，国民党就发生了这样的分化，一部分人转而支持共产党的激烈革命主张，而另一部分人，则始终坚持温和的改良立场。自己的改良搞不下去，又反对别人以激烈的革命手段推翻现存秩序，改造社会，自然，其结果，是自己成为激烈革命的对象。

2004年7月19日急就，2007年5月3日至5日修改，2007年11月三改。

六、家庭生活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 与蒋介石、宋美龄的感情危机

多年前，我在台北阅读根据蒋介石日记编辑的《困勉记》稿本时，曾经发现其1941年2月4日条云：

接妻不返渝之函，乃以夫妻各尽其道复之。淡泊静宁，毫无所动也。^①

当时，宋美龄在香港养病，拒绝返回重庆，蒋介石对此颇为烦恼，但努力克制，回信仅称“夫妻各尽其道”，要宋美龄自便，看着办。“淡泊宁静，毫无所动”云云，说明蒋介石尽管遇到了妻子不肯回家这样严重的事态，但仍处之泰然。

蒋介石自1927年与宋美龄结婚后，虽偶有矛盾，但这种情况，还从来不曾有过。蒋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谜团，直到今年我在胡佛研究所阅读蒋介石日记手稿本时，经过反复参详，才最终解开。

^① 未刊稿，〔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与此相同。

宋美龄留港不归，蒋、宋之间发生冲突

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9月21日，当日蒋介石日记云：

妻工作太猛，以致心神不安，脑痛目眩，继以背疼、牙病，数症并发，渝无良医，亦不愿远离重庆。以被敌机狂炸之中，如离渝他往，不能对人民，尤不愿余独居云。此三年来战争被炸之情形，其心身能持久不懈，实非其金枝玉叶之身所能受，不能不使余铭感更切也。^①

这段话说的是，宋美龄身患数疾，重庆没有好医生，但宋仍不愿离渝治病。一是出于对战乱状况下重庆人民的感情，日本飞机不断狂炸，宋不能独自避难，二是不愿离开蒋介石，使其独居。

同年10月15日，蒋介石日记云：“晚餐与布雷共食，以妻赴港养病未回也。”从这段日记看，为了养病，宋美龄最终还是去了香港。蒋介石很想念，也很寂寞，只能找陈布雷一起吃饭。

12天之后，蒋介石派蒋经国赴港，探望宋美龄的病况，同时迎接蒋纬国自国外留学归来。^②蒋介石本意要宋美龄和经国、纬国一起回渝，但宋美龄表示，待蒋介石的阳历生日时即归。然而，届时宋美龄仍杳如黄鹤。10月31日，蒋介石日记云：

令纬儿来见，以今日为余阳历生辰，陪余晚餐，妻本约今日回来，尚未见到，亦无函电，不知其所以也。

不仅人不回来，连一封函电都没有。蒋介石着急了，“不知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8月21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10月27日。

其所以”一句，充分表现出蒋的焦躁与不安！

蒋纬国归来，两个儿子都在身边，蒋介石很高兴，但宋美龄留港未归，蒋介石觉得不足。11月9日日记云：

经、纬两儿在港得皆见其母，回渝父子团聚，此最足欣慰之一事。如西安事变殉国，则两儿皆未得今日重见矣，实感谢上帝恩惠不尽也。惟爱妻抱病在港，不能如期同回，是乃美中不足耳。

11月30日，蒋介石日记再云：

两儿亲爱，兄弟既翁，此为本月最大之乐事，亦为十五年来最苦之一事。今能完满团团，此非天父赐予至恩，决不能至此，能不感激上苍乎？

爱妻不能如期回渝，是乃美中不足耳！

1925年，蒋经国赴俄留学，和纬国分离。1936年，蒋纬国赴德留学。同年，蒋经国自俄归来，蒋纬国已不在国内。纬国此次归来，蒋介石得以与经国、纬国兄弟同时相聚，享受天伦之乐。至此，恰为十五年。不过，宋美龄留港，蒋介石总觉得遗憾，一言之不足而再言之，可见，蒋介石思念宋美龄之殷。

“圣诞”是西方人的团圆之日，但是，宋美龄仍无归讯，蒋介石开始感到“苦痛”了。12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

三年来圣诞前夜，以今日最为烦闷，家事不能团圆，是乃人生唯一之苦痛。幸纬儿得以回来陪伴，足慰孤寂，得闻家乡情形，聊以解愁。

蒋纬国从国外回到重庆后，曾回浙江溪口一行。蒋介石于百无聊赖之中，只能以听纬国谈“家乡情形”略解愁闷。此后，蒋

介石的这种“孤寂”感日渐强烈。12月28日日记云：“惟妻留香港未回，以致家庭缺乏欣兴之感。”1941年1月12日、13日、14日，蒋介石连续三天在日记中写道：“为家事心多抑郁，应以澹定处之。”“昨夜为中共与家事，忧不成寐。”“下午与纬儿游汪园，各种梅花盛放，绿萼尤为可爱，惜妻今年未得同游也！”值得注意的是14日这一天的日记，受蒋家委托的审读者在开放前涂去一行，显然认为不宜公开。这以后，蒋的“孤寂”感有增无减：

1月26日日记云：“本夕为旧历除夕，孤单过年，世界如此孤居之大元帅，恐只此一人耳。”

同月30日日记云：“近日寂寞异甚，时感孤苦自怜。惟祈上帝佑我，与我同在，使我不至久寂为祷也。”

同月31日日记云：“妻滞港未归，子入团就学，故时以寂寞孤苦为憾耳！”

蒋介石为何有如此强烈的“孤寂”感？显然，和宋美龄滞港不归有关。宋为何滞港不归？则显然与蒋宋之间发生了某种冲突有关。从上引“心多忧郁”、“忧不成寐”等语推测，蒋与宋美龄之间的“冲突”不小。2月4日，蒋介石接到宋美龄“不返渝”的函件。蒋、宋“感情危机”终于爆发。

蒋一再要求宋美龄返渝而宋一直不理，至此正式发函通知。宋的函件今不可见，但无疑可以感知，蒋宋之间发生了重大矛盾。2月9日，蒋纬国回“党政训练班”学习，蒋介石手写《寂寞凄怆歌》相赠。

怎么办？蒋介石的态度是向宋美龄阐述“夫妻各尽其道”，不卑不亢，既不生气，也不告饶，将皮球踢给宋美龄。

蒋介石坚决保守家中“秘密”， 采取“权变”之计，化解矛盾

蒋的冷静、沉稳态度起了作用，宋美龄于1941年2月12日自港返渝，但是，蒋介石的家里并没有平静。同月23日，蒋介石日记云：

家事不宜过于勉强。只有勿助勿忘，以待其自然着落耳！

“勿助勿忘”，语见《孟子·公孙丑》：“心勿忘，勿助长也。”意为（修养时）心里不要忘记，也不要人为地去助它增长。2月24日，蒋介石日记再云：

家事致曲，不宜太直、太急与太认真，应以澹然处之，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耳。

“致曲”，语见《礼记·中庸》，旧解较多，其中一种解释为：将真诚推致到细微之处。2月25日，蒋介石日记又云：

家中之事，不能与家中之人直道，同家亲人不得晤面，是为余一生最大之遗憾，然亦惟有勿忘勿助，以待其自觉。家事切不可强勉而行，自信修身无亏，上帝必加眷顾，终能使我家母子亲爱，家庭团圆耳。令纬儿离重庆赴赣。^①

家事以委屈求全为主，不能与普通交道并论，只求母子亲爱无阻，虽权变尚无损也。

^① 以上文字，开放前被涂去。此据蒋介石《二十九年、三十年要事杂记》（手稿本）补，〔美国〕胡佛研究院藏。又《困勉记》稿本亦有此段记载。

“家中之事，不能与家中之人直道”，说的是：蒋介石有些事情不愿告诉宋美龄。“同家亲人不能晤面”，说的是蒋氏父子与宋美龄之间不能同时相处。但是，蒋介石“自信修身无亏”，所以开始时采取听其自然的方针，但是，思考再三，为了使母子之间“亲爱无阻”，还是决定“委曲求全”，采取某种“权变”的办法。显然，这一时期，宋美龄与蒋纬国“母子”之间“亲爱有阻”了。

蒋介石自述的“权变尚无损”的内容，他没有说，其内容之一大概就是“命纬儿离渝赴赣”，避免和宋美龄见面。蒋要纬国到江西去看看哥哥、嫂嫂，“还有，你母亲也在那里。”^①蒋纬国听命，到赣州会见蒋经国夫妇，也拜见将自己一手带大、从苏州逃难到此的蒋介石的第二任夫人姚冶诚。就在蒋纬国“离渝赴赣”期间，蒋、宋之间的“感情危机”有了显著缓和。3月6日，蒋介石日记云：

本日在参政会讲演，自觉过于滞钝，词不达义，而妻则以为甚得体也。

显然，宋美龄不仅与蒋介石和解，而且政治上支持蒋介石。蒋在国民参政会的演讲，自己不甚满意，但宋美龄却认为“甚得体”。3月9日为夏历二月十二日，系宋美龄诞辰，蒋介石邀集亲友10人为之祝寿。当日气氛融洽。蒋介石为夫妻关系好转欣慰，日记云：“夫妻谐和为人生唯一之乐事也。”但是，他同时也为经国、纬国不在身边遗憾。日记云：“两儿未能参加耳！”

3月27日，蒋纬国自江西归渝。大概此前蒋介石已经做好了宋美龄的工作，因此，蒋纬国“认母”顺利。当日，蒋介石命其

^①汪士淳：《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台北〕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第87页。

向宋美龄行隆重的“叩拜”大礼。日记云：

纬儿已到，令叩拜其母，亲爱如古，不胜欣慰。使我家庭之得有今日之团圆，以偿我一生最大之宿愿，惟有感谢上帝大恩于无涯矣。

十四年来之家事，一朝团圆，完满解决，寸衷之快慰，殊有甚于当年之结婚时也。^①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至此约为14年，多年没有能解决的问题一朝解决，蒋介石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感”。3月29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说：“心神愉快之时较多，尤以母子亲爱、夫妻和睦为最！家有贤妇与孝子，人生之乐，无过于此。”31日，在《本月反省录》中又说：“家庭间夫妇母子之和爱团团，此为一生幸福之开始，是亦修身、正心与祈祷之致也。”至此，蒋宋之间的“感情危机”结束。不过，问题似乎并未完全解决。

对家中的风波以及宋美龄和自己的隔阂，蒋纬国似乎有所觉察，但又不明究竟。1943年4月12日，蒋介石日记云：

近日纬儿心神颇觉不安，彼不愿诉衷，但其衷心自有无限感慨。昨晚乘车外行，彼称前夜梦寐大哭，及醒，枕褥已为泪浸，甚湿，不知其所以然云。彼复言哥哥待我如此亲爱，是我平生之大幸，亦为我蒋门之大福云。言下甚有所感。

第二天，蒋介石在晨祷时，想起家事，不禁泫然饮泣。他写道：“余如何能使彼母子之亲爱亦如其兄弟哉？”“惟祷上帝，能保佑我家庭，使彼母子能日加亲爱以补我平生之缺憾也。”^②

^① 以上两段引文，第一段见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第二段见于《困勉记》。

^② 《困勉记》，1943年4月12日。

此后，蒋介石见到宋美龄和蒋纬国之间关系良好时，就特别高兴。当年12月开罗会议之后，蒋介石、宋美龄与蒋纬国在蓝溪相会，同机返国。12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

登机视纬儿犹熟睡，颇安。以彼于下午忽发疟疾，热度竟至百零二度以上，见母子谈话与母询问儿病，亲爱之情，引为余平生第一之乐事。

由此可见，担心宋美龄与蒋纬国关系不好是蒋介石长期的心病。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是蒋、宋矛盾的原因

研究蒋介石上引日记可知，蒋宋在1940年末至1941年初的“感情危机”，既和宋美龄怀疑蒋介石的“私德”，又和怀疑蒋纬国的来历有关。

蒋纬国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而是戴季陶和日本护士重松金子所生，时间为1916年10月6日。戴季陶因惧内，事先和蒋介石说好，由蒋出面认子。蒋纬国出生后，由日人山田纯三郎带到上海，交给蒋介石，蒋交给当时的夫人姚冶诚抚养，取名纬国。后来甚至有过一种说法：蒋介石也同时和重松金子相好，蒋纬国为蒋介石与重松金子所生。抗战期间，戴季陶在重庆的一次演讲中就曾公开这样宣布过。^①

1920年，蒋纬国随姚冶诚到溪口。1922年随姚迁居奉化。不久，再迁宁波。10岁时到上海，入万竹小学就读。192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姚冶诚携蒋纬国迁居苏州。1928年，蒋纬国考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1934年毕业，进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物

^① 纪云：《戴季陶解蒋纬国身世之谜》，原载《钟山风雨》，此据 skb.hebeidaily.com.cn/200516/ca484340.htm

理系，两年即修完相关课程。又奉蒋介石命，进入文学院，学习政治、经济、社会等课程。在此期间，蒋纬国从未和宋美龄见过面。^①1936年10月，纬国奉父命远赴德国研习军事。这时候，宋美龄本应和纬国见面了，然而，仍然没有见，可能还因此闹了矛盾。蒋介石日记云：“纬儿如期出国，不稍留恋，其壮志堪嘉，而私心实不忍也。”又云：“家事难言，因爱生怨，因乐生悲，痛苦多而快乐少也。”^②

蒋纬国到德后，先后加入德国山地兵团及慕尼黑军校，被授予陆军少尉衔。欧战前夕，奉命赴美，先后进入陆军航空队空战训练班和装甲兵训练中心受训。1940年10月，蒋纬国自美返国，途径香港。宋美龄当时正在香港养病，蒋纬国自然要前往拜见。但是，这是宋美龄和蒋纬国的第一次见面，所以，蒋介石很重视，特派蒋经国到香港。一是为了迎接纬国，也是为了让经国充当纬国和宋美龄之间的“中介”。关于蒋纬国和宋美龄的第一次见面，据蒋纬国回忆：

当时见面非常自然而且亲切。我喊她“Mother，并且在她颊上吻了下，因为出国四年，一些礼节就很欧化了；她亲热地问我在国外好不好等等。我们谈话的气氛可以说一点都没有第一次见面的尴尬。她给我的印象，就好像是长辈看见自己的孩子回来一样。^③

蒋介石很关心宋美龄与蒋纬国的这次见面，事后得知“母子相见，甚为亲爱”。蒋介石非常高兴，日记云：“快慰无量，甚感上帝施恩之厚重也。”^④但是，蒋介石没有想到，宋美龄和蒋纬国第一次见面时的“亲爱”只是当时的“表面文章”，事后宋感

①《千山独行》，第48页。

②《本周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6年10月31日。

③《千山独行》，第83页。

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1年11月3日。

到不妥，于是就发生拒不返渝等情况。

蒋纬国的暧昧身世，今天人们已经很清楚，但是，当时的蒋纬国本人并不清楚。据他本人回忆，回到重庆后不久，在宋美龄的书房中发现约翰·根瑟所写 Inside Asia 一书，其中影射蒋纬国为戴季陶所生，为了某种原因过继给蒋介石了。蒋纬国为此询问戴季陶，戴拿出蒋介石送给他的十二寸带框相片以及一面镜子，对着蒋纬国坐下来，把镜子放中间，自己的头搁在一边，蒋介石的相片搁在另一边。他要蒋纬国照镜子，然后问蒋纬国：“你是像这边的，还是像那边的？”当蒋纬国回答还是像蒋介石“多了些”时，戴季陶笑着说：“那不就结了吗！”^①可见，蒋纬国身世之谜当时还是“机密”，宋美龄显然并不清楚。蒋、宋结婚之后，蒋介石也没有向宋美龄谈过有关情况。宋美龄自然会想：纬国到底是哪个女人所生？为何蒋会相认？蒋介石是否“私德有亏”等等。过去，蒋纬国和宋美龄从未见过面，宋可以不想这些问题，但蒋纬国自海外回渝，宋美龄就面临是否承认并接纳这个“儿子”的严肃问题；上述问题不清楚，宋美龄如何坦然承认并接纳？在这一情况下，宋美龄必然对蒋有所质问，蒋又不愿坦率说明（“家事不能直道”），矛盾因此而生；及至蒋“委曲求全”，采取“权变”后，二人之间的矛盾也就化解了。

蒋介石在世的时候，始终不曾将身世之谜告诉过蒋纬国，很可能，也不曾告诉过宋美龄。

原载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杂志，2008年2月号。

^①《千山独行》，第86页。

关于宋美龄 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

——驳考尔斯，兼辨李敖之误

1985年，美国人迈可·考尔斯（Gardner Milk Cowles）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题名《迈可回顾》（Milk Looks Back），其中写到，1942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Lewis Willkie）访问重庆时，宋美龄曾与之有过“风流韵事”，蒋介石发觉后，气愤地率领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前往捉奸。由于考尔斯是威尔基当年访华时的随员，因此，上述情节很容易取信于人。1986年，香港《九十年代》杂志10月号译载了考尔斯的有关回忆。1995年，李敖等在其合著的《蒋介石评传》中加以引用，并作了详细的论证和分析。其后，李敖又单独署名，写作《宋美龄偷洋人养洋汉》、《蒋介石捉奸记》、《宋美龄和谁通奸》等文，陆续发表于《万岁评论丛书》、《真相丛书》、《乌鸦评论》、《李敖电子报》、《礼敖大全集》等处。近年来，大陆出版的某些图书、刊物以及网站，也都乐于传播此说，竞相宣扬。某著名编剧甚至写到了电视剧剧本中。

如果是里巷儿女之间的偷情，并不值得重视，但是，事情发生在中美两个重要历史人物之间，又经过上述出版物的渲染，就不得不认真加以考察了。

考尔斯细致、生动的回忆

为了考察方便，并利于读者思考、判断，笔者不得不首先引述考尔斯的有关回忆。《迈可回顾》一书写道：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国。宋子文——蒋介石夫人的哥哥的那栋现代化的豪华巨宅，是我们在重庆六天的总部。

六天的活动相当紧凑，有威尔基和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数次长谈；有政府官员的拜会活动；还有委员长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仪态和风度，令我和温德尔两人都感到心神荡漾。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的致词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打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温德尔找我。

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地位，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掩护。当然，十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

我像站岗似地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刻慌乱地提出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掌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我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温德尔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巨大的嘈杂声，委员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把自动步枪。委员长压制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礼仪结束后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哪儿。”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穿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遍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人的确不在屋里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都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温德尔站在一排射击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清晨四点，出现了一个快活的威尔基，自傲如刚与女友共度一夜美好之后的大学生。一幕幕地叙述完发生在他和夫人之间的事后，他愉快地表示已邀请夫人同返华盛顿。我怒不可遏地说：“温德尔，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我列举一切的理由来反对他这个疯狂的念头。我完全同意蒋夫人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美丽、聪明和性感的女人之一。我也了解他们彼此之间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在重庆的报业圈已经有足够多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了。我说：“你在这里代表了美国总统；你还希望竞选下届总统。”我还表示届时他的太太和儿子可能会到机场接他，夫人的出现将造成相当尴尬的场面。威尔基听了气得跺脚离去。当时我已经非常疲倦，于是倒头便睡。

我八点醒来时，威尔基已在用早餐，我们各吃各的，半句话没说。九点钟他有一个演讲。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转身对我说：“迈可，我要你去见夫人，告诉她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华盛顿。”

“那里可以找到她？”我问。他腼腆地说：“在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层，她有一个公寓。那是她引以为傲的慈善机构。”

大约十一点。我到医院要求见夫人。当我被引进她的客厅后，我愚钝地告诉她，她不能和威尔基先生一起回华盛顿。

“谁说不能？”她问。

“是我，”我说，“我告诉温德尔不能随你同行，因为从政治

上说，这是非常不智的。”

在我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她的长指甲已经朝我的面颊使劲地抓了下去。她是这么的用力，以致在我脸上整整留下了一个星期的疤痕。

考尔斯曾任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里斯论坛报》(*Minneapolis Tribune*)和爱荷华州《狄盟市注册报》(*Des Moines Register*)记者，后来创办《展望》(*Look*)周刊，应该说，他的这段故事写得很细致、很生动，但是，这实在是一个破绽百出，编造得非常荒唐，非常拙劣的故事。

威尔基在重庆的日程足证考尔斯“回忆”之谬

威尔基于10月2日由成都到达重庆，7日下午离开重庆，飞赴西安，其间行程斑斑可考。为了以确凿的证据揭露考尔斯所编“绯闻”的荒唐，笔者现依据当时重庆《大公报》的报导及相关档案，将威尔基与考尔斯在重庆的活动排列于下：

10月2日，威尔基等一行于下午3时46分，由成都抵达重庆。旋即驱车入城参观市容。6时许至旅邸休息。

10月3日，上午9时起，在美国大使高斯陪同下，威尔基偕其随员考尔斯（当时翻译为高而思）、白纳斯、鲍培，陆续拜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秉常、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军委会总参谋长何应钦。

10时40分，拜会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谈至11时15分。

11时3刻，威尔基、考尔斯、白纳斯、鲍培赴国民政府，拜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12时，林森设宴招待威尔基。出席者有居正、于右任、孔祥熙、美国大使高斯、考尔斯、白纳斯、梅森少

校、皮耳少校等。

下午3时半，威尔基参观中央训练团，发表演说，长达一小时余。

5时至6时，美国大使高斯假座重庆嘉陵宾馆举行茶会，招待威尔基，到场有孙科、于右任等中外来宾三百余人。6时许散会。

晚8时，蒋介石及宋美龄假军委会礼堂设宴欢迎威尔基。参加者有威尔基及其随员考尔斯、白纳斯、梅森少校、皮耳少校、美国大使高斯、史迪威将军、陈纳德司令、苏联大使潘友新、英国大使薛穆及澳、荷、捷克等国外交使节与夫人。中国方面参加者有宋庆龄、孔祥熙夫妇、孙科夫妇、居正、于右任、王宠惠、吴铁城、冯玉祥、何应钦等多人。

10月4日晨，威尔基由翁文灏陪同，参观重庆工厂。中午，翁在中央造纸厂设宴招待。下午，威尔基返城。

同日下午4时，宋美龄以美国联合援华委员会名誉会长名义假外交部举行茶会，欢迎美国总统代表、美国援华会名誉会长威尔基。出席宋庆龄、孔祥熙、孙科、史迪威及威尔基随员考尔斯、白纳斯、皮耳海军少校、梅森陆军少校及中外记者百余人。威尔基首先参观儿童保育院及抗属工厂作品展览，宋美龄为之“一一加以说明”。参观后，茶会开始，由儿童保育院儿童表演歌舞及合唱。进茶点后，宋美龄致欢迎词，威尔基作答。6时散会。

晚，蒋介石与威尔基长谈3小时半，宋美龄任翻译。

1月5日，上午9时，威尔基由顾毓琇陪同，参观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及南开中学。12时返城，参加教育部长陈立夫举行的宴会。下午至晚间，蒋介石、宋美龄继续与威尔基晤谈。同日，受到威尔基接见的还有史迪威、胡霖、张伯苓、周恩来等人。

10月6日，上午9时，威尔基由俞大维陪同，参观兵工厂。

中午，何应钦在军委会设宴招待威尔基。午后四时，中美、中英、中苏、中法文化协会等18个团体在嘉陵宾馆举行联合茶

会，欢迎威尔基一行。到场有美国大使高斯、苏联大使潘友新及王世杰、冯玉祥等三百余人，由吴铁城致欢迎词。

5时50分，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访问威尔基。

午后7时，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及中美文化协会主席的身份在重庆范庄私邸设宴招待威尔基，宋美龄、宋庆龄、孙科、周恩来、邓颖超、冯玉祥等及美国大使高斯、史迪威、陈纳德，威尔基的随员白纳斯、皮尔、梅森等一百余人参加。席设范庄草坪，所用为“新生活自助餐”。

10月7日晨，蒋介石、宋美龄共同接见威尔基，同进早餐。

9时，威尔基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并回答提问。

10时，威尔基由董显光陪同，参观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出面招待，导往各办公室参观。至11时结束。

下午4时半，由重庆飞抵西安。

综观上述日程，可见整个威尔基访渝期间，由蒋介石主持，宋美龄参加的欢迎宴会只有10月3日晚一次。这次，威尔基和考尔斯都参加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次宴会，而不是考尔斯回忆中所说的会后还需要回到宋宅补进“晚餐”的“招待会”。会后也不如考尔斯所述，客人们分散谈话，以致威尔基可以乘机 and 宋美龄相约，溜出去偷情。关于宴后情况，重庆《大公报》报道说：宴毕，由中央广播电台表演国乐。“音乐节目进行时，威氏倾耳细听，极为注意。每一节目奏毕时，威氏即向蒋夫人询问甚久，蒋夫人则详加解释。”“全部音乐节目完毕，威氏即登台参观乐器。各大使亦继其后。威氏对每一种乐器均详加研究，蒋夫人以极愉快之情逐予解说。蒋夫人并亲抚古琴以示威氏，威氏叹为观止。”“十时半许，一夕盛会尽欢而散。”这期间，有威尔基与宋美龄调情、相约、出溜的机会吗？

重要的是，威尔基来华前和宋美龄从未谋面，到重庆后，3

日中午，和蒋氏夫妇仅有 35 分钟的谈话。晚宴时，威尔基和宋美龄之间的感情怎么可能迅速升温，达到互相默契，外出偷情的高热度呢？

人的记忆常常不很准确。是不是事情发生在其他日子，考尔斯的回忆发生部分误差了呢？也不是。

4 日。这一天，宋美龄为威尔基举行欢迎茶会，考尔斯是到会者之一。有无可能，偷情发生在这一天晚上呢？然而，档案记载，当晚，蒋介石与威尔基谈话，宋美龄任翻译。双方长谈三小时半，不可能发生威尔基要考尔斯掩护，自己和宋美龄开溜的事。

5 日。根据档案记载，蒋介石、宋美龄与威尔基之间的谈话自下午 5 时 15 分起至 8 时 15 分止，地点在重庆九龙坡蒋介石官邸。谈话后，同至曾家岩进晚餐，饭后继续谈话，宋美龄始终在场，也不可能发生和威尔基共同开溜之事。

6 日。孔祥熙在私邸草坪设宴欢迎威尔基。此次宴会取“自助餐”形式，有点儿像考尔斯回忆所述的“招待会”了，然而，这次宴会，蒋介石并未参加，考尔斯也未出席，自然，不可能产生威尔基要考尔斯打掩护，纠缠蒋介石以分散其注意力一类情节。据《大公报》报道，当日的情况是：孔祥熙致欢迎词。8 时 15 分，威尔基致答词，其后即在范庄向中国全国发表演讲词。词毕，继续进餐。餐毕，放映电影。8 时许，宴会结束。又据威尔基自述：晚饭吃过之后，他即受宋美龄之邀，一起入室，与宋美龄“大聊特聊”，一起谈到晚上 11 点，然后是孔祥熙进来，加入“龙门阵”。这是威尔基等在重庆度过的最后一个晚上。第二天下午，威尔基等就离开了。

可见，在威尔基停留在重庆的六天中，不可能发生考尔斯“回忆”所述的一类情节。

此外，现存的蒋介石和威尔基之间的谈话记录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融洽。根据蒋介石本人的统计，他和威尔基的谈话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之多，分别之前，蒋并友好地向威尔基

表示，将来旅顺、大连可由中美共同使用。这种情况也表明，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隔阂。

考尔斯“回忆”的其他明显破绽

考尔斯的“回忆”还有其他不少明显的破绽。

第一，蒋介石举行的“盛大招待会”，来宾众多，蒋介石要一一会见、寒暄的高贵来宾也很多。考尔斯只是威尔基的一介随员，怎么可能用“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缠住蒋介石达“一小时”之久？

第二，蒋介石仅仅在“招待会”上一时不见了威尔基与宋美龄，何以就轻率地断定二人出外偷情，以致于“盛怒狂奔”，率领持枪卫兵冲进威尔基住地，亲自搜查？蒋介石手下特务无数，要了解威、宋何在，何须亲自操劳？此类事情，越秘密越好，蒋介石带着卫兵，当着考尔斯的面搜查，一旦果有其事，当场捉出，一个是罗斯福的特使，一个是自己的夫人，蒋介石将何以善其后？

第三，蒋介石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中国方面的最高军事统帅，又在盛怒中，怎么可能先向考尔斯“一鞠躬”？

第四，威尔基是美国共和党的领袖，罗斯福的特使，考尔斯怎么可能谩骂他：“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第五，宋美龄作为蒋介石夫人，出访美国是件大事，中美双方都需要做很多准备，签证也需要时间，威尔基预定10月9日离华，怎么可能邀请宋美龄“同返华盛顿”；宋美龄作为蒋介石夫人，自然懂得她的出访并非小事，数日之内不可能仓促启程，怎么可能在听说不能与威尔基同行之后，就用“长指甲”朝考尔斯的面颊“使劲地抓下去”？

第六，考尔斯对威尔基说：“在重庆的报业圈已经有够多的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了。”威尔基在重庆停留的时日不过6天，

即使威、宋之间有什么“风流韵事”，报业何从知晓？传播何能如此之快？如此之“足够多”？

以上六条，条条足以证明，考尔斯的“回忆”是编造的，而且编造得极为拙劣、低下。

宋美龄访美并非肇因于威尔基

威尔基于1942年10月14日回到美国。同年11月26日，宋美龄相继抵达，开始了对美国的长达7个多月的访问。此事是否肇因于威尔基呢？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档案记载，邀请宋美龄访美的是罗斯福总统夫妇，1942年8月22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他本人及夫人都非常盼望“蒋夫人能即来敝国”。9月16日，罗斯福夫妇再次致电蒋介石，重申这一邀请。这两次邀请都在威尔基访华之前，可见，宋美龄访美，既非肇因于威尔基，也不需要依赖威尔基的力量。

威尔基确曾积极推动宋美龄访美。根据威尔基的回忆《天下一家》（*One World*）等资料，可知10月5日，威尔基在和宋美龄的谈话中，曾建议宋美龄去美作亲善访问。10月6日晚，威尔基在和孔祥熙谈话时，又说明其理由是：美国人亟需了解亚洲与中国，中国方面有头脑以及有道德力量的人，应该帮助教育美国人。蒋夫人将是最完美的大使，她有极大的能力，会在美国产生极为有效的影响力。他说，凭借蒋夫人的“机智、魔力、一颗大度而体贴的心，高雅美丽的举止与外表，以及炽烈的信念，她正是我们需要的访客”。威尔基回美后，还曾向罗斯福转达过宋美龄希望访美的口信。但是，威尔基的这些举动，都是在执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和指示。在很长时期内，美国采取孤立主义政策，漠视中国正在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战。威尔基反对日本侵华，对中国友好，积极主张援助中国抗日。1940年，他在竞选美国总统时，就主张“应予中国以经济上之援助”。1942年，他多次发表

演说，指责日本“以野蛮手段肆意侵略较弱之国家”，认为“日本为吾人之敌”，而“中国为吾人之友”。他高度评价中国抗战，认为“过去五年来，美国人民甚少能认识中国抗战对于吾人全部文明之重要意义者”。在这些方面，他和罗斯福是完全一致的。

至于宋美龄访美，则一是为了向美国人宣传中国抗战，争取美援，二是为了治病。

抗战爆发后，宋美龄即积极投身对外宣传，特别是对美宣传。她积极利用报纸、杂志、广播、接见外国记者等多种形式，宣传中国抗战。她的宣传受到美国舆论的重视和高度评价。1942年秋，中国抗战还处于艰难时期，自然有进一步争取美国支持的必要。

同时，这一时期，宋美龄的健康状况恶化也迫使她下决心赴美治疗，抗战初期，宋美龄到淞沪前线劳军，突遇日机空袭，宋美龄的座车在匆忙躲闪中倾覆，宋美龄不幸受伤。自此，宋美龄即长期多病。1942年10月下旬，宋美龄的身体状况日差，蒋介石担心宋患有癌症，决定命宋赴美治疗。同月27日，蒋介石日记云：“妻体弱时病，未能发现病因，甚忧。”29日日记云：“妻子体弱神衰，其胃恐有癌，甚可虑也。”30日日记云：“恐妻病癌，心甚不安，决令飞美就医，早为割治。”

可见，宋美龄访美也与她和威尔基之间的所谓“私情”完全无关。

这一阶段，蒋介石、宋美龄之间并无感情危机

如果宋美龄和威尔基之间确有“风流韵事”，蒋介石又曾“发怒狂奔”，率兵搜查，那末，他们二人之间一定会发生感情危机，但是，现存蒋介石日记（未刊）却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

宋美龄访美启程前，蒋介石依依不舍，愁肠百结。如：

11月2日日记云：“为妻将赴美，此心甚抑郁，不知此生尚能有几年同住耶？惟默祷上帝保佑而已。”

11月17日日记云：“下午与妻到听江亭廊前谈对美总统谈话要领十项后回寓。夫妻依依，甚以明日将别为忧也。”

11月18日日记云：“五时醒后不能安眠，默祷妻此行平安成功……九时，送妻至九龙铺机场，同上机，送至新津大机场，换大机……十二时，送妻登机，见其机大……别时妻不忍正目仰视，别后黯然销魂，更感悲戚。并愿上帝赐予生育子女，默祷以补吾妻平生之不足也。”

宋美龄启程后，蒋介石倍感惆怅，11月19日日记云：“‘平时不觉夫妻乐，相别方知爱情长。’别后更觉吾妻爱夫之笃，世无其比也。”

宋美龄抵美后，蒋介石仍然思念不已。如：

11月28日日记云：“妻于二十六日平安飞到美国，并据医者检查，决无癌症，此心甚慰。”

11月29日日记云：“妻于十八日赴美，临别凄怆，儿女情长，今又获一次经验也。”

12月1日日记云：“本日为余夫妇结婚十五周年纪念日，晨起，先谢上帝保佑与扶掖成全之恩德。接妻祝电。晚，往孔宅大姊处举葡萄酒恭祝余妻康健。”

12月31日日记云：“惟以妻在美不能共同团圆为念。”

1943年2月4日日记云：“今日为旧历除夕，孤身独影，萧条寂寞极矣。”

类似的记载还很多。如果宋美龄与威尔基有私情，蒋介石又确有所觉，他能写得出上述日记吗？

在蒋介石和宋美龄漫长的婚姻生活中，有过两三次感情危

机。例如，1940年10月，宋美龄赴香港养病，曾长期拒绝回渝。次年2月4日，蒋介石日记云：“接妻不返渝之函，乃以夫妻各尽其道覆之。淡泊静宁，毫无所动也。”这段日记表明，蒋宋之间发生了某种矛盾（关于此，笔者有另文分析）。而蒋在宋美龄赴美前后的日记表明，二人之间当时不存在任何隔阂。

考尔斯“回忆”的由来与宋美龄在美国所打“诽谤官司”

考尔斯并非威、宋“绯闻”的始作俑者。早在1974年，美国人艾贝尔（Tyler Abell）整理、出版的其父皮尔逊日记（*Drew Pearson Diaries*）的上册中就有记载。该书谈到，威尔基以罗斯福总统特使名义访问重庆时，与蒋夫人有染，蒋委员长盛怒之下，带宪兵到南岸官邸去捉奸，并无所获；威尔基临行去向蒋夫人辞行，闭门二十分钟才出来，等等。考尔斯所述正是皮尔逊日记有关说法的细致化。

皮尔逊是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其人文品不佳，专门挖人隐私，曾被罗斯福斥为“习惯造谣的人”。威尔基访华期间他并不在重庆，更与威尔基没有密切关系。其日记始于1949年，止于1959年，所述宋、威之间的风流韵事完全是事隔多年的道听途说，本无多大价值。然而，由于其事具有“商业价值”，所以日记出版后，迅速受到注意，被美国的每月书会列为重点推荐书目。该会当月的书讯在介绍该日记时不仅刊出威尔基与宋美龄的并列照片，而且下题“匆匆的结合”（*A hasty liaison*）数字。事为台湾驻纽约新闻处主任陆以正发现，上报台湾新闻局，新闻局不敢再继续上报，但宋美龄已读到了一位好事的美国老太太寄来的书讯，大为震怒，指令陆以正在美国《纽约时报》等十大报纸刊登全页广告辟谣。陆以正经过反复考虑，并经宋美龄同意，先向该书的出版公司交涉，要求更正，遭到拒绝。其后，陆以正即收集证据、证词，代表宋美龄向纽约州最高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要求出版公司与艾贝尔赔偿宋美龄的名誉损失三百万美元。经过一年多的谈判磋商，出版商最终接受三项条件：一、公开道歉；二、承诺在本书重版时，将诽谤的文字删除；三、律师费由双方各自负担，被告方赔偿起诉方诉状费、送达费、存证信函费等共七百多美元。此三项条件经宋美龄批准。

后来，《皮尔逊日记》上册再未重印，中、下两册则胎死腹中，永未出版以上情况，俱见陆以正所著《微臣无力可回天》一书，台北天下文化书坊 2002 年 4 月出版，兹不赘述。

考尔斯反复无常

据说，按英美制度，提出诽谤诉讼，原告如为公众人物，有责任提出对方诽谤不能成立的证据。陆以正代表宋美龄控告皮尔逊日记的出版者及编者，就必须设法证明该书所述纯属子虚。

在找寻证据的过程中，陆以正找到了考尔斯（陆书译作柯尔斯）。其情况，陆书写道：

我去见柯尔斯，他没想到事隔三十年。还有人记得他曾在战时到过重庆，相谈甚欢。我问他《皮尔逊日记》所提的故事是否正确，他大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绝对没有！”我说可否请他给我一封信，以当年陪伴威尔基访华记者的身份，说明绝无此事。他马上唤女秘书进来，口授了一封信，签名交给了我。这样豪爽的个性，至今令我难忘。

陆以正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大概也一直没有发现，当年这位保证“绝对没有”此事的“证人”十一年后又又在“回忆”中，以当事人的身份，活灵活现地描述了本文一开始引述的那段“风流韵事”。

怎样理解考尔斯的反复无常呢？看来，只能用“商业价值”

来解释了。为了吸引读者，考尔斯在写作自己的回忆录时，终于觉得那段“八卦新闻”还是很有用；而且，即使再为台湾方面发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皮尔逊日记》的官司不是七百多美元就了结了吗？

原载台北《传记文学》2003年5月号及《百年潮》2003年第10期。

宋美龄的巴西之行 与蒋介石的“婚外情”传说

——兼析其事与美国人要蒋交出军权之间的关系

1944年7月9日，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宋美龄突然离开重庆，去巴西休养，自此长期不归。直到一年后抗战胜利，宋美龄才翩然回国。关于此事，许多宋美龄的传记和相关著作都认为其原因是：蒋介石在重庆有了“婚外情”，宋美龄因此一怒而去。

事实是否如此呢？

可疑的送别茶会

蒋介石的《事略稿本》（未刊）1944年7月5日条云：

约集各院院长及各部会高级干部与欧美友好，计共60人，举行茶会，为夫人饯行并坦白说明外间之流言蜚语与敌党阴谋之所在。继夫人亦起而说明对公人格之信仰，措辞均极有力也。而居正、戴季陶等各院长亦各先后发言，金谓公之为，厚重严谨，久为众所敬服也。^①

^①《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藏。

这段记载很含糊。考察有关史籍可知，当年7月，宋美龄即将离开重庆去巴西养病。“为夫人饯行”云云，说明会议主题是为宋美龄送行。会上，蒋介石坦白说明了“外间之流言蜚语与敌党阴谋之所在”。接着，宋美龄起而发言，表示相信蒋的“人格”。又接着，居正、戴季陶以及国民政府各院院长纷纷帮腔，对蒋的“品格”大唱赞美歌。这就奇怪了，饯行会为何变成为蒋介石辨诬的“辟谣会”呢？所辟之“谣”为何？

查蒋介石日记当年7月4日条云：

下午，回林园，与妻商谈，约干部与友好聚会，说明共产党谣诼，对余个人人格之毁誉无足惜，其如国家与军民心理之动摇何！乃决约会，公开说明，以免多加猜测。^①

这则日记说明，会议是在7月4日与宋美龄商谈之后决定的，目的在于辟谣，谣言内容有关蒋的“人格”。至于谣诼来源，《事略稿本》仅模糊地说明出于“敌党阴谋”，而这则日记则点明是“共产党”。蒋介石长期敌视中共，所以并未调查，也未加论证，就武断地确定是“共产党谣诼”。

再查当年7月6日蒋介石的日记，中云：

妻近接匿名信甚多，其中皆言对余个人谣诼、诽谤之事，而惟有一函，察其语句文字，乃为英〔美〕国人之笔。此函不仅诋毁余个人，而乃涉及经、纬两儿之品格，尤以对经儿之谣诼为甚，亦以其在渝有外遇，且已生育孳生，已为其外遇之母留养为言。可知此次蜚语，不仅发动于共党，而且有英美人为之帮同，其用意非只毁灭我个人之信誉，且欲根本毁灭我全家。幸余妻自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信甚笃，不为其阴谋所动，对余信仰益坚，使敌奸无所施其挑拨离间之伎俩。可知身修而后家齐之道乃为不变之至理，安可不自勉乎哉！

从这则日记看，谣言出于写给宋美龄的“匿名信”，内容不仅“诋毁”蒋个人，还涉及蒋的两个儿子，特别是蒋经国。“似为英〔美〕国人之笔”，据此，蒋介石认为，“不仅发动于共产党，而且有英、美人为之帮同”。蒋称，宋美龄充分相信自己，不受煽动。

再查蒋介石7月8日日记：

据妻近日所言，其所接中外人士之匿名信，各种捏造是非，无中生有之诬词，甚于其往日之已言者。反动者此次造谣作用，其第一目的在挑拨我夫妻感情，先使我家庭分裂，然后毁灭我人格，则其他目的皆可迎刃而达矣。惟妻对余笃信不疑，已在饯别时发表其笃信之演词，以粉碎反动共匪一切之阴谋。是此次茶会之功效在此，其他外人对之信与不信，皆所不顾也。

从这天的日记可知，“匿名信”的内容是挑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夫妻感情”，其目的在于使蒋“家庭分裂”，进而毁灭蒋的“人格”。

蒋介石到底蒙受了什么样的诽谤，要在宋美龄出国前隆重召开有“高级干部和欧美人士”参加的会议，郑重“辟谣”？

蒋、宋同场表态

查王世杰1944年7月5日日记云：

蒋先生今日约党部、团部、干部同志三四十人暨中外基督徒

若干人在山洞官邸茶会。在会中，蒋先生宣布两事：一、蒋夫人将赴巴西养病，休养毕将访若干友邦；二、外间近有人散布谣言，诬蔑蒋先生私德，谓其有外遇等等情事者，有人欲藉此类造谣以摇动同志与军队对彼之信心。蒋夫人亦有演说，指述此类诬蔑之用意，与彼对蒋先生之敬信。^①

蒋介石的日记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而王世杰的日记则写得比较坦率，“谓其有外遇”，原来，是一则有关蒋介石私德的“绯闻”。王世杰当时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监察会监察，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显然，他是参加了“辟谣会”的。

至此，问题算是解决了，然而又没有完全解决。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收藏的《史迪威文件》中藏有一份“辟谣会”的会议记录，可以解决我们的大部分疑问。

记录为英文打字稿。其一为《委员长在75位客人参加的会议上的讲话》，现译为中文：

在我的妻子因神经衰弱出发去巴西之际，我决定为她举行送别会。你们都是我的朋友。我想坦率地说明某些事情的时刻已经到了。我觉得这样做很重要，它将成为维护革命的手段。可能在座的中国朋友会认为我不应该说得如此坦率，但是，这是必需的。

最近，在重庆社交圈里有不少谣言，有些牵涉我。你们已经听到，但是，除了我的妻子之外，只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件事。他是真正的朋友。所有我的朋友都在此，当他们听到此事时应该告诉我。这个谣言说我的个人行为不光明，说我和一个女人有不正当关系，说我和一位护士有非法关系并且生了一个儿子。

当我的朋友告诉我此事时，他建议我不要费心去说明任何

^① 《王世杰日记》，〔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影印本。

事。我知道这些谣言已经一个月。它们已经传播开来，不仅在社交圈，而且也在党内同志中成为闲谈的话题。我想这是很大的耻辱。如果这些谣言在人群中得到限制，这是一回事；当这些谣言在同志中流传时，就是另一回事。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有些同志已经嘲讽地谈论此事。在高级训练班里，说我不能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说我已经请别人做我的工作，说我不去办公室。

记录稿称：“说到这里，委员长详陈他每周所做的固定工作，以及投入大量时间接听电话，阅读文件。”蒋接着说：

没有一个地方我既能工作，并且适合于大家。我没有一小时能轻松。我不能休息。除了横膈膜附近有伤，我只能坐在沙发里。当我坐在椅子上，我感到非常累，疲乏，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去办公室并且不能在会议上长时间停留的原因。

显然，我的品格还没有足够伟大，使每个追随者都绝对相信我。

民国二十三年，我的妻子和我提倡新生活运动。由于这种道德力量，我们得以成功地反对共产主义并抵抗外国侵略。如果我像传说所称那样，我的真诚何在？我的将来和中国的将来相联系。作为领导者，任何对我的污辱就是对国家的污辱。我们必须询问自己，我们的道德标准是否足够高。如果我的道德标准被玷污了，我如何面对国家？我怎能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主席？

我为什么说这些事情？我恳请诸位了解我的人格。敌人找不到摧毁我们的办法，所以他要让我们丢脸。他不能摧毁我们，只能使我们丢脸。这些谣言并非指向我，而是指向国家。所有我的朋友长期和我患难与共，艰危相济。我必须让他们知道这些情况。我很惭愧。我自觉个人品格还没有高尚到使你们绝对相信我。在这样的时刻，我很遗憾，诸位不能培植对我的信任。

我国是弱国。如果我们企图引导战争走向最后胜利，就必须通过锻炼，使道德完善臻于正直。我们不应该逃避这些事。我们必须

做每一件事情，才可能掌握真理。这是击败邪恶企图的唯一办法。

在上一个十年中，如果我曾经有过一些贡献，这就是道德上的贡献。我是一个基督徒。相信它的戒律并且绝对服从。假如我不遵从这些戒律，我就是异教徒。朋友们，你们的生活和命运完全和我相连。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不敢做任何错事。我过去五年的记录是一本公开的书。假如你们不相信我，可以询问我的服务人员，并且调查我的举止。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有记录。我和妻子的感情绝对纯洁。我们的关系中没有任何污点。我的生活里没有任何事情不能公开。如果谣言所传是事实，那就称呼我为伪君子就是了。我召开此次会议，是为了挫败敌人的有害目的。只有当所有人都已经达到道德的高标准，我们才能面对公众；只有我们能引导战争走向胜利的时候，我们才能面对孙逸仙的在天之灵。

蒋介石的这份讲演稿说得很清楚：谣言的内容是他和一位护士有不正当的关系，并且生了一个儿子。蒋介石力辩绝无此事。他是基督徒，以教义自律；又是新生活运动的提倡者，对自己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他和妻子的感情绝对纯洁，没有任何污点。

蒋讲话后，宋美龄接着表态。她说：

委员长提到的谣言已经遍传重庆。我已经听到这些谣言，收到许多就这一问题写给我的信。不是作为妻子，而是作为真诚的爱国者，我觉得使委员长知道这些谣言是我的职责。

但是，我希望说明，永远不可能让我为这些谣言低首弯腰；我也不会向他询问，这些谣言是否真实。如果我怀疑委员长，将是对他的侮辱。我相信他是如此正直，相信他的品格和他的领导。我不能为任何事情侮辱他。我和他结婚已经17年。我和他共同经历了所有危险，严重者如西安，所以我了解委员长性格的每一面，他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了解他的性格，我完全相信他的正直。我希望，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些恶意的诽谤。

昨天，当委员长告诉我，他正在召集朋友们到一起，我的第一个反映是：“不要麻烦，谣言会自行消亡。”他回答说，这不是对个人的诽谤，通过诽谤他，他们正在诽谤作为一种道德力量的中国。这些恶意的诽谤应该立即消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是经济，不是军事，不是工业。中国的贡献是道德力量。

委员长的领导正在朝向更高的目标。不断追随主的脚步，那时，他是中国的力量。

宋美龄的讲话强烈表达了他对蒋介石道德上的信任，并且将是否相信这些提升到是否爱国的高度。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妇女月刊（《妇女争鸣》）编者陈逸云说：她第一次听到这些谣言在三个月以前，深受打扰。她觉得，任何相信这些谣言的人都是叛国者。

戴季陶说：应该信任委员长。多年以前，当我在东京和日本战争部长共餐时，我因认为中国有能力坚持，而被反复嘲笑，视为笑柄。但是现在，在委员长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战斗了7年。（戴先生的评论被随意弄乱，这里不是正确的引用。）

委员长最后说，本项活动不公布。^①

据记录，本次茶会参加者包括政府高级官员、教士、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等等，共75人。地点在歌乐山总统官邸。

以蒋、宋二人谈话为主体的这份会议记录不仅有英文本，而且有中文本。吴稚晖就曾收到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萧自诚的一份来函，内称：“兹奉上委员长、蒋夫人七月五日林园茶会讲演辞各一份，敬恳察收存阅，并恳勿向外发表为禱！”可见，有些没有到会的人也接到了记录稿。^②

^① Stilwell, 53-9。〔美国〕胡佛研究院藏。

^② 吴稚晖档案微卷，Roll, 28，〔美国〕胡佛研究院藏。

蒋介石“辟谣”之言可信吗？

蒋介石为个人生活“绯闻”召开如此隆重的“辟谣”会，这是罕见的。其原因，当然在于这一谣言在重庆，特别在国民党党内流传甚广，严重影响蒋介石的个人威信。其次，适当宋美龄即将赴巴西休养，也容易给人“谣言”属实的印象。当年，日本军队在河南发动一号作战，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正处于中国抗战的关键时期，作为抗战统帅的蒋介石的私人道德自然与抗战相关。蒋介石召开“辟谣”会的目的很容易理解。

那末，蒋介石的“辟谣”可信吗？这须要从多方面严谨地加以分析。

一、蒋介石不仅在公开会议上“辟谣”，而且在其日记上多次否认此事。早在1944年5月8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道：“共匪倒〔捣〕乱，造谣中伤诬蔑，甚至以败德乱行之污秽谣诼，想入非非之匪〔诽〕语加诸吾身，以图毁灭吾身家。此种诬蔑与横逆之来，自民国十五年以来，虽非一次，然至今更烈，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者，乃由今日经历所得，更觉其真切也。然余自信此种谣言，一经证明其诬妄，则增益余品性之时，故毁言之来，贤者实以为福也。”这是蒋介石日记中关于此项“绯闻”的第一次记载。一直到1945年末，蒋介石仍念念不忘去年他所经历的“私德”风波。其年终《杂录》云：“共党破坏我个人之信誉，毁灭我个人革命之人格，造作我私生活不道德、各种各样不同之方式谣诼，使全国民众对我绝望而为之遗弃不齿，以达其倾陷领袖夺取抗战领导权的目的。”又云：“离间我夫妻，污蔑我父子，伤害我家庭，夫妇、父子、骨肉之爱情，以期灭绝我血统，非使我国亡种灭而不止。”^①蒋介石的日记身前并未发表，也无发表打算。在公开的场合，蒋介石有意说谎，欺骗公众，可以

^① 《1945年杂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

理解；在自己不打算发表的私人日记里说谎，自我欺骗，似无必要。

二、蒋介石“绯闻”的最大冲击者是宋美龄。作为蒋的妻子，宋美龄不会容忍蒋在个人感情上对她的背叛与欺骗。即使她为了维护蒋作为抗战统帅的形象而委曲求全，但也决不会轻易出席茶会，和蒋介石同步发表上述鲜明而坚决的声明。这一时期，她对于蒋介石必然怨愤有加，冲突势所难免。然而，宋美龄不仅出席茶会，而且坚决“辟谣”。可见宋美龄不相信所传属实。

三、蒋介石早年的生活确实荒唐，但是，他努力以儒家的道德休养规范自己，致力于“存天理，去人欲”。在经过漫长的自我反省和斗争后，渐见成绩。在他加入基督教和提倡新生活运动后，特别是他承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要职之后，仍然继续履行儒学的修养工夫。这一方面，他的日记多有记载。如：

1939年2月4日日记云：“妄念恶意与邪心时起，如何能扫除净尽，如何能为全民表率？应严制而立克之。”

同年2月23日日记云：“污秽妄念，不能扫除净尽，何以入圣？何以治人？岂非自欺欺人之浊狗乎？”

同年5月28日日记云：“妄想恶念，滋生不绝，何能作圣，应痛改之。”

1940年1月3日日记云：“克念作圣，至今邪念妄想，尚不能克洗。何以对圣灵？何以成大业？戒之。”

同年2月11日日记云：“邪念不除，何以为人？”又曰：“年逾五十，尚不能不动心，其能有成乎？”

同年3月16日日记云：“妄念、欲心虽渐减，而未能绝也，究不可以作圣。”

同年4月13日日记云：“不能节欲，焉能救国，戒之。”

从这些日记中可见，蒋要求自己成为“全民表率”，以“人

圣”自期。因此，他在思想中不断进行“天人交战”，狠斗自己的“妄念”、“邪心”和“欲心”，其自我修养有很严格的方面。例如，他要求自己早起，一旦过时，就一再反省，自我谴责。又如，他生活淡泊，不抽烟，不饮酒，基本不喝茶，一旦违反，也会反省、自谴。他不仅要求自己的行为符合儒学标准，而且，狠斗私字一闪念，“察毫微于一念之间”。上引1939年2月23日日记表明，蒋当日仅仅因为“污秽妄念，不能扫除净尽”，竟狠骂自己是“自欺欺人之浊狗”！

蒋的上述日记“邪念”、“妄念”，其具体内容是是什么，我们不能任意猜测，但显然包括他青年时代的痼疾“好色”在内。在另外一些日记内，蒋把这一内容表达得很清楚，如：

1940年4月10日日记云：“人欲、性欲，应节制自爱。”这些日记表明，抗战以来，蒋介石对自己的“私德”有相当严格的要求。在这种状态下，他与某一护士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并且育有私生子的谣言当然不可信。

四、宋美龄患病是事实，医生要她迁地休养也是事实。宋美龄长期多病。1942年10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妻子体弱神衰，其胃恐有癌，甚可虑也。”30日日记云：“恐妻病癌，心甚不安，决令飞美就医，早为割治。”这是宋美龄抗战期间第一次赴美的主要原因。到美国后，经检查，发现并无癌症，但是，身体仍然不好。蒋介石日记中关于宋美龄疾患的记载很多，如1943年：

8月13日日记云：“妻病未痊，甚念也。”

12月5日日记云：“妻近日心神不安，故目疾、痢疾交发，痛苦甚剧。”

12月7日日记云：“妻病痢与目疾，恐难速愈，彼实为国为家集中心力于此一点，以期完成革命也。惟其心急忧甚，故为剧增，奈何。”

12月14日日记云：“妻痢疾已愈，而目疾未见进步，无任忧虑，此总由妻子幽愤之故，应使之心神宽裕为第一也。”

当月，蒋介石偕宋美龄飞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宋美龄一直在病中，特别是宋氏家族许多成员共有的皮肤病，严重地困扰着宋美龄。对此，早在1936年8月22日，蒋介石就记载：“妻病皮肤，甚苦痒，可怜也。”^①进入1943年末，记载日渐增多。如：

12月18日日记云：“夫人皮肤病复发，其状甚苦，至深夜二时方熟睡。”

12月19日日记云：“本日夫人目疾略减，而皮肤病、湿气，为患更剧，以气候转热关系故也。”

12月20日日记云：“在机上，晚餐时，见夫人目疾与精神较昨为佳，不料夜间在机上，其皮肤病复发，且甚剧，面目浮肿，其状甚危，几乎终夜未能安眠。以左医生新来，不知其体质，误用其药乎？心甚忧虑。”

12月26日日记云：“今日吾妻自上午十一时往访罗斯福商谈经济回来，直至晚间霍浦金辞去，在此十小时之间，几乎无一息暇隙，所谈皆全精会神，未有一语松弛，故至晚十时，见其疲乏不堪，彼目疾未愈，皮肤病又痒痛，而能如此，诚非常人所能胜任也。”

开罗会议后，蒋氏夫妇回到重庆，但重庆气候潮湿，多雾多雨，进入1944年，宋美龄的病情日益加重，蒋介石不得不强制她去昆明休养。其情况，蒋介石当年2月29日日记云：

昨日妻湿气更重，手股发肿，痛痒难熬，终夜不得安息，乃决催其赴昆明休养，彼终依依不肯舍家，情笃不可言喻。余不忍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6年8月22日。

其再受如此痛苦，乃准备飞机，强其赴昆，以重庆气候与水分只有增加其病症也。下午三时十五分，送至九龙铺机场起飞。六时前闻妻安全到昆，病亦稍愈为慰。”

又，《本月反省录》云：“妻病湿气更剧，痛苦异甚。”

宋美龄到昆明休养后，病情不仅毫无好转，反而更重了。1944年3月10日，蒋介石日记云：“妻到昆明养病，已逾十日，其病益剧，闻终夜不能安眠，恐成神经衰弱不能久支之象。近日忧虑以此为甚，奈何！”同月15日，宋自昆明回到重庆，病情一度略好^①，但没过几天，又进一步加剧。3月31日，蒋介石日记云：“近日妻病时剧，其痛痒之势，不可形状。夜间又不能安眠，乃至悲泣。”这里，蒋介石用“不可形状”来记述宋美龄的“痛痒”，可见其严重程度。“乃至悲切”，说明宋本人已无法忍受。

又，同年5月3日蒋介石日记云：“妻病‘风疹瘰’已半年余，近更严重，每夜几乎不能睡眠，其能安睡二、三小时之夜，已为难能可贵之事。此种痛痒，诚非身历者不能想象其万一。若上帝不速加怜悯，使之早痊。如此失眠痛苦，神经决难忍受，其病必深入神经矣。今日彼之心神萎顿沉闷，更为可虑也。天乎！”

此后，蒋介石日记常见他对于宋美龄的病况的忧虑。如：1944年3月25日日记云：“妻病亦未痊可，更觉沉闷。”3月27日日记云：“妻病沉滞，甚觉可虑。”5月中旬，宋美龄的病曾略有好转。^②但因日军发动“一号攻势”，河南战局紧张，宋美龄的病很快又变坏。5月21日，蒋介石日记云：“近时余妻及庸之皆因忧成疾矣。”蒋介石6月9日日记云：“惟妻病甚忧。”

6月13日日记云：“晚回林园，妻病日弱，诚家国两忧集于一身矣。”可见，宋美龄皮肤病确实很严重，易地治疗确有必要，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3月15日、18日。

^② 蒋介石1944年5月26日日记云：“本日心神略安，妻病亦较前减轻。”

并非无病呻吟。

至于为什么远赴巴西，笔者 2007 年在美访问期间曾询问宋氏家族的曹琍璇女士，琍璇女士向其夫、宋子安之子宋仲虎先生及宋蔼龄之女孔令仪作了调查，据称，当时听说巴西有个医生善治皮肤病，又因得到巴西总统邀请，所以就去了巴西。琍璇女士的这一说法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得到部分佐证。当年 6 月 29 日，蒋介石日记云：“预定：一、写巴西总统信。”7 月 1 日，蒋介石在《本星期工作课目》中列入“妻往巴西养病”。由此可以得知，宋美龄的巴西之行是蒋介石通过巴西总统安排的。

五、蒋宋之间这时不存在严重冲突，甚至可以说二人之间的关系相当不错。

1944 年 2 月 29 日，蒋介石日记云：“上午，批阅军事公文，以妻病悬念不置。”

3 月 4 日日记云：“下午，写妻信及手抄《真美歌》，祝妻四十六岁诞辰。”

3 月 6 日日记云：“晚以夫人诞辰，独自饮食，感慨不置。”

3 月 11 日《上星期反省录》云：“本月六日，即二月二十二日（旧历），为妻四十六岁诞辰，其湿气与失眠症甚重，在滇休养，心甚不安，独居寡欢，寂寞萧条极矣。”

宋美龄自昆明回重庆后，蒋介石经常陪宋美龄散步、游览、散心。

3 月 16 日日记云：“晚傍，与妻往听江亭游览。”

3 月 19 日日记云：“下午，与妻游览林园后回寓。”

3 月 27 日日记云：“四时与妻游览林园，精神略舒。”

5 月 22 日日记云：“傍晚回林园，与妻游览白市驿。”

6 月 3 日日记云：“下午，与妻乘车郊游后回园。”

这一时期，蒋介石为宋美龄的疾病担忧，宋美龄则为蒋介石的劳累操心。当时，由于战况紧急，蒋介石从凌晨3时起就以电话指挥河南军事，宋美龄很为蒋忧虑。5月5日，蒋介石日记云：“妻甚以余上午三时起而通电话为虑，然此无其他方法可代也。”7月2日，宋美龄决定去巴西养病，当日深夜，二人话别，颇有前途难测，依依不舍之概，据蒋介石日记云：

今日子刻与寅刻，余妻以即欲飞往巴西养病为念，发生悲戚心情。彼甚以最近国家形势甚危殆，而其精神与梦寐之间，皆多各种不利之征兆，甚以此去恐不能复见为虑。彼云：须君牢记世界上有如我爱汝时刻不忘之一人乃可自慰。又云：君上有天父之依托，而下有汝妻为汝竭诚之爱护，惟此乃可自慰也。余心神悲戚更重，不能发一言以慰之。惟祝祷上帝保佑我夫妻能完成上帝所赋予吾人之使命，使余妻早日痊愈，荣归与团聚而已。^①

宋美龄去巴西之后，蒋介石不断给宋美龄打电报。根据现有资料，自当年8月4日起，至同年9月11日宋美龄转往美国，入纽约长老会就医前夕止，蒋约致宋电9通。这些电报尚未全部公布，但已有部分可以见到，举例如下：

1944年8月10日，第403号。巴西中国大使馆蒋夫人：“国内战事与物价较前已佳。”

7月20日，405号。“共党所提条件另报。”

1944年8月26日，第410号。“罗（总统）私人代表哈雷等本月内可以到重庆，甚望吾爱能早日痊愈，回国襄助也。”

1944年9月2日，第411号。“现在美国召开和平组织会议。中美英会议未闭幕以前，似暂缓赴美为宜。”

1944年9月，第412号。“何日飞美？甚念。加拿大仍应如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7月2日。

约访问，不宜令其失望。如何盼复。今日已见哈雷与史迪威，情形较预想者为佳。”^①

从上述电报看，蒋介石如常向宋美龄通报国内情况，甚至向她提供有关中共的机密情报，并且关心宋美龄的身体状况，对她的外交活动提出建议，并无任何芥蒂。

综合以上五点，笔者认为，蒋介石的“辟谣”之言可信。

无风不起浪

谣言有多种形式。一种是毫无根据，一种是有某些影子，在流传中逐渐变形、扭曲，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事实，甚至面目全非，所谓“无风不起浪”是也。

上引蒋介石所记，当时重庆流传的关于蒋经国的“绯闻”：“在渝有外遇，且已生育孳生，已为其外遇之母留养”云云，显指其与章亚若的恋情及生育孝严、孝慈一事，只不过将发生在赣州的事移到重庆了。同样，蒋介石在重庆时期的“婚外情”也有某些“影子”。

一是戴季陶在重庆时曾公开声言，他和蒋介石在日本时共同喜爱一位日本女子，蒋纬国即为蒋介石与该日女所生。据纪云所写《戴季陶解蒋纬国身世之谜》一文，1943年11月12日，戴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曾痛自忏悔称：

到了东京离开中山先生的监护，我和校长（指蒋介石——笔者）共居一室，雇一日本下女服侍生活。那日本下女供奉得我们非常体贴，于是我们两个青年人竟然遏制不住自己，就和她同居了。我因为过去在沪长期纵欲，已经染上恶疾，丧失了生育能力，所以翌年下女生一男孩，就是校长的二公子纬国。我看到校长连

^① 《蒋介石总统家书》，〔台北〕“国史馆”藏。

得经国、纬国，而我犹是伯道无儿，常自恨自悲。几十年来每想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痛恨自身青年时期的荒唐。^①

作者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会后曾将记录稿发表于该校的内部刊物《南泉新闻》上。事隔多年，作者的回忆有若干混乱、谬误之处，例如，戴季陶并非没有生育能力，另有一子名安国，不会有“无后”之叹，等等，但是，蒋纬国的身世长期不明，戴季陶关于纬国为蒋介石早年与日本下女所生的说法自然会在重庆流传开来，并逐渐演变为蒋介石在重庆时与某护士生子的“绯闻”。

蒋介石“婚外情”另一“影子”是陈洁如自上海来到重庆，蒋介石与之重修旧好的传言。

对此，陈洁如的女婿陆久之曾函告著者的同事严如平教授说：“当年轰动山城传说纷纭的‘陈小姐’，原来就是陈洁如。”据事后严所撰文章称：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经过激烈的淞沪会战，上海于11月13日沦于日本之手，租界成为孤岛。隐居于法租界巴黎新村（今重庆南路169弄8号）的陈洁如，是一个民族意识相当强烈的爱国女性，她居安思危，犹如临渊履薄，更是深居简出。1941年12月中旬的一天，她与弟妇庞定贞同去南京路惠罗公司购物，不料竟与陈璧君、褚民谊在电梯中邂逅。陈洁如1924—1925年与蒋介石在广州居住时，与这位“国民主席”夫人是相识的，但如今的陈璧君，已是卖国投敌的大汉奸了，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炙手可热；褚民谊也是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陈洁如惴惴不安之余强作镇静，虚与委蛇；陈璧君则犹如捕获到一个猎物，当即邀陈洁如同去对面的汇中饭店叙旧共餐，饭后并以车送其归寓。陈璧君从此得悉了陈洁如的地址，常来巴黎新村串门，最后还提出了要陈洁如也跟着她一道“曲线救国”，出任汪伪政府的

^① 原载《钟山风云》，此处引自 <http://ckb.hebnews.cn/2000516/ca484340.htm>

侨务委员会副主任。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陈洁如婉言相拒，她为逃脱魔掌，当即毅然只身秘密离开上海，潜去抗战的大后方。

陈洁如抵达重庆后，被秘密安置在山洞（地名）离陆军大学蒋介石官邸不远的吴忠信公馆里。吴忠信是蒋介石 20 多年前的拜把兄弟，互相知根知底，如今受此重托，遂将陈藏于密室而重礼厚待。蒋旧情复炽，经常去吴忠信公馆与陈幽会。虽然行踪秘密，但终究逃不过宋美龄的耳目，一时醋海兴波，闹得不可开交。传说蒋被宋打了一个耳光，又一说蒋的脸都被宋抓破了，致使蒋无法接见外国来宾。素来对宋美龄依顺有余的蒋介石，这次居然我行我素。宋美龄十分气恼，竟于 1942 年 11 月出走美国云云。这一来蒋介石和陈洁如之间的活动也就方便自在多了。据传有一段日子陆军大学的游泳池常有陈洁如的身影，而蒋则坐在池边观看。当时蒋演出的这桩风流故事不胫而走，人言啧啧，盛传“委员长另有新欢”，人皆称之为“陈小姐”，在山城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然而人言言殊，以讹传讹。有的又说是蒋宠爱的这位“陈小姐”是陈布雷的女儿，有的又说是陈立夫的侄女，多少年来神秘莫测，殊不知乃是当年的校长夫人鸳梦重温而已。^①

陆久之在抗战胜利后与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结婚，与陈洁如关系密切，所言当出于陈洁如口述，自有相当的可靠性。^②不过

^① 原载南京《民国春秋》杂志，后收入《陈洁如回忆录》附录，团结出版社，2002。

^② 有关蒋介石与陈洁如在抗战期间在重庆重修旧好的说法也见于奉化王舜祈先生的《蒋氏故里述闻》一书，该书称：“1943 年。一天，周坤和接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发到侍从室的一份电报，内云夫人陈洁如已与太虚法师一起从南洋经香港到达广东。电报用密码拍发，陈洁如、太虚之名都用了代号，有关文字也用了暗语。侍从室的回电是“令四战区派人护送”。太虚回到了重庆（当时太虚在重庆北碚缙云山主持佛事，外出讲经仍回原处），陈洁如则去了上海。那时，宋美龄正在美国治病，同时向美国各界宣传中国抗战形势，要求增加援助。不久，蒋介石趁此良机，决定与陈洁如重叙旧情。”上海书店，1998。不过，王书也没有将有关史事的年月考证清楚。这是传说类著作的通病。

正像所有回忆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年代模糊等局限一样，陆久之将宋美龄负气离开重庆的时间定为1942年11月是错误的，因为那年宋美龄访美，源于怀疑自身患有“癌症”，需要检查和治疗，当时，蒋、宋关系良好。^①

这样，有了蒋介石与“下女”生子的情节，有了在游泳池边常常出现的蒋介石与“陈小姐”的身影，有关传说在重庆不脛而走就不难理解了。

宋美龄对蒋陈关系很敏感。1931年6月19日，蒋介石收到陈洁如自美国的一封来信，为宋美龄所见，蒋于慌乱中将陈函撕毁，宋美龄一气之下，于第二天晚上回沪。^②6月21日，蒋介石赶忙给宋美龄与宋蔼龄写信解释，事情才得以缓解。抗战期间，蒋介石与陈洁如再度相晤，宋美龄有较强烈的反映是必然的。

陈洁如到达重庆的时间说法不一。王舜祁《蒋氏故里述闻》称：陈洁如第一次到重庆时，曾参加军需署署长周骏彦的悼念活动。当时在侍从室为蒋收发电报的周坤和回忆，他在贵宾室发现蒋的身边有一位“中年妇女”，不是宋美龄，而是陈洁如。周骏彦逝世于1940年7月30日，故陈此前必已到达重庆。陈的到来激起了蒋的感情波澜：

1940年10月5日日记云：“最近每夜失眠，回忆青年时代往时，更自惭愧悔恨，而今于性欲旧情，亦时发现不忘，可知此心恶根未尽，何能望其与圣灵交感相通耶！戒之。”^③

同年10月《反省录》云：“心神较安，对于交感上帝之修养，似有进步，但杂念与性欲时有发现，以旧日孽缘太多，不易

^① 参见本书《关于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

^② 蒋介石1931年6月20日日记云：“美妻今晚回沪。昨日之函，不应撕碎，应交其阅，则不致疑，而我之心地亦大白，但见信即恨，故一时心忙，不问是非，立即撕碎，是出于真心，并无他意。”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涤荡尽净耳！^①

同年11月14日日记云：“性欲渐起，旧念重生，应以灵性制之，不可使其放纵。”

上述日记中，“性欲旧情”、“旧日孽缘”、“旧念重生”云云，应该指的就是他和陈洁如的一段老关系。陈洁如在重庆住到什么时候，已不可考。但是，根据周坤和的回忆，1943年，陈洁如第二次到渝，周曾目睹她出席“中美之友社”的成立大会。陈先来，蒋后到。

没有可靠的资料能够说明蒋、陈的“老”关系发展到了什么样的“新”程度，但是，却有蛛丝马迹可以说明，蒋、宋关系因之发生裂痕。

宋美龄1942年11月开始的访美之行获得巨大成功。1943年7月，宋美龄回到重庆。初时，蒋、宋感情不错。当年7月5日蒋介石日记云：“昨日下午四时回寓，见妻已到寓，病卧榻上，颈头疼痛，不能摇动矣。孙、孔二夫人与经、纬两儿皆聚集一堂，甚觉难得。亲戚辞去后，夫妻二人晤谈别后经过。妻又报告留美经过要务，殊感欣慰。晚餐后再谈，睡前静坐、祷告如常也。”7月11日《上周反省录》云：“本周夫人平安回国，结果胜利，其病体归来第三日几乎痊愈无恙。夫妻精神疗治，非任何药石所能比较也。”可见二人久别重逢后的亲密状况。但是，到了8月12日，蒋介石日记中就出现了蒋独住重庆黄山官邸，而宋住到新开寺孔祥熙宅“留医”的记载。8月16日，宋美龄病愈，夫妻二人同住黄山，但是，不知什么时候，宋美龄又单独住回孔宅。9月14日，蒋日记自称：“心绪郁结。”15日，蒋的日记起首部分被蒋本人罕见地涂去了五行。这被涂去的部分，应是蒋有不愿告人的秘密。^②日记末段云：

^① 《二十九年、三十年要事杂记》，《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② 蒋日记被涂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胡佛研究院开放前审读者所涂，盖有2006或2007印记，30年后将开放；一种是蒋本人所涂，无印记。

祷告毕，默然就寝。自觉今日之忍痛、抑悲、制愤、茹苦，可谓极矣。

这一则日记显示出，蒋当日精神上受到很大冲击而又不能发作。有谁能拥有如此巨大的本领呢？除了宋美龄，恐怕没有第二人。次日，蒋日记又云：“观月独坐，意兴萧然。”9月19日，蒋又将日记起首部分涂去三行。这以后，蒋的日记中连续可见“独到黄山休息”、“独自静观自然”的记载，足证蒋、宋之间发生矛盾，处于分居状态。联系上文陆久之所述相关情节考察，这应是宋察觉蒋、陈之间“新”关系的结果。9月27日，蒋介石日记云：“正午到新开寺孔寓，与妻谈话后即回。”这一段记载颇可玩味。夫妻之间的一般谈话，没有记载的必要；特别记载而又不记述内容，说明其中有秘密。至10月3日，蒋介石日记又云：“本晚静坐后，与妻同往新开寺孔宅叙谈，即宿于此。”这则日记说明，蒋宋之间达成和解，蒋介石的独居生活结束了。

陈洁如毕竟是蒋介石的前任夫人，因不愿当汉奸而投奔大后方，蒋介石自然要加以接待并妥善安置。蒋介石此举，名正言顺，理由正当。至于是否“鸳梦重温”，这是无从确证之事。所以宋美龄对蒋、陈的重会虽然不高兴，但也不能过加指责。“醋意”不能没有，但毕竟不能成“海”。经蒋“谈话”解释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了。不久以后，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宋美龄荣膺主席夫人，自然更不能揪住蒋、陈旧情不放了。

1944年5月至7月流传于重庆的蒋介石的“绯闻”，所谓与某护士的“不正当关系”，所谓“私生子”云云，对于局外人也许新鲜，对于宋美龄来说，自然不屑一听。她之所以能在“辟谣会”上慷慨陈词，为蒋介石的“私德”背书，其原因在此。

对蒋介石“婚外情”故事最感兴趣的是美国人，
和当时要蒋交出军权的图谋紧相配合

7月9日，蒋介石送宋美龄上飞机。7月13日，中央社自巴西里约热内卢发电报道：宋美龄于13日到达当地，同行者有孔夫人宋蔼龄等。宋等一行受到美国驻巴西大使及巴西高级官员的欢迎。宋将下榻关纳巴拉湾内的波罗柯伊奥岛的旅馆，预计将在此休息数周。14日，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华盛顿正式宣布：

蒋夫人已抵里约热内卢。夫人自美国返国后，即感违和。若干时日以前，即拟离渝，但因华莱士副总统访华之行而暂缓启程。其离渝前数日，曾在私邸宣布决赴巴西休养。蒋主席曾亲自机场送行。

16日，《中央日报》发布消息：“屏除工作，易地养病，蒋夫人抵巴西”。该社称：“蒋夫人于本月9日离渝赴国外养病，业于13日下午到达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本社有关方面探悉：蒋夫人从自去年访美加归来以后，以工作关系，迄无休息机会，致健康未能全复。据诊治之医生言，渝地气候不宜，必须易地疗养，且屏除工作完全休息，则最近期内即可全愈云。”

尽管中央社和驻美使馆陆续发布上述新闻，但是，传言并未止息。8月19日，蒋介石披阅有关情报，日记云：

最可忧者，美国朝野对我个人生活之谣诼层出不穷，尤关于我夫妇家庭间之猜测亦未已。此次吾妻出国养病，为于公于私，皆有损失，然虚实是非，终有水落石出之时。无稽荒谬之谈，必不能尽掩天下耳目，而且美国内亦有主持公道者，故余并不以此自馁也。^①

^①《蒋介石日记》（手稿复印本）。1944年8月19日。

可见，“谣诼”的最大市场在美国。不仅美国民间社会（野），连美国政府（朝）都关注此事。

文献证明，首先向美国传播“谣诼”的就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当年5月10日，使馆秘书谢伟思（Jack Service）曾以《蒋家庭内的纠葛》为题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中称：“关于蒋家庭发生内部纠葛的消息在重庆真是传说纷纷。几乎每个人都能为已普遍为人接受的消息提供一些新的细节和说法，即委员长找到一个情妇。”报告绘声绘影地描写宋美龄对蒋介石的怨恨：

夫人现在谈到蒋委员长时只是用“那个人”。

有一天，夫人走进委员长的房卧室间，发现床下有一双高跟鞋，就从窗口丢了出去，并打中卫士的头。

委员长一度有四天没有会客，因为在同夫人的一次争吵中，他的头的一侧被一只花瓶击伤了。^①

自此，美国的媒体、舆论就大炒特炒蒋委员长的“绯闻”，使蒋觉得脸面无光。1945年初，英美社会甚至流传蒋氏夫妇已经离婚的说法，使得蒋多次慨叹“对余夫妻之谣诼如故也”。^②

美国人为何要这样做？这和当时美国方面企图让蒋介石将军权交给史迪威的图谋紧密相关。

美国军政两方早就对蒋介石及其政府不满。1944年日军发动

^①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94页；参见 Sterling Seagrave: *The Soong Dynasty*, Happer & Row Publishing, New York, 1985, p.379.

^② 蒋介石 1945年1月5日日记云：“毕范宇来谈，英、美谣传余夫妻离婚之说，余一笑置之。此为英人所造也。”又，1月31日日记云：“共匪对吾妻又发动谣诼，以期丧失吾夫妻之信誉，并期离间吾家庭至感情。”《上星期反省录》1945年2月3日：“俄国对我态度渐有好转之象，故中共交涉亦已接近，然而对余夫妻之谣诼如故也。”

“一号作战”以后，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当年7月，马歇尔向罗斯福提出，中国局势颓落，必须让蒋介石将其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美国将军史迪威。同月，罗斯福晋升史迪威为上将，并于7日致电蒋介石，提出这一要求。15日，再次电蒋催促。中国的抗日战争有赖于美国的援助，蒋介石不敢得罪罗斯福，企图以拖延时日的方式软磨。罗斯福于8月10日、23日，两电蒋介石，要他立即采取必要措施，让史迪威及早指挥中国军队，并且威胁他：稽延拖拉，“容有严重之后果”。随后，美国特使赫尔利、纳尔逊及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先后出面，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罗斯福再次警告蒋介石，“务希立采行动，方能保存阁下数年来英勇抗战所得之果实，及吾人援助中国之计划”^①。话说得很清楚，你要是不听话，就别想再得到美援了。然而，蒋介石就是不为所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自然乐于传播并扩展蒋介石的“绯闻”，把他搞臭，促其下台。谢伟思的报告写得很清楚：“批评委员长的人认为，这一切都证明他的基督徒信仰和新生活运动不过是口头上的道德，而另一方面的迹象表明，不要太久，他终会成为旧式的‘军阀’。”报告还有一段话值得注意：“如果性格傲慢而又拘守宗教戒律的夫人与她的丈夫公开决裂，蒋氏王朝就会崩溃。”^②了解此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宋美龄会收到“许多”人，包括一些美国人的来信。

进入1945年，蒋介石终于恍然悟到美国人在其中的作用。他在《民国三十四年大事表》中写道：“去年一年间，中共与美国驻华大使馆协以谋我之阴狠，实有非人想象所能及者，今春美国大使馆之失火，其内容乃为灭绝其对我各种阴谋文书，故而故意纵火也。思之寒心。”同年末，他感慨地写道：

^① 《战时外交》（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第658-659页。

^② 《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93-94页。

以如此毒辣、卑狠、阴险之行动，以常理论之，决无幸免之理，而且已见其大效。美国且已断绝我接济，各地国民亦已信谣逐以为真，几乎街谈巷语皆以为资料，尤以五、六月间美副总统华莱士来华时为极点，而美国自其大使高斯拜辞（十月间）回去后，直至十二月方派哈雷接任，但其政府仍不令其提国书，竟至卅四年一月方提国书，中美国交至此方得初步恢复。言念及此，诚不寒而栗矣。^①

蒋介石以上两段话，有许多不正确的部分。一是毫无根据地将中共牵扯在内，一是过于夸大了此事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不过，美国人确实不能完全脱开干系。其证据：一是如上述给美国国务院写报告的美国使馆秘书谢伟思，一是那些积极给宋美龄写信的美国人，一是热衷于炒作“绯闻”的美国部分舆论界。这些人何如此？很简单。其中固然有对“婚外情”的道德义愤和对那时国民党政权已经充分表现出来的腐朽的憎恶，也和美国方面企图逼迫蒋介石交出军权的图谋有关。当然，他们当时没有可能准确地调查出事情的真伪，而是以讹传讹。在政治斗争中，要打击对手，常常并不需要准确的事实。这种情况，历史上实在太多了。

^① 《杂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